

余戈　著

1944：松山战役笔记

增订本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役。

松山战役（包括密支那、腾冲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

当时参战的官兵们，虽然对抗战的最终胜利抱有信心，但是看到日军如此疯狂地顽抗，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胜利那一天的到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拼光自己这一代人，杀死全部日本男人，也许中国才能熬到胜利那一天！

——余戈（本书作者）

余戈的这本书，有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

（本书）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详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嗅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面对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朱增泉（中将，《观战笔记》作者）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1944：松山战役笔记》像一块厚厚的板砖朝我劈面拍来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质量和沉重，也让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鸟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

——乔良（空军少将，《超限战》作者）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三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本人被全部消灭的战役，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腾冲和缅北的密支那。这三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

—— 余戈

ISBN 978-7-108-05185-1



定价：69.00元

1944：松山战役笔记

增订本

余戈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44：松山战役笔记 / 余戈著. —增订本. —北京：
生活 · 读书 · 新知三联书店，2015.4
ISBN 978 - 7 - 108 - 05185 - 1

Ⅰ. ①1… Ⅱ. ①余… Ⅲ. ①国民党军 - 抗日战争时期
战役战斗 - 史料 - 云南省 - 1944 Ⅳ. ①K265.2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82905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扉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 · 讀書 · 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42.25
字 数 507 千字
印 数 0,001 – 8,000 册
定 价 69.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公元 1945 年

在论及战争的事件的时候，我不敢从道听途说出发，也不敢基于我本人的观念。我所描述的，只是我的亲眼所见；如果系得知于他人，也是作了最仔细、最苛求的探究。这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同一个事件，目击者由于记忆不同，或者对事件的兴趣角度不同，给出的说法也就不同。因而大有可能的是，我的叙述严格地基于史实的性质，可能令人非常失望。不过，如果他想看到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真实画面的话……他就一定会说，我写的东西是有用的，而能够这样，我也就满足了。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

公元前 400 年

增订版前言

2009年8月《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迄今已逾5年。承蒙广大读者厚爱支持，这本书产生了一些反响，被《中华读书报》等媒体评为年度好书，并获得了国家图书馆第六届文津图书奖、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优秀图书提名奖及中国出版集团优秀常销书奖。

读者和社会的认可，当然给作者带来了荣誉感和满足感，但这一切都是转瞬即逝之事，因为作者很快就投入了《1944：腾冲之围》的写作。最初，当作者把《1944：松山战役笔记》的稿子交给三联书店编辑叶彤先生时，还没有写作“滇西抗战三部曲”的想法，但当完成第二部《1944：腾冲之围》后，写作第三部《1944：龙陵会战》的念头已经无法遏制。

同一题材的系列性写作，能使作者在深化认识、积累经验方面形成叠加，但衍生出的问题是，越往后写越对前面的作品不满意。特别是在“三部曲”这个野心勃勃的构想下，有追求完美“强迫症”的作者，发现必须对《1944：松山战役笔记》做一次修订，否则自己都不好意思再翻开它了。这个想法一经向责任编辑叶彤先生提出，立即得到了他的支持——多年以来，他总是这样不动声色地支持作者，甚至能容忍作者在已经开始校对的稿子上增删。作者也是做编辑的，知道交稿讲究“齐清定”，在校样上“打补丁”是个招骂的举动。但，他还是不动声色地接受了。他说，《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一版已印刷6次，下次就以修订版再印吧。

从客观必要性来说，做修订版主要是因为5年来又获得了一些新史料，有些还很重要。如，发现了当时中央通讯社记者黄印文和《扫荡报》记者潘世征所写的战地通讯，其中有两篇直接记述松山之

战；发现了珍藏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弗兰克·多恩将军反攻初期的报告，其中有不少内容是记述松山、龙陵方面的作战的；又发现了几位参加松山战役的老兵，其中有一位是“松山大爆破”的重要当事人；此外，日方重要史料《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和太田毅著述《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也提供了相当丰富、细致的新资讯。打个比方，有专家评说作者的研究写作是“战史拼图”，当发现新的重要的“拼图板”后，怎么能容忍拼好的图案上留有空白或马赛克？

于是，在《1944：腾冲之围》交稿而《1944：龙陵会战》尚未开工的空当，作者用两个多月时间修订了《1944：松山战役笔记》。因为大框架无变动，修订工作总体上是很愉悦的过程，反过来还感慨自己最初的结构搭得好。“结构决定性质”，现在只是锦上添花。当然第一版中一些冗赘的内容，就毫不留情地删掉了。篇幅最大的增补，是补写了1942年5月的惠通桥阻击战及紧随其后的“反攻试探战”一章。这部分在第一版中只是一笔带过，但它实际上是1944年滇西大反攻的一场小型“预演”，当然是不成功的尝试。此外，还增补了有关松山战役的历史照片和一批高质量的作战地图，特别是以万分之一比例的精确地图为底图，标绘了主要地域战斗进程的示意图。要知道，战争期间远征军部队用的地图才是十万分之一比例的，而且极不精确。得到这份大比例尺的稀罕地图，缘于《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受云南省龙陵县政府之邀，作者协助当地做了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工作，该图是当时水文部门的工作用图。

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第一版后记中，作者灵感忽来提出了一个“微观战史”的概念，用来界定自己所做的研究和写作的性质。这些年来，一直在咀嚼它应有的内涵：囊括全部核心史料，从文献爬梳到田野调查，对敌我双方史料进行“互参”，严格的“史料批判”，时空的“网格化”标定，从帷幄到战壕全方位“复盘”与“拼图”；冷静、克制、准确、细致、缓慢的叙事风格，主要用名词动词，少用或不用副词形容词；适度的“理解的同情”，拒绝煽情，拒绝“入戏”，拒绝成为题材或写作对象的“粉丝”和“代言人”……借用书法艺术领域的概念，这也许算是历史写作中的“碑体”？

这些年，云南、贵州等地修复了一些与远征军抗战有关的纪念碑，动因是随着一些被湮没的历史细节进一步清晰化，原来记述粗略且不尽准确的碑文需要修订。为此，作者还帮助提供过一些信息。由此反观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所做的一切也是这个性质：作者真心希望自己所写的书，这耗费了无数木材印制的出版物，也是一座方尖碑，能经得起岁月流转风雨侵蚀。这是“碑体”这一概念的引申含义吧。

《1944：松山战役笔记》出版后的几年，作者曾数次重返松山，每次都看到这本书在山上和当地的蘑菇、瓜果等山货摆在一起出售；有不少游客还带着此书自驾来到松山，对着地图和文字在山上寻觅战场痕迹。这情景真是令作者备感欣慰。“微观战史”追求所写的一切均能“落地”，因此《1944：松山战役笔记》无意间竟成了一座山的“导游手册”。该书出版第二年，龙陵县政府曾在腊勐乡松山村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授予作者“松山荣誉村民”，那么作者所生产的这个“山货”，也算是荣忝松山“土特产”之列了。在这方被鲜血浇灌的土地上，做一个勤恳踏实的劳动者，这是一份莫大的享受。

2014年5月26日

序一　研究战争史的新视角与新方法

余戈是一位军人，是一位真正的军事迷。不要以为只要穿上军装，都自然成了军事迷，不见得。身上穿着军装，却并不真正懂得军事，这样的人并不少。穿上军装，并且懂得军事的人，也不一定全都对军事潜心钻研到入迷的程度。朋友们告诉我，现在的军事网上很热闹，年轻人当中有一大批军事迷，“玩”得很深。他们对当今军事高科技领域的进展情况相当了解，对各种高性能的先进武器装备相当熟悉，对当代军事思想的发展动向也相当关注——虽然并不是每一条信息都很准确，也不是每一种见解都很内行。作为一名老军人，我觉得这是一条好消息，一种好现象。我国近30年来经济繁荣，老百姓生活总体上安定并且日益改善，富裕的人越来越多，一片太平盛世景象。怕就怕，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年轻人当中再没有人关注军事，再没有人钻研军事。如果那样，说明我们这个民族得了健忘症、幼稚病。

我们热爱和平，并不热爱战争，但忘战必危。这句话可以从各个不同层面去解读。从中国的历史层面去解读，中国战败的教训太惨痛了，百年耻辱，没齿难忘。从当今世界现实生活的层面去解读，世界各国的电视新闻中哪一天没有战争？世界哪一个角落没有战争？哪一个国家不在研究战争？哪一支军队不在准备战争？从一支军队、一位现役军人的层面去解读，意义更加直接。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有朝一日，有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同毫无准备地去投入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胜与败，生与死，结果将有天壤之别。从一个民族心理的层面去解读，对于历史上发生的战争，交战双方对战争中结下的怨恨都已释怀了吗？道义责任（哪怕只是

口头上的）都已承担了吗？最后，从厘清战争历史真相的层面去解读，我们对每次战争、每个战役、每次战斗，其取胜或者失利的过程、原因、经验、教训，都搞得十分清楚了吗？不见得。有很多东西至今仍是一本糊涂账，将错就错，以讹传讹。在今后战争中遇到相同的情况，很可能重犯相同的错误。

感谢余戈，他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战争史的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他不是从宏观的、政治的、浮泛的角度切入去研究战争史，而是从军事的、战役的、战术的，乃至从具体的战斗过程、具体的战斗细节切入去研究战争史。翔实、真切、细致、可感，有具体日期、具体人物、具体地点、具体景象、具体过程，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闻到硝烟，如听到枪声炮声，如见到怒江滔滔翻滚的浊浪，和对岸高崖上日军碉堡黑洞洞的枪眼。

余戈写的是真正的战争。他写的是中国抗日战争中一场具体的战役战斗——1944 年发生在滇西的松山战役。就内地半个多世纪来的抗日战争研究史而言，余戈的这本书，有两个突破，或称两个“正视”：其一，正视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正面表现；其二，正视侵华日军在军事行动上的严密作风。这是历史的态度。国民党军，在国内革命战争中是我们殊死拼杀的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它是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同盟军。面对共同的民族敌人——日本侵略军，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热血男儿，都曾为捍卫自己亲爱的祖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应该以历史的眼光共同回眸那一段难忘的战斗岁月。超越时光，“认同”的东西将会逐渐增多。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许多一脉相承的军事文化传统，这是不该否认的。日本侵略军，1894 年发动甲午战争，侵占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1941 年又发动太平洋战争。甲午战争距今 115 年；“九一八”事变距今 78 年；全面侵华战争距今 72 年；太平洋战争距今 68 年。日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战败，1945 年 8 月 15 日无条件投降，距今 64 年。这一切，我们都还记忆犹新。对于中国军人来说，不应该忘记一点：日本侵略军有战斗力。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用“武士道精神”一言以蔽之。要从多

方面去寻找，要从历史事实中去寻找，要从日军的平时训练和对战役战斗的组织实施中去寻找。余戈就是在进行这种具体的寻找。还有，日军、美军对待寻找战亡者、战争中的失踪者的执着，对待处置战亡者遗骨的严谨与庄重，也常常令我颇多感慨。与之相比，我们有时反倒显得草率、粗疏。这是对待人的一种态度，对待军人的一种态度，是对一支军队、一个国家战斗精神的一种悉心呵护。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兵家千古名言，发明权属于我们中国。敢于正视敌人的优点，是我们自信的表现。切记，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把"知己知彼"这句话喊成一句空话、套话。

最后还要特别提到一点：余戈的写作风格，是一种细心考证的风格。他拒绝任何戏说、想象、推理的成分。对于松山战役，他查遍了凡是能查到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所能寻访到的亲历、亲见、亲闻者，踏访了松山战役旧战场的每个角落，显示出军事记者不凡的调查采访、资料鉴别和叙事把握能力，写出了令人颇具"信任感"的文字。

余戈的写作态度把我感动了，我倚在枕上读他的书稿，半夜给他打电话："这篇序我为你写，最迟什么时候交稿？"

朱增泉　中将

2009年2月13日晨草于北京航天城

序二　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

余戈让我惊讶。

20年前，我曾与一位友人争执：为纪实文学是否允许虚构的问题。我坚定并激烈地反对那种认为只要事件真实，细节可以虚构的所谓“纪实文学”。我认为那不过是些没有足够想象力去写小说，却又把多余的想象力用错了地方的不入流作家的可耻托辞。我也鄙视那些貌似占有不少史料，却从不肯勤勤谨谨地通过艰苦的实地采访或仔细甄别遴选史料，直接就从前人著述中大量转抄文字的二道贩子式的所谓纪实作品。对战史类文学，我的看法尤其如此。我甚至从读《史记》那天起，就对书中的许多史实（不是全部）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尽管我毫不怀疑它的文学价值。特别是当一个人读过《八月炮火》、《第三帝国的兴亡》这类出色的战史（后者可以视为部分的战史）之后，你就更不可能容忍有人把那种“注水猪肉”式的文字端上你的精神餐桌。

原因很简单，巴巴拉·塔奇曼和威廉·夏伊勒已经苦心孤诣地把标杆竖在了那里。作家梦想成名甚至一夜成名，原本无可厚非，但需要提醒的是，当你打算起跳时，不妨先抬头注意一下，横杆在哪里？这不是大狗小狗都要叫的问题，而是请别发出虚假叫声的问题，因为能写出信史的作家，必备一种美德，那就是：诚信。对史、对己、对人，无不诚信。

现在，《1944：松山战役笔记》像一块厚厚的板砖朝我劈面拍来时，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它的质量和沉重，也让我长长地吐出了一口乌气：总算在期待了如此多年之后，看到了一部中国人自己写出的、放在世界战史文学橱窗里毫无愧色的作品。

这样说颇有点一篙打翻一船人的味道，但并不妨碍我在这里借机向另一位友人所写的《龙旗飘扬的舰队》致意，因为那同样是一部让人难忘并感佩的战史作品；有所区别的是，姜鸣（该书作者）更侧重于学术，余戈则是文史兼顾。而依我陋见，余戈为这部书所下的笨功夫、苦功夫，要比在这条道上走的大多数人更大。

当然，一部作品的高下，并不仅仅要看作者下了多少笨功夫、苦功夫。才华才是第一要义。但我一向认为勤奋是才华的影子。勤奋与才华如影随形。勤奋未必总能绽放才华，但才华却一定会催生勤奋。

余戈就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不妨先抛开正文，翻翻这部书的附件。一部30余万字的作品，竟有880余条注释，34幅图表（不算插图照片），引用115部（篇）文献以及百余篇报刊文章和网站资讯！一部专门的战史专著，也不过如此了吧？但它却是一部地地道道、典型意义上的纪实文学。

无一事无来历，无一处无根据，以至于所述史实精微到了可以称之为“战争考古学”亦不为过的地步，这怎么可能不让人感叹！

可这还不是这部书唯一让我感叹之处。

我还感叹于作者如史学家般的谨严和克制。为了达成史学意义上的客观性，你能时时感到作者强压下对侵略者的义愤和敌意（这几乎是民族感情的天然属性），去对历史事实进行一种冷静准确的陈述。这正是任何一支史笔所必需的态度。

我更感叹的是，作者对那场从时间到空间都完全陌生且遥远的战场氛围的敏锐捕捉和再现。在这里，我不想引用书中任何一段文字，以免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而更愿意把阅读的震撼留给读者自己去感受。我只想说，即使如我这种以读战史为己任的读者，也很少读过如此这般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浓烈的血腥、烧焦的皮肉、滚烫的弹壳和刺鼻的硝烟味的作品，以致我至今闭上眼睛，都能马上想象出那片寂静的战场下，被太多的鲜血浸泡过的钢铁和铜的腥气以及暗红色的泥土！

读了这部书，你才会了解，人，可能疯狂到何种地步，也可能英勇到何种程度。同样不必要在这里列举，只须想想为了攻克这片十余平方公里的土地，敌对双方共三万多人在这里经过整整3个月

里10场争夺厮杀（还不算那些数以百计的小战斗），付出了近万人的伤亡代价。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以让你一生震颤。

我所读到的这一切，是一个叫余戈的军队文职干部，用4年的时间，一边亲赴松山踏迹觅踪，一边青灯黄卷地在历史书页中翻寻，为我们一点点廓清迷雾，一块块拼接成图的。面对这样一幅惨烈得常常让人不忍直面的真实战史的血腥拼图，你能说什么？

你可以说，这部书填补了后人对这段历史认知的空白。

你也可以说，这部书使我们终于有了从廓清史实到文学价值都足以与外国同行们比肩的战史文学。

你还可以说，这将是一部一上架就会获得战史类模范文本地位的作品。

你更可以什么都不说。那么，在一个残阳如血的黄昏，你走到屋角的某处，坐下来，静静地翻开它，然后，开始读吧。

乔　良　空军少将

2009年2月18日

目 录

“超链接”目录

图表目录

随文部分

书末部分

地图目录

远征军方面

日军方面

其他

序章　他们在寻觅什么?

1

日本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上，只有两次是他们所说的“玉碎战”，也就是日军被全部消灭之战，它们分别发生在滇西的松山和腾冲。[1]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国人打下来的。“玉碎”一词，出自中国史书《北齐书·元景安传》:“大丈夫宁可玉碎，不能瓦全。”“二战”期间，日本电台于1943年5月31日报道日美阿图岛争夺战中日军守备队全员覆没消息时首次使用该词，用以表示“战斗到最后一人”[2]。此后“全员玉碎”一词频频出现在日本政府的战报上。

战后，日本人始终关注着这两个地方。对他们来说，这里是悲惨之地、血泪之地、伤心之地、耻辱之地。

公元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中国的边陲城市昆明。这些日本人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要求，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

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3]

---

〔1〕一说包括缅甸密支那。但日军战史记，密支那日军有约800人逃出，不能算作“玉碎战”。

〔2〕［日］寺田近雄:《日本军队用语集》，日本立风书房1992年版，第97页。日军所谓“全员玉碎”，并非绝对指一个都未存活。比如阿图岛日军共阵亡守备队长山崎保代大佐以下2638名，生还27名。同样，松山日军也有因逃跑、被俘而少量存活者。

〔3〕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1页。

1978年，原侵滇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4]、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

这时，品野实得知原日本驻缅甸大使馆参赞宫泽作太郎曾乘飞机飞越松山上空的消息，就想从他那里了解一点从空中看到的情况。宫泽作太郎曾在1976年1月应中国邀请，从仰光经昆明去北京。飞越怒江的时候，他在距地面7000米的中国民航飞机上注视地面，找到了松山的准确位置。尽管是在空中，但作为日本人，在战后见到松山，这是第一次。

当时，缅甸的北部为克钦族和北部掸邦的缅甸共产党所控制，从仰光登陆的日本人，往北走最远也只能到达腊戌。要接近滇西，唯一的途径就是从空中俯瞰。

不久，由原日军"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组织的一个所谓"慰灵访华团"再次来到中国。品野实积极争取，却未被选中。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1个日本人，第一次进入了云南。他们中间，有从松山战场逃出来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有从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五，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可是，他们仍未能得到允许由昆明再往西行。[5]

1979年之后，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的区域限定在昆明以西

---

〔4〕 随着侵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日军迫于兵力不足，在征兵中实行了4种兵役种类。据1938年8月1日的统计数字：现役兵（征召于1935年至1937年），占11.3%；预备役兵（征召于1930年至1934年），占22.6%；后备兵役（征召于1920年至1929年），占45.2%；补充兵役（征召于1925年至1937年），占20.9%。具体区分是：满20岁接受征兵（体格）检查，以现役征召者于当年12月入伍，服现役2年；退伍以后又服预备役5年4个月；后备役10年；为补充兵者，要服12年4个月的补充兵役。这时军中最年长的1920年征召兵，虚岁已达40岁，30岁以上的预备役兵占近一半，20多岁的预备役兵占两成以上，现役兵是一成多。在这种兵役制度下，一个人会多次被征召入营，40岁以下的日本男性大都不能幸免。到了战争后期的1944年，连品野实这种未曾服过现役、曾被列为"免征"对象的新闻记者，也被扩征进入补充兵行列。据日本《战史丛书　支那事变陆军作战（3）》，转引自［日］藤原彰《解读中日全面战争》，台湾水牛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页。

〔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31、337页。

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游客却个个愁眉不展，他们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莽莽苍山好像一道厚重的历史帷幔遮断了他们的视线。临行，日本人个个面向西方，长跪不起。[6]

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扫日军亡灵的。

据品野实后来所写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所载，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从遥远的滇西战场拿来了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7]

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日本人终于可以打着“旅游观光”的旗号，源源不断地奔赴滇西，来到松山。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着什么，祷告着什么……

当地人见了，不明白他们的意思。于是，就有人托翻译过去问他们：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他们回答：我们在祈祷，祈祷永远和平；愿他们的灵魂升天。

第一句让人疑惑重重：有这样祈祷和平的吗？

第二句让人气愤难平：那样罪孽深重的灵魂，只配下地狱！

还有一位日本老者，带着自己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他指指点点，哇哇呜呜，耳提面命下，其子女唯唯诺诺。于是，就有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唯一逃脱的日军炮兵中尉军官吧？还真猜对了，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20世纪70年代末起他来到滇西不下16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他曾向人宣称，自己的生命就是1/1260，代表死去的1260多个亡灵而活，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属，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

〔6〕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1页。

〔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37页。

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部所在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8]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鬼魂立碑之事，却着实是荒唐无稽之想。

还有其他耄耋老者也不远万里赶来，在这里如丧考妣，长跪歌哭。有人问他何以如此？他们回答：这里有他的战友。当年他们如何亲朋友爱。

你们亲朋友爱，为何昔日对待中国人那样野蛮残忍？他们反反复复而又躲躲闪闪的回答是：“我们是军人，军人……”

2

60多年前，侵华日军在滇缅战场遭受重创，有数万日军遗骨散落在缅甸和滇西各地。实现了到现地祭奠这个愿望后，他们就盘算着将死在这些地方的日军遗骨收集回去。

在日军野炮第56联队战记《炮烟》一书的附录中，有一份日本战后在缅甸收敛阵亡人员遗骨的资料，是自1975年首次派出“收骨团”赴缅甸，直至1980年派出“慰灵团”来我国云南活动的大事记。每次收骨回国后，日本国内的各部队战友会即组织“慰灵祭”，资料中还附有侵占滇西的日军第56师团及其所辖野炮第56联队的历次祭奠活动的详细记录。

这一切的发端，是日本于1973年发起成立“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推动日本政府厚生省于1974年制定出“海外战殁者遗骨收集计划”，并为即将派出的“全缅战联协”团员募集活动资金，当年4月和10月两次共募得8500万日元。据日方统计，日军在缅甸战场的阵亡人员约为13.7万，[9]因此留下大量未能及时处理的弃尸。

1975年，第一次“收骨团”踏上了赴缅旅程，成员由141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10名，老兵90名，阵亡者遗族25名，还有

---

〔8〕《日本新华侨报》文章《怒江大峡谷纪行》，曹光撰文。转自日本新华侨网：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5219。

〔9〕另据日本每日新闻社《一亿人的昭和史》之日本战史别册日本陆军史，日军在中缅印战场投入兵力230800人，战死160400人，战死率69.5%。

志愿者组成的“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 15 名。此次，共收集遗骨 10717 柱。1976 年，第二次“收骨团”赴缅，此次由 163 人组成。其中厚生省职员 12 人，老兵 100 名，阵亡者遗族 40 名，“日本青年遗骨收集团”成员 10 名。此次共收集遗骨 12589 柱。以上两次共收集遗骨 23306 柱。[10]

日本方面如何在缅甸打开的局面，笔者未见详细的资料，然而“金钱铺路”这一点却是不会错的。“二战”之前，缅甸为英国殖民地。日本为实现侵缅意图，战前即派遣特务赴缅积极活动，以支持缅甸民族独立运动为诱饵，组织昂山、奈温等一批缅甸民族精英在日占区台湾、海南予以培训，又秘密遣返回国组建“缅甸独立军”，在 1942 年日军进攻缅甸时积极配合；当时，中国派出远征军第一路赴缅与英军并肩抗日，很多缅甸人却对我怀有深深敌意。虽然昂山后来看清形势，于 1944 年倒戈加入了反法西斯战线，协助盟军对日作战，直至日本投降，但 1947 年英国又反悔当初允诺缅甸独立的协议，指使歹徒刺杀了昂山，使缅甸人深受伤害。此后，缅甸民族主义意识日趋浓烈，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昂山的继任者奈温以仇华反共为政治基点，铲平了缅甸境内的大量中国阵亡军人墓地和纪念碑，却对前来收骨、慰灵的日本人予以配合。

从 1975 年开始，在政府、财团和民众的大力支持下，日本人在缅甸打通了种种关节，在各个战场都修建了大大小小的慰灵塔和纪念碑，不论原址上已盖酒楼还是居民房，日本人皆重金买下做祭祀之所。距曼德勒 30 多英里、伊洛瓦底江边的自敢山，为缅甸著名佛教胜地，山上山下佛塔林立。风光最佳处，有一座由日本人出资修建的巨型鎏金佛塔，是其悼念战死者亡魂之所，白色佛塔基座上，密密麻麻刻满了几千个日本军人的名字。以这座塔为中心，四面有日本人修建的各种慰灵塔、悼魂碑、镇魂牌。甚至，为在缅甸和滇西战死的 800 匹军马也建了纪念碑。每年春秋两季，都有大量日本人在僧人带领下来这里进行祭祀活动。

几乎与在缅甸的活动同步，日本人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云南的活

---

〔10〕《炮烟——龙野炮兵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 827 页。

动。1980 年至 1990 年期间，他们先后 4 次以旅游者身份来到云南，打着“日中友好恳谈会”的旗号，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 年 7 月，“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一行 4 人经有关部门特批，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这些日本老兵当时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

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1990 年，陈晓耘应邀参加欢迎甲谷秀太郎的宴会。甲谷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谷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谷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腾冲旧称）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 1944 年 6 月至 9 月的战斗情况。甲谷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谷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言谢绝了他的请求，并表示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1944 年，日军在滇西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战死的日军尸骨遍地。据甲谷秀太郎提供给陈晓耘的资料，日军遗骨分布如下：拉孟阵地 1250 人，红木树附近 100 人，龙陵周边 2937 人，腾越城及周边 1800 人，瓦甸及大塘子附近 200 人，桥头街及冷水沟附近 100 人，芒市及上街附近 878 人，遮放及滇缅国境附近 400 人，保山附近约 200 人，合计 7865 人。[11] 实际上，这个资料仍然不是最精确的。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全缅战联协”成员曾来到龙陵，欲在城南的伏龙寺举行佛教仪式为战死者“招魂”。遭到当地有关部门拒绝

〔11〕《春城晚报》文章《日本老兵来滇收集日军遗骨未得逞——陈女士讲述 17 年前的故事》，转引自云南日报网：http://paper.yunnan.cn/html/20050804/news_86_323998.html。保山附近的 200 人，应是 1942 年 5 月日军坂口支队渡过怒江后，被远征军第 36 师击毙的一部。

后，他们不死心，将一份“战死者名簿”用塑料桶密封，悄悄掩埋在了寺外山脚下的一棵大树下，但2012年被当地百姓在劳动时无意间挖出。这份“战死者名簿”记载，在松山地区第56师团阵亡1288名；在龙陵地区第56师团阵亡1866名、第2师团阵亡544名，合计2410名。[12]这些资料反映了日军在松山、龙陵、高黎贡山、腾冲等地的阵亡情况，是了解滇西战场战况的重要旁证资料。

松山、龙陵的老百姓，几乎都听说过县外事办公室的人讲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当地没有人为此动心。[13]那么，那些遗留下来的日军遗骨到底在何处呢？据龙陵县史志办公室陈景东先生介绍，1988年至1989年，当地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的目的一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相关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骸和遗物被装在约20个木箱以及40余个陶罐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县史志办公室的仓库内。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又搬迁到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笔者的朋友、著有《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北京作家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曾看到过这些骨灰罐，他将这些日军遗物分为三类：

5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据日本厚生省的统计资料，在滇西战场上，侵华日军共战死14052人。当年滇西群众掩埋日军尸体是为了防止尸体发臭，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陶罐里；

此外，当时在收拾日军遗骨时，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他们的

---

〔12〕据龙陵县松山文物管理所陈院峰先生提供“战死者名簿”副本。

〔13〕2005年8月7日《重庆晚报》文章《松山血战亲历者诉说异国之鬼》，王蓉撰文。

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进了二十几个木箱里。[14]

3

如何对待阵亡人员遗骨，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不同民族对于历史的态度。昔日在滇缅战场交战的日本、中国及其盟国美国，是如何对待这一问题的呢？

日前，笔者重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译的“内部图书”《日本陆军统帅纲领与统帅参考》，这是1928年、1932年日军为方面军和军司令官（中将以上）颁布的战略战术法规及诠释文本，日本自卫队又于1962年重印，作为干部、军事研究者的必读书籍。在书中笔者发现，对于“靖国亡灵”的祭祀，曾被列为日本帝国核心的统治权，由天皇直接行使。具体表述如下：“日本帝国鉴于立宪政治的弊病，为了限制其危害，规定统帅、祭祀、奖励等统治权均不由国务大臣辅佐行使。这就是帝国宪法的精神。”文中所说的统帅权即为兵权，这正是日军被称为“皇军”的缘由；而祭祀权竟位列其次，可以想见这个问题在日本帝国政治构架中的地位。在这一制度和文化理念指导下，日军的做法极为引人注目。

战争之初，日军对阵亡者祭奠规格很高，一般是在战事告一段落后，将阵亡者尸体烧制成遗骨，举行大型“慰灵式”祭奠，而后运回日本，灵位入祀东京的靖国神社。随着战事惨败尸骨成堆，就采取军官割一条臂或一只手，士兵割一只手或一个手指，放在一个专用的“化学燃烧毯”上烧制成遗骨。[15]中国军队反攻时，节节败退的日军脖子上仍挎着白布包裹的骨灰盒同行；除非遭到惨重失败不容及时处置的情况，一般不丢弃阵亡者的遗骨。[16]一位中国远征

---

〔14〕方军文章《云南省龙陵县发现侵华日军遗骨遗物》，转引自人民网日本版：http://japan.people.com.cn/2002/7/22/2002722112601.htm。

〔15〕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42页。

〔16〕日军不遗弃阵亡者尸体，还有“护短不肯示弱”的考虑。凡有伤亡，必严密警戒不令人见，焚烧扫除后方才解除警戒。据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报《腾冲敌情报告书》，转引自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57页。

军军官称，他们最后打下腾冲城东北角，日军除了几个活的，其他死尸垒成一人多高的垛子，一个月下来，上面爬满白蛆。一户腾冲居民光复后回家，发现自家二楼堆满日本骨灰盒，每个盒上放着手表、钢笔、书信、奖章等。这显然是收集好准备后送的。那户人家又惊又怒，一炬焚之。〔17〕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战争惨败，日本人是不会如此狼狈的。而战后的几十年里，他们费尽心力地弥补着这个缺憾。

在中国，抗战胜利后，云南省政府在松山、腾冲、龙陵等战场遗址上修建了阵亡将士公墓，立了纪念碑。特别是在腾冲来凤山麓修筑的国殇墓园，将其西边的小团坡辟为烈士陵园，从山脚至山顶，依编制序列密密排列着全部阵亡将士的小型墓碑，碑上镌刻着每位烈士的姓名军衔。看上去，如同正向山顶冲锋的一列列纵队。而在削平的山顶上，则伫立着攻克腾冲的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大型方尖碑，碑上铭刻着那段历史的述评碑文，那是9168名阵亡将士（其中军官490名，士兵8678名）〔18〕用鲜血和生命为民族解放创造的辉煌业绩和赢得的最高荣誉。可以说，这座设计独特、气势恢宏的抗战阵亡将士陵园，在中国堪称最佳。然而，在“文革”中这些纪念碑和墓地全部遭到严重破坏，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政治气候变化才逐步重修，并于1988年恢复开放。在松山战役中，中国远征军阵亡4000名将士（其中军官157名，士兵3843名）。在今日的松山上，当年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所立的那方断裂又拼合起来的纪念碑；在保山易罗池，砌在池壁上的第8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残件，仍在刺目地提醒人们想起昔日的一幕。而曾经树立在昆明市圆通山的第8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遭毁坏后长

---

〔17〕《凤凰周刊》文章《大国伤心地》，邓康延撰文，2005年第18期。

〔18〕据彭文位、马有樊编《碧血千秋——腾冲国殇墓园资料汇编》之《重修腾冲国殇墓园碑记》。该资料指出，另负伤官兵为10200余人，伤亡合计则为19368余人。但该书中尹文和所作序言又说官兵伤亡为18200余名，其中阵亡8672名将士（其中军官493名，士兵8179名）。该书中还收入霍揆彰《第二十集团军腾冲会战概要》一文，指出战役中远征军共伤亡官佐1234名，士兵17075名，合计为18309名。另，《腾冲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刘春明、毕世铣撰《腾冲国殇墓园概况》中记：阵亡官兵共8671名（军官493名，士兵8178名），负伤官兵10200余名；则伤亡合计约18871名。以上几种数字并存备核。

期仅存基座，原先的碑身早已不可寻觅。直到2013年12月，在云南历史学者戴美政等有识之士的呼吁、帮助下，有关部门才依据历史照片和资料按昔日原貌修复重建。[19]

在缅甸的情形亦令人扼腕叹息。当日本人的"慰灵碑"一个个刺目地树立起来时，当缅甸昔日的殖民统治者英国人的阵亡将士公墓得到最好的保护时，将日本侵略军逐出缅甸的中国驻印军的陵园却难觅踪影。当年中国驻印军在缅北征战匆匆，大多数阵亡将士都是草草掩埋，部队撤回国后再无机会返回昔日战场重修陵园或迁移英烈忠骸。自20世纪60年代起，因为政治原因，缅甸政府铲平了大部分中国驻印军墓地和纪念碑。[20]不少旅居缅甸的中国驻印军老兵提起此事，哽咽难语，老泪纵横。在台湾的孙立人将军得知八莫中国驻印军墓地被毁后，坐卧不安，常常在夜晚用手捶打床沿。此后，每到清明节，将军都要到后山去给那些将士烧纸钱，称他们是"孤魂野鬼"。将军临死时，嘱咐后人要重新修复墓园，并说："如果在台湾不行，那就到大陆去修复！"[21]

在这方面，中国战时的盟国美国的做法颇耐人寻味。当年，配合中国远征军作战的美军顾问及飞行员共阵亡19人，他们都是在当时或在战斗后几天就举办了葬礼。其中军衔最高的威廉·麦姆瑞（William McMurrey）少校在高黎贡山麓的大塘子阵亡后，当地土司还提供了一口价值700块大洋的上好棺木。1946年、1947年美国政府又两次专门派出公益救护队寻找他们的遗骸，用绿帆布袋迁葬回国，送到其亲人手中，举行军队葬礼仪式，并写出国防部的寻找报告，进入国家档案。[22]至于因飞机失事而失踪的"驼峰航线"飞行人员，多年来美国军方一直没有放弃寻找。1996年1月，在云南历

---

〔19〕相关内容可参本书附录《松山战役相关纪念设施考证》。

〔20〕目前，缅甸境内仅在东吁（同古）存留一座中国远征军纪念碑。原碑为1951年由爱国侨领杨光汉发起修建于东吁中华学校校园内，纪念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在同古战役中阵亡的将士。因20世纪60年代全缅华侨学校收归缅甸国有，2000年由远征军老兵杨伯方等缅甸华侨从原址迁出重建。

〔21〕2014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文章《铁血悲情尘封70载　中国远征军遗骸归国记》，记者张文凌、通讯员刘春媛撰文。

〔22〕《凤凰周刊》文章《大国伤心地》，邓康延撰文，2005年第18期。

史学者戈叔亚、中国探险协会主席严江征等人帮助下，美国老兵弗莱彻·汉克斯（Fletcher Hanks）在滇西泸水县高黎贡山片马垭口，寻找到了1943年3月11日失事的一架隶属中国航空公司的C—53型运输机，确认了机长、美国飞行员吉米·福克斯（James Fox）及中国副驾驶谭宣、通信员王国梁等人遇难的事实。[23]

4

直到今天，国内知道松山战役的人仍然不多，来过这个偏远地方的人更属寥寥，也因此万幸地保留下了中国抗日战争最完整的战场遗址，供了解那段民族历史的少数人一次次前往凭吊。松山战役，可能是在中国最无名的地方发生的最有名的战争。

关于松山战役，日本方面的撰述比国内多得多，虽然这场战争中他们只活下来十几个亲历者（包括战俘和逃出者），但几乎每个人都留下了回忆录；作家、研究者的作品更多。[24]而其战后为祭奠死者来过这里的人，也比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国人多，虽然这地方是云南这个旅游大省的一部分。

这些年，日本首相和阁僚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每次均例行抗议，已经成为规律。但是，转换一下思维，为什么我们没有类似的仪式让他们感到压力？其实，靖国神社建在日本，拜与不拜都在他们：在位不拜下台拜；白天不拜晚上拜；官员不拜老百姓拜；行动上不拜心里拜；近处不拜远距离遥拜。他们能跑几万里路来到中国滇西拜，谁能挡住一个民族的精神活动？

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我们也认真地拜点什么，再不要干那些挖碑掘墓而后重建、急用时拜不用时撂荒的事情。因为归根到底，两个民族在信仰上的较量，是靠每个人在心里使暗劲的。看着别人的虔诚笃定而急眼，其实已经面临危机了。2014年3月，经第十二

〔23〕人民网文章《我们为何搜寻“飞虎队”美机残骸——访探险家严江征》：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92/9164/9167/20021014/841849.html。

〔24〕［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中，列举了日本关于松山战役的主要文献，多为亲历者撰述。第25—35页。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国政府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当那段历史翻过70年之后，这姗姗来迟的亡羊补牢之举，无疑是令国人深感欣慰的事。

所幸，在国内，关于松山已有种种传奇。

传奇一：

战争结束几十年后，走滇缅公路经过松山的司机们到这里都屏息静气，当地人都传说每当黄昏或者阴雨天，仍然能听见山谷里传来厮杀声枪炮声。这表明，那段悲壮往事已渐渐被后来人在心里做某种“神化”叙事，从中也可感到这座山在人们心中越来越重的分量。

滇西保山市“金水阁”酒店老板杨建明，小时候常听老人和老司机们讲述松山的故事，民间口述的历史激发了他的兴趣，每次路过松山，他都停下车，在路边静坐片刻，为阵亡将士点一支烟。十余年后，杨建明做生意成功，他寻找到100名活着的滇西抗战老兵，资助他们每人每月100元生活费。从2004年至2007年，共捐助30多万元。〔25〕

后来，在作家方军的宣传联络下，北京的一些青年知道了滇西远征军老兵的情况，在网上建立了一个“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网友们认养了百余名仍生活在龙陵、腾冲的远征军老兵，每人每月捐助50元。〔26〕如今，关爱抗战老兵志愿者组织已经有了全国性网络，无数热心志愿者正在为风烛残年的抗战老兵奉上最后的人文关怀。

传奇二：

1996年4月，云南保山市地方史志学者陈祖樑正在腾冲国殇墓园拓碑，双手黑黑。这天，忽然来了一群日本游客，都是七八十岁的样子，有一个脸上有一道很长的疤痕，有一个是瘸腿。这些日本老头进了墓园后，来到大门口西侧的“倭冢”前，这是昔日腾冲百

---

〔25〕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8日文章《抗日老兵林峰：松山战役后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王雷撰文。

〔26〕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42期文章《救助抗日老兵》，周丽娜撰文。

姓出于人道为收殓日军军官尸骨而修筑的墓地。他们上香拜祭，完毕后就要离去。

冷眼静观多时的陈祖樑，已猜到了这些人的身份，于是大喝一声："站住！"日本老头们很惊讶，陈示意翻译："你们是当年侵略腾冲的日军吧，来到国殇墓园为什么不拜英雄！"

几个日本老兵商量几句后，显得很无奈，只好排成一队，向抗日英雄三鞠躬。事后得知，这些日本游客正是当年占领腾冲邻县龙陵的日军士兵。那个脸上有疤痕的，是当年曾被当地人称作"疤脸伍长"的凶残之徒。[27]

传奇三：

2005年7月，在中国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原中国远征军第11集团军参谋长成刚将军的儿子、旅居美国的成彦邦先生一行回国来到松山。他们在松山一路捡拾地上的小石块，都用签字笔工工整整地标出腊勐、大垭口、子高地、滚龙坡、长岭岗等地名。返程回国登机时，装着石头的行李超重了19公斤，而每公斤需增加15元费用。陪同的人为此咋舌，成彦邦的夫人陈紫薇女士却笑道："值得！这些石头十分珍贵，价值无法计量。"

据了解，成彦邦是要将这些在炮火多次翻犁下顽强生存下来的小石块带回美国，在自己主持的中国抗日战争讲座上以松山石作实证，宣传松山战役的艰苦卓绝和惨烈悲壮，让每一块松山石敲起警钟，让华界同胞不忘国耻，弘扬全民团结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精神，为中华振兴贡献力量……[28]

5

国内关于松山战役的著述虽然不多，遗憾却不少。下面的两则文字出自一部影响广泛的纪实文学。这部作品是国内最早记述滇缅

---

〔27〕据《燕赵都市报》2005年8月30日文章《滇缅公路［3］夺路篇：松山只剩下两棵树》，胡印斌撰文。

〔28〕据云南日报网文章《今古一相接　长歌怀旧游——抗日名将成刚之子成彦邦先生访松山抗战遗址》：http://paper.yunnan.cn/html/20060126/news_88_897871.html。

抗战的力作，对于这段历史的宣传普及功不可没，但囿于当时收集资料的困难，文中也留下了不少史实方面的硬伤。挑出这两则，是因为它隐含的语境耐人寻味。

之一："确凿资料表明，松山大战没能抓到日本俘虏。唯一一个被俘的日本伤兵途中醒来，竟然咬掉一名中国士兵的耳朵，被当场击毙。"〔29〕

这说的是松山子高地被远征军爆破后从土里扒出来的5个被震昏的日本兵之一。作者既然知道这个咬了中国士兵耳朵的日本士兵被击毙，也应该知道同时被俘虏的另外4名最终就范了。事实是，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共俘获日军15人，〔30〕均送往楚雄战俘集中营关押，战后被遣返回日本。

之二："这一天（1944年9月7日）天亮前，8个朝鲜和中国台湾女人打着白旗走下山去，6名日本女人和她们的士兵男人留下来，留在即将毁灭的阵地上，等待生命中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31〕

事实是，日军战前即秘密杀害了中国慰安妇，战斗中强迫所有朝鲜慰安妇自杀，只有9名朝鲜慰安妇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脱或被我俘获而幸存。而当时全部5名日本籍慰安妇在日军保护下，一个都没有死，被远征军俘获后送入战俘营，后被遣返回日本。在松山、腾冲战场被俘虏的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及卫生兵吉野孝公，都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就连品野实在其著述中也说："这样一来，军国主义者们叫嚷的'日本慰安妇都安排朝鲜慰安妇逃走，自己化妆后自杀了'的高论，不就彻底被揭穿了吗？"〔32〕

不妨来分析一下这两则记述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第一则，是想说日本兵信仰坚定、气节无可动摇吗？确实，绝大部分日本兵战死未投降，这足以反衬出远征军作战的艰苦。但是，以"确凿资料"这样耸人听闻的方式作如此夸大，反倒令胜利者在

〔29〕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85页。

〔30〕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载：松山战役中，"守备该地的2000名日军中，只有9名被俘，10名逃脱"。此处日军守备队总人数偏大，应为1300名左右；逃跑人数其实更多一些。

〔31〕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84页。

〔3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82页。

精神上黯然。事实上，处于蒙昧状态下的日军的“勇敢”，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不但有9名做了战俘，还有六七十人在“未奉命”的情况下逃跑，连日军军部都深感玷污了“全员玉碎”的名声，悄然安排归队者去新的战场送死。[33]

第二则，是想说日军对异族妇女仁慈、讲道义，日本女人都是烈妇吗？真不知道这样的描写，该如何面对被杀害的中国同胞和朝鲜妇女的鲜血！

读这样的“纪实”作品，逼得人要亲自去把事情弄清楚，然后用自己相信的方式，告诉那些关注此事的朋友。为此，笔者专程前往滇西，在昔日的战场上久久徘徊，访问了一些健在的远征军老兵。回到北京后，通过档案馆、图书馆和互联网遍查有关松山战役的撰述文字，那段历史渐渐在脑海里显影、复活。

基于所获得的材料和自身的把握能力，笔者首先将目光聚焦于松山。

2004年9月笔者爬上松山时，在大垭口坡上邂逅了神交已久的戈叔亚先生，他正带着又一批媒体记者做有关松山历史的电视节目。此前，方军曾多次向我提到他在云南结识的这位兼具军人血气与人文情怀的学者。在笔者心里，他已经成为这座大山的权威代言人。他曾在个人博客中说：“通过多年研究以及无数次和双方老兵交谈并一同实地考察，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说：松山上几乎任何一处非农业功用的人为痕迹都可能是战争留下来的。完全可以拿着当年中日两军的攻防要图找到任何地方，并根据现存的表面痕迹看出日本军防御阵地配置体系、中国军队进攻线路、战斗的激烈程度和双方作战思想及特点。有几处坑道单兵射击掩体和炮兵阵地甚至清晰可见棱角分明，就仿佛是昨天才挖掘的。在松山，当看到那触目惊心的战场遗迹时，你几乎会听到枪炮声冲杀声、哭喊呻吟和自己怦怦作响的心跳声；可以闻到战火的刺鼻硝烟、烤肉与树叶、泥土与腐肉的混合气味。可以说松山的每一把泥土都被战火烧炼熏焦、被鲜血

〔3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1页。

渗透浸泡。”[34]

笔者正是带着对这段话的体验式心境，小心地走在那座大山的每一个高地上和山洼里。傍晚时分，当一轮血色残阳缓缓坠向西面的群山，那一刻，脑海中那幅日军在横股阵地全员“玉碎”之黄昏的画面，顿时与眼前的景象交融，一时心头涌起无限沧桑。这，莫非就是那种让人沉溺其中难以自拔的历史情怀？

笔者本来想能如刑事案件调查那样把那个山头发生的事情和细节都搞清楚，因为日本人品野实就是这么做的，尽管他们只活下来十来个见证人。一投入其中，笔者才发现这实在是个无法企及的目标：最具参考价值的中国官方战史资料，不过是一两本作战部队编写的叙事简略的油印本小册子[35]（而美军编定的《中缅印战区史》装了满满一个木箱[36]）；尽管有那么多战争亲历者，但是留下资料的却微乎其微，尤其是那些具有“战壕真实”的老兵口述史料，实在是太少了。[37]

为何会如此？这又是个类似如何对待陵园和纪念碑般的问题，一旦深究必定伤心。事实上，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态度，一方面为政治气候所左右，当局者对于历史的评价往往受制于现实功利因

〔34〕戈叔亚新浪博客文章《因松树得名，因血战传世——日军“拉孟玉碎阵地”松山》：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e1cca010008t4.html。

〔35〕即中国远征军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写的《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重庆陆军大学1947年编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存有第103师松山战役战斗详报及阵中日志；此外当时任陆军大学教官的吴致皋观战后编写的《滇西作战实录》中，也记述了松山战役前期新28师的战斗经历。以上资料为原始文献，此后有关松山战役的撰述均以此为据。

〔36〕［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520页。史迪威及其僚属编写的《中缅印战区史》（*History of the CBI Theater*），包括战斗报告、政治方面、各分支机构专述以及综述等内容，经压缩后篇幅为700页。因史迪威拒绝删除其中对蒋介石和英国的批评内容，一度无法公开出版，保存于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后出版时曾以《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为书名。20世纪60年代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组织翻译，在编撰其公刊战史时屡屡引用。另据［英］方德万：《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第10页），美国军方史学家Charles Romanus和Riley Sunderland曾撰写中缅印战区战史三卷本，于1953年至1959年在美国出版。

〔37〕作为“微观战史”写作，离不开对战争亲历者口述史料的引用。虽然口述史料因当事人记忆问题难免存在错漏，但只要依据官方战史等文献资料进行补充与互证，当能辨析其失实、偏差并做校正性注释。本书引用战争亲历者口述史料，均遵循这一原则。关于口述历史作品写作应把握的问题，可参见2008年8月20日《中华读书报》记者王洪波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的访谈文章《口述历史能否给予“历史的真实”》。

素。比如，因为滇缅战场为美国人史迪威所主导，而史迪威后来与蒋介石彻底闹翻，这使得国民党方面甚至将东线豫湘桂战场的惨败都归因于在滇缅战场浪费了过多战力，于是对这段历史加以忽视和贬低；另一方面，或许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模式本来就是惯于“定性”而轻视“定量”研究的；“定性”固然可以经常翻云覆雨、颠倒黑白，即使“定量”也往往就是“莫须有”、“差不多”、“大概齐”。“胜者王侯败者贼”式的历史实用主义观念，让中国的“王侯”和“贼”都一转眼就把刚刚流淌的鲜血擦得干干净净，付出的无数生命只是粗线条文献记载中的一个统计不精确的数字——日本靖国神社里供奉的鬼魂精确到个位数，中国纪念碑的碑文则“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前”概而言之。

多年以来，对于1944年的中国军队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云南历史学者和地方史志工作者徐康明、吴宝璋、戈叔亚、陈祖樑、李正、李枝彩、毕世铣、段生馗等人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寻访调查；凤凰卫视、中央电视台及云南卫视、保山电视台等媒体也曾制作了影响广泛的电视节目，有一些笔者还有幸参与其中。能介入这段被尘封已久的历史，在有生之年以最大努力探寻、还原昔日的一切，对于笔者来说是一份深深的踏实感和满足感。

第 1 章　惠通桥的“罗生门”

（参阅附图 8、附图 9、附图 10、附图 11、附图 19、附图 20）

1

在 Google 卫星地图上寻找松山，大致由北向南流下的怒江可作为参照物。当你在横跨怒江的惠通桥以西找到“腊勐”这个地名，紧傍其北侧的一座大山即为松山，主峰标高约为海拔 2200 米。从松山溯怒江北向绵延而上，则是如鱼脊般逐渐抬升的高黎贡山脉，那里的平均海拔已在 3000 米以上。

松山主峰至怒江江面的垂直落差为 1500 多米，站在松山顶上看怒江，仿佛从空中俯瞰，怒江如深谷中的一条银练；而抬头眺望怒江东岸的山峦，则感觉如在眼前，直线距离不过八九千米，似乎在此岸喊一声，彼岸即可听到，但行程却在 70 公里以上。自保山方向逶迤而来的滇缅公路，经东岸的山头绕“之”字形盘旋而下，至怒江峡谷谷底，跨过惠通桥后又盘旋而上，先通过腊勐街，再环绕松山山腰绵延数千米，而后在西南方向的滚龙坡转向龙陵，再西经芒市、遮放、畹町即可进入缅甸。

古时，这里只有一条陡峭多弯的古驿道，西行者从东岸山上下到谷底，以竹筏摆渡过怒江，再攀援而上至西岸山头，往往要走一整天，且一日里要经历谷底炎夏、山腰凉秋、山顶寒冬三种不同气候，一向被行人、马帮视为畏途，不是万不得已，绝不进入这“高山夹箐，地险路狭，人马不能并行”之地。

1928 年，时任龙陵县长的杨醒苍动议，在此处建成一座“一劳

永逸之西式柔性钢索吊桥”，并延请英国工程师伍布兰·苏卡生帮助设计。两年后，邱天培接任龙陵县长，在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李曰垓支持下，组建18人建桥委员会，继续筹划建桥事宜，并得到缅甸华侨分会会长梁金山捐物支持。历时4年准备，耗资8万银元，于1935年1月14日将原先的土练桥改建成钢缆吊桥。此为滇西第一座钢缆吊桥，桥面宽4.35米，每次可通行负重驮马7匹（约2吨）。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8月7日，经云南省主席龙云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提议，国民政府决定抢修滇缅公路，打通大西南的出海通道。为让惠通桥与滇缅公路配套，又将钢缆吊桥改建为10级荷载公路桥，由国民政府交通总段管理处工程师徐以枋设计，段长陈德培和工程师郭增旺组织实施。改建后的惠通桥长约120米，宽近5.7米，桥墩高约30米，于1939年2月通车。至此，惠通桥成为怒江上唯一可通行汽车的咽喉要津。[1]

1941年12月8日，日军海军偷袭美国珍珠港，陆军横扫东南亚各国，很快兵锋指向缅甸，并觊觎中国云南。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结成反法西斯战略同盟，中、英两国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2]应英国政府请求，中国决以第5军、第6军、第66军3个军10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于1942年3月入缅，以美国派来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中将为总指挥[3]，与英军联手抵抗日军。

此前，自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日军为破坏滇缅路运输，先后出动飞机178架次，对惠通桥进行6次空袭，投弹400余枚，每次轰炸都使桥梁部分受损。虽迭经修复，负载力仍下降，最

〔1〕张树才、李根柱：《战火中的惠通桥》，据《滇西抗战第一枪》，第32页。

〔2〕据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附录《中国远征军中缅印战场对日作战大事记》。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代表在重庆举行东亚军事会议，中、英签订此协议。同日，日军飞机轰炸仰光，美国志愿航空队与英国空军协同作战，击落日机25架。

〔3〕据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附录《中国远征军中缅印战场对日作战大事记》：1941年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组织同盟国中国战区，由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同意后，于1942年1月4日电请罗斯福选派一位美军高级将领担任中国战区参谋长。1月14日美国选派史迪威中将担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场美军司令等职。3月3日，蒋介石在腊戍会见赴华途中的史迪威，决定由史迪威指挥入缅作战的中国军队。3月11日，史迪威由重庆飞赴缅甸履职。

终只能每次通行7.5吨汽车1辆。虽然如此，1942年3月，惠通桥仍承载了中国远征军十万大军及辎重渡越怒江开赴缅甸。

孰料，缅甸战局急转直下。因英国一再延迟中国远征军入缅时间，错失了最佳战机，加之英军配合不力、远征军指挥系统混乱等因素，致使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新38师（师长孙立人）虽曾在同古、仁安羌等地予日军以有力打击，但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最终未能站稳脚跟。特别是对从东线迂回包抄的日军第56师团，我军因对敌情掌握不足而“漏算”，导致全线崩溃。[4]日军乘胜追击，尾随溃败的我军从缅甸北部攻入中国云南。

1942年4月29日，日军第56师团由棠吉（即东枝）攻占腊戍，击溃远征军第66军阻击部队，而后以装甲车队为先导，并用160辆汽车载运其坂口支队（第56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以步兵第146联队主力及配属兵种部队构成）沿滇缅公路急进。5月3日越过中缅边境界河进入畹町，4日进占芒市，5日上午进至松山东麓，架设火炮轰击怒江东岸公路上的我军车辆。千钧一发之际，我独立工兵第24营奉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命令炸断惠通桥。日军第146联队在工兵配合下，操舟艇从上游渡过数百人发起攻击，我少量守桥部队和宪兵[5]难以遏止日军进攻。在此危急时刻，宋希濂第11集团军第36师自祥云星夜驰援，其先头部队第106团（团长熊正诗）于5日天亮前抵达怒江东岸，抢占要地对日军实施阻击。5月6日上午，当美国“飞虎队”飞行员鲍伯·尼尔驾机沿滇缅公路飞临怒江时，发现惠通桥区域已是一片险象环生的灾难现场。

---

〔4〕据倪乐雄《杜聿明将军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转引自黄埔军校网之中国远征军文史馆，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yzjwsg0049.html。但据王楚英撰述，当时远征军已掌握日军第56师团对东线之威胁的形势，但史迪威在英军司令亚历山大说服下，令远征军主力第5军及新38师滞留曼德勒掩护向印度撤退的英军侧翼，拒绝了罗卓英、林蔚、杜聿明等中方将领要求调第5军驰援腊戍的建议，最终被日军第56师团击败战力薄弱的中国第66军（军部及新28师）占领腊戍，从而切断了远征军退路。http://www.yuanzhengjun.cn/wang/3-4.asp。

〔5〕为独立宪兵第2营第5连，连长凌彦。该营此前开赴缅甸执行战地军事警察勤务，遭日军击溃后，第4、6两连转赴印度，第5连退入国境，奉命驻守惠通桥。据2012年8月25日《南国早报》文章《我们没有忘记，从广西走出去的中国远征军》第三章滇西溃败⑤，记者卢大清、钟亮、莫仁力撰文。

2

关于爆破惠通桥，第 11 集团军战斗详报有如下记述：

(5 日) 9 时倾，敌炮向我射击，并有浓密机枪声，该团长（熊正诗）判断敌似已迫近惠通桥彼岸松山附近，该团即占领大山头、乌木郎之线阵地。斯时，沿途车辆与归侨、散兵等各自逃遁，情况异常混乱，尖兵连亦被阻于桥东端，不能渡江。该团长此时在大坪子目睹敌小型战车向惠通桥驶来，枪炮齐发，企图过江，遂令工兵第二十四营将桥梁炸断。[6]

依据此记述，似乎爆破惠通桥的命令为第 106 团团长所下，但这与指挥关系不符。实际上，担负桥梁爆破任务的独立工兵第 24 营隶属中国工兵总指挥部，该营此前已预先接受工兵总指挥马崇六的命令并做详细预案。

1942 年初，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防工程处在保山设立分处，以姚仕基上校任分处主任。其时，中国工兵总指挥兼昆明行营国防工程处处长马崇六作为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成员，与军令部次长兼参谋团长林蔚、参谋萧毅肃等入缅参与指挥作战。2012 年，姚仕基的儿子姚国魂曾据其父生前回忆致函笔者，介绍当时情景：

5 月初，姚仕基接到马崇六从缅甸发来的电令，令其带一个工兵营沿滇缅公路西进畹町执行任务。姚仕基遂与独立工兵第 24 营营长张祖武少校率该营自保山向西开进，一路上与自西而来的逃难军地车辆、散兵、难民交错，行进速度极为迟缓。至怒江惠通桥时，忽接马崇六电令，要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并维持交通秩序，控制大桥以确保自缅境溃败部队后撤。

5 月 3 日，林蔚率参谋团一行自缅甸退至怒江边，马崇六没有继续东撤，留在惠通桥指令工兵营准备破桥事宜。当天傍晚，马崇

---

〔6〕《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 1 辑，第 5 页。

六拟将其指挥车移置怒江东岸半山腰设指挥所，以便居高临下观察情况。临走时，嘱咐姚、张，须依照他的命令掌握时机破桥，做到万无一失。姚仕基答已准备好用炸药爆破方案，也考虑了用汽油烧木质桥面和用工兵斧砍断钢缆等应急方案。马崇六又补充命令，待任务完成后，张祖武带工兵营撤回保山，姚仕基撤上山腰，与自己同车回昆明。

5月5日晨，姚仕基、张祖武等人站在桥头观察情况，忽然日军一排枪炮打过来，工兵营有些伤亡，其中一名副营长牺牲，姚也受轻伤。原来日军先头部队已于清晨进占怒江西岸，即将攻占惠通桥了。就在日军即将夺占西桥头之际，我工兵奉命揿动起爆装置，随着一声巨响，大桥轰然坠入江中。

炸桥后，日军继续向怒江东岸炮轰扫射，张祖武带领炸桥工兵沿怒江边峡谷寻路向保山撤退，姚仕基沿山沟爬上山腰与马崇六会合，刚上汽车，即遭日军炮击，旋即弃车隐蔽，接着汽车被日军炮火击毁，一行人只能沿山沟躲避炮火。在此过程中，姚仕基与马崇六跑散。因负伤加之又饿又困，姚仕基曾在山沟昏迷了一段时间，醒来后沿山中小路徒步返回保山向马崇六复命。[7]

另据独立工兵第24营给养军需长李国屏在《张营长炸桥阻敌》一文叙述：

1942年4月末，张祖武少校奉命率独立工兵第24营赴滇西，准备入缅作战。途经昆明时，张营长请求补充各项工兵器材，全营分乘数十辆卡车沿滇缅公路西行。我当时任给养军需，行军宿营须紧随营长。

5月4日晚抵保山城郊，目睹保山城被敌机轰炸后的惨状，义愤填膺。据百姓告知，敌机常来袭扰，只有早晚较为安全，张营长遂下令次日天明前出发，按规定当日赶到畹町。

5月5日凌晨，全营准时出发，经诸葛营机场转过山坳，逶迤西行不久，再下坡约40公里，便是滇缅公路咽喉惠通桥。我营车队

〔7〕龙陵县政协文史委所提供姚国魂函件。

因前方来车过多，时时受阻，上午9时许才到达惠通桥东岸。这是一座钢索吊桥，又是单行线，西岸来车络绎不绝，桥头宪兵对此失控，秩序紊乱，散兵难民混杂抢行，商车军车推拥争道，人心惶惶，乱乱哄哄，全然是兵败如山倒的不祥景象。因无法过桥，只好在桥东耐心等待。

午前10时许，一辆指挥车来到桥头，车上坐着三位高级军官，询问工兵营长到否。张营长应声上前相见，其中一位是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他又是军政部驻昆办事处主任。马问明张营长携带爆破器材情况后，面带喜色连声说好，好！

——马崇六听到张祖武携带爆破器材何以连声说好？张祖武本人事后曾向人解释：工兵营到昆明时，工兵指挥部曾指示该营卸下旧装备，到缅甸领新装备。但张祖武以戎机莫测，为以防万一，请以原装备带至缅甸，再换新装备。指挥部遂同意其要求。[8]不想此时果然派上大用。

四人立即商量片刻，其中一位用信纸写下一纸手令交给张营长，便匆匆驱车离去。手令内容有三条：一、命令独立工兵第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在惠通桥东端就地待命；二、敌人强占惠通桥时立即爆破该桥；三、任务完成后即电报部。张营长告诉我说，临时奉命炸桥，责任重大，必须要一手令作为凭证。他说另两位是参谋团团长林蔚中将和参谋团处长萧毅肃中将。

张营长立即召开连排长紧急会议，宣布这项临时紧急命令，拿出炸桥方案交大家研究定夺。事不宜迟，迅即行动：一连长胡世安率全连官兵携带已计算够量的炸药及一应爆破器材到桥西端安装；二连长赵宋卿负责在桥中段安装炸药；三连长石坚在桥东端安装炸药及做好各项炸桥引爆准备工作。为确保炸桥成功，张营长决定双引爆，即导火索点火引爆和发电器电引爆，发电器由营长亲自执掌。随后，营长率营连干部逐一仔细检查无误后才返回桥东营指挥地，

〔8〕赵铣编著：《滇西对日抗战》第六章惠通桥作战，第38页。

用望远镜严密监视敌人。

这时，敌机械化部队赶到，占领桥西山头制高点，以猛烈炮火朝东岸射击。

中午时分，张营长突然发现西岸敌人奔扑桥头，向桥上冲来，敌人抢桥了！张营长断然高喊："点火！"他自己则猛力压下发电器手柄，"轰"的一声，惊天动地，峡谷轰鸣，烟尘漫天，桥沉江底，阻敌成功。

张营长见任务完成，即令全营撤回保山。因公路被敌人毁坏严重，车辆堵塞，张营长即率部分官兵徒步二十来个小时，于次日上午十时到达保山。经清点，我营伤亡、走失约三分之一。

炸桥后，马崇六专门发了致军委会昆明行营主任兼云南省主席龙云电，报告了炸桥阻敌经过；龙云也发了致马崇六的嘉奖令。电文如下：

马崇六致龙云电

限即刻到。主任龙。辰真（5月11日）申办机电谨悉。五日晨七时半，工兵第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率该营到达惠通桥。职当即令以一连担任破桥组，以两连在东岸占领阵地，掩护后续车辆。九时四十五分，敌寇于隔岸开始炮击，潞江（怒江旧称）两岸情形顿为混乱，该营尚能继续掩护车辆过桥。至十时五十分，西岸残留车辆约二百，以司机逃散不能开驶，而敌进势愈猛。适我卅六师一〇六团团长邢正诗（应为熊正诗，下同）率先头易浚华营已到达东岸高地，占领阵地，猛烈还击，乃决然命工兵营张营长施爆破任务。达成后，该营徒步向保山集结，人员、器材略有损失。该营现任功果桥及保惠公路之破坏准备。职马崇六呈。辰元（5月13日）巳保印。

龙云致马崇六等嘉奖令

马总指挥辰元（5月13日）巳保电悉。查此次腊戍之变，撤退仓促，敌寇乘虚进逼怒江，幸马总指挥崇六处置适宜，从容指导，阻击敌人于西岸，实深嘉慰！工兵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人数不多，

一面阻击敌寇，一面破坏桥梁，实属难能。又查三十六师一〇六团，团长邢正诗，长途行军，甫经到达，督率易浚华营，阻敌渡江，因之稳定战局，转危为安，虽有少数敌人渡江，终归消灭。所有出力官兵，应即分别叙奖，以资鼓励。一〇六团团长邢正诗、营长易浚华，工兵二十四营营长张祖武，着各记大功一次；易、张营全体官兵，各奖一万元，共二万元，由经理处即日汇交宋总司令（指宋希濂）具领分别转发为要。龙云之印（卅一、五、十四）[9]

上述撰述均为重要亲历者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关于时间的记述却不尽一致。按姚仕基回忆，工兵营在5月3日前即抵达惠通桥，马崇六等人是3日从缅甸撤退至此的；而李国屏的回忆却是，工兵营于5日9时抵达，10时许马崇六等人撤退至此。但马崇六致龙云的电报却记述，张祖武营是5日7时半抵达惠通桥，自己已先期到达。爆桥时间有5日早晨、中午两种说法；马崇六是否在现场也互相矛盾。

但吊诡之处尚不在此。比对日军战史的记载，上述时间均有值得推敲之处。此外，第11集团军战斗详报居然认定炸桥命令为其步兵团长所下；宋希濂事后对参谋团林蔚、萧毅肃在断桥阻敌一事上的“冒功”多有指责[10]，惠通桥阻敌遂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罗生门”。由此而观，当事各方对时间这一客观因素的记述，要么存在记忆错误，要么做了有利于自己的主观修正，这让事后的研究者极难甄别自圆。

3

桥上的故事无疑是最惊心动魄的，这是聚光灯攒射的舞台中央。

尽管当日的事件场景宏大、头绪杂乱，但爆破“零时”却可以作为经纬坐标。虽然关于这一时刻的记述也是众说纷纭，但笔者相

---

〔9〕《张祖武炸惠通桥与“五五”纪念章》，龙陵县政协文史委提供资料。

〔10〕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2页。

信日军的“表”比较准——因为至少截至爆桥的那一刻，日军是如猎犬般头脑清晰的追击者，而逃难的中国人无论军人、难民均处于惶恐不安状态。

据日军记录，其前卫部队抵达腊勐老车站的时间为上午 10 时左右——需要注意的是，日军战时以日本时间为基准，那么当地时间应为上午 9 时左右。

从 4 日夜开始，自缅甸逃出的公私车辆即沿滇缅公路向惠通桥衔接而行，源源不绝。但以惠通桥的承载量，每次仅能单向放行一辆，速度甚缓。虽然炸药及电气引爆装置已在桥上敷设完毕，但工兵营长张祖武仍忐忑不安，因为他接受的命令极难操作：应尽量放过更多车辆，又恐日本军车到来，爆破时机很难拿捏。马崇六曾特别提示张祖武，日军前锋可能化装潜械混迹难民车队，畹町失守即因此所致，需高度警惕。

5 日清晨，工兵营决定派两人化装成乞食的难民，对桥西车辆进行侦察。一名广东籍军官队长和一名四川籍班长接受了任务，两人换上旧衣服，拿着钞票，以买食物为由，从桥西第一辆车开始排查。

在距西桥头大约 500 米处，两人发现一辆卡车上正副驾驶均为着便装的年轻人，车厢内乘客五六人也是年轻人。对于逃难人群来说，这种人员构成显得不同寻常。他们伸手递钱表示要买吃的，对方只摇手不作答。由于前面的几辆车均未发现这种情况，两人又靠近邻近类似的一辆车，发现驾驶室内同样是两个年轻人，车厢内却坐着四个小伙子和一个老太婆。按中国人的思维，既然是一家人逃难，为何忍心让老人坐货厢？两人心生怀疑。又递上大把钞票，求他们卖点吃的，并动手翻他们的行李。车上的年轻人见状，忙手推脚踢予以阻止，只是如哑巴样不吭声。在翻行李的过程中，广东籍队长触到了像是枪支和钢盔形状的东西。这时车上的人面色大变，一齐动手要将其掀下车来。就在拉扯之中，队长看到了行李包内的枪支、钢盔和军装。[11]

队长下车后拉着班长疾步走向西桥头。就在此时，桥头却传来

〔11〕李济洲（口述）：《亲闻炸毁惠通桥经过》，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第 230 页。

两声枪响！

此处，不得不按说书人的“俗套”：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当日早晨，龙陵商人何树鹏驾车从保山回家，车过惠通桥，闻龙陵已被日军占领，遂在桥西头掉头欲返回保山。有一辆车等得不耐烦，从其旁边冲过，因刹车过猛机械损坏，抛锚在路中，使后继车辆不能通过。见此情景，一名宪兵从东岸召集十多名桥工，各带一根大铁撬来到西桥头。宪兵问抛锚车司机欲何为，答曰车坏了。问何时修好，司机傲慢答不知道。宪兵遂左手示意司机站在路边，右手拔枪连开两枪，将其打死。随后摆手示意桥工，用铁撬将抛锚车撬翻，滚入江中。[12]

但这意外的枪响，却让已接近桥头500米处的日军便衣队产生错觉，立刻打开行李包，将机枪架在车厢上向前后的中国军车和难民车辆疯狂扫射。此时，已侦清敌情的工兵队长和班长冲到西桥头高喊，桥东的工兵见状立即准备爆破。

这是个令人窒息的时刻！但这一刻竟然有两位通过惠通桥的亲历者留下了口述。

稍早些通过的是一个叫杨世雄的保山小伙子，此前在芒市做小买卖，闻听日军入境，赶紧处理掉货物东逃。

5日早晨7点离开腊勐街，约8点到了惠通桥。这时，日军已

〔12〕杨升义：《孩婆山阻击战》，第128页。这是关于惠通桥叙事中提及最多的一个情节，但是事件亲历者、独立宪兵第2营第5连第2排士兵刘赞琼，提供了另一种说法：当日稍早前，在怒江西岸距离惠通桥约5公里处，一辆军用卡车抛锚后横在公路中间，造成后面车辆大批拥堵。十多名华侨及护路员先后前来设在惠通桥头的指挥部报告情况，请求尽快疏导交通。一名工兵班长带领四个兵前去处理时，却被对方蛮横地缴了枪。奉宪兵连长凌彦的命令，刘赞琼和十多名宪兵化装成便衣，携带短枪前往疏通交通。当事人是第5军的一名少校军官，带领十多人驾驶这辆大卡车，因抛锚停在路中间修理。刘赞琼等劝其把抛锚的车推在路边，对方不听。迫不得已，刘赞琼等人掏出枪，勒令对方不要动，而后将该少校押回指挥部。军方人员一致劝解，在非常时刻应以大局为重，但对方不听，还大声谩骂。见其如此蛮横，大家一致要求指挥官枪决他。于是，指挥部当即决定对此人执行枪决，并张贴布告申明。工兵随后将该车上的货物卸下，交路过车辆运往第5军军部，而后将车推下山沟。刘赞琼说：“当时所有华侨听到这个消息后，无不欢天喜地。道路畅通后，遭受堵塞的车辆立即全速前行，争先恐后通过了惠通桥。”据刘赞琼回忆，此时日军尚未迫近惠通桥，也未开始炮击。据2012年8月25日《南国早报》文章《我们没有忘记，从广西走出去的中国远征军》第三章滇西溃败⑤，记者卢大清、钟亮、莫仁力撰文。

经向东岸的山坡打炮，公路上的车辆已堵塞成一条不能流动的河。有个守桥的宪兵催促说：“人员赶快过，要炸桥了！”我拎着包下了车就向大桥跑过去。与我并行跑过桥的还有两口子，男的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孩，女的抱着一个盒子，想必是金银细软之类，相信那是他们随身的全部家当。刚跑了十多米，听女人哭喊“我跑不动了！”男人唬了她一句：“不带着今后咯吃饭？”脚步并没有慢下来，边说边跑。

这时有日本飞机飞临上空，机枪对着人群扫射。只听一声惨叫，抱盒子的女人被射中，栽倒在桥面上，盒子也掉在一边。女人的血像水枪似的喷着。男人在飞机机枪扫射声中，虽然迟疑了一下，终还是抱紧孩子，一脸悲恸地跑过桥去。

听着西面半坡传来日军的炮声，跑过桥后，我也不敢沿着公路往上跑，而是顺着江边往下游跑。跑了二十多分钟，只听得几声巨响，大桥方向一片烟雾腾腾，大桥没了。[13]

脱险后不久，杨世雄报名投考宋希濂在大理举办的“滇西战时干部训练团”，毕业后进入远征军第71军军部当了参谋，参加了两年后的反攻作战。

另一位亲历者叫高熺奎，当时在中国运输公司龙陵保养场当助理员。据他回忆，自己一家人是最后通过惠通桥的。

5日天刚亮，我们爬上一辆车子，开到惠通桥边。当时车子一辆一辆过，非常缓慢。大约在上午8点左右，敌军在飞机掩护下占领了腊勐，开炮将东岸老鲁田的车子打翻并燃烧起来，把路堵死了。这时，又有汉奸的车子在我们前面横着，车上挂起了白色布单，司机持小枪威吓群众：“不准跑！不准跑！这是我们中国飞机，不要怕！”后面的人见此，即同声大喊：“捉汉奸！”这个司机才溜了。我们一家跳下车子，徒步上惠通桥，即见炸桥的两个中国兵，已将炸药摆在桥板上，绞动手摇发电机，一个正在接线。另一个站在桥

---

〔13〕杨世雄（口述）：《我所目击的惠通桥炸毁》，据《溅血岁月》，第145页。

面的兵，见我们全家七人已经上桥四五公尺，赶忙上前一步把接线兵的后领子一把揪住，向后拖倒仰卧桥上，一面招呼我们："快跑！"当我们刚离桥四五步时，轰隆一声，整座桥面沉入江中，只剩下几根铁索悬在空中……[14]

这里也提到了混迹车队中的"汉奸"。高熺奎还特别说到，5月3日深夜在龙陵时，两名从畹町下来的溃兵在其兄开的"聚友食堂"吃饭，谈及日军追击部队除了沿公路攻击前进的主力，还有一路以汉奸为向导，从走私小道直插惠通桥。

虽然在日方史料中，未见使用便衣队、汉奸为前驱的记述，但是这类事情一直被大量中方史料证明存在，在缅境战斗中也曾有大量穿黄色袈裟的和尚为日军充当爪牙。笔者推测，日方的刻意回避可能基于国际法因素——战时使用便衣人员参与军事行动，是不受关于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15]保护的。

这里，要再次提及那两位担负化装侦察任务的广东籍队长和四川籍班长。关于侦察发现日军便衣的故事出自此二人之口，但转述者却是惠通桥上游怒江坝土司署的总务主任李济洲。当时的土司（潞江安抚司）为线光天，抗战极为积极。

据李济洲回忆，5月6日下午，土司署的自卫队在怒江坝附近抓到了两个自称"缅甸难民"的可疑之人。李济洲亲自接待并打消其顾虑，经讯知是实施爆破惠通桥的中国工兵，一人为队长，一人为班长。

但两人向李的供述，却与前述爆破决策、实施过程有所不同。据其中的队长讲，他是4日在保山工兵总指挥部接受马崇六的命令担任爆破惠通桥任务的。马崇六特别叮嘱其把握炸桥时机，即，应尽量让人和车过江，但不准一个敌人混过来；一旦发现敌人应及时炸桥，不要让畹町失守的"旧戏重演"。

---

〔14〕高熺奎：《炸毁惠通桥目睹记》，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95页。

〔15〕主要指部分欧洲国家1907年在海牙签署的《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和1927年在日内瓦签署的《关于战俘待遇公约》，1949年该公约获得最终完善。

当时，该队长向马崇六提出了 4 条要求：一是执行任务人数不宜多，由其在所带工兵中挑一个排长和两个班长同行即可；二是时间紧迫，请马派专车送至惠通桥；三是请马给一纸手写命令，以免和守桥人发生误会；四是经济上予以支持以防万一。

马崇六同意了这 4 条要求，4 日下午用吉普车将他们 4 人送至惠通桥。即，执行任务的仅此 4 人。

与守桥部队接洽后，当晚，4 人即布设好了炸药。5 日黎明，队长令带去的排长和一名班长留在桥东操作爆破装置，自己带一名班长化装到桥西侦察敌情——这是贯彻马崇六关于“把握炸桥时机”的指示所想的办法。当两人在距桥头 500 米处发现日军便衣队后，迅速冲向桥边高喊发出命令，桥东的排长与班长启动爆破装置炸桥——这与高熺奎回忆自己一家人最后过桥时看到桥上炸桥兵为两人相吻合——队长与班长则被隔在了桥西。此后，二人趁乱溜下河谷，溯江而上约 25 公里逃至怒江坝附近，与土司署自卫队士兵遭遇而被捉。

难得的是，李济洲派土司兵带二人在怒江边一棵大树的树洞里找出了藏匿的马崇六手令、枪弹和钞票。确认了两人的身份后，土司署以贵宾相待，7 天后派人护送二人到保山。一年后，李济洲在保山与广东籍队长重逢，他已荣升处长，并邀其一起住在第 71 军军部，次日清早请李济洲吃了广东名菜“火烧狗崽”。很遗憾的是，李济洲在 75 岁回忆往事时已忘记了这位队长的名字。[16]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证伪的亲历者回忆。那么，前述那则军委会驻滇参谋团的将军们在惠通桥边向工兵营长授命的故事，就显出几分暧昧色彩。实际上，甚至还有一种说法是参谋团长林蔚亲自写下炸桥手令给张祖武的。此说出自台湾王思露《爆破惠通桥纪要》一文，文中记自己时任工兵第 24 营连长，炸桥是自己亲为；关于林蔚下炸桥手令系林蔚驾驶员汪某所告。[17]

那么，那位真正建立功勋的广东籍“队长”是谁？是营长张祖

〔16〕李济洲（口述）：《亲闻炸毁惠通桥经过》，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第 230 页。
〔17〕赵铣编著：《滇西对日抗战》第六章惠通桥作战，第 38 页。

武（张为湖南人）本人，还是连长王思露？但工兵第24营给养军需长李国屏提到了该营的三位连长姓名，并没有王思露。按马崇六致龙云的电报，他是令一个连留在桥头为“破桥组”，另两个连撤上东岸占领阵地掩护车辆过江的。李国屏所述3个连在桥上分段安装炸药，在爆破技术层面上确有小题大做之感。在美国飞虎队员事后绘制的一幅惠通桥战事的油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是惠通桥东端折断坠入江中，桥体中部没有断裂，西端仍与桥墩相连。这说明，工兵当时仅在桥面东端安放了炸药，而不是设置了3处炸点。

在爆桥前侥幸过江的中国溃军中，有第5军装甲兵团一部，少尉排副刘家茂是又一个亲历者。

作为当时中国唯一的机械化部队，装甲兵团在缅甸的表现尚有可圈可点之处，但因整个战局崩溃，使得仅存的坦克被裹入难民车队东逃。刘家茂所在的是一个14人的车组，由3辆美式载重汽车拉着3辆轻型坦克撤退，刘是一辆汽车的驾驶员。刘的记忆力相当好，他记述的行动时间相对准确可靠，在混乱的资料中提供了一条清晰的线索。

刘家茂说：4日凌晨5时许，他们在畹町遇到装甲兵团团长胡献群，命令他们立即东撤，并限晚上12点以前通过惠通桥。此前，他们的任务是在畹町附近山上阻敌，掩护军民沿公路撤退，此时任务突然变更了。

4日晚6时，车组到达腊勐街，拥塞在松山至惠通桥段公路的车辆水泄不通，很多人在传言“晚上12点要炸桥”，惶恐不安。

但迟至5日拂晓，刘家茂的车才挨到桥边，这时他看到桥面上已布好炸药雷管，爆破准备就绪。过桥后，江东路段也是拥堵不堪，待爬行至距惠通桥10公里的老鲁田时，已是上午10时许。刘家茂记述，炸桥就是在他的车爬坡期间实施的，因为当时车行至山背后，他未能直接目击。

但刘家茂事后了解到一些情况，曾这样写道：“后来听说负责炸桥的某营长（一说是连长——原注）机智勇敢，他并不死死地遵守命令时间，而是发觉了敌人后才拉线，这样，至少多放过来了一百多辆汽车，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写到此处，笔者眼前又晃动着那位广东籍“队长”的影子，而且对于爆破桥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在时间记述上的模糊性，有一种“同情的理解”——显然，这是一个由“人心”把握的事件，而不仅仅基于精确的命令。

4

这里，需要从日军视角再次回溯这一过程。

据日军战史：担负沿滇缅公路追击远征军溃部任务的，是日军第56师团坂口支队，该部由第56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指挥，以步兵第146联队（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为基干，并配属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行方正一中佐）、装甲车队（穴井元喜大尉）、工兵第56联队第1中队（江崎秀作大尉）、辎重兵第56联队第2中队（田中统介中尉）及师团卫生队担架第3中队（野津高雄中尉）、第1野战病院（乌井作夫军医中尉）、防疫给水部和通信队各一部编成，是一支能遂行独立作战的混成部队。

5月3日，坂口支队以第14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松本治中佐）为前锋，自中缅边境小镇畹町攻入滇西，4日相继攻占遮放、芒市。

据新28师第84团第1营机枪连老兵刘俊贤回忆：4日这天，第66军军长张轸和新28师师长刘伯龙刚退至龙陵，均与大部队失散，仅各带贴身卫士二三十人。刘俊贤曾看到，张轸因为痛惜部队打光而痛哭，刘伯龙不太客气地对其高喊：“傻瓜！你哭什么？走！我们上去拼了！”[18]但此后刘伯龙自龙陵北上腾冲，稍作逗留即翻越高黎贡山渡江至永平；张轸则直接退往惠通桥过江。因第66军受命掩护军委会驻滇参谋团撤退，则推测林蔚、萧毅肃、马崇六一行至少是在4日之前经惠通桥过江的。

5日晨，日军坂口支队推进至龙陵，继续向松山追击。当步兵尚未进抵怒江边时，炮兵发挥其射程远之优长，在松山东麓炮击东

〔18〕据《重庆晚报》记者邓果对刘俊贤所做口述史：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84aca10100u14f.html。

岸我军车队。[19]

据刘家茂记述：日军在松山下的滇缅公路上架炮轰击东岸中国军民，封锁了大山头外边的一段拐弯处的公路，只要大弯内的车一露头，炮就打过来，致使挤在大弯内的数百辆汽车无法通过这一封锁线。在日军炮击中，难侨丢掉汽车财物，哭声震天，沿江乱跑，许多老弱者死于沟壑，壮者妻离子散。[20]

此时实施炮击的，是日军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前卫第3中队（中队长石原义治）。据该大队第2中队小队长高村武人中尉记述：

"……因为敌人车队在怒江峡谷对面蛇形升降，所以总共70公里的距离就缩短为8公里的直线，他们终于进入了我野炮的射程（当时野炮第1大队是改造三八式野炮编成）。当日的行军序列是这样的：前卫为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松本治中佐）以及野炮第56联队的第3中队。10时前后达到白壁部落（即腊勐老车站）下方的突出部位置之后，野炮第3中队立刻布置放列[21]，对准八千数百米外的钵卷山（即大山头，当日日军叫它"一山"，5月6日后改称"钵卷山"）右端的敌人先头车辆猛烈射击，使之破坏燃烧，从而建立了迫使敌人车辆悉数停滞不前的伟绩。"[22]

在日军野炮第56联队战记中，有更为精确的记录：军曹堀清次的第2分队的一门野炮，架设于通过腊勐街后约一公里处的公路上，由第3中队长石原义治大尉亲自指挥，经调整射击诸元修正弹道，以第5发命中钵卷山公路最东端的货车。此后连续射击，致使一辆车滚落崖下，一辆车起火燃烧，使后续约800辆车停止不前。此时为日本时间10时30分，即当地时间9时30分。[23]

约10分钟后，日军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尖兵"急追到惠通桥附近，捕捉到了中国军的一部"。据该大队第10中队第3小队指

〔19〕［日］太田毅：《拉孟——玉砕战场の证言》，第16页。

〔20〕刘家茂：《远征军赴缅作战片断》，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第71页。

〔21〕将火炮及其配套装备由行军状态转为战斗状态的操作过程，也指展开后的炮位和掩体，英文为Emplacement。

〔22〕［日］高村武人：《「ビルマ戦場」雲南编のビデオを見て憶う》，朱弘翻译并提供。

〔23〕《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80页。

挥班长中原信夫军曹记述：

……炮声已撕裂般地在峡谷里响起，不一会儿，对岸中国军队车队的领头车冒起了浓浓黑烟。此时，尽管前面有中国军队的主力部队，但为了确保日军能通过惠通桥，尖兵们在尚未接到命令时已经冲下山去。第2、3小队沿着右侧斜坡迂回下去；第1小队和指挥班在中队长指挥下，冒着中国军队弹药车激烈爆炸的危险，穿过正在熊熊燃烧的运输车队向惠通桥冲去。一路上到处是惊慌逃难的人群、妇女和孩子，还有一些在路边草丛中哭泣着找妈妈的婴儿，悲惨痛苦的嘶喊声震撼着整个峡谷，犹如人间地狱一般。

当第2、3小队离惠通桥只有近100米时，守备大桥的中国军队的机枪响了，紧接着就是一声巨大的爆炸声，转眼间，悬挂在怒江上的吊桥消失在漩涡之中。[24]

日军这一记述，并未提及以“便衣队”混入我车队接近惠通桥的细节，但显示出我工兵掌握爆桥的时机极为得当，虽然因此使得滞留在怒江西岸的车辆多达150余辆。

下午2时左右（仍为日本时间，下同），步兵第146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金氏坚少佐）以及野炮第1中队和第2中队高村小队亦抵达。此后，野炮第1大队全部8门野炮在公路上一字排开，倾全力轰击“一山”右端先头车辆附近，在遮断公路的同时炮击“一山”“二山”（即孩婆山）的我军。其中，第1中队第1小队布置火炮放列后，考虑到风偏等因素修正诸元，连续射击3发炮弹未中，第4发经过950米的修正，由小砂小队第1分队山田二炮手击中一辆货车，引燃汽油后使前后十几辆车燃烧起来。当时，坂口静夫少将就站在指挥炮击的浏强次中尉身后观战，令日军士气为之大振。[25]

在炮兵火力掩护下，步兵进至位于惠通桥上游数公里的渡河地点（即金塘子老渡口）。晚7时16分，步兵第2大队的两个中队在

〔24〕［日］太田毅：《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第16页。伍金贵译文。

〔25〕《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76页。石江辉译文。

工兵队协力下，使用2艘橡皮艇开始了敌前渡江。这时，步、炮兵集中了全部火力，支援步兵行动。

高村自诩："这次的敌前渡河，正是步、工兵联合一体的奇迹，我当时的日记是这样写的：'自己激动的泪水使得望远镜都模糊一片了'；但是捕捉到那一千部车辆（*我们直接可以目击的就有680余辆——原注*）敌军的，则完全可以说是我们野炮大队的独角戏。"[26]后来，高村还曾在日本畅销上百万册的连环漫画《战争论》中表示："这个炮击战，尽管规模小，却发挥了炮兵的真正价值，与柔佛铁挺炮击战及科雷希多炮击战一起，被誉为大东亚战争攻势期的三大炮击战。"[27]

据载，在决定以橡皮艇渡河攻击前，日军尖兵还曾做过其他尝试。

最先冲到惠通桥边的步兵第3大队第10中队长横田进中尉，曾令分队长石川侦察地形寻找渡江点，并令士兵从公路上遗弃的车辆上收集木板、汽油桶制作渡江器材。当时，在150米外对岸的我军以机枪、迫击炮开火，击伤日军上等兵蓑田等人。

怒江东岸大坪子村二十多岁的郭凤英姑娘，当日早晨在惠通桥东桥头卖粥。惠通桥被炸后，郭凤英趁乱上山逃回家，又与家人往更高处的密林深处逃难。站在高半山上，郭凤英看到怒江西岸公路上的日军抓住了一些难民，持枪逼迫他们将堵在公路上的车辆往怒江里推，似乎想以此将怒江填平，从上面越过江来。但前后推下了六七十辆车，都被湍急的江流冲走，江面上一点痕迹都没有。[28]

此时，有人提出等工兵和重火力来支援，但第10中队横田进中尉表示要等石川分队长侦察回来再做决定。不久，石川分队长侦察回来报告：一、两岸地形复杂，悬崖陡立，江流太急，不少地方还有暗流；二、对岸丢弃在路上的车辆较多，不易突击，大量中国军队集结在对岸那些车辆后的村子里；三、日军所处位置树木虽多，但无法选择进攻路线，也无渡江的合适地点。听完石川分队长的报

---

〔26〕［日］高村武人：《「ビルマ戦場」雲南編のビデオを見て憶う》，朱弘翻译并提供。

〔27〕［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47页。

〔28〕苏家祥、戴有锟：《横跨峡谷的丰碑》，据《滇西抗战第一枪》，第28页。

告后，横田进一时难以决定。

下午5时左右，大队下达了从惠通桥撤离、转往大队本部指定的渡江点集中的命令。于是，横田进令平野小队留下负责监视对岸中国军队的动态，亲率中队主力向上游700米外的渡江点赶去。[29]

5

日军实施渡江攻击后，在惠通桥附近的中国军队，仅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安第6旅（代号“息烽”）的一个连、十余名宪兵、独立工兵第24营及驻大山头的一个化学防空连（敌机空袭时施放烟幕掩护桥梁），加上隶属混乱的零散溃军，都是不堪阵仗之旅。[30]

所幸，此前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奉令兼任昆明防守司令，其所辖入缅作战之第66军虽也在溃败途中，但第71军正从川康向滇西开进，该军前锋第36师已率先抵达祥云。

5月4日深夜，蒋介石打电话给宋希濂，告之：据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飞虎队”的侦察报告，“滇缅路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完全不能抵抗日军前进。如果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的前进速度计算，大约10天即到昆明”。据此，命令宋希濂星夜征调车辆，将第36师及第71军后续部队运抵怒江东岸阻敌。放下电话，宋希濂即亲至昆明郊外黑林铺滇缅公路运输总局洽商，该部允诺5日至7日3天内提供货车550辆用于运兵。[31]

5日凌晨零时，率先登车的第36师先头部队第106团抵达惠通桥东约10公里的加油站附近。天色刚明，团长熊正诗即率各营营长赴大山头前方侦察地形，命令主力向大坪子、孩婆山前进，以一个连到惠通桥附近警戒。9时许，当日军炮击东岸后，第106团迅即在大山头、乌木郎之线占领阵地。

因惠通桥被炸断，日军经侦察地形，将主力渡河点选择在上游

---

〔29〕［日］太田毅：《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第16页。伍金贵译文。

〔30〕杨升义：《孩婆山阻击战》，第128页。

〔31〕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2页。

约3公里、江面较窄的金塘子老渡口。此处为修筑滇缅公路时最初选择的过江桥桥址，后被废弃了，但两岸的“毛路”已修至江边，[32]辎重车辆容易接近，日军看中了这一点。因为在江上架设浮桥进展缓慢，日军仅以几只橡皮舟和排筏往返输送兵力，至我援军抵达时仅运送三四百人过江；且过江后即为大坡度仰攻，地形极为不利，因此给我增援部队开进提供了较充足的时间。

据高村武人所述，步兵第146联队渡江攻击发起时间为日本时间晚7时16分，即当地时间下午6时许。但第11集团军战斗详报载，“12时稍过，归侨及难民中潜伏敌之‘第五纵队’约数百人，即猝然向孩婆山袭击”；而据第36师政治部课长俞晏澄记述：5日下午5时许，几名华侨从公路下疾奔上坡，向第106团前卫连报告说，坡下公路上有3辆铁篷车，车上士兵的臂章是白底红日标志，可见日军已乘难民车辆混过惠通桥了。连长立刻派出两名士兵前往侦察核实，证实确系日军前卫小队，估计混过桥东的日军已有200余人。连长一面向上级报告，一面布置兵力监视敌人动向。第2营全营很快抢占大坪子公路旁的高坡，以机、步枪向铁篷车里的敌人扫射，但因路上敌我车辆人员混杂，未能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大部日军跳下车辆，抢占孩婆山高地开始还击。[33]

这一记述，令人再次想起高熺奎所说的那路以汉奸为向导、从“走私小道”直插惠通桥的日军，及工兵营两位化装侦察者在西岸车队中发现的日军便衣。但，假若这支日军“第五纵队”在爆桥前混过了江，为何在我工兵爆破时未加阻止？笔者以为这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极可能是军方在战报中将从上游金塘子渡口渡江的日军，记为预先从桥上混过江的日军，这至少可以掩盖部队开进迟缓、阻敌不力的情节。

此后，据第11集团军战斗详报记述，“该（106）团以驱逐孩婆山敌人之目的，施行进击。敌在炮火掩护继续强渡增援，彼我伤亡

---

〔32〕其中江东“毛路”呈蛇形向孩婆山上延伸，极像贵州晴隆著名的“二十四道拐”。

〔33〕俞晏澄：《中国远征军三十六师驻施甸抗战纪事》，据《滇西抗战第一枪》，第40页。

迭出，入夜仍在对峙中。”[34]

在保山读书的中学生陈济泽，家住松山至龙陵之间的镇安街，5日因返家心切，与逃难人流逆向而行卷入战场中心，躲在怒江西岸公路上200米处的一个干沟里，目击了当日的战斗过程。据其回忆：

“在炮火掩护下，日军开始用橡皮舟强行渡江。这时，我阻击部队已布防于对岸半山公路上，当发现日军渡江后，迅速用机枪对准渡口进行严密封锁，并利用有利地形和已过江的日军激战。日军冲上去，就被我军打下来，又冲上去，再被打回来，反复多次，直到天黑，枪声仍然不断。”[35]

陈济泽的观察位置，在怒江西岸金塘子老渡口上方，对面即为孩婆山。

最初布防于东岸半山公路上阻敌的兵力，应为前述“息烽”部队一连、独立工兵第24营和十余名宪兵，可能还有溃军中的一部。但爆桥后工兵营即先撤退，其他部队应是坚持到第106团增援抵达后撤出战场的。有些撰述记马崇六曾留下指挥阻击，但按姚仕基的记述，爆桥后自己即爬上山去与马崇六会合，但因日军炮火袭扰而弃车逃散——正如远在保山的萧毅肃事后在林蔚默许下以“筹谋破桥有功”而获颁三等云麾勋章，在这样的大事件中，大人物都要极力表明自己在现场，而不是某个最终被忘掉姓名的“队长”之类的小人物。

夜幕降临后，怒江两岸的局势变得诡谲莫测混沌不堪。

当晚9时，从后队赶到前方的日军野炮第1大队副官坂口八三中尉，乘着吉普车经过尖兵队野炮第3中队阵地，说：“大队主力已到达后方的腊勐村落附近。一定要抵达渡河点，大家加油！”但他的车向前刚开出数百米，即被对岸飞来的我军机枪流弹打死。[36]

此时，在金塘子渡口，已经渡江的日军步兵第2大队决定偷袭孩婆山制高点，有的士兵已攀爬至山腰，在丢弃在公路上的汽车之

---

〔34〕《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1辑，第6页。

〔35〕陈济泽：《日军入侵惠通桥目睹记》，据《龙陵烽烟》，第86页。

〔36〕《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76页。况冶译文。

间穿插，有的还趁机在汽车上顺手牵羊偷东西。稍晚，步兵第2大队长金氏坚少佐过江督战，第146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也跟了过来。当两人碰头时，突然遭到我军从孩婆山上投下来的手榴弹袭击——砸在一株仙人掌上，弹出几米开外爆炸，两人因此得以幸免……由于夜幕的遮蔽，当晚日军未能取得很大进展。〔37〕

6日上午，第36师师部及第108团抵达戥子铺（即等子乡），以一个营在一丘田亘阿兰寨之线构筑预备阵地，其余各部位置于大梁子附近；师长李志鹏实施统一指挥。当日白天，日军似在为后续部队渡江做准备，无大动作。午后，第106团决定乘夜向孩婆山日军再次攻击，策定部署为：

第1营派步兵一连于晚6时由大坪子北端行正面攻击；第3营一连于同时经大坪子向孩婆山敌右侧背攻击；第2营在中心寨南端干沟完成攻击准备，于晚6时30分向孩婆山之敌后背攻击。

6日下午，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率副参谋长陶晋初和作战参谋杨肇骧、高宝书等人由昆明乘坐军用飞机到云南驿。到达后，知第36师师长李志鹏已率该师第106团到达保山，旋即改乘吉普车到大理下关。宋希濂带杨肇骧到邮电局给保山打长途电话，接线员说线路不空，却又让商人和保山谈生意。宋希濂大为恼怒，拍着柜台大骂："我是宋总司令，限3分钟接通保山，不然贻误战机，杀你的头！"接线员吓得浑身发抖，马上接通了电话。找到李志鹏通话，获知该师于5日到达怒江东岸及阻击日军情况。宋希濂大为高兴，立即致电蒋介石报捷，并请蒋下令迅速赶运第71军后续部队。〔38〕

夜幕降临后，第106团各营按预定方案实施攻击。

晚7时，第2营前进至孩婆山第二个山头，距敌仅数十米，遭敌顽强抵抗，继之发生白刃肉搏，战况至为激烈。此时，日军主力潜向该营右后方反击，该营官兵奋勇迎击，将敌遏止，我伤亡营长

〔37〕此情节源自日军步兵第146联队战史记录，转引自旅日学者朱弘致笔者函件。

〔38〕杨肇骧：《滇西大溃败及其他》，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96页。

以下百余名。[39]

据载，为彻底阻断东岸我车辆通行，6日傍晚，在东岸炮兵火力掩护下，日军工兵队藤田仪作中尉率一个小队强行渡过怒江，利用夜幕潜行至滇缅公路钵卷山路段，用炸药炸毁了一段公路。[40]

此事未见我方史料提及。但从这一小队工兵的战术运用上，似可窥察日军在战术上偏爱以小部队实施大纵深挺进攻击，表现出罕见的大胆与冒险作风。据载，坂口兵团自编成以来，从攻略印尼爪哇岛开始，长驱数万里一直打到怒江，被日本媒体誉为“六段飞式进击”。特别是进入缅甸与我军交火后，14天交战7次，长驱1540公里，创造了日平均交战次数、日推进距离的最高纪录。[41]

据日军史料记述：6日深夜，步兵第3大队亦奉命渡江增援第2大队。该大队的兵力为第10中队及所配属的第11中队一个机枪小队、联队无线和有线通信兵等，为250人左右；其中承担抢攻对岸制高点的第10中队的兵力，含中队长横田进中尉在内为80余人。该部选择的渡江点在惠通桥上游约700米处，渡江用的组合式铁舟、应急筏、橡胶漂浮舟等均已由工兵准备好，每只舟筏上还配备了两名操桨者。据第10中队第3小队指挥班长中原信夫军曹记述：

夜幕降临时，渡江开始了，临时配属的第11中队机枪小队和通信分队负责掩护。在工兵拼死努力下，至7日凌晨，第10中队全员终于成功地渡过了怒江，马上向“中山”（即位于孩婆山与钵卷山之间较低的大坪子）制高点摸去。漆黑的夜晚，山险坡陡，高一脚低一脚的根本看不到路，摸到“中山”制高点时已经是7日早晨，大家顾不得休息，马上开始构筑临时工事。但此时敌军已经察觉到日军的行动，迫击炮弹猛烈地轰了过来。

---

〔39〕《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1辑，第6页。

〔40〕《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80页。

〔41〕同上书，第101页。

构筑单兵临时防御工事相当困难。因长时间天干地燥，加之山上的岩石坚硬，怎么也挖不动，只能用十字镐一点一点地啃出来，但也只是勉强能藏身的散兵坑。敌军多次组织兵力拼命地进攻，但最后还是败了下去，这时候就趁机加固阵地。这时，饮水也成了大问题。虽然经侦察发现山洼里有一个小水潭，本来想从那里取水，但又怕遭到敌军的袭击，无奈之下，中队长向大队发出了求水的请求。

这天，第 11 中队一直顽强地坚守在阵地上，多次击退了敌军的进攻。但奇怪的是，从早晨到下午 4 时，左翼的第 10 中队却没有遭到敌军的任何攻击，他们正拼命地构筑防御工事。但就在下午 4 时左右，从望远镜里看到，对面高地上的敌军正在调集兵力和迫击炮、机枪等重火器，看样子要在夜间发起进攻了。

傍晚 6 时左右（因无表，为估计时间——原注），敌军的迫击炮等重武器开始向日军阵地猛烈轰击，随着夜幕降临，曳光弹不断地飞过夜空，迫击炮弹落在山脊上发出轰鸣的震响，照明弹刺眼的白色光芒把整个夜空都照亮了。

“敌军来了！”

喇叭声，喊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一时震撼了整个山谷。

当晚，本来拟采用隐蔽式战术，即听到敌军迫近的脚步声才开枪。奇怪的是，第 1 小队指挥班和第 2 小队却冲了出去，于是展开了肉搏战。经一场混乱的厮杀后，中国军队退了下去。

关于当日战斗，第 11 集团军战斗详报的记述是：

“7 日拂晓，第 106 团第 1 营于正面及孩婆山右侧背干沟开始攻击（对日军第 2 大队）；又以第 108 团之一连附重机枪两挺、迫击炮两门，于孩婆山右侧高地向日军右侧猛烈攻击（对日军第 3 大队）。并以团属迫击炮集中于大山头，对敌行压制射击，掩护第 106 团攻击前进。第 106 团进至山头时，日军据反斜面阵地顽强抵抗，战况较前更为激烈，死伤更重。虽经数度增援，终因日军西岸野炮火力阻止而未达敌阵，相持至下午 5 时无进展。”

据载，当日中午，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率幕僚自下关赶到

保山，在城北郎义村元光寺开设指挥所，架设电话与第 36 师接通联系。而后，宋希濂携参谋杨肇骧驱车急赴前线视察敌情。当车行至滇缅公路 707 公里路标附近时，突遭 3 架日军飞机空袭，宋希濂等人急忙躲进树林，待日机飞离后又继续前行。至晚 6 时许，抵达江东老鲁田第 36 师指挥所。[42]

此时，第 36 师部队业已全部到达，正在构筑工事，准备反攻。观察战场态势后，宋希濂指示第 36 师师长李志鹏、副师长熊正诗和 106 团团长谷宾：注意加强阵地工事，配备炮兵火力封锁怒江渡口，严防敌人夜间偷渡。当晚，宋希濂返回保山途中，前往金鸡村会晤了参谋团长林蔚，该团参谋萧毅肃也在座。双方交换了对当前敌情判断的意见，言谈之间，林蔚等人对于破坏惠通桥阻止日军前进一事，颇恃功自傲。林蔚把部队自缅甸撤退经过叙述了一番，算是和宋希濂办理了交接任务的手续。之后，宋希濂一行返回城北郎义村元光寺指挥所。[43]

据日军中原信夫军曹记述：

8 日早 6 时左右，日军第 3 大队派运输班和弹药班的 7 名战友送来了饮用水、干粮和弹药。据说这 7 个人是奉命于昨晚冒着生命危险，每人背着 5 加仑装的水桶、扛着弹药箱从对岸渡江过来，在没有道路的陡坡和山间小道上攀爬，吃尽了苦头才来到了阵地前的。这解决了 250 多人的饮用水问题。

当日中午刚过，敌军两架飞机超低空飞来，在上空盘旋后对着野炮第 3 中队阵地猛烈地扫射了一阵，而后向北飞走了。根据此情分析，敌机是在侦察敌我双方前沿阵地详情，为大的攻击做准备。看来一场大的攻击即将开始，尽管敌军暂时没有动静，但不能大意。下午 1 时左右，大队命令撤出阵地。

---

〔42〕朱光亮（整理）：《滇西抗战第一枪》，据《滇西抗战第一枪》，第 9 页。

〔43〕杨肇骧：《滇西大溃败及其他》，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296 页。

我军战史的记述为："8日，第36师部队加强工事，不时向日军袭扰。入晚后，再向孩婆山之敌攻击，日军只能穷力抵抗"。联系日方记述，此时日军已感到继续进攻毫无希望，准备放弃。

9日晨，由田村中佐率领的野战重炮兵第18联队（欠第2大队）及野战重炮兵第3联队第2大队[44]从缅甸赶至松山。野战重炮联队，为日军作战时军一级单位配属炮兵，系由缅甸方面第15军派来增援坂口支队。

据我军战史，"当日上午，日军以炮火掩护向我反攻，激战终日，至晚渐趋沉寂。第36师又向日军施行攻击，迄夜半仍在对峙中"。

至此，战局虽呈现僵持状态，但因第11集团军后续部队第71军第88师、预备第2师已陆续抵达保山，而日军因怒江阻隔无法将更多兵力投送江东，已陷入困境。据日军战史载，当日，坂口少将令步兵第146联队主力撤出战场，转往腾冲实施占领。[45]

10日凌晨零时30分，位于敌我对峙前沿的第106团第1营报称："孩婆山之敌经我连日之攻击，伤亡惨重，刻在举火焚尸，似有退却之模样。"李志鹏闻报，即令该团全面攻击，又令第108团第1营由孩婆山右方绕行侧面攻击，期压迫孩婆山之敌于江边而歼灭之。

日军逐次向怒江西岸撤退，第36师进占孩婆山，尾追逃窜之敌。追至江边时，遭西岸日军机枪火力压制，我军渡江未遂；同时，西岸日军炮火亦向我孩婆山、大山头阵地轰击，极力掩护其步兵退却。[46]

据我军战果统计，连日来进至江东的日军约400人，仅百余人泅水逃回西岸，余均遭歼灭；第36师所部虏获日军轻重机枪2挺，步枪80余支。

放弃渡江继续攻击后，当日，坂口静夫令野炮第1大队主力（大

---

〔44〕其中野重第3联队装备九六式150毫米榴弹炮，野重第18联队装备九二式105毫米加农炮。关于兵力，太田毅著述如此记，野炮第56联队战记中则记150毫米榴弹炮和105毫米加农炮各一个中队。

〔45〕《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100页。

〔46〕《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1辑，第6—8页。

队本部、第1中队及大队段列[47]）转往龙陵担任警备，以第3中队及第2中队高村小队留守松山。该留守炮兵及在此前渡江攻击中损失惨重的步兵第146联队松本大队（第3大队）残部，统由新到的野战重炮兵联队长田村中佐指挥，田村也因此成为首任拉孟守备队长。[48]

6

在地面部队交战期间，5月7日，陈纳德飞虎队派出8架P-40飞临惠通桥空域，对猬集在江边及西岸公路上的日军车队猛烈轰炸，予敌以沉重打击。

据杜安·舒尔茨（Duan Schultz）在《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事的战争》记述，在此次攻击中，首先是美国飞虎队飞行员鲍伯·尼尔于5月5日驾机侦察发现严重敌情：

"……日本装甲车在公路上横冲直撞，越过一队队的难民群，把他们困在路上无法动弹。正在侦察的鲍伯·尼尔是第一个看见公路上所发生的这番景象的飞虎队员，他永远也忘不了拥挤在巉岩上劈出的公路上的那些人群。半崖间挤满了难民和日本的车辆及部队。从峡谷的谷顶到谷底，有35个盘来绕去的急转弯，汽车要往下跑20英里的路程才能到达江边的断桥，而这段路的垂直距离仅仅1英里。第二天，更多的日军部队相继抵达怒江边。日军的车辆一辆接一辆地停在公路上，等候他们的工程人员前来架设浮桥。次日，或者再过一天，日本人就可能渡过怒江，向昆明进发。"

5月6日，陈纳德致电向宋美龄[49]报告，并请求对怒江惠通桥附近公路上的日军实施空袭，当即得到蒋介石批准。

此后，飞虎队以特克斯·希尔、汤姆·琼斯、埃德·雷克托和弗兰克·劳勒等4名队员驾驶P-40E型飞机实施轰炸、扫射，此机

---

〔47〕段列，在作战中提供后方支援的组织或者配备。日军炮兵中队以上规模的部队，为保证战斗活动能够顺利进行，设置段列编制，进行必要的补给与整备支援，一般设在战线后方。

〔48〕《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84页。

〔49〕自1936年起，宋美龄即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抗战期间佐辅空军建军发展甚有贡献，也拥有很大权力。

型原配有可携带6枚35磅杀伤炸弹的弹架，但改装了可携带俄国产570磅炸弹的机腹弹架，4名队员均为经验丰富的美国前海军俯冲轰炸机飞行员；另以沃雷·沃尔森、R. T. 史密斯、埃里克·希林和汤姆·海伍德等4名队员驾驶P-40B型飞机担任高空掩护。由于怒江西岸的日军车辆和部队只能在从陡峭的松山山腰间劈出的狭窄公路一线猬集，没有隐蔽回旋之所，所以空袭造成巨大伤亡。据统计，飞虎队在7、8两日的空袭中，共轰毁敌机1架，毁敌卡车50辆，毙敌200名。〔50〕

以往中方资料仅强调第36师的地面阻击战，对飞虎队的空中助战很少提及〔51〕，大概因为空中攻击难免造成对我难民的误伤，作为友军的美国人很难面对这一复杂的"战场伦理"问题，这也是陈纳德要特别请示蒋介石批准的原因。杜安·舒尔茨的记述为："他（陈纳德）清楚地知道，被日军困在公路上的中国人会因此遭难。他面临一个可怕的决定，是否应为拯救更多的人的生命而牺牲一部分人。这不是一个他能独自作出的决定。他不能对那么多的中国人的生命承担责任。于是他于5月6日给蒋夫人拍了一封电报，向她叙述了目前的情况并要求委员长准予对公路沿线的攻击。他在同一天得到了委员长的答复：消灭敌人！"〔52〕

参加此次作战的飞虎队员特克斯·希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往下飞就看得更清楚了，从江边到峡谷上部的盘山公路上，排满了日军第56师团的大队卡车和武装车辆，一直到更远的坝子。"希尔说，自己从来没有一次见过这么多的日本兵，以前他只是在矮小树丛中看到小队人马，或是在路上碰到小股车队。现在这里有无数坦克、卡车，成百上千的士兵，都在等待着他们的工兵架设浮桥。希尔巡视空中是否有敌人飞机，很惊奇地发现没有，便继续下降高度。果然，日本工兵像蚂蚁一般簇拥在江边，将坚固的能够经得住

---

〔50〕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录四，第512页。

〔51〕日军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第2中队小队长高村武人日记中对当日飞虎队空袭有明确记述："五月七日木曜日（晴）夕方十数架の爆击机がやってきた。超低空での机铳扫射と爆击を受け、渡河点附近は相当やられたらしい。"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69页。

〔52〕［美］杜安·舒尔茨：《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事的战争》，第292页。

他们辎重的浮桥墩码起来，有的部分已经搭设好了。希尔以目光示意左右两边的僚机，他们都知道该干什么，没有半点迟疑，他们干净利落地排成了一行，开始攻击。

希尔以 60 度角向下加速俯冲，他知道一旦进入日本人的射程之内，他们会用所有小型武器还手。为了使自己不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他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做超低空飞行。同时，他将飞机调整到瞄准峡谷的顶部，确切地对准公路往下蜿蜒到江边的位置。在他下面响起了枪声，看上去似乎所有日本兵都停下手中的活计，愣愣地看着飞虎队的举动。找准了最精确的时刻，希尔投下了俄制巨型炸弹。

“这只是刚刚开始，当灰尘落定时，山坡上的日本兵惊恐地发现飞虎队的攻击把他们的退路也给切断了。巨型炸弹把上面的公路变成了一个大型堆石场，没有几个小时的清除是过不去的。长长的公路一边是悬崖，一边是江水，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隐蔽藏身。”

希尔和战友们转了一圈，又朝着日本人来了。希尔绕着朝江那一边的中国人飞过去，满身湿透的第 66 师（原文如此，应为第 36 师）的战士们高兴地往天上放枪，在江边又叫又跳。希尔的战友们也从各个方向准确地扔下了杀伤弹，这支号称“龙”的日军第 56 师团现在被打得人仰马翻。

由希尔的记述可见，“飞虎队”打击的目标主要是猬集在怒江东岸公路上的日军。这种完全控制了制空权的打击，既能压制日军火炮对东岸的掩护火力，又极大地杀伤了兵员，缺乏防空兵器的日军对此束手无策。可以推测，目前在东岸孩婆山与第 106 团对峙的日军，都是利用夜暗渡江的，天亮后飞虎队员飞临惠通桥上空，对日军即是灾难。在此情况下，即便我地面阻击部队无力，日军的渡江攻击也难以为继。更进一步推测，即便我军未能控制东岸孩婆山、大山头，而被迫退向纵深地带防御，因第 11 集团军主力已集结在保山附近，日军仅以少量步兵也难以有更大作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惠通桥断毁的情况下，日军欲将重炮运送过江且爬上适宜发射的高山阵地，也是难事。

坂口兵团的“六段飞进击”逆转于怒江，有相当的命定色彩。

飞虎队员仍不停手。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沿着蜿蜒的公路来回冲

击，朝着任何还在挣扎的敌人发射一排排点50口径（12.7毫米）机枪子弹。当把子弹打完后，他们又把在高空护航的沃雷·沃尔森小队的4架飞机调过来再次上演同样的好戏，直到子弹打光。当天，特克斯·希尔等4名飞虎队员飞到云南驿机场加油后，又返回峡谷攻击敌人，并沿着日本人的退路攻击，那里庞大的日军坂口支队残余正在蠕动。这一次，P-40E携带了部分燃烧弹，极具破坏效果，把排得长长的日军车辆变成了一片火海。据杜安·舒尔茨的描述，"成百上千的日本人在汽油的火舌、弹药的爆炸和燃烧着的装甲车及卡车的烈焰中丧生。浓烟升腾到数千英尺的天空，标志着这场大屠杀的地点"。

后来，陈纳德从战斗中拍摄的照片中推测："希尔投下的巨型炸弹中，有的可能炸到了接近峡谷底部伸出的岩石，然后落到敌人指挥部的位置上。如果是这样，那敌人就失去了首领。"

接下来的3天里，陈纳德派队员飞去察看，越过怒江和公路，直到芒市，看到日军就打。在一个星期中，日军没有一个营的兵力能在怒江峡谷100英里的范围内立足，蛇一般蜿蜒流淌的怒江看上去是日军车辆和装备的坟场。日军再也没有试图越过怒江。

多年以来，中方史料普遍认为日军渡越怒江意在进逼昆明甚至重庆，以此来评价惠通桥阻击战的战略意义。在此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美国飞虎队也表示，惠通桥的胜利被认为是决定性的。"如果美国志愿队没有能够在河边阻止他们的前进，那会发生什么？在怒江和中国西部中枢的盟军空军基地之间没有中国的抵抗力量，如果我们丢了空军基地，从印度翻越驼峰进入中国的空运就得停止，中国军队就会失去盟国的军事供应，没有这些空运他们就无法生存，那中国就要垮，那日本就会使用这些空军基地来供应它在缅甸的军队，以向西攻打印度。"〔53〕

杜安·舒尔茨在其著述中承认，战后公开的日方资料显示，日军当时没有计划向昆明推进，其战略为入侵印度。因为日军当时缺

---

〔53〕戈叔亚、江汶：《惠通桥之战——飞虎队在中国》，据戈叔亚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26479.html。

乏空中掩护，而怒江峡谷在其驻中国东部的航空兵基地的飞机作战半径之外。但是，最初蒋介石对在怒江一线堵截日军并无信心，而倾向于后退至澜沧江设防，并打算迁都至西昌。是民国元老、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极力主张在怒江御敌，并取得林蔚、宋希濂等了解现地情况的军事将领的支持，建议最终被蒋介石采纳。杜安·舒尔茨据此认为："如果当时日军能够顺利渡过怒江并发现怒江至昆明之间防御力量薄弱，他们也可能会抓住这个时机，逼迫中国退出战争。"[54]

笔者以为，对于经常因冒进的战术行动的成果而改变战略部署的日军来说，这一分析还是很有道理的。

7

怒江阻敌成功后，重庆统帅部对于滇西日军敌情作了错误判断，认为沿滇缅公路追击的日军不过是临时编成的快速部队，最多不过两三千人，孤军深入必不能持久；而第 11 集团军所属各部已陆续开抵怒江，截至 5 月 15 日已有 3 个师（36 师、预 2 师、88 师）兵力，对日军占绝对优势。因此，蒋介石下令宋希濂反攻腾冲、龙陵，企图利用日军立足未稳之际，把滇西失地夺回来。

5 月 15 日下午 5 时，宋希濂于保山郎义村指挥部向各部下达命令：

惠通桥西岸约有步炮联合之敌五六百人，装甲车、战车各十余辆，正与我第 36 师隔江对峙中；龙陵方面有敌步骑兵约七八百人，汽车约三四十辆，日来运输颇为繁忙；腾冲于 5 月 11 日被步骑炮联合之敌约七百人占领，十三四日敌骑已出没于红木树、大寨（马料铺西南约 12 公里）一带。

我军以收复滇西边疆，迎接我远征军回国之目的，即以主力迅速由惠通桥下游渡过怒江，先歼灭惠通桥西岸之敌，进出腾冲、龙陵之线。

---

[54] [美] 杜安·舒尔茨：《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事的战争》，第 292 页。

第36师（附炮8团[55]第1营）应以一部对惠通桥当面之敌佯攻，极力将敌抑留于我正面，主力应于18日由蟒王寨（即施甸县莽王寨）以西渡过怒江，经平子地、白泥潭进出于连厂、马鹿塘附近地区。于19日半夜后开始向腊勐街、核桃箐一带之敌侧背袭击，并彻底破坏该处公路，与该师在惠通桥正面之一部协力，务捕捉敌于惠通桥、腊勐间地区而歼灭之；另派一部由惠通桥上游渡河，进出于平子地、松山一带，同时绕袭敌之左侧背。

第88师应于18日正午以前由攀枝花（滥坝寨以西）附近渡过怒江，以主力经椅子山—杨梅田—红木树附近，进出于寿福硐、邵家寨及麦子地、咬郎（即绕廊）间地区，于19日半夜开始，将镇安街、猛冒街（即勐冒街）、黄草坝一带公路彻底破坏，并以一部占领黄草坝附近要点，竭力拒止龙陵方面东进之敌，俾我第36师方面之攻击容易；另以有力之一部，经坡头进出竹坝附近，于19日夜半同时占领南天门（放马桥南）附近要点，彻底破坏公路，拒止自芒市方面东进之敌，并对龙陵方面袭击，极力钳制该处敌之行动；对河尾（滥坝寨南约四五公里）方面，并应由该师搜索连派遣部队担任警戒。

此外，还令预2师于17日正午以前由惠仁桥附近渡过怒江向腾冲进击。

5月16日下午，宋希濂在保山指挥部接奉蒋介石删（15日）酉电令，要旨为："我军到龙陵时，如敌闭城固守，切勿攻坚，先将其东西各要隘占领，断绝其归路，再设法消灭；对腾冲亦应如是。"

自下达反攻指示，及此后的作战过程中，远在重庆的最高统帅蒋介石一直以电话、电报直接指导第11集团军。以前屡有耳闻，蒋介石对于战事关注、过问"很细"，经常越过无数层级指导到部队战术行动，从这一战事中可得佐证。但部队尚未行动，即先打了这种"勿攻坚"的预防针，此后的作战行动即早早定下了调子。

17日至21日，连续4天阴雨，怒江水势陡涨。第36师、第88

[55] 为独立炮兵团，装备辽造十四年式150毫米口径榴弹炮16门。

师、预2师各部依令向各指定渡口开进，因木舟和竹筏匮乏，渡江极为艰难，原定于19日的总攻时间只能被迫推迟。

此期间，我东岸重炮继续向松山轰击，位于下腊勐街附近公路上的日军野战重炮阵地落弹极密，日军怀疑该阵地已被我军侦悉，于19日夜将150毫米榴弹炮向东南转移至董别大山（即日军后来的右监视哨阵地）背后，将100毫米加农炮转移至松山西侧公路附近。[56]

22日，天空终于放晴。当日，从怒江下游渡江的88师主力已分别在龙陵以东蚌渺及咬郎各附近集结完毕，完成攻击准备，宋希濂即决定将总攻发起时间定于23日深夜。中午，又接到蒋介石电话命令："88师应先以有力部队占领南天门，彻底破坏该处公路，然后再图围攻龙陵之敌。"——南天门为滇缅公路芒市至龙陵路段上的一处断崖天堑，占据该地可阻止芒市以西乃至缅甸方向的日军增援龙陵。这一点，其实在集团军15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已经有明确部署。但宋希濂还是饬转第88师师长胡家骥切实遵办，并指示发动象达附近民众协助实施破坏。

据日军战史载，23日以前，日军在滇西的兵力较为空虚。

在松山，日军主要以临时配属的炮兵部队为主担负防御，包括野战重炮兵联队，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及第2中队高村小队，及在渡江进攻中损失颇重的步兵第146联队松本大队（第3大队）残部。

在腾冲，刚刚占领该地的步兵第146联队主力（联队本部及第2大队）立即遭到我预2师反攻，此时正在腾冲周边发生激战。

在龙陵，仅有坂口少将所辖第56步兵团司令部，野炮第1大队本部及第1中队，步兵、工兵各一个中队及野战医院，且步兵中队正在镇安街对从邦买街南下的预2师第5团第3营[57]进行"讨伐"作战。

---

〔56〕《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85页。

〔57〕17日，预2师先遣支队通过龙江桥向橄榄寨前进；第5团第3该营相机向邦买街以南牵袭日军。《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1辑，第13页。

由于我军渡江迁延时日，且20日日军在镇安街附近公路两侧山上发现我军尖兵踪影，日军第56师团长渡边正夫中将已预感到我军即将发起反攻的企图，乃紧急抽调正在缅甸伊洛瓦底江上游八莫、杰沙等地实施“扫荡”作战的松井部队（步兵第113联队）增援滇西方面。23日傍晚，松井秀治大佐率第113联队开入龙陵，使龙陵方面日军兵力大增。

我军即将发起的总攻，就仅以数小时之差而错失了最佳战机。

24日凌晨，第11集团军各攻击部队在协同行动下，分向指定攻击目标前进。

惠通桥正面：

自下游橄榄坝渡江的第36师第108团于零时开始行动，在沙子坡附近与接战，继而占领竹子坡5600高地，以一部向核桃箐、芹菜塘进袭。自上游干沟渡江的第107团第2营，亦于拂晓前秘密推进至4920高地（即赤土山）亘小寨之线，向南涉过勐梅河后，即向松山北部攻击。该部掌握的敌情为，敌共约一个大队，配有火炮4门[58]，节节顽抗，似图待援。

在日方记录中，从松山北部进攻的第107团第2营的攻击极为猛烈，且击毙了首任拉孟守备队长、野战重炮联队长田村中佐：

5月24日一早，怒江对岸钵卷山后方的敌军重炮一齐向日军阵地猛烈开火，敌军步兵也攻到了“十加”（105毫米加农炮）中队的炊事场，敌我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同时，腊勐高地和腊勐村落之间突出部的西分哨附近，敌我双方也展开了激战的手榴弹战。顿时，腊勐到处都是一片激烈的枪炮声，野炮阵地遭到了更加猛烈的攻击。松本大队（步兵第3大队）全体兵力按其配置，在各阵地与敌展开白刃战。

当时，野炮第3中队的今泉利四郎曹长，奉命带着缴获的2门迫击炮前往西分哨增援。9时30分左右，当小队全员乘坐的卡车在

[58] 实际上远远不止，仅野炮第56联队改造三八式野炮即有6门，尚不包括数目不详的野战重炮联队150毫米榴弹炮和105毫米加农炮。

距西分哨东侧还有200米左右的一个弯道处时，突然遭到头顶高地上敌军机枪的猛烈扫射，汽车引擎被击中，子弹从驾驶员小林兵长的肩上擦过，打在了今泉曹长腰间的水壶上，水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谢天谢地，托水壶的福，没有受伤。但车动不了，前方又被敌军的机枪封锁，一时难以前进。

今泉曹长只好命令大家马上持枪下车，找敌火力死角隐蔽。

此时，西分哨方向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手榴弹爆炸声不断，敌军虽都已进入射线，但又不能妄自行动。从望远镜里看到，大批敌军正向西分哨南侧高地移动，看样子是要攻击守备队本部高地了。

今泉曹长此时仿佛感觉到守备队本部及腊勐村落周边已陷入危机，为了阻止敌军继续向守备队本部及周围高地进攻，他一面命令江崎顺吾兵长和宫川理上等兵前往联队本部通报，同时用步枪向西分哨方向的中国军队开枪，想把敌军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下午1时左右，接到报告的野炮第3中队的山元正文中尉率领一个步枪小队赶了过来，田村守备队长也赶到第一线来亲自指挥战斗。当时，田村守备队长站在距离今泉曹长4米左右的道路上观察情况。

"危险！"今泉曹长心里刚闪过这个念头，敌军的机枪响了，一排子弹打在了田村守备队长身上，只见他歪歪斜斜走了不到十步就倒下了。联队副官马上跑过去，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但联队长已经断了气。

"联队长殿下！联队长殿下！"副官悲切地呼喊着，那悲惨的声音至今仿佛还回响在今泉的耳边。

下午4时30分左右，敌军的6架战斗机突然由水无川（勐梅河）方向低空飞来，在投弹轰炸的同时，又来回地向日军阵地扫射。此次空袭，日军死伤多人，今泉小队的山泷兵长左腿和手臂均被打中，江崎兵长两腿也负了重伤，经临时包扎后又参加了战斗。

傍晚时分，西面山谷里的敌军大部队又悄悄集结起来，今泉小队长测定了方位距离后，连续向敌军轰击，炮弹一发跟一发地在敌群中爆炸，敌军一片混乱。遭到沉重打击的敌军慌乱地向水无川方向溃退。敌军夜袭的企图被挫败，此时，日军才总算松了一口气。

当天夜里，对死伤人员进行了安置，并加固了阵地防御工事——田村联队长的尸体也在这天夜里进行了火化。而后，由步兵第146联队第3大队长松本中佐接替其担任守备队长，指挥部队与陆续袭来之敌继续奋战。[59]

龙陵东北：

自毕寨附近渡江的第88师第263团，于零时以主力袭占猛冒街；以一部袭击黄草坝，将敌百余击溃，占领各要点。上午10时，敌“仲岛部队”[60]约百余人由龙陵向黄草坝增援，当被击退，我焚毁汽车十余辆——据日军战史，这正是从龙陵赶赴松山增援的日军松井部队前锋；又松山方向开来汽车十余辆，载敌兵百余，至猛冒街附近被我击溃，复向北逃窜，我夺获步枪数支。

龙陵东南：

第88师第262团自毕寨渡江后，主力于拂晓攻占龙陵东南广陵坡、华坡诸要点，得知敌为中村及坂山部队，总计约八九百人。另以一营向南直插，于清晨袭占南天门，并加紧破坏滇缅公路。敌一再反攻，但要点仍为我控制。

当日中午，宋希濂致电第88师师长胡家骥：

“该师目前第一任务在积极破路，节节截断，愈彻底愈好，务使敌不能由芒市、龙陵等处增兵东援，并接济粮弹，俾36师得于短期内将惠通桥西岸之敌完全解决，希激励各部并发动民众努力图之。”此为对蒋介石此前提示的第二次重申。

25日，第36师第108团第3营本晚确实占领竹子坡高地，其第1营进占大滚塘。第88师第263团攻占猛冒街后，敌（即松井部队）由龙陵增援数百人反攻，激战至烈。该团受敌压迫，曾一度脱离公路，致敌有一部东窜增援。

26日，第36师第107团向松山、三眼井之敌攻击；第108团

---

〔59〕［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20页。

〔60〕我军战斗详报中所记日军姓名，一般源自零星缴获的日军文件或阵亡日军遗物信息，但多有虚构之笔，不尽可靠。下同。

向松山南端高地攻击，以收夹击之效。敌凭据松山主峰5200高地、腊勐街、核桃箐顽抗，双方伤亡均重。

担负打援任务的第88师第263团、第264团，仍在努力确保既得阵地，并积极破坏公路。但连日来芒市、龙陵之敌大举反攻，该部伤亡极重。

当日，宋希濂又致电第88师师长胡家骥：

“南天门要点至关重要，我军必须确实巩固，构筑阵地，做死守之计；无论敌如何攻击，均不得放弃，并须将该处公路继续彻底破坏，使芒市之敌无法再行东犯。如兵力不足，立即速调262团一营前往增援为要。”此为对蒋介石此前提示的第三次重申。

27日，第36师第107团之一营（第2营），于清晨攻占松山北及5200高地。敌数百人增援反攻，经该营伏击，毙敌百余，敌大队长入部兼康[61]少佐亦被我击毙，虏获文件甚多。据载，从缴获的一只军官图囊中，发现载有敌布防情况的文件及地图，即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分设拉孟（即松山）、腾冲、龙陵、芒市、平戛、畹町6个守备区，缅甸境内还有5处据点，师团司令部驻芒市，据此判断其兵力约为1.5万至2万人。[62]该文件即迅速上报。

据日军战史记述：从龙陵赶来增援的松井部队及野炮第1大队主力，“25日再向腊勐进击，途中力排敌阻；26日在松山南方垭口（即长岭岗）处与敌激战，将敌击退；27日午后抵达腊勐，与本地守备队会合”。[63]我军战斗详报的记述为：“下午1时后，由猛冒街方面增援之敌二三百，战车及装甲车各四辆，猛烈逆袭，反复肉搏，第107团因伤亡过大，不得已退守松山北端高地，就地构筑工事。”

---

〔61〕入部兼康系日军第113联队第2大队长，但据查此人未被击毙，而于1945年6月16日在独立臼炮第1联队长任上阵亡于冲绳。

〔62〕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5页。其后不久，日军第56师团在滇缅两地的配置为：芒市（师团司令部）、龙陵（步兵团司令部，后迁腾冲；第113联队第3大队及工兵第56联队）、拉孟（第113联队，欠第3大队）、腾冲（第148联队）、平戛（第146联队第1大队）、畹町（第146联队本部及第2大队）、南坎（第146联队第3大队）、滚弄和新维（搜索第56联队）、腊戌（辎重第56联队）、贵概（野炮第56联队）。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157页。

〔63〕《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100页。

龙陵方面，第 88 师第 262 团据守南天门阵地受敌猛烈攻击，竟日艰苦支撑。连日来，敌由畹町方面源源增援，该部伤亡綦重。

当日上午 10 时许，宋希濂接奉蒋介石电话指示："攻击部队应避免硬战，分成若干小组，钻隙进出公路，依伏击、截击诸方法打击敌人，并加紧破坏。"

天气似乎也随着战局进展而变化，28 日以后，又是持续阴雨。

昨日，从缅甸方向飞来敌机数架，在惠通桥上空盘旋，似在侦察我军实力。28 日中午，敌机十余架再度飞来，在江东大山头附近轰炸，我无损失。

下午，敌战车、装甲车各十余辆，汽车四十余辆，满载敌兵，由龙陵方向驶入腊勐。薄暮后，敌向据守松山北端高地的我第 107 团反攻，未逞。

担任打援的第 88 师各部连日受敌优势兵力之猛攻，伤亡甚大。第 262 团于昨夜被迫脱离公路，本日复进至猛冒街东北、大坪子、龙山卡之线。第 264 团第 3 营仍在南天门与敌激战中，该团主力续向龙陵附近之敌进击。

29 日，第 36 师第 108 团左翼长岭岗一带，增援之敌攻击颇烈；战事重点仍在松山主峰 5600 高地方面。

第 88 师第 263 团，分组在黄草坝、小黑河、小岩子附近向敌袭击，毙敌甚多，毁敌汽车数辆，并破坏公路数段。第 264 团在南天门将其附近的石台柏木桥破坏，敌源源而至增援，猛烈攻击，企图修复，该团极力阻止。

当日中午，蒋介石给宋希濂打来电话，指示："敌源源增援，我军应避免硬战，减少牺牲，以伏击邀截等方法钻隙扰袭，并尽量破坏公路，限制敌之行动。"显然，此时最高统帅已判断反攻无望。

宋希濂即转令第 36 师暂停攻击，并电令第 88 师以营为单位，再分若干小组以少数工兵进出公路，积极施行破坏。如遇少数之敌，则一举围歼之；遇优势敌人，则应伏于公路两侧予以奇袭，不必作真面目之战斗。

30 日，腊勐之敌六七百人，向竹子坡第 36 师第 108 团阵地猛烈攻击，我各地守兵沉着应战，伤亡颇重。

连日来，芒市之敌不断增加，向南天门第88师第264团之一营攻击，当日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中。据日方资料载，这应是从缅北调来增援的“菊兵团”藤村部队（第18师团第56联队）。[64]

31日，各攻击部队依昨日电令指示，逐次脱离敌人。第36师第108团以一部在秧阱、沙子坡、竹子坡、小岩子之线掩护主力向怒江东岸移动。此时，芒市、龙陵之敌仍源源增加，向第88师南天门阵地猛攻。

下午3时以后，宋希濂就后续作战行动指示第88师：

“划定怒江西岸北自滇缅公路，南迄平戛、象达、芒市、潞西[65]一带中间地区，为该师今后作战活动区域；应分派小部队配属工兵随时钻隙进出公路，施行破坏，且奇袭敌人，不断予以打击。并在作战区域内，多招收优秀青年及正直士绅，组训民众，配合军队作战，且联络各地土司，使不为敌所利用；敌后作战必须军民彻底合作，对于军纪之整饬，民众之抚恤，务必特别注意。”

6月1日，雨仍未歇。

上午，第11集团军接奉军委会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抄转蒋介石辰世（5月31日）电令：

> 关于滇西部署，希遵照以下指示：
>
> 预2师及刘伯龙部（新28师）在怒江西岸游击并破坏龙陵、腾冲、惠通桥间公路；36师主力守备惠通桥及攀枝花两渡口；88师一部守备惠仁桥，主力控置于保山。以上各部队任游击外，均须各就指定地区积极构筑工事，尤须注意以火力封锁渡口。

第11集团军基于上令，重新部署调整态势，以一部留置怒江西岸游击并施行破坏，主力沿怒江东岸构筑工事，坚强固守，形成对峙。6月14日，第87师开至保山，即令该师以第261团推进至施甸

---

〔64〕［日］太田毅：《拉孟——玉砕战场の证言》，第23页。据查此时第56联队长似为藤山三郎大佐，藤村义明中佐系1944年才接任。

〔65〕此时，芒市是潞西设治局的中心市镇。1949年8月建潞西县，1996年10月改潞西市，2010年8月改芒市。

附近，担任攀枝花至打黑渡间渡口守备；而以预2师全部留置腾冲东北地区开展游击。[66]

5月15日至6月1日，围绕惠通桥—松山这一核心区域发生的战事，后来在战史中被称作“反攻试探战”。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收复松山的一次小型化而不成功的“预演”。

---

〔66〕《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1辑，第14—25页。关于预2师游击腾冲，可参阅拙作《1944：腾冲之围》。

第2章　松山：兽军盘踞的要塞

（参阅附图 1、附图 2、附图 3、附图 4、附图 5、附图 12、附图 13、附图 14）

1

在惠通桥阻击战及反攻“试探战”之后，我军撤至怒江以东，日军即长期驻扎在了松山，形成隔江对峙局面。对怒江而言，松山是矗立西岸的一座超级“桥头堡”；对滇缅公路，松山是扼断其咽喉惠通桥路段的巨手；对滇西重镇龙陵，松山则为其东部的前沿屏障。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实为滇西战场攻守必争之战略枢纽，故美军战史将其称作“滇缅公路上的直布罗陀”。[1]

如前所述，最初打到松山的是日军第 56 师团步兵第 146 联队及野炮第 56 联队第 1 大队，当时是在临时编成的坂口支队之内。不久，以上部队及临时配属的野战重炮联队撤走，之后接替防务的是步兵第 113 联队主力及野炮第 56 联队第 3 大队，配属师团直属辎重兵、卫生队和防疫给水部一部，兵力约 3000 人，担负镇安街以东至怒江地区的守备，第 113 联队本部设在松山。按日军惯例，他们以松山脚下的腊勐街之名，将守军命名为“拉孟守备队”。[2]

野炮第 1 大队进驻松山时，仍使用老旧的“改造三八式”75 毫

〔1〕 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第 15 页。

〔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55 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33 页。

米野炮，新开到的野炮第 3 大队已经列装了先进的“十榴”——105 毫米榴弹炮。起初该大队进驻松山的仅第 8、9 两个中队；第 7 中队留驻龙陵，且一度改装高射炮被调往缅甸腊戍担任防空，后来又重新改装“十榴”返回松山。1943 年元旦的早晨，在构筑完成野炮阵地后，日军曾对怒江东岸我军阵地试射，发射前还在炮弹底部贴上了从故乡久留米高良神社带来的护身符咒。3 月 4 日，2 架我军飞机曾超低空飞过松山实施侦察，日军操纵缴获我军的 13 毫米高射机枪射击，击中了其中一架，飞机冒着黑烟坠毁于附近山中。次日，我军又派 12 架 B–25 中型轰炸机前来轰炸扫射，因松山地势不利，并未取得多大战果，日军为此得意洋洋。[3]

1944 年元旦，在松山日军的记忆中是个难忘的日子：海拔 2000 米的松山阵地上开始供水了。为此，日军在松山主峰的道人坪子用汽油桶烧了热水，士兵们脱得赤条条的洗了一通露天浴。

日军既然打算在松山长期坚守，水源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松山高地上水源不足。日军最初打到松山时，是由师团防疫给水部用运水车从镇安街方向运水过来，当时仅能保证煮饭用水。驻扎下来后，又先后在横股阵地（马鹿塘）及小股阵地（大垭口海螺地洼）发现了两处细小水源，分别指定为整个守备队的炊事用水和马匹饮用水。实际上，在松山西侧的水无川（勐梅河）是有足量水源的，特别是在本道阵地（滚龙坡）与崖阵地（松林大坡）之间北面山谷中就发现了一眼出水量较大的泉水。但因此处位置很低，关键是缺乏供水设备，日军只能组成运水班，每天往返一次，用水囊从山下背水上来，以满足洗衣洗澡之需。

日军第 56 师团长松山祐三对此非常焦虑，在其指示下，师团防疫给水部派专人前来解决松山阵地供水问题。防疫给水部的冈崎正尚军医大尉、吉田好雄准尉等人，利用我军此前遗弃在滇缅公路上的汽车进排气装置，改装成了一台动力抽水泵；又从畹町运来铁水管和水泥，从镇安街运来沙土，日军士兵汗流浃背日夜施工，在步兵炮小队兵舍西侧高地修了一个蓄水槽，又在滇缅公路纪念碑西侧

---

〔3〕［日］太田毅：《拉孟——玉砕战场の证言》，第 25 页。

高地修了一个配水池，于 1943 年 12 月 1 日完成输水管道铺设。而后，用两级抽水泵抽水上来，再以铁水管输往各兵舍地。12 月 26 日成功地进行了试通水，之后又做了一些修补，将输水管延长了 3000 米。1944 年元旦正式通水成功，不但彻底解决了守备队炊事用水，还保证了官兵每 3 天可轮流洗一次澡。[4]

洗澡对日本人是最重要的生活享受，能 3 天洗一次澡似乎意味着真正的安居乐业了，但他们想不到 200 多天后即全部葬身于这个山头。

在日军被歼灭整 60 年后的 2004 年 9 月，笔者曾来到松山。从公路边的松山大垭口村往山上走数百米，在路边的玉米地里看到一座边沿已经残缺的日军蓄水池。这里原是日军第 113 联队本部驻地，这个蓄水池是松山上仅有的几个混凝土设施之一；据说还有一处是电话交换站，已经被炮火翻耕深埋于地下。60 年过去了，蓄水池里盛满了猩红的雨水。

当时，吉田准尉还用汽车发动机改装成发电机，为松山主要阵地和兵舍拉了电线，使 70 多处用上了电灯。

2

日军部队都是所谓“乡土部队”，每支部队的兵员均来自一地，凭借浓重的乡土观念形成特殊凝聚力。侵占滇西的第 56 师团，系根据日本裕仁天皇“军令陆甲第 85 号”令，以第 12 师团留守部队为基干，于 1940 年 7 月在久留米编成，以北九州的福冈、佐贺、长崎三县为征兵区。

在日本，素有“九州男儿”之说，极言九州岛民风强悍、勇武、豪爽、热情。战国时代，这里曾据有筑紫、筑后、丰前、丰后、肥前、肥后、日向、萨摩、大隅九大藩国，几百年争战不休，从而熏染出精兵尚武“九州第一”之名。在南京大屠杀中罪孽深重的破城

---

〔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59 页。［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46 页。

“首功”熊本第6师团，及在缅北横行一时的久留米第18师团均属九州部队。作为编成地同为北九州久留米的“同乡”部队，第56师团与第18师团在滇西、缅北战场遥相呼应，作战配合上有天然优势。第56师团属于“新常设师团”，基干力量为3个步兵联队，配属搜索、野炮、工兵、辎重诸特种兵联队，为战争后期战斗力较强的“一类师团”。[5]

曾任日军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服部卓四郎大佐在战后所著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夸耀，“第56师团自1942年5月进占怒西以来，在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陆士22期）统率之下，富有必胜之自信，认为本战场为师团之练兵场。故能对十倍之敌，善战异常”。[6]但稍稍翻翻账本，就知道这个牛吹得有点大——至少在第56师团中序列第一的第113联队，就曾经有过暗淡的“前史”。

第113联队是1938年5月在熊本首次编成的，随后纳入第106师团序列参加了武汉会战，在九江以南的沙河镇和万家岭，两次几乎被国军全歼，其首任联队长田中圣道大佐被击毙；在一年后的南昌会战中，继任联队长饭野贤十大佐又被打死。[7]1940年3月该联队撤编，兵员解散，军旗收回皇宫。半年后，第113联队又在福冈重新编成，1941年10月纳入第56师团序列。

第113联队现任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陆士26期），即为拉孟守备队队长。中国远征军反攻开始后，松井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方向作战，将守备队长之职委任于野炮第3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后来又让自己的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从高黎贡山返回松山协助金光指挥。指挥日军拉孟守备队后来葬身于松山的就是此二人。

金光惠次郎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生人，日本冈山县和气郡人，出身贫寒农家，高小毕业后即辍学。大正五年（1916年）

---

〔5〕据黄立民文章《日本陆军师团组建与编组分类情况解析》《亚太战场123个日本陆军师团全记录》：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0383。

〔6〕［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84页。实际上，进占滇西时第56师团首任师团长为渡边正夫中将，1942年12月1日由松山祐三中将接任。据《兵旅の赋》，第317页。

〔7〕郭汝瑰、黄玉章：《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810、843页。日本每日新闻社《一亿人的昭和史》丛书日本的战史4之日中战争2，第211、216页。

20岁时应征入伍，服志愿兵役10年后，才以军曹资格考入士官学校进入军官行列（少尉候补生第7期），1944年已经48岁。[8]按日军制度，少尉候补生出身的军官，平时很难升到大尉，能晋升到少佐是因战时军官缺乏而实行的特例了。服部卓四郎曾评价说，“金光责任感颇重，沉勇有为，深得部下爱戴，及上司之绝对信任”。[9]日军陆军军官的正路出身，是从陆军幼年学校或旧制中学校毕业后考入士官学校，毕业后晋升到少佐大队长这一级，一般不超过40岁。金光惠次郎这个年龄无疑是超大了，被戏称为“老少佐”。大概因为出身不正的原因，这个“老少佐”不像一般少壮军官那样狂傲，显得比较内敛。据野炮第56联队本部的山口末吉中尉回忆：“金光是一个很会写报告、写文章的人。他即使来到比他年轻的山崎联队长这里，也像一个新兵，稍站片刻，回头就走，很有礼貌。”[10]

以金光这样的出身和个性，虽然担任着守备队长，但实权无疑旁落于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手里。真锅邦人明治四十三年（1910年）出生，日本福冈县筑紫野市人。也是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军官，先后毕业于日本熊本下士官教导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少尉候补生第12期），时年34岁，正值少壮。[11]据活下来的日军士兵石田富夫、鸟饲久等回忆，在松山战役期间，真锅邦人一直担任前沿阵地指挥。他对松山阵地的每个角落都了如指掌，并能够合理指挥，发布命令时喜欢大喊大叫，非常严厉。“正是由于有真锅大尉，那样的战斗才能坚持下来。”[12]

这个在日本士兵眼中有“威信”、“比较善良”的人，其实是一个残忍之徒。真锅邦人曾任第113联队第1中队长，其中队的上等兵高桥公曾供述：在隔江对峙时期的一次遭遇战中，在概玛瓢附近，一名赶着拉米的牛车的日军士兵被7名中国士兵包围。当时日军跪

---

〔8〕《大国之魂》中记金光惠次郎1944年为29岁，将其称为少壮军官，应不确。

〔9〕［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86页。

〔1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14页。

〔11〕同上书，第228页。

〔12〕同上书，第243、252页。

在地上求饶，7名中国兵没有杀他。但押着他回去的路上，碰上真锅邦人的中队，于是7名中国士兵反被日军俘虏。一名中国士兵逃跑时被击中，另一名逃脱。当时第1中队长真锅邦人下令，让上等兵高桥用刺刀将跪地求饶的其他5人全部捅死。

而这个提供证言的上等兵高桥公，入伍前竟然做过新闻记者，曾用第56师团奖励的一台“美能达”相机，为松山日军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擅长柔道，时常将战俘捆在木桩上练习拳击，打出一身汗水后，再用刺刀捅死。战后，此人易名为佐藤公，一度混迹越南，回国后担任了“全缅战联协”九州地区的事务局长，为后来在缅甸搜集阵亡日军遗骨不遗余力。[13]

3

后来的战事证明，日军拉孟守备队以留守的千余人，居然坚守松山3个月，尽管全军覆没，但造成中国远征军约7773人的惨重伤亡，主要原因正在于其松山阵地的坚固。日军曾将松山阵地称为“东方马其诺”，但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并没有发挥任何军事效用，被德国人绕道而过，兵不血刃；而松山则成了真正的战争“绞肉机”，吞噬了交战双方近万人的生命。70年以后，这个曾被炮火深深翻耕过的山头，植被却异乎寻常的茂密，也许正是因为浸透了鲜血的缘故。

1944年9月10日，在松山被攻克后第三天，中国远征军第8军军长何绍周发给其叔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描述了松山阵地的情形：

“敌以松山、滚龙坡为其东西两大坚强支据点，互为犄角。其堡垒群则作有体系，散布于松山南北之密林丛草、复杂丘陵。日军第113联队（欠第3大队）及特种兵大队连伤兵约二千余[14]，轻重炮十

---

〔1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37—140页。

〔14〕何绍周此电中对松山日军兵力的介绍不尽准确，详见第3章附表《日军拉孟守备队序列及阵地兵力配置情况》。

余门，由松山东端（785[15]）至滚龙坡（801）间正面约四千余公尺，构成若干堡垒群为其主要阵地带。每一堡垒均构成其上有射击设备和交通壕、下为坑道式掩蔽部。其掩体材分四层，由下至上，第一层中径四十至五十公分，第二层三十至四十公分，第三层廿五至卅五公分，第四层廿至廿五公分。其最上层均有覆板。周围则以大汽油桶，三层装土为被覆，并围以纵深四公尺之铁丝网数层。除重炮直接命中始有破坏力外，山野炮均难破坏。"[16]

1946年9月，历史学家、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方国瑜先生现地踏勘了松山等滇西战场遗址，著成《中国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那时，松山阵地遗迹还保存如初，方国瑜教授得以进入日军工事细致考察，他描述道：

"敌堡垒主体之构筑，大部分为三层，上作射击与观测，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仓库；更于下层掘斜坑道，其末端筑成地下室，又有于下层之四周筑地下室者。堡垒上掩盖圆径至70厘米之木柱，排列成行，积四五层，上铺30毫米厚的钢板数层，积土厚逾1米，虽山炮命中，亦不能破坏此坚固工事。堡垒出地面之四周，安置盛满沙石之大汽油桶，排列三重，桶间复加钢板数层，桶外被土，故150毫米榴弹重炮命中不能破坏，内部所受之震荡亦微。堡垒内三层之间，亦盖以圆木径50厘米者二三层，故上层倒塌不致影响下层。堡垒间之交通壕，纵横交错，更掘暗壕以通堡垒内之坑道掩蔽部，及阵地边缘交通壕，上间有掩盖，或以壕之侧壁掘掩蔽壕成环形，守备阵地或伸出以消灭死角。"[17]

据日方史料，自1942年5月进至怒西后，日军就将松山作为警备中心、进攻据点和防御支撑点三位一体的战略目标，开始阵地建设。1943年，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节节败退，日军战略专家预见到松山作为支撑滇西和缅北防御体系重要据点的作用凸显，为作最后的困兽之斗，拟将松山建设为永久性防御要塞。[18]

---

〔15〕指滇缅公路里程路标，从昆明西关起算。后同。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0页。

〔17〕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69页。

〔1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9页。

松山阵地的修筑分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将松山作为进攻保山的前进阵地而考虑，同时以应对远征军反攻为辅，因此主要修筑了本道阵地（滚龙坡）、原口山阵地（竹子坡）等外围阵地共 17 处，其中包括两处渡河点监视阵地。工程于 1942 年底竣工。第二阶段，日军看到进攻无望，转而以松山做支撑点式防御为主，着手对松山腹部阵地进行加固与扩展，共增设、改设及加固原有阵地 11 处。工程于远征军反攻前夕完成。[19]

对修筑松山阵地贡献最大的，是野炮第 3 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

在金光之前，首任大队长是菊地武宁少佐，曾率部驻扎松山一年有余。此期间，这位菊地大队长对于构筑阵地没有具体目标和想法，每天主要精力是兴致勃勃地侍弄他宿舍门前的一块菜地——后来活下来的野炮大队本部军曹森田觉曾说："那时，从上到下都还在做着天下太平的美梦。"1943 年 8 月，菊地转调海南岛的"南支派遣军"任职，由金光惠次郎接任。金光到任后，马上巡视了全部野炮阵地，皱起了眉头："这样的阵地不行！"遂立即召集所有军官，下令要有计划地构筑阵地。当时，第 8 中队长有岛芳次拟定了一个阵地配置方案，得到金光首肯，由此，野炮大队开始按高标准改建阵地。[20]

野炮第 56 联队军曹太田毅在战后所著《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一书中，曾主要以第 8 中队为例详细披露了修筑阵地的过程：

……在修筑主体工事"十榴"火炮掩体时，要将壕沟挖到在地面上只可看到炮口的深度，四壁则用两排装满土石的汽油桶进行加固。顶棚以粗大的松树原木平铺，原木之间用扒钉固定，下层再插入 3.2 毫米厚的大块铁板——这是在进攻作战时中国军队遗弃之物，如此横竖交错地要铺两层或三层。壕内的立柱，也是把几根粗大的松树原木绑在一起使用。

---

〔1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58—163 页。

〔20〕［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25 页。

由于缺少水泥，[21]顶棚上面就用厚土覆盖并夯实，又种上一些杂草进行伪装。以此确保工事强度，要能抵御“十榴”火炮的正面轰击或飞机投弹时的直接命中；甚至，连防水漏水工程也都进行了充分的考虑。

构筑工事的木料，都是从远处的山谷中运来的。为保证阵地的隐蔽性，阵地附近的树木一律不得砍用。如炮兵第8中队所用的木料，就是从本道阵地南面的山谷密林中砍伐的。当时，若要以人力搬运这些木料，不知道要多少人才够。为了解决运力问题，官兵们就利用中国军队遗弃的汽车，以能用的零部件拆装成牵引车。即便如此，把那些木料从陡峭的山坡下沿着蜿蜒的小路运上来，也是费尽了精力。在此过程中，还时常发生牵引车抛锚、翻覆、绳索崩断的事故，这时候士兵们就只能靠肩扛背驮，其艰辛真是难以言说。不过，奇迹是没有死一个人，因为士兵们都是紧绷着神经在拼命劳作。

好不容易将木料运上山，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作立柱的木料要树起来固定捆绑，作顶棚的木料也要抬起来搭上，这些全都要靠人力。

设计阵地时，还考虑到在万一的情况下，能依托掩体壕与敌军对峙的问题。就又在火炮的侧面增设了足够所有人员临时休憩的空间，并予以强化。

日俄战争时，日军在旅顺要塞的工事，都是用“坩子土”（高铝质黏土，可用于烧陶）构筑的坚强堡垒，然而40年后在松山上建造的却是“土堡垒”。虽说是用土木构建的非现代的堡垒工事，但也是官兵们在“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指导思想下，历时8个月时间经过千辛万苦劳动的结晶。所以，它最后还是挺住了敌数万大军3个月的猛烈攻击。

---

〔21〕据《缅甸作战》载：“因无水泥，不能构筑混凝土工事。”军事筑城学将工事分为永久性工事（要塞）、半永久性工事、野战工事。受制于缺乏水泥这一因素，日军以工事“地下化”为基础，充分利用本地木材较充足的条件，辅以汽油桶、钢板等材料，将松山工事最终建成为半永久性工事，防护性能并不亚于永久性工事。1942年5月12日日本《朝日新闻》曾报道第56师团在畹町、遮放、芒市、龙陵一路缴获我遗留物资甚多，其中在龙陵即缴获水泥10000袋，何以有“无水泥”之说，不详。据王辅：《日军侵华战争（第三册）》，第1800页。

为使“土堡垒”炮台充分发扬火力，在设计上堪称费尽心思。它与用钢铁和水泥浇铸而成的旋转式炮台完全不同，因为必须相对固定火炮射孔，这样保证射界就是一个难题。本道阵地（滚龙坡）的炮兵掩体，就将三笠山（竹子坡最高点）、原口山（竹子坡5600高地）和腊勐街方向的山谷以及横股阵地（马鹿塘）、对岸的钵卷山（大山头）都纳入了射界范围。为此，对很多细小问题都做了考虑，比如为提高射击精度，在火炮瞄准镜下面专门安装了一根刻有标高尺寸的支柱。

若按全方位射向来设计火炮掩体，射孔就必须开得很大，则工事强度就会减弱。所以，射孔大小就必须有所限制，只能指向主攻方向。所以，当时就没有开设指向本道阵地南面公路方向的射孔（但不幸的是敌军后来还是从这边攻了过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当时也做了一些调整设计，即在万一的情况下，把掩体后面作为出入口的铁门打开，将炮口掉转过来射击。此外，与此配套的弹药库也按高标准挖掘加固并做了伪装。

经过一点一滴的艰辛努力，筑壕工程终于完成了。接着就要用牵引车将火炮搬入掩体内，这又是一件让人捏着一把汗的紧张的连续性工作。当全体官兵把火炮拉入掩体内那一瞬间，大家都激动得相互拥抱在一起兴奋地跳了起来，还连呼三声“万岁”。

曾经当了俘虏经重庆回来的“八中观测”（野炮第8中队观测手，本人希望用假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曾感慨地说：“构筑阵地真是一件苦差事，天气又热，吃的是小土豆，大米很少，还得空着肚子把那些又粗又大的松木运到阵地，真是太残酷了。”

为让构筑阵地的士兵们恢复一下体力，上面命令休整了几天。但是，对岸敌军的活动已经频繁起来，于是各队又忙着修筑附属工事。每队都各自挖了用于藏身的掩体壕，第8中队把隐蔽壕选在了建造兵营时开垦出来较为平坦地段东侧的一个崖壁上。挖掘时只能靠十字镐和铁铲，运土倒是可用牵引车和当地的马，效率还是很高的。野炮兵都是来自福冈、佐贺、长崎三县，有相当一部分人入伍前曾是矿工，在挖掘和架支柱方面都有一定的经验，大量使用松材，所以挖掘工作进展顺利。

构筑坑道时，会在一些地方适当地弯曲，大致呈“T”字形，洞穴纵深为10米、左右每边各宽为20米。在坑道内各处还加宽开设了储存武器弹药和其他物资的仓库。挖掘这些洞穴，是考虑到万一兵舍被摧毁时可作为预备兵舍，也可以作为临时掩蔽部和收留伤员之用。由于这些洞穴只有一个入口，为防止发生窒息或被埋等事故，又另外开掘了一个进口。

在一轮又一轮的构筑工事期间，军事训练也从来就没中断过。也没有忽略对敌主要阵地进行测距和计算射击诸元，要时常通过火炮试射及用炮队镜搜索中国军队活动情况。

金光少佐所在的音部山（远征军编号寅高地）野炮大队本部壕，因不需要设置火炮射孔，就利用山的斜坡挖掘了很深的洞穴式掩蔽部。早见上等兵曾形容“就像落到井底一样”，因为它是在从地面挖下去近4米深的地下修筑的居住空间。

步兵的战壕虽然没有炮兵战壕这么坚固，但也都是利用山腰的坡面和崖壁来构筑的洞穴式掩蔽部，也很能承受炮弹的轰击。步兵的战壕挖得很深，还在侧壁挖了不少隐蔽用的横向洞穴。卫生队也挖了横向的洞穴做伤员收容所。

步兵战壕都是围着前沿阵地和主阵地挖的，各制高点都构筑了棱线阵地。此外，步兵还在杂草丛生的山的斜面挖了散兵坑，坑的直径在80厘米左右，样子有点儿像渔夫捉章鱼的罐子，可以直立于其中射击。各主要阵地之间还挖了相互连接的交通壕，步兵使用的小型火炮都能通过。

各阵地前都拉了铁丝网。重要的阵地是6～8米，一般阵地则是4米宽的双层或3层铁丝网。整个阵地的铁丝网达到了1万米。[22]

为了确保通信畅通，各阵地之间都拉了电话线。其中用于炮兵指挥的电话线就有6条，其中3条线架设在地面上，另外3条埋在地下以备断线时使用。电话交换所则设在用水泥浇灌的地下工事里。

---

〔22〕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附录《松山敌阵地编成之特点及工事之坚强说明》（第99页）：“敌各据点个别设有铁丝网，据点群周围又加设之，常有二三道者，每道纵深4公尺，木桩铁桩均有，铁桩高约2公尺”；“据点最内层用铁片网，其铁片宽有2公分至5公分者，钉于木桩之上。道路道口等处，多用拒马开闭”；“公路要道死角铁丝网前、多埋设地雷及炮弹（弹头上引信）”。

此外，各阵地与联队本部及渡河监视点之间还使用了6号无线电机进行联络。[23]

至1944年4月，日军已在松山上建起了城堡式的坚固防御体系。整个阵地依松山群峰地形，在滚龙坡、大垭口、松山、小松山、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及马鹿塘编成7个据点群，每个据点群均以数个最坚固的母堡为核心，四周又有数个子堡拱卫外围，共有子母堡垒40余座。[24]各堡垒阵地互为侧防，交相掩护。随着堡垒群的落成，整个松山也将近挖空，状如大型蚁巢，地下交通网络四通八达，供电、供水俱已解决。日军战后在公刊战史中记述："建成后的松山阵地枢纽部可承受中口径火炮直接命中，阵地内储存了作战物资，可坚持至少3个月战斗。"[25]

因为拥有了如此坚固的阵地，日军官兵都陷入了某种谵妄状态，对坚守松山抱定了"不败的信念"。在我军反攻前不久，野炮第3大队奉命从各中队抽出约60人临时编成一支特殊臼炮[26]中队，由第8中队长有岛芳次带领开赴缅甸胡康河谷增援第18师团作战。神崎博军曹被抽调参加了该中队，留守人员做了红豆甜粥为其饯行时，还颇为同情地说道："明天起你就再也看不到松山了。"说话的人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去缅甸生死难料，待在松山堡垒最安全，但没料到这句话后来竟成了完全相反的现实。

这时候，大部分官兵开始理解金光少佐的用心。据说金光对军事筑城法颇有研究，深知阵地建设对于作战的重要性，实践经验也很丰富。当时，在后勤供给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强行命令手下进行艰苦的挖掘作业，金光本人也心有不忍，起初遭到不少官兵的白眼和腹诽。但他深感自己肩负众多士兵生命的重大责任，所以，还是坚决彻底地贯彻了自己的意图。稍晚些进驻松山的第7中队小队长木下昌巳中尉曾说，那时金光少佐每天都来到施工现场悉心指导。

---

〔23〕［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25页。

〔24〕《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2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9页。

〔26〕即日军九八式320毫米臼炮。

“假如没有金光少佐，拉孟守备队不可能坚持奋战那么长时间。”看到在严酷条件下劳作的士兵们疲惫不堪的样子，一度对金光的做法内心十分抵触的神崎博军曹，后来也如此感慨。

后任第 33 军高级参谋的辻政信曾评论说：“新任之守备队队长，总要争取部下之欢心，但此老少佐，则顽固不如此做。他会亲自挥动圆锹，抬着木材，从早至晚攀爬急峻山坡，巡视赞赏汗流浃背之部下。每日工作完毕，官兵均入兵舍以后，始进自己房间。此乃是他之一日行事。对此队长之勤奋热心，其部下均甚感动，以后均默然加强阵地，毫无怨言。他对部下从无装腔作势之训示，亦无叱咤鼓励之嘉言，仅领先示范，以身作则而已。”[27]

在拉孟守备队“玉碎”多年之后，侥幸活下来的日军老兵曾感慨命运选择的吊诡——在阵地完工不久，这些人本来曾有机会离开松山，但他们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据第 113 联队补充兵品野实记述：“当时，师团方面已经有在一定期间更换拉孟守备队的计划，但是被松井联队长拒绝了，主要理由是官兵们不愿离开自己付出艰苦努力，流尽汗水才构筑起来的阵地……”野炮大队方面，一度也有换防一说，原野炮第 2 大队长齐藤卓尔少佐曾有记述：当时，野炮第 56 联队长山崎周一郎大佐考虑到金光大队因长时间施工作业，已经疲劳过度，且出现生病减员的情况，想让第 2 大队前去替换，并征求了齐藤的意见。齐藤当时回复：“非常愿意替换。”但不料金光大队长却拒绝了，说道：“我们不能把自己建造的阵地交给别人。”据说金光平素谦和恭敬，此时态度却很有些“一根筋”，因为这可能代表着绝大多数部下官兵的心愿，他们也不想离开自己辛辛苦苦建造起来的阵地。

“当时，连将军和参谋们都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下层士兵对防御抱有绝对的信心，也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太田毅对此解释说。[28]

---

〔27〕［日］辻政信：《滇西之决斗——十五对一》，转引自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录第四，第 108 页。

〔28〕［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25 页。

4

在怒江西岸，日军对防守做了长期打算。给拉孟（松山）、腾越（腾冲）、龙陵、芒市、平戛（今平达）、畹町等据点守备队下达的一致命令是："敌人进攻时，要努力歼灭；我方进攻时，要以此为根据地。"对处于特别战略要地的拉孟守备队，则另有补充要求："守备队既要应付地面上具有强大优势的敌人，还要对付天上空军的攻击，以少数兵力固守拉孟阵地，使师团主力便于作战。"[29]

基于此，在加强阵地建设的同时，滇西日军的军事训练一刻也没有放松。

据日军战史：为应对中国远征军的反攻，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着力指导各部队提高战术技能，在1943年缅甸方面军第15军举行的师团对抗射击竞赛会上获得了优胜。其后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和战术技能训练，并严格执行联队长、大队长、中队长等的集中教育及指挥机关、通信机关的综合训练。1944年初，还进行了两次联队对抗刺杀术、射击比赛。就在中国远征军发动反攻前夕，日军第56师团还根据作战部署，对全师团进行了历时约一个月的战前强化训练。[30]

而据守松山的拉孟守备队，在上述训练中一直堪称"标兵"。在缅甸方面军举行的一年一度军事大比武中，拉孟守备队一直保持步枪射击、火炮射击和负重攀登三项第一的优异成绩。据称，"在长达两年的怒江防务中，该守备队勤于演练，常备不懈，作战大小11次，毙敌90余名，多次受到上级嘉奖"[31]。

在此期间，日军曾多次打算转守为攻，渡过怒江进攻保山。1943年9月，第56师团司令部作战参谋永井清雄中佐拟定了一个作战方案，拟令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担任指挥官，以该联队本部及所属两个步兵大队，配属野炮一个大队，在平戛附近选择了两个渡

---

〔29〕许敏：《大战场　小细节》，第128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60—161页。

〔3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0页。

〔31〕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78页。

河点，进行渡河进攻试验。但该计划未得到上峰批准。直到 1944 年 3 月，缅甸方面军第 15 军对印度方向实施了英帕尔作战，日军才被迫放弃了进攻保山的企图。[32]

当时，处于日本侵略战线最远端的拉孟守备队成了日本后方关注的热点，大人物和记者团一个跟着一个前来慰问。1942 年秋，日军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来松山视察，天空布满日军飞机，让日军士兵大开眼界。12 月，由日本广播协会（NHK）组织的慰问团远涉重洋来到松山，成员包括作曲家古关裕而、当红歌星奥山彩子、浪花调[33]表演师梅中轩鹰童和一大群年轻的女舞蹈演员。为了抢着给女演员开车献殷勤，一个日军曹长还在镇安街附近的公路转弯处翻车送了命。师团卫生队的军医中尉高桥实带着卫生兵赶来救护，由于摸到了这些从日本国内来的女人的肌肤，心里充满着亢奋和欣慰。年底，日本女剧作家水木洋子为创作“国策电影”来到松山采风，松山日军中会写诗的第 4 中队长辻义夫还亲自陪同她走到了惠通桥边。1943 年元旦期间，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战地记者野村正男也来到松山采访，用大倍率摄影镜头拍摄了许多日军驻扎松山的照片，还将军医丸山丰、第 4 中队长辻义夫、联队长松井秀治写的诗带回日本发表。

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在为这支日本侵略军中的“精锐”和“前锋”打气鼓劲。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些高规格慰问和演出，既是对这些所谓“九州男儿”的颂歌，也是唱给他们的最后的挽歌。

5

战后，日军在战争中开设随军“慰安所”的行径，为全世界所谴责。这一制度的始作俑者是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他当时负责在上海开设了最早的日

---

〔3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61 页。据钟彬《龙陵会战史》：1943 年 11 月 17 日，日军数百人曾于打黑渡强渡，占领怒江东岸营盘街渡口据点。第 3 页。

〔33〕日本的一种大众曲艺，日文写作浪花节，应译作浪花调。江户时代末期产生于大阪，由琴师弹三味线伴奏，表演师以通俗易懂的曲调说唱故事。

军慰安所，后来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后被广泛推广。据他辩解，这一做法的初衷是为减少日军在占领区的强奸暴行。[34]但事实证明，强征占领区妇女充当日军泄欲工具的做法，使得这一丑恶行径合法化，不但没有减少日军的强奸犯罪，反倒纵容整个日本军队都成了无耻的野兽。

日军实施慰安所制度，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秘密推行的。使这一罪恶为全世界公众所了解的，正是松山战役结束时美军照相兵拍摄的俘获日军慰安妇的新闻照片。当时，在松山共有14名慰安妇幸存，朝鲜籍妇女为9人。其中一名叫朴永心（花名“若春”）的朝鲜慰安妇，2000年曾在关于“二战”日本政府性奴隶制度罪行的国际民间法庭活动中作证，并于2003年重访松山在日军慰安所现场指证。

1942年5月，日军进占松山不久，就曾从缅甸悄悄带来了三四个女人，骗她们说是当女招待，只是斟斟酒。其中3个女人有丈夫，也被抓来烧洗澡水，发放慰安所门票（慰安券）。日军强迫这几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眼皮下，满足日军士兵的性欲。

当时日军拉孟守备队达3000多人，三四名慰安妇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于是，1942年阴历八月，日军乘腊勐街赶集的机会，包围了街子，把十几个当地年轻妇女捉住进行强奸，然后拉进了慰安所成为慰安妇。在这些妇女中，有一个叫李连春的姑娘，是当地白泥塘村人，直到2003年还健在。她后来成为滇西地区敢于公开站出来控诉日军罪行的唯一的慰安妇。1998年，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等人曾对时年76岁的李连春进行详细的采访。

李连春说：“我原名叫李要弟，属鼠。我原是龙陵县腊勐乡白泥塘下海箩寨人。1942年，我18岁，日军占领了我的家乡。8月的一天，我背了一篮蔬菜到腊勐街去卖，想买点盐巴回家。刚到街上，就看见来了一队日军在街头街尾架起了机枪，将街子包围了。日本人见人就打，男人被拉去当夫，女人就在街上光天化日下被糟蹋了。

[34]《冈村宁次回忆录》，第351页。据冈村宁次供述，自己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但这是效仿当地海军（即驻上海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的做法。

最后，我和十几个年轻妇女，统统被拉到了日本兵营（松山大垭口）前面的慰安所里。

“初到慰安所，换上了日本和服，天天挨打挨骂，强迫我们进行‘实习’练习，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别人的面，让日本人肆意地侮辱。日本人什么不要脸的事情都干得出来，禽兽不如。我们被折磨得死去活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有一次，一名日军士兵在奸污她时，疯狂地咬伤了她的左肩，当时鲜血直流，后来化脓，留下了伤疤。

在拉孟日军慰安所一年半的时间里，性格倔强的李连春天天都在盘算着逃跑的事。后来在一个下大雨的晚上，在一个放牛人的帮助下，她化装逃出了松山，时间在中国远征军反攻之前半年。[35]

1942 年 8 月 20 日，日军正式征集的第一批朝鲜慰安妇到达仰光，共 703 人（另有约 100 名日本女人）。她们每 20～30 人被分为一组，分属不同的慰安所，以抽签的方式被派往日军在滇缅各驻屯地。[36]

在 1942 年 6 月日军第 113 联队占领松山之初，“（第 56）师团在电话中询问这里是否需要慰安妇”，但是被联队本部参谋吉原正俊独断地拒绝，说他们“绝不接受任何妇女”。第 113 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最初也很支持这一原则，他对士兵训示“生命中最大的慰安来自于完成职责的喜悦”。起初，军官们决定“不在拉孟建造，是因为拉孟是前线，如果盟军使用远程炮，这些慰安所就会在射程范围之内。而且，据点之外也没有其他地方建造慰安所”。因此，士兵可以被允许去步兵第 1 大队驻扎的松山西南十多公里的镇安街，那里有一个“从本地居民中招募的慰安所”，是由军队的“合作者”建造的。[37]

据松井秀治 1957 年在其回忆录《波乱回顾》中记述：

---

〔35〕陈祖樑：《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第 105—107 页。

〔36〕［日］浅野丰美：《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据《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 363 页。

〔37〕同上书，第 367 页。

……接下来必须要为年轻士兵们考虑的，就是慰安所的事情。上司们在昭和十七年（1942 年）末就说过这样的话，将士们也提出过请求。拉孟是最前沿的阵地，若敌人有远程大炮的话，此地将处于射程范围之内，且阵地以外没有开设所需的场地，所以最初决定不进行设置，允许士兵们到镇安街去。但这样不方便，故未能持续很长时间。其间，士兵们强烈请求在拉孟开设慰安所。选址，只能无奈地在纪念碑高地和里山之间开辟出一方平地来，由各部队分派作业人员承担建筑两栋房子的任务。作业人员非常努力，仅用数日时间就建成了拉孟最气派的建筑。〔38〕

品野实在著述中披露，日军在松山大垭口建起的慰安所为两栋房子，位置在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与里山阵地之间的空地上。〔39〕据资料，日军在构筑松山阵地时，战壕的支柱和顶棚所用的松木是从滚龙坡阵地南面的山谷里运上山来的，建慰安所时应该是同样的情况。建成的慰安所是两座狭长平房，里面以苇席（草帘）分成十几个小隔间，每间内放置一张矮床。

1942 年底，10 个朝鲜姑娘被送至松山，这是松山日军慰安所的第一批正式慰安妇。日军骗她们是招来为军官俱乐部服务和以组织敢死队“保卫她们的国家”，到了运输船上才宣布是来当妓女。尽管这些十八九岁的姑娘流尽了眼泪，还是被强迫着进行“实习”训练后送来了。1943 年初，又送来 5 名被称为“邦人”的日本妇女和 5 名朝鲜姑娘。最早送来的 10 个朝鲜姑娘，则换去了龙陵，与由第 3 大队驻扎地的慰安妇互换，换来的仍是 10 个朝鲜姑娘，共计 20 名。〔40〕换到龙陵的朝鲜慰安妇中，有一名叫雅子的在松山生了小孩，由第 2 大队军医大尉池田文字雄接生，并取名“猛雄”。〔41〕当时，松山、龙陵、腾冲各处的慰安妇经常互相交换，据说是应日本士兵要

〔38〕［日］松井秀治：《波乱回顾》，第 184 页。

〔3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49 页。

〔40〕同上。

〔41〕［日］浅野丰美：《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据《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 368 页。

求，为了让他们保持“新鲜感”。

据西野瑠美子叙述：

一名叫尹庆爱的朝鲜慰安妇被带到这里时被威胁道：“从现在开始，你们必须服从命令，不要忘了这是为天皇陛下尽忠，谁不听话，就砍她的头！”

而另一名朝鲜慰安妇朴永心被带到腊勐是在中国军队反攻开始之前。到了休息日，戴着表示休假之红臂章的日本兵，是以一个慰安妇要应付二三十名士兵的比例前来的。朴永心被逼做“慰安妇”已有4年，但她怎么也不能接受自己所处的境遇，羞辱和自暴自弃混杂的感情在她内心深处碰撞。想活下去，除了放弃感情，忍受此种生活，别无选择。[42]

松山大漆树村老人杨家运，当年曾被日军抓去干杂活。2001年8月25日，曾向历史学者、慰安妇问题专家苏智良教授介绍说：

……腊勐乡这边的慰安所，有两座房子。大约有四五十个妇女，周围有篱笆围着，屋子用石灰刷过，是这一带比较好的房子。每个妇女一小间，一张铺，一间房屋不超过6平方米；床是木床，由日本士兵做的，战后我们进去瞧过。我看过3个朝鲜慰安妇去赶街，穿着短袖短裙，很漂亮的。慰安所里也有满洲姑娘。她们都穿着高跟鞋，一般年龄十七八岁到二十五六岁之间。这里3个月换“警兵”，即抓当地民夫，用来站岗放哨做杂活。[43]

在日本方面的官私记录中，通常会提到从朝鲜和日本本土招募的慰安妇，却很少提及松山日军在当地强迫本地妇女充当慰安妇的事实。这里面隐藏着一个共同的秘密。

---

〔42〕［日］西野瑠美子：《战场の慰安妇——拉孟全灭战を生き延びた朴永心の轨迹》，第136页。

〔43〕苏智良、陈丽菲：《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第162页。

关于强迫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在当时的日本军方曾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最初，日军认为这会刺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耻辱感，激发反抗意识，对实施占领统治不利，因此尽量以征召朝鲜、中国台湾这些殖民地及本国慰安妇为主；后来，这个看法开始改变。

在战后远东审判案的备用资料中，日军情报部的大雄一男给日本陆军本部的一份文件中称："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能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唤起士兵的必胜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够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心。我们必须更多秘密地征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安慰我们的军人，树立他们必胜的信心。"这份文件产生于日本战力走向低落之际，基于这一理念，日本军部曾下达命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44〕

1997年4月13日，龙陵县白塔村一位叫张芹□（略去一字）的老人向保山史志学者陈祖樑证实：1942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7月6日）被日军第113联队抓入龙陵慰安所，那一天日军同时轮奸了她和她的母亲，并残忍地杀死了她的奶奶和其他两个被轮奸的姑娘。她说，她在慰安所里曾听到日军行政班要龙陵县"维持会"交600个"花姑娘"慰劳皇军。当时"维持会"的人找日军台湾籍翻译白炳璜求情，说："龙陵县小，没有这么多姑娘，而且老百姓都躲到山里去了，到哪里找人啊。"但不久，慰安所里就陆续抓来了十几个姑娘，听口音都是本地人。〔45〕

但是，与日本、朝鲜籍"慰安妇"不同的是，被强抓来沦为军妓的当地妇女经常处于流动状态。当日军厌倦后，就剃光她们的头发后释放，表示以后不必再来。这些妇女顶着这个耻辱的标记回家

---

〔44〕《远东审判案备用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转引自《历史学研究》杂志2006年第8期文章《日本军人的性心理与慰安妇制度》，高凡夫、赵德芹撰文。

〔45〕陈祖樑：《血雾迷茫——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第97页。[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98页。

后，村里的人甚至家里人都看不起她们，她们从此无脸见人。当地人称之她们给日本人“出公差”了。这种深深的耻辱感让这些女性终生保持沉默。松山战后曾参与战场调查工作的老兵洪绍坤，曾告诫经常去松山做战地田野调查的戈叔亚：到松山，凡是看到60岁左右的老妇，千万不要向她们询问战争的事。“就是问，她们也不会说的。”[46]

当时，日军拉孟慰安所有两个男主管，有领班、门卫、役夫。慰安妇分为两组。平日日军凭票进入慰安所。由师团卫生队的高桥实军医中尉、户田寅彦军医少尉，联队部的清岛长典军医少尉和卫生兵鸟饲久一等兵、吉武伊三郎伍长等人每星期来给慰安妇检查身体，为患有淋病的慰安妇注射针剂治疗，让日军放心奸淫。[47]

6

为加强守备，在加强松山工事构筑外，日军拉孟守备队对松山周围几十个村寨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淫掠，实施“三光”政策，制造“无人示范区”。

战后当地政府组织调查，松山附近17个自然村（寨）遭受日军战争罪行受害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松山地区遭受日军拉孟守备队残害情况统计[48]

寨　名	沦陷前		被烧房屋数	被杀人数	霍乱或病饿死	死绝户	光复后		后继感染人数	备　注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松　山	53	222	53	8	99	12	41	115	30	未死人的22户有7户迁居外地
永　兴	24	140	22	5	30	1	23	105	22	

〔46〕戈叔亚凤凰网博客文章《初上松山记录》：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4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49页。

〔48〕方早昌、陈济泽、杨仕贵：《日寇在松山人民中犯下的滔天罪行》，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123页。

续表

寨　名	沦陷前		被烧房屋数	被杀人数	霍乱或病饿死	死绝户	光复后		后继感染人数	备　注
	户数	人数					户数	人数		
马鹿塘	11	55	11	3	30	1	10	22	10	包括岔河村在内
三眼井	20	115	20		27		20	88	18	在外定居 3 户
大垭口	6	31	6		16	1	5	15		
小水沟	9	50	9	1	31	1	7	18	4	2 户合 1 户
梅子村	8	44	8	1	22	2	6	21	5	
黄家水井	19	86	19	2	42	3	16	42	8	1 户迁居外地
杉木寨	12	68	12	2	17	2	10	49	8	3 户定居外地
马黄水	13	88	13		48	2	11	40	8	
大　寨	10	77	10	1	36		10	40	6	包括大漆树村在内
大水平	15	102		1	56	1	14	45	12	
小松林	6	42			20		6	22	4	
油竹林	6	36			25	3	3	11		
麦　地	7	42		1	25		7	16		
核桃箐	30	125	10	5	70	3	27	50		
混　当	45	300	1	10	212	13	30	78	7	外迁 2 户
合　计	294	1623	194	40	806	45	246	777	142	

在盘踞松山期间，日军还多次用捕获的中国远征军战俘进行活体解剖。这种由日本关东军第 731 部队首创的灭绝人性的战争犯罪行为，当时已经推广到了各个战场。

日军内部对此事的描述是："用必须处死的敌军侦探来做实验，给他们注射麻醉药，一边观察身体反应，一边活生生地一点一点地进行解剖，直到人死为止。这是从肉体上改变死刑执行的另一种方法。"当时日军规定，如果要进行这种解剖，须得到上级军医官员下

发的免罪证明才能进行，如果随便进行解剖，将会受到惩处。事实上，没有多少部队在乎这条规定。[49]这一行为，与关东军731部队利用战俘和劳工进行活体解剖性质完全一样。

在拉孟守备队，第113联队及所属步兵大队均配有军医，第56师团卫生队还有派驻军医。他们对用战俘进行活体解剖的态度积极，认为用活体解剖战俘来提高医术，是只有在战争中才能得到的难得机会。他们常以“这些战俘不是军医捕获的”、“反正他们总要被处死”等理由安慰自己。但他们心里明白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于是对此往往讳莫如深，不愿意让外人知道内情。[50]据品野实在著述中披露，平素有“清高人士”之称的第1大队军医大尉深川朔次，在得到解剖一名战俘的许可证后，在值班士兵的面前也露出了极为难堪的神色。

在拉孟守备队的军医实施活体解剖时，一些士兵经常躲在手术室外，透过玻璃窗往里偷看。在他们看来，这些军医的行为显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胆量。

当时，日军把在战斗中能消灭敌兵、能拿战俘做实验，称作“练胆量”。认为能割下俘虏的头，用刺刀捅入俘虏的身体，这是颇有经验的人才能做到的。有些人还把俘虏盘做一团，塞进汽车轮胎里，再浇上汽油，点燃，从松山上推到怒江里。在进行攻击时，有的士兵还干出了许多恶作剧，如在砍掉头的中国士兵尸体上安上牛头取乐。藤原拓士写的《外科医战场物语——南方战线秘录》[51]一书中，就记述了在缅甸北部拿中国士兵做解剖实验的事。有的日军还把战俘的肝脏挖出来烧焦。在腾冲，两个被俘的远征军侦察员，被日军军医中尉落合芳雄在体内输入马血做实验。

有个军医见习士官还疯狂地用战俘做实验后再杀掉，简直是虐待狂。他们把俘虏从高处推下坑底，再从上面砸下大石头，观察研究怎样造成致命伤，以此获得实战中进行紧急救护的资料。这既说

---

〔4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38页。

〔50〕同上。

〔51〕日本永田书房，昭和五十二年（1977年）出版。

明这些人已经完全发疯，但也是在具体执行第 15 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的指示——他曾训导部属军官："一个勇敢的士兵是在异常情况下培养出来的。"[52]

当时透过玻璃窗看到解剖实验的日军士兵，都为那种疯狂的做法感到既惊讶又兴奋。事实上，日本军医给战俘注射麻药被看成是浪费，所以大多不给注射。品野实在著述中披露，一次士兵们在窗外听到悲惨的号叫声，透过玻璃窗看到，中国军队的一个侦察班长，结实的身体被剥光了衣服，手脚被紧紧地捆在手术台上。冰冷的手术刀闪着寒光，"嘶"的一声从胸口切开。那个中国士兵悲惨地喊叫着、呻吟着。刀切开身体某一部位后，日军军医都要久久观察那个部位的反应。胃被切开之后，那个中国士兵还活着。看到这些场面的日本士兵，个个目瞪口呆，事后谁都不敢吭声。至于是谁的命令，谁执的刀，多年以后谁也不愿意向任何人提起。[53]

在这些杀人狂中，军医大尉陶山磐之助、深川朔次、松崎干雄，军医中尉内崛研一、芳川博保、落合芳雄，军医见习士官小柳力等人，最后几乎全部丧命于滇西。唯有军医中尉高桥实于 1943 年底被调往密支那，在密支那守备队覆灭之际他逃跑了，然而最终也未能善终。当他抄近路逃至八莫北面 60 公里处的一个村庄，正在专心做饭时，遭到中国驻印军的袭击。除 3 名卫生兵逃脱，高桥实和其他十多个卫生兵，全部被击毙。这是 1944 年 8 月 14 日的事。逃出来的 3 个人，一个是曹长田中末喜，因大腿被打成重伤，不能行走，用手枪自杀了；还有一个是班长室园隆喜，到达八莫后感染疟疾，没多久也死了；唯一活下来回到日本的只有一个叫田中政美的士兵。[54]

---

〔5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39 页。
〔53〕同上书，第 140 页。
〔54〕同上。

第3章　大反攻：西线有战事

（参阅附图8、附图20）

4月17日：

即日，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1]这个类似商业合同的文件，是为了让中华民国政府履行自己的承诺：反攻滇西。

今天看来，保卫自己的国家还要与别人签一纸协议来约束自己践诺，对当时领导全国抗战的民国政府来说，多少有些讽刺意味。然而，对于在美英等西方国家参战前曾独立抗击日军侵略长达4年的中国来说，这个协议确实事出有因。

如前所述，自从日军夺占松山控制滇西后，滇缅公路被切断，失去外援的中国抗战形势面临严重困境，而东南亚局势也日趋恶化。1942年7月19日，为打通中印陆路交通线，确保中国战场，获得向日本本土发动最后攻势所需要的基地，史迪威中将拟订了一个代号“安纳吉姆”（Anakim）的反攻缅甸作战计划，中国统帅部补充后予以批准。这个计划包括两个规模宏大的战略构想：即在印度组建X军（中国驻印军），以收复缅北为目的；在云南组建Y军（中国远征军），以收复滇西为目的，战争同时进行，最终X军与Y军会师，

---

〔1〕据《云南档案》2006年第2期简讯《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档案史料中心成立》，郭进忠撰文。央视10套《探索·发现》栏目制作的《60年前的滇西反攻战》亦提及这一协议。这一协议应是中国在美国逼迫下于4月14日终于签署怒江攻势命令后，就作战支援、补给等对美方提出的额外要求（此前双方曾达成协议，反攻怒江作战时由中方自行负责补给），可能因“讨价还价”的色彩，为一般撰述所忽略。

贯通中印公路，全面收复缅甸。同时，计划还规定英军应承担登陆仰光、从南路夹击日军的配合作战任务。[2] 在史迪威的努力下，X 军与 Y 军相继组建整训，着手反攻准备。美国罗斯福总统和史迪威将军，希望 Y 军——中国远征军尽早渡过怒江，向怒江以西日军发起反攻，尽快打通滇缅公路。但直到 1944 年初，蒋介石一直按兵不动。

作为中国战区统帅的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自有他的考虑。自美英参战后，蒋介石的基本思想是：中国已经抗击日本 7 年多，消耗了大量国力，现在该保存一些实力，以便战后对付共产党；消耗性的硬仗，还是由你们美英为主来打。具体到反攻滇缅战事，还有几个现实因素影响到其决心：首先是英国方面对反攻缅甸计划态度冷淡，一直不履行其应承担的配合作战义务，最后干脆拒绝了从海路进攻的任务。缅甸当时是英国的殖民地，如果不是被日军占领，英国人是绝对不允许中国染指其势力范围的；即便不得已请中国参战，也是处处提防、百般掣肘。“英国人只关心保卫他们具有战略意义的殖民地，而且只是在战局符合帝国更大的战略需要时才这样做。他们不屑于同中国人合作，认为中国是长期威胁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国家。”[3]1942 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之所以惨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英国方面延误战机和战场不合作所致。有此前车之鉴，蒋介石对英国缺乏信任感，怕重蹈覆辙。其次，美国承诺的“租借法案”[4] 物资每月 1 万吨空运量（并提供 500 架战斗机）一直不能按计划兑现，[5] 缺乏物

---

〔2〕中、美、英三国商讨反攻缅甸计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在史迪威提出“安纳吉姆”计划后，中国军令部在补充基础上亦提出了反攻计划，最初的方案是从南北路全面反攻收复缅甸。此后由于英国对承担在缅南实行两栖登陆作战出尔反尔，中方为此顾虑重重，讨价还价，反攻计划一再变化，久拖不决。先由 1943 年 1 月 14 日至 24 日卡萨布兰卡会议重新提出，再到 5 月 12 日至 5 月 25 日“三叉戟”会议以“茶碟”计划替代此计划，而后经 8 月 14 日至 24 日魁北克会议、11 月 22 日至 26 日开罗会议上变更为“泰山”行动，经历了一个不断“缩水”的过程。

〔3〕[美]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 105 页。

〔4〕美国参战后，是同盟国中唯一有能力提供军事装备、物资的国家，但受援的英、苏和中国都拿不出钱来，所以美国国会专门通过一项租借法案（Unleasement Act），规定援助各国的军需用品一律按租借物资处理，不交现款，留待战后结算。

〔5〕1943 年 2 月 5 日，美国派出军事代表团来到重庆，向蒋介石通报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美英领导人确定的反攻缅甸方案，请求蒋的支持。蒋介石在同意后，提出三项新要求，包括给陈纳德独立的指挥权，每月经驼峰航线空运中国 1 万吨补给物资，至 11 月底前给中国 500 架作战飞机。此要求得到了罗斯福总统同意，但因各种原因直到 1944 年初也未能完全兑现。

资保障的“穷仗”，蒋介石实在是打怕了。再次，蒋介石已经通过陈纳德第 14 航空队的空中侦察等渠道获得了一些情报，日军可能正酝酿在华中、华南发起大规模进攻，[6]此刻全力投入反攻滇缅有可能陷入两面作战的境地。基于以上考虑，他一再犹豫，把反攻的时间拖了又拖。

作为对美方的妥协手段，蒋介石给了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行动的全权。因反攻计划迟迟无法落实而焦躁的史迪威，早在 1943 年 10 月，即指挥中国驻印军新编第 1 军（军长郑洞国，辖孙立人新 38 师及廖耀湘新 22 师）及美军 5307 支队（一支由 3000 名曾参加太平洋诸岛作战的美国志愿军人组成的暂编团，美方战史以其任务代号称之“加拉哈特”，因指挥官为梅利尔准将亦称“梅利尔劫掠者”）率先从印度雷多向缅北新平洋日军发起反攻，经过一连串艰苦卓绝的丛林作战，已打通胡康河谷并继续挺进孟拱河谷。

1944 年 3 月 8 日，为牵制中国驻印军的反攻，日本缅甸方面军第 15 军以 3 个师团的重兵突然发动对印度东部英帕尔（Imphal，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首府）、科希马（Kohima）地区的进攻，企图进袭印度的加尔各答，控制恒河河口。[7]英军措手不及，几天内被日军击溃了 3 个师。他们调集部队增援的同时，紧急向中国方面求援，要求中国远征军迅速反攻滇西日军以减轻印缅战场压力。英军知道，若让日军得手，就有可能进而破坏美国在印度阿萨姆邦的空军基地，彻底切断对中国的空中运输线（即“驼峰航线”）。

---

〔6〕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969 页。

〔7〕1943 年 9 月，日本缅甸方面军第 15 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见史迪威指挥的中国驻印军向缅北新平洋一带窥视，而英军的“长程突击队”（Long Range Penetration，LRP）又活动于更的宛河上游，预见盟军进入缅北是早晚的事，于是构想出这一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即，以较少的兵力对付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以第 18 师团抵挡驻印军，以第 56 师团应对远征军），而以第 15 军主力三个师团进犯印度。牟田口认为，印度重镇英帕尔只有一条公路北通后方，倘若在科希马附近将其截断，则英帕尔不难攻下。从此印度东部可无抵抗，日军可以进出于阿萨姆邦的盟军基地，此处为空运中国的基地，也是驻印军与远征军的补给中心，如果在此获胜不仅可望将缅北盟军囊括，而且可以激励印度人对英国殖民者的独立运动。这个方案呈送东京后，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绫部橘树前往印缅交界处实地调查，认为地形条件不许可（所采取的进军路线为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史迪威及孙立人入印路线）。但牟田口动用关系使凡反对此计划者皆调离职位。1944 年 1 月，其计划经过东条英机核准，东条也认为此战役之结果可以改变整个战争的态势。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 280 页。

面对日军在印度的进攻，史迪威决心尽快解决缅北的日军第18师团，故在孟拱河谷激战正酣之际，又指挥“中美混合突击支队”（由从中国驻印军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与美军5307支队混编而成）于5月17日飞兵奇袭缅北重镇密支那。倘若攻占了密支那，不但能有效牵制日军对印度的攻势，且能将输油管延伸到该地，从印度飞来的美军飞机就可以避开危险的“驼峰航线”，大大降低飞行高度，在密支那临时着陆加油后再飞昆明。在中印公路尚未贯通的情况下，这将大大增加战争物资的空运量。

史迪威将军要攻取密支那，也必须得到中国远征军从滇西方向的配合，不然滇西日军就有可能被抽调到缅北增援——事实上，正因为5月11日中国远征军的反攻牵制，致使5月18日日军第56师团将第33军的命令打了折扣，仅让第56步兵团长（日军三单位制师团设置的指挥三个步兵联队的指挥官，军衔为少将，相当于旅团长级）水上源藏[8]少将（陆士23期）带了象征性的少量兵力前往增援，[9]从而使驻印军取得密支那作战的胜利，绝望的水上源藏在伊洛瓦底江边农他隆东岸一棵树下用手枪自杀。

这位水上少将，1940年9月至1943年6月期间，曾在日本“华北方面军”第110师团第110联队任联队长。“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中国人几乎妇孺皆知。1941年9月，他指挥第110联队包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杨成武部，在狼牙山指挥战斗、最后逼迫葛振林等5人跳崖的正是此人。[10]此外，1942年日军对冀中地区的“五一大扫荡”，他所指挥的第110联队也是主力。[11]到了异国仍死在中国人手里，也算是一份“天缘”。

在密支那，史迪威将军一面指挥部队进攻，一面迭次电告美国

---

〔8〕水上源藏少将于1943年5月16日接替坂口静夫少将就任第56步兵团长。

〔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60页。按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命令，水上源藏应率步兵一个大队及炮兵一个中队增援密支那，但第56师团参谋长川道富士雄迫于中国远征军进攻压力，仅以步兵一个小队、炮兵一个中队拨归水上少将指挥。

〔10〕张子申、薛春德：《历史的耻辱柱——侵华日军将帅毙命全纪录》，第425页。水上源藏于1940年9月24日任华北方面军第110师团第110联队长，1943年6月10日调任缅甸方面军第56步兵团长。

〔11〕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第140—171页。

陆军部，请求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施加“来自最高一级的压力”，敦促他马上行动。[12]

1944年4月4日，蒋介石终于接到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电报：

……当激战正在缅甸西部和阿拉干（Arakan，又译作若开）海岸进行时，萨尔温江（Salween River，怒江流入缅甸后的名称，西方人亦泛指整个怒江）前线仍然平静无事，结果是日军得以转用第56师团的一部分来对付史迪威向孟拱河谷的突击和远程突击部队在缅甸北部的威胁。我不能想象阁下获得美国装备的Y部队不能前进以抗击实力业已空虚的日军第56师团。在我看来，阁下的第71军不再延迟立即进军占领腾冲、龙陵地区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萨尔温江上与阁下对峙的只是一个装备不全的师团。阁下向西进军必然成功。

为了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曾经装备并训练阁下的Y部队。如果不使用他们于共同事业，我们空运装备并提供教练人员的最勤奋和最广泛的努力就没有道理了。我希望阁下立刻采取行动。[13]

面对这个“最后通牒”，蒋介石有些坐不住了。他听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潜台词：如果再不出动中国远征军，美国将停止运送援华物资。而史迪威曾给他的暗示是，美国有可能提供援助给愿意反攻的共产党八路军，[14]甚至龙云的云南地方武装。

---

〔1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史迪威资料》，第89页。

〔13〕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968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援引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第80页。

〔14〕据资料，1942年6月周恩来在重庆曾向史迪威的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委员长同意，他会率领共产党部队发起进攻夺回缅甸，而且，“我会服从史迪威将军的指挥！”［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326页。而黄仁宇披露，在第一次缅甸战役时，史迪威即有指挥中共军队之幻想，曾将此意告他的情报课长罗伯兹。1943年史迪威曾向蒋介石提出三件条陈（9月5日、6日及16日），拟定分三批整训90个国军师的建军计划；其中9月6日之条陈，主张将所有晋绥部队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一并出击，牵制日军以减轻平汉路及陇海路之压力。蒋介石只对建军计划批复，对出动共产党部队不予作答。蒋在9月21日的日记中云：“史迪威此次来书，虽署中国战区参谋长职衔，但书中多不逊之言，令人隐痛。”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46页。

这时候，有一位中国女性也跟美国人一样为此焦急郁闷，这就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远征军美军顾问团团长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准将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披露：1944 年春，中国的军事首脑，包括蒋介石、何应钦以及其他军委会委员们，因不了解出动滇西远征军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好处，仍然拒绝出击，坐看有利时机流逝，急坏了了解军事、比她的“老学究”丈夫（Confucian Minded Husband）高明多了的夫人。她答应尽力帮助史迪威，在一次会议上她甚至说如果她给她的“达令”生一个儿子，她就能对他无限地施以压力。她说很多事并非自己不做，而是自己只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在天天开中美联席会议期间，宋美龄习惯于不分昼夜，随时把多恩将军叫到官邸去。有一次凌晨两点钟又叫他去，多恩以为要告诉他蒋准备出动的好消息，但宋美龄只是诉苦……宋平常不喝酒，有一次她竟然在一小时内喝了 5 大份。〔15〕

4 月 10 日，罗斯福总统的威胁有了实质性的动作。这天，史迪威的参谋长托马斯·赫恩（Thomas Hearn）少将奉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的指示，告知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建议将分配给中国远征军 4 个月份的空运分配额 734 吨物资，转移给美军第 14 航空队。”再者，已拟定计划“取消向中国航空公司贷给飞机的合同，并收回迄今已交付的飞机”。〔16〕

这无疑是美国对不肯开始反攻的蒋介石采取的最强硬的手段。

此时，除了中缅印战场的角逐外，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各个战区都捷报频传：在太平洋上，美军成功遏制住了日军的进攻，正逐步实施“越岛作战”战略；在苏联，红军已对德军全面反攻，正大踏步向前推进；在欧洲，意大利已经投降，盟军正计划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英国、美国、加拿大三国已经秘密制订了诺曼底登陆计划——“霸王行动”。原来的登陆计划也是准备在 1944 年 5 月 11 日实施，只是后来由于海上气候过于恶劣，才推迟到了那个著名的“D

---

〔15〕转引自萧慧麟编著《萧毅肃将军轶事》，第 77 页。

〔16〕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援引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第 80 页。

日”——6月6日。

世界形势一片大好，中国的情况却格外沉闷。在各战场遭受挫折的日本军队，此时急需打一场胜仗来挽回低迷的士气，他们选中了蒋介石这个“软柿子”。4月17日夜，以畑俊六大将任司令官（9月后冈村宁次大将继任）的“中国派遣军”，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失利，并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首先从河南发动了在东线战场的进攻，作战企图为打通整个中国大陆南北交通线。为此，日本动员了“中国派遣军”、朝鲜军和关东军可调用的约51万兵力[17]，发动了这次被认为是“赌上国家命运”的大战。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面对日军的进攻，河南战场上蒋鼎文、汤恩伯指挥的第一战区国军几乎一触即溃，至4、5月间，日军已夺取了郑州、许昌，打通了平汉线……这个时候，作为“大国统帅”的蒋介石面临着抗战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

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发生的战事蒋介石并不太关心，他所知道的是，接下来的东线战事必须硬着头皮继续打，而反攻滇西也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否则不但要失去美国的一切援助，还将面临着政治上的孤立，甚至被西方大国抛弃。倘若因此让共产党这个心腹大患借机成了气候，那将是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以来最彻底的失败。

无奈之下，蒋介石立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于4月14日[18]签署了怒江攻势命令，19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向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下达了作战指导方案。

于是，1944年的中国分别被敌军日本人和盟军美国人“逼”着投入了两线作战，有了东线（豫湘桂）、西线（滇西）两个战场。东线战场一如既往地在抵抗和败退中“消耗”日军，而西线战场则是持续的进攻作战，虽说艰苦卓绝，但毕竟开了收复失地之先河。战后，国民党方面对此的评价是“得不偿失”——西线之胜利，远远

---

〔17〕共计15个师团、外加5个独立旅团。此外，还动用军马10万匹、火炮1500门、自动车辆15000辆，为侵华战争以来使用的最大兵力，比日俄战争动用兵力多一倍，火炮多600门。据吴相湘：《三生有幸》，第316页。

〔1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0页。另，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第380页）记签署命令日期为4月13日。

不抵东线之损失；而这都是美国人——尤其是史迪威及其支持者马歇尔——造的孽。[19]但是，这个说法显然建立在一个未经历史检验的假设性前提之上：西线不打，东线就一定能胜吗？毕竟，西线之胜是“现货”，而东线的前途是“期货”。

如今，当那段历史渐行渐远，我们审视的目光里是否会有一些新的判断呢？我们知道，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战场并没有一个可以称得上是“转折点”的战役。如果硬要找个“近似的转折点”的话，1944年的滇西反攻作战比较具备类似的特征——特别是在松山战役中，中国军队攻克了抗日战场上日军最为坚固的防御体系，并且第一次创造了歼灭成建制日军联队的纪录。自攻克松山后，国军在西线的攻击作战连连得手；3个月后，东线国军也开始转入反攻，从此以后，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战场上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直到战败投降，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大规模的进攻行动。[20]

笔者以为，假如没有西线战场的胜利，抗战后期的中国正面战场不但乏善可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预言的全民族抗战的“战略反攻阶段”也将无从算起。若是如此，当日本投降的那一刻，我们是否有底气认为，在这场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仅靠“苦撑”和把日军“拖住”就赢得了战胜国地位？

---

〔19〕参见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十一篇第二章“北缅战役得不偿失”，第965—970页；及1944年10月9日蒋介石坚持要求罗斯福召回史迪威的备忘录，内有“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因攻下密支那而失却东战场，此种责任，史迪威无可逃避”等语，同书第1049—1050页。另，黄仁宇认为，1944年中国战场东线、西线战场之成败，象征着蒋介石与史迪威两个人事业上的一种竞赛。后来，因为国军在西线战场胜利，东线战场挫败，史迪威即以此为根据，通过马歇尔及罗斯福向蒋介石索要对中国全部陆军的指挥权。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77页。

〔20〕驻印军与远征军于1945年1月在缅北芒友会师。5月及6月上旬，驻印军全部调回东线参战。1945年3月起，日军先后发动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军于3月下旬从豫中会战之后的防线以东向西发动攻击，其前锋一直冲到西峡口。在湖北，3月日军向西北部发动攻击，于4月8日攻陷老河口；之后国军随即发动反攻，收复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在湖南，日军以空军基地芷江为目标，于4月向湖南西部发动攻击，但是在国军抵抗之下，日军遭受大挫败而退回原阵地。之后国军乘胜追击，向广西地区发动反攻，于5月27日收复南宁，6月29日收复柳州，7月27日收复桂林，8月收复广西全境。此外，国军原本预定于8月收复广州以打通中国对外运输要道，因为日本投降而未实行。

超链接 1：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

卫立煌，字俊如，又名辉珊。1897 年生人，安徽合肥人氏，陆军二级上将。卫立煌出身贫寒农家，1912 年考入湖南陆军学兵营入伍，1917 年进入孙中山大元帅府任警卫。以行伍出身，凭着战场业绩递升为国民党军赫赫有名的“五虎上将”[21]之一。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这位既无后台又非黄埔嫡系出身的卫立煌，是一个不多见的“异数”，被人称做“嫡系中的杂牌”，意思是部队属中央军系统，但个人出身没有什么优势。长期以来，他形成一套独特的生存法则和处世方式：中央实力派排挤他，他便靠拢共产党；蒋介石起用他，他又卖力为蒋介石打仗。

1937 年 10 月，卫立煌奉蒋介石命令率基本部队第 14 集团军驰援山西。“山西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道卫立煌能打仗，将指挥作战的全权交给了他，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与担负后方袭扰任务的八路军紧密配合，打了一个可圈可点的大会战，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留下深刻印象。此期间，周恩来多次与其会面谈话，对其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38 年 2 月，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在山西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与共产党团结抗战甚力。1938 年 4 月，卫立煌还借到洛阳开会之际绕道访问了延安，受到高规格的隆重欢迎，毛泽东对其坚持抗战给予褒奖，朱德称其为“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到西安后，卫立煌马上予以回报，让手下拨付八路军子弹 100 万发，手榴弹 25 万颗，牛肉罐头 180 箱。当时有人顾虑数目太大，不敢下发。卫立煌就亲自做工作，使这批物资迅速送到八路军办事处。[22]

1939 年 1 月，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9 月兼任河南省主席，次年又兼任冀察战区总司令。虽然权高位重，仍与共产党、

---

〔21〕所谓国民党军“五虎上将”，不过是坊间流传的一种说法。据说名列“五虎”者有两套名单，其一为何应钦、刘峙、钱大钧、顾祝同、蒋鼎文；其二为刘峙、顾祝同、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列入资格，主要以北伐和军阀混战时期的战绩而定。实际上，像刘峙这样的“虎将”，在抗战爆发后已经沦为以溃败逃跑著称“长腿将军”了。

〔22〕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 68—69 页。

八路军私下往来密切。1941 年 3 月，蒋介石电召卫立煌赴重庆述职，对其与八路军的关系加以责备，并声言要撤他河南省主席之职。卫立煌对此不服，一气之下，请长假到峨眉山休息。不久，日军大举进攻中条山，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自指挥的战事一败涂地，令蒋介石大为愤怒。

1942 年 1 月，因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第二科科长兼洛阳办事处主任袁晓轩叛变，军统掌握了卫立煌通共的证据〔23〕，蒋介石以追究中条山战役失利之责为由免去其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这一虚职。在此期间，我组成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准备入缅作战。蒋原有意改任卫立煌为司令长官，也因此事影响而未能到任。后由第 5 军军长杜聿明代理，罗卓英继任（杜聿明兼任副司令长官）；而卫立煌则被幽禁在四川成都。

中国远征军重组之初，史迪威接受了宋子文的举荐，向蒋介石建议调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来任司令长官。〔24〕史迪威在合作中感到，陈诚是个强有力的"能人"，对其评价颇高。此前担负怒江防务之责的第 11 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心里很抵触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认为给自己这个集团军充实装备、加强炮兵和空军支援就能担负反攻任务，上面再设一层指挥机构就意味着自己的地位被降格，因此对陈诚把手从湖北伸到云南，在两地兼任战区司令的揽权之举一肚子意见。他说，陈诚是看中了美国提供的武器装备，想借以充实个人的"土木系"〔25〕实力，并非真心想来打仗。〔26〕到任不久，陈诚就对远征军中蒋介石嫡系军官的指挥颇感掣肘。以宋希濂为代表的这些"黄马褂"（黄埔系）和"陆帽子"（陆大毕业者），

---

〔23〕据载，由于袁 ×× 叛变告密，戴笠去洛阳，得悉卫立煌涉嫌亲共，蒋介石就罢免了卫立煌的任职。见赵荣生：《回忆卫立煌先生》，第 282 页。卫道然在其《卫立煌将军》、方知今在其《爱国将领卫立煌》中，点明袁 ×× 即为袁晓轩。袁晓轩为八路军总部参谋处第二课（情报）课长，八路军总部先派其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处担任联络参谋，后任洛阳八路军办事处主任，与卫立煌联系做其工作。

〔24〕[美] 约瑟夫 · 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 161 页。

〔25〕陈诚的基本部队为其曾任师长的第 11 师和以其为基础而发展的第 18 军，十一为"土"，十八为"木"，故有此称呼。郭汝瑰在其回忆录中认为，"土"是指陆军大学第 11 期毕业军官。

〔26〕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55 页。

都是蒋介石的亲信，遇事常越级上奏，颇难指挥。不久，陈诚因在人事迁调问题处理不周，被担负滇越边境对日防务的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顶撞，气得胃病发作吐了血，仅就任半年就辞职回重庆养病了。[27]但另有一些研究者认为，陈诚去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跟史迪威关系过于密切，使蒋介石产生了戒心。[28]

另据载，在获知史迪威的用人意向时，何应钦不愿看到后起的实力派陈诚再占风光，曾提议由重庆卫戍司令刘峙担任，立刻遭到蒋介石斥责："什么！你拿严峻的局势开玩笑？在这种危机里你还要玩政治？"刘峙在国军高级将领中素有"长腿将军"之喻，抗战初期京汉线的全线溃败而逃就是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的此君之杰作；而其能一贯保持位高权重的秘诀，蒋介石私下里曾对宋美龄讲过——"刘峙指挥作战是不行，但是哪个人有刘峙那样绝对服从？"[29]可见，蒋介石是深知临阵点将与平日封官的区别的，遗憾的是，往常晃动在眼前的一片金星关键时刻掰着手指也数不出闪光的几个。作为"中国通"的史迪威看得出来，远征军司令长官这副担子，是"必须取得成功的职务"，否则这个人此前建立的地位也就完了。[30]思量再三，蒋介石仍决心重新起用卫立煌。主要考虑是：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责任重大，一时难觅合适人选；加之监视卫立煌已近两年，对其言行表现尚感满意，且在滇缅与美英军合作，不会再接触共产党，似可放心。

---

〔27〕陈诚因胃病吐血而离职，一般史料上均如此记载。台湾2005年出版的《陈诚回忆录》中，陈本人亦回忆了自己于1943年10月12日因"劳累"引发胃病而吐血的过程（第164页）。遭关麟征顶撞一事，在诸多撰述亦有提及，但是否因此而吐血离职，就是一种坊间传说了。第52军25师副师长段培德《关麟征与陈诚对第五十四军之争》记：成立远征军后，陈诚为笼络关麟征，将其基本部队第54军列入关麟征第9集团军指挥下，并由关麟征物色了军长人选。但实际上陈在该军根基很深，仍拥有实际控制权。关麟征为真正控制该军，旋即开始调整该军师长一级将领，引起第54军原将领不满。陈诚感到关麟征枭雄难制，要关换回已任命的军、师长，引起关的愤怒顶撞。据云，陈诚当面告诫关麟征："你不要争！"关麟征对曰："我争的是礼义廉耻！"据《关麟征将军》，第134页。

〔28〕宁志一在《文史精华》杂志2005年第6期撰文《陈诚缘何失去远征军司令一职》，持此观点。

〔2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八年抗战敌我优劣之检讨"一章，第840页。

〔30〕［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171页。

卫立煌对这些情形心知肚明，但能为国家民族出力、建立个人功业，自是卫立煌这样的传统军人无法拒绝的。重获机会后的卫立煌，为避嫌而屏退原先追随其左右的旧幕僚，轻车简从走马赴任。

卫立煌为将的性格特点是大义为重、敢作敢为、宽宏大量、不拘小节。宣誓就任后，他首先和蒋介石一贯监视着的云南省地方实力派龙云（云南省主席兼军委会昆明行营主任）接洽，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取得龙的谅解，应允对其远征军大力支援接济。来到保山，他又注意密切联系地方各族群众，并逐一拜访了怒江东岸的少数民族土司。当地共有土司十几个，在当地势力很大，握有地方上人力、物力和经济力量，对粮食供应的潜力尤其大，对搜集情报也有优势。到任后，卫立煌首先将司令长官部从楚雄前推到保山，并在离怒江前线70公里的马王屯设立前敌指挥部。同时命令下属各集团军及各军、师、团将司令部逐次前移，这样既能减少通讯联络上的障碍，又便于各级指挥官深入前线和指挥作战。卫立煌召集远征军师以上军官谈话，了解其思想状况。多年以来，卫立煌一直善于团结不同系统的队伍，对下谦和宽厚，气量大，能容人。针对军中的派系矛盾问题，再三向将领们申明：他是来打仗的，以消灭日寇为当前唯一的中心工作，没有任何扩张个人势力的意图，绝不介入不利于抗日的任何活动；希望将领们以救国大义为重，捐弃私见，积极投入反攻作战准备。

反攻前，卫立煌所有的工作都围绕三件大事进行：一是继续与龙云保持友谊，用实际行动说明他是来打日寇的，使十几万军队有足够的粮秣；二是密切与史迪威为代表的美军顾问组的关系，取得美国充足武器弹药的供应和其他军事配合；三是整训部队，激励士气。

在作战准备上，卫立煌最为重视军事训练和教育。

远征军的教育是以昆明的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含大理分团——宋希濂于1942年在大理开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和印度蓝姆伽（Ramgarh）训练营的教育为基础的，前者训练远征军部队副团长以下营、连、排级干部，后者训练军、师、团级干部，训练时间均为6周。训练方法根据各个兵种的情况决定。占主要地

位的步兵训练班，都是以两周为兵器训练，使受训者熟悉兵器性能并善于分解结合；以两周为射击训练，使受训者能使用各种兵器发扬火力；以两周为战术训练，通过沙盘教育和班排连的实兵指挥，使受训者了解如何确实掌握运用兵力以发挥战斗效能。这两个训练机构的教官多数是美国军官。在此基础上，卫立煌又进一步令各军部都成立了干训团，师部成立军士训练班，毕业后为师团营连的教育骨干，使远征军部队的教育训练实现一元化。卫立煌时常亲自到各部队视察教育进度，去时轻车简从，常常亲自驾车，将所属6个军的16个师都巡视过一遍。

蒋介石让卫立煌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史迪威表示赞同。这个自20世纪30年代即在北京担任美国武官的“中国通”，对中国所有的重要将领的历史事迹都作了记录并作评语，卫立煌指挥的忻口会战曾给当时担任美军观察员的他留下深刻印象。史迪威当时对卫立煌的作战能力很是信任，将其称为“常胜将军”，美国的《时代》杂志1937年11月即以这一评价对卫立煌做了隆重报道。〔31〕而在美军顾问组长多恩准将眼里，卫立煌这位中国“虎将”是老牌资历、新派作风，的确显示出不同于其他中国军队高级将领的素质，令他深感敬佩。如，卫立煌到任后不久就请求美军提供由航拍照片拼接的怒江战区地图，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地图测绘精度很差，用于指挥作战经常出问题。多恩没想到一个行伍出身的中国高级将领居然了解这一先进技术，马上欣然允诺，两个星期后就把拍摄制作好的地图送了过来。另外，卫立煌还请美军顾问在远征军行动路线上严格把握制空权，要特别注意日军“零式”战斗机的攻击，并提出了在我反攻后美军出动轰炸机群对缅甸境内的日军机场进行预先破坏的设想，这些都令多恩深感惊奇，答应遵办。〔32〕

这一切，都奠定了滇西反攻胜利的基础。

---

〔31〕在同期《时代》周刊报道中称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为“红色拿破仑”。见李辉：《封面中国》，第194页。

〔32〕有关卫立煌到任后的作战准备活动，笔者综合参考了王理寰：《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载《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卫道然：《卫立煌将军》、方知今：《爱国将领卫立煌》等资料撰写。

4 月 20 日：

新组建的中国远征军班底为：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参谋长萧毅肃；辖第 11 集团军和第 20 集团军及直属部队共 16 个师。

所辖作战部队及指挥系统如下：

表 2 滇西反攻作战中国远征军指挥系统

（1944 年 5 月至 1944 年 11 月）

番　号	部队长	番　号	部队长	番　号	部队长
第 11 集团军	总司令：宋希濂 副总司令：黄　杰	第 2 军	王凌云	第 9 师	张金廷
				新 33 师	杨宝毅
				第 76 师	夏德贵
				辎重团	段寿清
		第 6 军	黄　杰（前） 史宏烈（后）	新 39 师	洪　行
				预 2 师	顾葆裕
				辎重团	郑殿起
				通信营	冯行之
				战防炮营	梁中介
		第 71 军	钟　彬	新 28 师	刘又军
				第 87 师	张绍勋
				第 88 师	胡家骥
				辎重兵团	吴　炁
		第 200 师（后期配属）	高吉人		
		第 5 军炮兵营			
第 20 集团军	总司令：霍揆彰 副总司令：方　天	第 53 军	周福成（前） 赵镇藩（后）	第 116 师	赵镇藩（前） 刘润川（后）
				第 130 师	张玉廷（前） 王理寰（后）
				辎重兵团	刘宝华
		第 54 军	方　天（兼） 阙汉骞（后）	第 36 师（配属）	李志鹏
				第 198 师	叶佩高

续表

番号	部队长	番号	部队长	番号	部队长
第20集团军	总司令：霍揆彰 副总司令：方天	高炮第49团第3营			
		重迫击炮第2团（欠一营）	廖治民		
		第6军山炮营（配属）			
		辎重兵团	雷震波		
		工兵第2团	林松		
		独立工兵第24营			
		通信部队			
第8军	军长：何绍周 副军长：李弥	荣誉第1师	汪波		
		第82师	王伯勋		
		第103师	熊绶春		
炮兵指挥部	邵百昌	重炮第10团	胡克先		
		重炮第7团	郑琦		
工兵指挥部	傅克军				
直属通信营					
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	总指挥：郑坡				

附记：

1. 第20集团军第54军原有第14师（师长龙天武）、第50师（师长潘裕昆），于4月下旬被转调中国驻印军支援密支那作战[33]；
2. 滇西反攻作战初期远征军共12个师，后来作为总预备队的第8军及第200师投入战场，参战兵力达到16个师。据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记述，当时远征军各部队编制定员均严重不足，开始反攻时实际总兵力只有7.2万人左右（仅为定员的60%）。

---

〔33〕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军向胡康河谷推进中，深恐印度列多根据地危险，于3月29日飞重庆谒蒋介石，请准调在昆明附近、已编入远征军序列的第14师及第50师空运缅甸，编入驻印军战斗序列。后来英帕尔战局稳定，史迪威将两师各一部编入围攻密支那的机动部队。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81页。

在军令部下达的作战指导方案中，确定作战方针“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经多方调查研究，卫立煌拟定了反攻作战部署：

以右翼第20集团军为攻击集团，自双虹桥以北各渡口渡过怒江，攻击高黎贡一线敌军，以收复腾冲为目标（因腾冲到密支那有捷径可达，攻取腾冲后可在最短时间内与驻印军会师）；

以左翼的第11集团军为防守集团，除以新编28师掩护自双虹桥渡江的第20集团军部队外，以第2军第76师、新编第33师，第6军新编第39师，第71军第88师各编组一个加强团，从打黑渡和七道河渡口渡江[34]，作为助攻，以牵制芒市、龙陵方面的敌军，不让其向腾冲方向增援。

此外，作战计划还对分别担任攻击军和防守军的两个集团军的各军、师乃至团、营在攻击准备和攻击实施阶段的任务进行了具体部署。

卫立煌于4月中旬给各部队下达了上述命令，要求于4月底以前完成攻击准备。[35]

此后，卫立煌在保山与在重庆的蒋介石接通电话。卫立煌的长子卫道然在其所著《卫立煌将军》一书中，记其通话内容大致如下：

卫：请委员长批准我们的作战方案。到目前为止，没有出现新情况。

蒋：你有把握吗？我最不放心的是，缅甸日军会在我们攻击时，来增援滇西日军。你有把握对付这样的情况吗？

卫：我有把握。

蒋：若是渡不过去，日军可能随我军反渡过来，那结果可就严重了。这个你考虑过没有？

卫：渡江前一小时，若是发现日军有准备，我就立刻停止。渡江后，日军如有什么行动，我的方案中已有对付办法，并且，我留

---

〔34〕第6军新39师系从惠仁桥附近周家渡、瓦打渡渡江；新33师加强团系从滚弄附近渡江。
〔35〕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九册《西南及滇缅作战》，第338页。

有第11集团军，以备万一。

蒋：这个责任很大，盟军态度明确吗？

卫：明确。

蒋：还有一点，日军的增援部队也可能从密支那开来。

卫：我们按计划行动起来，他们根本来不了。渡江成功，我有把握，请委员长批准。

蒋：你再考虑一下，我明天中午给你打电话。这是要极其慎重的。

第二天中午12时，卫正要去吃饭，电话铃响了。

蒋：俊如吗？你考虑得如何了？

卫：报告委员长，未出现新情况，不用考虑了，我有把握，会成功的。

蒋：我把这件重大的事交给你了，责任都在你一人身上。你的要求我批准了。[36]

5月5日：

1944年5月5日，保山北郊板桥镇马王屯。

这里原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仓库群，有三十多座仓库分散在后山密林中。1942年5月4日日军轰炸保山后，仓库物资被运走，只剩下空屋。[37]最初71军进驻保山，曾在此处开设教育总队，轮训该军军官和军士。卫立煌决定将司令长官部从楚雄西迁保山后，71军即让出此地供长官部使用。司令长官卫立煌、副司令长官黄琪翔各住一间库房；其他的三十多间库房，则由长官部各处室、警卫部队及多恩准将所率的美军“Y部队参谋团”分住。[38]

大战在即，为贯彻统帅部旨意并研究反攻作战一切细部问题，使各部队及各兵种能确实协同，并督促各部积极完成作战部署，卫

---

〔36〕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22页。

〔37〕据载，此仓库主要储存自缅甸入境的军械物资。1942年5月8日夜转运军火时曾发生事故引起爆炸，民众误以为日军突破71军怒江防线迫近保山，遂全城惊慌出逃。万寿康：《惠通桥激战前后见闻记》，据《滇缅抗战亲历记》，第349页。

〔38〕张子文：《三年滇西抗战的回顾》，据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第186页。

立煌于即日在长官部附近的光尊寺[39]召开战前会议。[40]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及所属各军、师长全部到会，美军顾问团团长多恩准将亦受邀出席。

据载，卫立煌首先听取各部队作战准备情况报告，而后就此次出击滇西之重要性及渡河攻击间应注意之事项予以恳切指示。[41]

至此，滇西大反攻正式开始。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中国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消耗战略，在各战场上基本采取守势作战。这次，将是抗战7年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对占领我国土的日军主动发起大规模进攻。

这天，在滇西日军第56师团驻地芒市也有一个会议在进行。

主持会议的是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参谋长川道富士雄[42]大佐（陆士36期），参加会议的是师团所辖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第146联队长今冈宗四郎大佐（陆士28期）、第148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陆士26期）及师团直属的炮兵、工兵等特种兵联队长，及以上各部大队长以上指挥官。

日军与中国远征军在同一天召开最高级军事会议，这是一个奇异而有原因的巧合。

此前，第56师团一直在竭尽全力判断中国远征军的主攻方向。要在广阔地域迎击兵力绝对优势之敌，必须准确判断敌之主攻方向。鉴于两年来中国远征军对怒江西岸的渗透作战，主要是向腾冲北方进行，根据其他地势全貌来判断，日军认为中国远征军主力的反攻可能先由腾北地区开始，但一直无法确证。

---

〔39〕光尊寺位于板桥镇东北部，距镇政府所在地3公里的世科村后山。系唐天宝二年（公元743年）南诏王皮逻阁为祭祀佛教尊神而建，清朝后期至民国初期又多次重建，今仍保存。

〔40〕台湾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474页。

〔41〕《陆军第54军滇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二，第16页。

〔42〕第56师团前任参谋长黑川邦辅于1943年6月28日因飞机失事坠毙缅甸，7月1日由川道富士雄接任。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蒋介石将反攻的时间拖延到了雨季来临的5月中旬，这一不合军事常理之举，居然让日军产生了极度惶惑。据日军战史："关于反攻时机，当初根据雨季（5月中下旬开始）判断，可能在进入雨季前一个月，即4月中旬左右开始。进入4月中旬中国军队仍无反攻征兆，师团甚为焦虑。"[43]

不幸的是，一件突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使得日军在最后一刻掌握了远征军动态，从而"判明中国远征军将于5月10日开始反攻，主攻方向大致在惠人桥以北、六库渡以南地区"。

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迅即于今日召集各团队长到芒市的师团司令部，指示反击方针，并进行图上作业指导，决定首先在怒江西岸地区，继而转移到险峻的高黎贡山区，再在龙川江河谷对突入到高黎贡西侧的远征军实行各个击破。[44]此时，距离中国远征军开始攻势虽仅有6天时间，但根据前期的判断，日军已事先将师团主力配置在了惠人桥以北；这次只做了小范围的调整，就完成了针对性的防御反击部署。

那个不幸的"意外事件"，后面详述。

5月9日：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下令攻击集团军及防守集团军的各加强团于5月11日渡河攻击，开始时间或拂晓，或白昼，或夜晚，由各部队依当面情况自行决定。[45]

5月11日：

5月中旬，正值雨季到来直前。

一进雨季，怒江随即展宽，喜马拉雅山的洪水汇成怒涛，浊水注满大峡谷，卷动着旋涡直泻而下。因而此时开始大战役，的确困难重重，怒江即是一大障碍。怒江流经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穿

---

〔4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1页。

〔44〕同上。

〔45〕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294页。

开一条深谷，江面虽不甚宽（旱季约80米，雨季300～400米），但水深流急，水温极低。两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撤退过怒江时，主动破坏了江上原有的两座桥（惠通桥和惠人桥），两年来怒江上再无桥梁。

即日，期待已久的滇西大反攻，终于开始了。

这是个月明之夜。深邃的怒江峡谷景色在月光映照下颇为壮观，伫立东岸高台，极目俯视如银练般深水静流的怒江，令人不由为之惊叹。

中国远征军各反攻部队自东岸悄然下至深谷，来到奔腾的怒江边。午夜时分，在17名美国工兵顾问监导下，远征军工兵部队利用帆布船、竹筏和小木船，在怒江旋滚的激流中，开始渡送首批渡江部队。

超链接2：远征军是如何渡越怒江的[46]

在当时的西方媒体上，报道中国开始反攻的标志性新闻图片，就是远征军士兵操桨划着船筏渡越怒江的情景。中国远征军欲实施反攻，第一要务是渡越怒江。

早在1943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就命令成立怒江渡河工程处。以长官部交通指挥官傅克军兼任处长，以独立工兵第35营为基干（该营营长为张祖武，就是在1942年5月4日及时爆破惠通桥的执行者），并雇用民工，专门负责制造渡河器材。到1944年5月反攻前，共造好可运载一个排兵力的大木船和运载一个班兵力的竹筏子数百只。这些船筏都停放在怒江东岸各个渡口，每一船筏都雇有当地船工操桨。

1944年3月间，经过中美双方协调，决定改用美制渡河器材来装备远征军工兵部队。为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特地在下关成立了一个工兵集训处，以傅克军兼任处长，下辖教育、器材、总务3个组。当时，教育组副组长为从陆军工兵学校调来的渡河教官周鑫。

---

〔46〕此节内容，笔者系综合参考周鑫：《强渡怒江的工程准备和取胜经过》（载《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方知今：《爱国将领卫立煌》；陈真主编，田川、林平芳编著：《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中“血色腾冲”一章有关董嗣勋的访谈内容等资料而撰写。

据他回忆，这个处成立后，并没有真正负起训练工兵的责任，只是负责调集部队、协调车辆运送到怒江各渡口，由美军负责进行训练。

美军的渡河器材是一种前圆后方的帆布船，由十二个隔离的尼龙气囊组成（部分气囊破损船仍能保持一定浮力，不致沉没），用一块长方形的胶合板作底部垫板，一次能运载武装战士一个班（12人）。其优点是轻便，使用时吹起胀开即可，不用时放气后折叠装入背囊，一个人可以背走。但是垫板太大，长1.8米，宽1.1米，不能折叠，搬运时要占用一个人。共发给393个帆布船，每个军工兵营平均27个，可一次渡越9个排的兵力。

训练是在大理漾濞江进行的，由美军顾问亲自训练战士充气（可以用气筒打气，也可以用嘴吹气）、折装、搬运、上下船、漕行等基本动作，最后演习一次夜间渡河。每次集训一个工兵营，每期训练一周。第一批集训的是陆军工兵第2团第一营。训练后，这些帆布船即装备受训部队。一共训练了3批，后来因为反攻期近，到4月底集训就停止了。

参加强渡怒江工程准备和渡河保障的工兵部队，计有陆军工兵第2团的3个营及独立工兵第35营，共4个营。另外，还有各军师建制的工兵营、连，总兵力约4000人左右。1944年5月11日，在由栗柴坝至双虹桥间50公里渡河地段上，共集中了帆布船393艘。上述工兵部队保障了第20集团军几个师同时渡过怒江，从战术、技术上看，准备工作是很成功的。

渡江进展颇为顺利，其间仅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溺死。

在中、日、美三方的战史资料中，均记录有如此一笔。有幸的是，笔者无意间查到了这位不幸士兵的名字。据当时输送部队从勐古渡口过江的第54军第198师工兵连连长董嗣勋回忆：这位士兵叫邓超，湖南人，为第592团的中士班长，为人很好。当时，工兵连预先在江面上拉了一道钢索，邓超所在的班乘船从钢索上游渡江时，在水流推动下船行线渐渐下斜，将要从钢索下穿过，邓超担心钢索垂得太低会刮到士兵们，起身推扶了一把，不料因江水流速太快，小船疾速掠过了钢缆，邓超抓着钢索吊在了江面上。此后，排长派了几个空船想把他救下来，但船一到那里就一闪而过，最终邓超因

体力不支坠落江面，转瞬之间被急流卷走。已92岁高龄的原工兵连连长董嗣勋说，这个反攻中牺牲的第一位士兵是因为自己没尽到责任，这一辈子经常会想起他。

每一个牺牲都有其价值，他的名字同样应该留存史册。

关于渡江，还有一个小插曲：

1944年5月，渡河工程准备完毕，部队集结怒江沿岸各渡河点。正待命出发之际，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54军军长方天向交通指挥部提出了一个要求：部队渡到对岸后，如遭日军顽强抵抗，不能占领登陆场地时，工兵部队要负责把部队再接运回来。

当时，周鑫和傅克军一听这个要求，头就大了。因为在50多公里宽的江面上，几个师同时渡河，如果部队在西岸站不住退回来，兵败如山倒，哪里有纪律可言。若溃兵争先恐后地拥向最近的渡河点，在那样的混乱状态下，工兵部队哪能保证完成接运返回的任务！

周鑫脑海里的第一反应就是：部分高级将领的"恐日症"又犯了。两年来为反攻虽然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但到这一刻，一些高级将领对敌情的了解并不十分清楚，对反攻还缺乏信心和决心。所以还没有渡过江去，就先考虑怎样回来的问题了。而且，方天此时将皮球踢到工兵部队，显而易见有预先推卸责任的意味。

由于事关重大，周鑫向傅克军建议这样回应：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必须保证由哪个渡河点过去的部队，仍然由哪个渡河点回来，否则工兵部队不能负责。

方天一听就火了，在他影响下不少军师长都嚷嚷起来，一时上层军心浮动。据说争议很快就传到卫立煌那里，他为此愤怒地申斥各将领："昔日韩信背水而战、项羽破釜沉舟，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因为有此决心，才战必胜、攻必克，无坚不摧。我中国远征军养精蓄锐两年之久，又有先进装备，却在未进攻之前就想着后退的问题！这样，我们的反攻安得成功？"随即传达命令："大军渡江后，所有渡江船只返回东岸集结待命。我将邀请江东父老在岸旁守候，倒要看看有哪一位能厚着脸皮泅渡回来！"

众将领均深为震动。

董嗣勋说："当时战略计划就没有退回来的考虑。我们当兵的

人，作为攻击部队来讲，只有往前走，后退只有死路一条。与其跳到江里死，不如往前冲着死！”

1944年5月11日夜，中国远征军攻击集团军各部如期渡江。兵法云，对渡河之敌最佳的进攻时机为“半渡而击之”。但日军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设防，而把拦击阵地设在高黎贡山顶的各隘口，这对远征军来说无疑是幸事。后来很多媒体报道远征军是“强渡怒江”，实际上应该称为“巧渡怒江”。当远征军攻击部队士兵踏上怒江西岸，没有听到枪声时，不禁长吁了一口气。

当他们抬起头来时，黑黢黢高不见顶的高黎贡山，猛然压迫在他们眼前。他们尚不知，日军第56师团的精锐部队正以邀击态势，扼守着各个山头和隘口。

按远征军制定的作战方案，为顾虑我一旦攻击开始，缅甸方面之日军沿滇缅公路增援向我怒江正面攻击，则可能危及我军侧背，甚至动摇我后方，因此决定以第20集团军为攻击集团军，攻取腾冲；而以第11集团军为防守集团军，沿江固守，仅以4个加强团的少量兵力渡江攻击，以策应第20集团军的作战。

形象地说，这个攻势计划只是一记“右勾拳”，显然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方案，建立在对于敌情的不了解上。其实，以日军当时的兵力，是很难从容应付缅北、滇西的两面作战的。

据日军战史载：第56师团的防卫地区北起片马以南的中缅边境，南至滚弄以南，约达400公里的广阔正面。而且其中预料远征军有9条作战路线，即：指向腾冲方向的4条，指向龙陵和芒市地区的4条，由滚弄（kunlong）通向新维（hsenwi）[47]的1条。“倘若中国军队在上述作战路线分别部署一两个师，然后全线同时发起攻势，是师团最大的痛苦。”[48]因此，“对师团来说，唯有以一部预先扼守前述各作战路线，阻滞敌军进入，并在此期间指导主力进行果断的内

〔47〕新维又译作兴威，历史上曾系我木邦（孟邦）土司治所。滚弄、木邦均在缅甸境内，今属掸邦管辖。

〔4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8页。

线作战，将敌各个击破，此外别无良策”[49]。

现在可以假设，如果中国远征军的两个集团军从两个方向同时出击，来个“双风贯耳”，必能使日军各据点兵力困在原地无法机动，难以实行内线作战的企图，则后来高黎贡山不会那样难打，龙陵也不会久战不下；松山、腾冲之敌守备兵力固然有所增强，仍不过是深井中的困兽而已。

更进一步假设，在采取全线进攻时，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之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迫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入缅支援驻印军的作战……

上述方案，是战史专家郭汝瑰[50]、黄玉章在其所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中，总结滇西反攻作战时的假设，无论如何有道理，也是“事后诸葛亮”了。[51]遗憾的是，战争过程中从来没有“假设”二字。

据日军战史，日军第56师团当时判断，中国远征军作战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首先在北方占领腾越及其以北一带地区，在南方首先攻占平戛周围，然后由南北向滇缅公路包围夹击日军。在此之前，一直在滇缅公路沿线地区避免力攻而待机的兵团，此时与上述南北两兵团的夹击相呼应，由拉孟方面西攻。由南、北、东三方面钳击日军，将其逐出滇西地区。[52]

应该说，在“知己知彼”这一点上，日军确实是完全做到了。对中国远征军来说，这是个极大的不幸。

---

〔4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8页。

〔50〕曾任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第22兵团司令。

〔51〕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309页。实际上，从后来战事演进过程来看，如果不预先拿下松山这根卡在滇缅公路上的“毒刺”，不能充分解决粮弹补给问题，即便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日军从腾冲、芒市以更多兵力回援，远征军也不可能迅速拿下龙陵。

〔5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5页。

5 月 12 日：

凌晨，日军第 113 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指挥所属部队（联队直属部队及步兵第 1 大队），在怒江坝红木树附近反击渡江的中国远征军。在惠人桥附近周家渡、老鸦渡、瓦打渡等渡口渡江的新 39 师加强团（以第 115 团及第 116 团一部编组，师长洪行指挥）遭到打击，不得不退向江岸。

随着中国远征军第 20 集团军开始反攻，松井秀治遵照第 56 师团命令，在松山、镇安街、龙陵等守备地区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率联队直属部队 200 多人于 5 月 8 日向腾冲方向增援。走时，命令野炮第 3 大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接任拉孟守备队长，并将第 113 联队军旗留在了松山。[53]

此后，松井秀治转战红木树、江苴、龙陵、平戛等地，再未能回到松山。松井因此捡了一条命，金光惠次郎成了他的替死鬼。

5 月 14 日：

日军松山阵地。

为了应对中国远征军即将发起的攻击，近几天日军在松山各阵地前沿地带埋设地雷。14 日这天，几匹炮车驮马意外地走过了大垭口慰安所前的雷区，却没有爆炸。日军深感意外，几名兵器管理士兵怀疑地雷有问题，于是找来军锹要挖开看看，谁知此时地雷突然爆炸了，当场炸死了芳贺正行和浅田一市两人，另一名受了重伤的坂本赖田在卫生队呻吟了一个星期后，也呜呼哀哉。[54]

对兵力不足的拉孟守备队来说，这种大战前的非战斗减员，让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大为恼火。自从松井秀治把这个摊子交给了他，金光惠次郎整天眉头紧锁着待在松山主峰音部山阵地野炮大队本部的战壕内沉思，士兵们很少能看到他的身影。

作为一个候补少尉出身的超龄炮兵军官，要担负原由步兵军官

---

〔5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55 页。[日] 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71 页。

〔54〕[日] 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38 页。

指挥的阵地守备任务，他多少有些缺乏信心。松井秀治深知这一点，所以6月3日让其副官真锅邦人大尉带着三百多伤兵从红木树返回松山，协助金光惠次郎指挥。金光听取了真锅对兵力部署的意见，将守备兵力进行了调整，具体安排如下表所示：

表3　日军拉孟守备队序列及阵地兵力配置情况[55]

（1944年6月）

守备队长：陆军少佐金光惠次郎

步兵第113联队：

联队本部一部（副官真锅邦人大尉以下）

第1大队本部残留者（副官木原唯雄中尉以下）

第1中队（小队长岩永嵩中尉以下1个小队）

第2中队（小队长井上要次郎中尉以下1个小队）

第3中队（小队长大谷政雄少尉以下1个小队）

第4中队（中队长辻义夫大尉以下，欠1个小队）

第5中队（小队长桑野理壮少尉以下1个小队）

第6中队（中队长高桥九州男大尉以下，欠2个小队）

第9中队（小队长尾笼健儿少尉以下1个小队）

第1机枪中队（小队长荒牧芳光少尉以下1个小队）

第2机枪中队（中队长只松茂大尉以下，欠1个小队）

联队炮中队（小队长福田国夫中尉以下，欠2个分队）

速射炮中队（中队长古手川舆一大尉以下，欠1个小队）

野炮兵第56联队：

第3大队本部（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以下）

第7中队（中队长泽内秀夫中尉以下3个小队）

第8中队（小队长公门司少尉等3个小队）

第9中队（中队长毛利昌弥大尉以下2个小队）

〔55〕日军拉孟守备队的兵力及部署情况，著者系综合参考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日］森山康平编著：《太平洋战争写真史——フ－コソ・云南の战い》等日方资料基础上撰述制表。

辎重兵第56联队第1中队（小队长田中省五郎少尉以下1个小队）

第56师团卫生队担架第3中队（中队长野津高雄中尉以下约100名）

第56师团防疫给水部一部（军医冈崎正尚大尉以下约40名）

第56师团通信中队（本田治雄准尉以下40名）

野战医院患者（约300名）

番　号	日军阵地	核心区地名	中方编号	指挥官	兵　力
步2中队 野炮8中队	本道	滚龙坡	甲、乙、丙、丁、戊	小队长井上中尉 小队长公门少尉	140（十榴2）
步6中队	上松林	阴登山		中队长高桥大尉	60（联队炮1）
联队炮中队	小股	海螺地洼	癸 （松林堡垒）	福田中尉	40（联队炮2）
	侧方	胡家小坡	庚		30
速射炮中队	崖	松树坡		村上准尉	20
步6中队	平山			大野曹长	30
步4中队	松山	黄土坡	1号、2号	小队长松尾中尉	50
野炮7中队	横股	马鹿塘		中队长泽内中尉 小队长木下中尉	80（十榴2）
野炮9中队	西山	垭人场坪子	3号	中队长毛利大尉	70（十榴3）
步4中队	关山	大松山	子	中队长辻大尉	70
野炮第3大队本部 （暨守备队本部）	音部山	官坟坡 狗头坡顶 马鞍山坡	丑、寅、卯	金光惠次郎少佐 真锅大尉	170人
机枪2中队 辎重兵第1中队	里山	小松山	辰、巳、午、未	中队长只松大尉 小队长田中少尉	150（十榴1、速射2）
担架3中队	卫生队	黄家水井		中队长 野津中尉等	400（含伤病员300）
第113联队本部 军旗护卫小队	预备队			联队 副官真锅大尉 安河内少尉	30

续表

番　号	日军阵地	核心区地名	中方编号	指挥官	兵　力
	腊勐街	老街子			
	原口山	竹子坡	5600 高地		
合计					约 1340
附注： 1. 以阵地性质而论，为前进阵地 6 个（上松林、小股、侧方、崖、平山、本道），主阵地 7 个（松山、横股、西山、音部山、关山、里山、卫生队）； 2. 300 余名伤员除重伤者留在野战病院外，其余均被配属各阵地。					

关于日军留守松山的兵力，日军战史中列举了其序列番号，统计数字为 1260 人。第 56 师团战友会"云龙会"编写的《拉孟、腾越：玉碎的真相》中公布的数字为 1280 人。品野实指出，公刊战史中遗漏了联队通信中队的 40 人，他在著述中的统计数字为 1310 人。辻政信在其《滇西的死斗——十五对一》中，记为 1400 人。

到底哪个数字更为准确？不妨做一番细致梳理：

日军拉孟守备队，由第 113 联队留守部队、野炮 56 联队第 3 大队及其他配属部队组成。在第 113 联队第 1 大队第 1 中队士兵二ツ木留治编撰的《镇安街守备队》一书中，提供了一份依据"战殁者名簿"核定的战死松山的第 113 联队兵力统计，如下表：

表 4　战死松山的日军第 113 联队兵力统计表

	将校	下士官	兵	计
113 联队本部	8	15	30	53
联队炮中队	3	10	62	75
速射炮中队	3	8	35	46
通信中队	1	9	29	39
第 1 大队本部	2	2	6	10
第 1 中队	1	8	51	60
第 2 中队	1	1	44	46

续表

	将校	下士官	兵	计
第 3 中队	2	6	36	44
第 1 机关枪中队	1	4	27	32
第 1 步兵炮小队	1	1	5	7
第 2 大队本部		4	9	13
第 4 中队	5	19	112	136
第 5 中队	1	6	45	51
第 6 中队	3	11	62	71
第 2 机关枪中队	5	5	35	45
第 2 步兵炮小队	1		2	3
第 3 大队本部				0
第 7 中队			1	1
第 8 中队				0
第 9 中队	1	3	16	20
第 3 机关枪中队				0
第 3 步兵炮小队				0
合计	39	112	602	753
备注：由于日军认定拉孟守备队全员“玉碎”，因此上述统计数字中应包括后来被我军俘虏的十余人，及从红木树转运来的伤员约 300 名。				

除此之外，拉孟守备队序列内其他部队兵力情况为：

野炮兵 56 联队第 3 大队，约 380 名；辎重兵 56 联队第 1 中队的 1 个小队，约 40 名；第 56 师团卫生队担架第 3 中队，约 100 名；第 56 师团防疫给水部一部，约 40 名；第 56 师团通信队无线电分队，约 10 名；以上合计 570 名。[56]

〔56〕［日］二ッ木留治编撰：《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第 206 页。

则，拉孟守备队兵力总计为 1323 人。

5 月 16 日：

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反攻部署，在第 20 集团军在高黎贡山方向反攻的同时，第 11 集团军编组 4 个加强团渡江助攻，以牵制日军兵力。在惠通桥以南的怒江下游，最初拟定以第 71 军第 88 师加强团从打黑渡以北渡江，向龙陵进击；以第 2 军第 76 师加强团自七道河渡口渡江，向芒市进击。

但第 71 军军长钟彬经研究感到，平戛为日军在滇西的六大据点之一，若不先攻占平戛，欲以钻隙渗透法袭击龙陵、芒市，必感兵力不足，后勤方面亦难以接济。于是向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建议，将前述两个加强团统一指挥会攻平戛，由第 88 师师长胡家骥指挥。宋希濂斟酌后同意了该方案。

盘踞平戛街之敌，为日军第 113 联队第 1 大队（大队长安部和信少佐[57]）约 800 人，配属山炮 4 门。[58] 自 5 月上旬以来，在青木岭（桤木林）、马鹿塘、三村（今三家村）等外围据点构筑工事据守；并以一部进据打黑渡西岸高山扼守，以阻击我军渡江。

为避免敌前强行渡江而遭敌“半渡而击”，第 11 集团军令第 88 师师长胡家骥率该师第 264 团（以第 262 团第 2 营加强）及山炮兵一个连，秘密移动至打黑渡下游蚌董渡，在配属该军之渡河工兵连协助下，于 5 月 11 日上午成功渡江。12 日晨，即向青木岭、三村、小黑箐、小寨之线猛攻；次日又续向马鹿塘攻击。

12 日晚，安部大队以主力向我第 264 团（团长戴海容）增援反扑，至 14 日在平戛东南 8 公里附近阻滞了该团攻势。[59] 但此时，从下游七道河渡口渡江的第 2 军加强团（以第 76 师与第 9 师联合编组，由第 9 师副师长陈克非指挥）乘虚进击，于 15 日凌晨 4 时攻占平戛东山及平戛街，并继续追击向西北方向溃逃之敌。

---

〔5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记为安部和信，《兵旅の赋》第 56 师团将校职员表记为安部和壮。

〔58〕据日方记载，配属安部大队野炮第 56 联队第 1 大队第 4 中队九四式山炮 4 门。

〔5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93 页。

据日军战史：此时，日军第56师团令先前作为师团直辖、奉命由松山北方阵地向龙陵转进的第113联队第2大队，与芒市守备队编成联合大队（以原田万太郎大尉为队长的步兵三个中队为基干），火速派往平戛增援。平戛守备队长安部少佐一并指挥联合大队，于16日从南北两面夹击正在攻击平戛阵地之我军，歼灭我一个营。[60]

据钟彬撰述："当时，因我第71军、第2军之间联络不畅，两个加强团作战未能严密协同，在日军反击下，占领平戛街南街阵地得而复失。"[61]此为日军第56师团按预定方案，在内线作战中第一次运用机动兵力向我反击，使我以两个加强团对平戛之攻势遭到顿挫。

但是，当16日安部大队主力回援平戛，第264团尾随追击时，却有一个意外收获。据载，当日上午9时，该部于三村击溃日军，于敌遗尸中拣拾到冰田部队（经查第146联队第1大队第3中队长为永田岩男大尉，疑为永田之误）阵中日记、会报记录等文件。此后两天，官兵打扫战场时又搜获敌大队部作战命令、会报记录及其他文件，发现"该敌对我远征军之整个攻防部署、部队番号、长官姓名及使用兵力、渡口均甚了解"，心知其重要价值，立即呈送上级。[62]

据时在第11集团军总司令部作战课任职的陈宝文回忆，在这份缴获的日军作战命令上，我军的反攻作战方案赫然被列为第一条，而其部署则完全是针对我计划而为，即以师团主力在高黎贡山作严密布防，在松山、镇安街、龙陵、平戛、象达均配置不足一个大队的防御兵力。当时，集团军拟定的作战计划仅下达到军，由军长召集团长以上军官当面口头传达[63]，日军怎么会拿到我军反攻计划文件？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看后的判断是：一定是内部出了大汉奸和败类。于是连声大骂，并直接打电话报告了卫立煌，要求迅速改变作战部署。[64]

---

〔6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3页。

〔61〕钟彬：《龙陵会战史》，第14页。

〔62〕《陆军第71军88师加强团平戛战役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212页。

〔63〕《第十一集团军怒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85页。

〔64〕陈宝文：《反攻腾龙战役亲历纪实》，据《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第103页。

后来有人说，三村之战缴获的这份日军作战命令书，是滇西战略反攻取得胜利的“转折点”——详情后面分解。

5月17日：

东南亚战区盟军总司令、英国皇家海军中将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即日决定，将由13架C—47飞机组成的一个美国运输机大队从印度方面转隶第14航空队，担负云南方面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的空中补给。

蒙巴顿认为，中国军队每人的所需空运量可以远低于英美军的所需量，故约定每日按4个师的最低补给量进行空运。[65]

在美英两国首脑于1943年8月在魁北克会议上设立的东南亚盟军司令部中，这位贵为英国皇族（英王乔治六世的表弟）的蒙巴顿勋爵是最高司令官，史迪威是其副职。蒋介石一辈子最痛恨英国人，不喜欢丘吉尔和他的这些将军，是因为这个老牌殖民帝国对中国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和警惕，不愿意中国以反法西斯同盟的一员而坐大，威胁到其在亚洲殖民地的利益。按照蒙巴顿这个歧视性的补给配额，搁在英美士兵身上早就不干了，但对于穷困的中国军队，只能接受。实际上，由于滇西的恶劣天候，就连每日4个师的补给物资，也无法投送到部队手中。

中国军队是在远低于美英军的物资保障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作战并赢得胜利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对此都非常清楚。在西方人看来，仅仅以少量大米果腹，就能翻越海拔3000米的高黎贡山脉，与最凶恶的敌人在“云层上的战场”战斗，也许只有中国士兵才能办得到。[66]

5月20日：

那个不幸的“意外事件”，终于让中国远征军感到了痛苦。

---

〔6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援引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第81页。

〔66〕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第3页。

这天上午，在保山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大发雷霆。作战部情报处中校处长林逸时后来这样回忆：

“当时形势对我军不利。渡江作战已经进行了10天，一线部队进展甚微，日军且有反攻趋势……大约上午8点多钟，美军G2部（情报部）伯丁上校派人送来一份缴获的紧急情报，并附有一张怒江东岸日军防卫兵力部署图表。我看过后感到吃惊不小，因为日军这个部署毫无疑问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按照计划，我军进攻分为左右两翼。左翼松山、龙陵由一个军佯攻，目的是分散和牵制敌人，右翼腾冲才是主攻方向。主攻集团为第20集团军，第11集团军担任策应性攻击。但日军似乎早已洞悉我军部署，将第56师团主力近万人[67]全部集中在了腾冲方向的高黎贡山一线，利用险要地形频频反击，致使我军攻击受挫，伤亡惨重。我将情报火速呈送卫长官。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68]

泄密事件在中国远征军高级将领中引起极大震动，卫立煌甚至怀疑重庆统帅部打入了日军高级间谍。究竟是谁并怎样把机密泄露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这个谜团直到1969年才被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编撰的公刊战史揭开：

北方的腾越方面和南方的龙陵方面，两个方面的中国远征军究竟是同时进攻而来，还是以不同的反攻时机攻来？这直接影响着师团的作战指导。因此，对企图各个击破绝对优势之敌的第56师团来说，必须先彻底掌握敌情。

当时，第56师团根据芒市机关（监听破译中方通讯的机构）的积极活动，努力监听云南方面中国军队的无线电通讯，特别是从其通讯系统的增减、移动或通讯联络次数的变化，通讯量的增减等，

---

〔67〕远征军开始反攻时，日军第56师团在滇西的步兵总兵力约为六个半大队（含配属部队第18师团第114联队猪濑第1大队）。为应对第20集团军第54军、第53军攻势，松山祐三陆续将总兵力的六分之五左右投入在高黎贡一线。参见曹英哲、王楚英：《抗日名将叶佩高》，第100页。

〔68〕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53页。

判断中国军队的动向。但能够破译出的电文仅占大约三分之一。然而，1944年2月中旬，中国一架军用飞机因浓雾迷航，在腾冲迫降。当时捕获中国少校军官一名，并缴获了新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人员编制表。

据日军战史记，“此后，破译密码颇为容易，对作战指导亦大有裨益。收报范围已远达昆明、重庆”。“第56师团之所以能出色地进行内线作战，固然与师团官兵对战场地形了如指掌有关，但从破译密码上亦获益匪浅”。[69]

反攻作战时，远征军老兵林峰被分配在第11集团军总部参谋处，协助参谋长成刚少将工作。林峰虽然只是个上尉书记官，但总司令和参谋长的军印都由他保管着，“总司令的军印叫做关防，参谋长的叫钦记。我负责起草文书，由参谋长审阅后，我再盖章，交给收发处发往各军、师部”。第11集团军收发的文件，大多都要经由林峰的手，几乎每天都要加班。

林峰记得，反攻开始后，电令骤然多了起来，无线电密码本频繁更换，谨防通讯被日军破译。尽管这样，中国远征军的无线电通讯还是被设在芒市的日军电台截获、破译，日军准确判断出中国军队的部署，集中近万名兵力防守高黎贡山，给第20集团军造成巨大伤亡，开战仅一周就伤亡数千人。[70]

在这种情况下，远征军的作战方案必须改变，原本助攻的第11集团军必须真正出击了。

令人欣慰的是，重庆统帅部此时也提出了发动左翼攻势的想法。当然，他们尚不知道日军已掌握我反攻计划的事，而是根据滇西、缅北战事进展所作出的判断。当日，军令部长徐永昌致参谋总长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电报称：

---

〔6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89页。

〔70〕据《南方都市报》2005年8月12日文章《林峰：松山战役后，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王雷撰文。

“我远征军出击部队（第53军、第54军及第76师、第88师、新39师之各一加强团）自本月11日开始强渡怒江以来，进展顺利，已先后攻占马面关、桥头、红木树、平戛等据点，并围攻斋公房、大塘子等地。又我驻印军一部（新30师第88团、第50师第150团）配合美军支队复于18日迂回至密支那，占领密支那机场，并随即以运输机、滑翔机运输增援部队在该机场降落。此际我远征军主力似应乘机渡河，扩张战果，进攻腾冲、龙陵、芒市之敌而占领之。……处置：令第71军（欠1个师）向龙陵攻击；第2军（欠新33师又1个团）以主力向芒市攻击，截断后方联络线，一部协力第71军攻击龙陵”。

蒋介石批示：“照办。”〔71〕

5月21日：

这天，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收到了从“冰田大尉”身上搜获之敌作战命令。泄密之事已经确凿无疑。16日从战场缴获的敌情文件，一个星期后才送达最高指挥部，中国远征军对情报工作的怠慢和办事的低效率，实在让人叹息。

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在呈送件中签署了个人意见：“我反攻部署敌已明了，敌兵力开始向腾冲集结。我应抓住战机，争取主动，出敌不意，全线反攻。”〔72〕

卫立煌遂决定改变反攻部署：以第20集团军为右翼攻击军，攻取腾冲；第11集团军为左翼攻击军，攻击龙陵、芒市。两翼展开全线反攻。令第11集团军各部（第71军、第2军）于5月底完成渡江准备，6月初西渡施行攻击。

据说，卫立煌决心变更原来的进攻计划后，自知责任重大，曾亲自带着新起草的作战方案飞往重庆面见蒋介石。尽管蒋介石已获知军令部关于发动全线攻势的提议，但既然卫立煌主动送上门来，就出于其惯性心理“拿”了一把：

〔71〕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05页。
〔72〕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2页。

蒋问：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

卫答：我愿负责。[73]

如此，这个本应由最高统帅承担的责任，就“巧妙”地卸在卫立煌个人的肩上了。

将军临阵，重在决心与担当。打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赌博，打完仗留下资料让搞研究的人说长道短。下决心的依据是对敌我的了解，敌情掌握愈准确，固然胜算愈大；但有时只有三分胜算的仗，如果需要也得打。低级指挥员在这方面没有选择，高级将领就多了一些自由。笔者欣赏那些精于盘算的将领，只有胜券在握才断然出手，多年以后赢得一个“常胜”的美名；但从内心更敬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将领，因为他超越了个人功利，体现了军人最高的道德标准。

在滇西，陈诚走了，卫立煌来了。敌情尚不明就出手了，打好打坏谁兜着？其实是一线冲锋陷阵的将士。在战场上，指挥官的人格、胆识和决断，决定着士兵将付出多大的牺牲。一将功成万骨枯，打败了顶多丢个官，多年带兵打仗的卫立煌岂能不明白。卫立煌令人可敬之处在于，敢于根据新情况及时自我否定，这是为胜利负责，也是为士兵的生命负责。换个心思复杂的人，不一定敢这么做，因为原定作战方案军委会已经批准了嘛，责任大家来负；临阵改变方案，打了败仗可都是你一个人担着。

卫立煌的幸运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5月25日：

卫立煌提出发动左翼反攻的设想后，却遭到美军方面的极力反对。他们认为，后勤方面无力支援中国远征军5个军（12个师）的全面攻势。自19日开始，何应钦与中缅印战区美军总部函来电往，何迭次恳请史迪威尽快拨发至少20架运输机到位，而美军总部副参谋长本杰明·费理斯（Benjamin Ferris）准将一面答复正在办理，一面敦促左翼远征军9个师迅速行动，此时美方“讨价还

〔73〕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28页。

价”味道极浓。[74]

其实，远征军最初仅从右翼反攻的作战计划，很大程度也是在征求了美军联络部的意见后决定的。据美军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军事顾问团》的解释，“放弃拟定始终以小规模、保持高度机动性的诸多部队进行作战的设想，而逐渐改为力攻日军阵地的设想，被认为这是从过于加重后勤负担而考虑的”。当时，保障远征军作战补给的第27空运中队仅有13架C—47运输机，在不能指望第14航空队出动大批飞机的情况下，空军部队认为支援远在100英里前方的庞大远征军困难重重，出现了不满情绪。

然而，史迪威中将却坚决支持卫立煌的方案。[75]

在任驻华武官时期，史迪威曾称赞指挥过忻口战役的卫立煌是中国最能干的战区司令，性格积极进取。几年不见，他对卫立煌接替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起初有点疑虑：“Y军需要一个有冲劲的推动者”[76]，言外之意是怀疑他现在还是不是这样的人，此印象可能来自卫立煌被幽闭四川时的一度消沉。如今卫立煌左右两路出击的计划，显然打消了他的疑虑。[77]

超链接3：史迪威与中国远征军

史迪威1904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被分在驻菲律宾美军部队服役，任陆军中尉。1911年11月首次途经中国，逗留17天，目睹了中国的辛亥革命。1920年至1923年，史迪威作为语言军官被美国陆军部派到中国学习中文。其间，他以志愿者身份参加国际红十字会，担任总工程师帮助中国修建山西汾阳至军渡段公路，以解除

---

〔74〕据何应钦与费理斯往来函电6则。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14—415页。

〔7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援引美国出版战史《中国—印度—缅甸：史迪威军事顾问团》，第112—113页。

〔76〕［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211页。

〔77〕史迪威后来与卫立煌成了好朋友。据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517页）：卫立煌曾对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说，自己曾因“剿共”有功而得到四个县赋税的奖励，“对于像史迪威将军这样的人，他们当然应该给他至少十个县！”

该地区的严重饥荒，这仿佛是在为他后来领导修建中印公路作铺垫。1926年至1929年担任根据庚子议定书驻扎在天津的美军第15步兵团少校营长（当时马歇尔为该团中校团附），对当时中国致力于国家统一的北伐战争有深刻观察。1935年至1939年又被任命为美国驻华武官，见证了日本分离华北及卢沟桥事变前后的情形。在此期间他到中国各处游历观察，加深了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军队状况的了解，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通"。

作为职业军人的史迪威，是美国陆军杰出的指挥军官和步兵战术家，与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等人一样，他渴望在为美国利益的服务中成就个人功业。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给他提供了机会，在赏识他的老朋友、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78]的举荐下，1942年他被美国陆军部任命为中缅印战区（CBI）美军总司令兼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1943年又担任东南亚盟军司令部副总司令。正如艾森豪威尔之于欧洲战场、麦克阿瑟之于太平洋战场，史迪威将建功立业的平台定位于中缅印战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让美国意识到这个战场的重要性：首先将中国军队装备训练成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用这支军队切断日军占领的缅甸防线，从而打破对中国的封锁；最后，再整训一支更为强大的中国军队收复中国大陆，加入太平洋联盟，以中国大陆为跳板实施对日本的总体反攻。他坚信，他要打通的中印公路最终将通向东京。这个宏大的计划，被称为"史迪威梦想"。

最初，罗斯福总统和马歇尔是相信这一点的，因此全力支持他的构想和努力，给了他巨大的权力，尤其是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的管理权；只是无法给他派出最紧缺的美军部队。史迪威欲实现理想，只能从中国要兵力和指挥权，同时与英国谋求战场合作。然而，这个最需要政治斡旋能力的工作，恰恰是他不擅长的。他憎恨英国这个老殖民帝国主义的自私自利，更痛恨蒋介石一味索要美国援助却保存实力、无所作为。而蒋介石和英国人则反感他的粗鲁跋扈和政

---

〔78〕史迪威在美国佐治亚州本宁堡陆军步兵学校任教官期间，曾深得该校副校长马歇尔赏识。马歇尔担任美陆军参谋长后，曾将此期间他所赏识的优秀军官布莱德利、史迪威、比德尔·史密斯、柯林斯、李奇微、希尔德林、迪恩等人举荐担任美军高官。

治上的幼稚，他两头不讨好。以才能和个性而论，史迪威最适合做一员带兵打仗的战将，蒋介石却希望他安心待在重庆做一个纸上谈兵的幕僚长，最好一门心思去跟美国催要租借法案物资，其他不必操心。对此，洞若观火而使命感极强的史迪威岂愿任人摆布。于是，这个曾任美国陆军战术教官和步兵第7师师长的三星中将，几乎将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消耗在吵架和扯皮上，在作战方面只投入了百分之十。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后，这个瘦削单薄、左眼失明、年届六旬的老头扛着卡宾枪，率领一百多名部属和医护人员，14天里徒步行军140英里逃到了印度。[79]几乎是到达印度的那一刻，他就开始谋划洗雪败战之耻的反攻计划。1942年日军悍然进攻菲律宾，麦克阿瑟指挥美菲部队抵抗失败，奉命撤离的时候曾留下豪言："我还要回来！"史迪威的个人意志和胜利信念毫不亚于他。到达印度后，史迪威在新德里向记者坦言："我们挨了一顿狠揍。我们从缅甸逃出来，这是个奇耻大辱。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原因，然后打回去，收复缅甸。"在蒋介石迟迟不愿意下令远征军反攻时，他率领驻印军先干了起来，其推进速度、战斗效能曾让蒋介石惊讶不已。[80]与史迪威曾有矛盾、素以忠厚著称的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在回忆录中曾对史迪威作中肯评价："……应当承认，他（史迪威）毕竟是一位正直的、很有才华的军事将领。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他的态度不仅始终是认真、积极的，而且颇具战略眼光，在指挥上很有一套办法。"[81]给远征军和驻印军新装备的是他，监督将军饷发到每个士兵手中的是

〔79〕5月1日，美军第10航空队曾派一架飞机找到史迪威并奉命接他去印度，史迪威让飞机接走了参谋人员，自己拒绝登机，甘愿徒步前往。王楚英评论认为，"此举并不可取。如果他当日乘机去印度，就可以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营救陷于绝境的中国军队，使数万中国官兵免遭无谓牺牲"。据王楚英：《史迪威与中缅战场》，载滇西抗战胜利50周年《滇缅抗战论文集》，第285页。

〔80〕原话为："'花生米'对北缅的成功十分吃惊。"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262页。

〔81〕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02页。基于第一次入缅作战没有切实掌握指挥权的教训，史迪威在缅北反攻中以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身份，基本剥夺了先后担任新1军军长、驻印军副总指挥的郑洞国的指挥权。带着对中国高级将领的成见，当一次目击郑洞国在阅兵时坠马后，在日记中尖酸刻薄地形容郑洞国为"那个白痴"。据黄仁宇：《黄河青山》，第29页。

他，[82]蓝姆伽训练营也是他组织领导的，干这些真正的军事工作，他比任何一个中国将军都强。虽然因为对中国军队战斗效能冀望过高，指挥方面有时被一些中国将领指责为鲁莽和冒险，但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大错。[83]美国人打仗讲的是实力，在雄厚物质基础上用技术和训练解决问题，所谓兵法谋略放在其次。中国和英国的不少高官都批评他作为一个中将司令官却在长达半年时间里钻在丛林里指挥战斗，嘲笑他是“美国陆军最佳三星级连长”、他在缅甸打的是“排级战”，[84]但这正是他有意而为——蒋介石曾以其经验反复告诫史迪威：中国军队只有三倍兵力于日军，才能打防御；五倍兵力于日军，才能勉强进攻。[85]所以，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待在那里无所作为——好了，既然你们都不相信一支由壮丁拼凑起来的杂牌部队能打败日军精锐师团，那么就请见识一下建立在科学治军训练与充足物资保障基础上的美式中国“新军”，到底能发挥出何种效能。在他看来，把中国的营、连、排投入战斗并使之获胜，要比在其他地方的会议上争论他们的价值重要得多。

---

〔82〕史迪威坚持要对驻印军士兵逐个付饷，进行当众点名。而以罗卓英为首的中国将领则要求将军饷“整块”交给各部队指挥官，史迪威认为，如此中国将领即可沿用克扣、“吃空额”之惯例。最终，史迪威报请蒋介石同意赶走了罗卓英。据《史迪威日记》（第 190 页）载，“罗卓英离开前每月要拿 10 万卢比”。关于当时国军部队“吃空额”的具体情形，王光炜曾撰文讲述：松山战役后，王光炜被任命为第 8 军辎重兵团团长。到任不久，军长李弥即指示，辎重团编制为 5000 名兵员，实有 2000 多名，以后仍保持实有 2000 名，而虚报满编 5000 名领受军饷，团里留 300 名空额经费，其余全部上交军部处理。美军顾问点名发饷时，从友邻部队调人来应点。黄仁宇当时任中国驻印军新 1 军军长郑洞国（后升任副总指挥）副官，对高阶军官“吃空额”的贪污行为不满。郑洞国告之，虽然高级将领通过吃空额经手很多钱，但他必须养活部下，其中有的失业，有的家有急难，还要尽种种特殊义务，剩下的金额不足以让全家维持差强人意的生活水准。这个解释未能说服黄仁宇，但让黄从一个新角度来看待高级将领的生活及挣扎：其一，当时的军队内人身依附色彩浓重，爬至高位者需要设法为跟自己卖命的手下尽特殊义务；其二，军队明面上的薪水，难以支撑一个将领所要面对的现实的“排场”和应酬，以各种办法捞钱遂成为全体高级将领心照不宣的“潜规则”。据黄仁宇《黄河青山》，第 19 页。

〔83〕黄仁宇在评价史迪威的军事指挥能力时认为：“在检讨第一次缅甸战役作战经过时，如果我们完全根据战略上及战术上之至当，则只有相信史迪威之英明果断。”但是，黄仁宇同时指出，这一评价“不能逃避当日的实际情形，因为国军非现代化社会产物，即不能以现代眼光责成其执行战略上及战术上之至当”。他认为虽然史迪威堪称“中国通”，但是对国军的素质是否能依照现代军队军事原则行事而达成效能，尚有过于理想化的一面，因此“史迪威一定要了解中国人之心理和中国战法。”据黄仁宇：《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 231 页。应该说，经过总结反思，尤其是与中国驻印军的接触“磨合”，在第二次反攻缅北作战时，其指挥效能即大有改观。

〔84〕［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1911—1945》，第 425 页。

〔85〕［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 64、277 页。

正是这种深入基层的实干作风，使得史迪威这个“老外”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及立足现实推进变革的热情，赢得了不少国人的惊奇和感动。他对于中国军队指挥将领和底层官兵的评价，完全是两个极端：他认为，出身贫苦农家的中国青年天生就具备成为全世界最优秀士兵的潜质，所需要的只是英明军官的正确指导和激励；而混到将领的高级军官们，则大多蜕变为精于盘算的“投资商”。[86]当时中国军队的普遍现实是：如果一仗打下来一个师的兵员减少到一个团而不能马上获得补充，那么这个师长就成了团长。这种“亏本”的仗谁还会冒险去打？但是，假如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保存实力会导致丢官，这些将领又会以粗劣的指挥驱使大量兵员做无谓牺牲。“中国的所有政府机器上都有相互交错的利益纽带……家族，经济，政治，等等。无论一个人多有办事效率，他都不会仅仅因为最称职而升官，他还必须要有后台。”对此他的结论是：“要改革这样一种制度，就必须将其打得粉碎。”[87]在很多人看来，他这种想法无疑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在美国史迪威素有“醋乔”（意为脾气大、别扭）的绰号，他对中国高级将领惯有的患得患失、敷衍推诿、厚此薄彼、“吃空额”[88]那一套作风深恶痛绝，直言批评，为此得罪了不少人。但他以身先士卒、平易近人的作风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更是让很多中国士兵惊奇。他对吃苦耐劳、知恩图报、服从上级的中国士兵评价很高，将他们称作“我的孩子们”，而士兵们则亲昵地称他为“乔大叔”。在缅北反攻战场，每当战事处于紧张时刻，只要“乔大叔”瘦削精悍的身影出现在阵地上，就会引起士兵们热烈的欢呼，部队的士气就会更加高涨起来，再艰难的任务也会毫不犹豫地

---

〔86〕在史迪威看来中国士兵刻苦耐劳用命，下级军官也无问题。团营长好坏参半务必去莠存良。问题在军长师长，“当中很少的有效率”。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35页。

〔87〕［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277—278页。

〔88〕国军部队中通行的一种“陋规”，即故意不按编制满编员额，而以虚额部分冒领军饷补给，由各级军官贪污自肥。对此，在松山战役期间，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曾做如下记述：“（6月23日）下午会报检讨此番豫战。何敬之（即军政部长兼参谋总长何应钦）谓何以我军作战无必死之心，风气坏极，平时吃空额可以，战时应努力牺牲云云”。对此，徐永昌的评论是：“不知战时无必死之心，即为平时风气太坏所致，不能牺牲即是平时‘吃空’所致，所云‘吃空额可以’，殊不成语也”。见《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346页。

去完成。[89]正是在缅北战场上一个接一个的胜仗中，中国官兵渐渐获得了令自己也惊讶的信心：抗战以来的中国战场上何曾出现过这样的情景！这是让史迪威最欣慰而自豪的事。

但史迪威最终被罗斯福总统召回了，因为他触碰到了蒋介石容忍他的心理底线。他发现“不理想”中国的总根源都来自蒋介石，出于对蒋介石政府在政治上的绝望，他认为要使中国对美国战略有用的话，就必须将这个“花生米”[90]换掉，或者让其靠边站。[91]从一个军人的职责而言，史迪威显然是严重“越位”了；但他发现，唯有如此自己才能真正实现来中国的“使命”。就直觉、秉性和信念来说，他本无心、无力于政治，事实上他连反对他的不少美国人都摆不平[92]，却深深地蹚进了中国政治的浑水。

一度，罗斯福站在了史迪威一边，帮着他向蒋介石索要指挥中国全部陆军的兵权，因为有指挥中国驻印军反攻缅北的胜利业绩证明，史迪威确实有能力将中国军队的战略作用发挥到极致。就在松山战役结束10天后的9月19日，在马歇尔运作下，罗斯福给蒋介石发来一封居高临下、措辞强烈的电报，要求蒋不要借口东线战局吃紧欲将远征军从滇西调回；[93]同时委派史迪威指挥全部中国军队。

---

〔89〕郑洞国：《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302页。

〔90〕原为美方在无线电讯中对蒋介石的代号。史迪威经常在日记和谈话中使用这个含有轻视意味的诨名，尤其是对蒋不满之后。

〔91〕史迪威在日记中曾写下“中国问题的药方是除掉蒋介石”的看法（见《史迪威日记》第279页）。史迪威的助手、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曾在其所著的《和史迪威从缅甸出走》中披露：史迪威曾打算“一劳永逸”地把蒋介石干掉，多恩据此设计了一个破坏蒋介石飞机的计划，但罗斯福总统一直没有授权史迪威实行这项暗杀。参见［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第153页。

〔92〕如倚仗“明星效应”与其争夺空军补给配额并觊觎其领导权的下属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初期支持史迪威，后又赞同蒋介石意见要求罗斯福总统将史迪威召回的特使赫尔利。

〔93〕因第11集团军久攻龙陵不下，局势危急，蒋介石于9月上旬令史迪威发动八莫攻势以牵制日军，但史称驻印军疲劳过度需要休整而拒绝用命。在9月15日的会晤中，蒋再次要求史督促驻印军攻八莫，史仍不从命，蒋即谓将令攻龙陵之远征军撤回，史则谓如需援军应派防制中共之胡宗南部队，并在会晤后报告了马歇尔，遂有9月19日罗斯福总统电文中对蒋“按兵不动或竟提议撤退”的指责。应该看到，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对战事是积极的，而史迪威却表现出相当的傲慢和意气用事。黄仁宇评论认为，蒋介石所见不仅具有纵深，而且也超过史迪威所见的幅度。史迪威要求凡事合理，他只能处理一个有限的局面，缅北也是一个无民事纠纷的战场，而蒋介石则经常应付三四处不同的变数。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310、312页。

罗斯福要求史迪威将此电报亲呈蒋介石。此前，在巨大压力下，蒋介石本来已在研究罗斯福的要求，考虑给史迪威安一个“中国战区参谋长兼中美联军前敌总司令”的名头。但史迪威这时以其急躁、刻薄的性格弱点犯了一个致命错误，他不顾美国总统的政治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少将建议由自己向蒋介石意译电文的劝阻，直接把电报原文当着蒋介石的面交给了中方翻译。[94]这封“最后通牒”式的电报，撕碎了一个大国元首应有的“体面”。蒋介石被深深的羞辱感激怒了，他认为罗斯福的电报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史迪威要是拿到这个权力，就意味着自己将失掉江山，这次他铁了心：史迪威必须走人，哪怕因此会失去美国的支持，也在所不惜。

是成全一个美国将军的理想，还是稳住一个在美国国家战略中尚有重要作用的国家？罗斯福是政治家，在蒋介石毫不妥协的坚持下，最后还是选择了后者；这一次连一贯支持史迪威的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爱莫能助。加之此时美军已在太平洋上夺占了战略据点塞班岛、提尼安、关岛，从那里起飞的B—29远程轰炸机已经可以轰炸日本本土[95]；一年前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也允诺苏联打败德国后6个月即出兵中国东北对日作战，利用中国大陆做反攻基地的“史迪威梦想”价值似乎不大了。于是，一个军人被出卖了。“两年八个月的奋斗，得到的是一个嘴巴。”[96]

1946年11月13日，回国仅两年，这个拥有“钢铁意志”的军人即郁郁而终，死于肝癌。也许当他扛着步枪行进在缅北丛林时癌细胞已在肆虐，但真正能放倒他的却是政治，癌细胞不过是落井下石。虽然1944年8月罗斯福授予了其四星上将的最高军衔，但当权

[94]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史迪威资料》，第125页。

[95] 美军于1944年6月15日攻占被日本称作“绝对国防圈”内的塞班岛，至7月间又相继攻占同属马里亚纳群岛的提尼安、关岛。随后，在这些岛上修建了5个B—29轰炸机机场，并组建第21战略轰炸机集团。11月24日，该集团以B—29轰炸机群首次对东京实施轰炸，成为继中国成都第20战略轰炸机集团之后第二个可以从空中打击日本的战略力量。[日]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第367页。

[96] [美]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292页。

力和责任落空后，在他眼里不过是个安慰，真正的军人是以结结实实的功绩而满足的，这种安慰反倒像是讽刺。离开重庆前，他拒绝了蒋介石授予他的青天白日勋章[97]，仅带走了在战场上缴获的一把日本军刀和用以锻炼身体的哑铃。当听到中国远征军攻克松山时，他通过多恩将军向卫立煌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而当蒋介石将新开通的中印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为“史迪威公路”的消息传来，远在太平洋那边的他对这份荣誉感到“悲欣交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评说诸葛亮的诗句似乎对史迪威也是合适的。他当得起“鞠躬尽瘁”这个词。他为了谁？主观上当然是为了美国利益，为了他个人的勋业，但只要是了解这段历史、并讲良心的中国人，得承认他的努力客观上帮助了我们的民族解放事业，帮中国人找到了作为胜利者的尊严。[98]

就在松山战役期间，史迪威经过与蒋介石反复交涉后，与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联手，于7月、8月两度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实现了美国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接触，积极谋求合作的可能。倘若他实现了那个曾经的闪念：用美式武器装备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打击日军，也许中国后来的历史乃至世界格局都会改写。但当时的现实证明，那个闪念连个梦想都算不上。前来延安考察的美国总统特使及外交情报官员中，对中国共产党有好感的不少，但是他们都改变不了美国政治在意识形态上的傲慢与偏见。在离开中国时写给朱德的告别信中，史迪威表示由于不能“与你和你所发展的优良部队”在一起，而“非常失望”。

---

〔97〕国民政府曾于1944年3月第一次提出授予史迪威青天白日勋章。史迪威当时告诉美国陆军部说，为了保证他能完全自由行事，他拒绝接受中国或者英国的勋章，而且如果他无法“平和地”达到这一点的话，那么他就将援引美国陆军部的一项规定，按照这个规定，凡是参与租借物资分配的人都不许接受外国勋章。美国陆军部据此对史迪威最终拒绝接受中国授勋作了解释。这一次，蒋介石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是通过中国军事委员会一名低级官员转交给史迪威的参谋人员的；史迪威通过类似级别的一名美国军官拒绝了这一勋章，作为正式理由的借口是：像他这样级别的美国军官认为接受任何外国的勋章都是不明智的。参见约瑟夫·史迪威：《史迪威日记》，第300页。[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512页。

〔98〕史迪威在1944年9月24日的日记中，记录宋庆龄对自己说：“希望你代表中国出席和平大会，因为你比中国人更能为中国人办事。你在中国人中有替他们说话的名声。缅甸战役使他们再次觉得受到了尊重。”参见《史迪威日记》，第291页。

1945年，日本投降后几个月，病体沉重的史迪威拜访继任美国总统杜鲁门，恳求他不要为了蒋介石而干预中国的事务，他说“我们必须撤出——就现在”。闻听已卸任的老朋友马歇尔将奉命去中国调停国共内战，他在1946年4月6日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评论说“马歇尔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甚至在信中提及国共在东北的纷争时率性直言：“我心里痒痒地想丢下铲子，到那里去和朱德并肩扛枪。”[99]——当然，这只是出于对蒋介石不满而作的情绪化表达，也不能当作史迪威真实的政治态度。[100]

对美国而言，以1944年10月召回史迪威为肇始，此后的“多米诺效应”是继续错误扶持一个“在中国日益不得人心和不为人所信任”的“垂死的反民主的政府”[101]，最终失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招致几年后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冷战格局中的强大对手。而此前被很多人指责为缺乏政治头脑的军人史迪威，终于被发现是拥有无与伦比的政治洞察力和预见力的先知者。

1971年，当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踏上访问新中国的“破冰之旅”之际，台湾国民党当局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史迪威事件》[102]一书，本是发泄对美国“背信弃义”的不满，却再次给这个已死去25载的老兵大泼污水。至今，台湾国民党方面提起这个美国老兵仍没有什么好话。而在2005年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在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门努力下，重庆市政府将当年嘉陵江边的史迪威寓所老

---

〔99〕［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537页。

〔100〕黄仁宇曾评论说：“史迪威同情中共由来已久，但是并非赞成其政治企图与革命理论，而是欣赏其部队有效率。日后他表扬他所爱慕的中共人物为朱德而非毛泽东，有等于他爱慕冯玉祥与李宗仁。以上各人都朴实而与士兵接近。”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45页。

〔101〕《纽约时报》1944年10月31日就史迪威被召回所作的报道，援引自［美］巴巴拉·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第513页。史迪威的继任者为魏德迈，持反共立场，与蒋介石配合较好，在抗战结束后曾令美军飞机、舰船运送国民党军进入日占区与共产党争地盘，介入了对中国内政的干涉。

〔102〕《史迪威事件》（梁敬錞著，1971年7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73年5月大陆商务印书馆再版）是一部经蒋介石“特许”并向作者提供其大溪资料室档案所作的研究，虽然下了很大功夫，但先定主题、后找证据的操作路数，仍使该书带有很强的政治工具色彩。而将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的事迹安在陈诚名下，更是被卫立煌长子卫道然指责为“无人格”可言。见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48页。

房子修葺一新，建立了一所“史迪威将军纪念馆”，馆内陈列着这位老兵的生平事迹。虽然中国共产党昔日并没有得到过这个美国老兵“现实”的好处，但情感道义上的理解支持也应该铭记——这似乎是新时代中国应有的胸怀和气度。

事实上，在国共两党与美国关系几十载恩怨情仇这个大背景下，基于某种被放大了民族自尊心，两岸的中国人都很难对史迪威在中国所作出的努力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人们容易把他看作美国对华政治的某种符号，而忽略其作为一个个体的内心情怀。习惯于在历史进程中将个人作用置于“螺丝钉”地位的国人，对于西方人普遍看重的“英雄史观”，必定有不理解之处。[103]

调动部队的命令下达了。第20集团军继续向高黎贡山纵深攻击，第11集团军所属部队则沿怒江东岸向预定渡河点秘密运动。为迷惑日军，我军还实施了佯动，使敌难以摸清我主攻方向。在松山至怒江坝新成一线，我军不断实施大张旗鼓的渡江动作，金光惠次郎派刚刚进驻松山才一个多月的野炮第7中队，以30匹马牵引一门“十榴”火炮离开横股阵地北进出击，在松山北面临时修筑的简易道路上折腾得疲惫不堪而无所收获。25日，隶属第71军的新28师一部约二三百人，携迫击炮出现在松山北部10公里处，金光又派出小股兵力在勐梅河与怒江汇流处的红土山（日军称高桥山）阻击，我军稍与敌接战即撤回江东。上述行动在我军战史中未见记述，但战后活下来的日军野炮第7中队小队长木下昌巳、步兵机枪第1中队上等兵早见正则均留下了回忆。[104]

据日军战史，日军第56师团已料到远征军不久将由滇缅公路方面发起新的攻势，其芒市机关也在尽力监听着远征军通讯。后来，芒市机关根据远征军通讯量增大，判断远征军即将自拉孟（含）以

---

〔103〕西方史家认为史迪威有一种强烈的“戈登情结”，希望自己能够像清朝同治年间的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Gordon），在中国训练与统率一支打败太平天国的“常胜军”。因之，史迪威将训练掌握中国军队看做一种投资，意在以此洗雪缅甸战败的耻辱，在异国建立显赫战功，书写个人的传奇历史。被誉为“再造日本”的麦克阿瑟，也有着类似的心态。

〔104〕［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82—92页。

南地区发动新的攻势，但师团未及时采取相应对策。[105]

5月28日至31日：

第71军的首批渡江部队抵达惠通桥南8英里处的攀枝花渡口，开始渡江准备。与此同时，美军第14航空队的轰炸机对日军松山阵地频繁进行空袭。

乘轰炸间隙钻出战壕的日军士兵看到，在怒江东岸的公路上，从保山开来的汽车一辆接一辆，消失在大山背后。接着对面山头上出现了远征军士兵的身影，似乎在构筑重炮工事。这座被公路缠绕的山头，位于滇缅公路707公里路标处，在眺望的日军士兵的眼里，就像日本武士头上缠着的白带子，日语称之为“钵卷”，后来这座山头便在日军战史记录中被叫做“钵卷山”，中方记录中也偶见“缠头山”的称呼。

虽然钵卷山处在日军松山炮火的射程内，但由于我炮兵阵地设在山后，日军无法观察，因而难以进行有效的破坏性射击。

6月1日：

即日，怒江东岸钵卷山后的我军重炮开始向松山试射，炮弹直落日军西山阵地的前沿，射程逐次延伸，炮弹呼啸着掠过松山落在了勐梅河谷地。炮兵出身的金光惠次郎听到爆炸声，判断是我军的“十五榴”重炮，随让传令兵竹内上等兵去通讯班战壕传令各阵地注意隐蔽。

担负松山主攻任务的，是第71军新编第28师。据该师副师长王治熙回忆：“6月1日晨，在炮火猛烈轰击掩护下，第82团（团长黄文徽）、第83团（团长董惠）及师直属部队在攀枝花和惠通桥附近两个渡河点，第84团（团长鲁岂愚）在三江口渡河点一举渡过怒江。”[106]

---

〔10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8页。

〔106〕王治熙：《我参加的反攻松山和收复龙陵之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255页。

新28师司令部参谋盛兆记得：新28师前锋第82团进至攀枝花渡口时，曾对部队作了战前动员。此时，惠通桥附近我东岸高地上的炮兵，开始对松山一线炮击。我进攻松山的兵力虽少，却有两个榴弹炮团[107]和第71军山炮营的支援。在百门火炮的震天响声中，大军开始渡江。十多条橡皮船来回运载，营长翁秀山率领第1营先过江，在对岸掩护后续部队。天上，第14航空队9架中型轰炸机轰鸣助战。虽然是6月天气，怒江的水依然寒冷彻骨。骡马全是泅水渡江，幸而未发生事故。至12时，第82团渡江完毕，随即向北面的松山方向攻击前进。[108]

在以上两位亲历者的记述中，新28师是在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江的。但在师部参谋处任人事少尉附员的刘俊贤的记忆中，部队在前日（31日）下午五六点即在江边待渡，是乘着夜暗悄悄渡江的。次日（1日）拂晓，突袭日军西岸前沿据点滥坝寨，俘获了不少日军。副师长王治熙因曾留学日本会说日语[109]，遂亲自审问这些战俘，才发现这些人没有一个纯粹的日本人，基本是朝鲜人和中国台湾人。[110]

第11集团军突然发动的左翼攻势，令日军立刻陷入被动。据日军战史："此时，第56师团正几乎倾尽全力在腾冲方面与第20集团军激战。在龙陵以南，仅有安部大队（第146联队第1大队）在平戛附近与第76师之一部（前度担任策应攻击的加强团）交战。因此，第11集团军的攻势完全形成攻击第56师团防备之虚，战局骤然紧迫。"[111]

---

〔107〕其实仅为炮兵第10团和炮兵第7团混合营。

〔108〕据盛兆：《滇缅抗日杂忆》，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82页。但盛兆将日期记作6月4日，6月4日清晨为新28师发起攻击日，此时不应仍在渡江。参照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回忆，渡江日应为6月1日。

〔109〕王治熙1929年于中央军校第6期毕业后，又奉派赴日本千叶陆军步兵专科学校留学，1932年毕业回国。

〔110〕据关爱抗战老兵网邓果所做口述史《鲜血铸就的远征——发现老兵刘俊贤》：http://www.ilaobi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ordertype=1&tid=25475。

〔11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98页。

据第71军军长钟彬记述：当军部率军预备队第84团渡过怒江推进至厥坝，以便指挥龙陵会战时，“有感于对松山方面作战通讯不灵，指挥不便，遂将松山之围攻，由新28师刘师长（刘又军）负其全责……”[112]副师长王治熙的回忆是，师部渡过怒江后驻白泥潭，师长刘又军即征得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的允许留在后方，而指令自己代理师长，全权指挥作战。王治熙随即组成前进指挥所，并到距松山南面的竹子坡约四五百米处视察地形和敌情。[113]

据载，师长刘又军经批准留在后方，而指派王治熙代理指挥，是因为身体不佳请了病假。[114]仅从这一细节上，也令人感到第11集团军对松山日军表现出一种相当轻慢的态度。

较多的著述在谈到这一点时，都说是这与远征军对松山敌情缺乏了解有关。即，最初远征军估计松山仅有日军三四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炮一二门。“以为小小松山无足轻重，不攻亦能困死日军”。[115]因此，“第11集团军的作战计划是避免对松山作正面的攻坚战，仅以两个团（第82团、第83团）的兵力，配以东岸强大的炮火，对松山作牵制性进攻。集团军主力（两个多军）则自左翼攀枝花、打黑渡等渡口过江，首先攻占平戛（今平达）、象达、镇安街，进而收复龙陵、芒市，截断松山敌军的补给线，欲迫使敌军主动撤出松山”。新28师参谋盛兆在回忆中证实了这一点。

盛兆认为，“这未尝不是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计划。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作战计划对松山敌军的主客观条件，都作了过低的估计”[116]。

---

〔112〕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1页。

〔113〕王治熙：《我参加的反攻松山和收复龙陵之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85页。

〔114〕彭荆风在其纪实文学《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中记，新28师师长刘又军因病请假。民国史专家胡博提供的资料表明：刘又军原名刘铸军，黄埔第1期毕业。1932年曾因病离队，至1938年方返回军界，改名刘又军。1944年1月由第11集团军参谋长调任新28师师长，可能此期间身体仍未康复。

〔115〕陈剑声：《夺取松山之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59页。

〔116〕盛兆：《滇缅抗日杂忆》，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81—182页。

超链接 4：远征军对滇西日军的情报工作

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后人方知今（其父为第 79 军军长方靖中将）在其《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印纪实》一书中说：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第 56 师团隔江对峙的两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是宋希濂率第 11 集团军进行防守，做出了一定贡献；第二阶段是陈诚任期内，主要是接受美械装备和训练，无其他作为；第三阶段为卫立煌上任后，已经迫近反攻，只能积极加强战前准备。三个阶段的领导人各行其是，却有两个共同的疏漏：

第一，眼睁睁看着松山日军进行阵地工事建设，没有进行干扰；第二，对日军松山的防御措施没有进行充分的侦察。

在反攻准备阶段，宋希濂于 1942 年在大理开办的“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及一年后在昆明成立的“军委会驻滇干部训练团”，均开设有谍报工作班，选拔当地青年，培养了一些情报骨干。后来，组成谍报小组，派遣到敌后搜集情报。然而，由于滇西群众长期以来对滇军龙云部队胡作非为印象恶劣，对远征军缺乏了解和信任，处于对立状态，工作很难开展。获取有价值的情报，往往靠一些偶然性因素。值得一提的事有如下几件：

1943 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属谍报组周炎涵少校一行，在腾冲以北的江苴街活动时，得到一位自称是教书先生的中年男子的主动帮助，提供了一个练习簿，详细记载着腾冲沦陷以来的详情，包括日军部队番号、兵力、装备及城内外工事位置、强度等重要内容。这是对腾冲方向取得的一份重要情报，提供者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未留下姓名。[117]此外，时任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的李嘉祜，于远征军反攻前 20 天，向保山第六区行政公署呈报了一份《腾冲敌情报告书》，较详细地反映了日军在腾冲的军事、政治等情况，亦有一定参考价值。[118]

〔117〕周炎涵：《抗日战争中滇西反攻前夕的谍报工作》，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滇西抗战”，第 189 页。

〔118〕据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 457 页。

在龙陵县镇安街，一位原从事滇缅公路养护工作的爱国青年余在海，主动参加了第71军情报队，并发展几位好友建立了一个情报组。后来，还配合日军建立了镇安区公所，以这一合法身份掩护远征军情报组活动，搜集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1943年端午节前后的一个深夜，根据余在海送出的一份重要情报，远征军第87师第259团第2营第6连杜伯章、屠伯豪游击组，在镇安街东北雷家寨附近伏击了日军一辆汽车，击毙日军7名，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支及部分弹药、文件，在日军中引起很大震动。〔119〕1943年11月18日，由于叛徒张五九、汉奸张岁春等告密，余在海、张德周、赵金开、张小贵4人被日军龙陵行政班和宪兵队诱捕，在严刑拷打未取得口供的情况下，以缴获到的一封密信为依据将4人杀害，割下人头用盐腌过，悬挂在镇安小学门口的照壁上示众。同时，还秘密杀害了他们的8位亲属。此事在当地影响较大，此后远征军利用当地群众搜集情报日益困难。〔120〕

这件事在日方资料中也有披露。据品野实著述，在这次行动前，日军镇安街宪兵队和行政班曾捕获赵常国等5名远征军谍报员，其中2名为女谍报员。在严刑拷打下，两位19岁的姑娘始终没有招供，但日军宪兵军曹在其中一位姑娘的头发里搜到了装在竹节中密写的情报，内容为镇安街日军火炮、机枪、速射炮阵地部署及兵力、通讯设备等情况。后来，日军从汉奸口中得知，这两位姑娘曾进入昆明的远征军谍报培训班，经受过严格的训练，于是将她们送到了仰光的缅甸方面军宪兵司令部，在严刑拷打后枪杀。因为这2名外来的女谍报员的“良民证”，是由镇安区公所区长张德周、秘书余在海等所办，由此事先已产生怀疑。〔121〕

另外，由滇西籍国民党军官朱嘉锡、常绍群领导的“龙潞游击

〔119〕屠伯豪（口述）张组成（整理）：《千军奋勇驱邪恶　我血亦染龙陵土》；李从枝：《忆滇西抗战中遇难的余在海先生》。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90、159页。

〔120〕李从枝：《忆滇西抗战中遇难的余在海先生》，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60页。张国龙：《在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日子——镇安沦陷区回忆》，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185页。

〔12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41—144页。

队”，在敌后积极活动，也获取了一些关于滇西日军的情报。

但总体而言，远征军对滇西日军情报工作是不尽如人意的。正如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对此期间敌我情报工作所作的比较：“我主敌客，理应我灵敌滞。事实上，我军战斗序列、军队部署、师长以上主官之姓名及性格等，敌人都调查得非常详尽，且又相当正确，我们对之不得不惊奇而敬佩。反观我军情报，且多为推测判断之词，良堪痛惜。”〔122〕

笔者检索史料，未发现有关远征军对松山日军掌握情况的记述。据新28师参谋盛兆回忆，第11集团军曾对松山敌情多方进行侦察，但因松山日军戒备森严，只探知一些粗略迹象，而不了解其详细情况。

其实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考量这个问题：当获取敌方情报不力时，那么就应该特别加强反情报能力，即保密工作。而远征军反攻两个月前被日军缴获密码本，却一直未更换；渡江前5天又被日军通过无线电侦听破译，完全摸清了作战部署，实在令人遗憾。与此可以作比较的是，1940年8月20日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第一阶段作战，在正太路全线数百公里地域内，20多个团同时出击破袭日军交通线和重要据点，事先日军却毫无防备。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华北治安战》承认：“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投入巨款方能恢复。”〔123〕

第71军军长钟彬在战后所作的《龙陵会战史》总结中，道出了当时搞情报之难：“第71军驻保山，为了腾龙以至腊戍之情报，非得人民之助，用重赏征求不为功。虽两年余来，对敌军装备、工事位置、强度及敌军动态，尚能熟悉预知，但已至感运筹此种经费之苦。尤以谍报工作本身，因知识过低及技术未精，每为敌间所利用而不自知。”钟彬在这里道出了国军搞情报的最大特点和难处：得靠重金赎买，这笔经费很难筹措；同时，还免不了被“双料间谍”利用。他举了一个例子：据战后调查，龙陵北部三十多公里有个小勐柳乡，远征军从集团军到师级情报单位，在那里布置了5部电台。

〔122〕方诚：《八年抗战小史》，第104页。

〔123〕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上）》，第296页。

但远征军想不到的是，日军在那里也秘密安置了一个情报组，同受那个乡的保长保护，简直就是敌我双方的一个情报交换所！这个保长两头得好处，自在地当起了“双料间谍”。钟彬为此感叹：“故敌对我远征军之行动及国军内容，颇为熟悉，此乃无可讳言之事实。”[124]

方诚归纳远征军情报工作不利的原因，认为“敌军威迫我生活无依、缺乏爱国思想的同胞，不愿为而又不得不为者，予以训练，给予优待，有组织有计划地搜集我军情报。我军对情报，虽也重视，因待遇太低，通讯联络困难，实在难能如愿”[125]。

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家最不了解的地方，正是要付出最大代价的地方。无论是钟彬、宋希濂还是卫立煌，他们在滇西战役中最不能释怀的战场，必然是他们在开战时才开始熟悉的松山。

依常理，第 11 集团军指挥 3 个军实施大兵团作战，只要区分出各军的作战区域即可。松山、龙陵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均为第 71 军担负的攻击区域。对两地的兵力部署，必定是由第 71 军最先拿出方案的，第 11 集团军不会越俎代庖。

果然，第 71 军军长钟彬后来在著述《龙陵会战史》曾披露了这个情况。当时第 71 军确实曾就两种方案进行过比较：

方案一：主力攻击松山，一部攻击龙陵。

有利因素是：交通较便利，补给容易；炮兵火力充分；与第 20 集团军可齐头并进；渡口准备容易，开始攻击时间可早；

不利因素是：企图容易暴露；必须先攻占高黎贡方向的红木树，才能保右翼安全；由南北夹攻松山，指挥不易，难收歼灭之效果。

方案二：主力攻击龙陵，一部攻击松山。

有利因素是：敌感受之痛苦大；可收歼灭战之效；可吸引腾冲

〔124〕钟彬：《龙陵会战史》，第 9 页。

〔125〕方诚：《八年抗战小史》，第 104 页。

方面之兵力，协助右翼第20集团军之攻击，成功胜算最大；有出敌不意之效果；

不利因素是：变更渡河地点，准备时间延长；补给绝对困难；围攻松山之部队，不能受军统一指挥；间隙突击，不利久战。

虽然比较了两种方案，但第71军并不能单独决定实施，因为其行动与其左翼第2军的作战还存在连锁性关系，即：如第2军先攻击平戛，再进攻象达、芒市，第71军就应先攻松山，再攻龙陵；如第71军先攻龙陵，则第2军宜先攻象达、芒市。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作战区域的紧密衔接。因为有这种关系，第71军将上述两种方案呈请第11集团军核定，最终宋希濂确定了先攻龙陵的方案。〔126〕

这样，第71军在兵力部署上就做了如此安排：

以军主力第87师、第88师攻取龙陵，以新28师主力攻取松山；为了加强龙陵兵力，还把新28师的第84团拨给了第88师指挥。本来，第11集团军主力第71军中，战斗力较强的是87师和88师，也是宋希濂任第71军军长时的老部队，但被用在了龙陵方向；投入松山的部队，是战斗力较弱的新28师的两个团。

新28师是由原新29师合并而成的，这两师原来都属于原第66军。说起来又要扯出一段旧事：

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新28师在腊戍与日军一触即溃；新29师奉命前往增援阻敌，以确保远征军的补给线，但是未站稳脚跟也被日军打垮，两师分散溃退回怒江东岸。战后，第11集团军宋希濂召开缅甸战役检讨会议，最后建议军委会，将第66军军长张轸、新28师师长刘伯龙撤职，将新29师师长马维骥撤职查办，同时撤销第66军和新29师番号，将两师残部合成一个新28师，划归第71军指挥。宋希濂也以这一正当理由扩充了个人实力。

新28师虽然划归了第71军建制，毕竟是一个收养的“孤儿”，再加上“败军”的名声，难免处处受歧视。反攻一开始，就被分散

〔126〕钟彬：《龙陵会战史》，第17页。

使用，后来也是在各师“打补丁”。

对第71军的这些情况，就连日军情报部门都摸得很清楚。第36师曾在战场上缴获到一份日军第56师团文件[127]，内中对第71军各师有如此评价：“第88师为第71军著名部队，在兵团正面敌人中堪与第9师（属第2军）比肩”；“第87师与第88师略有同等战力”；“新28师在缅甸作战时，在第66军几受歼灭的大打击而败走”，言外之意自然是轻视。

“死去”的原第66军，唯有一事值得欣慰：其所属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第一次入缅作战中在仁安羌击退日军，解了被围困的英军之危，尔后基本全身而退撤到了印度。在这颗“种子”上生长出的中国驻印军新编第1军，如今在军长孙立人指挥下正在缅北孟拱河谷势如破竹地扫荡日军第18师团残部。

部队不可无荣誉感，败军尤其需要机会洗刷耻辱。此刻，担负松山攻击任务的新28师官兵摩拳擦掌，决心誓报当年缅甸战场的一箭之仇。

6月2日：

至今日，第11集团军全部反攻部队均顺利渡过怒江，如第20集团军在怒江上游的情形一样，在江岸未遭到日军有力抵抗。这再次印证了日军兵力不足，使得第11集团军的将士们信心倍增。特别是担负攻击松山任务的新28师，士气空前旺盛。虽然从滥坝寨至松山一线山坡陡峭，人马难行，艰苦异常，但将士们似乎锐不可当。

我怒江东岸的重炮继续轰击松山，并将试射目标从西山阵地逐步转向音部山和本道阵地。数十门大口径榴弹炮开始急促射击，之后是齐射，大约十几秒后，松山先炸起一片亮点、烟簇，紧接着，亮点变成火海，烟簇形成了烟雾，烟雾直冲云霄。确实是万炮齐发、弹如雨下！

因日军野炮第7中队进驻松山才一个多月，设在横股阵地的防御设施薄弱，其观察所位于西山阵地上，其间以电话联络。该中队

〔127〕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录第三《龙陵情报记录第十四号》。

连一发炮弹都未打出去，电话线就被我军炮击炸断。该中队通信曹长木村英人要去修复电话线，刚跳出战壕即遭我150毫米榴弹炮炸毙，僵硬的右手还抓着电话机的摇柄。

随后，日军利用西山阵地和本道阵地的两个炮兵观察所进行交叉测定，测出了我炮兵阵地的准确位置。基于振作士气考虑，金光惠次郎下令在本道阵地第8中队及西山阵地第9中队的5门105毫米榴弹炮一齐还击。霎时间，敌我双方的炮声震撼松山，在怒江峡谷回荡。[128]

105毫米榴弹炮，日军称之“十榴”，这是松山日军最大口径的火炮了，且只有区区8门。这无疑是一场严重“不对称”的炮战。中国抗战7年来，这是首次在炮火上对日军形成绝对优势。

超链接5：松山战役中的炮兵作战（之一）[129]

参加对松山进攻的炮兵，为远征军直属炮兵第10团（团长胡克先）及炮兵第7团（团长郑琦）混合营，并配属第5军山炮营（欠一连）、第71军山炮营（欠一连）。

据1939年毕业于中央军校炮兵科、时任炮10团第1营第2连上尉副连长的阎启志回忆，当时该团投入的兵力为第1营的第1、2连及第3营的第4、5连，共4个连。所装备的火炮，一部为德式150毫米重型榴弹炮，以汽车牵引，射程为15100米；[130]另一部为刚改装不久的美式105毫米榴弹炮，射程为10675米。5月31日，该团利用雨雾天气进入怒江东岸，每个连间隔千米构筑阵地。这时，松山日军以炮击干扰。因为炮位立足未稳，不能还击，只能暂时利用地形隐蔽。这时，在其左翼已完成阵地构筑的炮7团混合营，立

---

〔128〕［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94页。

〔129〕本节内容，系综合参考阎启志《炮兵第10团滇西反攻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121页）、宋保恒《在松山战役中炮兵的使用》（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80页）等资料撰写。

〔130〕此炮为德国莱茵公司(Rheinmetall)生产的L/32sFH 18型重榴弹炮，1935年中国政府向德国订购，设计采用了32倍径长炮管以增大射程，共订购24门，1936年交付。

刻以12门苏式76.2毫米野战炮对日军火炮予以压制，掩护炮10团构筑阵地作业。入夜，炮10团迅速清理被炸毁的阵地，冒雨构筑工事，做好战斗准备。6月1日拂晓，即开始向松山日军阵地试射。

老兵宋保恒毕业于中央军校炮兵科，时任炮7团第1营第3连连长。据他回忆，炮7团第1营的火炮也有两种，两个连为76.2毫米野炮，一个连为115毫米榴弹炮。当时炮兵均配置在怒江以东惠通桥东北的山地上。宋保恒的连在一个叫做"大山头"的山头东北侧占领阵地，观测所设在大山头的顶部，岩石夹缝空隙里；营观测所也设在附近；其他连队的火炮，全部错落疏散地配置在隐蔽阵地里。炮10团的重炮，因为射程远，也为了避免日军反击炮战的损失，将阵地配置在炮7团第1营阵地的后方东北侧。这些炮兵全受远征军炮兵总指挥部指挥，任务是：配合第71军第28师及后来的第8军作战，密切步炮协同，支援友军围歼松山之敌。

5月初，炮7团即已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架设电线，测量怒江对岸敌阵各目标的距离和射击诸元，搜索敌情，并观察步兵进攻活动的态势。遵照炮兵总指挥部的命令和友军步兵的要求，炮7团第1营担任两方面的任务：第1、第2连的762野炮，因为射程可达12000多米，担任对松山各据点的压制破坏和射击任务；第3连的115毫米榴弹炮，射程约6400米，担任对怒江西岸近距离目标的射击任务。

第1营营长胡春祥指示所属的三个连，在步兵开始进攻之前，炮兵的主要任务是：对沿怒江西岸敌人坚固阵地的摧毁；对敌火力点的侦察和破坏。对敌炮兵的压制和破坏。在正式进攻以前，连续射击七八天，宋保恒的第3连发射炮弹千余发。其时，制空权已入我手，当我空军轰炸敌阵地时，敌炮声就沉寂下来，正便于我方精确射击。

这个时期，炮10团的150毫米榴弹炮，同时向松山顶及其周围的敌阵射击，压制和破坏远距离的目标。这种重型火炮射程远，威力大，起的作用更大。但因该型火炮炮弹较少、珍贵，轻易舍不得使用，只专门对重点远距离目标射击，与炮7团第1营的火炮分工合作，互补不足，协力战斗。

表 5 中国远征军／日军火炮种类用途对照表[131]

<table>
<tr><th>国别</th><th colspan="2">火炮种类</th><th>口径（mm）</th><th>发射速度（发／分钟）</th><th>最大射程（m）</th><th>用　途</th><th>备　考</th></tr>
<tr><td rowspan="8">日军</td><td>大队炮</td><td>九二式平曲两用步兵炮</td><td>70</td><td>约 10</td><td>约 2800</td><td>扑灭或制压步兵重火器</td><td></td></tr>
<tr><td>联队炮</td><td>四一式山炮</td><td>75</td><td>约 10</td><td>约 7000</td><td>同上。但可作射击战车用</td><td>山地小径均可通过近距离可用臂力搬入堑壕内</td></tr>
<tr><td colspan="2">九四式速射炮</td><td>37</td><td>最快约 20</td><td>不详（注：在 1000m 内可贯穿 60mm 装甲）</td><td>主要对战车射击，有时亦可射击侧方机能尤其枪眼炮门</td><td></td></tr>
<tr><td colspan="2">八九式重掷弹筒</td><td>50</td><td>最快约 40</td><td>约 600</td><td>用于冲锋及发起逆袭之阻止，及阵地前死角之消灭</td><td></td></tr>
<tr><td colspan="2">改造三八式野炮</td><td>75</td><td>6～12</td><td>榴弹 8250
增榴 10700</td><td>用于杀伤暴露或掩护下之目标，或破坏障碍物</td><td></td></tr>
<tr><td colspan="2">九四式山炮</td><td>75</td><td>6～12</td><td>榴弹 8300</td><td>适于作配属炮兵与第一线步兵同行动或使用于特殊地形</td><td></td></tr>
<tr><td colspan="2">九一式“十榴”</td><td>105</td><td>6～8</td><td>榴弹 10800</td><td>射击野山炮死角内或掩护下之目标</td><td></td></tr>
<tr><td colspan="2">九六式“十五榴”</td><td>150</td><td>3～4</td><td>榴弹 11900</td><td>射击野山炮死角内或坚固工事，或与野山炮十榴并用增其效果，尤其精神效果</td><td>汽车牵引</td></tr>
</table>

〔131〕据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录第一《滇西敌军一瞥附表第九》，部分火炮性能指标笔者根据兵器专业资料有所修订。

续表

国别	火炮种类	口径（mm）	发射速度（发／分钟）	最大射程（m）	用　途	备　考
中国远征军	美造 M–1 山炮	75	6～8	8787	同日本山炮	
	瑞典造卜福斯山炮	75	6～8	9150		
	俄造 762 野炮	76.2	6～8	旧装 8925 新装 12020	同日军野炮	
	美造“十榴”	105	约 3	10675	同日军“十榴”	
	俄造 115 榴弹炮	114.1	约 2	6390		
	德造“十五榴”	149.1	约 3	15100	同日军“十五榴”	汽车牵引
附记：所列日军火炮中，有些如九六式“十五榴”松山日军并未装备；中国远征军各型火炮均投入了作战。						

远征军老兵董启超，曾任炮 10 团弹药装填手，生前曾留下片断回忆。

1937 年 7 月，22 岁的河北冀县小伙子董启超在天津学织布。闻听卢沟桥事变后毅然从军，被分到了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第一运输大队，在南京修飞机场。12 月 13 日，日军破城，董启超在下关冒死乘船逃脱，身后码头上是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数万难民……刚逃到江西，南京大屠杀的确切消息便传来，董启超和同伴们心如刀绞！

董启超后来辗转到了滇西的芒市，为滇缅公路搬运物资。1942 年 5 月日军从缅甸杀了过来，董启超逃命过了惠通桥再次大难不死。在昆明，中国远征军直属炮兵师第 10 团招兵，招兵军官嫌已 27 岁的董年纪大了不想要，董启超一急脱掉上衣亮出一身结实肌肉，声泪俱下：“长官，我当过 7 年搬运兵，有的是力气，也懂滇西少数民族的摆夷（傣族旧称）话，就想为南京死难同胞报仇！”军官感动了，破例收了这个年龄足以当连长的兵，安排他在第 2 营第 4 连当装填手。

训练近两年就开始了滇西大反攻，炮 10 团隆隆起程往怒江开拔。该团当时装备 18 门 150 毫米德国野战重炮，全以车辆牵引，一

路前进声势浩大。董启超坐在驾驶室里豪情万丈：当步兵一枪才打死一个鬼子，当炮兵一炮就能轰掉几十个，过瘾！部队在怒江东岸“缠头山”后布下阵地，董启超每天光着膀子、举着50公斤重的炮弹跑上跑下苦练，临战前他的装填速度超过了每分钟8发，成了全团的标兵。

6月2日，董启超所在的炮10团率先开火，猛轰对岸直线距离仅6公里左右的松山。一个连3门炮，连长举个小红旗站在土坡上，不时猛挥小旗大喊：“8发急促，放！”“6发间歇，放！”董启超十分明白，“急促”就是要他疯了一样装填炮弹，“间歇”就是歇一会儿再打下一发，让观测员辨认效果修正弹道……50公斤的大炮弹在他手上像没事儿一样，流水般送进炮膛；有时候送得过快，上一发的炮弹壳“叮当”滚出来贴到他身上，“扑哧”一下就烫掉一层皮！

打在松山的近千发炮弹，曾是董启超亲手送入炮膛的。老人说，这是他这辈子最感自豪的事。[132]

6月3日：

即日，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于怒江东岸施甸半坡寨，向各部下达“全衔作命第3号”命令：

……本集团军决以一部先攻腾冲[133]、松山之敌，以主力指向龙陵、芒市行包围攻击。

第71军（欠军搜索营及新28师第84团之一营）配属第5军山炮营为右翼攻击军，应即编组一加强团，于6月3日展开于大石头、连厂、沙子坡之线，6月4日拂晓协同惠通桥我东岸炮兵，向腊勐、松山之敌攻击。该军主力应于6月4日进出于淘金河、咬郎（今绕廊）、蚌渺之线，5日向黄草坝、龙陵行包围攻击。但须注意右侧警戒，至少以一团配置于淘金河附近，并另派一部进出黑水河（镇安

[132] 据2005年6月18日《重庆商报》文章《血战松山 三吨炸药炸飞山头》，罗磊、颜乔撰文。

[133] 第11集团军攻击腾冲部队是指配合第20集团军攻击怒江坝红木树的第6军新39师。

街东 2 公里），破坏该地公路桥梁，截断腊勐与龙陵间之交通。

炮兵第 10 团及炮 7 团之混合营归炮 10 团胡团长指挥，应于 6 月 4 日拂晓，直接协同第 71 军加强团对腊勐、松山之攻击……[134]

这天上午，在我军连日炮击中头晕脑胀的松山日军，忽然看到美军第 14 航空队数架侦察机以极低高度掠过松山，机翼形成的强大气流将山上的松树吹得剧烈摇摆。然而，却不见有炸弹落下来。11 时许，怒江东岸又一轮炮击开始，这回炮弹打得又刁又准，几乎都在堡垒顶部炸响，松山各阵地的日军士兵忙钻入堡垒下层的掩蔽部内躲避——拥有制空权的我军，现在可以利用飞机（应为 L-5 型空地联络机）低空盘旋，引导炮兵进行准确射击。

据载，当日我军炮兵共发射炮弹 280 余发，4 门“十五榴”命中日军长岭岗（应指松山）阵地 4 发，75 毫米山炮命中阴登山阵地数发。日军火炮还击二三百发，我 1 门“十五榴”受损伤，士兵伤亡 3 名。至下午 3 时，日军火炮完全沉默。昨日曾在松山主峰发射的 3 门山炮全天“哑巴”，似乎已被击伤。[135]

日军方面则记述：经两日来还击，到 3 日傍晚时分击毁远征军火炮 2 门；日军方面因阵地坚固，“十榴”火炮并未受到损失。但加大了射程的远征军重炮炮弹，当日已经落在了野炮第 7 中队的横股阵地周围。第 8、9 中队因进驻松山已久，原先牵引火炮的驮马均留在了缅甸腊戌。但第 7 中队因刚刚进驻，其牵引炮车的 30 多匹驮马因无足够的隐蔽空间，临时停放在阵地旁边的公路上，遭远征军重炮轰击后驮马受惊乱窜，被炸断的残肢漫天飞舞。素以爱马著称的日军炮兵，看到这些从日本出征时即跟随自己的战马一匹匹被炸死，禁不住流下了眼泪。[136]

---

〔134〕《第十一集团军怒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 85 页。

〔135〕据卫立煌 6 月 4 日电。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 490 页。

〔136〕［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96 页。

第4章 一战松山

时间：1944年6月4日—7月1日。

指挥：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第71军军长钟彬。

主力：新28师各团、新39师第117团。

进展：夺取松山外围阵地竹子坡、腊勐街及阴登山。

（参阅附图16、附图17、附图21、附图22、附图23、附图24）

6月4日：D日

6时40分，新28师师长刘又军下令："第82团之第3营为右翼，展开于沙子坡一带；第82团之第1营为左翼，展开于小董瓮及5600高地；第82团之第2营为预备队，位置于连厂；第5军山炮营之第8连，在连厂东北端占领阵地，并保持重点于左翼，协同怒江东岸炮10团向腊勐街及竹子坡攻击。"[1]松山外围战斗打响。

姑且让我们将步兵发起攻击的日子，定义为"D日"[2]吧。

"轰轰轰……"天边一阵闷雷滚动，准备发动地面攻击的远征军士兵们感到耳朵里像被东西堵住了。7时许，从西边传过来的轰鸣声越来越响，美军第14航空队的4架B-25中型轰炸机呈菱形编

---

〔1〕张荣校：《龙陵抗日反攻战概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59页。

〔2〕在军事术语中，D日用来表示一次作战或行动发起的那天。同时用H时表示一次作战或行动发起的日期和时刻。D和H，是英文日和时的首字母。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军，在1918年9月7日美国远征军第1军的第9号战地命令中写道："第1军将在D日H时发起以攻击，夺取圣米耶尔角（St. Mihiel Salient）。"

队，慑人出场了。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军就是对这种陆基轰炸机进行改装，由詹姆斯·杜立特（James Doolittle）中校率队，从“大黄蜂号”航母上强行起飞轰炸了日本东京，使美国低落的士气为之一振。〔3〕

美军飞行员并没有听到预期的高射炮声，松山日军早已丧失了对空还手之力。我东岸炮兵则零星开炮，以弹着点为飞机指示轰炸目标。美军大兵嚼着口香糖，从舷窗看一眼机腹下阒然无声的松山，揿下了红色的投弹按键，重磅炸弹连串落下，转瞬间，森林茂密的松山被烟尘和火焰所笼罩。而后，B-25轰炸机编队返航，将这片烟火世界交给了地面部队。

竹子坡，日方战史称原口山阵地，位于松山南侧约4000米处，其北部山头在当时的作战地图上被标为5600高地（以英尺计量的标高）。虽然该阵地是整个松山区域的最高点，但由于距离主阵地较远，一旦被分割包围后将难以救援，因此日军仅留有少数兵力担任警戒，并已预先准备在我军攻击猛烈时放弃，收缩兵力。一年前，第56师团前任参谋长黑川邦辅大佐来松山察看地形时，即有此预案。〔4〕果然，在我炮火猛烈射击下，日军抵挡不住，撤往腊勐街。

腊勐街，如今是龙陵县腊勐乡政府所在地。当年这里本是一块不毛之地，因为滇缅公路经此处绕上松山，便成为旅客休息和用餐的处所，并逐渐兴旺起来。

午后，第82团占领竹子坡。从这里隔腊勐河眺望北面的阴登山（又称鹰蹲山，海拔约2000米），落日余晖照射着日军阵地上重重的铁丝网，闪闪发光。我怒江东岸重炮正向山头轰击，炮弹爆炸后的团团白烟翻滚而起，尘土飞扬。

这时，阴登山后松山主峰上日军的榴弹炮，开始向竹子坡我军射击。东岸我军重炮当即延伸炮火予以压制，一枚枚带着呼啸的炮

〔3〕杜立特率领16架B-25轰炸机于1942年4月18日空袭东京，造成损失并不大，且无法持续实施，是一次报复日本、振奋美国民众士气的象征性军事行动。美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战略轰炸，是在松山战役期间，由驻中国成都的第20轰炸机集团派出B-29轰炸机群于1944年6月16日空袭日本北九州市八幡钢铁基地。

〔4〕［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311页。

弹向敌阵地飞去，松山上顿时白烟滚滚，遮天蔽日。又一波次 B-25 轰炸机编队及时赶到，再次将成吨的炸弹倾泻在松山上。[5] 在我优势火力压迫下，日军再一次沉默了。这给攻击部队将士增添了很大的信心。

阴登山，日军称上松林阵地，为松山主峰南部的前沿屏障，由日军步兵第 6 中队小队长大和幸辅（后由从红木树返回的中队长高桥九州男接替指挥）率兵 60 余名防守，并配备联队炮（75 毫米四一式山炮）一门。此山远看像一座扣着的大钟，山顶有一个约为三十度的缓斜坡，延伸下来是六七十度的陡坡。陡坡森林密布，但山顶缓斜面的树木却被敌人砍光了，用这些木料修筑堡垒，又可扫清射界，日军想得确实很周到。山头上有几个地堡的射击孔，从望远镜里隐约可见。后来攻击部队才知道，这是用以吸引我军火力的伪装。经过十几天飞机、重炮的猛轰，远征军将士以为阴登山上的敌人工事大概摧毁得差不多了。其实不然，除了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的少数几个地堡被炸毁外，其他地堡上虽然弹痕累累，依然没有丧失作用。

当日清晨，昆明《扫荡报》[6] 记者潘世征在保山板桥镇马王屯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用过早餐后，随司令长官卫立煌一行前往怒江东岸观战。由卫立煌亲自驾车作为头车，五辆美式吉普车组成的车队，沿滇缅公路保山至惠通桥段西进。行至老鲁田附近，离开公路驶入左侧的一条便道，前方就是怒江东岸我军重炮阵地观察所——羊角峰（今称羊山）。潘世征在羊角峰观战一整天，以淋漓尽致的笔墨记述了我军步炮协同攻击松山“D 日”的情景。

这里，让我们再从最高指挥部的视角，回溯一番前述战事：

---

〔5〕 据《空军滇西作战日志》载，当日于 7 时、9 时、12 时、14 时各出动轰炸机一批三四架次。据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 2622 页。

〔6〕 前身为 1931 年 3 月由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贺衷寒在南昌创办的《扫荡三日刊》，1932 年 6 月 23 日扩版改名为《扫荡报》。抗战爆发后，该报改隶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迭经迁址汉口、桂林继续出刊。1943 年冬，杜聿明、邱清泉又创办昆明《扫荡报》，仍以汉口《扫荡报》的首刊年月为创始日期，向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登记立案，但经费及人事均由杜、邱负责，社长李诚毅。西南联大学生潘世征系此期间进入报社，任战地记者。

羊角峰上观察所

吉普车开到了便道的尽端，我们就踏上了正在修筑的便道前进。

走了一里路，翻过一个山峰，高黎贡山的雄姿，已矗立在对岸与怒江比美。向下望去，也是见到怒江一角，因为山高，只见灰白色一片，根本听不到江水的波涛。我们所在的地势太险要了。

正想欣赏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忽然传来了“轰”的一声炮声，接着对面山上发出一阵爆裂声。因为面对着记者的正面，还隔着一个山峰，那爆裂声极其轻微。

接着又是一声，随着炮声后面，传入了一阵机轮的声音，从老远传来。

“飞机来助战了吧！”记者正在想，同行的炮兵指挥部李参谋长也脱口说出了，我们都加紧了脚步。

又越过了一个山峰，对面发现一个独立的小山峰，满山是树木，周围不到三公里。

“这就是羊角峰观察所所在地了。”

三脚并作两步，走入了宽仅一尺的小路上。曲径小道，中午太阳炽热的光芒，已被上面的树木荫蔽，向上爬，一阵阵松香的芬芳气味，向记者们的鼻腔中冲入。

将到顶上，炮兵部指挥官（邵百昌）在电话上大声地指挥，最先传到耳中。记者四天前，在×××送别了他，今天在这儿见到，打了一个亲密的招呼。

长官（卫立煌）坐在一块大石上，对着面前的高黎贡山，用望远镜在观察。他问明了我们迟到的原因，继续他的工作。

这时，满山都是将士们。这山峰的形势太好了，有许多的树木和大石，阻挡了敌人的视线，加以炮兵团指挥所建筑的一些工事，更使我们能观察到对方的行动，而对方山上绝对见不到我们。

指挥用的电话，就在长官坐的大石的附近的一堆大石之间；另一个无线电指挥台就在底下几十公尺的地方，一位参谋正在大声地叫，他在对下面营连部指挥。指挥声，谈话声，行走在松叶上的窸窣声……间或传来的大炮声，使整个山峰合奏出最美丽、崇高的曲子，无以名之名之曰：

“炮兵指挥曲”。

步炮联合进攻的一幕

长官指着对面山上说：“消灭敌人每一个工事。”

大炮又在怒吼了，“轰！”对面一朵白烟，顷刻传来了一阵爆裂声。

也有“咯咯咯”的机声传入了。

“我们的步兵又在进攻了。”

邵指挥官打完电话，走过来了，他指着长官面前的地图，拉着记者说：“我指给你看，这是松山，这是阴登山，两山中间是大垭口，后面是长岭岗。你看，”他指着前面的山说，“那是松山，这是阴登山，我们的队伍，就在攻打这两座山头。”

“今天早上我们还在山脚下面，昨日占了腊勐，今天早晨就向腊勐街、沙子铺（即沙子坡），又攻上了竹子坡。敌人的工事，一个个都在炮火下被破坏，步兵就英勇节节前进，现在已向阴登山进攻了。”

对面的机枪声又传到了这边来。

长官在望远镜中发现了对山敌人的铁丝网，他说：“这东西闪着光，消灭它，好让我们步兵进攻。”

无线电传达了命令，发现铁丝网旁边的敌枪炮阵地在射击。

炮×团的胡团长（炮10团团长胡克先），他的部下正是在攻击的，他刚接到友军报告，于是他在命令了：“我们的步兵向阴登山进攻了。注意，各人攻打敌人的据点，当心打着自己人。把所有的据点完全破坏。”

电话中的报告：“据点很多，正在一个个向上打，在破坏它。”

邵指挥官对记者介绍说：在昆仑关作战的时候，敌我步兵相距很近，很难发射。我自己修正了许多弹着点，先从敌人的据点一点点向外退，这样敌人的工事全部被毁，没有伤到一个自己人。

我们大炮的吼声继续着，朵朵的白烟有的正在目标上开放，有的打到了偏斜的地方。

“打炮是一半技术，一半运气，”邵指挥官继续说，“上次在别的战场上，有一炮打偏了，刚好打死了一个联队长。”

忽然“轰”的一声，在视察所的下面爆炸了。

有人叫了起来："敌炮！敌炮！"

"快发现它在什么地方。"

记者正在看一个测远镜，周高参跳了过来："我来找它！"他旋动测远镜在搜索。

不到一分钟，胡团长报告了："发现了。"

"我们集中打它。"邵指挥官命令。

炮兵指挥曲

在无线电指挥台旁边，一位参谋不停地在发出呼号：

"喂！喂！Gox，Gox，阴登山下面已被我们占领，阴登山下面已被我军占领；阴登山上面可以打，大垭口可以打；阴登山上面可以打，大垭口可以打；阴登山下面不可打，阴登山下面不可打；快消灭敌人阵地，快消灭敌人阵地！"

炮弹落在阴登山上面，发着朵朵白烟，差不多全在一个据点上。

过了一会儿，又在喊了：

"Gox，Gox，我向你报告，我向你报告……"

"第一点，向阴登山左边六十五公尺射击，向阴登山左边六十五公尺射击……

"第二点，向阴登山射击，向阴登山射击；你有什么报告，在××点××分报告；你有什么报告，在××点××分报告；再会，再会。"

美摄影员（潘世征在文中记为"柯达德"）来了："请你摄一张照片，仍用在发电时的姿势。"于是他们仍以发电时的姿势，拍摄了一张照片。

不久，时间到了，又开始了指挥："Gox，Gox……"

"第一点，奉长官命令，贵团今天无论如何要将阴登山确实占领，确实占领。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没有，确实就是确确实实，听见了没有，我听你的回话。"指挥仍是每一句重复的，接着他听取了对方的回话，他又喊了："Gox，Gox，对了，对了，OK，OK。"

"第二点，贵团（第82团）山炮连，无论如何要推进到××高地。听见了没有，我听你的回话。"

"……"

"Gox，Gox，对了，对了。第三点，你们步兵推进到了什么地方，要立刻告诉我，要立刻告诉我。"

"……"

"Gox，Gox。对了，请回答，第三点，我等你回答。"

又重复地把三点报告了一遍，听到对方确实完全听清楚了才结束了这一幕。

但是又在几分钟以后，另外几个要点，又在指挥了。

"Gox，Gox，喂！喂……"

……

消灭"松山炮兵"

建设了两年的敌松山炮兵，地点正在惠通桥的西岸山峰上。两年来，敌寇养精蓄锐，准备作为进攻我滇西的据点。他以为利用优良地势，众多大炮，可以凭险固守，灭尽我怒江的战士。

哪知突然出动的我国远征军，分十几个渡口渡江西进，分散了敌人的视线，敌一部分大炮不得不派向惠仁桥、双虹桥去救援。

敌人更梦想不到的是，在每一次炮战发动之后，他的大炮，必为我们更多的、射程更远的各种炮弹围攻，使他溃退下去。

毕竟在6月2日的拂晓，远征军又向惠通桥正面来挑衅了。

"他妈的，我神明的子孙，天皇的大炮，不向你们攻打，你们倒太岁头上来动土。他妈的，他妈的，打，打，打，死命地打，一天内灭尽支那炮……"

我们可以用事实来证明，这是敌松山炮兵指挥的咆哮。我们这一天，仅是试炮而已，却想不到敌人大发脾气，这一天发炮的数量，我们发射了一百炮，敌发炮不下四百发。

我们的伤亡是零，敌人的伤亡，明日分晓。

第二天，我们加强了发射的数字，照理敌人应发射更多了，可是我们将近射出三百发，敌人却减到了二百发，对我们的损坏，只有五个弟兄受些小伤——昨天敌人顽强的大炮呢？

"你们退下去休息休息。"

“不，小伤，没有关系，我们要亲眼看见松山炮兵被我打毁，我不去休息。”受伤的弟兄们，有一个脸上给敌人炮弹振起的石子打伤了，他还是在营地中工作。

我们去观战的时候，炮兵同志们已经两天两夜不得休息了，但是，每一个人的精神是特别好的。

一位参谋向记者说：

“我们倘若发现阵地之后，立刻用准备着的远射程山炮集中攻击，我们一打，他们必退。今天早上，又来了四门大炮。他们开始发射之后，又被我们大加围攻，今天上午，敌人已自山下向山头上退却了。”

这时，胡团长收到报告，又向邵指挥官报告了：

“轰！”“轰！”……又是一大阵，几十朵白烟在对面阴登山上同一据点开花。只见我们的进攻，不见敌人的还击。

机关枪声又是“啪啪……”的传送过来，我们的步兵是随时等待每一个良机，去消灭敌人的。

“Gox，Gox……我们向 ×× 射击，我们向 ×× 射击……”

“轰！”“轰！……”

白烟在阴登山和松山上开花。敌人著名的“松山炮兵”呢？

“步炮协同”的午餐

时间已在下午 1 时，我们的炮火老是在松山顶上开着白烟花。

长官坐在大石上像一尊佛像，他看着望远镜对每一朵白烟研究，不时地说出：“好，好，打在工事上了，消灭它，消灭它。”

炮兵指挥官报告：“长官请下山用饭。”

长官对我们的炮弹不能命中时，评述他的角度：

“占领阴登山，我们今天要确实占领阴登山。”

第 × 军何军长（第 8 军何绍周军长，此时该军部队已接替东岸江防）报告了：“请长官下山用饭。”

长官评述着我军进攻的步骤。

有人在旁边轻声地说：“不攻下阴登山，长官不想吃饭。”

……

时间已在下午2时，炮兵指挥部及第×军（第8军）两方面准备着的几样简单而适胃的菜，送到山顶上面。

邵指挥官说："这是步炮协同的午餐。"

地下放上了几张纸，作为"桌面"，大碗小碗，粗碗细碗，放了两桌。长官开始离开大石，走到前面野餐。每一张桌上围了十几个人，有长官部的，有总部的，有军部的，有来观战的美国盟友，有炮兵，也有步兵……记者拥在人群中间，享受了一顿畅快的野餐。同来的那位美国摄影员，还忙着为大家拍摄一张吃饭的纪念照片。

正在吃饭，又来了几位客人，他们是工兵指挥官，滇缅公路上的工程师，美国的一个工程师。他们向长官报告，他们两辆吉普车走错了路，一直向惠通桥方面的路上前进，敌人的几枚炮弹，落在他们汽车的附近。

"敌人也许是专门向你们射击的呢？"

敌人能发觉到，自长官以下这样一大群的高级将领们，是在隔着江在大炮射程之内安静地观战吗？

踏上归途

饭后，大家在休息，准备归去。

飞机又在头上"嗡嗡"作声，一架过去，又来一架。

运输机，我们的。"三架运输机。"上面看见的人报告。

长官站起来看："在哪里，是投粮的吗？"

"今天我机准备来三次。"邵指挥官报告。他又转过身去告诉胡团长，"倘若是他转回来投粮的，快向阴登山发炮，指示目标。"

飞机向东南前进，没有转来。

下午3时许，开始踏上归途，我们这一辆车，走在最后面。沿路上，又给修路的女工和孩子摄了几张照。回到长官部，已是晚上8时许。[7]

滇西的太阳落得晚，此刻的天光才刚刚薄暮。

〔7〕潘世征：《随卫长官怒江观战记》，据其战地通讯集《战怒江》，第39页。

在怒江西岸，激战一整天的第82团在竹子坡构筑临时工事，准备次日向腊勐街、阴登山进攻。第71军山炮营也随步兵到达，在竹子坡选好阵地，进行试射。

深夜11时，第82团团长黄文徽召集战前会议，下达次日进攻的命令。突然，附近传来一声枪响，接着是连发，各种枪声密如连珠。原来，是第7连一位姓李的排长带着一班巡逻哨与前来偷袭之敌遭遇。当时，大约有四五十名日军已经摸到第82团指挥所附近，听到人声便潜伏路边。我一名巡逻兵走近，被敌一军曹跃出用刺刀刺穿胸膛，惊叫一声，倒地死去。李排长在他身后七八步，夜黑看不清，以为他摔倒了，便把右肩背着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甩到左手持着，疾步上前，准备去拉那个士兵。此时，突见一个黑影用步枪向他刺来，李排长往左一闪，右手一把抓在了敌刺刀与步枪枪口之间。他左手打开冲锋枪保险时，日军已经先发了一枪，把他的小拇指和无名指打飞了。他咬住牙关，用3个指头死握住敌枪不放，左手将冲锋枪抵住日军胸膛，一梭子弹全部打进了敌人的心脏。接着，又向隐蔽的日军扫射，我巡逻兵也一齐开了火。日军偷袭被我粉碎，遗尸6具（包括那个军曹），狼狈逃走了。[8]

夜间偷袭为日军作战要务令中突出强调的惯用战术，尤其在处于不利状态时频繁运用。团长黄文徽庆幸自己事先安排了巡逻哨，遂报告师部。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新28师对此并未在意。

6月5日：D +1日

凌晨，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4架向阴登山头俯冲轰炸，重炮团的密集轰击打得阴登山顶硝烟弥漫。

上午9时，第82团自竹子坡向腊勐街突进，守敌二三百人激烈抵抗，被我杀伤甚众，仓皇后撤。中午，部队占领腊勐街，又连续击退敌人几次反扑。无奈之敌遂撤上了阴登山。[9]

第82团乃以第3营攻击阴登山。部队向前开进时，遭到敌炮火

[8] 盛兆：《滇缅抗日杂忆》，第183页。

[9] 同上书，第184页。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3页。

的猛烈袭击，便迅速跃进至山麓，攀藤缘葛而上。沿途树林中都有敌人暗藏的狙击手，以冷枪袭击我军。我前锋以密集火力开路，肃清林中敌人，全营顺利攻至陡坡与山顶缓斜面构成的棱线。棱线以上是寸草不留的山顶，敌主阵地便在山顶中部，距棱线不到100米。我炮兵已作延伸射击，敌阵地上的铁丝网东倒西歪，一片狼藉。

我军两个连在重机枪和迫击炮火的掩护下，向敌主阵地发起了第一次攻击。士兵刚跃出山棱往上冲，便遭到南、北、西三面远近各处敌人暗堡机枪交叉火网的射击，因毫无藏身之处，几十名官兵当即倒在了光坡上，致攻击顿挫。

这次攻击的唯一收获，是发现了一些隐蔽巧妙的敌堡。于是我东岸炮兵再度猛轰敌人，竹子坡我山炮营也对敌据点进行精确射击。但是，当天步兵3次冲击山顶，均未奏效，机枪连连长中弹牺牲，前后伤亡近百人。我军坚守棱线不退，就地连夜挖掘战壕，准备再战。[10]

午后，新28师83团一部自滚龙坡以南迂回行动，于淘金河附近破坏了公路桥梁，占领公路两侧高地，切断了镇安街、龙陵日军向松山增援的通路。据日方资料，“原来每天在两地间行驶联络的汽车无影无踪了。从此，3个月没有支援的孤军作战开始了”[11]。

当晚，日军再次实施偷袭战术，带队者为第6中队小队长大和幸辅中尉。松山被围困后，其所在小队被指定为军旗护卫队兼预备队，并奉真锅大尉之命前往阴登山增援。

深夜12时许，大和幸辅率日军约百人摸出阵地溜下阴登山，又迂回而上，摸到我军后方。我两名步哨未察觉，被日军突然跃出用刺刀捅死，日军而后径直摸到我机枪第3连阵地。

日军听到第82团机枪第3连班长聂正容正在装填子弹的特殊声响（该连用的是老旧的丹麦造“麦德森”M1902式轻机枪），便悄

〔10〕盛兆：《滇缅抗日杂忆》，第184页。

〔1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58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78页。

悄走近，从背后一刺刀将他捅死。排长王保成听到惨叫声，提着冲锋枪走近问道："是谁？"副连长吴俊臣富有夜战经验，他端起"汤姆逊"冲锋枪扫了一梭子，一边大叫："不要问，快打！"他们两人一扫射，大和幸辅便指挥偷袭日军哇哇叫着冲了上来。这时，传令兵王来福把弹匣装好给吴俊臣，一阵猛扫，打退了敌人第一次冲锋。全连的6挺重机枪迅速调向后方，向再次发动冲击的日军猛烈扫射，一瞬间就打死三十多人，大和幸辅也受了伤，忙带着其余日军转身溃逃。听到枪声，从山顶堡垒里冲下来企图策应的日军，也被我步兵打死十余名。〔12〕

日军两次夜间偷袭均被我挫败，但都是因偶然因素被我较早发觉，加之火力强大能迅速将其压制。团长黄文徽再次向师部报告了这一险情，建议通报各部队保持高度警觉。

据原新28师参谋盛兆回忆，第82团团长黄文徽是湖南人，他常用儒家的"智、仁、勇"道德标准以及历史上名将的格言教导部下，抗日的态度很积极。

6月6日：D+2日

第82团再次冲击阴登山。

前番的攻击证明，我空军和炮兵远未能完全摧毁日军堡垒，贸然强攻势必伤亡过大。于是，团长黄文徽下令调来了"堡垒克星"——美式"巴祖卡"火箭筒和M2火焰喷射器。这两者都是美国不久前才研制定型的新式武器。

拂晓，我两具火箭筒和三具火焰喷射器推进至棱线上选定了的位置，全部机炮做好了准备。一声令下，一条条火龙奔向敌人几个主要地堡，数十挺轻重机枪分别对准已发现的敌人火力点射去，瞬间压制住了日军的火力。我步兵乘势冲向敌阵，越过铁丝网。这时，日军纷纷从壕沟中跳出来实施反冲击，敌我双方激烈地展开了近战肉搏。

---

〔12〕盛兆：《滇缅抗日杂忆》，第184页。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记述，日军卫生兵石田富夫回忆，原军旗护卫预备队长大和幸辅曾率队夜袭阴登山遭重挫，死掉三十多人。因此双方的回忆可以相互佐证。第239页。

“白刃战”本是日军优长，所依仗者为其敢死精神及优良的刺杀技术。但面对我兵力优势，尤其是我军士兵手中的近战利器——美式“汤姆逊”冲锋枪，日军战术开始失灵，打一枪拉一次枪栓的三八式步枪此时全无威胁，急红眼的日军士兵挺着装有50厘米长刺刀的步枪急于接近我军，却在“汤姆逊”冲锋枪密集的连射弹雨下纷纷仆倒，转瞬间死伤大半，残余者转身后撤。一场血战奏凯，我军第一次占领了阴登山顶部。

但是，紧接着，从阴登山反斜面以及后面的几个山头上，日军的炮弹、榴弹、枪弹便向我军倾泻而来。已攻占山顶的我军步兵，迅速跳下敌人留下的交通壕进行还击，但日军枪炮的密集轰击压得我军难以抬头，刁准的炮弹和掷弹筒发射的榴弹很多落在了壕沟内爆炸，如此下去必造成更大伤亡。无奈，我步兵又被迫跳出战壕，退回棱线下。

当日，第82团第7连梁连长和第9连李连长阵亡，全团官兵共伤亡50余人。估计日军伤亡也不下此数。[13]

本日，从西南方向迂回的第83团第3营推进至滚龙坡前。如前所述，这是日军本道阵地主要火力射向的背面。

超链接6：松山战役中的中日武器对比

说到远征军的反攻作战，最大的亮点就是中国军队终于“鸟枪换炮”，装备了美式武器，从而实现了自抗战以来首次在武器装备上对日军的优势。“美国出枪、中国出兵”这个模式，用在对日抗战上，大概是最可嘉许的模式。后来，在接受这些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中形成的所谓“五大主力”，在内战中成了急先锋，那是后话了。

配发装备最初也有过一番波折，因为“中国通”史迪威长期以来对国民党军政部的腐败、效率低下印象颇深，坚持不同意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来主持配发武器的事。他的担忧是，这些武器装备被用于扩充个人实力，甚至留下来将来跟共产党打内战，根本到不了远

---

〔13〕盛兆：《滇缅抗日杂忆》，第185页。

征军作战部队手里。在性格倔强的史迪威坚持下，蒋介石只好同意由美方直接把武器发给远征军各军师部队，并由各部队在接收后填报表给军政部备查。多年后，这个问题曾引出美国无视中国尊严、笼络部队军官培植亲美势力等说法，相信读者自有判断。

这里补充一个小细节：有一次卫立煌视察到第20集团军，发现其所辖的第53军（原属张学良东北军）60迫击炮没有按数量配发，经询问得知是被集团军扣留了，于是集合军官说了一番重话："军队是国家的军队，不是谁的私有物，不许厚此薄彼！"后来60炮补发下去了，长期受歧视排挤的第53军莫不感激卫长官，但第20集团军司令霍揆彰却忌恨上了卫，虽碍于上下级关系不敢造次，暗中却没少给第53军"小鞋"穿。[14]

反攻初期，中国远征军实施美械装备的共有6个军（后期扩大到12个军[15]），按编制装备如下：

每军成立一个榴弹炮营，每营配备105毫米榴弹炮12门；每师成立一个山炮营，每营配备75毫米山炮12门；每个步兵团成立一个战车防御炮连，配备战防炮4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迫击炮排，配备81毫米迫击炮2门；每个步兵营成立一个火箭排，配备"巴祖卡"式火箭筒2具；每个步兵营的重机枪连配备重机枪6挺；每个步兵连配有轻机枪9挺，"汤姆逊"式冲锋枪18支，60毫米迫击炮6门（每排2门）及M2火焰喷射器1具。[16]

当时中国军队均为"三三制"，按此计算，全军共有：105毫米

---

〔14〕王理寰：《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77页。

〔15〕宋希濂在《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中，回忆实施美械装备的12个军为：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13军、第18军、第53军、第54军、第71军、第73军、第74军、第94军。并解释，因记忆原因可能有一两个军的番号与当时的实情不符。据郑洞国在《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中回忆，是13个军：第2军、第5军、第6军、第8军、第13军、第53军、第54军、第71军、第73军、第74军、第79军、第85军、第94军。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四厅第一处副处长及厅办公室主任的欧阳秉琰回忆，13个美械军为：孙立人的新1军、廖耀湘的新6军、王凌云的第2军、邱清泉的第5军、李弥的第8军、石觉的第13军、赵公武的第52军、周福成的第53军、阙汉骞的第54军、陈明仁的第71军、韩浚的第73军、施中诚的第74军、牟庭芳的第94军。著者以为后者比较准确。

〔16〕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56页。

榴弹炮 12 门；75 毫米山炮 36 门；37 毫米战车防御炮 36 门；81 毫米迫击炮 54 门；60 毫米迫击炮 489 门；“巴祖卡”火箭筒 54 具；重机枪 162 挺；轻机枪 729 挺；“汤姆逊”式冲锋枪 1458 支；火焰喷射器 81 具（以上不包括军师团各级直属单位的装备）。

笔者还将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装备，与在缅北作战的中国驻印军进行比较，发现远征军一个军的武器装备，仅大致相当于驻印军的一个师。驻印军一个师的装备是：105 毫米榴弹炮 12 门；75 毫米山炮 24 门；37 毫米战车防御炮 36 门；105 毫米迫击炮 36 门；81 毫米迫击炮 36 门；60 毫米迫击炮 162 门；“巴祖卡”火箭筒 108 具；重机枪 108 挺；轻机枪 360 挺；“汤姆逊”式冲锋枪和 M1 卡宾枪各 400 支；火焰喷射器 85 具。[17] 其中，大口径的 105 毫米迫击炮和步兵基本上人手一支的自动步枪，是远征军所没有的。

驻印军确实比远征军“阔”得多，这不但体现在武器装备上，就是外在形象也差距甚大。当 1945 年 1 月 27 日两军在中缅边境的芒友会师时，身穿破烂的布军装、脚穿草鞋的远征军士兵，与头戴钢盔、全身英美军服及单兵装具的驻印军士兵紧紧握手时，都为对方的样子所惊讶：这还是属于同一个国家的同胞军队吗？但是，他们很快就为对方的业绩而互相尊敬：兵力较少的驻印军在缅北歼灭了精锐的日军第 18 师团，而装备较差的远征军以巨大的伤亡代价，将日军第 56 师团及第 2、第 53、第 49 师团各一部从滇西驱逐出了国门。

所幸的是，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还拥有配属作战的炮 10 团、炮 7 团混合营，及美军第 14 航空队的空中支援。虽说装备还不尽如人意，但和国军在抗战前期的装备比较起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拥有同等的物质条件下，容易满足的中国人总是能够创造更多奇迹。有了这些装备，在当时的远征军部队提出了“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的口号[18]，士气受到极大鼓舞，充满必胜信心。

日军第 113 联队编制、装备情况如下：

---

〔17〕王楚英：《中国远征军印缅抗战概述》，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118 页。

〔18〕吴堪：《抗日战争滇西战场亲历记》，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滇西抗战》，第 78 页。

表 6　日军步兵第 113 联队编制、装备情况[19]

部队番号				兵员、武器装备数量
联队本部				约 120 人
步 1 大队				
步 2 大队				
第 3 大队	大队部			约 60 人；步枪 10 支
	步 7 中队			
	步 8 中队			
	步 9 中队	中队部		约 20 人；步枪 4 支
		第 1 小队		
		第 2 小队		
		第 3 小队	第 1 分队	13 人；轻机枪 1 挺，步枪 8 支
			第 2 分队	13 人；轻机枪 1 挺，步枪 8 支
			第 3 分队	13 人；轻机枪 1 挺，步枪 8 支
			第 4 分队	13 人；掷弹筒 3 个，步枪 4 支
	第 3 机枪中队	中队部		约 20 人；步枪 4 支
		第 1 小队		
		第 2 小队		
		第 3 小队	第 1 分队	12 人；重机枪 1 挺，步枪 2 支
			第 2 分队	12 人；重机枪 1 挺，步枪 2 支
			第 3 分队	5 人；为小队之弹药队；步枪 2 支

〔19〕本表系笔者根据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录第一滇西敌军一瞥附表第一《敌五十六师团之编成表》、附表第二《敌军第五十六师团联队编制装备概见表》综合调制而成。

续表

部队番号				兵员、武器装备数量
		第 4 小队		为中队之弹药队
	第 3 炮兵小队	第 1 分队		70 毫米步兵炮 1 门
		第 2 分队		70 毫米步兵炮 1 门
		第 3 分队		小队之弹药队；步枪 6 支
炮兵中队	中队部			
	第 1 小队			
	第 2 小队	第 1 分队		75 毫米山炮 1 门
		第 2 分队		75 毫米山炮 1 门
		第 3 分队		小队之弹药队；步枪 6 支
	第 3 小队			为中队之弹药队
速射炮中队	中队部			12 人；步枪 4 支
	第 1 小队			
	第 2 小队			
	第 3 小队	第 1 分队		37 毫米速射炮 1 门，步枪 2 支
		第 2 分队		37 毫米速射炮 1 门，步枪 2 支
		第 3 分队		小队之弹药队；步枪 2 支
	第 4 小队			为中队之弹药队
通信中队	中队部			10 人；步枪 4 支
	第 1 小队			
	第 2 小队			
	第 3 小队	第 1 分队		13 人；步枪 2 支
		第 2 分队		13 人；步枪 2 支

续表

部队番号				兵员、武器装备数量
		第 3 分队		13 人；步枪 2 支
		第 4 分队		13 人；步枪 2 支

附记：

A. 人员：

1. 联队辖步兵中队 9，机枪中队 3，炮兵中队 1，速射炮中队 1，通信中队 1，共 15 个中队。每队以 179 人计算，共计 2685 人。
2. 每大队直辖炮小队 1，3 个大队共有炮小队 3，以 1 中队计，共 179 人。
3. 每大队部及联队部共以约 300 人计。

B. 武器装备概数：

1. 每步兵中队有步枪 88 支、轻机枪 9 挺、掷弹筒 9 个、枪榴弹筒 18 个。又小圆锹 9 个、小十字镐 33 把、镰刀 9 把、隐显灯 4 个、夜光指北针 16 个、望远镜 9 个。
2. 机枪中队每分队以步枪 2 支计，中队部以步枪 4 支计，共 22 支。
3. 全步兵大队共有步枪 308 支、轻机枪 81 挺、掷弹筒 81 个、枪榴弹筒 162 个、重机枪 6 挺、70 毫米步兵炮 2 门。
4. 联队直辖炮兵中队以每分队步枪 2 支计，中队部以步枪 4 支计，共 22 支。
5. 联队共有 75 毫米山炮 4 门、70 毫米步兵炮 6 门、37 毫米速射炮 6 门、掷弹筒 243 个、枪榴弹筒 486 个、重机枪 18 挺、轻机枪 243 挺、步枪 1026 支。

C. 马匹：

日军在山地作战之师团，除官员乘马外，凡重机枪、榴弹炮、速射炮、通讯器材与各弹药，均为兽力编制。联队每名士兵平均有 3 夫 1 马。

上表是日军第 113 联队在满编时的装备情况。在中国远征军围攻松山前，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已率联队主力增援高黎贡山方向，留在松山的仅为不足一个大队的步兵和野炮第 3 大队，其装备与满编状态差距很大。笔者据综合资料统计，当时野炮第 3 大队的 105 毫米榴弹炮为 8 门；步兵第 113 联队所属主要武器计有：山炮、步兵炮共 12 门，速射炮 2 门，迫击炮 2 门，用航炮改装的防空机关炮 2 门，高射机枪 2 挺，重机枪 8 挺，轻机枪 30 挺，掷弹筒、枪榴弹筒共 90 余支。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远征军拥有制空权，占有武器装备的绝对优势；日军赖以顽抗的资本，主要是其异常坚固的堡垒工事、合理的火力配系、优良的单兵战术素质，以及战斗到最后一人也不投

降的超强战斗意志。

6 月 7 日：D+3 日

从西南侧迂回的第 83 团到达攻击位置后，新 28 师重新调整部署：

以第 82 团继续攻击阴登山，并进出小水洞、松山之线；以第 83 团（欠第 2 营）附工兵一排，除以一部对镇安街方向警戒，将公路破坏外，其余则展开于汪家寨、核桃箐之线，向大垭口、滚龙坡攻击，尔后进出松山、邦掌之线；以第 83 团第 2 营为预备队，分置于松坡头、马鹿塘（在连厂附近，与最后的围歼阵地不同）两处，并向竹子坡 5600 高地派出警戒。[20]

第 82 团以两个营兵力，再次向阴登山发动猛攻，摧毁敌地堡数个，占领了前沿阵地。日军再次反攻，失而复得者再，但这一天总算站稳了脚跟。[21]

经深入观察，才知道日军堡垒是何等的坚固。有一个地堡是被飞机投下的重磅炸弹直接命中炸毁的，四五米深的上下结构，还约略可见。泥土中埋着残断的近两人合抱的大圆木，还有扭曲的 3.2 毫米厚的铁板。有些地堡虽然被 105 毫米榴弹炮直接命中，并没有坍塌，只打破了一点“皮”。

日军的顽强也是惊人的。被迫撤出阵地时，一个日军小队长腿被炸断，我军迫近时，他竟用刺刀自杀。一段只有四五十米的交通壕内躺着敌我两军上百具尸体，时届盛夏，臭气熏天。这里是唯一可以在争夺战中隐蔽的地方，也是敌我炮兵反复集中轰击的地方，因此这里既是求生之所又是葬身之地。由于死者太多，战壕已宛如一条血河。

第 83 团切断滇缅公路后，从西南方向向日军滚龙坡阵地发起攻击。

滚龙坡位于阴登山西南，是一道南高北低的狭长山梁，公路在山梁上蜿蜒通往大垭口，左右两侧是云蒸霞蔚的勐梅河、腊勐河深

---

〔20〕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 43 页。

〔21〕盛兆：《滇缅抗日杂忆》，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185 页。

谷，状如一条在云雾中滚动的长龙。此地距离日军主阵地松山主峰直线距离约2000米，是比主阵地海拔略高的独立阵地。自从日军放弃了腊勐河对岸的竹子坡阵地后，这里就成了最高点。

滚龙坡上的日军本道阵地，由日军步兵第2中队长井上要次郎中尉率步兵约100名、炮兵40名守备，配备“十榴”火炮2门。井上深知，如果远征军占领了滚龙坡，松山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故拼死抵抗。据活下来的炮兵曹长小笠原光雄回忆：“攻上来的敌步兵就像蚂蚁一样，打倒一个又上来一个，没有中断。攻到阵地前来的，马上朝天发射信号弹，接着就是一群炮弹打过来，这样的来回每天不知反复多少次，敌兵还是不停地拼命往上攻。”[22]

6月8至10日：D+4至D+6日

8日晨7时，第83团再次向滚龙坡攻击，恶战至中午12时，占领距离滚龙坡200米的南部高地。

当晚，新28师前指命令第82团、第83团两团分别编组突击队，由连排长亲自带队夜袭敌堡垒。这天是农历五月十八日，虽然时有骤雨，但风停雨歇浮云散去时，月亮皎洁明亮。突击队员手持冲锋枪、机枪，背着炸药包、爆破筒，凭借山林的掩护，在泥泞中匍匐潜行。但刚进入日军射界内，就踩上了地雷，敌堡垒工事里立刻射出密集的轻重机枪弹雨。突击队员纷纷仆倒，毫无目的地放枪滥射，激战至天亮，没有任何进展。

据载，日军在上松林阵地（阴登山）配备有联队炮（四一式75毫米山炮）一门，面对攻击至近前的我军，常用榴霰弹施以“零距离”射击，对我威胁极大。所谓“零距离”射击，即炮弹采用瞬发引信，出膛约15米后即行爆炸，炮弹内装填的270颗钢珠形成扇形弹幕，对前方100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杀伤。由于威力巨大，日军炮兵在近战中经常使用。[23]

---

〔22〕［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05页。

〔23〕同上书，第96页。

9日夜，又令第82团、第83团于次日再行总攻。激战至10日14时许，各部亦了无进展，战事陷入僵局。[24]

然而，自6月5日以来，龙陵方向第71军主力的进展却颇为顺利。第87师第259团（团长聂率淮）于5日至9日连克黄草坝、南厂（又做赧厂）、文笔坡；第260团（团长贯鸿儒）亦于9日下午3时夺取镇安街西南部的大坝村，歼敌70多人，俘敌士兵3名，仅十余名日军溃兵逃入龙陵。[25]由松山至龙陵之间的公路，完全被切断。大坝为松山日军弹药和军需仓库所在地，我军缴获汽车7辆、骡马四五十匹、物资仓库十余座。至此，拉孟守备队与龙陵日军主力彻底阻绝联系，处于我军四面包围之中。大坝之战为第71军渡江以来首次歼灭战，对部队士气鼓舞很大。

第11集团军为早日肃清松山之敌，消除对攻击龙陵主力的侧后威胁，遂电令第6军新39师第117团（团长江望山），将怒江东岸江防移交前阶段在红木树之战中损失较大的第115团缩编之加强营，即开至松山附近，归新28师指挥，参加攻击松山。[26]

这是我军攻击松山第一次“计划外”增兵。

6月11日：D+7日

鉴于龙陵方面情势严峻，日军第56师团即日命令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率联队主力自腾冲南下增援龙陵。[27]

在滇西战场上，松井秀治扮演的角色可以称为“战场消防员”，哪里有危机就扑向哪里。这倒与后来远征军第8军副军长李弥担当

[24]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3页。

[25] 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据守镇安街的日军为第113联队第2大队（原田大队）留下的兵力约150名，在远征军包围攻击下，大部战死，仅十数名逃至龙陵。见第99页。品野实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披露，镇安街日军包括行政班员原尾繁中尉率领的约75人，第7中队小队长有江英雄少尉率领的50余人。经4天抵抗后奉命出逃，前队逃出原尾繁中尉、香月助军曹等7人到龙陵；后队因未收到命令大部分战死，仅有少数逃出。但逃到龙陵后，也大部战死。第144—147页。

[26]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3页。

[27]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1页。

的任务有几分相似。如果抛开感情因素，这位松井大佐也称得上是一个“能将”。据第 113 联队补充兵品野实的回忆，这年他大约 50 岁出头，矮小的个子，脚上穿着士兵常穿的分趾胶鞋，拄着拐杖和士兵一道爬山行军，看上去像个农村老头。他“虽然一丝不苟，很严格，但对士兵和善而被敬慕”。

国内很多记述松山战役的“纪实文学”，都一厢情愿地说这个松井大佐也殒命松山了，笔者也希望如此，然而确实不是这样。后期他一直在龙陵指挥作战，急切地想通过个人努力把松山的部下救出去，最终未能如愿。第 56 师团长松山祐三乃至第 33 军司令官本多政材都严令拉孟守备队死守到底，他也不敢发话让他们突围，最后只能看着部下白白送死。说起来，他也是个悲剧性的日本军人，尽管 8 月 1 日军部还给他这个联队长破格晋升了旅团长或步兵团长才享有的少将军衔[28]，不过是给个重帽子压着他继续进行无望的苦斗。

松井秀治战败后回到了日本。有些在松山战役中幸存下来的日本老兵知道他也活着回来的消息，都怨恨于他的见死不救，不愿意见他。[29] 1957 年他出版了战地回忆《波乱回顾》，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负疚心理：“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拉孟，那是我和部下一起倾注了心血构筑的阵地。不，应该是我和部下们埋葬自己尸骨之地。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因缘让我没能葬身于那里；如果可能的话我想再去一次拉孟，去祭奠我阵亡的部下和烧掉的军旗，但这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了……”[30]

1966 年，松井秀治郁郁而终。

新 39 师第 117 团于当日奉命归新 28 师指挥，从红木树附近渡过怒江后，派人与新 28 师多方联络，却一直未接上头，只得循着隆隆的炮声南下向松山接近。

---

〔28〕任命为缅甸方面军直辖之独立混成第 105 旅团长，在滇西战事未完成前未到任。
〔2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40 页。
〔30〕据［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 86 页。

6月12至13日：D+8至D+9日

12日，金光惠次郎看到东南方（大垭口、滚龙坡）的远征军阵地上有一些骚动，似乎是在为后续战事调整兵力；北部阵地前（黄土坡）则相对平静，没有战事。[31]

据载，6月3日傍晚，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在高黎贡山相膊子（即象脖子）决定，令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第4中队长辻义夫大尉、第6中队长高桥九州男大尉、速射炮中队长古手川舆一大尉、联队炮中队小队长福田国夫中尉等负伤军官，率第4中队一个半小队、速射炮中队主力及前段战事受伤者共约300人返回松山，加强拉孟守备队的防御。[32]由于兵力不足，金光惠次郎于12日将一部分轻伤员配备到了前沿阵地。

据后来活下来的日军第1机枪中队上等兵早见正则回忆："我跟随松井联队长反击中国远征军进攻时，在高黎贡山进行了战斗。后来我奉命护送伤员到拉孟后，又返回去追赶撤往腾冲的本队。刚过龙川江就被包围了，又被迫返回拉孟，接着就卷进了松山的全军覆灭之战。"

最初，松山与龙陵之间有电话相通。这天，我军的炮击炸断了电话线，日军第56师团与拉孟守备队的联系只有靠无线电报了。[33]由于战局处于白热化，双方的电波都在空中穿梭，通讯联络十分困难。

13日，新39师第117团由开抵勐梅河北岸蚂蝗箐，下午3时经过邦别寨时被日军敌发现，敌发炮五六发，该团伤亡副官、马夫各一人及驮马一匹。[34]

当日，新28师派出小股兵力在当地向导带领下，破坏日军由黄土坡至大垭口、阴登山的供水管。[35]

---

〔31〕［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64页。

〔32〕［日］松井秀治：《缅甸从军——波乱回顾》。转引自《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第150页。石江辉译文。［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99页。

〔3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79页。

〔34〕黄杰：《滇西作战日记》，第155页。

〔35〕《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第89页。

6 月 14 日：D+10 日

即日，第 117 团与新 28 师取得联络。在尚不熟悉战场态势的情况下，于午后 3 时向日军松山（1、2 号高地）、横股阵地（马鹿塘）攻击。

据日方记载，“在中国远征军猛烈攻击下，上松林（阴登山）、本道阵地（滚龙坡）处于苦战中。中国远征军新 39 师第 117 团又南下增援，开始对拉孟北面的主阵地松山和横股阵地进行攻击，有力地增援了损失惨重的新编 28 师。”[36] 然而，第 117 团的损失也较大。

新 28 师研究决定于明日再兴攻击，部署为：

以第 82 团仍向阴登山攻击；以第 83 团仍向大垭口攻击；以第 117 团一部展开于坪子地东西之线，由北向南围攻松山之敌。工兵连、特务连及第 83 团之第 5 连为预备队，位置于松坡头、沙子坡及长箐各地附近；以炮 3 连（欠 2 门）仍置于 5600 高地，协同各部队之战斗。[37]

在步兵进攻难以进展的情况下，远征军唯有继续加强炮火打击。怒江东岸远征军重炮二十余门，对松山阵地和本道阵地进行了连续几天的猛烈轰击。据载，松山日军第 113 联队的两门山炮及野炮第 3 大队的几门 105 毫米榴弹炮当日被炸毁。[38]

这天，阴登山阵地的日军卫生兵鸟饲久一等兵被炮弹炸飞的木头击中腹部受伤撤下，此前一直待在联队本部医务室的石田富夫兵长被派往阵地接替。石田富夫记得，那时不管白天黑夜中国军队都在炮击阵地。夜晚，每打十发炮弹，就打一发照明弹将阵地照亮以便观察。日军阵地上的几门炮虽然偶尔也开炮回击，但却对付不了弹药充足的中国远征军。

当时，军官给卫生兵石田富夫发了一支三八式短步枪，伤病员还把身边的手榴弹凑了三四颗给他。当他进入阵地的时候，看到阴

---

〔36〕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58 页。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 43 页。

〔37〕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 43 页。

〔3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79 页。

登山阵地上只剩下了第2机枪中队附进藤定少尉带领的20多个人。

超链接7：松山战役中的炮兵作战（之二）[39]

炮兵第7团第1营第3连连长宋保恒说，当步兵发起夺取敌阵的激战时，炮兵的射击也最紧张激烈，与步兵的协同动作更加紧密。特别是要用炮队境、望远镜仔细观察战斗的进程和步兵攻击敌人各阵地的动态，适时取得密切联系，根据友军的需要和战场的变化，及时将炮火延伸到最需要的部位。这时主要的射击任务是：对步兵进攻的密切支援；配合步兵占领敌阵要点；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压制敌人的各项活动；按友军要求，随时将火力射向他们所指示要求的目标。

这时期，任务特别繁重，发射也非常猛烈，常常连续发射两三小时，几乎每天发射多次。连长宋保恒在"大山头"岩石后面的观测所指挥，观测着全连射击的效果，根据弹着点，不断修正射击诸元。观测员黄定鼎精密计算数据，做宋保恒的助手，通信员把宋保恒下达的口令传达到阵地，副连长胡臣卿在阵在上高呼，传达着宋保恒发出的口令，4门火炮怒吼着，把炮弹倾泻到日寇的阵地上"轰轰"开花，摧毁杀伤着可恨的日寇。看到自己指挥的火炮轰击敌寇，又帮助友军攻克一处处阵地，消灭一批批敌人，宋保恒心情特别激动，全体官兵特别欢快，情绪高涨。虽然昼夜坚守在阴湿的观测所和阵地上，但心情是很兴奋愉快的。

在宋保恒他们对日军射击的同时，日军的火炮也偶尔向我阵地和观测所射击，而且射得很准，很猛，我人马都有伤亡，第1连的火炮被打坏了1门。宋保恒所在的观测所，因为在"大山头"的突出部，挨敌人的炮弹也最多。

有一次，激战后将要入暮，正要吃饭时，宋保恒又观察到日军发射的炮口火光，知道敌人又发射了，立即传呼："又响了，快躲！"大家不约而同，飞快地躲入观测所的石洞里。刚一进洞，外

---

〔39〕本节内容，系参考宋保恒《在松山战役中炮兵的使用》（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80页）一文撰写。

面“咔咔”两声，连续两个炮弹落在刚才大伙吃饭的洞口，接着猛烈爆炸几十发炮弹，全落在左右不到40米的山头上。当射击稍稍缓和后，宋保恒到洞口一看，刚才的饭桶、碗筷，全都被炮弹打碎、打飞了。

紧接着，炮7团混合营和炮10团的火炮，连续对准敌刚才冒出炮口火的地方集中发射，猛烈还击。

宋保恒他们在“大山头”的阵地上，连续用炮火和敌人战斗了二十多天，共发射两三千发炮弹，摧毁松山外围敌人的防御工事，掩护新28师攻击。

6月15至16日：D+11至D+12日

15日，新28师以第82、第83团和第117团再次发动攻势。当日大雨滂沱，部队冒雨猛攻。第83团第3连连长张振清身先士卒，率部一举占领阴登山侧防小堡垒3个。[40]当晚，第117团第1、2营自坪子地向上攻击，破坏敌障碍物四五道，离山顶仅60米左右。[41]

至16日夜，又变更部署：以第117团占领松山山腹之一部，为右翼攻击队，对当面之敌，行牵制攻击；以第82团（附第83团第2营欠第4连、工兵一排），为中央攻击队，重叠展开于阴登山之棱线及山腹，待炮兵将敌之工事及障碍物破坏后，一举突入敌阵地而占领之；以83团（欠第2营）为左翼攻击队，亦向当面之敌，行牵制攻击。同时令山炮第3、第8两连，于次日晨7时，先开始破坏阴登山东北、东南部敌之工事；9时以后，待步兵攻击开始，再向西北、西南山顶轰击，阻止敌之增援。[42]

据日方记载，此时中国远征军利用已控制阵地，逐步减缓了攻击节奏，前沿兵力一周轮换一次，企图以疲劳战拖垮日军。日军守备队士兵只得冒着雨淋，缩在泥泞的战壕里，待远征军接近时再开枪还击，勉强撑持在阵地上。[43]

---

〔40〕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抗日战争龙陵纪事》，第92页。

〔41〕黄杰：《滇西作战日记》，第155页。

〔42〕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3—44页。

〔4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0页。

交战中的中日士兵并不知道，就在这两天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让持续争战7年的两个国家愈加看清了战争的前景：

6月15日，美军第20轰炸机集团的92架B-29“超级空中堡垒”轰炸机从印度飞到中国成都[44]，在成都加油后以68架飞往日本。长驱2600公里后，首架B-29轰炸机于午夜前飞抵目标——日本北九州市的八幡制铁所，数千吨炸弹倾泻而下。[45]八幡是日本的钢铁基地，产量占全国的1/5，炼铁炉占全国的76%。美军对日本的首次战略轰炸选择此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46]北九州市属福冈县，而福冈县正是日军第113联队的编成地，也是大部分松山日军的故乡。

战火终于烧到了日本本土。

昭和19年6月16日，日本大本营发布当日战报：“下午2时左右，北九州一带遭到来自支那方面的B-29轰炸机的袭击。”虽然战报仍然一如既往地宣称，“我防空部队予以还击，击退并击落数架敌机，我方仅有轻微损失”，但当地的新闻报道却告诉市民：“敌B-29轰炸机初次轰炸北九州，造成226人死亡，重伤151人，轻伤225人，另有41人失踪。我防空部队还击时仅击落敌机一架，且是在友军战机协助下才击落的。”

在去北九州市门司区每日新闻社西部总社上班途中，23岁的该社记者品野实目击了B-29空袭投下的“地狱之火”，心头震撼莫名。不久，每日新闻社从军方借来被击落的B-29残骸，在各地举办展览会。但在品野实看来，此举与其说是要激发日本人的同仇敌忾之心，不如说是告诉素有“技术崇拜症”的日本国民：这就是性能先进的超高速B-29巨型轰炸机，日本已不可能应对这样的战争力量！

---

〔44〕在1943年11月的开罗会议上，决定美国空军B-29战略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四川省动员成都附近45万民工，包括女人与幼童，兴建飞机场9个，其中4个有9000英尺的跑道。所有建筑工程全不用机械，碎石用手槌成，镇压滚石以数十或成百民工拖拉，泥土以竹箕及独轮车搬运。开工60日后首批“超级空中堡垒”降落，90天后所有机场如数完成。1944年美军占领塞班岛后，于11月建成新的战略轰炸机基地，成都基地即失去价值，因为成都基地轰炸机所用油料弹药均从印度运来，航程长且需飞越“驼峰航线”，成本太高。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67、276页。

〔45〕［美］约翰·托兰：《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第815页。

〔46〕［日］前田哲男：《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第362页。

一个月前，品野实接到了被称为“红纸”的入伍通知单，让他必须于 7 月 25 日到福冈联队报到参加新兵训练。不久，品野实了解到，他被分配的部队叫做“西部 6734 部队”（第 113 联队征兵区代号），这支部队如今在中国云南陷入了“苦战”的泥淖。作为该部队的补充兵员，品野实将与其他 2400 名[47]来自福冈、佐贺、长崎的新兵去填那个“血肉之坑”……[48]

超链接 8：龙陵危机：松山侧背的惊险一幕（之一）

话说，继第 20 集团军从右翼反攻腾冲后，卫立煌断然决定再挥出一记“左勾拳”，令第 11 集团军从左翼全线出击攻击松山、龙陵、平戛。至 6 月 5 日，第 71 军的第 87 师、第 88 师已经从西北、东南迫近龙陵城郊；随后以部分兵力切断公路，对芒市、腾冲方向分别进行警戒。

虽然日军第 56 师团对这一攻势有所预料，但是没有料到来得这么快，一时惊慌不已。因为此时其主力几乎全部在腾冲方向与第 20 集团军激战，留守龙陵的部队，总共不过 750 人，分别是：第 113 联队第 3 大队和工兵第 56 联队的留守人员共 100 人，野炮兵一个小队 20 人（105 毫米榴弹炮 2 门[49]），连同野战医院、野战仓库的非战斗人员和伤员，合计不过 300 人；配属第 56 师团的第 2 师团第 29 联队第 2 大队（藤木大队）440 人；从镇安街溃败逃来的残兵十余人。以上兵力由大队长藤木隆太郎大尉临时担任守备队长，负责指挥。[50]虽然日军攻占龙陵两年来，以龙陵城区外侧作为复郭阵地，以龙陵周围的高地作为主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但以如此少的兵力来防御，其正面实在是过宽了。

---

〔47〕据日方资料，第 56 师团定员 16620 名，后续补充兵员 2400 员，合计 19020 名。

〔4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3—4 页。

〔4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99 页。但据当事人野炮第 9 中队小队长小林作五郎少尉撰述：4 月 29 日，野炮第 56 联队命令驻松山野炮第 9 中队拨出一门十榴至龙陵，由其任独立炮兵队队长，辖炮手一个分队及段列一个分队。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第 487 页。

〔5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99 页。

而他们面对的是第11集团军第71军的2个主力师：第87师由龙陵西北攻击，第88师由东南攻击。

6月8日，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与第71军军长钟彬一行登上龙陵东南制高点、海拔5000英尺的尖山寺第88师指挥所督战。这天，第88师第263团冒雨组织波次突击，与日军反复争夺9次，攻占勐林坡。团长傅碧人负重伤，官兵伤亡达500余人。[51]尖山寺中有一湖南籍老道，据说也是当过兵而放下屠刀的出家人。该人指点着山下的战场，对两位将军口说旧日战史，杂以笑话神语，直令宋希濂、钟彬以为是方外仙人，忘了此刻正置身枪林弹雨之中。

6月10日，第88师主力攻克广林坡、老东坡、风吹坡、三官坡等外围要点，日军放弃阵地溃逃，其第264团（**团长戴海容**）乘势突入城区。第87师以第259团攻克龙陵老城，入晚，以第2营继续向伪县政府所在地伪县长赵鹏程宅攻击；配属该团的第261团（**团长庚浩如**）第3营向龙陵东南日军据点伏龙寺推进。至此，龙陵城郊各高地尽入我手。据日军战史，此时日军放弃外围主阵地，收缩固守城区外侧西山坡、红土坡、一文字山、中学校、观音寺及东卡各据点。[52]

这天夜里，我一线攻击部队忽然传出了"攻克龙陵"的消息，一时传得沸沸扬扬。第二天清晨就被证明是假消息，日军仍在龙陵城区各据点固守。

至12日，在远征军步、炮兵猛烈攻击下，日军野战医院伤员增加到了400人，连卫生兵也在医院外围投入战斗；仅有的2门105毫米榴弹炮还被击毁了1门，形势的确是岌岌可危。[53]

这一阶段，远征军的进攻固然凌厉，但也让日军感到蹊跷：白天攻击猛烈，然而一到薄暮，即悄然退出。[54]

15日晨发起的又一轮总攻击，又再现了这戏剧性的一幕：伴随

〔51〕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92页。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1页。

〔52〕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92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2页。《陆军第八十七师滇西战斗详报（续）》，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164页。

〔5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2页。原文为"仅有两门十榴，其中一门因伪装网被敌燃烧弹引燃，引起装药爆炸，致使炮位全员伤亡，火炮损坏"。

〔5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2页。

猛烈的炮击，第87师、第88师夺取了复郭阵地一部，继而与日军展开了惨烈的巷战。黄昏时分，第87师一部甚至冲入了位于城中心的日军野战医院内，连日军军医都拿起手榴弹投入战斗。正当日军无力增援，感到龙陵阵地难保之际，天空突然升起了信号弹，远征军攻击部队再次后撤了。[55]

为什么会有如此戏剧性的攻势呢？据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视察龙陵前线后，给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电报称："龙陵收复，本已指颐可期，惟敌工事坚固，绝非步兵兵器所能摧毁；且因连日大雨，飞机既未输送弹药，又不能协力轰炸；兵站输力薄弱，亦不能及时追送粮弹"[56]，因而，他没有下令部队连续进攻。而第71军军长钟彬的说法更具感性："……（15日）竹笋、芭蕉根已由副食的地位，变成主食的要物。更从声嘶力竭的电话中，催运弹药。总要三天以后，始能得到一次攻击最低限度之需求，指挥官之决心纯为兵站分监所支配，以打消继续猛攻之意。"[57]美国出版的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印证了这一说法：当时"飞机用436个降落伞空投75毫米炮弹，另有600匹驮畜往返怒江渡河点与龙陵之间，进行弹药补给。但仍不能满足围攻军的消耗，步兵进攻终告失败"。看来，粮弹不济确实是一个原因。然而，美军战史又指出："第11集团军总司令按照中国军队的惯例，给被包围之敌留出了一条逃路，仅由东、北、西三面攻击龙陵阵地。"[58]

笔者以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面对仅有数百人的日军，宋希濂的思维惯性仍是不要硬碰硬，缺乏攻坚的决心，所以"围三缺一"、"黄昏息战"，他心里期盼的是日军快点从缺口自行逃跑算了，免得自己的这支嫡系部队伤亡太大。

---

〔5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3页。

〔56〕宋希濂6月17日致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电。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3页。另据资料，第11集团军应编驮马大队5个，实编3个（1500匹），请美军兽医协助保育，为远征军兵站主要输力。军政部拨交总监部18个运输兵团，因种种原因逃逸死亡大半。后以9个团并为4个团。第11分监部在保山、漕涧等处囤粮3.8万包，屯弹15个基数。见《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第69页。

〔57〕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3页。

〔58〕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3页。

在这种心情下，就不难理解10日晚那荒唐的一幕：

据时任第11集团军第87师情报参谋的胡薛军回忆："（10日）黄昏时分，遇到敌人顽强抵抗。由于战前侦察工作不细致，黑夜难辨龙陵城区地形，激战6小时后，第87师第259团的攻击部队一进入城区街道，团长聂率淮即匆促向师部报捷'收复龙陵'。当时我同师长、参谋长均在前沿指挥所，第87师师长张绍勋据此立即命我向军部报告：我师已克复龙陵。当即层层上报至重庆军令部，后来听说重庆大小报纸，均以显著标题，登载龙陵我军大捷的消息。孰料翌日拂晓，攻城部队始发现占领的城区是龙陵老城，而主要新城区仍在敌手，为此师长张绍勋认为这是谎报军情，贻误战机，责任重大，极度难过。"〔59〕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龙陵东南方向的第88师当晚也传来了"喜讯"：

"……前方还不通电话，可是后方已把消息传开了。当电话一接通，长官部立即打电话问尖山寺师指挥所，宋总司令还亲自打电话来问我：'龙陵占领了，确实不确实？'我答：'天又黑，又下大雨，我现在就在老东坡阵地上。前线从城内回来的传令兵都说占领了，到处搜索，都没遇到抵抗，他们还带回许多战利品，牛肉罐头、饼干，我都吃过了。电话还未架通，我看是占领了。'于是，宋总司令委派了龙陵城戒严司令，由他率领队伍进城。当我进城部队刚开到城边，却遭到敌人猛烈袭击。后来听说，攻克龙陵的消息当夜即震动了全国，也传到了国外。但听说日本天皇裕仁却一口否认，说龙陵还在他们手中。"〔60〕这是当时任战场指挥官的第88师副师长熊新民的说法。

宋希濂从两个主力师"确认"了这个消息后，兴奋不已。这时，一贯冷静的第71军长钟彬还补充了一个细节：中午11时许，我军正待向老东坡发起攻击之际，日守军六七十人却主动撤离逃

〔59〕胡薛军：《反攻滇缅路的龙陵战役》，黄埔军校网"远征军文史馆"文章：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yzjwsg0013.html。

〔60〕熊新民：《连战皆捷的滇西反攻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90页。

窜；他同时看见由龙陵通往芒市的小道上之篱笆坡有一缕青烟升起，就想，会不会是给日军指示退却路线呢？[61]实际上，这是日军因伤亡过大而收缩阵地，意在固守城区。但宋希濂却确信日军是要放弃龙陵溃逃了，于是马上发电向自己的校长蒋介石“报捷”了。电文如下：

委员长蒋（中正）、总长何（应钦）、卫戍总司令刘（峙）：2979密。

此次我远征军渡江反攻，职奉命为左翼军，已于巳东开始行动。由职亲率71军及第2军主力，分别由碧寨渡、打黑渡渡过。我军向龙陵梓市之［敌］攻击前进，沿途各地之敌均顽强抵抗。但我军士气旺盛，连克腊勐、□□、[62]［镇］安街各要点，鱼日迫近龙陵近郊，均分别围攻，于蒸申攻克龙陵。此役，敌伤亡约数千人，遗尸三四百具，卤获战利品正在清查中。我伤亡团长以下官兵约数百人。刻残敌向龙陵西南溃退，除继续扫荡、确保战果外，谨电呈鉴。

职宋希濂。巳蒸。甸参。龙。印。[63]

由电报抬头可见，这个电报是宋希濂越过顶头上司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直接发给蒋介石的，这显示出“校长门生”非同寻常的特权。电文报告“蒸申”攻克龙陵，即为10日下午3时至5时。[64]事实上此时两军正在龙陵城郊激战，宋希濂显得太心急了点，但这正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太需要这样的结果了。当这个“喜讯”在翌日清晨被龙陵城区东卡钢筋水泥碉堡中的日军机枪声粉碎时，宋希濂和他的两个师长都陷入了极度尴尬之中。恰在此时，美军顾问团长多恩准将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电，更是让宋希濂、钟彬

[61] 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2页。

[62] 档案原件因印刷问题漏字，有的资料记做“平戛”。

[6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2页。

[64] 自清政府开通电报业务至民国时期，因发报以字论价比较昂贵，遂采用以十二地支代月；以30组共106个韵目字代日（军方应用时有两个特例：30日按规定该用韵目字“陷”，但因于军队不吉利，便以“卅”字代替；又以“世”或“引”代31日，因“世”字大致为“卅一”两字合写，用“引”字则因其很像阿拉伯数字31）；以十二天干计时辰。仅用三个字即可大致表示准确时间。如“巳蒸申”，即为6月10日申时。

羞惭得想挖个地缝钻进去。[65]

但是，对第71军而言，灾难才刚刚开始。

对日军第56师团而言，虽因应对高黎贡方向远征军第20集团军的大举攻势，将第113联队由松山、龙陵北调，致使龙陵兵力枯竭，但是龙陵却是必守的枢纽要冲。一旦龙陵失守，不但北面的腾冲和东面的松山日军将彻底被孤立，而且西面第56师团司令部驻地芒市也将暴露于远征军正面当前。因此，第56师团根本没有弃守龙陵之意，正紧急从各方调集兵力予以增援。[66]

自11日始，从腾冲沿腾龙公路南下的松井部队主力（松井秀治指挥的第113联队第2、3大队）约1500多人，携火炮7门，中途结合汽车运输，向龙川江上的咽喉要津腾龙桥疾进，于12日夜全部抵达龙川江畔。此前，第87师曾分别两次派兵配合工兵破坏腾龙桥，部队竟然因未携带炸药而未能成功。[67]14日，第56师团派来的长滗中队到达，入列松井大佐指挥下。下午3时，松井部队逐次攻击龙川江东岸我第261团第1营阵地，扩大桥头堡。

那乃是龙川江东岸腾龙公路上的一处要隘，位于腾龙桥东南约2.5公里，由第261团第1营第3连据守。据载，日军未过桥前，即有群众向该连罗连长报告："有大量日军向龙陵开来。"该连长不信。第二次又有人报告："敌人已渡江向那乃来了。"该连长仍不信。在该连吃饭时，第三次有人来报告："敌人离这里很近了！"该连长还是不信。有一名中尉排长警惕性较高，连忙吹哨下令第1排进入阵

---

〔65〕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2页。

〔66〕不少撰述资料说到远征军第一次攻击龙陵，都认为第71军已攻占龙陵，但反被日军援兵包围，是中了日军的"空城计"。这个说法，显然有为第71军辩护的色彩，似乎该部因攻占龙陵而陷入日军合围之预谋。事实上，第71军始终未完全占领龙陵，龙陵核心阵地仍有日军坚守，并非"空城"；日军随后的增援为应急处置，而非事先预谋。再则，这个说法也误读了"空城计"原义。

〔67〕6月8日，第87师先派出第259团第3营一个加强连担负破坏腾龙桥任务，该连报告：腾龙桥及大硝河共有桥梁3座，除木桥一座予以彻底破坏外，其余均为铁链、木石之坚固桥梁，无法破坏。第87师又令第261团派出第1营配合师工兵连前往破坏，但该营因缺乏炸药，故一面请求炸药，并要求空军轰炸；一面准备汽油、棉花、稻草等物焚烧，最终未达成破坏效果。见《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第82页。

地。第1排尚未出屋，日军已端着刺刀冲入，两排人遂成为日军砧上之肉，悉被歼灭。随后，位于其后方大松园的第1营在不知敌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也遭日军击溃。[68]

15日晨，松井部队沿腾龙公路向龙陵突进，于邦腊掌附近击溃赶来增援的第260团第2营，至傍晚进至回顾台以西。16日拂晓，浓雾弥漫。松井秀治令兵分两路，以第2大队（原田大队）向据守腾龙公路两侧5210、5412高地的第260团主力（欠第2营）发起攻击；以第3大队（萩尾大队）沿公路南侧高地向龙陵西北侧前进，威胁集结于文笔坡的第259团侧背。[69]

日军的援兵到了。

当日黄昏，日军第3大队突破第259团阵地，以一部冲入龙陵城内；当晚9时突降大雨，第2大队亦突破第260团防线，继续北向老蚌户、勐外坝迂回，似有包抄第87师退路的企图。[70]

这就是日军第56师团制定的反击方案中，所谓实行“内线作战”中机动兵力的运用。[71]在整个滇西战场，松井秀治率领的这支主力“消防队”，“南北增援，来去自如”。开至龙陵不久，松井就掌握了第113联队所属的3个步兵大队，并受命指挥全部龙陵日军向我反击。

危机立刻笼罩了第71军。

“6月16日，第87师败退到距龙陵3英里后方。败退是以第261团突然开始原因不明的溃逃为导火线而引起的恐慌状态造成的。据说，第87师师长为此企图引咎自杀。

---

〔68〕按说，第261团第1营第3连失守那乃责任非常严重。然而奇怪的是，在7月中旬第11集团军调查腾龙桥失守责任时，连长罗某提供了一份翔实的作战记录，将何时发现敌情向营长报告，何时丢掉排哨、连哨，以及3次请求援兵和营长派来援兵的时间都有详细记录。因此，上峰认定责任不全由连长一人负责，未判罗某死刑。参见赵铣：《龙陵反攻战史事珍片》；屠伯豪（口述）张组成（整理）：《千军奋勇驱邪恶　我血亦染龙陵土》，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85、97页。

〔6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4页。《陆军第87师滇西战役战斗详报（一）》，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三，第153页。

〔70〕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6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4页。

〔71〕据云，英国官方战史曾盛赞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善于发挥内线作战之长处，能使小部队独立作战，中国军队则动作迟缓。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84页。

"17日，第88师放弃龙陵附近阵地，撤至东北8英里一线。这样，中国远征军在临实现攻占龙陵这一光辉目标的直前，竟突然失之交臂。"[72]

当晚，退至城外的远征军政工人员用广播筒通宵对日军进行攻心喊话，使城内日军一夜不得安宁。

18日晨，从上街（即象达）附近赶来增援的日军永井支队[73]150多人进入龙陵东侧，继而向腾龙公路与滇缅公路相交处的勐林坡发起攻击。松山大垭口村一个叫李堡林的16岁小伙子，当时被日军胁迫至龙陵在军需班当差，他看到日军分为三路，每路有50多人，赶到山脚后队伍呈扇形散开，接着便"呀！呀！"叫喊着向山头冲击。据守阵地的第88师第263团杨光耀营三四百人，在与日军短暂交火后，即放弃了本团曾付出500人伤亡代价夺占的山头，向东撤退至勐冒街。日军攻占阵地后，居然捡到10挺机枪和数百支步枪。[74]这个营是为第87师撤退殿后的，大部队已经转移了，也就没有与敌拼杀的必要了，为跑得快些，连武器也不妨奉送，反正美国人还会补充。

至此，"卫立煌为实现攻占龙陵，甚至企图出动总预备队[75]，但其决心却在仅有1500名日本兵的反击下被粉碎了"[76]。

关于第87师师长张绍勋的自杀事件，笔者了解到的一种记述是：

16日晨，在日军援兵的猛烈攻击下，第87师师长张绍勋慌了阵脚，害怕日军集中兵力先行击破第87师，动摇了固守龙陵西北高

---

〔72〕美国出版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3—114页。

〔73〕由第56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指挥的第53师团步兵第119联队第1大队（野中大队）的两个步兵中队，在上街（即象达）附近临时编成，在击破远征军第9师营救出日军上街守备队后，又转进西北增援龙陵，从背后攻击龙陵东北部的勐林坡。见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5页。

〔74〕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9页。李堡林（口述）段润昌（整理）：《我被迫参加日本军队的经过》，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64页。

〔75〕指第8军。事实上后来卫立煌已下令第8军副军长李弥率荣1师一部（荣1团及荣2团第1、2营），于6月25日赶来增援。

〔76〕美国出版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14页。

地的决心，请求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给变换阵地，放开公路，东撤至黄草坝。作战以来，攻击龙陵的两个师是由副军长陈明仁担任战场指挥的。

陈明仁认为，放弃龙陵西北高地，让开腾龙大路，日军就会一举冲过来，不但围攻龙陵企图彻底落空，若日军沿公路尾随追击，则兵力单薄的黄草坝、镇安街也难确保，一切都将前功尽弃。他判断日军此时的目的，正是想凭借这股气势一举打到松山，救出被我新28师围攻的拉孟守备队。于是，陈明仁即严令第87师师长张绍勋，必须坚守现有阵地，不准再退一步。

张绍勋接到陈明仁不得再退的电话后，心急如焚，瞒着陈明仁，直接打电话给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张绍勋向自己的老长官苦苦哀告说，部队伤亡太惨重了，再坚守，全师就要覆没了，得赶紧撤退，另辟阵地。

恰逢此时，陈明仁也要打电话给宋希濂。接线员插上塞子，随手又拔掉，报告陈明仁说，宋长官的电话占线，听声音，是张师长与宋长官正在通话。陈明仁心里有数，当即要接线员将塞子插上，监听他们的谈话。陈明仁听到张绍勋在电话里向宋希濂叫苦不迭，又听到宋希濂不耐其烦地说："绍勋，部队万一守不住，就不要硬守了，可以变换阵地，放开公路就是了。"

正在这边监听的陈明仁，这时按捺不住愤怒了，对着话筒高声吼道："张绍勋，你必须给我守住，绝不可后退，这关系整个战斗的大局。你的第87师归我指挥，我的命令不算数吗？"接着，陈明仁口锋一转，又对着宋希濂高声喊道："总座，作为总司令，你不可以不与我商量，就直接处理我职权内的事情。要不，还要我做什么？"[77]这位陈明仁，虽然位居宋希濂、钟彬之下，却是与他们同为黄埔第1期的同窗，打仗能攻善守，早有"虎将"之名。1925年黄埔军血战惠州时，时任连长的陈明仁率本连首先奋勇登城。战后，蒋介石曾亲令陈明仁立于城墙之上，接受全军的敬礼。但他孤傲耿

---

〔77〕王卓超：《回忆反攻滇缅的龙陵之战》，据《湖南文史资料》第26辑，第171页；于冠礼：《抗日名将陈明仁的戎马一生》，《文史春秋》，2005年第11期。

直，素有“湖南骡子”之称，以敢于顶撞上司全军闻名，故而职位升迁大受影响。

宋希濂自感尴尬，半晌无语。从内心讲，他是同意张绍勋的意见的，两个师围攻龙陵一周都未拿下，现在日军援兵已到，战机已经错失，要是日军集中兵力乘势合围了自己的嫡系第87师，那就糟糕了。不如将主力暂时转移至达摩山、老庙坡、麻石头梁子、深沟、长岭岗一线，改成一个“守势钩形”，与第88师现有阵地衔接，先站稳脚跟再说。

有了这个想法，宋希濂便打电话指示第71军军长钟彬，钟彬深知此举影响重大，加之不了解从腾冲来援的日军到底力量如何，就回答说：“待力战至黄昏再定。”宋希濂提醒：“勿轻敌！”

到了傍晚，钟彬判断日军主力确有从右翼迂回包抄第87师侧背的迹象，终于“挥泪酸心”，决定“放弃右翼以血肉换来之一部阵地”，下达了转移阵地的命令，贯彻了宋希濂的意图。〔78〕据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记述，因为稍早前卫立煌已严令死守不得撤退，为了达成先斩后奏之势，宋希濂在向司令长官部提交了撤退方案后就离开了指挥部，自行消失了24小时，其间由未获授权的集团军参谋长成刚来应付通讯联络。〔79〕第11集团军第4号作战命令中记述调整后的部署为：“第71军（欠新28师）除龙陵东南郊各据点应竭力固守外，即速以一部迂回长岭岗之我占领阵地，主力控置于黄草坝及其西南地区，伺敌主力即予迎头痛击之”。〔80〕

再说作为一师之长的张绍勋，猛地吃了陈明仁的一顿枪药，想想几天前的误报军情，今天又越级打电话违抗军令。挂断电话后，张绍勋自知责任重大，觉得无颜再见上峰长官，心情沉重。

10天后，随着日军发起进攻，部队一退再退，张绍勋诚恐无法挽回战局，而连日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转来蒋介石严令查究放弃龙

〔78〕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6页。

〔79〕《渡江初期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报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藏资料。李晨提供，张太雷译文。

〔80〕《第十一集团军怒西攻势作战战斗详报》，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第一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第87页。

陵责任的电报，更是让他压力空前，遂决心以自杀承担责任。[81]于是写下三封遗书，一封致老长官、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表达了自己擅自撤退、累及全军的愧疚之情；一封致全师将士，勉励他们不为一时挫折而颓丧，继续奋勇杀敌，洗雪第87师的耻辱；一封留给妻儿，安排后事。而后，在指挥部换了一身整洁的军装，用手枪对着自己胸部开了一枪。所幸未击中要害，被送后方抢救。笔者找到了6月28日卫立煌发给蒋介石的"巳俭午"电报，是这样讲的："……今晨敌复增援，沿滇缅公路向该师阵地猛扑，虽经该师长亲加督率，全力抗拒，以敌战车及炮兵火力之激烈，复以粮弹缺乏，其第260团5255高地被敌突破。该师长张绍勋目睹情形恶化，诚恐无法挽回，乃愤而自杀，弹由左乳左胁下出，由美医治疗中。"[82]

宋希濂将此消息告诉陈明仁时，陈明仁仍恼怒地说："张绍勋战场自毙是为了逃避责任，纵然不死，也军法难饶。"[83]宋希濂只好下令第87师副师长黄炎接替张绍勋之职，指挥部队进行后续作战。

从误发"捷报"到放弃阵地，尔后又久攻龙陵不下，为宋希濂招来一片责难。17日下午，重庆委员长侍从室参谋吕文贞即打电话至保山传达蒋介石"钧谕"，饬令卫立煌查明放弃龙陵是何人下令。宋希濂此时已不敢直接电复蒋，而派专车从由旺镇送抄件"代电"面呈卫立煌做解释。[84]后来，与宋素有矛盾的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乘机建言，促使蒋介石下决心后来让宋希濂阵前"下课"，去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受训，让第11集团军副总司令黄杰代理指挥。作为宋的黄埔老同学、老部下的第71军军长钟彬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出于"为尊者讳"的心理，说误报战果是"留置后方之幕僚，竟以主官之名义报捷于中枢，演绎成龙陵得而复失之误会"[85]。事实上，当蒋介石得到电报后，又打电话向卫立煌核实情况，当时卫立煌哪里知

---

〔81〕6月20日至25日，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曾三次传达蒋介石电令，追查放弃龙陵系何人下令。详见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23页。

〔8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5页。

〔83〕《文史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文章《抗日名将陈明仁的戎马一生》，于冠礼撰文。

〔84〕据卫立煌6月17日抄电。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18页。

〔85〕钟彬：《龙陵会战史》，第28页。

道这个电报是越过他直达天庭的，正让参谋紧着向第11集团军催问呢。[86]明眼人一看即知，哪个“留置后方的幕僚”敢直接向蒋报捷？

对上述说法，有人还做了补充。在台北的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在其为父亲写的传记《萧毅肃将军轶事》中披露，因为宋希濂“谎报军情”，人们误认为“龙陵得而复失”，舆论大哗。“蒋委员长在盟国追询下颜面尽失，下令追查责任并限期收复龙陵，[87]第87师师长张绍勋有苦难言，在指挥部举枪自尽，宋把责任推给张，渡过这一关，但却无能收复龙陵……后来他派去重庆陆军大学受训，失了兵权”，“这算是一种留面子而相当重的处罚了”。[88]

如今客观评价这一段争执，笔者以为误发“捷报”属宋希濂草率唐突，但转移阵地还算正确决策。据事后虏获日军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于6月13日下达给松井秀治的第174号作战命令，确有令其“经勐外坝、小米地先向滇缅公路急进，遮断敌之退路。尔后不失时机，返向龙陵城郊前进，求敌侧面而攻击之”的指示。问题的关键在于，第87师就是挡不住松井支队的1500多人，挡得住的话，后撤就不对了。这涉及中国军队战斗力评估的问题了，抗战以来宋希濂跟日军交手多次，他有自己的判断。而钟彬在战后所写的《龙陵会战史》中，仍认为宋希濂和自己的决策是不应被指责的：“在战场由血肉换来之阵地，任何有血性之指挥官决不会轻易放弃其尺寸，

---

〔86〕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129页。张组成：《龙陵抗日战争综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23页。

〔87〕据军令部长徐永昌6月21日日记：“三时半会报，提出史迪威请示裁治龙陵失守之责任者。敬之（何应钦）办法仅令前方速行收复而已。”徐永昌评论说：“此诚空言，无补遗笑外人。”见《徐永昌日记》第七册，第343页。

〔88〕萧慧麟编著：《萧毅肃将军轶事》，第80页。宋希濂在其《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对自己突然离开前线去陆大受训一事，作如此解释：“……及至松山克复，炮兵部队陆续开到，补给亦源源而来，方期一举歼敌之计，突奉军委会命令，调我去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受训……不料到了重庆晋见蒋委员长时，他第一句话就问我：‘前方正打得很紧，你为什么来了呢？’我答是奉委员长命令来受训的。蒋闻之愕然，半晌不语，随后说：‘既然来了，就去受训再说。’我这才恍然大悟，我之调训，并非委员长之意。事后查悉系萧毅肃捣的鬼。萧时任远征军长官部参谋长，曾为武器分配与反攻部署等问题和我发生过争执，加上他喜欢人送礼，我不买账，遂挟私报复，利用其在军令部一些同学的关系，偷偷将我的名字列入（共有七八十人）”。见该书第185页。这里有两点值得留意：其一，以萧毅肃个人之职权能力，能将一位集团军总司令从战局吃紧的火线调离吗？其二，如确是蒋亲自下令调宋，他见了宋后的故作愕然状，颇堪玩味。

到万不得已，必须放弃一部时，指挥官能负责到底。此种高尚之指挥道德，实在为吾人所敬佩。”[89]

在查阅资料的时候，张绍勋这个人一直让笔者挂心。按说，一个敢于承担责任阵前自杀的少将师长，不应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当时他作撤退考虑必定出于个人对战场情势的判断，错误也好正确也罢，都不能仅从道德上进行评判。至于其自杀的动机，可能非但不是如陈明仁所说的“逃避责任”，倒很可能是代人受过——张绍勋是长期追随宋希濂的忠诚部下，且为人极具担当。1943 年 2 月，参谋总长何应钦视察印度蓝姆伽训练营后返国，过境昆明时召集在滇中央各军师长会议。当时国军将领“吃空额”成风，各师长皆报告本师现有战斗兵力八九千人，唯独第 87 师师长张绍勋报告本师仅有战斗兵力五千人，并以担任怒江正面防务战线过长，请求补充。何应钦听后认为该师缺额过大，对张绍勋加以责备。军统局局长戴笠通过情报系统探知，张绍勋其实说了实话，第 87 师现有实力甚至比其他各师都多，其他师长则统统说了假话；并在给蒋介石的密报中称，张绍勋“为人爽直”。[90] 而且，从卫立煌发给蒋介石的电报看，对张绍勋的努力反映充分，并没有多少谴责意味。

事实上，这个人此前的经历，也足以说明他是一位优秀的抗日军人：张绍勋，1909 年生，广东合浦人，黄埔第 5 期毕业。曾两次参加淞沪战役，第一次（一·二八抗战）为 87 师 261 旅 522 团第 2 营营长；第二次（八一三抗战）为 36 师 216 团团长，进攻汇山码头时负伤。后来又参加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滇西反攻胜利后，无大错的将领均获相应提升，张绍勋也不例外。看来峰层最终还是对他的作为给予了充分理解。

然而，这个人后来的命运实在令人叹息。1949 年，时任国民党第 122 军军长的张绍勋在湖南大庸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50 年入中南军区军政大学学习，改造思想。1952 年 7 月被军事法庭以“历史

---

〔89〕钟彬：《龙陵会战史》，第 29 页。

〔90〕戴笠呈蒋中正请严查各师缺额并严格取缔官兵走私（32.07.17 发），台湾“国史馆”典藏号：0020880102038007。收录于《戴笠先生与抗战史料汇编·经济作战》。

反革命”罪判刑8年，送往宁夏石嘴山市平罗镇战犯监狱服刑，实际执行15年（无延长判决）。1964年被特赦，留当地劳改农场就业。“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关进监狱。1970年11月，宁夏石嘴山市革命委员会未经审判便以历史和现行反革命罪将张绍勋定为死刑，并于1971年1月6日公开执行枪决，终年61岁。[91]

6月17日：D+13日

上午10时许，第82团（附第83团第2营）施行猛烈之冲锋，与日军反复肉搏至18时左右，将阴登山山顶之大部占领，计大堡垒2个，小堡垒7个。日军退守该山西南高地；第83团（欠第2营）则夺取大垭口方向之堡垒2个。

第117团亦攻击距离“松山”顶仅200米，但闯入了日军密集火网之中。日军又组织小股兵力实施逆袭，部队伤亡较大，少校团附兼第2营营长庞绣章（也有写做庞秀章、庞秀璋）、第1营营长张星良及部分连排长先后阵亡。[92]新28师遂令该团以一部对该地警戒，主力转往腊勐街方向，准备协助第82团攻击。[93]

据日军战史载：

由红木树南下增援的第117团，攻击的是北部的松山阵地（第1、2号高地）和横股阵地（马鹿塘）。其中横股阵地由野炮第7中队守备，由于进驻松山较晚，阵地构筑不太坚固；虽有“十榴”火炮，但无近战使用的榴霰弹，炮兵们仅以手枪和手榴弹，难以应对我步兵攻击。于是，守备队长金光又将原先守备平山阵地的大野满喜雄曹长的小队调来增援，同时放弃了该前沿阵地。

此时日军士兵感到，进攻中的远征军士兵与以往交战的老对手完全变了样，个个敢打善战。由于得到了大量美援新式武器，拥有了压倒性火力，士兵变得异常勇敢。面对进攻上来的我第117团，大野小队多次组织夜袭反击。在肉搏战中，大野砍杀了我军一位连

---

〔91〕邓贤：《落日》，第191—192页。张绍勋案于1980年平反。

〔92〕黄杰：《滇西作战日记》，第160页。彭荆风：《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第162页。

〔93〕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4页。

长，倒在战壕里的这位勇敢的连长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衣袋里还装着像是母亲的来信。野炮第7中队小队长木下昌巳见此，也禁不住合掌为这位年轻的敌军指挥官致哀。[94]

连续投入了3个建制团，对松山的攻势仍无大的进展，龙陵反倒出现了危局。卫立煌有些急了，虽然战事刚刚开始，就被迫考虑动用预备队第8军。

第8军原驻滇南文山一带，担负防御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老挝、柬埔寨）方面日军来犯的任务，属第9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指挥，1944年4月调往滇西作为远征军的战略预备队。4月中旬，该军经开远、昆明开往祥云、凤仪一带集结。5月中旬，奉命以第82师先开施甸县由旺镇，接防怒江东岸。6月中旬，又奉命以荣誉第1师开赴龙陵增援第71军。

据第8军荣誉第1师第2团团长周藩回忆：

6月初，荣1师由保山开至惠通桥。6月17日，南进至攀枝花渡上游，乘橡皮舟渡怒江，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向龙陵东北之廖家寨急进，阻击龙陵的日军第一次反攻，援救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的指挥所。

荣1师第1团（团长周开成）先渡河，第2团接着渡河，刚渡到对岸，忽然又接到命令：荣2团第3营（营长郑安关）拨归71军指挥，任务改为攻打松山。不久，随后渡河的荣3团（团长赵发毕，也记做赵发笔）也拨归第71军指挥。这样，我们这个师分成两半使用，指挥就不那么灵活了。[95]

前面说了，新28师的部队在宋希濂手里到处“打补丁”，第82团、第83团打松山，第84团被配属给第88师打龙陵。如今，荣1

---

〔94〕［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96页。

〔95〕周藩：《龙陵痛歼日本侵略者亲历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45页。

师的部队也被拆成了两半，先渡江的荣1团和荣2团的第1、2营在第8军副军长李弥率领下驰援龙陵，荣2团第3营和荣3团留下准备打松山。

这显然是卫立煌的不得已。他本是个无派系观念的人，松山情势危急，只好如此处置。李弥先是率部去解龙陵之围，7月底又赶回来打松山，虽然两头"救火"，似乎也没有什么怨言，对他这个根基还不深的副军长来说，这是最佳的处事态度了。"侄帅"军长何绍周（何应钦的侄子）就不同了，对自己的部队被分割使用对卫立煌颇有意见，后来与其他事合在一起，对卫立煌发了一通邪火——此为后话。

6月18至19日：D+14至D+15日

18日清晨，第117团一部奉命转到阴登山方向。其第3营于午后3时接替了第83团第2营阴登山北端之防务。[96]

第117团隶属第6军（军长黄杰）新39师（师长洪行），是临时从怒江东岸调过来增援新28师指挥的。从14日起在黄土坡（1、2号高地）连打了4天，伤亡不小，战绩平平。对于这支"客军"，新28师也不敢用狠了，暂撤到本部后面担任预备队。

据日军史料记："（6月）16日，阵地上淫雨连绵，日军守备队在泥泞的战壕中奋战，取得较大战果。17、18日，敌军不分昼夜地攻击，但官兵仍坚守在阵地上。"[97]

19日，远征军后方补给了一批各种弹药。原先拨归龙陵方向的第84团第2营亦奉命转至松山战场，占据竹子坡为预备力量。[98]攻击部队士气为之一振。

6月20日：D+16日

凌晨4时许，第82团（附第83团第2营）趁天色尚未亮透，山谷里一片幽暗，大雨和山溪的哗哗响声掩盖了部队行动发出的声

---

〔96〕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4页。
〔97〕［日］楪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85页。
〔98〕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4页。

音，实施了一次急袭。许是因天黑、雨大、夜寒，日军连日战斗倦意沉重而放松了警惕，直到我军攻至阵地近前，才仓促应战，一时难以招架。激战至6时许，残敌纷纷向松山、大垭口逃窜。打了近半个月的阴登山，至此才得以完全占领。

经清查，敌遗尸70余具。但第82团第1营营长翁秀山、第83团少校团附潘诚均负重伤，连排长伤亡更多，继续攻击松山已是力不从心。

在第82团攻击同时，第83团和第84团第2营也协力向滚龙坡发起猛烈攻击。[99]

日军从各阵地抽调兵力，增援北面和西面阵地，与我展开肉搏战。据日方记载："这时，师团无线电通讯机收听到新28师师长李士奇战死的消息，随即，中国远征军停止了攻击，构筑阵地请求增援。"[100]

这是一个奇怪的错误记述，因为新28师原师长李士奇2月已调任他职，由原第11集团军参谋长刘又军继任师长。[101]然日方记录又言之凿凿，笔者疑心是日军第56师团故意制造的假消息，意在为松山日军鼓劲打气，可惜连我方指挥员的名字都没搞准确。对此，未见我方有任何记述。

这天，远征军重炮无意间命中了大垭口的日军步兵弹药库，造成剧烈爆炸。对缺粮少弹的日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至今日，担负松山攻击的中国远征军各部已伤亡1600多人。作为主力的新28师伤亡逾千人，攻势日衰。整个松山堆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只要我军飞机来轰炸，或者炮击，到处都能见到腾起一团团血雾，死人胳膊大腿炸上了天。在太阳曝晒下，尸体开始腐烂发

---

〔99〕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4页。彭荆风：《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第163页。

〔10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0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63页。

〔101〕盛兆：《滇缅抗日杂忆》，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179页。

臭，生出白花花的蛆，爬得阵地掩体到处都是。远征军士兵天天埋在尸首里打仗，在死人堆里打滚。几个月下来，人都变了形状，手臂、腿脚、身上的皮肤都被尸体染成黑色，尸臭好久都无法消除。

就在这时，被战火熏黑的天空滚过一阵轰鸣，又一阵夏雷在松山的头顶炸开，紧接着便是一连串的电闪雷鸣，寒风裹着倾盆大雨哗哗直下。黑云笼罩下的雨也如墨色，像一块广阔无垠的黑幕，将天地都包围起来。这可怕的黑雨，无情地鞭挞着地面的尸体，破碎的白骨，破碎如丝状的军服，七零八落地躺在地上呻吟，令人惨不忍睹……

6月中旬，滇西的雨季到了，落下饥饿、伤痛，更多是死亡的恐惧与麻木。昼夜之间，到处山洪暴发，怒江江面比平时涨宽一倍。交通断绝，山道泥泞，民夫骡马均不能行，美军第14航空队飞机亦无法起飞。前线作战部队失去后勤保障，一时军心动摇，攻势颓缓。士兵们痛苦地蹲在被战火烤得光秃秃的战壕里发呆，怀抱步枪，日夜听凭大雨瓢泼，苦不堪言。伤员运不下火线，只好任其自然死亡，痛号呻吟之声到处可闻，其状甚惨。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此忧心如焚。他明白，如攻势再无进展，如暴雨再持续十天半月，伤亡惨重，且失去后勤保障的远征军部队，其攻势将自行瓦解，全线崩溃将不可避免。

此时，奉卫立煌命令增援松山的预备队第8军荣1师一部（荣2团第3营和荣3团主力），正陆续开赴怒江东岸集结。为加强指挥力量，卫立煌又命令第71军军长钟彬将龙陵方面的指挥交割给副军长陈明仁，转至松山前线坐镇。[102]

6月21日：D+17日

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于6月20日撤出上松林阵地（阴登山）；我军战史亦记载，当日我军攻占阴登山。但是，在我方官私记录中的新28师前期战斗过程中，6月21日以后的战场仍出现“阴登山”、“松山”这样的字眼。

---

〔102〕钟彬21日奉命转松山指挥。见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2页。

笔者经现地踏勘并进行史料研判，当时新28师对于松山小地名的掌握比较概略、模糊，这种情形直到今天在当地人的认知中仍然存在。比如，在当时远征军的作战地图上，辰、巳、午、未诸高地被统一标注为“小松山”，日军称之为“里山阵地”，而后来龙陵县政府在巳高地（今称“栗栗坡头”）竖立的碑桩上，则写作“阴登山”，当地人也常常将子高地下面的水塘以南，包括辰、巳、午、未诸高地的整个山头统称为“阴登山”。

那么，辰、巳、午、未高地在当时新28师的战斗记录中被概略记做“阴登山”、“松山”，就有可以理解之处。因为新28师攻占阴登山后即被调离松山战场，对于松山日军阵地全局情况的掌握，有盲人摸象不知全局之憾，不如后来攻克全部阵地的第8军可以清晰界定其局部。据第71军军长钟彬记述，直到7月初，该军将攻击松山任务交割给第8军而撤离前，新28师及配属部队第117团的战绩仅为：攻占竹子坡（第82团）、阴登山（第82团及第83团一部），大垭口与滚龙坡之一前进据点（第83团），阴登山与松山间之一中间据点（第117团），歼敌一个中队以上。作战中，我亦阵亡营长萧昭松、向麟以下官兵千余名。[103]

因此，推断新28师在6月21日以后的战斗，实际上是从已经占领的阴登山顶向辰、巳、午、未诸高地推进，亦即当时攻击的是日军“里山阵地”，或称“小松山”。

即日，日军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从望远镜里看到，一些参谋人员簇拥着一位中国将领出现在竹子坡5600高地，正以炮兵观察镜向松山眺望。此人即是第71军军长钟彬。[104]

第一次龙陵攻击失利，最大的制约来自补给困难。由于松山据点始终像根鱼刺那样牢牢卡住滇缅公路的咽喉要道，远征军急需的粮食弹药补给物资，均要依靠人力骡马经由惠通桥下游的几条山谷小道运抵松山和龙陵前线，因此前线供应时时发生危机。如果不拿

---

〔103〕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3页。

〔10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59页。

下松山，拔掉卡在滇缅公路上的这根“毒刺”，就无法利用公路输送作战物资，光靠飞机间歇性空投、骡马从山谷小道驮运，龙陵的战事将难以为继。

不仅如此，从整个滇西战场态势而言，对处于劣势的日军来说，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在于松山。松山是楔入远征军纵深的一颗钉子，是支撑胜利的据点。松山不守，腾冲、龙陵则无依托，怒江防御体系的三角支点就将瓦解，实施内线作战将远征军各个击破的战略构想就将化为泡影。

对人数占优势的远征军来说，在天时地利上明显不利，背水一战，交通受阻，大雨滂沱，进攻困难。松山据点把反攻部队分割成了彼此孤立的三块，致使龙陵方向的远征军首尾不能相顾，始终处于被动挨打和岌岌可危的境地。松山不克，腾（冲）龙（陵）之师都成孤军，随时有被敌人各个击破最终导致全线崩溃的危险；松山若克，则满盘皆活，三处战场连成一片，后续部队及物资便能源源不断地投入战略大反攻。

这样，松山就必然成为双方拼死争夺的焦点和取胜关键，小战场决定着大战略。现在卫立煌和宋希濂都意识到，这个最初放在次要位置的松山，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于是命令第 71 军军长钟彬率新 28 师第 84 团（该团初期作为第 71 军预备队，曾配属第 88 师在龙陵作战）主力，赴松山督战指挥。

钟彬时年 42 岁，中将，与宋希濂为黄埔 1 期同学加密友，且为陆军大学正则班〔105〕第 9 期首席（第一名）。据日军掌握的情报称，钟彬在国军有“参谋长第一人”、“战术第一人”之称，国军对师以上干部的战术教育，多采用“钟氏战术”为范本。〔106〕但后来谈及松山之战，钟彬曾感慨道：“松山之敌不外千余人，经我新 28 师半月之猛攻及优势炮火之射击，尚未全部攻占，故上级命余往松山指挥。吾于此，对敌守备阵地之疯狂顽强之精神，得有充分之认识，非如一般‘限期攻占’，‘不成功、则成仁’之卤杆从事者，所

---

〔105〕当时陆军大学三年正规学制班，区别于特别班、将军班之类的短期“镀金班”。

〔106〕据缴获日军文件，载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录第三龙陵情报记录第十四号。

能成事也。”[107]

简单说，打仗靠两条，一个是得有办法，一个是要有决心。然而局外人更容易关注后者，因为感性强，也比较好懂。中国军阀混战时期的战争，技术战术含量低，多半靠军队的勇气即能达成特别效果，因此发展出“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阵中教义，然细究起来，与义和团的作风属于一脉相承。一旦遇到国与国之间的正规战争，内战中那些办法多半不灵。现在，素以战术理性见长的钟彬，显然从松山的观察体验中，开始动摇固有观念。然而，“有办法”一条，可不是思想一通马上就有的。几天后，连他也无奈地丢下松山这个“课题”转回龙陵。

下午3时许，军长钟彬在小董瓮新28师指挥所召集会议。研究决定，22日以主力指向松山，一部指向大垭口，再行攻击。

战斗部署为：

令第117团，附工兵第3营之一连（欠一排），为右翼攻击队，于22日10时前，将阴登山阵地交与第82团接替。12时前，展开于阴登山西端东西之线。13时开始向松山攻击，务必一举而占领之；

第82团，配属师工兵连，于22日10时前，接替第117团阴登山阵地，并监视其西端堡垒，担任左右攻击队之联系；

第83团，配属工兵一排，为左翼攻击队，于22日10时前，完成攻击诸准备。10时30分，向大垭口之敌行牵制攻击；

第84团第1营为预备队，于22日12时前，位置于阴登山东西山腹，尔后随右翼攻击队进展，逐渐扩张松山之战果。

又令军山炮营第1连，仍占领5600高地附近阵地；第3连推进至竹子坡，第8连在滇缅公路附近，占领阵地，均于22日12时前完成射击诸准备，以火力指向松山，支援第117团战斗。[108]

据资料，钟彬以打通公路补给线为当前急务，下令凡能攻占松

〔107〕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2页。

〔108〕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4—45页。

山的部队，予以10万元奖金；能攻占大垭口的部队，予以5万元奖金。[109]

6月22至23日：D+18至D+19日

22日，按第71军军长钟彬部署，对松山日军的攻击全面展开。

担任主攻的第117团将防务交82团后，从右翼向松山（小松山）攻击，当日占领松山西南小高地及东南山腰后，遭日军暗堡火力猛烈压制而难以进展。23日，该团继续攻击松山（小松山），由于伤亡较大，钟彬令担任预备队的第84团第1营投入战斗，交由第117团指挥。[110]

据第84团第1营第2连上等兵孟存美回忆：

攻击时，双方的枪炮声响得没有一点缝，只见前面冲上去的人像滚豆子一样滚下；再组织冲锋还是像滚豆子一样滚下。死了的，一动不动；伤了的，哼的哼，叫的叫。山头上双方死的人到处都是，转过来踩着的是死人，转过去踏着的也是死人。真是几辈子也见不着那么多死人。可当时只怕活人，死人不可怕……也来不及有什么想法，后面有督战队的机枪架着，横竖逃也是死，冲也是死，倒不如冲上去死了就算了，死不了打走日本鬼子回家再说。[111]

第84团第1营第1连第3排排长李儒回忆：

……连续几个晚上的攻击，都无法靠近敌人的阵地，而我们的人死的死，伤的伤，能参战的不到一半了。这天晚上，狂风暴雨像是要把松山刮倒冲走一样，剩下的人又整装待发。连长宣布：今晚，一定要冲上松山，只准前进不准后退，谁敢后退就枪毙谁！部队出发后，一排长连世全在右，二排长李俊在左，我带三排在中

---

〔109〕《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第100页。

〔110〕据新28师司令部绘制《新第二十八师松山围攻战斗经过要图》图注之⑧，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附图。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图第五之一。

〔111〕吴有春：《抗日老兵访谈录》，据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第399页。

间。我们拼命地往上冲。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流，茂密的树木让人磕磕绊绊，身上的装备更沉重了。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到双方的枪炮声在耳边炸响……冲倒半山腰，突然一个闪电，我回头一看，只见弟兄们横七竖八地倒在血泊中……“狗日的小日本！”我着咬牙一遍遍地骂着，朝着敌阵地冲去……凌晨5点钟，子弹打光了，甩手榴弹，上刺刀……可我怎么也站不住。刘相成冲我喊：“李排长，你挂彩了！”我一看整条腿都是血，在我身边的何佰光、何自杰两人已经牺牲了，我不知道怎么脑袋里“嗡”的一响，晕倒在地……后来，我在保山后方医院醒了过来，才知道我们连活下来不到10个人。[112]

在左翼第83团连日猛烈攻击下，大垭口阵地日军渐渐弹药不足，日军一次次跳出战壕，以日军惯用的军刀和刺杀术对我军实施白刃反击。我军虽然不断击毙疯狂反扑之敌，然由于日军有坚固堡垒为依托，我军始终无法接近突入。

据日方记述：

位于本道阵地（滚龙坡）东北面的里山阵地（小松山），正前方是原口山（竹子坡）敌炮兵阵地，后面是主力阵地音部山（丑、寅、卯高地）和关山阵地（子高地），是一个据有重要位置的阵地，所以敌拼命地发起攻击。

最初，里山阵地是由步兵第2机枪中队长只松茂大尉率150名士兵（步兵90名、辎重兵40名、野炮兵20名）守备。由于连日来遭到敌炮火猛烈轰击，阵地已经严重破坏，死伤严重。

这天，在敌猛烈攻击下，里山阵地陷入危机。在第6中队小队长大和幸辅负伤后，真锅指定第4中队一个小队担任军旗护卫队兼预备队，由小队长安河内正幸少尉率领前往增援。后来活下来的森本谢上等兵也参加了。在赶往里山阵地途中，敌炮弹雨点般地落在阵地附近，增援小队在到达阵地前就伤亡了不少人。

---

〔112〕李儒、张有统、卢彩文（口述）吴有春（整理）：《抗战老兵的战斗片断》，据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第220页。

森本谢上等兵一到阵地，马上就跳入了战壕，正要用步枪射击时，只见在侧面应战的分队长樋口政雄军曹突然向前倒了下去，连哼都没哼一声。“怎么了？”森本谢上等兵马上靠了过去，注意一看，钢盔正面有个洞，是被子弹击穿头部当即死去的。

此时，森本谢上等兵已经无暇悲痛，马上取下樋口分队长的子弹进行还击。就在这时，中国士兵用掷弹枪发射过来的手榴弹“嘣”的一声落在了战壕里，他马上捡起扔了回去，千钧一发之际，周围的战友得救了。

刚刚击退雪崩一般攻上来的敌军，暴雨式的炮击又来了。炮声稍停，敌步兵已高喊着冲了上来。旁边的友军因剩下的弹药不多了，就采用把敌兵引入战壕前来拼刺刀的战法，以此来击退他们的进攻。

傍晚时分，敌军进攻放缓了节奏，安河内小队准备返回预备队原阵地。此时，大家才一起把阵亡人员的尸体运到里山的洼地里，晚上悄悄地火化。这时，距夜幕降临还有点时间。安河内小队离开阵地不久，又战死好几个人，兵力又减少了 20 多人。[113]

自 6 月 8 日至 23 日，敌我双方在小松山阵前已进行多次拉锯战。血河般的战壕内尸体日益增加，有的已腐烂脱骨。为了保持即得的阵地，我官兵不得不站在血潭中坚守阵地。这时，第 84 团第 3 营也从龙陵转来，归还建制。

远征军老兵金城，中央军校第 15 期毕业，曾参加 1942 年第一次入缅作战。6 月下旬，时任第 84 团第 3 营第 9 连连长的金城带领全连进抵小松山山脚，作为新 28 师最后的增援兵力，亲历了最后的作战。[114]

---

〔113〕［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107 页。

〔114〕据 2005 年 8 月 17 日《华商报》文章《主动请缨两赴缅甸抗日 战士被蚂蟥吸干血》，记者申重重撰文。据金城口述，6 月 21 日夜第 84 团第 3 营抵达阴登山脚，22 日凌晨向松山发起攻击。但根据钟彬制订的攻击计划：22 日仅第 84 团第 1 营位于阴登山东西山腹担任预备队，23 日在第 117 团攻击伤亡过大撤下后担负后续攻击；并未提及第 3 营。因此，笔者推定第 3 营应比第 1 营稍晚到达松山，其发起攻击时间应该是第 1 营失利后，以 24 日凌晨为宜。

6 月 24 日：D+20 日

拂晓，金城带着全连战士由右侧斜坡向阴登山（应为小松山）山顶冲击，不料遭到敌人暗堡火力射击，冲击受阻。营长命令撤下，重新部署。

上午 10 时，部队再次冲击阴登山（小松山），因为受三面暗堡火力的夹击，十多名战士倒在光秃秃的山坡上。金城说："我冲到敌阵地前，看见一个日军营妓跳出战壕，身上什么也没有穿，抡起一颗手榴弹就向我扔过来。大概用力过猛，弹离手，人也一头栽下斜坡，滚到了我的脚边。"

有关日军慰安妇在松山的作为，很少见诸纪录。据日军被俘士兵早见正则回忆，战斗初期慰安妇曾做饭送到各个战壕，后来还接替卫生兵护理日军伤兵。为此早见正则感慨说："她们也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了。"〔115〕金城的回忆，让我们看到这些受蒙骗的妇女更为愚昧的一面。

在腾冲围攻战中，据《扫荡报》记者潘世征所写的战地通讯，日军营妓"生活同士兵一样，每天两包饭团或者一包饼干。她们戴上头盔，帮助士兵搬运弹药"，有些极端者"甚至拿着手枪向中国军队射击"，"临死之前，第一线上距离敌人十公尺的我军，没有听到过一个女性哭泣的声音"。潘世征称这些女人是一群饱受日军侮辱与损害的"可怜虫"。〔116〕当后来被俘后进了收容所，知道日本战败的消息后，"已经和日本士兵关系亲密起来的朝鲜慰安妇们，态度马上就改变了……开始对将她们置身于暴力、强奸、炮火下的悲惨境地的日军，表示出强烈的愤怒。"〔117〕可见，松山阵地上朝鲜慰安妇所做的一切，也不过是为了能活下来的违心之举。当后来日本兵逼迫她们自杀的一刻，她们才真正醒悟过来。正如韩国记者金荣所言，"那些朝鲜慰安妇内心深处的想法，日本兵是理解不了的"。

但是，一些日本右翼文人却试图改变"慰安妇"的性质。在棋

〔115〕［韩］金荣：《慰安妇朴永心》，载《华夏人文地理》杂志 2004 年 4 月号。
〔116〕潘世征：《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群可怜虫》，载《战怒江》第 146 页。
〔117〕［韩］金荣：《慰安妇朴永心》，载《华夏人文地理》杂志 2004 年 4 月号。

本捨三2003年出版的《壮烈　拉孟守备队》一书中，绘声绘色地记述了一个叫做菅昭子的慰安妇，为了对自己慰安妇的历史“画一个终止符”，要嫁给一个在战斗中双目失明叫做户山的日军伍长；而她要在火线嫁人的初衷，只是因为此前户山伍长看不起慰安妇，称她们不过是“工具”，现在她要以实际行动“感化”他。真锅为了部下的这个“个人私事”来找金光，得到了金光的支持，成全了两人的心愿。而后菅昭子充当户山伍长的眼睛，指挥他在战壕里投弹，最后双双“英勇”战死。藉此，作者高呼：“她在这一刻已经不是慰安妇，而是帝国军人的妻子，是整个日本的妹妹、姐姐和母亲！”[118]这个故事，在楳本捨三的书中是个重要情节，他描述得好像置身现场一般，甚至连两人的私房话都细腻道出，这反倒暴露出其杜撰的破绽：此事的当事者全部死在松山，那么，楳本捨三所认定的“个人私事”是谁传出来的？

不仅如此，这位楳本捨三还就慰安妇问题描写了一段金光与真锅的交流。说“平民出身”的金光对慰安妇抱有同情心，为不能在战斗期间安全送走她们而焦虑。但真锅对其坦言相告：“队长，您不必如此，那些女人比您来这里还早，是您的‘前辈’。拉孟已经是她们的第二故乡了，你想送她们走她们可能还不乐意呢——即便死在这里，也许正是她们的心愿，因为她们已经跟联队官兵亲如家人一般。”于是，炮兵队长金光只好尊重这个步兵联队的所谓“特色”和“传统”，否则，听真锅的口气——这可能会让士兵们不高兴，影响到自己对步兵的指挥，因为步兵才是这里的真正主人。[119]

慰安妇，是日本人关于战争史观的一个软肋，也是右翼势力的一块心病。想为这一丑恶罪行涂脂抹粉的大有人在，但涂抹出来的都是这样可笑的怪胎。

晚上，第84团决定，次日一定要攻下阴登山（应为小松山），方法是分批突击，金城的第9连为第一批。“我一想，这下完了：第

---

〔118〕［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12—121页。

〔119〕同上书，第80页。

一批就是以死开道啊！那时已经打红了眼，也不怕，就是当下要死也没有太多想法，晚上就写了一封遗书，让家里人不要为我难过。”

一晚上，金城不能入睡，等待着冲锋号吹响。次日凌晨四五点钟，战士们都睡着了，战场上出现少有的寂静，能听见野老鼠争抢死尸的吱吱叫声。这时候，营长突然出现了，气呼呼地对金城说：“我们快胜利了，但长官部决定把我们调下松山，听说打松山的任务要交给第 8 军接替！”

金城记得，部队撤到山脚，第 9 连清点人数。值日排长将队伍集合完毕，然后报数。“报告连长，全连应到 163 人，实到 58 名。”“听到清点人数的结果，我的眼泪忍不住就淌下来，止也止不住。”〔120〕

日方记载，“不轻易放弃进攻的中国军队，在守备队前面开始构筑工事”〔121〕。连日来的攻击，新 28 师一直未进行工事构筑，为稳定战线防止日军反扑，才开始挖掘战壕。同时，日军也利用这一间隙一面加固阵地，一面在夜间跳出战壕，从我军士兵尸体上寻找弹药来补充自己；抽烟的士兵则忙着在那些尸体上找香烟。

远征司令长官部从战况判断，损失惨重的新 28 师已难以继续攻击，决议将松山攻击任务交由第 8 军担任。为此，已向第 8 军发出预令。24 日，第 8 军军长何绍周令军部上校附员李彦萱为前线联络官，先过江与第 71 军接洽。

李彦萱渡江后来到竹子坡第 71 军指挥所，钟彬情绪颇为沮丧地对他说：“你来得正好，我部已奉命转进龙陵，请贵军明天黄昏后接防完毕。”显然，在屡次攻击受挫后，松山在钟彬眼里已经成了烫手的山芋。李彦萱说：“怒江水流湍急，且我要返回东岸汇报后才能开始渡江，按您的要求时间上恐怕来不及，请原谅。”钟彬只得令新 28 师部队暂时稳定既得阵地。〔122〕

---

〔120〕据 2005 年 8 月 17 日《华商报》文章《主动请缨两赴缅甸抗日 战士被蚂蟥吸干血》，记者申重重撰文。

〔121〕［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108 页。

〔122〕李彦萱：《忆松山攻坚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82 页。

6月25日：D+21日

即日上午，观战已久的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向担任战场指挥的钟彬提出对于松山攻击作战的意见，主要观点为两条：

其一，坑道作业与对壕作业缓不济急；

其二，应组成特种攻击队进行攻击。

鉴于攻击伤亡巨大，此时我作战部队已酝酿提出坑道、对壕作业战法。多恩将军显然对此不以为意，认为那样太耽误工夫了。当时，参谋人员根据多恩准将谈话，笔录整理“特种攻击队”战术的编组和实施方法，内容如下：[123]

一、编组方法：

1. 对敌每一堡垒群组织一个攻击队；

2. 视敌堡垒群内之堡垒个数，在攻击队之下组织若干攻击分队，其分队之个数与敌堡垒个数同；

3. 每分队之下组织五个小队，即：

a. 第一小队——担任破坏铁丝网。共六人，每两人为一伍，每伍担负一个开口，共可担负三个开口；

b. 第二小队——携带莫洛托夫爆炸瓶[124]。共两人，每人携三个爆炸瓶；

c. 第三小队——携带火箭筒。共四人，每两人带火箭筒一个及火箭弹若干个；

d. 第四小队——携带爆炸竿。共六人，以三人持长竿，两人任点火，一人另携带一大包黄色炸药，长竿顶端绑黄色炸药包若干个及爆炸瓶一个，装两根电气点火索及一根导火索；

f. 第五小队——携带冲锋机关枪。共五人，每人一挺。

以上每分队合计23人。查敌堡垒群多系大堡垒一个，外绕小堡

---

〔123〕以下引文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附录《窦尔恩（即多恩）将军谈话记录》，第91页。

〔124〕即仍在游击队、街头暴乱群众中沿用的自制燃烧瓶，别名“莫洛托夫鸡尾酒”，系“二战”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明。以玻璃瓶内混装汽油、镁粉、橡胶碎片等易燃材料，瓶口扎布条为引。使用前将布条浸透易燃液体，燃点后将瓶抛出，撞击目标后破裂燃烧，可造成一定的阻绝及杀伤能力。

垒5个，共需6个分队，即每一攻击队为138人。

二、实施步骤：

1. 于攻击前一日下午，用重炮猛轰两小时，除予敌以损害外，并造成甚多之弹坑。夜间仍继续射击，使敌神经紧张，不能休息。次日凌晨2时半停射；

2. 于攻击前一日下午，用战防炮接近敌堡垒至六百码，用穿甲弹及爆炸弹对准敌射孔射击。如能穿入射孔，当可杀伤堡垒内之敌兵，亦可藉此将敌射孔打坏。入夜后即停止射击；

3. 凌晨3时每一攻击分队之第一小队即开始剪断数层铁网，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小队即可匍匐跟进，特须利用弹坑跃进，此时堡垒内之敌必用机关枪扫射我，须候其停射，始能前进。若敌不断扫射阻我前进，我第二小队则投掷一个爆炸瓶，能命中敌射孔为好；即便不能命中，该瓶燃烧火光亦可照亮敌射孔，我第三小队即用火箭筒瞄准敌射孔射击。假定进行顺利，则凌晨3时第一小队开始剪铁丝网，至凌晨4时可以剪通。此时天尚未明，第四小队乃近迫敌射孔，将爆炸竿上绑有黄色炸药及炸药瓶的一端伸入敌射击孔内。伸入后须立即将竿端横撇于敌射孔内，使敌不能推出；在伸入之瞬间，应立即点火，其方法为前面持竿之人喊后面点火人的名字，如此则不至于与其他分队的第四小队相混，可免发生错误；

4. 经上述攻击，堡垒内之敌人当已或死或伤。但因敌堡垒之下尚有地道，而地道内之敌必又进入堡垒，故每一攻击分队之第五小队必须乘堡垒内敌人死伤之瞬间，用冲锋机关枪塞入敌射孔内断续射击，并依情况以手榴弹投入而杀伤之。但堡垒仍未破坏，此时第四小队管理爆炸竿之点火兵已无事，应立即将原已准备好之大包黄色炸药迅速提起，前进而置于敌堡垒之裂缝中，或埋于堡垒之下，并安置电气点火索及导火索，牵至后方（其距离以爆炸时我士兵不受损失为度）；

5. 上述事项做完后，约为凌晨5时，天已渐明，攻击队长令各小队一齐退后至安全距离，由后面轻重机关枪及战防炮监视敌人，使敌不能由堡垒内冲出截断我炸药引线，我即点火炸毁堡垒；

6. 又，敌每一堡垒群，除各小堡垒与大堡垒间有地道联络外，

尚另有一或两个出口。我须细密侦察，预先将机关枪对准其出口之外，如敌开铁门，我即射击之。

按以上办法实施，可免我步兵直接攻击，减少死亡，并可将敌人全部葬身于堡垒之内。

上述“特种攻击队”战法，类似于大型机器上由多个工人配合的流水线操作，必须由破障、爆破、火箭筒及冲锋枪等不同专业分工、技术娴熟的突击队员担任，且在多梯次进攻中战术配合也很复杂。虽然听描述后钟彬及师、团指挥员即感到耳目一新，但对于能否执行这一战术，心里普遍没有底，因为参战部队专业兵种的训练纯属临阵磨枪，可能连所需要的突击队员都挑不出来。开战以来，对于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新式兵器的使用，远征军非常尊重美军顾问的意见；但对于步兵战术运用，还习惯于靠老经验、老办法。

为体现对美军顾问意见的重视，卫立煌听钟彬汇报后，建议由正在待命参战的荣3团两个营、第8军工兵营及战防炮营各一部，遴选人员编组特种攻击队，利用26、27两日在怒江东岸进行训练演习。同时，一贯行事缜密的卫立煌，也考虑到如此法不能奏效，还得准备“第二手”，即在实施更猛烈的炮轰后，采用古老的对壕、坑道推进法。

但要采用“挖壕打洞”法，就离不了工兵。反攻前，远征军配属工兵共5个营，其中4个营昼夜维持怒江各渡口交通，无法调用；一个要塞工兵营主力用于赶修公路桥梁；军属工兵营又各有自身任务。用于松山攻坚的工兵作业队，仅有120人左右，在22日、23日两天的战斗中，工兵用黄色炸药和莫洛托夫炸药瓶迫近敌堡垒爆破，即阵亡一百多人。此前，卫立煌曾致电军令部请调昆明工兵第15团配属远征军，未获批准。25日，他再次致电蒋介石，恳请允准将工兵第15团配属远征军，车运至惠通桥协助松山攻坚。电报中，卫立煌称：松山攻坚作战，“其最难解决者，实为技术问题，而非战术问题”[125]。

---

〔125〕据卫立煌6月25日电。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502页。

6月26至27日：D+22至D+23日

26日，鉴于第84团第1营伤亡奇重，第71军军长钟彬令其撤至腊勐街整顿。[126]

一个月来，尽管怒江东岸我军重炮不断轰击松山，但因对日军阵地详情缺乏了解，打击效果并不理想。为此，新28师师长刘又军指派师部参谋钟湘荣（中央军校第14期），随第83团攻击部队在第一线侦察日军火力点，绘制出要图和详图，交怒江东岸我重炮团，以期精确摧毁敌火力点，配合步兵下轮攻势。

24日，钟湘荣携带望远镜、制图工具，从师前指所在地猪圈山（今碧寨白花树附近）前进至滚龙坡附近，在第83团攻击位置侦察松山全貌，绘制出了战场平面图和写真立体图各一份。完成任务后，牵着马带一名勤务兵下山，走到半山腰时夜幕已降，遂在一农户家过一夜。25日晨起程，走到惠通桥西桥头，发现已断毁两年的桥面刚开始修建，仅拉起了4根钢索，上面铺着木板，别说马不能通过，人过也危险万分！怎么办？

我想到这是战斗任务啊，事关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就是上刀头下火海也得走！于是毅然决定，叫勤务兵把马带回去，自己一个人走。刚一踏上钢丝绳上的木板，就被远处施工的工程兵发现，他高声吼叫着："干啥的，你不要命呀！"接连不断地吼叫着，我装作没听见，踏着摇摇晃晃的木板，只顾往前走。每当左脚踏上前面一块木板，木板就右摆，两边又没有护栏可把，真叫人提心吊胆！碰上木板与前面一块间隔大时不得不一跳，每次一跳，脚下的板子晃动得十分厉害，心里怦怦直跳，只好蹲下来休息一会儿再走。最危险的是：有两次，因钢索晃动，前面的两块板子掉下去了，中间一个大洞，要前进不能，后退不行，往下一看，激流的江水，与脚踏的木板向水流的反方向慢慢朝空中在翻。

惊心动魄地在桥板上挪了几个小时，方才过了江，当晚赶至老

[126]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5页。

鲁田炮兵阵地交了所绘地图，住了一夜。26日，钟湘荣搭乘架桥的工兵的吊车绕至怒江下游，从攀枝花渡口渡江返回师部。据其回忆：“返回师里的第二天（27日）凌晨，天刚透亮，我军重炮阵地上响起了阵阵的炮声，一道道闪亮的火光直冲松山顶上日军阵地……”

——据载，因松山作战不利而即将奉命转调，令自视颇高的钟彬心情沮丧而不甘心。可能是对钟湘荣绘制送交重炮团的地图寄予希望，27日，钟彬令新28师师长刘又军为前线指挥官，以第117团团长江望山为步兵攻击队队长，炮10团团长胡克先为炮兵射击队队长，向松山发起了最后一次步炮协同攻击。

清晨6时，炮火准备两小时后，步兵发起冲锋。虽一度攻占山顶，但终被日军猛烈火力击退。[127]据美军战史记载，“在这次失败的协同攻击后，日本人反而夺回了新28师在这个月不久前得到的地盘。”[128]

两日来，在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和美军顾问直接组织指导下，新编组的“特种攻击队”在怒江东岸冒雨加紧训练新战术，据说“成绩尚佳”。[129]

6月28日：D+24日

日军拉孟守备队由于二十多天的战斗，弹药特别是手榴弹极缺。本来松山阵地储备有足量弹药，但在缅北我驻印军奇袭密支那后，已将所储备的部分手榴弹调往密支那。自6月下旬起，日军在每天的战斗中开始限量使用弹药。[130]

即日，松山上空雨云低垂。连日来听惯了美军战机轰鸣的日军，忽然感到空中的飞机声音有些异样。一个士兵抬起头来，一眼就看到了一架飞机机翼上涂有血红的太阳徽记。

“友军飞机！”整个阵地上的日军都忽然发疯似的喊起来。

---

〔127〕《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第105-107页。

〔128〕据美国出版的中缅印战区战史丛书《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第三部分史迪威指挥的难题。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129〕据卫立煌6月28日电。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第503页。

〔13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0页。

原来，这天日军驻缅甸第3航空军第204飞行战队的4架九八式直协侦察机（一说为一式战斗机）乘着阴雨间隙，前来给拉孟守备队空投弹药。据载，这是战斗开始后松山日军第一次看到航空兵的影子。

日军航空兵中尉清水千波驾机围绕松山盘旋，却难以分辨地面阵地上到底是日军还是远征军。这时，从战壕里跳出几名赤裸着上身的日军士兵，拼命地挥舞着太阳旗示意。日军飞机在我高射炮火干扰下强行降低高度，终于向约定的横股阵地投下了弹药，但准确落在阵地上的很少，无异于杯水车薪。[131]

而这天金光惠次郎却从望远镜中再次看到令他焦虑的情景：中国远征军开始抢修惠通桥附近的公路和渡河设施。已大致架通惠通桥，并以大约50辆汽车输送兵员和军需物资，同时由牵引车送过了4门重炮。金光下令以105毫米榴弹炮干扰远征军补给，但因缺乏弹药未能奏效。[132]当时，日军的105毫米榴弹炮是按每门500发炮弹配备，共储存了4000发。这些炮弹都存放在各火炮阵地旁一个建得很大而坚固的弹药库里，但开战后指挥官只管下令发射而未加节制，到目前为止已所剩无几了。[133]

超链接9：龙陵危机：松山侧背的惊险一幕（之二）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

迫于第11集团军的强大攻势，日军第56师团已决意自腾北收缩，仅以臧重康美大佐指挥第148联队主力固守腾冲，而将北线机动兵力全部调往龙陵。自6月17日起，短短几天内，从腾北开来的武田大队（第113联队第1大队）[134]、猪濑大队（配属第56师团作

---

〔131〕［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90—95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0页。

〔13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1页。

〔133〕［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09页。

〔134〕该部于6月8日接替第148联队宫原大队（第3大队）据守高黎贡山大塘子西部山坳，以阻滞我53军攻势。15日，向第148联队交割任务脱离战场，于19日赶至龙陵回归松井联队。据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0页。

战的第18师团第114联队第1大队)，相继突破远征军拦截拥向龙陵。此外，在上街(象达)附近新编成的永井支队(由师团参谋永井清雄中佐指挥的第53师团第119联队第1大队的2个中队)，击破我第2军第9师所部，解救被围困的上街守备队后转向龙陵，正从背后攻击我第88师；从芒市开来的山崎支队(由野炮第56联队长山崎周一郎指挥的联合步兵1个中队，装甲车、野炮各1个中队及临时作业队)，突破我第84团扼守的放马桥拦阻线，绕经伏龙寺与龙陵守敌会合。[135]6月20日晨8时，第56师团战斗指挥所也从芒市推进到龙陵。[136]

兵力集结后，第56师团决定采取攻势，令松井秀治指挥所属第113联队主力(步兵3个大队，配属装甲车1个中队)，于6月21日午夜沿公路两侧向黄草坝我第87师攻击。直接协助松井部队的一个炮兵大队(第1大队长池田喜六少佐，山炮4门)沿公路推进；同时令此前守卫龙陵的藤木部队(第2师团第29联队第2大队和1个中队)于当日夜突破长岭岗南侧我第88师阵地，向蚌渺攻击。[137]23日夜，松山祐三又将猪濑大队、奥仲部队(第53师团搜索联队主力及前隶属永井支队的第119联队第1大队)等兵力增派到松井部队正面。同时将师团情报主任参谋田口正之中佐派赴第113联队归松井指挥，向松井转达师团作战意向：尽速击破当面第71军主力，尾追败敌前出松山，营救拉孟守备队。[138]到23日午夜，松井秀治掌握的兵力已经达到4000多人。

22日，被史迪威迭次要求追查失守龙陵责任者的电报逼得大为恼火的蒋介石，给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发来严电，并在卫立煌的名字后面捎上了宋希濂、霍揆彰两个集团军总司令，云："……以优势兵力进攻弱势之敌，不特进展迟缓，且龙陵竟因少数敌之反攻得而复

---

〔13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3页。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0页。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8页。

〔136〕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5页。

〔137〕同上书，第106页。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303页。

〔13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6页。

失，实有损国军荣誉，”并明令“如有作战不力，着由卫长官依法严惩”。[139]在此危急关头，卫立煌严命宋希濂集结主力，全力反击黄草坝正面的日军，必须确保黄草坝一线，不许后退半步！意识到事态严重的宋希濂紧急调整部署迎敌：令第88师确保龙陵东南既得据点；以第87师控制于黄草坝及其西南公路两侧高地，第6军新39师两个团及第71军搜索营担负其右翼警戒；同时令第2军军部及其第76师主力位于蚌渺附近，协同第87师侧击龙陵东犯之敌。[140]

这时，钟彬已去松山，第71军副军长陈明仁全权负责所属第87师、第88师及配属部队的指挥。[141]在陈明仁严督下，第87师依托黄草坝西南公路两侧高地拼死抵抗。第76师第227团亦急赴增援长岭岗以东回头坡、空树坡方面。

自6月21日至26日，日军不断倾注全力，向我公路正面，以及空树坡、回头坡阵地结合部与锁钥部猛烈攻击。在日军军需班当差的松山大垭口村小伙子李堡林，因为久与日军厮混懂得一些日本话，他记得21日中午沿公路进攻的日军约有七八百人，由3辆坦克（实为装甲车）开路，4门山炮殿后，一路狂呼着“打开通路，杀回松山”的口号前进。刚到深沟，即遭到远征军截击，双方展开激烈厮杀。[142]敌我双方反复肉搏，炮声、机枪声、白刃战厮杀声轰天震地，惨烈异常。

陈明仁感到，日军的这次攻击显得异常疯狂。

据战场上虏获的日军第56师团于6月26日深夜下达的第217号作战命令，松山祐三将这次攻击命名为“蚌渺会战”，称：

一、此次蚌渺会战系对敌第11集团军主力决战；

二、兵团拟举全力获此一战之决胜，而一举解决今后之作战。

---

〔139〕据蒋介石、卫立煌6月22日往来电报。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19页。

〔14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7页。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82页。

〔141〕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2页。

〔142〕李堡林（口述）段润昌（整理）：《我被迫参加日本军队的经过》，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第165页。

各队应觉悟蚌渺会战之胜败，攸关兵团之存亡，务竭死力向胜利之途迈进；

三、松井部队代表龙兵团（第56师团代字）之命运，应于敌主力集结之前，迅速击灭当前之敌……[143]

总之，松山祐三这次是不惜孤注一掷，系第56师团生死存亡于所谓“蚌渺会战”。为此，他从芒市亲临龙陵督战，并且在作战命令最后一条特别注明“余在龙陵”，令全线日军压力顿增。而远征军已毫无退路，只能在此战求得决定性胜利，可以说成败利钝，在此一举，所以战斗惨烈自不待言。然而，在战后日本编撰的战史中，对此次攻击却有些一笔带过，究其原因，不过是遮掩失败之羞。

在这次战斗中，第87师经受了严重考验。据日本战史，当时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突然感到面对的远征军变了样，“第87师抵抗尤为顽强，其逆袭极其执拗”[144]。6月16日的败退是由第87师而起的，此后师长张绍勋一直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知耻而后勇，第87师此刻焕发士气顽强奋战，确有挽回部队声誉的因素。

说起来，第87师、第88师及反攻前被调往腾冲方向的第36师，可谓中国军队最早投入抗战的中央军主力部队，且彼此有着“血缘”关系：第87师、第88师前身是原卫戍南京的中央警卫军第1、第2师，第36师则源自这两师的补充团。抗战爆发前，在由德国汉斯·冯·赛克特将军及其继任者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将军指导的国防军改造中，这3个师是最早一批按德国模式装备训练的整编师，即通常所谓“德械师”。[145]早在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中，第87师、第88师即编为第5军，与蔡廷锴、蒋光鼐指挥的第19路军并肩投入对日作战。全面抗战爆发后，这3个师又率先在淞沪对日军发起攻势作战，与后续部队一道苦战3个月，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梦想。其后退至南京，又进行了惨烈的南京保卫

---

〔143〕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0页。两处关于此命令下达日期有16日、26日之别，联系战局进展判断应为26日。

〔14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7页。

〔145〕滕昕云：《铁血军魂——抗战前期之德式标准中央军暨淞沪会战评析》，第26页。

战，部队伤亡惨重，溃兵多死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此后，蒋介石命令重建了这3个嫡系师，将第36师师长宋希濂提升为统领这3个师的第71军军长，后在武汉会战之富金山、沙窝战役中曾挫败日军。作为一支有着特殊出身和战斗经历的部队，第71军没有理由缺乏骨气和血性，否则，如何面对惨死于南京的本军数万将士之鲜血！

另一支异常英勇的部队，是由第8军副军长李弥亲率的逐次抵达的荣誉第1师（荣1团及荣2团第1、2营）。6月25日，长岭岗阵地结合部被敌突破，第11集团军总部勐冒街廖家寨受敌威胁。危机关头，作为远征军总预备队的荣1师，奉卫立煌之命紧急赶赴增援，立即投入战斗。率先到达战场的荣1团在团长周开成指挥下，25日午前以第3营（营长胡开俊）首先攻占香菇岭，次日凌晨以第1营（营长陈其国）再夺回头坡，顿时扭转了战场态势。据钟彬回忆，该师“以其慷慨负责、勇敢牺牲之精神，先后予进击之敌以重大打击！”〔146〕当时，“荣1师在第87师、第88师之间投入作战，并未归第71军指挥，但其协同精神，与第71军隶属部队无异，抑有过之”〔147〕。在国军中，这支由抗日战场负过伤的老兵组建的“荣誉之师”声誉很高，此番钟彬亲身体会，为此感动敬佩不已。

6月26日午后，第56师团参谋长川道富士雄大佐带着师团作战主任参谋永井清雄中佐来到松井联队本部，视察敌情和地形。当川道大佐从望远镜里看到远征军在黄草坝两侧及纵深方向的地形和兵力部署后，意识到攻势已难有更大作为，师团制定的所谓“蚌渺会战”已面临破产。为面子考虑，他要求松井排除万难攻占公路右侧的最高峰阵地（5255高地），以表明随后日军的撤退是在有利条件下主动实施的，而后留下永井参谋接替田口参谋协助松井指挥，自己带田口匆匆返回芒市向师团长汇报。〔148〕

日军作战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发起这种“面子战”，尤其是当遭受我军重创或攻击受挫时，这种赌气争强式的“报复战术”一再

---

〔146〕钟彬：《龙陵会战史》，第31页。

〔147〕同上书，第32页。

〔14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7页。

出现，几成规律。这一行为固然有挽回士气的考虑，但不如说是一种不计作战目的、无谋的匹夫之勇，只能从日本人的民族性格中寻找答案。在华北战场，八路军曾多次利用这一规律，创造在同一地点多次重创日军的经典战例，比如杨成武指挥的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之战〔149〕，刘伯承指挥的两次七亘村伏击战。士兵训练有素，军官骄狂，战术僵化，重复犯同样的错误，“记吃不记打”，这让我军指挥员增强了战胜愚蠢敌人的信心。

6月27日，松井联队全力向黄草坝南方、公路右侧的制高点5255高地冲击，但在我第87师第260团的顽强抗击下停滞于半山腰。第56师团不得不命令从腾冲紧急抽调而来的官原大队（第148联队第3大队）〔150〕和正在进攻长岭岗高地的藤木部队主力，增援松井联队。同时，令正在攻击达摩山的奥仲部队掩护松井部队侧背。当日，第56师团接到通电，获悉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东条英机上奏缅甸方面军情况时，天皇裕仁对第56师团的“英勇奋战”赐语嘉奖，遂马上向一线部队传达，给屡遭挫败的日军打气。〔151〕

28日晨，满山浓雾。松井部队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于上午10时勉强攻占了5255高地〔152〕——第87师师长张绍勋就是在此刻自杀的，这个时机选择得太冤枉了，因为这时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而且，我荣1师后续兵力荣2团两个营也到达战场。第8军副军长李弥本想让该团接替荣1团战斗，让荣1团略作休整。但荣1团团长周开成表示，本团第3、第1营均已立功，希望再给第2营一个立功机会。得到李弥支持后，又指挥第2营（营长伍子敬）从第87师左侧向空树坡猛烈攻击。〔153〕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也坐不住了，亲

---

〔149〕阿部规秀率部进袭黄土岭，是为报复前一日在雁宿崖遭八路军伏击损失一个大队。

〔150〕第148联队第3大队（大队长宫原春树少佐），本系担负腾冲外围飞凤山防御任务的骨干兵力。6月27日，该大队被紧急抽调增援龙陵后，联队长臧重康美大佐不得不放弃飞凤山阵地而收缩腾冲防御兵力配置，这在相当程度上导致腾冲日军提前覆灭。详情可参阅拙作《1944：腾冲之围》下部浴火之城。

〔151〕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0页。

〔152〕同上。

〔153〕周开成：《荣一师光复龙陵之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93页。

临一线指挥，令第87师、第88师、第76师及荣1师各出动一个团转入攻势。[154] 在芒市的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听了返回的川道参谋长的汇报后，半晌无语。“知道步兵战斗力已达极限，遂决意停止攻击，命令各部队秘密与敌脱离，返回龙陵。”[155]

7月2日夜，松井秀治沮丧地率日军悄然撤出阵地返回龙陵。经清点，部队伤亡惨重，有的中队已减员至二十余人。[156] 那一刻，松井已经预感到，也许再也没有机会挽救松山的“火中之子”——拉孟守备队了。

由于远征军亟需整补，于是暂停攻击，在龙陵外围与日军形成对峙。

而此时，已经与日军在松山鏖战月余的疲惫之师——新28师官兵，并不了解发生在30公里外的这一惊险战事。

即日傍晚，完成模拟攻击演练的荣3团主力乘汽车从保山沿滇缅公路向怒江开进，在离惠通桥数里的公路附近下车待命。

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看见，在江东公路上停放着无数的汽车，部队很多，各兵种都有，最引人注目的是用载重汽车牵引着大口径火炮的炮兵。急性子的人，在车上就向车下忙忙碌碌的友军官兵大声呼问：“喂！松山在哪儿？”崔继圣也和大家一样，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朝对岸望去，见远处被一片白茫茫的云雾笼罩着，“之”字形的公路消失在一座长满松树的大山后面。“那就是松山！”被问的人漫不经心地说。“除了显得高一点外，这是一座普通的山。”当时崔继圣在心里这样想。

荣誉第1师，是抗战初期的1938年由几次大战斗中负过伤、治愈后再参战的官兵组建的荣誉团合并而成，第一任师长为郑洞国。1939年，该师属杜聿明第5军建制，在桂南昆仑关战场，曾与日军精锐、素有“钢军”之称的第5师团较量，打垮日军、击毙第21旅

---

〔154〕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82页。

〔15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08页。

〔156〕同上。

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赢得“昆仑关大捷”。不久部队改编，郑洞国奉命以荣1师为基础组建新编第11军，后改番号为第8军；如今该师师长为汪波（黄埔第3期），兵员大部分是湘西和贵州籍。这些老兵久经战阵，富于作战经验，战斗作风沉着、机智、勇敢，因此平素也有些傲气。他们似乎对盘踞松山不足一个联队之敌，很不在意。

“当时谁能知道，荣3团这些身经百战的战士中的绝大部分，却再也没有从这座普通的山上下来！”崔继圣后来感慨不已。

在第8军上校附员李荩萱（黄埔第5期）协调下，美军顾问组长斯培德〔157〕上校调拨来一只小火轮和一只拖船，连夜运送荣3团部队渡江，来回一趟约需40分钟。与此同时，美军顾问指挥工兵在惠通桥上架设了铁索便桥，部分部队从桥上通过。〔158〕崔继圣回忆，此时的便桥只是4条铁索上铺着一层薄板，没有护栏，摇摇晃晃的，许多人过桥不是很习惯，几个负荷较重的战士不慎滑倒掉下江去，被无情的江水卷走，惨叫声荡漾在峡谷中，传得很远很远。多年以来，老兵崔继圣从没有忘记过这几个还没有参加战斗就倒下的人。〔159〕

6月29日：D+25日

拂晓时分，荣3团主力两个营渡江完毕。怒江西岸的公路已经被破坏，崔继圣他们从山路插到公路边的一个不大的寨子下腊勐，并从这儿沿山洼走到腊勐街。腊勐街比下腊勐大得多，但被破坏的程度都一样严重，除日军认为有用的物资都搬到山上外，其余的全部烧毁。村子里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据说在两年前日军未来时就逃得一干二净，现在到处是我方伤员。荣3团就从这儿直接上阴登山去接替第71军部队的阵地的。阴登山上到处都是苦战搏斗的痕迹，可以看出敌人工事修筑得极为坚固而又复杂，使人暗暗吃惊。〔160〕

---

〔157〕美国新闻处编《怒江战役述要》中译作斯巴特。

〔158〕李荩萱：《忆松山攻坚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82页。

〔159〕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57页。

〔160〕同上。

一个多月后，中央通讯社记者黄印文来到松山采访，也曾从腊勐街攀上阴登山观战，对这座已经我军攻占、令荣3团官兵“暗暗吃惊”的敌阵地有如下描述：

……约莫一个钟头，我们置身于阴登山山麓了。山势作四五十度的倾斜，幸喜这日天晴，工兵又早已开出一条之字形的小径。我们在森林里绕来绕去，足足费了一个半小时，才达到山腰。这里山势屹岬，作六十度的倾斜，这个斜坡上数百株松树都已被敌伐去，只剩下一公尺高的树干，满牵着带刺的铁丝。坡上是敌人在阴登山的第一道工事，机枪阵地密如蜂窝。我跳进一条壕，顺着走去，发觉这条壕沟四通八达，竟将百十个大小堡垒连成一气，令人不禁赞叹敌人用心之苦。当然，更不禁为我攻克阴登山的将士叫好。翻过这一道工事，又发现一处更坚强的阵地。此地山势更狭，树林更密。敌人最后的一处工事，构筑在山顶上，整个的一座山头都给他们打穿了。这个堡垒群分作三层，层层相通，你攻击甲点，他可自乙点、丙点还击，不是奋不顾身的将士休想接近他。

到了这里，看到这一片被炮火摧毁得残败不堪的森林，看到树干上的表皮被枪弹剥得精光，怎不对我攻克阴登山的忠勇将士倍增怀念和钦敬，怎不感到滇西寸土尺地都是在艰辛中恢复的！[161]

6月30日：D+26日

卫立煌决心由第8军替换第71军担任松山攻击任务，但因第8军所属部队仍分散各处未到达战场。于是，先令第8军军长何绍周前来接替71军军长钟彬，完成战场指挥权的交接，同时电告蒋介石：

即到。渝委员长蒋：阪密。兹令第8军何军长即日指挥荣1师第3团（欠一营。含新编成之工兵队、战防炮队）、新28师（含配属该师之71军山炮两连）、新39师之第117团，及炮10团、炮7

〔161〕黄印文：《滚龙坡前观战记》，据大公报小丛书第三辑《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第240页。

团混合营，担任松山、大垭口敌堡垒阵地之攻击。第71军钟军长仍回龙陵方面，指挥该军主力作战。除分令外，谨电核备。职卫立煌。[162]

6月4日至7月2日，为围攻松山前期战斗。远征军攻击松山部队，陆续增加到4个团（新28师的3个团和新39师第117团），但因伤亡过大，实力已不足3个团，且久战疲劳，阴雨连绵，山陡路滑，攻击难以奏效。到6月底，虽然向松山各高地发动多次进攻，杀伤了不少敌人，摧毁了一些堡垒，却未能取得显著进展。

在这一个月的战斗中，以第71军新28师为主力的各攻击部队付出了伤亡近1700人的重大代价。其中士兵阵亡805人，负伤736人；军官阵亡50人，负伤108人。此外失踪32人。毙伤日军596人，缴获步枪16支。[163]敌我伤亡比例接近1：3，战况的惨烈和我军损失之巨大于此可见。

笔者在研究资料时发现，新28师系统的战争亲历者，往往对松山之战记述语焉不详，给人以乏善可陈之感。尽管该师加一个第117团在松山打了一个月，发起大小5次进攻，但在后来的战史上只记做“一战松山”，或曰“松山前期战斗”。而第8军参战后，先后发起9次攻势，虽然战事规模、投入兵力不等，但一次算一次，后来战史上并称为“十荡十决”。第8军在战后总结时，也对新28师颇为不满，认为该师打了一个月，也没有摸清敌情，影响了本军的作战指导，让接替参战的本军部队初战阶段吃了大亏，否则还可以打得更好。[164]

新28师不如第8军，不仅仅是战斗力，可能还包括战斗作风。这从该师在6月下旬发出的一系列战报中即可窥知一斑：

6月25日7时：“松山顶上敌堡垒已为我攻克”，“松山西北及

---

〔162〕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0页。

〔163〕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5页。

〔164〕参见尾章《松山战役检讨》。另，笔者从新28师作战部门绘制的松山战斗示意图上看到，其对于日军松山阵地分布情况描绘非常粗劣，对日军堡垒阵地只有面的印象，而无点的定位；而后来第8军绘制的示意图就准确得多。

大垭口数个堡垒正被我围攻中”；

6月25日20时30分：“松山之敌5处地下堡垒，已经被我攻占4处，余一处正被我第82团、第83团围攻中”；

6月27日10时：“松山之敌已被我新28师四面包围，于22日午后3时攻克，已占领黄家水井、邦掌寨、大垭口、关城、大漫渍、大董瓮”；

6月28日17时：“松山最高点于27日为我新39师第117团占领；新28师亦占领一山头”；

7月2日20时：“松山残敌被我包围中，敌战车五六辆增援，均被我击毁”，“荣1师（一部）主攻松山，残敌尚有二三百名”……[165]

看了这些前后矛盾、浮夸武断的“捷报”，再联系后来第8军的两个月苦战，真让人感慨不已，对第8军对新28师的怨愤深感理解。新28师在松山的浮夸作风，与其所属的第71军的龙陵“报捷”，确有异曲同工之处。这种恶劣积习和作风的形成，自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仗乃是搏命，平日作风浮夸，战场上必然要付出血的代价。在松山战役中，这些血的代价，主要由一线冲锋陷阵的校尉级军官和士兵的巨大伤亡“支付”了。

当然，新28师的战斗也削弱和疲劳了日军，摸到敌作战的一些规律，给各级指挥官正确认识松山日军提供了依据，也给后续攻击部队提供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据日军战史，此时日军已无力反击夺回新28师既占阵地，守备队处于四面被包围的境地，健康的士兵只剩下381人。[166]

鉴于两天前以飞机对松山日军首次空投补给成功，即日，缅甸日军第3航空军司令部命令，由飞行班长小林宪一中尉指挥2架九九式军侦察机（日军简称“军侦”）配属第33军，成员包括山田朝光、迎直之两名飞行曹长，及整备班甲斐明伍长以下4名机务兵，专事负责对拉孟守备队的后续补给任务。同时，令第204飞行战队

---

〔165〕黄杰：《滇西作战日记》，第166—185页。

〔166〕［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1页。

派出12架一式战斗机（代号“隼”）担负掩护任务，由战队长相泽少佐指挥。第3航空军司令部参谋向小林介绍情况时说：“……拉孟守备队目前的处境完全超出了预想，战况令人绝望。”小林闻听心境黯然。[167]

此后，日军驻缅航空兵第204飞行战队、第50飞行战队先后出动十余次飞临松山为拉孟守备队空投补给，但在我地面高射炮和第14航空队战机干扰下效果不佳，直到9月3日拉孟守备队覆灭前4天终止任务。

7月1日：D+27日

即日，第8军军长何绍周轻车简从抵达松山，第71军军长钟彬奉命转回龙陵。从保山起程前，卫立煌曾当面激励何绍周：看来打松山还得靠你们这支老部队！你们第8军到位后，新28师就撤下去。

但此时何绍周能掌握的第8军部队还不到一个团。

第8军因屡次变更任务，所属3个师目下分散数处：其第103师驻祥云、弥渡；第82师防守怒江东岸。荣誉第1师第1团、第2团（欠第3营）增援第71军，正与日军在龙陵外围激战；荣3团第3营防守保山机场。根据远征军司令长官部6月中旬的预令，目前仅荣3团第1、第2营，及军工兵加强爆破连、战防炮营开至松山。

当日，新39师第117团亦奉第11集团军宋希濂命令转往龙陵。卫立煌急令在怒江东岸担任江防的第82师第246团迅速渡江，同时令已进驻镇安街的荣2团第3营转向松山开进。军长何绍周命各部于3日内在松山地区集结并完成战前准备，预定7月5日拂晓对松山、滚龙坡两路进攻。

后来，第8军投入松山战斗的兵力为6个半团和全部军直属队，兵力累计达到2.5万人。然而，这些部队却是逐次“添油式”地投入战斗的。打松山到底需要多少兵力，远征军的各级指挥官都没有底数，却都做了最低估计，以至于对松山的攻击屡屡出现兵力告急，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伤亡过大。对新28师攻击松山一个月的教

---

〔167〕［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92页。

训，第8军只约略对堡垒攻坚需有办法这一点有些心理准备，至于兵力使用原则全然没有成熟的考虑。这里固然有两军交接仓促，无暇交流经验的原因，但更重要的也许是：第8军根本就没把新28师的经验当回事。据说，奉令接替新28师攻打松山后，第8军官兵议论纷纷："新28师在松山被打垮了？要是早点让我们上去，恐怕早就收复松山了。"甚至还有这样说的："新28师垮得好，不垮显不出第8军的强大。"[168]

第8军原驻防滇南，是反攻前才被确定为远征军总预备队的，与第11集团军各部素无血缘关系，不但辖有荣1师这支全军公认的"王牌"，第103师是何绍周带出来的贵州子弟兵，第82师官佐也以黔籍居多，又有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个大靠山，这些优势合在一起，自然自信满满；而新28师是什么部队？第一次入缅作战的败军，宋希濂收编的"孤儿"。傲慢导致偏见，就注定要再次"交学费"。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第8军的轻敌情绪非常担心，在召见军长何绍周时，向他传达了蒋介石对松山之战的关注，同时也想让何绍周以清醒的头脑去完成任务。卫立煌不无自责地说："松山敌情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们事先不明就里，估计有误，导致今日的被动。这个责任应由我本人来负。新28师是有功劳的，他们以极大的代价帮助长官部了解了敌情，使我们对敌人的阵地体系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倘若不是新28师的艰苦奋战，前一阶段的代价恐怕会由第8军的部队付出的。你回去后立即进行部署，务求周密细致，尤其要向交防的新28师部队充分了解日军的阵地构筑和火力配备情况，制定有效的攻坚方案。长官部将从炮兵、空军两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具体怎么打由你决定，但务必不可骄躁。"[169]

这天，怒江惠通桥附近的简易桥修复通车。

其后，远征军便依靠汽油桶渡桥以汽车输送弹药、物资，为下

---

〔168〕《"东方直布罗陀"的累累白骨——血战松山》，杨刚撰文，云南施甸县人民政府网原创作品：http://www.ynsd.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07。

〔169〕方知今：《爱国将领卫立煌》，第195页。

一步攻势做准备。从渡河点到松山阵地的海拔高差约为1300米[170]，汽车的输送纵列，沿陡坡绕“之”字形蜿蜒爬行。由于公路处于日军火炮射界死角，日军只能听着我军汽车的引擎声昼夜不停，看着我军在阵地前数百米处大量囤积作战物资。

在滚龙坡阵地以西通向龙陵的公路上，远征军也开始进行运输。这些物资是支前民工和骡马队从东边的山谷小道绕过松山运送上来，而后装载汽车运往龙陵的。日军从阵地上望见，在烟雨迷离的夜空里，闪耀着频繁往返的汽车前灯的白光，心情沮丧莫名。

日军拉孟守备队准备应对远征军的新一轮攻势，修复连日被炮击、轰炸破坏的阵地。我军攻克阴登山和松山东麓的前沿阵地后，金光惠次郎将溃兵都收拢到了松山主阵地。远征军攻击的目标，已指向松山主峰的关山阵地（子高地）。

---

〔17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记载，“从渡河点到拉孟阵地前沿的比高约为700米”，见第159页。从Google地图标示的等高线判断，应该不止。

第 5 章　二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7 月 2 日—7 月 6 日。
指挥：第 8 军军长何绍周。
主力：荣 3 团第 1、2 营。
进展：主攻松山子高地未果。

（参阅附图 5、附图 19）

7 月 2 日：D+28 日

即日，第 82 师第 246 团（团长田仲达）奉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渡江。

连日来，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一直在松山观战。7 月 2 日，当第 71 军军长钟彬悻悻然离开松山之际，多恩在作战日志中记述了对其作战指挥的评价。这份保存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中的资料，过去未在国内著述中使用过。多恩坦率直陈，言辞犀利，对于习惯"为尊者讳"的国人来说，也许难以接受，但对于这一重要他方亲历者的证言我们应该直面以对：

1. 松山战役的指挥官钟彬一直在用小股部队对日军的坚固工事进行攻击，伤亡惨重且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战斗中，第 82 团仅剩 150 人）。钟彬不断要求对日军阵地进行轰炸，实际上空中轰炸根本不可能摧毁日军的阵地。钟彬的如意算盘是让空军清除所有的日军碉堡，然后他再派人占领日军阵地。目前，日军工事里总共也就不到 200 人在据守。

2. 当第 71 军向前线开拔的时候，钟彬将全部的新式 37mm 战防

炮都留在了保山的仓库，仅携带了6门没有什么准头的老式战防炮和炮手。在松山战役中，钟彬没有任何可以用于近距离摧毁日军碉堡的武器。

3. 钟彬向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报告，经过对松山阵地的反复进攻，他已经“黔驴技穷”了。同时，他又在不断要求获得补充兵员。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要求美军顾问团拿出作战方案。我们拿出了一个很普通的方案，这个是美军在其他战场曾经使用过的，我们仅对其进行了少许修改（应指6月25日提出的“特种攻击队”战法——笔者）。即挑选精干工兵和步兵组成突击队，在模拟的松山阵地反复演练，使用这个方法将会使同样的进攻伤亡率大幅度降低。

钟彬打算使用刚刚抵达增援的荣誉第1师再次攻打松山。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回复钟彬不要贸然行事，告诉他可以在美军顾问团建议组建的突击队完成训练后，使用这支新的队伍再行攻击。钟彬却执意要求马上再次攻击松山。他只是想挽回自己的颜面，至于最后到底会取得什么样的战果，他的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为此，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连发四道命令，其中有一次是卫立煌亲自下命令，才迫使钟彬同意暂缓攻击（钟彬仅仅是急于为挽回自己的颜面而战，如果他仍是沿用之前的战法，只能是再次失败）。

第二天，钟彬派荣誉第1师一个营（应指27日的最后一次攻击，此时荣1师部队尚未到达，应为第117团之误——笔者）对日军的一个相对薄弱的阵地发动进攻，在付出了60人死亡的代价后，阵地被占领。但是这个阵地正好处在日军另一处高地的火力范围内，因此钟彬又命令攻击部队撤出他们刚刚占领的日军阵地。这就是钟彬一贯使用的作战方法——以惨重伤亡突破敌人某个薄弱环节，然后因为无法继续扩大战果而放弃已经到手的战果。

4. 钟彬还想再进行一次类似上述情况的进攻，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他在我到达他的防区之前不得轻举妄动。

在和钟彬充分交流之后，我和塞尔斯[1]上校都认为钟彬已经不

〔1〕即约翰·塞尔斯（John K.Sells），美国陆军上校，当时在远征军顾问团供职。1946年曾任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组长访问延安并结束该使命。

再适合担任松山战役的总指挥了。他既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接受他人的建议。钟彬一再坚持说他一定能够拿下松山，可是他却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钟彬请我转告卫立煌，让他不要对松山的战事抱有过多的期望；并且他还想知道万一松山无法攻克，卫立煌是否有相应的撤军计划。钟彬一边不断重复说拿下松山是重开滇缅公路这条物资供应通道的关键，一边又在喋喋不休地讲夜间进攻没有用，火箭筒无法摧毁日军碉堡，他的部队已经相当疲劳，只有通过空中力量才可以攻下松山……当我在钟彬的指挥部的时候，第 71 军的作战处长曾对我说，不要什么战术，只要有足够的兵力，松山就可以被拿下。

我通过电台告知卫立煌，原计划的进攻取消。钟彬的状态令人非常沮丧，他是在白白牺牲士兵的生命。我会尽快返回长官部，向他汇报当前情况。钟彬不具备担任指挥官的能力，他的行为对整个指挥体系都造成了影响。在他麾下的部队，只有在敌方抵抗微弱的时候才可能取胜。我向卫立煌陈述了对钟彬的所有看法，建议他立即将钟彬解职。如果一定要顾全他的脸面的话，可以把他派往龙陵。至少在龙陵，他能惹的麻烦还不至于影响全局。卫立煌接受了我的全部建议，他命令第 8 军军长（何绍周）即刻赶往松山接任钟彬的指挥位置。筋疲力尽的新编第 28 师残余部队（主要是在士气上受到钟彬的严重影响）撤出阵地，由第 8 军的部队接手。[2]

7 月 3 日：D+29 日

据日方记载，一整天中国远征军都在换防，受到惨重伤亡的新 28 师后撤到镇安街方向，由第 8 军荣誉第 1 师接替阵地。[3] 其实，荣 1 师已到达松山的仅为荣 3 团第 1、2 营及荣 2 团第 3 营。此外，第 82 师第 245 团第 3 营亦到达一部。

在金光惠次郎的望远镜里，一位中等身材、微胖的陌生中国将

〔2〕《渡江初期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 · 多恩准将报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藏资料。李晨提供，张太雷译文。

〔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2 页。

军这天频繁出现在竹子坡5600高地。日军情报部门对远征军将领卫立煌、宋希濂、钟彬都有深入研究，但并不熟悉第8军军长何绍周。对第8军所属部队，也仅仅熟悉荣誉第1师。

“支那军的荣1师上来了！”松山日军开始悄悄议论着，尽管对中国军队素来轻蔑，但在昆仑关挫败过“钢军”第5师团的这支劲旅，还是让不少日军官兵心里有些忐忑。〔4〕

而此时第8军的装备、训练水准到底如何呢？应该说并不乐观。

据第8军战后编撰的总结材料《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讲：

在滇南驻防时期，第8军虽也被列为远征军督训部队，但实际上还没轮上配发美式装备。转隶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直属后，在向滇西开拔途中，行军到开远、昆明、云南驿等地，装备才陆续发下来，到保山时还没有发齐。军奉命过怒江时拥挤而来，装备都是由美军联络组边领边发，也没有严密手续，部队过了江，军长何绍周还不清楚自己的部队都添置了哪些家伙。说到部队训练情况，在滇南时期，全军集训了约三分之二的军官，但教育重点偏重于对各种武器技术性能的掌握上，战斗战术运用基本上还没沾边。所以后来在战场上，没参加集训的那些营连排级军官经常不知道手里的家伙怎么用，需要明白的上级长官临阵提示。也幸亏还有三分之二的干部懂得这些武器，否则真成了烧火棍了。〔5〕

第8军，这个应考准备相当不充分的“考生”，就这样上了松山这个最严酷的考场。

7月4日：D+30日

第8军所属部队与新28师阵地交接完毕，完成对松山日军的包围。即日，怒江东岸重炮开始对松山进行区域性轰击。第71军山炮连、第5军山炮连推进至5600高地、大董瓮地区占领阵地，炮兵观察所设于阴登山，听从荣3团团长赵发毕指挥，准备直接协助步兵攻击。〔6〕

---

〔4〕［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84页。
〔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页。
〔6〕同上书，第6页。

荣3团团长赵发毕召集副团长陈运昌和团部副官崔继圣及第1营营长陈岳峰、第2营营长郑仁祥分配战斗区域。令卫生队长刘贞夔开设救护所，准备接收伤员。而后，官兵们开始紧张地修筑工事，作进攻准备。[7]

赵发毕是军长何绍周的外甥，是个有“靠山”的人，然而在作战中非常勇敢，常常亲率部队突击，是攻打松山的十来个团长中的“明星”。可见，即便是在裙带关系风气浓重的旧军队，也不乏忠勇强干的“太子党”。在中国军事史上，从霍去病与卫青（甥舅关系），杨家将、岳家军、戚家军到曾国藩的湘军，一直有这样的传统。既然个人的身家性命和前程系于一支派系军队，为它拼死而战，既是报国也是保家；而关键时刻最需要献出忠勇的，自然是与这支军队关系最密切的人。“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在旧时代的中国，不是说说而已。

7月5日：D+31日

第8军对松山的首度攻击开始了。

主攻部队为荣3团的第1、2营及第82师第246团。荣2团第3营接防阴登山阵地；第245团第3营一部推进至下腊勐，担任荣3团战斗右翼掩护任务。军长何绍周对兵力进行调整后，任务区分为：荣3团从松山正面攻击，直取核心阵地；第246团从大垭口、滚龙坡方向做牵制性攻击。[8]

无论如何，这次攻击的发动都显得草率了些，但军长何绍周似乎信心很足，凌晨时分即在美军顾问组长斯培德中校陪伴下，带着参谋人员进入竹子坡炮兵观察所观战。

拂晓前3时15分，何绍周下令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松山、大垭口、滚龙坡，施行区域性破坏射击。在松山下方千余米处丛林中待命的新参战部队官兵，感到了来自大地深处的震颤，过去在日军炮火下吃的亏太多，现在完全有理由相信日本兵正在绝望地狂吼、乱窜，接着被炮火撕碎。

---

〔7〕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58页。

〔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7页。

5时，荣3团依炮火射击的效果，以第1营在右、第2营在左，开始从松山东坡向山顶运动，部队成战斗队形交替掩护前进。此时正值雨后，坡陡崖悬，路滑地烂，泥泞的山坡犹如泼了油一般。官兵们手脚并用地朝山头攀爬，开始感觉困难，但不时遇到浓雾，两对面看不见人，而且又有粗大的树木遮蔽，对部队进攻很有利。在开阔地带，官兵们以树枝伪装匍匐前进，进入山雾或有树木遮蔽时则跃进快跑前进。进入距敌阵地300米处，待炮火延伸后，各营连跃进，一举突入敌阵，于5时40分占领了子高地前沿阵地。

但因敌子高地堡垒坚固，我炮兵火力未能完全破坏。敌堡垒中，原先在下层工事躲避炮击的日军此刻已进入射击位置，一时间各方交叉火力向我军猛烈射击。40分钟后，荣3团攻击部队伤亡甚重，无法立足，不得已，难以坚守的部分又退下来，在松山主峰下约100米处的山腹隐蔽，就地构筑简易工事潜伏，准备再行攻击。[9]据美军战史载，此次进攻“由于兵力不足，虽然部分日本人的阵地被占领，但是日本人马上组织反击，结果到了黄昏，中国人在损失了70多人的情况下，又回到了原来的阵地。第8军美军顾问组长斯培德中校向弗兰克·多恩准将报告，破坏班和偷袭小队之间的配合非常糟糕，要求这样的训练必须马上加强”[10]。

据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回忆：

在这次战斗中，从右翼前进的第1连被日军发现后，以炮火和机枪近距离向我射击，我官兵大片大片地倒下，连长受伤，部队开始溃散。突然，位于攻击部队后方的军直上士号长杨敬财站起身吹响了冲锋号，正在卧倒避弹的士兵，精神倍增猛然奋起，意欲溃退的士兵立即回头向敌阵地冲去。日军忙集中火力向杨敬财射击。霎时我军杀声四起，压倒了敌人的枪炮声，越过了敌人的铁丝网和各种障碍物及战壕，从右翼冲上了子高地前沿，和冲出来的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就在这时，几个一直隐蔽的侧面敌暗堡突然吐出了火舌，向我

---

〔9〕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1—72页。《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7页。

〔10〕据美国出版的中缅印战区战史丛书《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第三部分史迪威指挥的难题。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第1连扫射，眼看我军又要被击退。杨敬财挂起军号，雷声似的大吼："一连的弟兄们跟我来！"抽出背在身后的大刀片挥舞着率先冲上敌堡。喷火手用火焰喷射器抵着敌堡枪眼喷射，只见堡内几个火球冲出来，在地上来回滚动，发出可怕的惨叫。杨敬财和战士们用大刀片对浑身冒火的日军一阵猛砍，只见几个日军的头像西瓜似的，滚落在地下。我军占领了前沿阵地。

所有这一切，陪同美军顾问观战的崔继圣在望远镜里看得一清二楚。当时温夏克少校在崔继圣旁边高兴地跳起来，用手拍着崔继圣的脊背高兴地叫道："Bugler（号兵）顶好！"[11]

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30余人，缴获机枪3挺，弹药、军用品和其他物资无算。战斗一结束，荣3团团长赵发毕当即报请军长何绍周，将杨敬财破格提升为上尉。杨敬财可谓松山战役中第一个书写了战场传奇的英雄，他的故事后面还有续篇。

第246团当日接替新28师滚龙坡方向防务，未能积极活动。[12]

超链接10：中国远征军中的"美军顾问团"

1943年春，为打通中印交通线，史迪威拟订了从缅北和滇西两路反攻日军的作战方案，相继组建X军（中国驻印军）和Y军（中国远征军）。X军在印度蓝姆伽组建后，总指挥一职由史迪威亲任。最初，出于对中国高级将领的成见，他想让美军军官担任中国驻印军所属部队的营级以上指挥官，但新1军军长郑洞国（后任驻印军副总指挥）、新38师师长孙立人、新22师师长廖耀湘等将领认为这样会伤害中国官兵的民族自尊心，坚决予以反对。史迪威只好作罢，改为在团、营级单位配置美军顾问。[13]

后来，这一模式也被一年后组建的Y军——中国远征军所沿

〔11〕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1页。崔继圣回忆这次战斗发生在"7月初旬拂晓"，依时间推断只可能为7月5日的攻击行动。

〔1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7页。

〔13〕郑洞国：《中国驻印军始末》，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71页。

袭。亦即，美国军人不指挥远征军，仅以顾问的身份提供援助。司令长官卫立煌要求美国方面给予支援的项目是：1. 协助训练；2. 交换情报；3. 援助补给；4. 保证空地联络。根据这一要求，美国于 4 月 29 日决定设置一个野战司令部，由弗兰克·多恩准将任参谋长，随同卫立煌的司令长官部行动。这个司令部设有 G2（情报）、G3（作战）、G4（兵站）各部。初期，中国远征军以师为单位，均设置了美军巡回训练班，在卫立煌的要求下，又增设到了团级单位。各训练班由 6～20 名美国军人组成，包括步兵、炮兵、工兵、通信、会计、兽医等专业人员。此外，还派出流动外科、野战医院和兽医分遣队随同远征军出征，并在重要桥梁和机场配置了美军高射炮连。

关于补给方面，美军野战司令部的 G4 部（兵站）与美军后勤司令部之间，在昆明和云南驿补给基地交接粮秣、弹药、装备，随后用卡车输送到位于滇缅公路上的远征军部队。再由驮马队驮越群山补给前线的部队，必要时向战场空投。〔14〕

自中国远征军渡江后，各集团军总部及军、师、团部，都配属了人数不等的美军联络参谋组（Y-FOS）。按美方规定，Y 军中的美军顾问的正式使命是“帮助改进中国陆军的战斗效能”。首先，是为中国远征军配置教官；第二，供应武器、弹药、医疗和其他装备，为装备部门的组织提供指导；第三，在作战中，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和参谋人员提供指导。〔15〕

远征军长官司令部最高的美军顾问军官是弗兰克·多恩准将，是史迪威的老部下，出身于西点军校。在我军反攻后曾到腾冲、龙陵、松山前线视察战况，对配合我军反攻及时出动第 14 航空队进行空中支援，尤其对日军坚固阵地进行轰炸，做出了贡献。虽然平日有优越感，瞧不起中国军队，但在我军攻克松山后，曾真诚地对所属的美军军官说：“这次作战是极其艰苦的，牺牲是惨重的，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因此，这次作战的每一胜利，

---

〔14〕美国出版战史《中国—缅甸—印度：史迪威顾问团》，转引自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83—85 页。

〔15〕2004 年 5 月号《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文章《寻找少校麦姆瑞》，孙敏、章东磐、江汶等撰文。

都应归功于中国。"[16]

第 11 集团军总部的联络参谋组组长是吴德（Wanlter Wood）上校、副组长魏德迈（Wei Demai）中校，他们都是从欧洲战场调来的即将退役的年老军官，另外还有几个尉官和军士。他们带有自己的收发报机，每天都能收听到世界各地的战报；还有一部雷达机，专供对空联络之用。此外，还带有观测、测绘等器材和口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每天与远征军联系，了解当日作战情况、司令部及战况变化；更重要的任务是负责与美军第 14 航空队联系，传达我方要求负责补给的联络及陆空协同作战诸事宜。

当时，荣 3 团上尉副官崔继圣被安排担任与驻该团的美军顾问的联络工作。他说，美国官兵到团里的任务，军部是这样通知的：在制订作战计划、指挥战斗时当参谋，并临场指导我战士学会掌握部队新配备的美式装备，如火焰喷射器和其他爆破器材等。原则上不让他们参加战斗。年轻的美军军官，多数是在大学期间参加后备军官训练团[17]时取得尉官资格，战争爆发就上了前线，在美式武器装备应用方面经验较丰富，但带兵指挥上未必都比中国军校毕业的营连长强。军士阶层中"蓝领"出身的多些，平日语言较粗俗，知识面也窄，许多农家子弟很朴实。他们同中国军队同吃同住，都毫无怨言，每天总要干完当天的工作，并写完工作报告才休息。他们临来时，团长赵发毕一再告诉自己，要特别注意他们的安全，不让他们到危险的地方去，不能让他们上前沿阵地，否则他们有了伤亡不好向上级交代。但是荣 3 团的美军联络参谋组长温夏克少校，总是悄悄带着译员背着自己到前面去察看情况，崔继圣一发现，就随着他们同去。[18]

这些美国军官共同的爱好，是从中国军人手中收集从战场缴获的各种战利品，日军的太阳旗、军刀、"千人针"之类都是追求的对象。为此，他们不惜以个人随身携带的各种物品与中国军人交换。宋希濂等将领了解到这一特点，主动将部队缴获的日本军刀送给吴

---

〔16〕陈宝文：《反攻腾龙战役概述》，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滇西抗战》，第 308 页。

〔17〕美国陆军后备军官训练团，是美国陆军设在地方院校进行军事训练和招募大学生到部队服役的组织机构，是陆军借用地方院校培养军官的重要场所，被称为"地方大学中的军官学校"。

〔18〕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第 161 页。

德等人，借此大大地增进了美军的好感，密切了关系。[19]

西方军人素来重视军事职业中的精神满足感，对身处二线的美军人员来说，能得到前方中国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珍贵战利品，确实能满足某种自豪感，把它们作为胜利回国后在和平生活中可堪夸耀的人生资本。

7 月 6 日：D+32 日

首度攻击受挫，何绍周开始意识到松山这块骨头难啃。

当日，何绍周命令各部休整待命，在阵地前沿修筑工事，同时召集营以上指挥官开会研究作战方案。

指挥部分析了日军防御部署，认为：日军松山阵地，子高地堡垒当前，为最主要的据点，工事坚固，炮兵无法破坏；又于谷地密林中筑有多处隐蔽侧防机构，并于反斜面构筑阵地以掩护子高地。即便我军以中央突破摧毁并占领子高地，也将遭到侧面及反斜面袭击而难以立足。而西南方向的滚龙坡只有几个主要堡垒，因植被稀疏，其侧防潜伏地堡也容易判明，且公路从滚龙坡脊背而过，攻击较为容易；其西南侧有一核桃箐高地，可以瞰制整个滚龙坡，步兵与炮兵协同易实现。于是，指挥部决定先由两翼进攻，占领滚龙坡及黄土坡后，形成夹击局面，再行中央突破。

于是调整作战部署：决定以主力攻击滚龙坡之堡垒阵地；其他各部队亦应同时进击，牵制敌人兵力。怒江东岸及竹子坡炮兵，以炮火破坏滚龙坡。预计次日下午发起攻击，而后利用夜暗巩固已占领阵地。这次战斗，指定第 82 师师长王伯勋担任战场指挥。[20]

以滚龙坡为攻击突破口，是这次会议最重要的决定，此后再未改变。

---

〔19〕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62 页。

〔20〕《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9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2 页。

第6章　三战松山

时间：1944年7月7日—7月11日。

指挥：第8军军长何绍周、第82师师长王伯勋。

主力：第246团、荣3团主力及荣2团第3营。

进展：进攻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

（参阅附图5、附图25、附图26、附图27）

7月7日：D+33日

清晨，第82师师长王伯勋下达作战命令：

第245团第3营迂回于敌左侧背（黄土坡）牵制吸引敌兵力；荣3团并指挥荣2团第3营包围攻击子高地；第246团一部攻大垭口、红木树[1]之敌，主力由小利刹（今做小立色）、核桃箐一线进攻滚龙坡甲、乙、丙、丁、戊5个高地。怒江东岸重炮兵及第71军山炮连以主火力破坏滚龙坡；一部破坏松山阵地，而后以一部压制丑、寅、卯高地增援反扑之敌。第5军山炮连归第246团直接指挥。[2]

傍晚5时开始，怒江东岸和竹子坡炮兵集中火力轰击滚龙坡阵地。晚7时，第246团主力利用炮击成果，从西南方向核桃箐、红木树一线对滚龙坡发起攻击。初期进展顺利，晚8时一举攻占了丙高地，随即突击乙高地而占领之。但丁、戊两高地上的敌堡垒难以攻克，许多士兵被来自堡垒中的“火镰”拦腰割倒，整个部队队形

〔1〕与怒江坝附近的红木树不同，此红木树为日军侧面阵地（庚高地）前沿。

〔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9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2页。

顿时大乱。因步兵过于接近堡垒，加之天已薄暮，因观察受限我直瞄战防炮无法支援，而敌侧防阵地却毫无顾忌地袭击进攻部队，并以强大的火力阻断增援。第246团尚还来不及重新组织起队形，几十名日军已冲出堡垒对我实施反冲击，使部队伤亡惨重，只得于拂晓退回公路南侧，就地构筑工事。该团另一部攻击大垭口，已接近敌3座堡垒，因主力之攻击未达预期成果，受敌交叉火之射击，无法立足，于次日拂晓退回。[3] 在美军顾问团的记载中，这次进攻使日军“感到惊讶”，“几乎在将要夺取全部要点时功败垂成”，为此颇为遗憾。[4]

在松山主峰东坡，荣3团团长赵发毕亲率3个连队，利用炮击成果进行正面强攻。战场上硝烟弥漫，枪弹曳光飞舞，双方互投手榴弹，火光不时升空。19时，一举突入山顶。但堡垒仍攻击不下，而四周日军的侧射火力密集，使进攻部队无法扩张战果。

入夜后，枪声稀薄，次日凌晨仅有5名伤兵退回，先头营的其余200余人均无动静。据伤兵报称，子高地中央有一大地堡，攻至该堡垒近旁，敌紧闭堡垒门户，没有活动，而四周暗堡辐射火力不时袭来，密不透风，因难以固守只得退回。

从阴登山顶部向巳高地攻击的荣2团第3营，也无进展。[5]

超链接11：松山阵地命名及作战地图

研究松山战史资料，首先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阵地命名问题。

松山上这大小十多个山头，在长期生活于斯的当地人那里，原本都有其名称，比如大脑子、官坟坡、红帽坡梁子之类，后来龙陵县政府在松山战场遗址上所立的标志，都是如此称呼。然而在中日双方的战史上，这些山头都另有其名，远征军以中国古老的天干地

---

〔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9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2页。

〔4〕据美国出版的中缅印战区战史从书《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第三部分史迪威指挥的难题，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10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2页。

支及数字来编号[6]，日军则大致以最早进驻松山、守备阵地的炮兵及步兵中队长名字命名。如“西山”阵地，对应野炮第2中队长首任中队长西实——这是野炮第1大队进攻松山时的命名[7]；“关山”阵地，对应野炮第9中队首任中队长关升二；“音部山”阵地，对应野炮第9中队第二任中队长音部嘉次（**后来音部嘉次转任野炮第6中队长，由毛利昌弥接任**）；“绪方山”阵地，对应于野炮第8中队首任中队长绪方意诚；而子高地下面那片水塘，以野炮第8中队第二任中队长有岛芳次的名字命名为“有岛池”。“原口山”阵地，则对应着步兵第2中队长原口九十九。

据日方资料，这些在松山留下名字的日军中队长中，原口九十九于1944年9月7日战死在龙陵，绪方意诚于1945年6月2日战死在缅甸；西实、关升二、有岛芳次、音部嘉次等人均因职务变迁离开松山，未卷入最后的覆灭之战，并活着回到了日本。战后，日军战史中屡屡提及以他们名字命名的阵地，这使得他们都深感惭愧。太田毅说：“那些因名字留在松山而活着回来的人，都背着沉重的包袱过完了自己的人生。”[8]

大致说来，日方阵地名称的涵盖面宽，一个名称通常指一组高地，而远征军为逐一解决这些山头，每一个都有独立命名。在作战时，为阵地编号的目的是便于指挥、联络和保密。日军说“本道”阵地时，远征军不一定会明白它指的是滚龙坡甲、乙、丙、丁、戊这一组高地；而“里山”阵地，说的则是辰、巳、午、未高地，它们均处于松山以里。远征军所说的“子高地”，即日军“关山”阵地。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栖身的“音部山”阵地，对应着远征军所说的寅、丑、卯这一组山头；其中丑高地原来是潞江土司线光天的祖坟，又称官坟坡。音部山阵地与关山阵地相距仅有100多米，日方认为音部山才是主阵地最高点，而关山阵地要略低一点。[9]

---

〔6〕据说这是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创意。张荣校：《龙陵抗日反攻战概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60页。

〔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34页。

〔8〕［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第58页。

〔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3页。

与此相关的是，当时的地名与今日也有较大变化。如在第8军战史记录中，马鹿塘是最后围歼日军的阵地，日军称“横股阵地”，但后来此处竖立的战场遗址标牌上则注着“松山大寨”的名称；在远征军战史中，大寨指的却是今天杞木寨至黄家水井区域的村落。当年自松山西侧和南侧汇入怒江的两条小河，日军称其为水无川、拉孟河，当地人分别称作勐梅河、腊勐河。

当这些自说自话的名称同时出现在眼前，很容易让人糊涂。细究起来，松山这个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作为中国西南极边地带，其地名都是祖祖辈辈生长于斯的山民信口命名，中央政权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对其做行政区划规范（滇西为“云南王”龙云所统治）。因此，中日两军不得不一边作战，一边为脚下的土地命名。

表7　日军／远征军松山编号阵地对照表

日　　军	远征军	备　　注
本道阵地	甲、乙、丙、丁、戊高地	滚龙坡
上松林阵地	阴登山	鹰蹲山
纪念碑阵地	辛高地	大垭口原第8军国殇墓园上方高地
小股阵地	癸高地（松林堡垒）	公路外侧，海螺地洼旁山头
侧方阵地	庚高地	双家志地旁、高压线塔山包，亦称胡家小坡
山崎台阵地	己高地	公路改道处山包
崖阵地	松树坡	大漆树至大水平山梁之间大谷场、小梁子两个有松林的山头
松山阵地	1号、2号高地	公路拐弯处山上，已成耕地
横股阵地	马鹿塘	公路外侧，立有“松山大寨”标志碑处
西山阵地	3号高地	坧人场坪子（箐门口）及向下延伸的两侧山头
音部山阵地	寅（狗头坡顶、马鞍山坡）、丑（官坟坡头）、卯（官坟坡尾）高地	金光惠次郎指挥部所在地
阿图阵地	5号高地	核桃洼坡头
联络阵地	4号高地	5号高地与3号高地之间平台
所罗门阵地		核桃洼梁子

续表

日　　军	远征军	备　　注
关山阵地	子高地（爆坑）、红帽坡梁子、马槽洼头	大松山
里山阵地	辰、巳、午高地	旧称“小松山”
战斗司令部阵地	未高地	今烧人坡垭口
	腊勐街（第 8 军指挥部）	今老街子
白壁阵地	腊勐老车站高地	
原口山阵地	竹子坡（5600 高地）	远征军炮兵阵地
后山阵地	壬高地	大垭口道班房背后山头，旧称老鸦窝梁子
炮台山阵地	大寨“天”	午未间无名高地
关山下阵地	大寨“地”	子、卯高地前，纪念碑西北侧路下阵地
腹部阵地	大寨“元”	杨新良家南面路头山包
	大寨“黄”	闫玉重家前面山包，午高地下
	大寨“宇”	杨家山家前面山包
	大寨“宙”	清水井山包，旧上山路左侧
	大寨“洪”	苦楝子山头——李家荣家旁边山包
	大寨“荒”	上山路水池南三个“品”字形山头
	无名高地	寅高地下，黄家水井水源地背后山包
	青松堡	小学校门口松林高地，原日军阵地入口小路右侧
	枯树堡	小学校背后高地
卫生队阵地	黄家水井	以杨金满家为中心，小水沟洼子南侧山包——闫玉华家背后山包
涡卷阵地	1539.8 高地	阴登山东北侧山下公路第一个转环处平台，亦称回头弯
平山阵地	1467.3 高地	阴登山东北侧山下公路第二个转环处平台
下山口观察哨		公路上三眼井村落
左监视哨		尖山村后山包
右监视哨		大滚塘山包（董别大山）
岩石阵地		西边山小营盘

续表

附记：

1．松山地名由来

滚龙坡：因阴雨天云雾翻动，似龙在打滚而得名；

烧人坡：因回汉战争时，在此火化过人而得名；

黄家水井：因一黄氏人家在此挖一水井而得名；

黄土坡：因山坡上的土为黄色而得名；

竹子坡：因山上盛产竹子而得名；

狗头坡：因形状像马鞍前的扶手（骑鞍前的扶手当地俗称“狗头”）而得名；

马鞍山：因形状像马鞍而得名；

核桃洼：因山洼里长满了核桃树而得名；

马鹿塘：因马鹿在此池塘饮水而得名；

大松山：因山上长满松树且山相对较大而得名；

小松山：因紧靠大松山且山相对较小而得名；

鹰蹲山：因老鹰经常在此等候觅食而得名（又称阴登山）；

长岭岗：因是当地最长的山梁而得名；

腊勐：傣语，意为怒江对岸的平地；

三眼井：因村旁有三眼水井而得名；

桤木寨：因建寨时桤木树较多而得名；

大寨：因寨子居住较为分散，范围较大而得名；

小水沟：因村中有一常年流水的小沟而得名；

大垭口：因两边是山中间形成一个很大的垭口而得名；

蚂蟥水：因水中蚂蟥多而得名。

2．日军阵地命名由来

纪念碑阵地：因阵地附近立有滇缅公路竣工纪念碑而得名；

小股阵地：不详；

侧方阵地：因位于滚龙坡主阵地侧面而得名；

山崎台阵地：推测是以野炮第56联队长山崎周一郎氏名命名；

崖阵地：因阵地东侧为断崖而得名；

松山阵地：因阵地靠近当地松山寨子而得名；

横股阵地：不详；

西山阵地：因最早据守阵地的日军野炮56联队第2中队长氏名“西实”而得名；

音部山阵地：因据守阵地的日军野炮56联队第9中队长氏名“音部嘉次”而得名；

阿图阵地：因纪念日军在太平洋上远端据点阿图岛而得名；

联络阵地：因位于音部山与西山之间的重要联络点而得名；

所罗门阵地：因纪念日军在太平洋上远端据点所罗门群岛而得名；

关山阵地：因最早据守阵地的日军野炮56联队第1中队长氏名“关升二”而得名；

续表

里山阵地：因为在松山主峰阵地里侧而得名； 战斗司令部阵地：因步兵第113联队前进指挥所设在此处而得名； 白壁阵地：位于滇缅公路老腊勐车站高地，曾遗留一些白色的残垣断壁，日军称“白壁部落”； 原口山阵地：因最早据守阵地的日军第113联队第2中队长氏名“原口九十九”而得名； 后山阵地：因位于滚龙坡山后而得名； 腹部阵地：因位于松山腹部而得名； 卫生队阵地：因系日军卫生队驻地而得名； 涡卷阵地：因滇缅公路在此处回旋如同漩涡而得名； 平山阵地：因位于滇缅公路内侧小平台而得名； 兜山：即5350高地，因貌似头盔而得名； 一峰：从兜山向北第一座山峰； 二峰：从兜山向北第二座山峰； 三峰：从兜山向北第三座山峰； 赤土山：因山上遍布红色土壤而得名。

在阵地名称问题之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作战地图。

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使用什么地图，各种史料中都未见提及。写作期间，笔者的朋友、抗战文物收藏家沈克尼帮我搞到了民国时期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陆地测量总局绘制的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4张，且为腾冲、龙陵、施甸、辛街4联幅，松山就在施甸幅内。地图左上侧注明，该图是在民国六年至十四年（1917—1925年）调查基础上，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制印完成的。可以想见，在滇西这样险峻、偏远的地区，长达8年的测绘调查付出了怎样的心血，之所以延宕至1935年印出，也许正是为即将爆发的全面抗战未雨绸缪。沈先生分析认为，此图应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反攻作战所用地图。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地图测绘不够精准，且1938年8月才修筑完成的滇缅公路未出现在地图上，所以卫立煌才向美军顾问团提出提供飞机航拍地形照片的要求，意在与该地图进行比对，以更清晰地掌握战场细节。严格说起来，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作为集团军、军一级使用还勉强；对于局限于松山狭小地域的攻坚作战，应有1：25000，甚至1：10000的大比例尺地图，才能清晰显示出每一个山头，满足师、团级部队战术层面的需要。抗战时期，中国的

国防重点在华北、华东、东南沿海，那些地区的地图测绘可能比较精细，至少 1 ∶ 50000 的地图比较常见；但像滇西这种大后方，谁也没料到日军会从这里进攻，因此这种超精密的地图在当时可能还属于战场准备的“盲区”。

笔者在翻阅松山战史资料时，还看到一些粗略绘制的作战示意图，有的是参战部队新 28 师、第 8 军参谋人员所绘，有的是战史研究者（如吴致皋、方国瑜）战后现地调查所绘，但都是示意性地图，不属于精密地图。作战部队所绘制的地图，有的连大方位都不准确，由此也能见出当时对松山地形、敌情的不熟悉；只有两张绘有松山山体大略等高线，且标注了各高地编号的第 8 军所绘地图，经与 Google 地图上的卫星航拍松山区域地貌图比对大致近似。此外，笔者还找到数张日本战史研究者绘制的拉孟阵地示意图，大方位相当准确，只是对各阵地标示显得过于概略。写作中，笔者一直是将我方与日方地图进行对照，才得以明确战局发展的大致情况。为了方便读者阅读，笔者综合中日资料，以 Google 卫星地形图为底版标绘出松山敌我阵地分布图；又以 1 ∶ 10000 地图标注了各区域作战示意图（见本书附图）。

此外，昆明市汽车运输经贸总公司一位叫陈立言的退休职工，曾在当地收藏市场以不菲的价格买到一批当年第 8 军遗留下来的松山战役示意图，包括《松山敌阵地编成要图》、《陆军第八军第八次围攻松山战斗经过要图》（及全图）、《松山敌全阵地位置要图》、《松山顶坑道作业敌我态势要图》等 10 张（其中 3 张为道林纸印刷，7 张为毛边纸油印手绘）。经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鉴定，这批地图属于战报图，是在战役刚刚结束时，由部队所作的总结性战程记录资料，内容包括当时日军的据点、火力覆盖范围、整个作战经过、松山战役战斗进程，具有很高的史学研究和军事研究价值。[10]2009 年底至 2010 年初，笔者与戈叔亚先生受龙陵县政府之邀，在现地组织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时，曾对这些地图予以研究。

---

〔10〕 2005 年 5 月 21 日香港《文汇报》“记忆光年”栏目文章《松山旧图藏灭寇战讯》，莲子撰文。

第8军两度进攻，均以冲击日军主阵地为目标，未达到预期效果。究其原因，在松山方向，是对日军阵地火力编成情况基本不明；对滚龙坡方向情况虽有一定掌握，但因其阵地前、阵地内火网严密，占领局部阵地后很难扩张战果。日军的反斜面阵地尤其巧妙，不光从高地脚向高地顶射击，还在背后之高地斜面上预设火力点，当我步兵通过后，以一部阻我预备队投入，一部由我步兵背后射击，因此即便部队占领阵地，也难以立足，伤亡之大，殊出意外。

何绍周亲临一线观察后，召集师团长们研究对策，总结改进战术。

根据进攻情况判断，不能仅以占领制高点作为目标，因为占领敌人阵地毫无用处，反倒成了负担；必须攻克其堡垒，全歼守敌，才能真正占领阵地。具体方法是：采取限制目标之攻击法，逐步攻略敌之据点，避免一举突贯战法；占领高地以占领高地棱线为满足，绝对禁止突下反斜面，避免反斜面敌人之袭击；占领高地棱线之同时，应以有力之兵力占领敌工事，逐步严密肃清壕内及掩蔽部之敌，不可稍忽；对敌堡垒务必以炮火先行破坏。

对进攻重点，仍决定以主力攻击滚龙坡，再求逐步推进。[11]

抗战7年以来，中国一直采取消耗战略，在各战场基本上取守势作战，很少进行攻势作战，基本没积累下什么经验。正面战场屈指可数的几次攻势作战，应算是淞沪战役初期围攻汇山码头、昆仑关战役、收复宜昌作战等，虽均有可圈可点之处，然最终还是均未达成作战目的。其中称得上典型攻坚战的，要算是第5军的昆仑关战役。第5军为当时全国唯一的机械化军[12]，军事训练综合考评居全军第一。即便如此，当日军后来增兵反攻后，昆仑关还是失守了。所以，松山战役是中国军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取得全胜的攻坚战，从这个角度来考量作战中暴露出的种种缺点，似乎不宜多加苛责。

我们这个民族，即便强盛如秦汉时代，也还是以修筑长城为基

---

〔1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11—1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2—73页。

〔12〕该军配属一个装甲兵团，步、炮兵以汽车输送，以现代标准衡量属摩托化部队，与以履带化战车机动的机械化标准尚有差距。“摩步”与“机步”因对道路依赖性差异，在野战性能上属两个档次。

本国防政策，说是一个心理上呈“守势”的民族，大概是准确的。一旦提出“攻”这个题目，总会引发种种慌乱。想想这一点，不禁令人感慨万端。

7 月 8 日至 7 月 9 日：D+34 日至 D+35 日

昨日下午，第 307 团奉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自祥云车运至怒江边由惠通桥渡江，于 8 日夜抵达腊勐街。而后，根据前两次攻击经验进行战前模拟教育。[13]

后来，第 8 军的全部兵力都是这样“添油式”地注入松山战场，每一名士兵都对过怒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因为这条江成了从和平跨入战争的临界线，而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都再也没有跨回来，也可以称之为“生死线”。据几天后渡江增援的第 103 师第 308 团（团长文安庆）士兵袁德均回忆：

过江前，我们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都讲了话。他们讲话的中心意思就是让大家不怕死，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后就打牙祭，吃肉，喝壮行酒。排里分了一坛烧酒，排长派人买了一只公鸡，宰了，弟兄们一起喝鸡血酒。我喝着喝着就哭了。我想这回准得死在江对面，我倒不是怕死，是因为再也回不到家乡了。

过江那几天正下大雨，左右的山都遮没了，到处白茫茫一片。山头上在打炮，不像战场，像半空中打雷。后来雨住了，云露出条缝，我们才看清那座松山。我的娘！陡得能望掉人的帽子，上面那半还罩在云雾里。怪不得第 71 军吃了大亏。[14]

对比十几天前荣 3 团刚开至松山时官兵们的傲气，可见即便是同为第 8 军的部队，在自信心和士气上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第 307 团副团长陈一匡（又名陈伟）记得，该团通过惠通桥时，因桥身曾经炸毁，工兵在仅存的铁索上铺了一层薄板，两侧没有护

---

〔1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12 页。

〔14〕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 269 页。

栏。人马通过时，桥身震荡摇晃，只能缓步前进，入夜才开始从腊勐河谷小路取捷径登山。因山高路狭，适逢大雨滂沱，山路崎岖难辨，攀登十分困难。由江边到腊勐街有近十公里，全团彻夜强行军，士兵疲劳不堪。[15]

鉴于新生力量到达战场，何绍周再次调整了进攻部署：

将第 307 团移至核桃箐担任主攻任务。并将第 71 军山炮第 3 营（欠一连）移于竹子坡附近占领阵地，该军山炮第 1 连移两门山炮于阴登山占领阵地，以支援第 307 团攻击滚龙坡。预定发起攻击时间为 12 日 15 时。

9 日下达的战斗命令如下：

第 245 团第 3 营为右侧支队，从黄土坡以北向马鹿塘方向迂回攻击，以吸引敌之兵力于该方面；荣 3 团（欠第 3 营）配属荣 2 团第 3 营、军工兵营爆破加强连喷火器 6 个班为右翼队，攻松山子高地正面，以牵制该方向之敌。

第 246 团配属喷火器两个班为中央队，于 11 日拂晓将其左翼小利刹（小立色）以西之正面移交第 307 团，攻击大垭口、滚龙坡之敌。但其重点应置于左翼，以协助左翼队之攻击；第 307 团（欠一营）配属第 5 军山炮第 8 连、军战防炮第 3 连一个排、第 82 师工兵排喷火器四个班为左翼队，由小利刹（小立色）、核桃箐一线攻击滚龙坡乙、丙、丁三个高地；为中央队与左翼队达成良好协同，令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统一指挥。

怒江东岸炮 10 团及炮 7 团混合营，对滚龙坡、松山行攻击准备射击两小时。第 71 军山炮第 2 营（欠一连）配属该军山炮第 1 连、第 5 军山炮第 8 连各一个排，主要对滚龙坡乙、丙、丁三个高地，一部支援右翼队左翼对松山攻击。第 71 军山炮第 1 连一个排在阴登山占领阵地，侧射滚龙坡之敌，以支援滚龙坡之攻击。

第 307 团第 1 营为预备队，驻腊勐街。[16]

---

〔15〕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05—406 页。

〔1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12—14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3 页。

在这次攻击中唱“主角”的，将是第307团。

据日军战史载：至6月末，第56师团因对在龙陵东方地区的第11集团军主力的攻击，已精疲力竭，无力再救援拉孟守备队。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遂令第56师团主力后退到芒市附近。当时，松山、腾冲、平戛的守备队正在优势的远征军的重围下，继续孤军作战。由于第56师团主力的后退，龙陵再度陷入敌人包围之中。[17]

在此期间，在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极力主张下，第56师团曾酝酿过一次救援松山日军的计划，但很快胎死腹中。日军战史对此没有记述，但太田毅在其著述中作了披露：

7月9日左右，退到芒市的松井联队长正做下期作战准备时，接到了拉孟守备队的电报。得知本道阵地在敌总攻中悲惨奋战的情况后，心情沉痛万分。

再度救援拉孟守备队的作战获得立案，师团参谋长川道富士雄大佐调来两个大队的兵力交予松井联队长指挥。但是不清楚的是，师团的意图是救援部队进入松山后就负责死守阵地呢，还是只把拉孟守备队营救出来就可以了。松井联队长马上召集幕僚，从地形和敌情方面进行仔细研判。

考虑到此次进攻，不能带许多驮马同行，加之是在山地间开路冒死挺进，最多只能带一个星期的粮秣，这样部队从芒市到达松山至少需要近一周时间。此外就是龙陵以北的前进路线问题，这条以往的后勤补给道路，现在公路两侧要地均被远征军占领，能否冲得过去？虽然可利用夜间在敌防御线间钻隙过去，但对于两个大队的行动来说实在太难了。

途中如与敌发生遭遇战出现伤员，还得考虑如何处置。如能侥幸抵达松山与守备队会合，还得考虑如何冲出敌重重包围。如让守备队主动突击出来与救援部队会合，留在阵地上的伤员又该如何安排？如救援部队主动冲进松山阵地，又该如何再度突围而出？以目

〔1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24页。

前师团的战斗力看，要损失两个大队的兵力是绝对不允许的。

经过仔细研究后，松井联队长向师团长汇报："可以迂回前进到松山附近，但是仅靠两个大队要救出守备队，我没有把握。"但他又恳切地请求："军旗还留在松山，不管有多大的困难，我们也要把守备队官兵救出来。即便没多大把握，也请果断下令吧。"

但是，松山师团长从军全盘情势考虑之后不同意。以那个参谋长的想法看，好像从开始就不希望师团长支持此次行动，所以只调派了两个大队的兵力，还说能救援成功。

第一次救援行动因敌反击而失败，第二次要求在立案后又被否决，这样一来，拉孟守备队的命运只有等待"玉碎"了。但这一切，松山上的官兵们全然不知，还在坚持拼死战斗。他们坚信，只要军旗还在，军部就一定会来救援。〔18〕

7 月 10 日：D+36 日

当日，第 8 军部队正进行攻击准备，突然接到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命令，云平戛方面有千余日军窜扰，拟调第 71 军山炮第 1 连配属新 28 师前往截击。因对松山攻击在即，军长何绍周立即向长官部经请示暂缓，却未得到允许。

这意味着，攻击发起后预先设想的支援炮火将要打些折扣。

第 8 军虽然只在松山打了几天，投入作战的几个团携带的弹药就打得所剩不多了。军参谋长梁筱斋命人去军需部门统计，只能再供应各种步枪子弹 4 万发，木柄手榴弹 1000 余颗。

在松山战役期间，步炮兵弹药保障，由远征军兵站总监部直属第 8 分站供给。但该站刚刚成立，组织不全，运输能力不足，且受滇西山区道路容量限制，人多无用，运粮即难运弹。至次日午前，所需弹药尚未补充到位，不得已，第 8 军向负责供应第 11 集团军的第 11 分监部兼其下属的第一分站借到了一部分，计有步机枪弹 20000 发、60 迫炮弹 1079 颗、82 迫炮弹 300 颗。加上各部队剩余及官兵携行部分，弹药准备情况为：

---

〔18〕［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的证言》，第 113 页。

步机枪弹药约80000发、045机枪弹20000发、303机枪弹20000发、手榴弹1200颗、60迫击炮弹1079颗、81迫击炮弹500颗、82迫击炮弹800颗、75山炮弹1500颗、两公分战防炮弹350颗。

考虑到平戛方面情况较急，及本军此次作战的主攻正面不大，何绍周认为弹药尚足应付，且保山后方追送不日可达，遂决心不变，仍计划于12日开始攻击。[19]

7月11日：D+37日

当日下午3时，为眩惑敌人分散其对滚龙坡方向的注意力，我军从阴登山向巳高地发起了一次小规模攻击，效果不错。

原来，我竹子坡炮兵观察所注意到，几天来只要我军一炮击松山，一股日军就钻到阴登山与巳高地之间洼地的战壕内躲避。所以当日在我炮火又将日军逼迫于该洼地内后，我步兵秘密接近，一举突至壕边，投入大量手榴弹，炸死日军20多名，没死的日军跳出战壕逃窜，又被我机步枪火力射杀约30余人。我军仅伤18名。[20]

当日，第307团团长程鹏、副团长陈一匡率营连长仔细勘察滚龙坡地形。发现滚龙坡虽然孤悬于松山阵地之外，是南北长约500米的狭长地带，但其西侧是一个等齐斜面，地形开阔难以接近；东侧则悬崖陡壁，且敌设有重重障碍，无法攀登。进攻一方除了由南向北实施正面攻击外，无法施行包围或迂回。据陈一匡回忆，11日白天，第307团以一个连分散向滚龙坡敌据点攻击，企图使敌各堡之火力点暴露，探明障碍物布置情况，进行火力侦察及攻击准备。[21]

---

〔19〕《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14—15页。

〔20〕同上书，第15页。

〔21〕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05—406页。

第 7 章　四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7 月 12 日—7 月 19 日。
指挥：第 8 军军长何绍周、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
主力：第 307 团、第 246 团、荣 3 团主力及荣 2 团第 3 营。
进展：攻击松山滚龙坡、大垭口、子高地未果。

（参阅附图 25、附图 26、附图 27、附图 29）

7 月 12 日：D+38 日

据第 307 团副团长陈一匡回忆：

当日，第 307 团以两个营对滚龙坡各堡垒发起进攻。因气候影响，阵雨雾大，攻击前进困难，敌许多隐蔽的侧射潜伏堡未能发现。在日军机枪火力压制下，部队伤亡很大，攻击顿挫。敌军乘机发起逆袭，迫使我军退回原阵地。[1]

据美军顾问观察记载，第 307 团在战术上有一个致命弊病，攻击时总是“成群地沿着容易上山的路线向山头发起冲锋，日本人先

---

〔1〕在《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及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均记述第 8 军于 7 月 12 日发起第三次总攻击；而陈一匡在其《松山攻坚战》（载《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提到第 307 团分别于 12 日、13 日两次发起攻击；其中 13 日的攻击情形，与前两种文献的记载一致。笔者分析感到，作为此战亲历者的陈一匡的记述，逻辑性较强，即 12 日出现了大雨阵雾，攻击前进困难，效果不佳，于是顺延至 13 日再次攻击，且在当晚对敌阵地实施了夜间侦察。这种因气候不佳推迟攻击的情形在后续战事中曾再次出现过。而作为官方记录的《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可能是按预定攻击时间 12 日记载，未考虑曾顺延一日攻击这个情形。故而，笔者采信了陈一匡的记述。不过，在陈一匡记述中，第 307 团以第 1、第 2 营攻击，可能有误，因为第 1 营被确定为预备队，在腊勐街待命。因此，进攻的两个营只能是第 2、第 3 营。

用机关枪打得中国人一群群拥挤在山间的洼地躲避，而后向这些地方发射榴弹和迫击炮弹”，造成大量伤亡。[2]

第307团第一次对滚龙坡攻击失利，共计损失官佐10员、士兵199名。[3]

当夜，团长程鹏派侦察小组摸到滚龙坡后方，搜索日军阵地内部情况，发现了敌掩蔽部、水管及照明设备。根据侦察结果，在团指挥所（滚龙坡西南1000米左右的核桃箐村）设置沙盘模拟敌阵地配备。集合全团营连长，由副团长陈一匡说明滚龙坡敌阵地情况，总结上次攻击受挫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滚龙坡攻击方案。

各营、连长纷纷发言，几乎是异口同声：“现在明白新28师为什么伤亡那么大了！”这实际上是第8军官兵通过几天的攻坚战后共同的认识。如此自发地检讨性认识，有助于尔后的进攻——第8军将士都明白必须认真对待鬼子了。

7月13日：D+39日

拂晓5时，我轻重炮对滚龙坡乙、丙、丁高地集中射击两小时。敌阵地有掩盖的交通壕、散兵坑大都被击漏，工事也有倒塌的。7时，炮火延伸射击后，第307团第2、第3营发起攻击，我英勇官兵前仆后继，越过敌外壕，通过铁丝网向滚龙坡敌主阵地进逼。

接近丙、丁高地之敌阵地约50米时，敌以猛烈火力射击。攻击丁高地的第2营（营长刘鸿斌），受到丙高地反斜面下敌侧防机枪斜射，及乙高地敌火力集中射击。此时大雾弥漫，急风骤雨，攻击部队停滞在敌阵地前无法前进，因此伤亡甚大。我曾经组织爆破手拟以炸药包炸敌堡，但敌火力猛烈，难以接近，我英勇的爆破手均死于敌堡垒射击孔前。左翼的第3营（营长叶成章）蒙受重大损害，一度占领了丙高地棱线，但仍不能缓解右翼第2营之痛苦。

激战至黄昏，日军见我攻击部队势弱，便由甲、乙、戊向丁、

---

〔2〕据美国出版的中缅印战区战史丛书《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第三部分史迪威指挥的难题，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3〕据《第一零三师在滇西阵中整训日记》。

丙两高地逆袭。时值大雨浓雾，能见度极差，双方近距离恶战，阵地失而复得，双方均有较大伤亡。我军连续挫败敌两次逆袭，但此时敌我相距甚近，只能使用近战武器，为避免炮火误差，免受无谓伤亡，我炮火不能支援；加之攻击部队弹药无接济[4]，被日军第三次逆袭逼近，双方展开白刃战，很多官兵壮烈牺牲。入夜，日军退回，攻击部队站稳脚跟后连夜修筑工事。[5]

对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死守之敌强攻，想一举歼灭，诚非易事。第 307 团副团长陈一匡后来回忆说：现在大家开始省悟，必须抱定寸土必争之决心，攻到哪里，占到哪里！部队就地挖坑，夜间对壕作业，逐渐逼近敌堡垒，相距近者六七十米，远者百余米。敌用轻重机枪及掷弹筒射击，我就用 60 迫击炮及步机枪还击。我一度冲进敌壕，与敌发生白刃战，互投手榴弹。此次攻击，第 307 团阵亡连长 2 人，排长 4 人，伤亡士兵 150 人。[6]

本轮攻击，虽然对滚龙坡未能全部攻克，但是滚龙坡西南高地均为我占据，构成轻重机枪掩体、散兵坑、交通壕，形成简单的野战阵地。敌火炮已被我摧毁，一辆战车[7]亦坏在路上。惟敌堡垒坚固，无法摧毁，这是攻击松山最大的难题。此外，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载："步兵勇猛，炮兵之支援亦属确实，而粮弹告绝致功亏一篑，得而复失。故攻击之准备，首应注意弹药之屯集，切忌贸然从事战斗。"[8]

在松山子高地正面，荣 3 团主力接近敌阵地约 50 米时，亦受到松山西北侧（丑）及南侧（巳）高地突然出现的侧防机枪阻击，虽

---

〔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17 页。

〔5〕同上书，第 16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3 页。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06—407 页。

〔6〕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07 页。

〔7〕其实日军拉孟守备队并未装备坦克，这是他们将 1942 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败退时第 5 军装甲兵团丢弃的苏式 T-26 轻型坦克半掩埋做固定堡垒用的，据载一辆埋在滚龙坡，一辆埋在辛高地，一辆埋在横股阵地，一辆埋在松山东坡下公路边的平山阵地。

〔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17 页。

然炮兵用猛烈炮火压制，但由于日军机枪阵地隐匿在密林之中，以两三发点射为主，很难发现其准确位置，所以炮兵几乎是在盲目轰击，始终不能有效消灭敌火力，使进攻部队在日军交叉火力袭击下伤亡惨重。

第246团向大垭口—红木树—甲高地一线的进攻，陷入了日军的“八”字阵地，受到交叉火力阻击，毫无进展。

这天唯一取得较大进展的，是左翼荣2团第3营得以占领敌壕，推进了约50米，在敌我接触线上，拉出了一道倾向日军阵地的斜线。

本次攻击，我军合计损失约一个半营。[9]

超链接12：日军松山阵地的火力配系

至此，已经多次说到日军侧防火力这个概念了，它对远征军造成的伤害实在是太大了。这里不妨对其及相关概念做一简单注释：

【火力配系】防御时，将各种火器按其性能和任务作适当的配置和分工，组成火力体系。包括防坦克火力配系，防空火力配系，防步兵火力配系。具体到松山阵地，主要是后者。

【火力点】轻重机枪、直瞄火炮等配置和发射的地点。

【侧射火力】从敌人侧方对其进行射击的火力。

【斜射火力】从敌人斜方向上对其进行射击的火力。

【暗火力点】隐蔽配置在敌人不易发现的地方的火力点。在敌人接近时，出敌不意，突然开火，杀伤敌人。

【火网】由各种火器正面射击和斜射、侧射交织而成的密集火力。[10]

要说攻坚作战，最难对付的不是敌堡垒坚固，再坚固的工事也能被足量炸药爆破；难就难在敌火网阻击无法靠近。战史上，对敌垒实施爆破的英雄，多数是倒在了敌人的密集火力下。接近敌堡后出现意外的，比较著名的是董存瑞和黄继光，一个是没有放置炸药

〔9〕《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16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3页。

〔10〕据1972年版《军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第45页。

包的支架，一个是没有了爆破筒和手雷，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与敌同归于尽，书写了壮烈的英雄篇章。在他们之前倒在敌人火网下的爆破手，则很难被人们记住。

松山攻克后，远征军各级指挥官详细考察了日军阵地的布局结构，以总结战术经验。1944 年，陆军大学教官吴致皋[11]曾观战滇西，在其出版于 1948 年的《滇西作战实录》中，绘制了较为详尽的日军松山阵地、堡垒的平面、立体图。每一个编号阵地，看上去都像是一个“龟背”图，中心位置是主堡，附近有一两个子堡或掩蔽部，以蛛网状的壕沟与坑道相连接，最外围的是无数前沿散兵坑——当然，这是为战术研究所绘制的剖面图，而当时日军阵地大多覆有厚厚的遮盖物，不但美军第 14 航空队的飞行员从空中无法看清其“龟背”结构；即使远征军攻击部队的侦察兵，也无法预先探明每一个火力点的位置。

在这里笔者要纠正日本学者山田正行所著《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一书中的一个错误。山田在滇西采访时，保山的陈祖樑先生为其提供了包括吴致皋所绘制的日军阵地图和《敌 56 师团编制系统表》在内的大量资料，他都用在了书中。但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从日本方面来看，这确实可以当作间谍活动的证据。所以日军才把便衣当做游击队，为防止由于性行为泄露信息而管理慰安妇。”[12]其实，山田先生若看仔细一点就知道，吴致皋的阵地图是我军攻克松山后绘制的，而《敌 56 师团编制系统表》中的附记中明确注着：“本表系根据俘获文件及俘虏口供制定。”幸亏山田先生在误读之余，还没有为日军将众多普通中国老百姓当做“便衣队”残酷处死的战争犯罪行为进行辩护，否则陈祖樑先生的肠子都该悔青了。前面笔者说了，远征军情报部门反攻前急需这些情报，但一直无法得到，只能在作战期间通过缴获的日军文件和审问战俘中逐渐了解敌情，这是付出无数鲜血

〔11〕据查吴致皋为黄埔第 6 期生，湖南澧县人，曾任陆军大学教官。其他情况不详。

〔12〕［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 55 页。

和生命才得到的。山田先生据此认为中国方面的“间谍活动深入到日军的细节”，实在是高估了远征军这方面的能力。[13]

日军每个阵地上的机枪火力点，均指向四周，以不使本阵地有缺口为原则。而相邻的几个阵地之间，火力则互为侧防、斜防，彻底消灭彼此的火力死角。这个道理，如同摄影术中的布光技巧，有时为拍摄高调子的静物照片，需要放置多个照明灯，意在不让物体留下任何阴影。有阴影的地方，在火力配系中即表示存在火力死角，给攻击者有隙可乘。

在阵地建设中，工事结构和布局主要由工程兵设计指导，火网编织则是步、炮兵们的事。可以想见，在构筑松山阵地的两年中，日军工兵第56联队与拉孟守备队的步、炮兵，如何为此苦心经营。检验阵地火网编织是否严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置身于进攻者的角度，从不同方向对阵地进行模拟攻击，看是否能隐蔽接近堡垒和战壕。为此，拉孟日军几乎踏勘过松山的每一个角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比在这里生活的当地人更熟悉这座大山，所以几十年后他们中的幸存者来到这里时仍是轻车熟路。而首次面对松山的远征军士兵，则对自己将要收复的这片10余平方公里的国土是完全陌生的。

在炮火和轰炸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下，作为进攻方的远征军，最佳的选择就是采用最古老的战术——对壕作业，通过挖壕沟隐蔽接近敌人，而后以火焰喷射器、冲锋枪、手榴弹等近战兵器制敌，必要时必须进行白刃战。这是个笨办法，耗时费力，然而也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它既能达成作战目的，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士兵的生命代价。

7月14日：D+40日

我军已三次进攻松山和滚龙坡，步兵勇猛，炮兵支援也颇有力，唯敌坚守堡垒，迄无成果。因其工事坚固，如非彻底破坏，即便我突入阵地，亦难期收效。

---

〔13〕山田正行先生曾看到本书第一版，并撰文就此予以解释，希望笔者能理解其研究的总体动机和效果，不必苛责细节方面的问题。笔者在本书中引用其他撰述时，仅就细节问题就事论事，并未做整体评判。

连日来观战的何绍周为此痛苦不已。如果不想出一个办法改变这一局面，即便第 8 军部队愿意继续承受巨大牺牲，也没有多少兵力可用了。而要远距离破坏敌堡垒，只能靠炮兵。何绍周当即打电话到东岸炮兵指挥所，命令炮兵调整战术，不必一味进行区域性狂轰，应通过观察逐一确定敌堡垒位置，采用单炮精度射击，限制目标，实施定点破坏。凡敌之堡垒及侧防重掩蔽部，均指定单炮一门，彻底破坏；在核桃箐北 5350 高地、竹子坡、阴登山、下腊勐，也各置山炮、115 榴弹炮，定点破坏滚龙坡各高地及反斜面工事。至此，何绍周确立了对敌阵地实施“先行软化，再行攻略”的方针，并决心延长攻击准备时间至一周。他相信这是“磨刀不误砍柴工”之策，不但不会延误战期，反而能缩短战事进程。

又召开会议，确定后续作战部署，拟定：

以程鹏指挥第 307 团为左翼队，继续攻击滚龙坡丁、丙、戊、乙高地（本道阵地）；以田仲达指挥第 246 团为中央队，以一部接替阴登山阵地守备，以主力攻击大垭口庚高地及其以西据点（日军侧面阵地），切断滚龙坡与大垭口之联络，使左翼队第 307 团攻击容易。

以上两主攻队均由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统一指挥。

以赵发毕指挥荣 3 团并荣 2 团第 3 营为右翼队，在将阴登山守备任务移交中央队后，集中力量强袭松山主峰巳高地，以破坏子高地侧防，尔后伺机攻占子高地；第 245 团第 3 营为右侧支队，牵制攻击黄土坡之敌；以军部上校附员李荩萱指挥第 103 师搜索连及第 308 团重机枪一排、山炮第 8 连为左侧支队，接替 5350 高地警戒任务，并相机以火力支援第 307 团攻击滚龙坡。

同时又特别要求各部队：为在攻击接敌前避免敌侧防火力伤害减少伤亡，各部队必须大量挖掘交通壕，且应挖至接近敌阵地 30 米以内。各攻击连最少要挖两条，并在末端与敌阵地平行掘成散兵壕，作为尔后突击发起点。为避免敌掷榴弹之损害，还要对交通壕逐段加以掩盖，尤其是末端和突击发起点的散兵壕不可缺少。[14]

---

〔14〕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3—74 页。《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19—20 页。《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鉴于上次攻击因弹药补充不济影响攻击，何绍周又要求各部清查弹药存量。以往，第8军从未实施过如此大规模的攻坚作战，对弹药消耗量没有经验可以参考，于是以既往攻击任务的3倍来做预算。经查弹药屯集情况如下：

表8　第8军攻击松山部队弹药储存情况一览表[15]

（1944年7月　日）

		腊勐街	核桃箐	竹子坡	合　计
储存数量	79步枪弹（发）	1004629	349971		1354600
	045机枪弹（发）	95985	48015		144000
	303机枪弹（发）	44000	9600		53600
	60迫炮弹（颗）	6990	1650		8640
	81迫炮弹（颗）	2400			2400
	82迫炮弹（颗）	2574	2226		4800
	手榴弹（颗）	9969	2031		12000
	火箭弹（颗）	510	300		810
	枪榴弹（颗）	4320	2160		6480
	掷榴弹（颗）	4320			4320
	55战防枪弹（颗）	4800	960		5760
	黄磷手榴弹（颗）	4000	2000		6000
	37战防炮弹（颗）	7200			7200
	75山炮弹（颗）	4500	500	5000	10000
保管单位		腊勐街弹药交付所	第307团弹药交付所	第71军山炮第二营	

基于对弹药储量的判断，何绍周要求各部队从13日起开始准备。[16]并估计7月17日炮兵弹药屯集量可达半数，遂决心于7月

［15］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插表《陆军第八军攻击松山各部队储存弹药数量地点及保管机关一览表》调制，第21—22页。

［16］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松山战役所以旷日持久难决，很大程度受制于弹药储备周期。此外，攻击部队伤亡后兵力难以及时补充，也是原因之一。这常常使部队陷于“有兵待弹，有弹待兵”之窘境，致攻击时间延长。该资料第73页。

20 日开始炮击，22 日步兵开始突击，发起第四次攻击（正式作战命令“怒战字第 20 号”，为 19 日晚 10 时下达）。[17]

在此期间，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 11 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及美军顾问组长多恩准将均来到松山前线视察，他们对松山战事的僵局焦虑不已。对松山这块“骨头”之难啃，他们与第 8 军军长何绍周的判断并无分歧，但在拥有优势的作战物质条件下，他们都希望第 8 军部队在主观能动性方面有更大作为。经与何绍周研究，决定由各部队抽调精干官兵组成尖兵团，以师长任团长，团长任营长，各级军官逐级充实第一线，集中全力攻坚。为激励士气，使官兵拥有必胜信念，何绍周在向部队动员时表示：“自今日开始，不拿下松山，我就不理发剃须！”[18]

在中国远征军将领们感到痛苦焦虑之际，松山日军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天，日军士兵乘我军步兵停止攻击间隙修补阵地，忽然听说勐梅河水源地的蓄水池被我破坏，各阵地立刻陷入断水。金光惠次郎不得不下令，此后各阵地每日派士兵利用夜间摸下山去背水。[19]

日军从勐梅河抽水上山，水道隐蔽得十分巧妙，看不到，炸不坏。攻击几十天，我军一直不知道松山主峰日军吃水从哪里来。这天，在一位当地老乡协助下，远征军找到日军水源地所在，破坏了其第一储水槽。此后，日军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据活下来的日军士兵早见正则回忆，“此后每天夜里，我们就悄悄地下山去取水，以供饮用”。

但让松山日军颇感伤心的是，战后，一些日军军官谈及这一点时，认为是活来下的士兵为失败找借口，说：“天上下着雨，到处都是湿的，还有必要去取水吗？”早见正则曾愤愤不已地告诉品野实，这种可笑的言辞让活下来的士兵极为不满。[20]

---

〔17〕《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18〕陈剑声：《夺取松山之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59 页。

〔1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2 页。

〔20〕同上书，第 215 页。

7 月 15 日至 18 日：D+41 至 D+44 日

按照何绍周的命令，自 7 月 14 日至 19 日，远征军以轻重炮火对敌堡垒及侧防、掩蔽部彻底破坏，实施“先行软化，再行攻略”的方针。不间断地炮击，使得松山再次被浓烟烈焰所笼罩。

担任主攻的第 307 团利用这段时间积极训练火焰喷射器的使用方法。

M2 式火焰喷射器，远征军官兵称“喷火枪”，是反坦克、堡垒攻坚的利器。它是美军提供的一种新式武器，美国也是刚刚研制定型不久，刚拨发到远征军部队时还要求保密。据说，这个武器是直接针对在太平洋各战场对日军的登陆攻坚作战而研制的，在没有它之前，美军也尝够了日军据险负隅顽抗的苦头。其原理也很简单，就是两个 15 升的罐子，一个装凝固汽油（普通汽油中加入凝固粉），另一个装压缩空气，油料经过软管压迫进喷枪，击发点火之后就喷射出去，成为一条火龙，射进敌堡垒内，超过 1000 摄氏度的炽烈的火焰引起堡垒内物体燃烧，弹药爆炸，人员窒息死亡，即便有增援之敌，亦因温度过高不能马上利用。这样就可以有效摧毁敌堡垒，消灭了死守堡垒的敌兵。

然而由于初次使用，射手操作不熟练，或火焰射不进敌堡，或射手未进到发射位置就在敌火力射击下牺牲，致使火焰喷射器不能发挥预期效果。因此，第 307 团集中火焰喷射器手由副团长陈一匡负责训练；把全团火焰喷射器编成 8 个战斗小组，每组火焰喷射器配正副射手 2 人，担任火力掩护的轻机枪组 4 人组成。在团指挥所后方小村中训练一周，对火焰喷射器使用要领、发射操作、运动方法、火力协调等，反复演练，以期达到动作纯熟，在后续攻击战斗中使用。[21]

同时，各部补充弹药，加强对壕作业，逼近敌阵地。其间，15 日中午，为探明日军松山暗堡分布，荣 3 团、荣 2 团第 3 营对子高

---

〔21〕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07—408 页。

地发起了一次小规模攻击。[22]因敌反扑失利，荣3团团长赵发毕、荣2团第3营营长郑安关[23]均负伤，连排长以下官兵伤亡甚众。只好固守既得阵地，与敌对壕相峙。

据日方记载，日军56师团司令部由无线电侦听得知我军准备发起新的攻势，并通报给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17日午后1时许，日军从阵地上看到，在下腊勐附近出现了远征军军车，知道远征军已将惠通桥完全修复。正值雨季，河水暴涨，远征军能如此迅速地修复惠通桥，让日军万分惊讶。[24]而且，因公路处于射击死角，炮火袭击难以奏效，眼看着大批我军汽车顺着公路爬上来，运来用于反攻的弹药和物资，在阵地前越堆越高。

18日，日本东条内阁总辞职，占据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开始抽调兵力移防冲绳，日本从战略攻势转入守势。午后，松山日军通信队通过无线电收听到了这个消息。担任传令兵的早见正则去30米外的联队本部掩蔽部向真锅邦人报告，在掩蔽部外听到消息的士兵开始小声议论起来，不一会就杳然无声。[25]早见走出战壕时，看到士兵们都蹲在战壕里愣愣地盯着一处发呆。

挑起太平洋战争的东条英机垮台了，但疯狂的战争车轮仍在失控状态下疾驰。也许这些被绑在战车上的日军士兵都意识到了末日即将来临，只是不知道命运所安排的具体归宿。

7月19日：D+45日

这天，在日军卫生队收容所的战壕里，因受伤从阴登山撤下来的首任预备队长、第6中队小队长大和幸辅中尉伸头观察敌情，被落在附近的迫击炮弹击中面部，鲜血堵在喉管里，疼得连气都喘不

---

〔22〕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09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载，7月17日13时许，远征军曾以小股兵力发起了一次进攻，被击退。笔者怀疑陈一匡所说15日的行动，即这次攻击，是时间记忆有误。

〔23〕陈一匡记荣2团第3营营长为陈贵亭，但荣3团副官崔继圣、第309团副官陶相宜均记该营营长为郑安关。

〔2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3页。实际上，此时远征军工兵仅在怒江上搭设了临时浮桥。

〔2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18页。

匀，卫生兵把他的喉管切开，也未能救活，于当日死亡。[26]

大和幸辅中尉是一个好色之徒。中国远征军反攻前，一名叫中村森太郎的少尉从联队密码班被调到第6中队，在向小队长大和幸辅中尉报到时，却发现他正在慰安所里忙活。对此，战后侥幸活下来的中村森太郎终生难忘。

5月份增援高黎贡山方向作战时，大和幸辅中尉本应率第6中队前往，但他借口患了夜盲症，指使中村少尉带队。后来中村在龙陵会战中失去了一条腿，幸免于松山全军覆灭之战。中村认为自己的生命就是用那条腿跟大和幸辅中尉换来的。

活下来的中村森太郎曾告诉品野实，他在缅甸的第15军司令部受训时，曾经在集会上听到过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的训话。牟田口廉也在卢沟桥事变时任"中国驻屯旅团"第1联队长，正是此人指挥所属联队打响了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枪，战后他供述是"我制造了卢沟桥事件的开端，事件扩大成中日战争，最终发展为大东亚战争"[27]。战争期间，"当他辖下的日本军队占领了日渐广大的中国版图时，牟田口廉也经常公开地鄙夷中国人没有自卫能力，随着中国军队的每一次战败，他对中国人的蔑视和憎恨便愈发强烈"[28]。

就在中国驻印军已开始反攻缅北的胡康河谷作战、中国远征军准备反攻滇西的前夕，牟田口廉也指挥的第15军竟然率先于1944年3月8日发动了对印度方向英军的英帕尔作战（日军称"乌号"作战）。因为战争准备不足，特别是在山区雨季作战补给问题难以解决，作战计划一提出就遭到其作战参谋片仓衷大佐及属下师团长们的强烈反对。但是牟田口廉也在他当年的顶头上司中国驻屯旅团长、时任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出于"个人私情"[29]的支持下一意孤行，最后导致战争惨败。投入的3个师团和一个"印度国民师"共

---

〔26〕［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39页。

〔27〕［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41页。

〔28〕［美］多诺万·韦伯斯特：《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第243页。

〔29〕［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41页。

15.5 万人中，死亡达 6.5 万人，几乎一半是因病饿而死[30]，其惨败程度超过了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败走野人山。开战不久，牟田口廉也即以作战不力、“缺乏进取精神”为由，将第 15 师团长山内正文、第 33 师团长柳田元三两个中将罢免。随后又将擅自下令撤退的第 31 师团长佐藤幸德中将解职，以日本陆军史上前所未有的师团长级抗命罪交付军法会议审判。

战后，被称为英帕尔作战“第一人祸”的牟田口廉也主动要求为日本国会图书馆留下录音口述史。谈及一意孤行发动此次作战的原因，他说是因为个人挑起战争给国家带来灾难，就想“根据自己的力量进攻印度，如能对贯彻大东亚战争带来决定性影响，那么作为制造这次大战爆发原因的我，就算给国家尽了绵薄之力”[31]。一个中将军司令官基于“个人心情”，就能发动对一个国家的战事，这类事情在当时的日本军队，真是不算少见。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几个佐级参谋军官，就曾大胆包天地策动“满洲事变”；第 5 师团长中村明人中将敢于在日法两国外交协商初步达成协议的时候，断然以武力进占法属印度支那，都是基于同样的心理：成功了，自有军部和天皇追认，成为国家“功臣”；不成功就走一步看一步，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战争赌徒”心理，几乎可视为军国主义日本的基本特征。可惜的是，这些人都是能惹祸不能收场的主儿，战败后没有一个敢于以“武士道”的方式自杀承担责任，反倒在战犯审判中为自己百般辩解，活下来的日军下级官兵都从心里鄙视他们为懦夫。在英帕尔战场，很多日军官兵愤恨地呐喊着“不打死牟田口死不瞑目”而死去。[32]

牟田口廉也中将当时在缅甸仰光对中村等军官训话时说：“要培养最勇敢的士兵，最重要的是尽快让他们成为精神病人！”[33]这些话

---

〔30〕战后日方记录云日军 3 个师团战死 3 万人，伤病 4.2 万人，残存余额不及原额 1/10。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 282 页。

〔31〕［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 41 页。

〔32〕同上书，第 27 页。

〔3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40 页。

让入伍前是一名中学教师的中村惊异而难忘。而在第 113 联队的补充兵品野实看来，这些看似残忍的话正是日本军队的真理："人只要一发狂，就会去杀人，去吃死人肉。"

在高黎贡山方向作战的远征军第 198 师第 592 团团长陶达纲，1988 年在其《滇西抗日血战写实》一书，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5 月 30 日，打下冷水沟，只见两个坑中有水泡着的十几具日军尸体，细看他们的大腿肉、屁股肉都有刀痕，有的还见骨头，真是惨啊。又随部队到了北斋公房，房屋四周有一小堆一小堆的黑色屎便，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日本人吃他们自己人的肉，因为纯吃肉的屎便是黑色的。显然五六天以来，日本人后方补给断了。"战时驻重庆美国新闻处所编的《最高海拔的战斗》中这样描述："那里的日本人被包围，最糟糕的供应问题出现了，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在炸毁日军最后的工事时，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原估计至少还有 300 名日军，现在只剩下 75 人？他们在厨房找到了答案，原来日本人吃完了干粮，就把自己人一个个吃掉。"中国远征军美军最高顾问多恩将军，也发现了日军吃人肉的事实："我们和中国的一个营在高黎贡山西坡一个叫江苴的地方奇袭成功，当我们冲到了日本军的一个指挥部食堂时，美国的联络军官碰见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吃人肉的例子：准备好的不同阶段的尸体像堆柴一样地在地上堆着，有一些尸体的部分位置被剥了皮，长条的人肉是从另外一些人身上割下来的；有几人仅留下了骨架，奇怪的是头、手和脚都完整地保留下来。许多长条人肉，显然是从手臂和腿部割下来的，正挂在树枝和绳子上晒干，有些还需要被割成适当长条以便在两口大锅里炖煮。"[34]据说，多恩将军当时曾主张把日军所作所为的真实情况公诸全世界，但被中国方面制止了。

在腾冲战役中活下来的日军第 56 师团卫生兵吉野孝公，在其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对于日军吃人肉却未提一字，只是很含糊地说到"战场上的人肉部队"，就是困守冷水沟几乎全军覆没的

---

〔34〕语出弗兰克·多恩将军回忆录《当国旗降下之后》，转引自《中国国家地理》杂志 2005 年 8 月号文章《怒江：愤怒之河》，孙敏撰文。

第148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日隈太郎少佐）。[35]第56步兵团军医中尉丸山丰，是从密支那战役中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之一。他给吉野孝公的书所写的后记里写了这样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对于战场上的事，有的可以写，有的则不能写；有的想写，有的则再也不愿追忆。"军医丸山丰随第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增援密支那，目击了水上少将的自杀，战败回国后成了一位诗人，写过《地下水》等战争题材诗歌。后来，日本九州大学中国文学部的秋吉久纪夫教授曾将丸山丰的诗与中国远征军英文翻译、诗人穆旦（查良铮）的诗作比较文学研究。[36]

据载，多恩将军在分析中国方面为何阻止自己发布日军吃人肉这一事实时，得出了一个令人遗憾的结论："中国人对任何一种人——甚至可恨的日本人——竟会采用吃人的手段而无所恐惧……中国方面可能认为日本人在战地那种野蛮习惯不会在他们之间立刻引起多大的厌恶和反感。并且他们都有一种潜在的担心，如果这种事情一旦传开，将会给他们自己的部队在粮食缺乏而准备菜单时出一些坏点子，因为这种缺粮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事情。"[37]

这种说法，无疑带有西方人固有的认为东方民族愚昧野蛮的整体偏见。笔者认为，中国方面之所以制止多恩将这一事实作为"宣传材料"来发布，是因为这一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战争罪行的范畴，它已经是整个人类的耻辱。当我们站在人类的立场上欲控诉此事，首先感到痛苦的是良知感备受煎熬的我们自己。

---

〔35〕［日］吉野孝公:《腾越玉碎记》，第37页。

〔36〕［日］秋吉久纪夫有论文《缅甸战线上的穆旦——〈森林之魅〉的主题》。可参见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候选人张松建评论文章：http://www.fgu.edu.tw/ ～ wclrc/drafts/Singapore/zhang-s/zhang-s-04.htm。

〔37〕据弗兰克·多恩将军回忆录《当国旗降下之后》，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译文"部分：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第 8 章　五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7 月 20 日—7 月 25 日。

指挥：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

主力：第 307 团、第 308 团、第 246 团、荣 2 团第 3 营。

进展：夺取滚龙坡丙、丁、庚高地。

（参阅附图 25、附图 26）

7 月 20 日：D+46 日

清晨，何绍周在竹子坡军指挥所用望远镜观察着日军阵地，眉头紧锁。由于连日阴雨，浓雾弥漫，观察不便，远征军炮兵“软化”敌阵地的定点摧毁战术一直未达到预期效果。几天来第 8 军将士冒雨蜷伏在散兵壕里，积水满踝，饥寒交迫，苦不堪言。

天气现在成了最可恶的敌人。

白而浓稠的大雾于松山各高地蒸腾缭绕，刚刚露出日军阵地一角，旋而又把它遮蔽起来，成了日军天然的伪装网。令何绍周稍感宽慰的是，随着怒江便桥修复，炮兵又从东岸将 4 门 115 毫米榴弹炮推进到了下腊勐，以 8 门山炮置于竹子坡、2 门置于阴登山，另以 2 门山炮布置在核桃箐以北的 5350 高地，现在可以对日军滚龙坡阵地从 3 个方向夹击，且对敌主要堡垒早已标定好射击诸元。

用望远镜观察片刻后，何绍周断然下令按预定计划开始炮火准备：总攻击开始！

几十门山炮、榴弹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弹雨铺天盖地地向日军滚龙坡阵地轰击。滚龙坡阵地横跨滇缅公路，是宽约 200 米、长约

500 米的狭小阵地，由步兵第 2 中队小队长井上要次郎中尉率 70 多名日军坚守（后增援兵力至 140 人）。据日方记载，“一天之内，七八千发炮弹倾泻而来，守备队士兵被炸得血肉横飞，伤亡惨重”[1]。

这天，第 113 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收到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电令，要求他在最坏的情况到来时，把军旗烧掉，并将饰有天皇菊花御纹族徽的镏金旗冠深埋。[2]“军旗奉烧”是日军在面临全军覆没时的最后举动，尽管真锅邦人大尉在陆军下士官教导学校时代即熟悉这一军中教义，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面对这个问题。虽说炮兵少佐金光惠次郎是守备队长，但只有步兵第 113 联队才拥有军旗，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走后军旗就由自己保管。在阴暗的步兵联队本部的掩蔽壕里，真锅邦人就着蜡烛微弱的光亮打开了存放联队旗的木匣，摩挲着潮湿厚重的旭日旗，心里掠过一阵浓重的悲凉。

据载，这天夜里，得到少量弹药补充的日军士兵，打算挑选一些精兵去偷袭我军指挥部，但未能成功。[3]

超链接 13：松山战役中的炮兵作战（之三）[4]

日军退守松山和滚龙坡，依靠坚强永久工事顽强固守；第 8 军也向敌阵逼近靠拢，部分火炮在怒江东岸因距目标太远，射程达不到。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炮 7 团第 1 营的两个 115 榴炮连，将阵地推进到怒江西岸，在升登盘旋公路一侧的山坡上，重新占领了阵地。这里逼近松山脚下，适宜利用曲射弹道的特点，更好地支援友军战斗；第 1 营的 762 野炮第 1 连，仍在怒江东岸，隔江射击。

---

〔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3 页。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表七《第八军松山战役武器弹药消耗统计表》，整个战役期间，我配属炮兵消耗各种口径炮弹总数为 49986 颗，自 6 月 1 日试射至 9 月 7 日战役结束，日平均消耗炮弹约 538 颗。若按日军的印象每日七八千发，则那些炮弹不到一周即可打完。因此，日军对我炮火强度的感受应是一种被夸大了的心理感受。

〔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61 页。

〔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4 页。

〔4〕本节内容，系参考宋宝恒：《在松山战役中炮兵的使用》（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2 辑，第 180 页）一文撰写。

炮10团仍在怒江东岸的原阵地，利用射程远的优势，继续支援进攻松山的战斗。

炮7团第1营和宋保恒第3连的观测所，设在炮阵地的西南面竹子坡高地上，在炮目线的左方，炮观距有4000米，但因竹子坡很高，由阵地到观测所，要走两三个小时。观测所这里，林木丛生，便于隐蔽。与阵地架通电话，修好掩蔽部，架上炮队镜后，就可以更清楚地观察敌情，发现新目标。同时也有利于观测射击效果和指挥射击，更正确地修正方向和距离，并仔细观察步兵的进攻活动，这样就更便于与友军步炮协同，适时、切实地支援友军战斗。

日军在后一阶段，把兵力集中到松山、滚龙坡不到10平方公里范围内，凭借其坚固工事和完备设施，顽抗死守。我军连日猛攻，均遭到重大伤亡，经过近一个月的反复冲击，仍未攻占松山。当时，由于炮弹较少，不能尽量发射，难以破坏敌人的坚强工事；加之曲射步兵炮少，不能消灭压制新出现的重要火力点，因此当步兵暴露冲杀到近敌阵前时，往往遭受敌人突然出现的新火力点的强烈射击，伤亡惨重。宋保恒他们在竹子坡观察得极清楚，极为痛惜。

在多次失利、久悬不进的情况下，第8军军长何绍周把他的指挥所也推进到了炮兵观测所所在的竹子坡上，天天利用剪式炮队镜观察敌情和战斗态势。有两次卫立煌司令长官也到这里来了解战况，征求、研究攻战方法意见，探讨取胜途径，指示战斗。宋保恒和第1营营长胡春祥有二十多天都在他身旁，提供情况和意见。

松山当面之敌疯狂挣扎，凭险顽抗，我军伤亡过大。在屡攻不下的情况下，“吃一堑长一智”，步、炮兵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摸出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战斗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

这段时期的主要经验是：

不能急于求成，不能再盲目硬拼、暴露冲杀；

利用各种手段，弄清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配置、建筑物、明暗碉堡群和对我进攻影响最大的障碍物，用我们的火炮、协同步兵炮逐一以破坏之后，再组织进攻；

昼夜突击，掘土打石，对敌阵搞“对挖作业”，即掘壕接近敌阵，几路并进，可以减少暴露伤亡，完成一处，夺取一处敌人阵地；

对敌每一据点和阵地，在完成上述条件后，步炮密切协同，组织进攻。首先以火炮压制敌人火器和阵地上敌人的有生力量，掩护友军从对壕里接近敌阵，一跃而上，一鼓作气地冲入敌阵，冲击包围，消灭敌守。这样就一个又一个地占领了敌阵地。用这种“蚂蚁啃骨头”的办法，远征军逐批消灭日军，使得敌人阵地越来越小，残敌越来越少。

7 月 21 日至 22 日：D+47 至 D+48 日

21 日天气持续恶劣，无法实施准确炮击。何绍周决定将原定两天的炮火准备时间向后顺延一日，步兵攻击于 23 日开始。[5]

当日，本道阵地守备队长井上要次郎中尉遭我炮击毙命。据载，井上要次郎时年 35 岁，应征前在福冈市经营一家建材商店，夫人是一位女警官，两人育有一男一女，家境优裕。井上在松山期间，曾给妻子写过近百封家信。[6]

井上死后，原守备松山阵地（1、2 号高地）的步兵第 4 中队小队长松尾良种中尉奉命乘暗夜进入阵地接任。

这天，位于芒市的第 56 师团情报部门通过无线电监听到了蒋介石给中国远征军的激励电文，云：“目前战局总体向有利于我发展，前途充满光明，但通向胜利的道路仍艰难坎坷。就目前各方面战况进展而观，不如意者甚多。在这方面日军堪称楷模。在密支那、松山、腾冲战场上，日军守备队所发扬的勇敢善战精神，令我军相形见绌。余对此深感遗憾。希望官兵一致，振奋士气，加强训练，改进战法，克服千难万苦，协力向打倒强敌积极迈进！”[7]这则电文，后来被日本军部当作来自敌对国领袖的“逆感状”（感状，是日军部队长感谢部下作战时特殊贡献的一种书状，类似我军之嘉奖令；“逆感状”可以理解为“反面嘉奖令”之意）而引以为荣，在相关撰述中屡屡被引用，然而在我方史料中却很难查到原文，此为笔者根据

[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3 页。
[6]［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105 页。
[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3 页。

日方资料译出。[8]

称赞敌人"勇敢善战"，在中国近代以来抗御外侮的历史上是鲜见的，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样的话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嫌。笔者推测这是蒋介石对远征军官兵的一种特殊的心理刺激，藉以振作士气。但也有撰述者认为，蒋介石如此褒奖日军，是说给美军联络组听的，意在提醒美方看到日军的顽强，从而对中国军队战事不利少一些指责。战后，很多日本人常常援引蒋介石的这份电报，说它充分证明了日军强大的战斗力，但是活下来的日本兵却说这纯属为失败找台阶的自欺欺人。当时被"救援"所欺骗而处在煎熬中的松山日军，是没有这种自鸣得意的感觉的。[9]

据日方记载，至 22 日 16 时，日军滚龙坡阵地遭到炮火连续轰击，落弹超过了 8000 发。[10]从松山主阵地上用望远镜观察，只见沙石随着火焰漫天飞扬。日军都怀疑，有谁能逃脱这样的轰击呢！但炮击停止尘埃落下后，仍能看到阵地上有士兵在蠕动。

所有这一切，金光惠次郎在松山主峰音部山阵地完全看入眼中，却无可奈何。

在怒江东岸的炮 10 团老兵董启超记得，此时我炮击已持续了近两个月。最初，松山日军还常常发炮还击，进入 7 月份后就再没炮弹飞过江来。董启超没有望远镜，只能凭肉眼遥望茫茫雨雾中的松山，山顶终日烟雾腾腾，不时看到步兵交火的火光闪烁。董启超和弟兄们心里急啊："每天少说要轰两万发炮弹上去，两个月就有百万发炮弹炸在山顶鬼子兵头上，他们怎么还没死绝呢？"[11]

---

〔8〕来自日文网站的原文为："戦局の動向はわれに有利に展開しつつあり。勝利の栄光は前途に輝いているものの、その道に到達するまではまだなお遠しといえる。各方面の戦績を見るに、予の期待にそむくもの多し。諸兵、ビルマの日本軍を範とせよ。拉孟において、騰越において、またミートキーナにおいて、日本軍が発揮した勇戦健闘ぶりを見よ。それに比し、わが軍の戦績の、いかに見劣りすることか。予は遺憾にたえざるものなり。将兵一同、一層士気を昂揚し、訓練に励み、戦法を考案し、困難辛苦に耐え、強敵打倒の大目的を達成せんことを望むものである。"

〔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02 页。

〔10〕同上书，第 184 页。

〔11〕据 2005 年 6 月 18 日《重庆商报》文章《血战松山三吨炸药炸飞山头》，罗磊、颜乔撰文。

当日，担负主攻任务的各部均已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左翼队第307团于滚龙坡南侧无名高地及核桃箐一带，中央队第246团于滚龙坡东北部庚高地前沿，在我炮击掩护下以对壕作业逐渐逼近日军阵地。[12]

7月23日：D+49日

即日10时后，天气稍见开朗，炮兵依计划继续进行破坏射击。

这时，我指挥所观察发现马鹿塘附近有50多名日军钻出战壕蠢动，当即指示滚龙坡西北5350高地的山炮予以轰击，日军被迫缩回战壕。[13]

12时10分，日军3架九九式军侦察机在12架一式战斗机掩护下临空。九九式“军侦”发动机为940马力，最大时速424公里，载重400公斤；其两翼中央有13毫米机关枪各一挺，机舱前端还配有一挺7.7毫米旋回式机关枪；飞机两翼下各悬挂一个重50公斤的空投包。此外，战斗机腹部也悬挂一个50公斤的空投包（每个空投包内装有手榴弹50枚，步枪弹2000发）。15架日军飞机在松山上空盘旋，在马鹿塘附近相继投下供应品18包。

“看到了上半身裸露，红土色皮肤的守备队士兵从阵地里冲出来，正拿着被雨浇得湿淋淋的T形白色布标拼命在地上铺设，一时内心充满了对他们的敬佩……”实施此次空投的日军飞行班长小林宪一中尉后来在日记中写道。[14]

按预先计划，飞机完成空投任务后应迅速脱离战场，但飞行班长小林中尉、战队长相泽少佐等人此刻全然将此忘在脑后，操纵侦察机和战斗机向我地面部队俯冲扫射。[15]

何绍周这才意识到，上午那些钻出战壕的日军，是出来为空投飞机布设“T”形白布标志的。遂下令我高射炮拒敌机于高空，并以

---

〔12〕《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1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3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4页。

〔14〕［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28页。

〔15〕［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92—94页。在《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亦有记述，不过记日机为12架，投下供应品20包。第74页。

炮火覆盖敌空投地域。日军冒着炮火钻出战壕抢拾空投包，被我击毙十多名，并将空投包打得七零八落。[16]

不久，美军第14航空队数架P-38、P-51战机飞来，如饿虎扑羊般冲入敌机群。正在侦察机前舱操纵旋回式机关枪俯冲扫射我军的小林中尉，身后机舱被美军战机一发炮弹击中。战队长相泽少佐见状不敢恋战，遂下令机群迅速摆脱我方战机撤出战场。[17]

午后，我攻击部队将士均潜伏在出击位置，静听炮弹“嗤嗤”掠过天空对敌阵地狂轰滥炸，紧张地等待攻击令的下达。至14时，在松山子高地顶部的树木已经被炮火摧毁无余，但仍看不到其工事所在。丑、卯高地前较开朗，但也难以看到敌阵地的位置。

但滚龙坡东北部庚高地（日军侧面阵地前沿）的堡垒，已经完全摧毁；乙高地堡垒也已倒塌，其四周填土用于被覆的大汽油桶被摧毁无存；丙、丁高地的堡垒亦见倒塌，其堡垒四周的交通壕、散兵坑及机关枪巢亦见崩溃。

指挥部感到炮击已达满意效果，当即命令炮兵转移火力，步兵开始突击。[18]

当时的中国随军记者黄怡曾如此描述这次攻击：

当发射开始总攻的信号弹的光焰尚在飘散，当我最后落在敌阵地上的炮弹的爆烟还未消散的瞬间，我军即展开了中国近代战争史上罕见的诸兵种联合攻击作战。

步兵紧接着一波一波冲进铁丝网破坏口，向敌阵勇猛突进。

炮兵紧随着标示步兵到达线的白色布板延伸弹幕。

步、机枪，迫击炮向残留敌军方向集注炽盛火流。

火箭筒、战防炮配合火焰喷射器的火舌，将敌坚固的钢板掩体化为乌有。

---

〔1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3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4页。
〔17〕［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92—94页。
〔1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3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4页。

在步兵冲击最前沿，不断发出各种颜色表示各种信号，一片迷彩似的浓烟。

盟军飞机一次俯冲，又一次俯冲，搜索扫射敌人。

我突进步兵，一次又一次地用手榴弹、冲锋枪、刺刀，击退敌军官战刀白晃晃挥督下的猛烈反扑。

民众担架队、运输队冒着弹雨，不断向前运送弹药，后送伤员。

工兵立即将已经占领的敌军阵地改变成我军阵地。

连续不断的一次攻击，又一次攻击，敌军一再反扑，又一再反扑。火焰的巨大火团，由一个山头喷射到另一个山头，不分昼夜地争夺战斗。〔19〕

战斗中，左翼队第307团以第1营（营长刘家骥）、第3营（营长叶成章），在我炮兵转移火力之瞬间，以轻重机枪适时压制敌火力，步兵即向丙、丁高地攻击前进。这时我火焰喷射器发挥了效能，敌堡火力顿熄，步兵即勇猛突入阵地。战斗仅20分钟，即将丙、丁两高地堡垒大部占领，继续向乙、戊高地堡垒进攻。但已遭破坏的乙高地顶部堡垒中，仍出现敌密集火力，集注于我攻击部队；丁高地东北山嘴及丙、丁间左侧各机枪阵地侧防火力及掷榴弹又向我急袭，我攻击队士兵伤亡奇重。

15时许，突起狂风暴雨，日军乘天昏地暗之际猛扑丙、丁高地，第307团陷于苦战，黄昏时丁高地一度失守，情势危殆。这时，第308团第3营（营长张德荣）适时赶到，军长何绍周电话命令第103师师长熊绶春以该部投入增援，19时又夺回丁高地。〔20〕

战斗中，何绍周一直在竹子坡用望远镜观看第307团进攻，发现副团长陈一匡手执冲锋枪，率领官兵勇敢冲入丙、丁高地时，对站在他身边的军参谋长梁筱斋及参谋人员说："你们来看，那个身披

---

〔19〕黄怡：《松山攻夺战经过》，原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战时宣传丛刊《文摘月报》第4卷第9、10期合刊。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江山作证》，第162页。

〔20〕《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3—24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4—75页。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08页。

雨衣，指挥官兵冲进敌阵地的是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他是军校第10期学生，这样英勇善战，谁说军官学校学生怕死啊！”[21]副团长、副营长、副连长这些副职，在平日里掩在主官背后不为人注意，甚至指挥系统表上都看不到姓名，在战场上则是直接率队执行主官命令的角色。

看到左翼队战局较为混乱，何绍周又电话命令仍将第307团交由熊绶春指挥，并通知此前统一指挥中央队和左翼队的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熊绶春遂赴汪家寨另行开设指挥所。23日夜，滚龙坡之敌又不断反扑，因第308团第1、2两营分别在白泥潭、腊勐街担任警戒，一时无法调集，熊绶春急令师直工兵连及防毒连增援，始得占据丙高地及丁高地一部，并虏获敌半掩埋做固定堡垒的战车一辆。[22]

在中央队方向，第246团主力于炮兵火力转移之瞬间，一举攻入庚高地，即利用其阵地加以修改而固守之；并以一部推进于大垭口南约200米之公路旁，严密警戒。当晚，敌集结约百余人，由大垭口及己高地方向反扑4次，均予击退。当翌日晨日军反攻无望，遗尸40余具，从我阵地前奔逃的时候，我军发出一片“活捉”的喊声，士兵兴奋得从阵地内跳了起来，美军联络官翘起大拇指向我士兵们不住地大叫：“顶好！”敌又被我截击于大垭口南侧公路上，遗尸30余具。

右翼队的荣2团第3营突击巳高地，因受右侧松山子高地火力瞰制，攻击终日无果，致使其主力未能断行攻击。[23]

7月24日：D+50日

拂晓后，滚龙坡之敌又全力反扑，我军官兵浴血苦战，至中午始获稳定。

---

〔21〕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08页。

〔22〕《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2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3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4—75页。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408页。

昨日黄昏我攻击滚龙坡时，有 5 名被日军抓做民夫的当地老百姓从大垭口逃出来，被我军发现。即日清晨经过讯问，民夫说日军在大垭口附近常留驻健康兵员约四五百人，目前另有七八百名伤兵。[24]

下午 4 时许，敌乘浓雾风雨交加之际，再向我丙、丁高地守军猛烈反扑，伤亡枕藉，屡濒于危。我军官兵均抱定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奋不顾身，与敌肉搏。第 307 团团长程鹏、副团长陈一匡均持冲锋枪在第一线督战，士气愈奋，入暮后卒将顽敌击退，丙、丁高地仍在我手。

与敌鏖战中，副团长陈一匡被敌射来的掷榴弹击断左上臂，被后送腊勐街军野战医院；两个营长刘家骥、叶成章均负轻伤，阵亡连长 2 人、排长 5 人，士兵 200 多人。但敌军经这次猛烈打击，凶焰渐减。[25]

鉴于第 307 团、第 308 团第 3 营及直属部队两个连伤亡巨大，已丧失攻击能力，第 8 军军长何绍周决心变更部署，拟以第 308 团第 1、2 两营担任攻击，令前番攻击部队后撤担任预备队。并改此前的"一举攻略法"为"逐次攻略法"，将攻击目标限定为丁、戊两个高地，依据进展情况再逐次攻略乙、甲两高地。

当晚，第 103 师根据军命令拟定了滚龙坡攻击计划，其指导要领为：攻击部队应以丙高地为据点，逐次占领丁、戊、甲高地，后整顿态势相机进出于己高地之线；攻击部队应派遣小组战斗斥候严密搜索敌侧防机能予以彻底消灭，以便攻击队攻击容易；攻击实施并乘炮击成果猛烈突击，不得停止于敌手榴弹投掷距离内致遭损害；攻击奏功后应即迅速修改工事及与后方大交通防敌逆袭。

该命令于深夜 24 时以"滇战字第 1 号命令"下达各部。[26]

这天夜里，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在滚龙坡战壕里见到了几名来

〔2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7 页。
〔25〕《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26〕据《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送饭的慰安妇。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最使我感动的是：朝鲜慰安妇两人一组给官兵送吃的东西，她们淋着雨，冒着弹雨，将干面包和饭团装在桶里，给我们送来。煮饭处是在关山阵地通往核桃洼途中下面挖的一个洞里，那附近经常遭到敌人的炮击。如果稍有烟雾冒出，马上就会引来敌人的炮击。晚上，为了不让亮光泄露，就用几层毛毯挡住洞口，在弥漫的烟雾中做饭。"〔27〕

这是个令人痛惜的事实。然而当这些朝鲜慰安妇被我军俘虏后道出实情时，早见正则的感动完全是一种虚伪的矫情。

估计到次日我军将对滚龙坡发起新的攻势，24 日深夜，金光惠次郎命令里山阵地的第 2 机枪中队长只松茂大尉前往本道阵地指挥作战，又将担任预备队的军旗护卫小队派往增援。25 日凌晨，我中央队第 246 团一部奉命前出切断公路，在大垭口南、己高地右下方，正与安河内正幸少尉率领的军旗护卫小队约 30 名增援之敌遭遇。经过激战，我军毙敌 12 名，缴获山炮 1 门，安河内正幸仅率十余名残敌强行突入滚龙坡。据品野实记述，该队"伤亡惨重，增援的兵力再也没有了"〔28〕。

7 月 25 日：D+51 日

25 日晨，第 8 军再次对滚龙坡发起总攻。

8 时前，第 308 团第 1、2 营均已在无名高地及丙高地南端进入攻击准备位置。10 时许，我直协炮兵开始向甲、乙、戊各高地射击，破坏敌之工事及侧防机能。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从战壕里看到，滚龙坡西南方向 100 米处的阵地前沿冒出一杆白旗，旗子一个劲地上升，然后在空中摇来摇去，似是远征军步兵在为炮兵指示目标。30 分钟后，远征军即开始炮击。早见正则所在的浅见机枪分队正在野炮战壕里修筑工事，这时一发炮弹正好落在工事里爆炸，本道阵地继任守备队长松尾良种中尉挥动着军刀倒下了。这位松尾中尉，是

---

〔2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11 页。

〔2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4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5 页。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5 页。中日记载可以相互印证。

1943 年 8 月从前线出差回国时，把早见这批补充兵从日本北九州的门司港带到松山的。[29]

下午 3 时，308 团第 1 营（营长郑季衡）为右翼，向丁高地北端之敌攻击；第 2 营（营长杨永康）为左翼，向戊高地攻击。老兵杨克南，原为第 308 团团部中尉副官，在我军反攻前被派遣到云南古木学习 60 迫击炮，归队后被任命为第 2 营第 1 连炮排排长。据其回忆：

我们营一展开，就被鬼子火力压得抬不起头！只听彭营长[30]高喊："火焰喷射器，火焰喷射器！"两个喷射兵冲上去，鬼子枪法好，竟将喷射瓶打燃，喷射兵当场被烧成焦炭。彭营长又转身命令我："杨副官，把 60 炮集中起来，轰！"全营共 16 门炮，由我指挥，我让士兵在炮弹上再挂炸药包，一阵猛轰，鬼子机枪哑巴了，步兵一冲锋，机枪又响了！

我们连一排长叫李政山，巴县人，成都中央军校毕业，和我关系最好。记得进攻前吃最后一顿晚饭时，他对我说，老杨，这次我可能下不来了，但老子死了也要往前扑！冲锋时他在最前面，被子弹打中脑壳，当场牺牲了。连里还有一个叫张德玉的垫江人，胖子，平时最能吃，大伙都笑他。可没想到他在战斗中非常勇敢，当敌人地堡火力被我方炮火压住后，张德玉冲上去，鬼子端着刺刀出来拼命，张接连干倒两个鬼子，又钻进地堡，拉响了手榴弹！后来收复阵地打扫战场时，我见他被炸成了几截……[31]

第 103 师战斗详报载："攻击戊高地之文团第 2 营，则因受乙高

〔2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12 页。

〔30〕据《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 308 团第 2 营营长为杨永康。"彭营长"可能为第 246 团第 2 营营长彭剑鸣之误。然杨克南回忆提及本团团长为田仲达，而田仲达系第 246 团团长，因此其说法有矛盾之处，笔者以其所述战斗时间 25 日，姑且认定其参加戊高地攻击。

〔31〕2008 年 7 月 8 日《重庆晚报》文章《川军南征万名重庆勇士血战滇缅》，张卫、丁香乐撰文。

地敌火瞰制，及公路以东敌隐秘侧防机关之猛烈侧射，迄未得手。”[32]

据日军士兵早见正则回忆：“炮声一停，敌人已经攻到眼前，友邻部队开始反击。冲过来的敌人中，有许多是连嗓音都还没有变的少年，他们呼喊着稚嫩的声音冲了上来。当时，我看到一个十二三岁模样的孩子顺着机枪阵地爬了上来，他后面还跟着一个握手枪督战的军官。有的少年还站在那里哭，既不下去也不上来。于是，我们在上面用中国话喊：‘来，过来！’后来有一个胆战心惊地爬了上来，看来他情愿当俘虏也不愿意死。这个少年兵后来还是被杀死推下悬崖。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能力去照顾这些俘虏呢？”[33]

从美军照相兵拍摄的远征军照片来看，当时远征军部队中的确有不少少年兵，这是战争后期因兵源匮乏胡乱“抓壮丁”充数的结果。这也许是只有在当时情境下才能理解的残酷现实。日方的记载经常提及这一点，谴责中国军队“不人道”的用意不言自明；他们不提日军在塞班岛、冲绳岛上逼迫居民妇孺自杀的事。然而，从那些中国少年兵稚气未脱的脸上，却让人看到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绝不妥协的坚强意志：为了民族最终的独立自由，中国已经在“预支”下一代人的牺牲。而当日军杀戮少年俘虏兵的时候，无疑也到了最后的疯狂。

下午4时，日军乘暴风雨向第308团逆袭，致死伤迭出，攻击无法进展。这时，第14航空队4架战机前来助战，并用机枪向丁、戊高地扫射。但因事前空地未协调好，步兵未来得及布置布板信号，空军反而误伤我军士兵10余名，致使攻击顿挫。

随即又调整部署，下午5时许，严督攻击再兴。这时我战机又飞来助战，地面攻击部队乘机向敌猛攻，我军士兵冲入与日军守兵展开肉搏，狭窄战壕里的格斗极其惨烈。第1营终于将丁高地全部占领，歼敌百余名，虏获敌轻机枪3挺，步枪30余支及弹药文件甚多。晚7时，敌30余人利用薄幕昏暗向丁高地左翼猛扑，被我军机

---

〔32〕《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3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13页。

枪扫射，除数人逃回巢穴外，其余均被击毙。[34]

但据日方记载：25日当晚，从里山阵地前来增援的只松茂大尉率领残兵发起逆袭，又夺回了丙、丁高地的反斜面。[35]熟悉地形的日军，反复运用夜战这一传统战术，而远征军官兵却非常害怕夜战，常常将白天付出巨大牺牲取得的战果，一夜间丢失殆尽。在此后的战斗中，这一情形又多次上演。

至本日，第8军对滚龙坡阵地本轮攻击已持续5天。阵地前沿的远征军士兵，利用死角向日军阵地不断投掷手榴弹，缺乏弹药的日军士兵常常捡起来再投回来。据金光惠次郎当日发给第56师团的电报，日军已阵亡350人，负伤430人。[36]

这天时晴时雨，天气变化无常，担任协同攻击的其他各部与敌激战终日，进展甚微。而我攻击部队已损失约5个营，情状惨重。何绍周又令第245团（团长曾元三）主力从怒江东岸开至松山，增强进攻兵力。

军长何绍周要求各师设指挥部于前沿阵地1000米之内，以便就近督战；各团指挥部距前沿不得超过500米。他本人也把指挥位置推进到了距中央阵地1000米以内，亲自督战。如此距离，在敌方重武器有效射程之内，危险极大。看到军长已横下一条心，将士们也都下了必死的决心准备进攻。

何绍周又召集指挥员分析战术，总结我炮兵破坏敌阵地经验，发现150毫米重型榴弹炮命中滚龙坡乙高地堡垒后，仅能破坏其表面，内层尚完整，致使步兵无法进入。于是决定推进山炮于最近距离，命中一点，续发多枚炮弹，增大效果，纵不能彻底破坏，也要将敌迫入掩蔽部深处，而后步兵突进封堵，以火箭筒击开孔隙，再以火焰喷射器、爆破器材焚烧敌于掩蔽部内。作战主力，仍指向滚龙坡。其他阵地，亦同时进攻。预定26日拂晓，发起本军第五次攻击。[37]

---

〔34〕据《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3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5页。

〔36〕［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95页。

〔37〕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5—76页。

第 9 章　六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7 月 26 日—8 月 2 日。
指挥：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
主力：第 308 团、第 246 团。
进展：夺取滚龙坡戊、乙、甲高地。

（参阅附图 25）

7 月 26 日：D+52 日

从早晨开始，我军又集中炮火向滚龙坡阵地轰击。雨季松软的阵地，被炮火全部犁过一遍，战壕几乎被填平，日军再也无力修复。

第 308 团开始以对壕作业法推进，清扫丙、丁高地反斜面之敌，并向乙、戊两高地攻击。中央队第 246 团亦以近迫作业，逐渐向己高地（日军侧面阵地）推进。[1] 日军阵地上大部分人已经战死，活着的人没吃没喝、白天黑夜不能休息，却仍坚持在泥泞的壕沟里。[2]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载："敌士兵战斗意志顽强，虽阵地粉碎，仅余一人仍拼死顽抗，不死不休，尤不能以战理判断。虽处于绝地，仍拼死不退，我军非将其悉数斩杀无余，始能称占领该地。"[3]

松山之敌受我猛烈攻击，同时龙陵也被我第 11 集团军围攻，敌后援断绝，仅靠空投补给。这天下午 1 时，从镇安街方向又来了十

〔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8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6 页。
〔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5 页。
〔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68—69 页。

余架日军飞机。5架战斗机在松山上空盘旋3次后，超低空俯冲下来，扫射我一线部队，紧随其后的约9架轰炸机投下供应品数包。设于阴登山阵地的我军高射炮当即予以猛击，击伤敌机两架，击落轰炸机一架，该机坠毁在冯家坡敌我阵地之间。[4]

日军飞机临空时，狂喜的日军士兵跳出战壕，像在梦幻中一样，一股劲地摇动白布发信号。这时我地面部队开枪了，当场就有几个人倒了下去。[5]因降落伞在空中就被我高炮击毁，所空投物资反被我军缴获，主要是罐头食品和弹药、药品。在敌坠机残骸处，我军发现的已重伤的日军飞行员，转送至第246团指挥所后即毙命。经检查被击落敌机为九八式轻型轰炸机，机上有13毫米口径机枪两挺，于是拆卸下来。机内还发现未投完的物品，为日军八九式掷榴弹。[6]

7月27日至28日：D+53至D+54日

自即日起至31日，松山又是连续大雨。因炮兵与步兵难以实施战斗协同，军指挥部命各部队自觅战机歼敌，攻击势头有所减弱。[7]

这一阶段进攻，我军损失惨重，5个步兵营伤亡殆尽，担任主攻的第307团、第308团损失最重。所得战果为占领了滚龙坡丙、丁、庚等高地。较有战略意义的是，占领庚高地后，切断了大垭口与滚龙坡之间的联系，为尔后攻击部队扩张战果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第103师在攻击滚龙坡乙、戊高地之前，曾向军部提出3项建议：对坚固据点须逐次攻略稳扎稳打；配属炮兵于主攻部队，以挺进配置直接射击敌之侧防机能；编组挺进部队突击大垭口敌之咽喉部，截断松山与滚龙坡之联络，陷滚龙坡之敌于死命。这些建议均被军长何绍周采纳。

27日中午，第8军司令部下达了实施第五次攻击的“怒战字第24号”命令。次日，第103师以本师“作命滇字第2号”命令下达

---

〔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8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6页。
〔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14页。
〔6〕据《空军滇西作战日志》。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34页。
〔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8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6页。

部队，其要旨为：

以第 308 团（欠机枪一排）配属山炮、战防炮及喷火器组成攻击队，逐次攻略滚龙坡甲、乙、戊三据点。以第 307 团（欠机枪一排）附属师工兵连及防毒连一部，迂回攻击己、甲两据点，配合第 308 团及中央队第 246 团作战；以一部确保丙据点，并以火力协助第 308 团攻击。其余作为师预备队，集结于核桃箐附近。

命令规定，攻击发起时间，军另以电话通知。[8]

此期间，日军各级司令部发往松山守军的电报纷至沓来。

27 日，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发来的是“打气”的嘉奖令：

“拉孟守备队驻守惠通桥之要点，与中国远征军对峙。以高度的胆识和策略，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坚守阵地。昭和 19 年 6 月，敌人渡过怒江大举进攻。面对强大的敌人，你们与兵团主力部队一道，屡次打败敌人的进攻，勇敢地完成了反攻任务，其后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但是，你们能以守备队长为核心，坚强团结，以坚韧的士气，毫不退缩，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用刺刀同敌人拼搏，保卫阵地，体现了勇敢战斗的精神，真不愧为敢打敢拼的楷模，为全军树立了榜样。为此，特发此嘉奖，并通报全军。”[9]

此嘉奖状列举了拉孟守备队金光惠次郎少佐以下步、炮兵中队一级的详细番号，[10]后来成为日本公刊战史关于松山日军兵力统计的依据；但其中明显有所遗漏，但按日军惯例后来也就将错就错了。

28 日，第 33 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发来的赏词大同小异，不过是再次通告全体人员：援兵屡次努力失败，战局已经难以挽回。

---

〔8〕《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6 页。

〔10〕嘉奖电所列拉孟守备队序列番号为：守备队长陆军少佐金光惠次郎、步兵第 113 联队本部一部、同第 1 中队 1 个小队、同第 2 中队 1 个小队、同第 4 中队（欠 1 个小队）、同第 5 中队 1 个小队、同第六中队 1 个小队、同第 1 机关枪中队 1 个小队、同第 2 机关枪中队 1 个小队半、同联队炮中队（欠 2 个分队）、野炮兵第 56 联队第 3 大队、辎重兵第 56 联队第 1 中队 1 个小队、第 56 师团卫生队第 3 中队、第 56 师团防疫给水部一部。据［日］楪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 104 页。

品野实说，电报只字不提最后时刻是否可以突围逃跑，“丝毫没有悔过和自责的表示”。太田毅认为，这也许是日军高官预感到拉孟守备队已时日无多，解救希望渺茫，突围也无可能，趁他们还活着，发个嘉奖令作为“悼词”、“香火”，安慰安慰罢了。[11]

此时，松山阵地日军的全部兵力，包括伤病员在内，只剩下300多人了。[12]

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从龙陵发给真锅大尉的电令，则要“务实”得多。他再次念念不忘地提醒真锅：“要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发生，在事前要尽快将军旗烧掉，将旗冠深深埋入地下，一切公文、个人日记和信件都尽快烧毁处理。”[13]

全体日军士兵均预感到死亡即将来临。

超链接14：日军为何如此重视军旗

日军拉孟守备队在松山苦苦地垂死挣扎，其直接长官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不但无力救援，反倒多次发电报要求在危急关头烧掉军旗；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于焦头烂额之际，也将这件事作为头等大事，多次复电汇报处理情况。这一现象，是不了解日本军队的人所无法理解的。笔者以对旧日本军队的研究，深知兹事体大，可以说这是解读日本军队这只凶猛怪兽的秘密。

日本军旗，系明治三年（1870年）以“太政官布告”的最高法令形式发布定制，称作“陆军御国旗”。它是从日本国旗——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16道血红的光芒线，又被称为“旭日旗”。且陆军军旗3个边饰有紫色流苏，木制烤漆旗杆顶部，有一个三面体的镀金大旗冠，3面均为日本天皇家族的16瓣菊花纹浮雕家徽图案。据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自1874年1月23日，日本明治

[11]［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37页。

[12]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1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07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6页。

[1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1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6页。

天皇对近卫步兵第1、第2联队亲授军旗为肇始，此后凡日军新编成之步兵及骑兵联队，必由天皇亲授军旗，以为部队团结之核心，将士对军旗之精神，举世无比。"[14]

军旗为天皇亲授，仅为建制步兵联队和骑兵联队才拥有，所以也称为联队旗。按日本陆军的规定，军旗在则编制在，军旗丢则编制裁。所以军旗在日军是一个不得了的要紧东西，要挑选联队一名最优秀的少尉军官担任旗手，专门设一个军旗护卫中队来保护它。松山日军仅有建制不完整的千余人，因为军旗留在此地，仍指定了一个军旗护卫小队。

正因如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部队都渴望缴获到日本军旗，但是都未能如愿。因为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没危险时，应奉烧军旗。不管遭遇怎样的败仗，日军仍有烧掉军旗而后自杀的时间。1941年9月，为策应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第六战区部队发动反攻收复宜昌作战，由于我军重兵攻势凌厉，据守长江西岸据点的日军第13师团曾面临烧掉军旗的危机，已经向所属第104联队发出预令，且准备好了师团长以下高级将领剖腹自杀的场地，后因援兵到来逃脱了厄运。[15] 1942年1月第三次长沙会战中，在长沙南门外清水塘附近，我第4军第59师部队已迫近日军第68联队军旗咫尺之间，第68联队长野宪三郎大佐拔出军刀，督令联队本部传令小队和护旗小队拼死护旗，我军最终未能夺取。[16] 在八年抗战中，日军仅在松山和腾冲的两次"玉碎"战中烧掉了两面军旗，分别属于第113联队和第148联队。这实在是中国军队八年抗战最值得称道的骄傲！

据资料，"二战"期间，作为日本陆军象征的共444面军旗，均在太平洋战场烧毁、随运兵船在海上沉没或是在战败后举行的"军旗奉烧"仪式中毁灭[17]，目前仅在东京靖国神社"游就馆"保存着一面步兵第321联队军旗，是联队长后藤四郎中佐通过一个叫做"神

〔14〕［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第345页。

〔1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长沙作战》，第114页。

〔16〕同上书，第188页。

〔17〕［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第345页。

道天行居”的右翼宗教组织隐匿保存下来的，这也是世间仅存的一面日本军旗。[18]

日军之所以重视军旗，因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最高物化形式。1939年夏，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和蒙古国边境，爆发了苏日诺门罕之战。从8月20日苏军发起进攻到30日停火，10天时间内，关东军阵亡了1.8万人，第23师团和第7师团大部分建制联队都被彻底歼灭，日本陆军遭遇到了自成军以来最惨重的败仗。在此情况下，日军仍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死亡攻击，为什么呢？原关东军老兵、日本作家五味川纯平在其所著《诺门罕》一书中写道：“听说第64联队等被歼后，关东军和第6军最担心的不是山县武光联队长等人死没死、怎么死的，他们最担心的是军旗是不是完全烧掉、有没有落入敌手。关东军在这之后又调集了第2师团、第4师团和其他直属部队，企图来一个大反攻，军旗下落不明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军旗成了他们的一大心病。”[19]

9月24日，日军终于在747高地发现了第64联队山县武光、独立野炮第13联队伊势高秀两个联队长的尸体，还发现了尚未完全烧毁的第64联队的军旗（**炮兵联队无军旗**），从旗手的衣袋里还发现了军旗的菊花御纹旗冠。这一发现，使第6军和关东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最关心的不是士兵，而是军旗；最令他们心神不定、坐卧不安的是军旗是否落入苏军之手。因为对他们来说，丢失军旗是关东军的奇耻大辱。更重要的是，丢了军旗也就意味着丢了自己的面子。关东军计划的“二期作战”也好，“战场清理”也好，其中的一个潜在的因素，或者说是说不出口的目的，就是寻找下落不明的军旗。

而参战的日军第7师团，由于师团长园部和一郎中将对这场鸡蛋碰石头般的战事没有信心，事先要求所属联队把军旗都留在了驻地齐齐哈尔。虽说3个联队也没剩下几个兵，但按照日本陆军的理论，这些联队不能算被歼灭，还可以重建。为此，第7师团大大地

---

〔18〕这个“神道天行居”组织倡导所谓“灵的国防”思想，亦即以张扬“靖国亡灵”为军国主义复活张目，以到处在日军昔日战地修筑“慰灵”设施和举行祭祀为主要活动。

〔19〕［日］松本草平、华野：《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第256页。

庆幸了一番。

对此，以小知识分子被征召从军的五味川纯平深感困惑和愤怒："军旗就是一面旗帜，只不过是一个部队的象征而已，说是天皇赐给的那也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战争是以胜败而论的，军旗怎么能决定胜败？为了一面下落不明的军旗而出动大军，可谓愚蠢透顶……为了一面军旗而企图把成千上万的人再次投入死地，这样的领导人是真正的、地地道道的战争狂人。"

但是，在昔日大多数日本军人那里，是不会对此有任何异议的。诺门罕战役的幸存者、原日本关东军第23师团卫生队军医军曹松本草平在其《茫茫的旷野：诺门罕》一书中有如此回忆：

"军旗只是一面旗帜，充其量是一个部队的象征，可是整个日本军队都把军旗看得很重，比部队的一切都高贵。要是说起原因来，还要说是日本军统教育的结果。

"记得在我幼年时代，只要一有陆军的军事演习，母亲总是背着我，跟在邻居的后面一起去观看，去参加欢迎式，从不敢怠慢。当明晃晃的刺刀随着用黑布包着的军旗从眼前走过的时候，母亲和邻居们都一齐下跪叩拜，流着眼泪目送军旗走过。直到今天，每当我看到军旗的时候，还是不由自主地把头往下低，这恐怕也是被那个时代熏陶的结果。那个时候军国主义的调子吹得正响，我们这些人就是在那种环境里被驯养出来的。可也是，3岁时所接受的教育和熏陶，事过60多年仍深深地印在脑海里，想抹也抹不掉了，想一想真令人可怕。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父亲用那粗粗的声音教给我唱的一支歌，这歌大概是明治10年前后流行于日本的，歌词是：'小官，小官，你马前是什么？一闪一闪，一飘一飘，那不是征伐朝鲜的锦旗吗？征呀征，征到底，伐呀伐，伐到头……'不难看出，当时的军人是多么狂妄，多么傲慢。在征伐东亚的军旗下，那些幼稚而浅薄的军人们开始蠢蠢欲动，最终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恐惧的侵略潮流……"[20]

---

[20] [日]松本草平、华野：《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第286页。

日军第113联队的军旗烧毁在松山，有天皇菊花纹族徽的金属旗冠被深埋在了阵地上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据资料，战后远征军曾带着日俘里美荣寻找过它，可见远征军中是有人懂得这一特殊战利品的价值的。但一个被俘士兵哪里知道由金光惠次郎和真锅邦人亲手处理的这一最高机密呢。战后，那些幸存的日本老兵一次次来到这里，除了想把阵亡者的遗骨弄回去，恐怕脑海里也不止一次地琢磨着军旗旗冠可能埋在哪里吧？

据远征军预备第2师第6团团长方诚回忆，第20集团军围攻腾冲时，总部也曾悬赏奖励虏获日军第148联队军旗者，克复后又悬赏征求，均未得。后来经审讯日军战俘得知，守城的第148联队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被炸死后，联队旗于9月11日由继任守备队长太田正人大尉下令，由联队副官桑弘大尉烧毁。[21]

中国人可能觉得这是可笑的小事。那么必须说到另一件事：除军旗之外，日本军国主义精神的另一个物化形式是所谓“靖国神社”——实际上，军旗对应着统率权，靖国神社对应着祭祀权，如果再加上对应奖励权的荣誉勋赏制度，对于日本帝国“精神”的理解就更全面了。为何一代代日本首相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执着参拜鬼魂，因为它是一枚被封存的“精神原子弹”，只要供奉着这颗种子，一旦时机成熟，大和民族的“理想之花”必然会重新绽放，日本人必然会让健忘的人们重温它昔日的面目。2008年初，中国旅日电视人李缨独立制作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在日本公映屡遭停映风波一事，已充分说明“靖国神社”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属于极力维护、不可触碰的精神敏感区。既然日本是一个注重形式和细节的民族，中国人就要对此予以关注，因为这里面有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知道的秘密。战败后投降的日本不惜一切要保存“天皇制”，将其作为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唯一条件。在中国人看来换了哪个当皇帝还不是一样，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保存下来的“天皇制”对日本人是多么强大的精神支柱；有了它，日本就永远不会

〔21〕方诚：《八年抗战小史》，第72页。

成为西方那样的民主国家[22]；在外力强制下制定的“和平宪法”，也很难说不会被重新修订，何况日本近代以来向来以翻云覆雨、诡诈偷袭，不按游戏规则出牌而著称。中华文化输入日本，日本从来是重“术”轻“道”，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兵法、权谋和三十六计。

所以，不要轻易相信日本现在是“和平国家”的说法，孙中山、鲁迅先生当年盘桓于日本时感受到的和平气息也很浓。1913 年孙中山在神户向日本民众演讲时，还热切冀望崛起的日本能成为“东方王道的干城”[23]，但后来的日本不但突破了孙先生不做“西方霸道的鹰犬”的底线，干脆以其特产的军国主义霸道成了凌辱中国最甚的急先锋。1945 年日本是战败了，但像“卧薪尝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这样的中国成语典故，日本人恐怕比中国人体验得更为深切。

7 月 29 日：D+55 日

即日，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第 8 军副军长李弥从龙陵转至松山协助何绍周指挥作战。据说，这个命令是应何绍周的请求而发的，何的本意是希望荣 1 师师长汪波把荣 1 师主力从龙陵带回来，但汪波在率部开赴龙陵时坠马受伤住院，长官部遂改派李弥。[24]龙陵局势正吃紧，李弥来也是单人匹马，没带一个兵。

李弥是云南莲山太平街人[25]，对当地气候、地形特征极为熟悉，且为人直率，带兵有方，指挥灵活，注重兵力火力的合理应用。

受命后交割了任务，李弥匆匆赶到松山。一到战场，即到军作业组找李汝章参谋要作战地图，并带他同往阴登山侦察地形，又令工兵营、通信营各派一个排长同去。地形观察结束后，便令工兵营修建指挥所，通信营架设电话接通松山各团，直接指挥。

---

〔22〕有人评价西方民主体制框架下的日本是“有民主、没自由”，其传统力量对民众思想约束力极大，可以批评内阁首相，却对“神道”系统敬畏有加。

〔23〕出自《孙中山文集》，转引自李辉：《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第 109 页。

〔24〕周开成：《荣一师光复龙陵之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93 页。

〔25〕当时为莲山设治局，由设在腾冲的云南省第一殖边督办公署管辖；今属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

据资料，当日晚饭时，第8军美军顾问组长斯培德中校及翻译来到，李弥与斯培德握手。斯培德已获知李弥率荣1师主力为龙陵解围的战况，恭维李弥说：将军到哪里，哪里就胜利。可是松山战斗近两月，而日军据点一个未攻破，严重影响了中印公路通车和外援输入啊。

李弥说：这个硬骨头看来难啃，我来指挥也无良策，现在想与阁下商量个办法是否可行。

斯培德问：有何良策？

李弥答：子高地母堡系敌指挥中心，此处攻不下其他则更难攻。但要攻此处，只可智取，不可硬拼。我荣3团阵地距子高地母堡仅200余米，由此处开挖坑道直通子高地母堡底下仅百余米，而后可用炸药将其指挥中心一锅端掉。

斯培德闻听大喜：好主意！我立即向史迪威将军汇报，请他及时运来TNT炸药支援贵军。

李弥随后打电话与何绍周军长商量，请何转告卫长官适当延期攻击。卫当即表示可以延期至8月25日。[26]

有撰述者评说，李弥确实是有才干的将领，其标志就是能够及时找到战场的规律。李弥把指挥所搬上了前沿阵地，带领参谋人员和美军顾问督战数天，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他后来在作战日记里写道：

"……攻打松山，乃余一生最艰巨之任务。敌之强，强在工事、堡垒、火力。若与敌争夺一山一地得失，中敌计也。须摧毁其工事，肃清其堡垒，斩杀顽敌，余始克有济。"[27]于是决定调整战术，命令部队从外围着手，一个地堡一个地堡地摧毁，向山头地堡群的中心逐步推进。这样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扎实有效。

这天，中国远征军开始用飞机向日军阵地散发劝降的传单，内容大致是："日军官兵们，我们都是亚洲的同一人种，请不要再反抗

---

〔26〕周昶：《松山主战场抗日胜利纪实》，载2005年3月28日《云南日报》。作者1944年曾任第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据载，对松山采取"坑道爆破法"，是几天后第8军战前会议研讨作战方案时提出的，李弥刚到松山当不会马上即有此想法。此说留存备考。

〔27〕转引自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64页。

了，相互之间停止战争吧！你们已经有了很多伤员，中国随军医院将给他们进行治疗，请赶快投降吧！”活下来的日军士兵说，起初他们都不相信这种宣传，认为远征军的传单是在说假话，因为日军抓到中国战俘都是杀掉；但后来被俘的日军都受到了治疗，战后被送回了日本，才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28]

据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回忆，日军也曾用传单包上石头投向中国远征军阵地，传单上画着大炮，操炮的为美国兵，中国兵是炮弹，意思是中国人给美国人当炮灰，以此刺激中国军人的民族自尊心，挑拨中美同盟关系。[29]这种宣传同样也无法令远征军士兵信服。

7月30日：D+56日

即日，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签发了给拉孟守备队记功的嘉奖状。紧接着，日军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又给松山日军发来鼓励电：

“拉孟守备队为确保缅中联络线的巩固，坚守战略要点数旬。在这期间，面对地面强大的敌人和空中攻势，以敢打敢斗的精神日夜奋战。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仍然毫不动摇。我为你们这种精神所感动。你们武功超群，面对日益严重的各种困难，殊死拼搏，充分发扬了皇军的精粹，为皇军的作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30]

品野实在著述中，对日军各级高官纷至沓来发往松山的“感状”电报，表达了一名下层士兵的愤怒：“总之，还是在为天皇陛下开脱。尽管有困难，还是要叫你去拼命，既不派援军，又不下达逃跑命令，只说些美丽动听的言辞，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不过，大家都知道，这已经是军部惯用的伎俩。尽管前线正迫切需要一兵一卒，还得有士兵去收听和翻译上方的这种文电，疲惫不堪的通信兵还得支持着干下去，这就是日本士兵的悲惨命运！”

但是，在死神即将降临的最后时刻，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

---

〔2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7页。

〔29〕同上书，第216页。

〔30〕同上书，第187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06页。

少佐还是带头宣誓并给师团回了电报：

“收到总司令官的嘉奖和参谋总长的鼓励电后，守备队全体官兵感激万分。同时，我们也感到所担负的任务既光荣又重大。拉孟守备队全体官兵决心保持军人的本分，竭尽军人的职责。全体官兵对于总司令官阁下授予的嘉奖无比感激。我们决心以军人的气魄更加团结战斗，克服困难，坚守阵地，完成军部交给的任务。”[31]

这天，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下达了让拉孟守备队死守到9月上旬的命令。日军仍在做救援松山的努力，问题是：松山日军能否坚持到他所规定的期限？

因连日倾盆大雨，加之弹药尚未运到，第五次攻势无法实施，部队只能利用大雨间隙继续对壕作业。我中央队第246团对壕作业已逼近己高地，即日军所谓侧面阵地的左突出部。侧面阵地就在本道阵地下面，紧接着本道阵地。如果本道阵地失守，侧面阵地就会跟着陷落。日军清楚这一点，非常焦急。

这天，一发迫击炮弹击中日军侧面阵地战壕，早见正则上等兵和松本时次一等兵等3人负伤。早见撩开衣襟查看，发现弹片是击中腰间的金属皮带扣后钻入腹部的，伤口不算深。卫生兵鸟饲久将早见腹部皮肉剪去一点，注射了一支给军马用的大林格氏药水。当时早见口渴难忍，鸟饲久吓唬他说：“喝水马上会死！”晚上，将其转送到了大垭口的卫生队战壕。

卫生兵鸟饲久是在阴登山受伤撤到卫生队本部，因为侧面阵地的卫生兵川村上等兵战死，又换到侧面阵地的。当时，因为日军在战壕里看不见前面铁丝网下以对壕作业逼近的远征军，所以他请求战斗司令部的炮兵观察所（未高地）用掷弹筒射击，防止远征军攻上来。日军的八九式重型掷弹筒发射50毫米口径的榴弹，最大射程为700米，也就勉强能打到附近。但刚打了几发，就遭到我军炮火的猛烈还击，卫生兵鸟饲久的肩部也中了弹，当晚又撤到了卫生

〔3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8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06页。

队战壕治疗。[32]

7 月 31 日：D+57 日

即日拂晓，第 308 团第 2 营利用对壕作业，一举攻入滚龙坡戊高地，击毙日军 10 余名，驱逐堡垒外围之敌约 20 名。而后以火箭筒在堡垒上“凿孔”，用火焰喷射器对准孔洞射入。据早见正则回忆，其所在的浅田分队的一挺机枪被火焰喷射器烧毁，顿时浓烟直出，堡垒化为火海。

滚龙坡戊高地又被我占领了。[33]

同时，担任左侧支队的第 307 团一部向壬高地日军水源地袭击，夺获自来水管及电话被覆线甚多，并发炮击毁敌仓库一座，十余名日军和两匹军马从仓库内逃出，被我悉数射杀。

中午 12 时许，第 8 军参谋长梁筱斋打电话告知各部队长，因本日天候恶劣，竹子坡直协炮兵群无法射击，攻击开始时间改由各部队自行决定。为增进炮兵射击效果，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命令将滚龙坡南无名高地的第 5 连山炮一门，转移至汪家寨师指挥所附近，对乙高地侧防机关实施定点打击。但丁高地及侧面死角内残存之敌侧防机关始终无法摧毁，对于我军向乙高地之攻击颇有危害。[34]

8 月 1 日：D+58 日

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这天的战事格外惨烈。

据日军战史载，当日清晨，中国远征军将两门山炮推进到本道阵地西方约 300 米处，开始狙击该阵地；又以迫击炮、速射炮、火箭筒，辅以怒江东岸的重炮，开始彻底破坏本道阵地的东半部。8000 多发炮弹落在阵地上，持续两个多小时，阵地被炸毁。[35]尤其

---

〔3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13、252 页。早见正则与乌饲久二人的回忆可以相互佐证。

〔3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8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6 页。

〔34〕《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3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61 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88 页。

是配属第308团的炮兵第5连的一门山炮，射击非常准确，直接命中甲、乙高地间的日军机枪阵地数座，毙敌十余名。[36]

将山炮推进到300米处抵近摧毁堡垒这一招，发挥了显著效果，滚龙坡日军被逐渐压迫在了乙高地大堡垒后。中央军校第18期毕业生王荣年，时任第71军山炮营第2连观测员，是当日指挥其中一门大炮“拼刺刀”的指挥官。据他回忆：

7月31日，军长何绍周命令由该连组成一支“单炮敢死队”，利用夜色从竹子坡潜入滚龙坡西南日军阵地前，以近距离直接瞄准摧毁其工事，协同步兵攻击。

敢死队组成后，由王荣年带队。黄昏薄暮，军长何绍周亲临敢死队，说了些鼓励、期待与安慰的话。他特别对王荣年说：“你们必须完成任务，这是整个战斗的关键，能打下滚龙坡，就可攻下松山，就可打通滇缅公路，就可获得美援，就可获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你们一定要勇往直前，不要瞻前顾后。说明白一点，我已为你的后事作了妥善的安排，请你一定放心！”

敢死队由10名炮手组成，携带75毫米山炮1门（分解为6个组件）、炮弹30发，分别由8匹骡子驮运。入夜时出发，敢死队一行沿山坡溜下腊勐河，众人衔枚疾行，却因无路可循，又不能使用照明器材，只得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爬坡时，有一匹驮骡失足滚落崖下。因为驮骡载着一个山炮组件，丢了它山炮就成了废物，王荣年忧心如焚。队员们又滑下山崖搜寻，终于找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搬上山梁。

拂晓之前，敢死队距目标已不远。这时山头上大雾弥漫，大家只能摸索前进，估摸着已到达目标区，就趁晨雾掩护，将火炮卸下进行组合。这时天已微明，大雾略散，王荣年这才惊愕地发现，日军主碉堡就在眼前，感觉就是100米左右！众人都出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大雾掩护，刚才肯定会被日军发现，可能早就被其机枪火力消灭了。

王荣年赶紧命令瞄准手确认目标，炮手装好药包，将信管装好，完成射击准备。而后对准日军主碉堡之射击口，快速连续发射，不到十分钟，就把30发炮弹打光了。王荣年看到，炮弹几乎全打在了

〔36〕《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碉堡射孔周边，有的还钻进了碉堡里爆炸，一时间土块木头汽油桶齐飞，硝烟冲天，日军全无反击能力。[37]

从下午3时开始，各个阵地都处于激战之中。日军在滚龙坡虽然布置有两门105毫米榴弹炮，但地下弹药库里储备的500发炮弹早已打光，已成了没用的摆设，毫无还手之力。[38]据日军上等兵森本谢回忆，他是25日随安河内正幸少尉的军旗护卫小队从联队本部阵地赶来增援本道阵地的，到这天，这支担任预备队的军旗护卫小队只剩下9个人。远征军利用隐蔽地形不断逼近阵地，投出手榴弹，在大声呼喊中一次次攻入阵地。日军只能用重机枪、手榴弹等武器还击，因弹药不多不允许浪费，就用刺刀跟逼近的远征军反复肉搏。[39]

下午4时30分，第308团利用对壕作业，在我山炮抵近射击压制下，步兵分两路接近乙高地大堡垒约28米处，以机枪火力掩护。这时，火焰喷射器射手从侧面迅速接近，扣动扳机，将一束火龙射入敌堡垒枪眼内，霎时浓烟突起，我军迅速跃入占领乙高地。此战伤亡20余人。[40]

第8军工兵营第1连第3排老兵张羽富，这天担任火焰喷射器副射手，当时的情景他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说，他入伍后就分在第8军工兵营。该营是为反攻作战新组建的技术部队，由美国教官亲自训练，一个班的美国工兵示范操作。工兵最初学习架设浮桥、埋排雷、爆破，后来就专门学习使用火焰喷射器。工兵营配备火焰喷射器比部队稍早，技术也娴熟一些。

8月1日这天，下小雨，山上风大，刮得呼呼响。担任正射手的是副班长，姓潘，河南人，脸上有麻子，绰号“麻皮”。“麻皮”管喷火，张羽富当助手，背补充气瓶——经部队前段使用发现，虽然火焰喷射器说明书上说可以喷射80米，实际射程只能达到40米；说标准射击能重复8到10次，而实际最多只能击发6次。大概

〔37〕王荣年：《奋战松山的单炮敢死队》，载黄埔同学会《黄埔杂志》2007年第2期。
〔3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8页。
〔39〕同上。
〔40〕《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9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6页。

是由于压缩气瓶不过关，致使压源的力量不够，所以，实战中需要配一个助手，背着补充气瓶跟着跑。补充气瓶也沉得很，二三十公斤一只，模样跟现在的泡沫灭火机差不多。步兵没见过这种洋玩意儿，稀奇得很，一个连长当场讲好，干掉敌人堡垒由他请客。

“麻皮”参加过武汉会战，是个老兵油子，左滚右爬很快就进入喷火位置。张羽富紧随其后，硬着头皮往前爬，总算运气好，没有被子弹打中。待步兵的机枪把日军火力吸引开，“麻皮”就接上燃料管开始瞄准。日军地堡在三十多米外，从平日演练的效果看，应该万无一失。哪知道“麻皮”刚刚扣动扳机，就惨叫一声倒在地上乱滚，原来他只注意喷火角度，忽视了风向，一阵山风将喷出的600摄氏度高温刮回来，当场就把他的眼睛烤瞎了。幸亏张羽富躲在他身后两三步远的地方，否则难以幸免。但是“麻皮”射出的那股火龙却没有失效，日军地堡立刻就冒出许多浓烟来。张羽富听见鬼子在地堡里哇哇乱叫，有几个没烧死的钻出地堡逃命，浑身带着火，马上就被我们的机枪打倒了。[41]

张羽富从此以后记住了喷射火焰时要选择风向。但是“麻皮”却很惨，被送到了保山后方医院救治，但战后却没有再看见他。张羽富说，火焰喷射器威力确实很大，在肃清日军地堡垒和据点的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一般在三四十米以内，瞄准了必定有效。但日军也非常顽固，往往地堡上层烧塌了，下层继续往外打枪，直到烧死或者地堡彻底被炸塌为止。这种办法虽然很彻底，但堡垒内被烧成焦土，很难清查战果，也无法缴获战利品。

第308团攻占乙高地后，我军即占据滚龙坡五分之四地域。此时，各高地溃败日军，均退入甲高地内做困兽之斗。午后，左侧支队第307团又绕攻甲高地，向敌侧背威胁，并以迫击炮击毁大垭口敌营舍、仓库数栋，火焰冲霄，蔚蔚壮观。[42]

活下来的日军上等兵森本谢记得，黄昏时分，远征军的炮火又怒吼起来，数百发炮弹在本道阵地爆炸开来。300米外架起来平射的

---

〔41〕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73页。
〔42〕《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山炮威力很大，一发发炮弹射向本道阵地，许多被炸死的日军士兵尸体随着泥土一起飞上天空。有被炸断一只手一只脚的，有血流满面还在痛苦呻吟的，但谁也无法帮助他们。炮击一停，远征军又攻上来，肉搏战开始了。炮火的硝烟笼罩着整个阵地，敌我双方都看不清楚。本道阵地已经没有多少日军士兵了，但远征军还是不停地发起攻击，像蚂蚁一样爬近阵地。这种战术使敌我双方的阵地上都摆满了尸体。在阵地上，日军士兵有的头被炸得像裂开变黑的石榴，有的手足和内脏被炸得飞了出来，血把阵地周围的泥土都染黑了。尽管如此，在远征军的进攻下，日军士兵仍恍如在梦中一样，机械地挥动着刺刀，机械地搏杀着，好不容易才挨到了天黑……[43]

另据第 11 集团军参谋周昶回忆，在第 103 师各部攻击滚龙坡同时，荣 2 团第 3 营亦对小松山巳高地发起攻击。但官方战史并无记载，谨转述如下备考：

"……其后，李弥又来到荣 2 团第 3 营阵地，营长郑安关向李弥请缨，先攻子堡，后攻母堡。李弥嘱郑务必审慎从事，不要做无谓牺牲。李弥又令山炮营用 4 门炮集中火力封锁母堡，另 4 门直击子堡。炮击一小时后，郑营长率领 70 余人猛攻子堡，全歼堡内日军 50 人，缴获小炮 3 门，轻重机枪 5 挺，步骑枪 50 余支，战刀刺刀 20 余把，膏药旗 20 余面，毛呢军大衣几十件。荣 2 团第 3 营伤亡 3 人。"[44]

夜晚，我中央队第 246 团报告，本部所挖掘的交通壕，已经迫近至已高地 60 多米。若明天发起攻击，就连夜掘开三四十米，作为攻击出发线。军指挥部当即同意，并告知攻击时间为明日天气晴朗后。[45]

当日，中央通讯社记者黄印文赶来松山前线采访，晚上住在腊勐街第 8 军指挥所。夜幕初降，他看到我军发射的炮弹一颗颗从头顶掠过，飞入日军阵地猛烈爆炸。日军偶尔反击一两炮，炮弹从头

---

〔4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34—235 页。

〔44〕周昶：《松山主战场抗日胜利纪实》，载 2005 年 3 月 28 日《云南日报》。

〔4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9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6 页。

上呼啸而过，却大多落在荒山上，只炸断了几棵小树。第8军副参谋长杨绪钊告诉他："今晚的炮战是明日攻击滚龙坡的前奏曲。何军长、梁参谋长早已上火线去了，不打下松山，他们发誓不下来。"

闲谈间，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自前方打来电话，说是攻击布置业已妥当，明天决心再夺取一座堡垒，并约黄记者前来阴登山指挥所观战。

这夜，我军重炮断断续续一直射击到次日天明，使敌军通宵不得安宁。[46]

8月2日：D+59日

即日，滚龙坡阵地的日军迎来了末日。

清晨起大雾弥漫，能见度极差，整个松山都显得格外平静。大概敌我双方都预感到了今日决战的焦点在滚龙坡，因此不约而同地制造了这份难得的宁静。

中午时分，天气放晴。一身深绿色将官呢军服、领缀两颗星金板领章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出现在竹子坡5600高地。龙陵、松山两地久攻不克，令宋希濂格外焦虑。闻听松山战场将有重大突破，他昨夜连忙从龙陵驱车赶来观战。而在松山主峰音部山阵地，日军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也用望远镜眺望着滚龙坡。在8倍率的望远镜镜头里，两高地间2000多米的距离，仅相当于裸眼目视250多米外。他们都清晰地看到，在滚龙坡阵地上，远征军步兵为炮兵指示前锋线的一面面白色布板，已迫近日军占据的最后堡垒前几十米处。[47]

此刻，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指挥位置，已经前推到滚龙坡西南方一千米处。当大雾完全散开，他走出掩体，下令开始炮击。

我炮兵先集中炮火轰击甲、乙两高地，下午2时炮火延伸，当炸点未及两高地间的无名高地的瞬间，中央队第246团突击队员跃

〔46〕黄印文：《滚龙坡前观战记》。据大公报小丛书第三辑《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第240页。

〔4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1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9页。

出壕沟，雨点般地投出手榴弹，迅猛地突入己高地，占领了前半部阵地。日军缩在后半部阵地拼死抵抗，两军短兵相接，互掷手榴弹，继而以刺刀肉搏，激烈万分。[48]

何绍周在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交战情况。看到两军肉搏约 15 分钟后，我军士兵拼刺技术大不如日军灵活凶狠，一会儿，一半以上突击队员已被日军刺倒，日军在数量上逐渐占了优势，而且不断从附近的堡垒里钻出来增援。进攻部队最后仅剩下几十名士兵，也不是日军的对手。眼看进攻部队就要在己高地被日军歼灭，再组织进攻，又要以大量士兵生命去换取。在这种情况下，他当机立断，命令随行的作战参谋：

"向炮兵下命令——集中炮火再向己高地开炮！"

"钧座！这……"

"发命令——迟疑者杀！"

作战参谋看看一旁的军参谋长梁筱斋和第 82 师副师长王伯勋，见他们都咬紧了牙，脸上毫无表情，只好用无线电话向炮兵传令。

炮兵们接到命令，深知在阵地上还有数十名自己的弟兄在与鬼子肉搏，但军令如山，不敢违抗，只能校正了距离向己高地发炮。往常，炮兵们都要观察射击的准确性及效果，会为炮弹命中目标予敌以杀伤而自豪欢呼。现在，弹药手低着头默默地向大炮里填着炮弹，射手们闭着眼睛发射，指挥官都背转身去……

山坡上，几位指挥官铁青着脸举着望远镜观察。但见一颗颗无情的炮弹飞向己阵地，在交战双方士兵之间爆炸，顿时血肉横飞，尸横遍地，数十名士兵与日军同归于尽。泪水顺着望远镜滴下来，但指挥官仍在喊："再打！再打！再打！"这些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炮 10 团第 1 营第 2 连连附阎启志回忆，军长何绍周向炮兵下达这个残酷的命令时曾解释说：日军拼刺刀比我军强，与其在白刃战中我单兵被敌兵刺死，不如双方同归于尽！[49]

---

〔4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29—30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6 页。

〔49〕阎启志《炮兵第 10 团滇西反攻记》，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123 页。

己高地上再没有一点点活动之物了，何绍周把手向下一挥："第二梯队上！"当第二梯队冒着自己的炮火冲到距离己阵地仅50米时，何绍周才下令停止炮击。我步兵终于占领了阵地的三分之二而确保之。[50]

第246团攻击滚龙坡己高地，中央通讯社记者黄印文当时曾在阴登山指挥所，与前敌指挥官、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一道观战。据其战地通讯记述：

12点钟左右，我们坐在了某师（即第82师）的指挥所里了。这是一所用薄铅皮和空弹药箱搭成的小棚子，里面摆着一张床，几只空油桶，三具电话机，床头摆着一支信号枪，一支冲锋枪。王副师长（王景渊）已到更前方去了，只留下一个勤务兵烧开水。这时我炮兵射击愈来愈猛，炮弹好像在山涧和树梢上擦身而过，十秒到二十秒的样子，又在敌人阵地里爆炸。我们走出指挥所，通过一处暴露的地形，在一条一人深的战壕里，找到了王副师长。他的左侧距松山敌人阵地约一百公尺，在敌人步枪有效射程以内，前距滚龙坡敌阵不过两千公尺，机枪炮弹也可以打得到。这里虽是相当危险，但居高临下，滚龙坡战场的一切能够一览无余。

王副师长坐在一只空弹药箱上，右手扶住他前面的一架潜望镜，眼睛紧贴着它，左手握着一个电话筒，身旁还摆着好几具电话机，嘴里在喊着："第四门炮打得恰到好处，用原角度，再射三发。"站在附近的炮兵连长覃汝恒立即用电话传达命令，听他的口音，像是广西的。在他们之间，摆着一张详细地图，每一敌人的阵地都标上一个号码，或甲、乙、丙、丁。

"我们步炮配合进攻是11点钟开始的，现在我们步兵正在进攻滚龙坡公路第二道拐的阵地，你看某某连已接近第二道拐的左角，第三道拐的阵地还在敌人手中，第一道拐及第三道拐以上的堡垒群，都是我们的了。"王副师长一面对我说明战况，一面将潜望镜调

〔50〕方知今：《爱国将领卫立煌》，第204页。这一细节，可在《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29—30页）及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6页）中得到佐证。

整好，拉我过去，他说镜中十字架对准的地方，就是现在步兵进攻的第一个目标，即第二道拐的左角。我正要凑身过去，他却未曾摆动身体，反而将望远镜抱得更紧。接着他欢喜地高声叫起来："我们步兵跳进战壕了，敌人放弃堡垒跑了，逃得好快！翻译！翻译！赶快通知那两位美国朋友，开机关枪扫射。通讯兵！摇电话给参谋长（军参谋长梁筱斋），我要请他下令伸延重炮的射程，不然要打到自己的人了。"

王副师长话犹未完，我看着两位美国朋友，工兵上尉贺青山同高射机枪连中尉傅福，早将两挺高射机枪放倒瞄准狼狈溃退的敌人，阁阁地扫射过去。我举起望远镜，看着红色的曳光弹，夹着一串串的穿甲弹、杀伤弹，飞也似的钻进敌人身上，逃得命的虽有几个人，但又不幸碰到一个迫击炮弹，全部结果了他们。现在我们的步兵，在这个新占领的阵地前摆了 × 形的白布标，同时放起一层烟雾，这显然是告诉指挥官，他们确实已占领阵地了。

公路第二道及第三道拐上的敌人，这时正以猛烈的机关枪朝我步兵新占领阵地扫来，我军机枪也自四面八方猛击，拍拍清脆的枪声和阁阁沉重的枪声正在唱和。我们的炮兵已延伸了射程，又开始猛烈地射击，隆隆之声不绝于耳，平均每一分钟有一枚炮弹落在敌人的堡垒群里。今日天气太好，不但没有雨季的雨，而且满山满谷都给阳光晒透了，因此炮弹落在敌阵里，立即掀起一团十多公尺高的灰尘，使指挥官清楚地看出炮弹的弹着点。

二十分钟后，步兵忽从公路第二道拐的左角越上公路，有的拿着冲锋枪，有的拖着中正式步枪，直朝敌人的堡垒冲去，白晃晃的刺刀，照在阳光里格外耀眼。敌人的机枪虽被我们的炮兵压制住了，但仍在若断若续地点射。我们步兵匍匐在敌阵之前，开始燃放烟幕，白的，绿的，红的，朵朵簇簇，刹时缠绕在那些矮树上。几个伤兵带着武器从烟幕里走出来，慢慢地回到我们的阵地。后面的辎重兵和老百姓，正扛着弹药箱往前面跑，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好像满不在乎一样。烟幕渐渐地稀薄，敌人的机枪却渐形稠密，这时我们步兵放了信号枪，只见一个红球向敌人的阵地滚去。

"炮兵，炮兵，步兵快进入敌阵了，偏右一百公尺射击，要

快！”王副师长在大声叫着，覃连长马上在电话里命令他的部下，几分钟后，炮弹集中右边了。“通讯兵摇参谋长的电话！”王副师长的嗓子有些哑了，通讯兵摇来摇去，也累得满头是汗。

“参谋长！报告！现在无名高地的敌人还在用机枪侧射击，妨碍这边步兵进攻，请叫重炮压制它。最好调一排人攻击一下。”当王副师长通电话时，一串枪弹似乎自我们的耳际擦过，杨副参谋长立刻叫我们取低姿势，我只得斜倚在战壕里，仅留着两只眼睛和握着望远镜的双手在外。

炮兵的射击延伸了，无名高地的敌阵也遭到炮弹的光顾。一刹那间，我们的步兵站了起来，一个个拿起手榴弹朝敌人掷去，敌人的机枪还在啪啪地响，有几个忠勇的士兵，眼瞧着他们慷慨地倒在敌人面前，但在后面的弟兄，却以前仆后继的精神越过他们的忠骸，冲进堡垒群中去了。尽管敌我在交通壕里，在机枪掩体里，在堡垒的一场生死挣扎，一场胜负的狠斗，我们不能看到，不过公路第二道拐左角的那块白布标已移到公路上的阵地内，这也万分令人满足。

午后4时5分，杀入敌阵的步兵，又释放起几团烟幕，缕缕的白烟正在一寸一尺地朝前弥漫，终于笼罩住这个堡垒群的一半，无疑说这一半已到了我军手中。这里我们应向×师（指82师）全体的将士，特别是彭营长剑明（第246团第3营营长）以次的官兵致贺致敬。[51]

在第246团发起攻击同时，第308团第1营乘我炮火制压敌侧防机关之瞬间，以一部肃清丁高地反斜面之敌，以主力包围甲高地之敌人，并以喷火器向敌堡垒喷射，甲高地掩蔽部地下仓库当即起火燃烧。步兵乘势突击，一举占领甲高地之顶点。

少顷，即见四五十名日军从东西两面堡垒顶上跃出，企图逃窜，被步兵消灭大半。残敌滚落于甲高地北侧的交通壕内，稍加整理后即以密集队形向我右翼反扑，异常凶猛。这时我竹子坡、阴登山的

---

〔51〕黄印文：《滚龙坡前观战记》。据大公报小丛书第三辑《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第240页。

山炮、战防炮和高射机枪，均集中向甲高地北侧倾泻弹雨。我第一线突击队员以冲锋枪猛烈扫射，将敌两次逆袭击退，但日军仍与我隔公路对峙，坚持不下。这时，配属作战的喷火器两班向敌喷射烈焰，日军恐惧异常，纷纷抱头鼠窜，步兵跟进猛烈射击，将敌歼灭殆尽。

斯时，由第307团主力编成的左侧支队进展至甲高地北端，威胁己高地侧背，并将由甲高地逃出之敌10余名全部消灭。[52]

当日攻击滚龙坡甲高地之战，时在阴登山观战的记者黄印文曾有如下记述：

午后2时，我另一支部队，在×师长（第103师师长熊绶春）指挥下，趁第二道拐公路战斗正酣时，突自第四道拐新占领的堡垒群，俯攻第三道拐的敌阵。×参谋长（第103师参谋长覃国铎）也在附近亲自使用战车防御炮。他们与敌人的距离多少远，记者在阴登山无法看出，但从那几门战车防御炮射击得过分准确，可知他们距离敌人不到一百公尺远。他们的指挥所是利用敌人现成构筑的一个坚强堡垒。我军在7月31日进攻时，曾使用新式的火焰放射器，敌人固然被高温度的火舌所逼，放弃了工事，而为我军扫数歼灭，工事也燃烧了一天一晚，至今还在冒烟。[53]

此刻，在音部山眺望的金光惠次郎的望远镜中，整个滚龙坡都被臂缠醒目白毛巾的远征军士兵包围，人数不多的日军士兵在战壕里踏着死尸来回疲惫应战，不断将我军士兵投来的手榴弹捡起反投出去，接近后双方搂抱在一起翻滚肉搏。在日军传统中，敢死队是用白布在胸前交叉成一个“×”状，称做“白襻队”的。那白布本是用来包裹骨灰盒的，显示的是必死的决心。以臂缠白毛巾作为突击队标志，在中国军队也久有传统。其作用是在近距离混战中区别

---

〔52〕据《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53〕黄印文：《滚龙坡前观战记》。据大公报小丛书第三辑《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第240页。

敌我，同时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夺人的杀气，撼人心魄。

激战至黄昏5时许，我军终于将日军斩杀殆尽，甲高地被我军火焰喷射器焚烧的日军堡垒熊熊黑烟直冲天空。滚龙坡中央主堡垒终于被我军攻克了。

在松山主峰日军阵地，一些日军士兵看到此情此景，个个咬牙切齿黯淡无言。据日方记载，真锅大尉曾指挥主阵地的炮火进行声援，"但微不足道的几发炮弹，像是在悼念死亡的士兵"〔54〕。

当晚，在阴登山观战一整天的中央通讯社记者黄印文，曾在前沿阵地探察小松山。我军占据的阴登山，与小松山辰、巳、午诸高地仅隔着一个小鞍部，距离不过百余米。通过黄印文的记述，可以感受到当时敌我在小松山前对峙的态势：

"来！我们去看看松山（指小松山）的敌阵。"杨副参谋长弯着腰在前面领路，我跟着他在后面，我们循着一条交通壕走去，直到离敌人50米处站住。前面即是我们的散兵线，现在他们正在挖隧道，步步迫近敌人，有的离敌人只有30米了。我们将头伸出壕沟，望一下，马上又低下来。移动几步，再伸头望一望，松山山头的树已被我炮兵打得精光，留下一堆黄土；可是敌人的堡垒群，都依然完好。我们攻到50公尺处，即抬不起头来，敌人也不敢走出工事，因此形成对峙状态。

我们在交通壕里走了一段路，绕到一个比较掩蔽的地方，遇着王副师长。他告诉记者："今天我们预定计划只攻下（滚龙坡）一个堡垒群，谁知竟打下一个半。"我们一面谈笑，一面爬出交通壕，朝指挥所走去。刚在里面坐定，我们听到一声猛烈的爆炸，一团白烟离我们十多米远，再过来点，大概要伤好些人。"没有关系，这是松山敌打下的枪榴弹。"王副师长若无其事地说，但是他仍命令门外的

〔5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1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9页。

勤务兵："小心点，不要挤在门口。"[55]

这天深夜，金光惠次郎发出战况报告后，第113联队联队长松井秀治发了一封回电。日军卫生兵石田富夫从一个通信兵那里知道了电报的内容，大致是："心早已飞向拉孟，可身不由己，你们只有等待神仙来保护你们了……"据说，松井联队长平日非常相信神的力量。当时，那个通信兵幽幽地对石田说："我们可能要全部战死在这里了。"[56]

---

〔55〕黄印文：《滚龙坡前观战记》，据大公报小丛书第三辑《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第240页。

〔56〕［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45页。

第 10 章 七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8 月 3 日—8 月 19 日。

指挥：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

主力：荣 2 团第 3 营、第 246 团主力；第 308 团、第 307 团。

进展：攻击小松山巳、午、未高地未果；夺取大垭口己、壬、癸、辛高地。

（参阅附图 3、附图 7、附图 36、附图 27）

8 月 3 日：D+60 日

拂晓，中央队第 246 团扩张昨日之战果。中午 12 时，在阴登山火力支持下，继续攻击日军侧面阵地己高地。第 308 团一个步兵排出敌不意，袭占无名高地，并推进 4 挺重机枪协力第 246 团对己高地攻击。第 307 团亦于 15 时占领壬高地森林中的日军堡垒，颇有斩获。

鏖战 5 天，除被炮火轰击埋于地下及焚烧者不计外，日军于甲高地附近遗尸 68 具，内有少、准尉军官 3 名。我军缴获大小炮 5 门（两门为 105 毫米榴弹炮），重机枪 1 挺，轻机枪 4 挺，步枪 20 支，高射机枪 1 挺。[1]

滚龙坡之占领，犹如斩了松山敌阵地之首，日军似惊弓之鸟，惶恐不已。据日方记载，即日占领本道阵地的远征军士兵，自由自在地在阵地上收捡战利品，还从日军尸身上剥取衣服，故意披在身

〔1〕《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0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7 页。

上，嘲笑松山主阵地上缺乏弹药的日军士兵。

——但是，太大意了，难免会发生意外：

这天，第308团第3营营部传令兵谭祖幼和营部伙夫还有一个姓杨的士兵，三人坐在滚龙坡刚攻下的一座堡垒附近聊天。突然，堡垒里冲出来一个鬼子军官，显然是刚才没有肃清的残敌，发疯似的挥着军刀向他们劈来。当时，谭祖幼手里拿着一把铁锹，伙夫挑着扁担，只有那个姓杨的兵手里有枪。谭祖幼是最先看到鬼子军官冲过来的，他本能地扬起铁锹去挡对方劈下的军刀，没料到用力过猛，竟把对方的军刀磕飞了。姓杨的兵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开枪打死了那个垂死挣扎的鬼子军官。多年以后回忆起此事，谭祖幼在感叹自己命大之余，仍念念叨叨地说："那把刀后来我得了，一直背在身上，背到保山送人了……可惜咯，我那把刀。"[2]

当日，第113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发电报告联队长松井秀治："军旗已从旗杆脱下，缠于腹上，旗杆已奉烧，御纹旗冠已深深地埋入地下。"[3]

完成占领滚龙坡阵地后，远征军全部兵锋即指向大垭口、松山。

自第8军攻击松山以来，虽经我飞机轰炸，重炮不断轰击，松山子高地敌堡垒始终未受到大的损坏，其工事坚固程度，由此可知。我反攻部队曾4次攻上顶峰，因不能及时攻入堡垒内部，而受到两翼侧防火力袭击，伤亡颇重，终不能立足。此时我反攻滇西的两大主力部队——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与敌鏖战于龙陵、腾冲，缅甸方向的中国驻印军已经攻克密支那。因松山未攻克，滇缅公路不通，严重影响到滇西总反攻作战物资的补给。松山，已经成了决定整个滇西战场态势的"瓶颈"。

在此紧急关头，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达蒋介石紧急命令，严令第8军于9月上旬克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

〔2〕2012年第6期《贵阳文史》杂志文章《松山：八千贵州男儿血——第8军103师老兵谭祖幼的抗战回忆》，周渝撰稿。

〔3〕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1—162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89—190页。

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4]

为此，第 8 军军长何绍周紧急召集副军长李弥，参谋长梁筱斋，第 82 师师长王伯勋、副师长王景渊，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副师长郭惠苍，荣 1 师师长汪波等将领，紧急商讨攻击子高地战术。经研究，决定采用“坑道爆破法”炸毁子高地，制定了爆破计划。在坑道作业未完成前，先攻略辰、巳、午、未诸高地及大寨，形成围攻子高地的有利态势。

具体部署为：指定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为指挥官，指挥军工兵营在子高地前约 150 米处开始进行坑道挖掘。同时，令中央队第 246 团将已占领阵地移交第 103 师，转移于阴登山、冯家坡之线，准备攻击午、未两个高地；荣 2 团第 3 营准备向辰、巳两高地进击；第 308 团确保滚龙坡并接替守备己、庚高地，准备攻击辛高地；第 307 团附战防炮一门，准备攻击大垭口及其以北之敌。配属炮兵、美军第 14 航空队进行火力掩护。[5]

自即日起，我右翼部队开始坑道作业。[6]按指挥部反复研究确定的方案：先以交通壕作业延伸至敌子高地堡垒最近距离，然后挖掘坑道，一直挖到堡垒下面，再填入大量 TNT 炸药，将敌堡垒从下面颠覆。在坑道作业同时，即令工兵指挥官计算所需炸药数量。

超链接 15：第 8 军松山战役中的指挥者

很多著述者，都将松山战役的指挥首功归于第 8 军副军长李弥。这个日后在解放战争淮海战场上化装逃脱的国民党军第 13 兵团司

---

〔4〕参见王伯勋《日军第一一三联队是怎样被歼灭的》，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223 页；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中国文史出版社《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10 页。另据《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第 701 页）载，蒋介石因第 8 军 7 月末仍未攻克松山，乃严厉电令何应钦电告何绍周，再限一周要攻下松山，否则“将对第 8 军师长以上军官以贻误战机论处，捆送重庆，交军事法庭按军法处理”。转引自李仲明《何应钦大传》，第 255 页。两说略有不同，并存备考。

〔5〕陈一匡：《松山攻坚战》，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410 页。《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3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7 页。

〔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3 页。

令，又率残部在缅甸“金三角”地区纵横一时的传奇人物，确实更容易吸引人们的眼球。为了让这个主角成为“一号明星”，有的著述设置了这样的理由：“军长何绍周，是军政部长兼总参谋长何应钦的侄儿。何氏虽然身为中将军长，实际并不特别擅长打仗，又尤其不擅长与日本人打仗，因此每有战事或遭遇激烈战斗，便将前线指挥权慷慨交与副军长李弥，自己蹲在第二线掩蔽部里观望”。[7]

果真如此吗？方知今在其《中国远征军》一书中说：“在国民党军界，仅靠父辈权势裙带关系，是不能服众的。蒋介石把他的儿子蒋纬国派到胡宗南的部队里，从连排长干起，目的也在于让儿子在部队里熬资历，立战功，按部就班晋级，使人心服口服。何绍周早年曾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5期炮兵科**）深造，又毕业于黄埔第1期和陆大正则班第10期，身经百战，颇有作战经验和指挥才能。他在松山攻击战中，兵力部署和指挥方面还是颇有独到之处的。”[8]方知今这一评价，是在采访了包括其父方靖中将在内的众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及许多在世的远征军老兵的基础上得出的，应非对何绍周的溢美之词。

据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编印、1944年10月31日出版的战时丛刊《文摘旬报》第4卷第9、10期合刊载：“7月中旬第5次攻击前，第8军军长何绍周召集干部到竹子坡指挥所，提出了在一般战术原则上的几个有效办法：一、坚固阵地攻击，不能仅凭血肉和勇气死拼，必须用我军装备火力优势，充分发挥各种新兵器在近战中的优良性能压倒敌人；二、步兵、工兵应与炮兵软化敌阵地的破坏射击，同时推进对壕，彻底摧毁敌阵地前的障碍设施；三、攻击前，须不断佯攻，扰乱、麻痹敌人精神，使敌人无从判断我真实面目及攻击的时机与地点；四、‘只有进，没有退。’占领阵地后，应有新锐兵力击退敌人反扑，赶快利用敌军阵地和遗留资材，

---

〔7〕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62页。

〔8〕方知今：《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印纪实》，第512页。另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淞沪战役时，何绍周任战斗力颇强的税警总团第一支队司令，孙立人是其辖下第4团团长；武汉会战时何绍周任第103师师长，在没有副师长、参谋长协助的情况下，何指挥所部在田家镇阻击日军，歼敌步兵、机枪各一个中队，并缴获日军今村旅团的作战命令；宜昌西岸会战时挥师击退渡江西进日军，巩固西岸，保障了入川门户。

筑成自己阵地。此外，在雨季淫雨的泥泞中，须昼夜不息推进对壕，至距离敌20米以内距离，以减少攻坚应有的重大牺牲。事实完全证明了何将军几种战法的正确性。”[9]从这个当时军事委员会的内部资料，不难看出何绍周对松山作战指导上还是颇善总结经验的。

况且，不论何绍周是否擅长打仗，从军长职责来讲都必须全程在松山一线坐镇指挥。据资料，6月24日，第8军副军长李弥即受命率荣1师主力（荣1团及荣2团第1、2营）增援龙陵，直到7月29日才转到松山战场。在这一个多月期间，第8军对松山先后实施了5次围攻，一直是何绍周在组织指挥。8月3日，决定以“坑道爆破法”进行第6次关键性攻击的军事会议，也是何绍周主持的。而8月20日子高地爆破后两次激烈的反逆袭，则是由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在一线督战；松山左翼滚龙坡、大垭口、大寨等区域的作战，一直由第103师师长熊绶春指挥。据第103师战斗详报，战役期间第8军司令部下达的各次作战命令，均由军长何绍周、副军长李弥、吴剑平及参谋长梁筱斋联合签署，但明确李弥担任具体指挥职责，是9月2日以“怒战字第33号”命令李弥统一指挥松山主峰既占阵地守备队及右兵团扫荡黄土坡。可见，李弥来到松山，只是加强了作战指导力量。

论及何绍周与李弥的关系，就要说到第8军的渊源及内部派系问题。第8军属中央军，却带有浓郁的“黔系”色彩，这自然与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相关。在国民党的大员中，何应钦为人谨小慎微，对培植“私人势力”比较小心。直到1940年枣宜会战以后，才先后将第103师、第82师两支贵州部队调入第8军，使该军成为“黔军”班底。1943年初，第8军军长郑洞国奉命转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何应钦遂任命其侄、第8军副军长何绍周接任军长。何应钦因夫人王文湘不孕无子女，遂过继二哥何应禄之子何绍周为养子，对其视同己出，备加关照。而李弥在军中本来没有什么靠山，是凭着黄埔系出身和战功递升为荣1师师长、第8军副军长

〔9〕黄怡：《松山攻夺战经过》，原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战时宣传丛刊《文摘月报》第4卷第9、10期合刊。转引自陈祖樑主编：《江山作证》，第162页。

的。早年陈诚对李弥并不看重，甚至还有过节[10]，但在派系之争中为了抑制老对手何应钦，转而拉拢李弥，想给第8军干部队伍里掺上一把“沙子”。

第8军下属3个师，按战斗力的排列依次为——荣誉第1师、第103师和第82师。荣1师后期是由湘西和贵州籍伤愈士兵组成的部队，也算是半个黔军。但这个师一直处于“陈诚系”的掌控之下，从师长（汪波，黄埔第3期）到团长、营长大都是陈诚和李弥的人，只有荣3团团长赵发毕是何绍周的亲外甥（所以过江后即被何留在了松山）。第82师原由贵州土匪武装收编而成，在何绍周初任军长时闹过哗变，被何予以严厉镇压驯服，如今部队虽然听指挥，但战斗力较弱。该师现任师长王伯勋是贵州人，是何应钦的亲信。但因王伯勋年初才从陆大第6期特训班深造归队，接替前任第82师师长吴剑平的职务（吴剑平升任副军长），所以作战指挥方面何应钦更多依赖副师长王景渊。因此，何绍周在第8军真正倚重的主力为第103师。第103师的前任师长就是何绍周自己，现任师长是熊绶春（黄埔第3期）。熊绶春是陈诚的亲信，因此，何绍周一直琢磨着要换掉这个师长。作战期间经常把该师部队（如第307团、第309团）交由王景渊指挥，在给该师下命令的时候经常越过师部直接指挥到各团，生生地把熊绶春给架空了。熊绶春对此自然会有怨气，即便在其第103师战斗详报这种官式公文中，也时时可见一直担任左翼作战的该师对右翼兵团战事不利时的揶揄和抱怨（如7月23日打滚龙坡、8月7日打小松山受挫时）。

因为这些远近亲疏的关系，在回忆第8军的松山战事时，不少当事人都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大致是黔系将领都拥戴何绍周，荣1

---

〔10〕1930年，黄埔第4期毕业的李弥在川军第51师任副团长，随部开赴鄂西、江西，听从陈诚调遣，参加“剿共”。1932年秋，第51师驻防江西永丰。陈诚为了扩张实力，吞并异己，奉蒋介石之命，借口该师纪律太坏，将永丰包围。该师不敌，大部缴械。李弥拒不受命，集合官兵讲话：“我们不是一样的打共产党？你们愿不愿意缴械？”官兵们齐声回答：“不愿！”李即带领官兵冲出包围，把部队带到南昌见“剿总”总司令何应钦。蒋介石得陈诚报告后，在庐山召见李弥，严加申斥，问他为何不听从陈诚的缴械命令。李弥回答说：“过去在黄埔军校时，校长只教过学生如何打仗，未曾教过缴械。因此将部队带来交还校长。”蒋介石听后甚为高兴，认为李弥是忠于自己的，遂将李弥团改归赣军熊式辉部，配属周浑元的第5师，李弥升任团长。

师官兵推崇老师长李弥。[11] 尤其是在战役后期，第8军最后的生力军第309团投入战场，却因战事不利，引发了何绍周与李弥乃至与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的冲突，使得第8军的内部派系矛盾公开化。据一份史料来源不明的文章说，“在围攻松山的重要时刻，第8军军长何绍周从马上跌下来，被送到昆明治疗”[12]。如果属实，这应是在9月4日之后，因为2日开始的第9次攻击作战方案，仍是军长何绍周部署的。在这一天，因为第309团前日晚攻击3号高地得而复失，在李弥报告后，引起卫立煌震怒，斥责何绍周指挥不力，责令何枪毙团长陈永思，何绍周情急之下使性子顶撞了卫立煌。笔者以为，可能是在此情形下，何绍周才借口摔伤离开战场的。那一刻，何绍周一定满腹愤懑，否则不会在即将大功告成之际离开松山。一些著述提到何、李二人后来“在第8军交接问题上有些不快”，就是指此事。

2005年，笔者电话采访了时年84岁的荣2团第3营机枪第3连连长黄天，他是长沙黄埔同学会的秘书长。他说，第8军的这几位长官他都接触过，感到何绍周脾气好，是个“好好先生”，稍嫌魄力不足；李弥出身农家，进取心很强，为人比较“狡猾”一些，但很亲近下级军官和士兵，打仗办法多。松山战役中，副军长李弥应算充分尽到了副职之责。战后，何绍周获得中华民国高等荣誉青天白日勋章[13]，升任云南警备司令部副总司令（后升总司令）。何应钦欲举荐在第一次入缅作战被撤职的亲信刘伯龙接任第8军军长，陈诚力持异议，与第8

〔11〕关于国军的派系问题，黄仁宇曾作如此评析：“国军在生存条件极端困难之下，得力于各部队内部个别军官团之团结才能避免崩溃。但此一因素，始终被中外之观察者及以后之历史家忽视。部队长与各干部之人身关系、乡土关系及部队历史，虽使各部队间之协同困难因之产生分化作用，但在每一个单位内部之凝聚力又不可少……说来说去，这也仍是社会未进化过渡期间的必然趋势”。见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272页。

〔12〕德宏州史志办张方元文章《抗战时期的李弥将军》：http://dehong.yunnan.cn/255/2006/11/15/37@1689.htm。

〔13〕青天白日勋章为中华民国第二等级的荣誉勋章，授予陆海空军于战时抵御外侮立有卓著战功的军人。从1929年设立至今共颁发209枚（001号的得主是张学良），并曾授予马歇尔、史迪威、陈纳德、魏德迈4个美国军人。青天白日勋章不分等级，但通常很少授予师级以下军官。因松山战役功绩获得“青天白日勋章”者为第8军军长何绍周、荣3团团长赵发毕、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第246团第1营营长谢梦熊（战斗中牺牲）、第309团第3营营长黄人伟、荣誉第3团第3营排长张其昌等6人。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共颁发青天白日勋章65枚，1944年颁发11枚。另，中华民国最高等级荣誉勋章为国光勋章，整个抗战期间仅于1943年授予蒋介石一枚。

军美军顾问斯培德一起向蒋介石举荐李弥接替了军长位置。[14]

综合上述分析，松山战役全程指挥之首功，仍然要归于何绍周，李弥应排在第二位（其率荣1师主力解救龙陵之功可另算），王景渊、熊绶春两位大概可以并列其后。

8月4日：D+61日

我军炮兵自即日起，开始软化辰、巳、午、未诸高地之日军阵地，步兵则依部署作第6次攻击准备。[15]

8月5日：D+62日

即日清晨，为便利指挥起见，第103师指挥所迁至核桃箐附近，各部队开始调整部署。第308团以第1营守备滚龙坡，第2、3营在己、庚高地展开，准备向辛高地攻击；第307团在无名高地左侧，于松林堡垒之线展开，准备向大垭口及其以北地区攻击。以师搜索连为预备队置于核桃箐附近，均已准备就绪，待命进攻。[16]

在研究中日战史资料时，笔者发现双方对滚龙坡日军残敌肃清时间的记载，存在冲突。中方史料普遍记述，8月2日我攻占滚龙坡后，即完成对日军本道阵地及侧面阵地残敌的清剿。日军战史也认定8月2日本道阵地陷落，但据几个活下来的日军士兵回忆，他们逃离“本道阵地”的时间为8月5日深夜。联系中方记载，在几天后滚龙坡下西北方的日军崖阵地仍有残兵，且钻出来从背后向我前进部队打冷枪，我军不得不回头再次清剿的事实，日军士兵此说也可存疑。这里不妨转引其叙述以备进一步核查。

据日军上等兵森本谢回忆：

---

〔14〕新华网文章《抗战名将——李弥》：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07/content_7933869.htm。此外，松山战役后，第8军的指挥官普遍获得晋升：第82师师长王伯勋升任第8军副军长兼荣1师师长；第103师师长熊绶春升任第14军副军长；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升任第103师师长；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升任第85师师长；第103师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升任该师副师长；军部上校附员李彦萱升任第82师副师长；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未获晋升，平调辎重兵团团长。

〔1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4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7页。

〔16〕《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5日，日军笹栗兵长在“本道阵地”战壕里站起身来，向我军投弹的瞬间，被我军的子弹击中胸膛。森本谢拼命跑过去抱起他，只见他嘴唇动了一下，不知想说什么就断了气。随后分队长松本日出伍长也战死。

当日深夜，守备队本部发出撤出本道阵地的命令。军旗护卫小队长安河内正幸乘远征军停止射击的间隙，大声吼道：“跟我冲！”带着活着的人一齐冲出了战壕。这时，我军的150毫米榴弹炮炮弹飞来爆炸了，安河内正幸“扑通”一声朝前倒了下去。森本谢抬起枪向我射击，在200米距离外的阵地上，远征军以重机枪、迫击炮猛烈还击。森本谢冒着弹雨，向安河内正幸方向跑去，将他抱了起来，看到他胸部被击中，鲜血已经染红了军服。安河内正幸嘴唇嚅动着，好像对森本谢说着什么。森本谢后来含糊地对采访他的品野实说，自己好像听到他在喊“妈妈”，也许是“天皇陛下万岁”，不一会他就垂下了头。森本谢于是离开阵地，去追赶其他逃跑的日军。

从本道阵地到音部山本部阵地大约有3000米，想突破我军包围并非易事，森本谢迎着眼前冲上来的我军拼命冲了过去，相互拼杀中耳边只有“杀！杀！”的怒吼声……据森本谢说，从本道阵地撤出的日军总共有四五十人左右。安河内少尉死后，预备队也仅存五六个人了。[17]

而据后来从崖阵地逃脱的日军卫生兵石田富夫回忆：

安河内正幸少尉负伤后并没有当即死，在森本谢丢下他逃跑后，他挣扎着爬到了右下方的崖阵地的战壕里。这里由村上正登准尉指挥十四五名士兵把守。村上准尉是安河内正幸的小舅子，两人关系最密切，尤其是在身处绝境以后。当时，安河内正幸被击穿了背部，卫生兵石田说：“我给你治疗一下吧！”安河内正幸对石田说：“我已经不行了，治疗也没用了。”石田说，当时他到死都在一个劲地说着话，说了些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但是，他后来向品野实证实：安河内正幸临死前绝对没有高呼过什么“天皇陛下万岁”，“人

〔1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33—237页。

在断气前是极为痛苦的，怎么能喊出那种话呢？”[18]

士兵在临死前喊“天皇陛下万岁”还是喊“妈妈”，在日本军人所写的战记中是个经常提及的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日本军人心里纠葛之深。今天人们为之感到可笑和悲哀，但这正显示了军国主义教育对日本士兵人性禁锢、毒害之深。活下来的一些日军士兵之所以敢对此有所置疑，是因为战后日本社会对那场战争有了一些反思和省悟的氛围，但对那些老兵而言，也只能做这点嘟哝式抱怨；有些怯懦的人，连这点嘟哝都不敢，只要看看森本谢含糊其辞的叙述即可：难道在日语中，“天皇”和“妈妈”发音一样，以至于从口型上也不能判断绝命前的人到底说的是什么吗？

在滚龙坡陷落后，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命令残余日军300多人（含伤病员），集中在主阵地横股、松山、西山、关山、音部山、里山各处进行整顿，修补阵地，准备做最后的挣扎。[19]

8月6日：D+63日

凌晨3时，第8军司令部以“怒战字第28号”命令部署第6次攻击，其要旨为：

本次攻击主力指向午、未高地，同时攻略子、壬、癸诸据点，逐次压迫敌人于松山山顶而聚歼之。担负主攻的右翼队及中央队，由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统一指挥。预定主力中央队发起总攻时间为8月7日，其他各部据任务可率先行动。[20]

据担任主攻的中央队第246团团长田仲达回忆，因该团接手阵地不久，对壕作业尚未完成，请求延期缓攻。但军指挥部未予采纳，反令该团不惜任何代价，按期实施强攻。[21]

据此，第103师于上午8时以“作命滇字第10号”命令，向所部下达攻击任务。随即，第308团率先以端末作业向辛高地极力推进，击毁敌坦克堡垒一辆；第307团以主力由无名高地左侧一部，

---

〔1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41—244页。

〔19〕同上书，第190页。

〔20〕《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21〕《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田仲达诗文专辑），第20页。

由正面向壬高地推进端末作业。10时许，第307团攻击部队利用对壕迫近敌阵地，向日军投掷密集手榴弹，毙敌甚多，11时50分完全占领壬高地。[22]

在此期间，缅甸日军航空兵于上午9时派出3架战斗机和6架轰炸机，又为松山日军空投补给。[23]因我高射炮火猛烈，仅两架敌机能低飞，共投下补给品7包。其中一架被我击伤。待我机闻讯飞来，日机群已逃跑。[24]

8月7日：D+60日

所谓松山主峰，在第8军的作战指挥地图上，分别是指子、丑、寅、卯及辰、巳、午、未这两组8个山头，当地人谓之大、小松山。其中，子、丑、寅、卯被日军称为关山阵地、音部山阵地，辰、巳、午、未为里山阵地、战斗司令部阵地，前者海拔比后者平均高出约40米，中间隔着一个马鞍形的洼地，洼地中间有个水塘。我军欲爆破子高地（关山阵地），所选定的坑道入口在其东北道人坪子方向，为分散子高地日军注意力，牵制性攻击就必须指向其南部的这些高地。

7日天气转劣，从清晨起即雨雾弥漫，至中午12时才放晴。我炮兵随即开始炮击，至下午1时，中央队步兵发起攻击。

荣2团第3营从东侧以巳高地为目标分波突击，攻入敌阵地后，与敌展开肉搏两小时之久，敌我尸体填平了战壕，终于占领了巳高地前半部，但敌死守巳高地一部不退。至黄昏，敌我距离10米相持，成胶着状态。该营之一部，对辰高地之攻击受挫，不得前进。荣2团第3营伤亡奇重，最后仅剩下能战斗的官兵18人，军官仅剩下1名排长。

第246团谢营（第1营），从西侧跃进于距午高地100米附近，突遭辰高地之侧射，伤亡倍增，营长谢梦熊阵亡、第2连连长郭维、排长王维松阵亡。我炮兵虽一再以炮火诱导，期其攻势再兴，终无

〔22〕《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2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0页。

〔24〕据《空军滇西作战日志》。据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36页。

效果。至黄昏，清查该营，仅余8名士兵退回。

第246团黄营（第3营）从南侧一举突入位置较低的未高地而占领之。只是该营在前阶段对滚龙坡庚高地攻击之后，仅剩兵力50余人，力量非常单薄。激战至15时许，日军由午高地及未高地之左侧行包围反攻，该营与敌鏖战达3小时之久。[25]

经历此战活下来的第246团第3营老兵高有旺，记忆中留下了令他终生刻骨铭心的一幕。

高有旺是龙陵人，尽管直到大反攻前夕才参军，但一下子就遇上了打松山这样的空前恶战。高有旺记得那几天雨下得很大，他穿着草鞋、扛着“中正式”步枪跟着老兵们爬山，爬到未高地下已是周身泥泞，头上也早已是一片火海弹雨。高有旺脸色惨白有些紧张，班长好像是重庆巴县人，连踢了高有旺两脚，口里骂：“龟儿子等哈儿跟到我，不准乱跑！”

信号弹在怒江上空升起，对岸炮兵弟兄奋力开炮轰击，为尖兵团扫清障碍。炮火一停，班长猛然跳起高喊：“快冲！”高有旺紧握步枪直起身来，跟在班长身后往山上冲去。山顶原先茂密的松林已被炸得全无踪迹，裸露在地表的除了一堆堆士兵的尸体，就是被血浸红的黄土。日本兵躲在很深的战壕里疯狂射击，高有旺一个趔趄栽倒在地，等他抬头一看，冲在前面的弟兄倒了一大片。班长趴在前面不远的地上破口大骂“龟儿子！”子弹在头上嗖嗖地飞，班长命令大伙扔手榴弹，炸一阵就爬起来往前冲一段，再趴下投弹……渐渐地高有旺觉得离日本兵很近了，因为前方最多10米的地方就是一张张丑陋的面孔在盯着他，不停地朝他打枪。班长抄起一把军用铁锹大喊“上刺刀！”紧接着便跳起来冲向日军战壕。高有旺来不及多想，装上刺刀也跳起冲进几米外的战壕，刚一落地就觉得脚下软绵绵的，一看踩中了一具日军尸体。

一个矮个子鬼子端着装有长刺刀的步枪狠命地朝高有旺刺来，高有旺闪身一躲，手里的“中正式”步枪也刺了个空。小鬼子丢了

---

〔2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4—35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7—78页。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2页。

枪一把将高有旺抱住摔倒在地，翻身骑上来死命掐住高有旺的脖子；高有旺看着面前这张龇牙咧嘴的丑脸心里反而不怕了，双手在地上乱刨，抓起两把土就往鬼子脸上抹去，鬼子拼命躲闪着，终于忍不住腾出一只手去擦眼，高有旺顺势一个翻身将鬼子压在身下，一手掐住其脖子一手握拳狠命朝他脸上揍！班长大步赶过来，铁锹起处，小鬼子脑浆迸裂……[26]

在该营与日军激战期间，第 8 军指挥部急令滚龙坡方向的第 308 团派一个连前往救援，惜为日军残兵袭扰，未能及时到达。最后该营伤亡过半，无法支持，至黄昏，突围而出，仅剩下 10 余名士兵。[27]

据第 246 团团长田仲达回忆，在这次战斗中，因对壕作业未能充分接近敌堡垒，该团第 3 营在突破第一道障碍后冲向第二道障碍时，即暴露于日军交叉火力网下，官兵纷纷中弹倒下。这时，在军指挥部用望远镜观战的何绍周打来电话，问："你的兵为什么趴倒不动？"田仲达答："他们永远也不能动了。"田仲达为此痛切地写道："所以说，上级不了解战场情况，武断指挥，往往造成重大伤亡。这是最痛心的事！"[28]

在松山的 90 余天战事中，8 月 7 日之战给很多老兵留下惨烈的记忆。第 8 军的各级将领谁都没有料到，以掩护坑道作业为目的的这次牵制性攻击，只打了半天就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

且说，第 246 团黄营（第 3 营）攻击未高地兵力告急，第 308 团为何未能予以有力增援？原来，此刻第 308 团与第 307 团对滚龙坡下敌据点进行清扫，难以抽调更多兵力。在中央队攻击的同时，第 308 团利用连日端末作业成果在距敌阵地 20 米处发起冲锋，一举占领辛高地。第 307 团以主力肃清壬高地反斜面之敌，以一部向癸高地进攻。但因受黄土包、大寨敌机枪侧射、瞰射，损伤甚大，攻

---

〔26〕2005 年 6 月 19 日《重庆商报》文章：《血战松山　三吨炸药炸飞山头》，罗磊、颜乔撰文。

〔2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4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8 页。

〔28〕《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田仲达诗文专辑），第 20 页。

击未果，仅焚毁大垭口附近敌兵舍数间。[29]

当日，位于荣2团第3营右侧的第245团一个营，当日以松山、阴登山间马鞍部为目标实行佯攻，遭到两组高地的火力夹击，仅前进了十多米。[30]

第8军一月来进攻松山，各部队伤亡惨重，先后投入了5个步兵团，这时可抽调补充而能战斗者只剩下一个团的兵力。进攻不可停顿，无兵又不能进攻，因此指挥部只得先从重武器兵中抽出一部分士兵（重机枪每挺留3名、82迫击炮每门留3名、60迫击炮每门留2名），又将各指挥系统的非战斗人员集中起来整编，全改为步兵。经清点，荣3团（欠第3营）220余名；荣2团第3营60名；第246团120名；第307团100名；第308团170名。以上合计不过两个营。第245团底子薄，未担任主攻，一直在支援各团战斗，经逐次消耗所剩兵力也不过一个营。至此，第8军在松山能使用的突击兵力，最多也就是一个团。[31]

于是，决定呈请长官部速从祥云和保山分别调来保卫机场的第309团和荣3团第3营，以增强攻击力量。在增援兵力未到之前，一方面继续挖掘坑道，一方面相机袭扰，不让日军窥破虚实。[32]

8月7日夜，对部队部署作如下调整：

荣3团及工兵营主力，应加紧坑道爆破作业，尽可能缩短工期；

第246团因军官伤亡殆尽，即令撤出战场，于大董瓮附近整编为一个加强连，派第2营营长彭剑鸣率领，向日军横股阵地西面横档（亦写做混当）迂回，右与第307团左翼、左与第245团第3营右翼分别衔接，合围封锁日军并相机袭扰之；

第245团（欠第3营）指挥荣2团第3营，除确保既得之地域外，并向辰、午及午、未高地间无名高地，以对壕作业力求接近，准备后续攻击；

第308团肃清大垭口之敌，攻占未高地鞍部以左；第307团攻

---

〔29〕《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30〕《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4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8页。

〔3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7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8页。

〔32〕同上。

击癸高地，突击大寨，缩小包围圈，使后续作战有利。[33]

打松山到底需要多少兵力？从新 28 师最初使用了 3 个团，到现在第 8 军 5 个团逐次投入，仍然感到捉襟见肘。于是，又开始追加兵力。这种“添油式”的兵力使用，难以对日军防御体系形成绝对优势，造成了大量伤亡，实在是松山战役指挥上一大失误。按常理，“添油式”的兵力投入，适用于在较小的阵地上进行防御战，可以减少敌密集炮火下的伤亡。作为进攻方，对松山这种散布式据点阵地，则应保证充足的攻击兵力，使敌分散应对，无法各个击破。归根到底，这一错误仍是“不知彼”所造成的。

然而，这时日军抵抗兵力也捉襟见肘。在我炮火猛烈轰击和步兵突击下，战斗力量仅有疲惫不堪的 200 多人。但在金光和真锅严命下，仍向关山阵地靠拢，准备在辰、巳、午高地失陷后实施反冲击。[34]

据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回忆，他从本道阵地逃到关山阵地后，第一次下达了要重伤员自杀的命令，但由于全体士兵的强烈反对而没有执行。在日军的所谓“玉碎”战中，令重伤员自杀是最后的手段。有些日军士兵们不甘心地说：“不是说援军要来吗？如果真的能来，这样处置是不是操之过急了？”[35]这些可怜的炮灰，如今只能在幻想中苟延残喘。至于“投降”，是想一想都要打冷战的念头。

8 月 8 日：D+65 日

命令重伤员自杀遭到全体士兵的抵制，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一时颇感意外，有些恼怒。

连日来这些重伤员躺在战壕里呻吟，却没有什么办法救治，只能看着一个个死去，目睹此状，每个活着的士兵都仿佛受传染似的心境黯然。让他们自杀，本是想消除这种负面影响，至少可以眼不见心

〔3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8 页。
〔3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90 页。
〔35〕同上书，第 214 页。

不烦。不料却遭到了全体士兵的抵制。传令兵慌乱地跑到音部山野炮第3大队本部战壕将此情报告给金光少佐，金光仿佛看到了那些反对者在沉默中射来的愤怒的目光。他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日本士兵对死亡和苦战的承受能力，金光心里有数，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这个命令也许会顺理成章地被执行。事实上，让重伤者自杀已属“人本”之举，在以往流动性较强的作战中，对重伤者往往只有“活杀”一途。[36] 1941年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向陆军颁发的《战阵训》“惜名”一节中，已将“勿生受囚虏之辱”列为军法，日军败战之后别无选择，只有“玉碎”一途。倒不是他们不怕死，而是他们不相信落在中国人手里会比自杀更好，只要想想他们过去两年怎样对待中国人就够了，他们习惯于以己度人，不存任何侥幸心理，“投降”这个字眼哪怕是一转念都是可耻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每个人都怀着援军会到来的期盼！为此，连奄奄一息的重伤员都拼命地调动意念提着最后的一口气，活着的人更是被偶尔闪过脑海的援军到来的幻觉鼓舞着。“天照大神”会让大日本“皇军”这么惨吗？不会，因为开战以来一直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他们早把自己看成了神话的创造者。他们从未品尝过战败的滋味，更不相信曾经立下赫赫战功的九州部队会被杀绝，因为联队旗还在阵地上啊，军旗是天皇授予联队的象征，有它存在，援军就一定会来。[37]要是在黎明前的一刻死去，没有熬到大日本帝国的旭日升起，那才是悲惨得无法形容的事啊！

金光惠次郎深知，即便在军令严明的日本军中，强制执行犯众怒的命令，也是需要掂量的事情。作为一个年已四十八九岁的老少佐，金光不像小自己十多岁的真锅大尉那样易于冲动。因为，战事仍处于艰难境地，任何打破这平静状态的意外事件都是无法想象的。既然这个犯了众怒的命令是出于振作士气的目的，那么，就一定还

〔36〕对伤员的处理方式，最强烈地体现出日军将人作为战争工具和材料的色彩。据腾冲县政府民政科长、国民党腾冲县党部书记长李嘉祜1944年4月20日呈报《腾冲敌情报告书》载：“……（日军）每有伤亡，必将死尸抢运后焚化，决不留一具尸首与人看见。轻伤者抬回医治，重伤者虽其人尚能言动，要求抬回医治，皆不听，每以大刀砍为两段，以马驮之而回”。转引自云南省档案馆编《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第457页。

〔3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32页。

有其他办法。这新办法如能与前面的命令之间构成内在的一致性，必然会使士兵们对自己多一分理解，至少会部分地消除他们心里潜藏的受伤感。金光惠次郎少佐透过望远镜仔细观察着远征军的炮兵阵地，一个念头从眼前闪过。

据日军战史称：

8月8日，为破坏对守备队威胁最大的远征军火炮，振奋日军士气，金光惠次郎少佐命令组成一支“挺身爆破班”。从各阵地抽出29名日军（一说28人），编成7个组，每组3至5人，准备实施日军擅长的夜间偷袭。目标是：本道阵地西北方向（即5350高地）的山炮，崖阵地西方的重迫击炮，原口山（竹子坡）半山腰的榴弹炮，白壁阵地（下腊勐北公路转弯处）附近的榴弹炮，及从拉孟到惠通桥之间的我辎重汽车。当晚，破坏班换上了从中国阵亡士兵身上扒下的衣服，携带手枪、手榴弹、破甲炸弹，从远征军一线阵地的间隙悄悄穿过，向预定目标潜行。[38]

综合太田毅、品野实的著述，这7个组分别由津野崎丰基军曹、森本高之进军曹、长谷川一军曹、立花行雄伍长、占部末雄伍长、吉田熏伍长、重藤富雄兵长等下士官担任组长。[39]但在楳本捨三著述中，领头的又变成了所军曹、石山军曹、水野伍长、坂井伍长、佐藤伍长、森伍长、畑上等兵等人，且清一色是野炮第3大队的炮兵，即金光的直属部下。[40]但两个名单一个人都对不上，所以鬼才知道这件所谓的“英勇壮举”里头有多少水分。

敢死队一走，守备队现有的二百多人里，未负伤的就剩下二十八九名了。对金光而言，这无疑是一次赌博，如果楳本捨三书中的名单属实，可以推测“老少佐”金光似乎只能让自己手下的炮兵领头去玩命，命令步兵去他心里可能有所顾忌。但参与者却显得有些亢奋，与其看着重伤员自杀，这种赌博式的偷袭更符合日本人

〔3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2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0页。

〔39〕[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52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0页。

〔40〕[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28—129页。

的心理。据日军士兵早见正则回忆：临出发前，真锅大尉用激动而庄重的语调说："你们的行动关系到守备队的命运，必须完成任务，安全返回！"并用松井联队长留下的两个茶碗，以仅有的宝贵清水代酒，预祝敢死队偷袭成功。[41]

不过，据后来活下来的卫生兵吉武伊三郎的说法：

那时是组织了一个"挺身爆破班"，他记得只有 4 个组，每组 4 个人。吉武本人也参加了。他这个组都是卫生兵，有一人会说中国话，就给他换上了中国人的衣服。吉武等挑着装甲爆破雷溜下勐梅河，负责炸毁对岸的一门山炮。后来这个组全都活着回来了。滇缅公路后面方向是由两个组负责，勐梅河对面的另一个目标是由一组负责。这几个组后来只有一个人活着回来。即派出 16 人，活着回来的只有 5 人。[42]

品野实在书中对此很疑惑：吉武说的这次"挺身爆破班"是否与前者是一回事呢？如果是同一回事，那么对这次行动日本军方后来的宣传就太离谱了。

上文提及曹长、军曹、伍长等日军特有称谓，很多读者不明就里。这里不妨列表将当时中日两军军制及官兵称谓做一介绍：

表 9　远征军／日军军制及官兵称谓对比

称谓／区分		将　校（士官）									准士官		下士官			兵			
日军	日军军衔	大将	中将	少将	大佐	中佐	少佐	大尉	中尉	少尉	准尉（特务曹长）	甲种干部候补生	曹长	军曹	伍长	兵长（四〇年后）	上等兵	一等兵	二等兵

〔4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16 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 110 页。

〔4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56—257 页。

续表

称谓 区分		将校（士官）									准士官		下士官			兵			
日军	指挥/战斗岗位一般任职	总军司令官及以上	师团长/军司令官/方面军司令官	旅团长/步兵团长	联队长	兵种联队长	大队长	中队长	小队长/中队长	小队长	见习小队长/中队部指挥班长		中队部指挥班长/小队长	分队长/中队部附员	分队长/分队附	伍长勤务上等兵	战斗兵/技术兵	战斗兵	内务班新兵
中国远征军		军官											军士			兵			
	远征军军衔	上将	中将	少将	上校	中校	少校	上尉	中尉	少尉	准尉	军官学校学生	上士	中士	下士		上等兵	一等兵	二等兵
	指挥/战斗岗位一般任职	远征军/战区司令长官及以上	军长/集团军总司令	师长/副军长	团长	副团长	营长	连长	排长/副连长	排长	专业技术军士/排长		副排长/班长	班长/副班长	副班长/战斗兵		战斗兵	战斗兵	教导队新兵

附记：日军在“甲种干部候补生”外，尚有“乙种干部候补生”，均由中学毕业以上士兵中遴选，经部队教导队短期集合教育后，通过考试选拔区分为两类，前者送入国内的久留米预备士官学校受训8个月，提拔为军官，任小队长；后者在各下士官教导学校受训5个月，提拔为下士官，任分队长。[43]

〔43〕据［日］河村太美雄所著《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中关于日军低级军官生成情况的介绍资料，第183页。

当日清晨，第308团将未、辛两高地鞍部附近之敌完全肃清，于下午1时以主力从东斜面攻击未高地。激战至黄昏，因兵力不足，虽以炮火尽力支援，仅进展至未高地棱线下10米，无力再攻，于是就地构筑工事固守。[44]

据参加此战的第308团老兵袁德均回忆：

不打仗不晓得枪炮厉害，打起仗来才晓得锅儿是铁打的（四川话，硬碰硬之意）。炮弹一炸，连石头都在抖，枪炮声密得跟大年三十放鞭炮一样。鬼子的机枪厉害极了，子弹好像长了眼睛一样往人身上钻，打得人抬不起头。连长命令冲锋。排长说敌人机枪这么猛怎么冲？连长说是团部的命令。大家只好爬起来慢腾腾地前进，结果只冲了几十米又退回来，白白丢下十几个弟兄。

硬冲不行，就边打边修工事，打了半个多月，我们团的工事修到了大垭口下面。大垭口有日本人的兵营，有发电厂，听说还有军妓院。反正暗堡到处都是，火力猛得很。有次三连刚刚冲上去，我们自己的榴弹炮就打了过来，结果只有十几个弟兄逃回来，李弥气得当场就把那个炮兵团长给毙了。[45]

——李弥下令枪毙炮兵团长的事，未见其他官方记录，似为老兵夸张的说法。当时只有炮10团团长胡克先、炮7团团长郑琦两位炮兵团长，均未遭此厄运。事实上，攻打滚龙坡时，军长何绍周还曾下令炮兵不顾我军步兵伤亡进行掩护性炮击，李弥为误伤问题迁怒于炮兵似不合情理。

第307团当日午前以主力袭占黄土包敌阵地，歼灭敌10余名，获步枪9支，机枪1挺，另以一部于扫荡壬高地左侧洞窟内之残敌。后继续向癸高地攻击，因受到未高地西斜面及癸高地西北之敌侧防火力瞰射，虽一度占领，无法固守。经判断，必须先驱逐西北侧之

〔4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8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8页。
〔45〕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70页。

敌，否则难以占领癸高地而越过公路前进。[46]

8 月 9 日至 10 日：D+66 日至 D+67 日

9 日，第 308 团再次向未高地棱线攻击，却被来自高处的午高地及午、未间无名高地日军侧射火力所阻止，陷于胶着状态。第 307 团以其主力肃清其北侧之敌，激战终日，始将敌驱逐。

10 日，第 307 团再度攻击癸高地，仍无战果。于是又像攻取滚龙坡时那样挖壕作业推进，直到数日后才占领之。尔后，又挖掘多条交通壕向公路方向推进。[47]

据日军战史载：10 日深夜 24 时，随着几道火光闪过，滚龙坡西北 5350 高地及下腊勐附近的白壁炮兵阵地发生爆炸，日军“挺身爆破班”部分袭击得手。松山阵地上的日军士兵闻声狂呼：“偷袭成功了！”[48]

后来与炮兵中尉木下昌巳一起奉命出逃而活下来的上等兵龟川肇，曾参加了“挺身爆破班”的行动。据其后来向人讲述：

当时，我被分在长谷川军曹那个班，共有 4 人，都换上了深色的便衣，趁着夜暗穿过友军阵地，顺利地越过了敌人的哨兵线。当时，因我们不占优势，敌人好像疏忽大意了。长谷川班的攻击目标是兜山附近的敌山炮阵地。

正往前时，突然发现了敌人的游动哨，4 个人马上匍匐在草丛中。值勤的敌哨兵正在吸香烟，烟味随风吹到了正匍匐在草丛中待机的我们鼻子里，由于好长时间都没有吸到香烟了，一闻到烟味烟瘾也来了。

“走，杀掉那个哨兵，把烟抢过来。”一个士兵说道。

“混蛋！”长谷川班长对那个士兵怒斥道。

过第二道岗哨时相当危险，悄悄地，连粗气都不敢喘地潜伏在

---

〔4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8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8—79 页。

〔4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8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9 页。

〔48〕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62 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91 页。

一个洼地的草丛里，洼地上面可以听到中国军队哨兵吧嗒吧嗒的脚步声，和好像是狗在后面追跑的声音——草丛里发出沙沙的声音就像野狗在蹿一样。

爆破行动要等到10日深夜。当时眼前什么也看不到，正在焦急地摸索前进时，突然，我的脚被一根线套住了，抓起来一看，原来是中国军队的电话线。“正好！”免得摸不着方向，4个人就顺着电话线摸索了过去，终于到了一处像是中国军队山炮阵地的地方附近。

“好！就以这个火炮阵地为目标。”长谷川班长命令。由于时间还早，大家又撤到中国军队警戒线以外的安全地带隐蔽起来。在快到预定爆破时间前，再次摸了过去，接近了火炮并在一门火炮上安放了数个破甲雷，另一门则毁掉了瞄准具。

当破甲雷“轰”的一声爆炸时，50米外下面的帐篷中的中国兵都被炸得飞了出去。连着扔了3颗手榴弹后，4个人像兔子似的逃到了来路上。

完成任务返回途中，4个人心情特别好，话也多了起来，又说起“到来时有哨兵的那个地方去，把哨兵杀掉，弄包香烟再回去”，但到了那里后却没见到那个哨兵……〔49〕

美军顾问团战史中的记述为：“8月9日夜间，日本人组织了7个志愿敢死队，他们捣毁了一些榴弹炮并从阵地上拿走了他们可以拿走的轻武器和弹药。”〔50〕另据第103师战斗详报载，日军敢死队在5350高地用磁性炸药炸毁我山炮一门，又潜至核桃箐附近袭击第103师师部，弹投至门口被我哨兵发现，将其全部消灭。受此启发，我各部队也决定每夜派兵向敌袭扰。〔51〕

8月11日：D+68日

凌晨时分，日军“挺身爆破班”一部返回主阵地。

---

〔49〕［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54页。

〔50〕据美国出版的中缅印战区战史从书《美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缅印战区》，第三部分史迪威指挥的难题。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51〕《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据拉孟守备队发给第56师团的电报称，此次偷袭29人中战死2人（军曹、兵各一名），7个班长均返回。成果是破坏远征军山炮1门、榴弹炮1门、迫击炮2门、机关枪1挺、汽车1辆及150人住的宿营地一处。[52]在这部分当过“敢死队”的人中，军曹森本高之进在全军覆灭前自行逃出了松山，并和奉命逃出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巳一道在芒市接受了日本陆军报道班成员、朝日新闻社记者藤井重夫的采访。后来，在藤井在所写的报道中，这支爆破敢死队的战果就吹嘘成了“炸毁了敌人山炮7门，重型迫击炮4门，重机枪8挺，炸死敌兵150人以上”[53]。

但森本军曹半年后还是在缅甸南坎战死，因为他不是正式接受军令而是擅自逃出的，所以，最后还得去送死。另有几个从松山战场逃出回到原部队的日本兵，也很快又被派到了第一线，因为他们必须得死，否则全军“玉碎”的说法会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不成立。品野实说，这就是日本军部首脑的“温情”。[54]

日军的偷袭并未阻止其末日的到来。今天，我军在子高地前的掘壕作业已经持续了一周。

整整60年后的2004年9月15日，笔者在龙陵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怀准、松山村民李正早陪同下，从松山子高地东面的山坡斜径绕道至北面，来到半山腰，眼前突然出现一个约两个篮球场大的平地。因此处曾有一个道士来做过法事，当地人称其为“道人坪子”。李正早说，这里曾是松山日军露天洗澡地和练兵场。当年远征军攻取阴登山后，就是沿着我们走过的山腰斜径绕至此处攻击子高地的。当年第8军工兵为爆破子高地挖掘的坑道起点也在此处，至今仍可见到被半掩埋的壕沟向上面的子高地延伸。

当时，曾在滚龙坡用火焰喷射器焚烧敌堡立下大功的第8军工兵营第1连老兵张羽富，已转至此处施工。据张羽富生前回忆：工

〔5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2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2页。

〔53〕［日］藤井重夫：《悲风　缅甸战线》，第200页。

〔5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2页。

兵营第1、2连就驻在挖掘起点壕沟下150多米处。开始是挖4条明槽，第1连负责左面的两条，第2连负责右面的两条，挖一段就用树叶、杂草巧妙盖蔽。“先是躺着挖，然后跪着、蹲着挖，最后才能站起身来。当时松山阴雨、暴雨连绵不断，一、二连在黄土上作业非常不利，士兵被黄土黏得是人是泥都分不清。”

中央军校第18期毕业生鲍直才，当时在第8军荣1师工兵连任排长。他回忆说：“挖掘初期工作尚称顺利，但越向前深入，问题就越多，例如坑道内照明、用餐、大小便，尤其是最前端人员，因空气供氧不足，呼吸困难，人人都汗流浃背，好像打入了十八层地狱一样。这些问题没法解决，但仍得咬牙苦撑，不可片刻停工。挖掘工作一昼夜两班倒，每班12小时。因坑道狭窄，换班时，要等坑道里的人全部退出，接班人才能一一按顺序进入。最前端的人，将挖出的废土装入麻袋，再以接力方式，一个人一个人地传递，将废土运出，所以挖土的人不多，而运土的人会有数百之多。所以，后来军工兵营和3个师工兵连的数百人全投进去了。”〔55〕

据担负掩护任务的荣3团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回忆：我军挖掘时日军不断从上面往下打冷枪，鬼子的狙击手枪法非常准确，挖沟的士兵一连被击倒数人。这时，团里临时给各连发了二十多块薄钢板，让挖沟的士兵把钢板竖在坑边作掩护，抵挡子弹，轮换挥镐向前掘进。防弹遮身的“盾牌”非常实用，以此战士们步步为营，只进不退。〔56〕

8月12日：D+69日

这天，中日两军地面上战事平静，松山上空却上演了一幕精彩活剧。

从上午10时开始，我军炮火即轰击松山主峰，掩护子高地工兵坑道掘进。中午时分，日军2架侦察机在11架战斗机掩护下飞来，

---

〔55〕鲍直才：《不流血的战斗——工兵流汗克松山》，载黄埔同学会《黄埔杂志》2007年第1期。

〔56〕杨金继2002年10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详见：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为松山日军投下部分补给品后，又用机枪对准我军阵地扫射轰炸。

松山日军做梦也没想到此时仍有友军飞机前来，正当他们惊喜若狂时，一架日军飞机却被我军布置在本道阵地的高射炮击中，尾巴拖着浓烟坠落到大垭口附近，一时引起日军兵营四周大火熊熊！[57]

在松山战斗期间，布置在怒江两岸护卫惠通桥和对我地面部队实施防空掩护的美式高射武器，均为美军士兵操作射击。在距离火线稍远些的阵地上，经常有当地老百姓和为远征军运送粮弹的民夫观战，不时看到光着膀子的美军士兵跳出战壕，抱着机枪对低飞的日军飞机扫射。在日本飞机不来的时候，老百姓常跟那些光着膀子躺在阵地上晒太阳睡大觉的美国兵开玩笑："美国佬！快起床，小鬼子飞机来了！"那些美国兵便"OK！ OK！"地爬起来，煞有介事地跑到高炮前用嘴巴"嘟嘟嘟"地射击一通，然后模仿日机被击落的情景，摇摇晃晃地栽倒在地上，引得围观者哈哈大笑。在当地人看来，这些美国大兵既有能耐，又和善可亲，比中国的军队还让人喜欢。

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回忆，抗战七年来，这还是头一回看到日本飞机被击落，所以大家特别高兴。当时在坠机处俘虏了日本飞行员一名，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58]此外，日军部分空投物品被我军缴获，里面居然有一些女性所用的口红等化妆品，及镶嵌有女人相片的纽扣，令人匪夷所思。[59]

目睹此景，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向师团回电，显示"觉悟"："感谢今日的空投，手榴弹约100枚、步枪子弹2000发将士合掌感激受领，誓为每发必中而奋斗……我战机勇敢低空飞行，因而遭受敌火，深为痛心，以后乞不勉强。"这份"悲情"电报把日军将领和参谋们感动得眼泪汪汪，像"挺身爆破班"的事一样在后来的战史中大肆宣扬。[60]

---

〔5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2页。另据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记载，当日击落日机为两架。

〔58〕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1页。

〔59〕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第17页。

〔60〕［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三册）》，第187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91页。

没有了敌机干扰，在我军炮火压制下，子高地前的掘壕作业大大加快。

据腾冲文史作家段培东对第8军工兵营第2连第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的采访记录：

当日，齐头并进的4条壕沟已经推进了120多米。虽然每条壕沟宽1米，深1.8米，人在壕中走，不会露出头来。但日军的子弹仍不断擦着地皮啾啾地飞，稍一不慎，脑袋就会开花。好在白天黑夜都有炮群支援，子高地上日军枪声一响，我炮排立即进行轰击，并不断发射烟幕弹，搅得一山黑烟滚滚，以遮住日寇视线，便于工兵作业。

松山的土层很厚，我们始终没有碰到岩石之类的障碍物。这一方面可能是天意，日寇罪恶滔天，活该完蛋；另一方面是成千上万颗炸弹、炮弹将松山的土层震松了，成了名副其实的"松山"。同时，军令如山，军师团营各级指挥官亲临前线督战，工兵营长常承隧捋起袖子站在壕沟边上，提着鞭子、握着手枪指挥工兵轮番作业。他是立了军令状的，不得不如此。而我们当兵的更明白"工兵多流汗、步兵少流血"的道理，都是共同打狗日的日本鬼子嘛。所以，我们白天黑夜轮流干，每昼夜可挖5米，弟兄们爬着挖、跪着挖、蹲着挖，挖出的土用麻袋运走，不能给日军发现。人又多，壕又窄，既不能讲话，又不能吸烟，每个兵嘴里、鼻孔、耳朵眼里塞满了土，就像地狱中的一溜溜"土鬼"在给日军掘坟墓！[61]

2005年夏，笔者通过电话采访了在长沙安度晚年的荣2团第3营重机枪连连长黄天，昔日他曾负责以重机枪火力掩护工兵作业。老人已经84岁，用口音浓重的长沙话向我讲述当时的情景：

当时，日寇白天火力狠烈，并有敌机突然飞到，空投弹药给养，夜间还经常突出偷袭。在阵地官兵不断减员的情况下，我连只剩下

〔61〕段培东：《狱中琐记》，转引自作者所著《松山大战》，第236页。

30多人和一个只剩9名战士的小炮班（60迫击炮）。我既要指挥战斗，还要来回战壕亲自担任射手。

敌人居高临下，观察方便，火力猛烈，阻碍我工兵作业。我有所感悟，指挥2挺重机步枪分开目标，移动射击。我自己掌握1挺重机枪瞄准目标，连续击中敌主碉堡中的3个瞭望孔，并发现了敌主堡群中的观测所。随即到小炮班，与班长王运祥将60迫击炮精确瞄准，计算好射程，装药上弹，连发10炮，将敌观测所炸毁，破坏了敌军观测，封锁了敌军火力。亲临前线指挥的宋希濂总司令、李弥副军长、汪波师长等称赞叫好。并由宋总司令手书嘉奖令和奖金800元让副官送到阵地。同时命令我将第3营在阵地上的官兵共约140多名组成加强连，将我由中尉代连长升任为上尉加强连长。

后来，我在编组加强连转移阵地时，不幸被日军发射的一颗掷榴弹弹片击中，右臀被弹片削去半边，血流如注，当即昏倒。后被战友背下了战场，在军部野战医院上药消毒包扎后转运到保山后方医院，昏迷十多天后才醒来……[62]

攻占并肃清滚龙坡下的几个分散据点后，第307团、第308团即向纵深推进。12日中午，第308团向未高地攻击前进，因受午高地敌火力瞰制，仅左翼占领棱线一部分。第307团分别由壬、癸两高地向公路南侧敌小松林高地进攻，因受小松山及大寨各方火力集注射击，立足极为困难，仅能加强作业巩固阵地。[63]据日方记载，从12日下午开始，远征军利用火焰喷射器和其他武器竭尽全力向里山阵地发起攻击，接着占领了里山阵地一部。[64]

8月13日至17日：D+70日至D+74日

13日上午11时许，日军飞机9架再度飞临松山上空，投下供

〔62〕亦可参见黄天撰述《中国远征军松山攻坚战纪实》，载2008年第2期《长沙统一战线》杂志。

〔63〕《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6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2页。

应品 7 包，落在了大垭口北侧。我军立即派兵前往破坏，与前来抢夺的一股日军遭遇，激战约 2 小时后，驱逐日军并击毁供应品一部，我军伤亡 60 余人。在午、未高地之间的无名高地与未高地间，设有日军弹药库一座，被我炮火击中，当即起火。日军拼死抢救，被我炮火阻绝，抢去甚少。[65]

当日，第 307 团一部继续扫清公路西侧断崖下的据点之敌。

这天晚上，该团派出的袭扰小组摸到了大寨边缘。下士班长张学成看见大寨有一所房舍露出灯光，遂带 3 名战士在黑暗中爬至房舍附近，突然投入手榴弹，继而冲入以机枪猛烈扫射，击毙正在开会的日军数名，并搜检缴获到有“松井部队本部”、“龙六七三四原田部队”[66]字样的臂章及第 2 大队长原田万太郎印章等战利品。后日军增援反扑，张学成负伤，由士兵掩护返回阵地。[67]

学者戈叔亚收集到的一件文物证实，这次战斗中还缴获到了日军第 113 联队关防，印文为篆体“龙六七三四部队之印”字样。第 8 军参谋刘君立曾以一幅印样赠第 103 师美军顾问组兽医辛肖，并在其上注明：“一九四四、八、一三，松山之役我军冲入敌之一一三联队司令部（即龙六七三四部队）俘获敌之印鉴，足见其狼狈不堪矣。8A（第八军）刘君立赠，于怒江西岸阴登山，八、二三。”[68]

据日方记载，13 日晚敌我开始争夺里山阵地的战斗。到次日拂晓时，夺回被远征军占据的里山阵地一部。第 103 师战斗详报印证了这一记述：“14 日天明前敌向文团（第 308 团）未高地左翼猛扑，当经我官兵奋勇抵抗，奈因手榴弹潮湿投掷无效，同时敌火猛烈，

---

〔6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39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79 页。

〔66〕“龙”为日军第 56 师团代字，数字 6734 为第 113 联队代号，是为保密故隐去正式番号的代称，又称“防谍号”。第 56 师团后期还曾用代字“森”。第 56 师团及其所属其他联队代称分别为：第 56 师团：龙 6703；第 146 联队：龙 6735；第 148 联队：龙 6736；搜索第 56 联队：龙 6737；工兵第 56 联队：龙 6738；野炮第 56 联队：龙 6739；辎重第 56 联队：龙 6740。

〔67〕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戴孝庆、罗宏彰主编《中国远征军入缅抗战纪事》及徐康明《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均记述此事，但记载日期不一，据战况进展应为 8 月 13 日。在我军反攻前，驻守松山的日军步兵为第 113 联队本部及第 2 大队，第 2 大队长为原田万太郎少佐，缴获的物品与此契合。

〔68〕据戈叔亚战地田野调查《初上松山记录》，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据第 103 师战斗详报载，后次夜袭发生于 8 月 11 日。并存备考。

致将昨日已得之棱线一部分失陷。程团（第307团）向公路南侧敌阵地推进端末作业，并炮击敌仓库，颇有损毁”[69]。

在此期间，随着我军在子高地下坑道掘进进展，开始在松山主阵地前调集兵力，并发动火力侦察式佯攻。15日起，日军发现阵地前我军聚集的兵力越来越多，猜测我军准备从子高地下发起新的进攻。据品野实撰述，当时日军已感知我军要爆破关山阵地的意图，并通过无线通讯机隐约监听到我军“好像在请求补充TNT炸药”[70]。

17日，守备保山机场的荣3团第3营开到了腊勐街，当即归建。军山炮营亦于当日到达松山。指挥部即命令荣2团所剩的残破营，接替了第245团第3营的任务，后者交接完毕后归建。[71]

8月18日：D+75日

中日双方的记载显示，即日，敌我两军分别派出战机飞临松山上空。

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载：上午8时30分，日机21架轰炸惠通桥，并以2架盘旋于怒江坝及镇安街很久。9时许，才向龙陵方向飞去。所幸我地面部队仅伤辎重兵连长1名、马4匹，炸死马2匹。[72]

日军飞机所以一反常态，出动最大规模阵容轰炸惠通桥，并在怒江上空久久盘旋，是因为即日惠通桥修复竣工通车了。据载，自6月18日起，滇缅公路局渡桥工程处组织惠通桥桥工队民工，在桥位上游抢修一座临时人行便桥，20日竣工。7月4日，又修建驮马通行桥一座。8月1日，开始修复两年来一直断毁的吊桥，至今日终于完工。日军侦察得知惠通桥修复，意识到据此我军补给量将成倍增加，战局劣势将难以挽回，于是立即出动机群前来轰炸破坏。我驻守惠通桥的高炮第43团第5营以炮火拒敌，敌机轰炸无效，不得不

[69]《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7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2页。
[7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9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9页。
[7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0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9页。

离去。[73]

然而，下午时分，美军第14航空队一架C-47运输机飞临松山，在向我军空投补给中，由于飞得过低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带伤坠毁于龙陵，机上7名人员全部遇难。[74]

超链接16："飞虎队"：来自云端的希望

在腾冲的国殇墓园里有一块纪念碑，曾镌刻着美军中尉夏伯尔（Kirk Schaible）等14位在滇西反攻作战中阵亡的美军官兵的姓名。后来，历史学者戈叔亚和定居美国的昆明人江汶及史迪威的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John Easterbrook）等人经过多方寻找，将这个名单增加到了19位。其中，有9位属于美军第14航空队成员。

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在美国查到的Y路军美军阵亡名单中，不但有每个人的姓名、职务和军牌编码，还注明了他们的阵亡时间和地点。其中有7人居然是1944年8月18日同一天阵亡。[75]据查，上尉威廉姆·威廉姆斯（William Williams）等6位是同属一架C-47运输机机组，执行空投任务，遇难地点为龙陵；而注明同日牺牲于松山的美军上尉军医瑞普利·巴京汉姆（Ripley Buckingham），却无法查知阵亡原因。[76]70年过去了，即便是向来重视军人身后事的美军，也无法搞清楚这些昔日英雄们的具体事迹。当戈叔亚等人寻访到他们的亲人时，他们都深感意外，转而就为遥远的中国云南至今有人能记得自己亲人的功绩而感动不已。应该说，这些美国军人比70年前与他们并肩作战的中国远征军士兵更幸运，至少，他们还有

---

〔73〕张树才、李根柱（整理）：《战火中的惠通桥》，据中共施甸县委宣传部编《滇西抗战第一枪——纪念滇西抗战胜利60周年文史集》，第32页。

〔74〕引自《华夏人文地理》杂志2004年5月号文章《寻找少校麦姆瑞》，孙敏、章东磐、江汶等撰文。

〔75〕戈叔亚：《未刻名字的阵亡将士纪念碑》，据《东方诺曼底之战——滇西缅北战役》，第349页。

〔76〕笔者在网上检索发现，有一位当时由重庆中央大学应征为美军联络组担任译员、署名"老兵"的人撰文《怒江战役始末——并简述四十年代大后方大学生参加随军英语译员事》提到，松山战役中曾有一名美军上尉在打扫战场时被日军狙击手击中牺牲，不知是否此人。

一份详细的名单。

然而，中国远征军的将士们不会因此而嫉妒这些昔日的战友，因为当年正是这些空中勇士从云端里给他们带来了希望。

1943 年 3 月 5 日组建的美军第 14 航空队，脱胎于 1941 年 8 月陈纳德组织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飞行大队”（AVG）——“飞虎队”。随着美军加入对日作战，这支空中力量先是被纳编为美军陆军第 10 航空队第 23 战斗大队（亦称驻华空军特遣队），最后升格为独立的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其创建者兼指挥官陈纳德晋升为美国空军少将。该部使用与昔日“飞虎队”相同型号的飞机进行战斗，不过机身上统一画上了带翅膀的老虎的标记，因此中国人仍习惯将他们称为“飞虎队”。第 14 航空队的总部设在昆明，在美国战时的 16 支航空队中是独一无二的——创建并驻扎于战事活跃的地区，依赖于一条险恶的空中补给线，为了一个领袖——陈纳德将军而建立。

第 14 航空队成立不久，就通过“驼峰航线”向中国运来了大量美式武器装备，装备了中国军队的 30 个师并开始进行训练。同时，部分轰炸机大队加入第 14 航空队接受指挥，中国空军第 69 混合联队（团）成立，美国飞行员和在美国受训的中国飞行员在这里并肩战斗。

在滇西、缅北反攻作战中，中美空军给予了有力支援。作战方针规定，空军以破坏敌交通线、阻断敌增援及补给为主，同时采取积极空中攻势支援地面战斗，进而歼灭滇西、缅北之敌，打通国际交通线。投入的作战力量为第 308 轰炸机大队，机型为 B-24；第 69 混合联队第 22 轰炸机中队，机型为 B-25；第 25 战斗机中队，机型为 P-40、P-38、P-51；及担负空投补给任务的第 27 运输中队，装备 C-47 型运输机 13 架。据美军“二战”史资料，在战役期间，有一个美军联络中队跟随着远征军部队，驾驶 L-5 型联络飞机协调第 14 航空队的空中行动。这个中队为远征军中担负战斗、通讯任务和负伤生病的美国军人提供物资，在大部分不利的气候和时有敌机干扰的条件下完成了数以百计的任务。1944 年 6 月 16 日到 10 月底，战斗激烈的时期，联络中队的军士飞行人员飞行时间超过 5500 个小时，其中 3800 个小时是在战斗条件下执行的 4000 次飞行任务，运输物

资超过 125 吨、人员 1875 人。[77]

在开赴松山作战前，上尉杨金继所在的远征军第 8 军荣誉第 1 师第 3 团驻守保山诸葛营附近的机场，担负机场守卫任务。他说："当时，第 14 航空队的战机由昆明空运远征军部队到保山，机场十分繁忙，时有机身画了大鲨鱼图案的飞虎队 P-51 战斗机在机场起降。而日军的'隼式'战斗机也不时飞临机场上空偷袭。机场四周配备的美军高射炮群，终日炮声隆隆，向天空扫射，以防止日机侵入机场上空。那时飞虎队飞行员驾驶着比日军'隼式'战斗机更先进的 P-51 战斗机，速度快，上下翻滚灵活，常以一当十冲入敌机群给日本人以迎头痛击，日寇的战机常被击落。所以我营的官兵还有捕捉跳伞日本飞行员的任务。"[78]

第 14 航空队在整个滇缅战场上完全取得了制空权。松山日军的许多据点，都是美军 B-25 轰炸机低飞投掷 500 磅乃至 1000 磅的炸弹才得以摧毁的，在腾冲、龙陵的情形也是如此。同时，第 14 航空队的 13 架 C-47 运输机常冒着恶劣气候给远征军投送粮弹。据第 71 军军长钟彬回忆："即飞机运输，作战初期之计算，在龙陵区，每月有 13 天为飞机活动日，事实上每月仅六七天而已。吾人每听见上空嗡嗡之声，辄默祝上帝庇佑，使苍天开一穹隆，我机得下降低空投掷粮弹。终以云层厚密，无法透过，机声由微小而沉寂，精神由兴奋而失望，更由枯寂而重新抖擞。然盟军空中战士，冒险犯难之服务精神，已为前方将士所敬佩。高空盲目飞行，机翼积雪压力过重而强迫降落牺牲之噩耗时有所闻。"[79]

就在松山战斗紧张进行的时候，日军增援部队猛烈反扑进攻龙陵的我第 11 集团军主力，企图救援松山日军。此时，第 14 航空队

---

〔77〕据战时美军驻华战斗司令部公关军官汇编、美国 Press Censor Goldbert 出版的《怒江战役的完成》，戈叔亚译。转引自戈叔亚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e1cca010008vn.html。另据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附录四（第 530 页）载，滇西、缅北反攻期间，我空军投入兵力为中美混合团（联队）第 1 大队第 3 中队，计有中型轰炸机 12 架，以玛偏机场为主要基地。自 6 月 25 日至 8 月 16 日期间，共出击 170 架次，炸毁铁路 8 处，破坏铁路桥梁 20 处，另破坏仓库 10 处，摧破阵地 3 处。此记录中出动兵力偏小，与美方记载有出入。两说并存备考。

〔78〕杨金继 2002 年 10 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79〕钟彬：《龙陵会战史》，第 7 页。

运输机在大雨中冒着危险空投了大量的弹药和给养，同时以战斗机突袭日军装甲部队，击毁了敌人几乎所有的战车和其他车辆辎重，这才使前线部队稳住阵脚。据《空军滇西作战日志》统计，在松山战役期间，我空军共实施地面轰炸、空域掩护等十余次，而预定任务量在3倍以上，主要因为松山空域局部天气状况恶劣，使空中支援作战大受影响。[80]

当时第14航空队中流行着一首《飞虎队员之歌》，歌词是："我们是有名的飞虎队员，我们是只知道战斗的勇士。光荣属于在战前就开始战斗的人，[81]啊，陈纳德是我们的头儿，他带领我们进行战斗。穿得比从前还糟糕，但是我们只对冲击新的高度着迷。我们始终是一个队伍，大家都在同一条战线上。我们是飞老虎，啊，飞虎队员，啊，十四航空队，顶好！[82]航空队，顶好！"

这天中午，在腊勐街野战医院救治伤员的远征军第6军新39师少尉军医黄执中，看到一队工兵背着铁锹等工具从医院外经过，黄执中好奇地问："去干啥？"一个兵神秘兮兮地说："放个炮仗给你看！"[83]当晚黄执中得知，工兵午夜即可将爆破坑道挖掘至子高地日军关山阵地下，明天即可开始装填炸药。

于是，指挥部连夜确定第7次攻击的部署为：

荣3团除以一部守备双尖峰警戒军之右翼外，在爆破之瞬间，以主力攻占子高地。为此，配属战防炮2门、山炮1门，于19日开始破坏敌之侧防机关。另配属喷火器2具；

荣2团第3营确保巳高地已占领之一部；

第245团以一部守备阴登山、冯家坡一线，在爆破之瞬间，以主力突击巳高地后半部及辰高地；

第308团在爆破瞬间，突进未高地棱线而确保之；第307团全力攻击大寨。配属战防炮4门、喷火器2具。以山炮第5、第8连支

---

〔80〕据《空军滇西作战日志》，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第2617—2643页。

〔81〕指"飞虎队"在美日开战前即投入援华抗日。

〔82〕当时流行在滇西地区对美国盟军的问候语，说时常将大拇指竖起。

〔83〕2005年6月19日《重庆商报》文章《血战松山　三吨炸药炸飞山头》，罗磊、颜乔撰文。

援两团攻击；

派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指挥阴登山山炮2门、战防炮2门及美高射机枪6挺，督导荣3团、荣2团第3营及第245团之战斗。

另，东岸炮10团及炮7团混合营主力，于20日子高地爆破瞬间，即开始压制丑、寅、卯三高地之敌。炮4连山炮2门，及军炮2连山炮（欠1门）于竹子坡占领阵地，于20日拂晓先破坏巳高地后半部及辰高地，爆破后，即以炮2连向辰高地行弹幕诱导；炮4连之山炮2门，即压制午高地。下腊勐阵地115榴弹炮于20日拂晓破坏未高地，尔后予以压制。[84]

8月19日：D+76日

关于爆破松山子高地，留下各种撰述资料很多，但最权威、专业的记述是《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件四《对松山顶爆破计划及经过》一文：

敌人松山之堡垒，以松山顶点的工事最坚强，侧防火网最严密。我军曾四度攻击，虽到达山顶，因不能进入堡垒内部，而受反斜面之掷弹筒及侧防火力，伤亡颇大，终不能立足，致无法占领该山顶，乃策定爆破计划。先行端末作业，进至最近距离时，再用坑道作业，到达敌堡垒下部，开设药室，用美国制造的TNT炸药进行爆炸。

8月3日起，开始对壕作业，由我第一线距敌约150米处，先以端末作业4条前进，每条深度1.8米，宽1.0米，上加掩盖，以避敌手榴弹及掷弹筒。因端末作业，不能容纳多人工作，乃昼夜换班。因土质良好，作业力颇大，至8月12日，各壕推进约120米。自3日至12日，每壕作业量每昼夜约12米，并以第一、第二壕连一横壕，第三、第四壕连一横壕，加以掩盖及射击设备，以资掩护作业。惟接敌越近，工作越困难，且敌随时投掷手榴弹及步枪射击，以致被步枪射击伤亡士兵3名，被掷弹筒炸死工兵排长1名、士兵4名。

待作业头距离敌堡垒约30米，乃开始坑道作业，于第一、第二

〔8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0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79页。

壕之间及第三、第四壕之间，各做坑道一条，每条高1.2米，宽1.0米，配简单之木框加固，不分昼夜向前掘进。至18日下午，坑道长度已有30米。自13日至18日，每条作业量每昼夜约5米。

约计已到达堡垒下部，即开掘药室。18日晚24时后，药室完成，旋即装药。右药室因爆破面较厚，计装药70箱；左药室爆破面较薄，计装药50箱。用电气点火，并装导火索为备份点火。

19日拂晓，装药完成，继以填塞，用麻包装土垒填三层，再填土捣固。每间隔5米，又垒麻包三层，沿坑道填塞长约20米。之所以要做如此填塞，是为将爆炸力聚集于药室顶部，不使之沿坑道逸出。至19日下午，乃全部完成，候命点火。

预定点火时间为20日上午9时，点火位置在荣3团指挥所附近，距离爆点约500米。

那么，让关山阵地日军坐上“土飞机”到底需要多少炸药呢？这里面涉及一个工程数学计算公式，比较简单，不妨了解一下：

公式为：$N = (L^3 \times Z)(1 + X\%)$；

其中，N为所需要的药包个数；

L为爆破面即炸药威力圈的半径（单位为英尺）；

Z是一个变数，依照所爆破土质及预计爆坑之大小而定。此次爆破需要过量装药，查表得知过量装药的系数为0.162；

X%也是一个变数，查表得知装药500药包以上此系数为10%；

预定炸药威力圈半径L为10米≈33英尺；

代入公式计算为：$(33^3 \times 0.162)(1 + 10\%) \approx 6404$（个）药包；

美制TNT药包4个为1公斤，则需要炸药$6404 \div 4 = 1601$公斤；

标准装箱为100个药包，计重25公斤。则每个药室需$1601 \div 25 \approx 64$箱，两个药室约需120箱，共重3000公斤。[85]

据军工兵营老兵张羽富回忆，在他们施工期间，美军顾问时常爬进坑道来一段一段地量距离，十来天后说声“OK！”工兵们就分

〔8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95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0—81页。笔者从数学符号使用规范角度做了校订。

成两拨，一左一右，成个“Y”字形斜着往上掘。又掘了几天，顾问说好了，已经到了敌人脚底下。大家一听都很紧张，就开始挖出两个“十”字形坑道为药室，都有一间房子那么大。[86]

其间，最令人紧张和担心的是日军的袭扰。因为听说敌人好像有了察觉，也在上面向下挖地道截击。于是大家连夜往洞里搬运炸药，大气也不敢出，生怕被敌人抢了先，前功尽弃。1947 年 9 月，已转任云南警备司令的何绍周曾在昆明《民意日报》撰文《第八军滇西战役述略》披露：“……唯接敌愈近，工作愈难，至作业末端将达敌堡下部时，敌已有所发觉而亦急作坑道，欲以破我计划……据事后调查，若再迟二日则敌必能切断我坑道，而使我功亏一篑，斯亦幸矣。”[87]

至 19 日凌晨，120 箱、共 3000 公斤美制 TNT 炸药被填入药室。曾在中央军校 18 期工兵科受过爆破训练的荣 1 师工兵连排长鲍直才给炸药装置信管、连接电线，小心地将电线引出坑道外。[88]

一整天，我军炮火仍不停歇地轰击松山顶部，掩护我工兵回填坑道土方。据品野实著述披露，日军隐约感到我“挖掘坑道准备工作好像已经结束”，关山阵地守备队长辻义夫大尉只能硬着头皮率领剩下的四十余名守兵，听天由命地龟缩在堡垒中。当晚，几名日军还摸出战壕从我军阵亡将士尸体上搜集弹药，但这已是他们活在人世的最后一个疯狂之夜了。[89]

超链接 17：“坑道爆破法”考证

松山战役中，远征军进攻作战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运用“坑道爆破法”颠覆了子高地，从而撕开了松山主峰阵地的口子，为后续攻克全部阵地奠定了基础。这是此战中决定性的一击。以至于日后

---

〔86〕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 275 页。

〔87〕转引自段培东《松山大战》，第 237 页。

〔88〕鲍直才：《不流血的战斗——工兵流汗克松山》，载黄埔同学会《黄埔杂志》2007 年第 1 期。

〔8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93 页。

大部分谈及松山战役的文章，浓墨重彩地写完这一笔，基本上就为整个战役画了句号，尽管在此后还打了艰苦卓绝的17天。

这一战术是谁最先提出来的？一直存在各种说法。比较集中的意见是两种：一是由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提出来的，时机是在8月3日由军长何绍周召集的作战会议上。[90]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确定由王景渊任右翼攻击指挥官，指挥军工兵营和第246团攻取松山主峰，分工是工兵营实施掘壕作业，第246团实施牵制性攻击；另一个说法是，此战术是第8军美军顾问提出的。[91]

第一种说法较多，但提出者均不是参加这次作战会议的当事人，且在王景渊本人的回忆文章中并未表明这一点，只说到担任指挥官一事。[92] 2007年10月31日，《云南政协报》报道了一则消息，从台湾回到昆明探亲的一位参加过松山战役的老兵王文光先生披露："坑道爆破法"是刚从陆军大学毕业归来的第82师师长王伯勋最先提出的。[93]王文光为中央军校第18期生，时任第8军直属战防炮连第1排中尉排长。

王伯勋本人在其回忆文章中，也表明：在8月初研讨作战方案的会议上，军长何绍周让大家献计献策，自己想起在陆军大学曾听教官讲过，有时飞机、大炮难以摧毁的工事，可充分发挥工兵作用，采用爆破战术。于是提出，可否采用坑道作业，装入大量炸药将日军工事炸毁。军长何绍周采纳了此建议。[94]王景渊为王伯勋的副职，按部队内部的行事规则，如果副职有此想法必定会向主官汇报通气，也可以看作是同一种说法吧。

第二种说法，也主要见诸参战老兵的回忆。且较多的说到美军顾问是向副军长李弥建议的。这一说法的可信性在于，使用近3吨

---

〔90〕方知今在其《爱国将领卫立煌》中即如此认定，第202页。

〔91〕邓贤在其《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中通过所采写的老兵张羽富之口作如此认定，第273页。

〔92〕王景渊：《血战松山》，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96页。

〔93〕转引自云南政协网文章《从台湾回来的远征军老兵》，陈秀峰撰文。http://www.ynzxb.cn/2007/10-31/11032568838.htm。

〔94〕王伯勋：《日军第一一三联队是怎样被歼灭的》，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222页。

美国 TNT 炸药实施爆破，是中国战场前所未有的；老兵张羽富曾提及美军工程专家参与了爆破技术指导，也许只有他们才有从操作层面作如此设想的可能。但荣 1 师工兵连排长鲍直才曾明确告诉笔者：当时他们在施工时，美军顾问很不以为然，认为缺乏专业器材的中国军队弄不成这个事。直到爆破成功，美军顾问才向中国工兵竖起大拇指叫："OK！"

第 8 军军部上校附员李荩萱参加了这次研讨作战方案的会议。他在回忆文章中记述，是受几天前第 308 团第 2 营以对壕作业攻占滚龙坡戊高地战法的启示，有人提出挖坑道至松山脚下以黄色炸药爆破的办法，只是未点明提议者系何人。但他补充了一个细节——当时何绍周闻听后曾说："我军哪有这样多的黄色炸药呢？"李荩萱回答："可请美军顾问斯培德上校想想办法。"于是当即与斯培德上校商议，斯培德允诺，可以从加拿大用飞机运送 10 吨黄色炸药来。几日后，斯培德即将 15 吨炸药从加拿大运到了保山机场。[95] 这个资料，似乎让前述两种说法得到了统一，即战法由第 82 师指挥官提出，美军顾问从可行性层面予以支持。

如前所述，在 8 月 3 日议定的作战方案中，由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担任战场指挥，一并指挥工兵作业及本师第 246 团牵制性攻击，这表明该师在这次作战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个作战方案中，工兵作业无疑是成败的关键。尽管第 82 师师长王伯勋说自己是"坑道爆破法"的提议者，但一个专业色彩极强的战术方案由师长提出，这无论如何是有些蹊跷的。按道理说，应该是由他手下的专业人员建议，由他或王景渊在军的作战会议上提出，才更符合情理。这样，作为师长在追忆往事时从"领导有方"的角度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也是军队里的习惯做法。

莫非，爆破松山的"第一功臣"，另有被埋没的英雄？

2010 年 4 月，贵州读者刘秀麟、宦国铎等人看到拙作初版后与笔者联系，认为爆破子高地"首功"应归于其父——第 82 师工兵连连长刘栋臣。刘秀麟、宦国铎是刘栋臣的女儿、女婿。据他们提供

---

〔95〕李荩萱：《忆松山攻坚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81 页。

的资料：

刘栋臣，字耀卿，原籍湖北武汉，生于1911年，卒于1985年，享年74岁。1933年，刘栋臣入伍在独立第34旅当兵，1938年该旅整编为第82师。抗战期间，随部队亲历淞沪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及滇西反攻诸战役。曾入南京陆军工兵学校军士队受训，后又入南迁至湖南零陵的陆军工兵学校深造（**第16期军官班**）。至松山战役前，刘栋臣已有十多年工兵履历。

1944年7月，当第8军上下为如何打破松山战事僵局一筹莫展时，第82师工兵连连长刘栋臣首先在本师范围内向师长王伯勋提出，可以用“坑道爆破法”颠覆松山子高地。王伯勋认为此计似可行，并支持刘栋臣另选日军的一处小型阵地，进行过一次坑道爆破试验。

关于这次坑道爆破试验，在日方记述中似乎可以找到佐证。据日军上等兵早见正则回忆，他从上松林阵地转移到绪方山阵地时，曾遭到过远征军的坑道爆破：

“绪方山阵地是由我们机枪分队和三十名步兵把守……由于绪方山阵地构筑在绝壁上，敌人攻击困难，一筹莫展，于是变换了战术。他们在崖下往里挖坑道，安放炸药，准备进行爆破。正好那天夜晚是我站岗，听到崖下有响声时，我就将耳朵贴在地上，听出是铁锹挖掘的声音，马上跑去报告分队长浅田高吉伍长。接着，全体人员撤离了阵地。凌晨3点钟左右，巨大的爆炸声中，阵地飞上了天空。由于及时撤离了阵地，我们三十多名士兵安然无恙。”〔96〕

所谓“绪方山阵地”，即1942年日军进占松山之初，以野炮第8中队首任中队长绪方意诚名字命名的那个阵地。据早见正则描述，该阵地“位置在里山至西山阵地途中，紧靠关山阵地的核桃沟上面”，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军和中国军人在腊勐街上给汽车电瓶充电的情景”。2010年春天，笔者与戈叔亚先生依据这些描述，在现地确认了该阵地的位置，是在子高地东北约500米的一处小台

〔96〕［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09页。［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16页。

地，与道人坪子、子高地处在一条攻击轴线上。

关于绪方山坑道爆破，在中日军方战史中都没有记录，但早见正则与刘栋臣的个人回忆能彼此契合。早见正则对爆破时间记忆不详，但大致在7月中下旬。虽然因日军警觉而撤离阵地，此次爆破未造成杀伤，但证明此方法确实可以摧毁坚固阵地。此后约一周时间，在8月3日第8军召开的作战会议上，师长王伯勋提出了这一方案，得到军部长官首肯。

方案开始施行后，王伯勋深感本师责任重大，如能奏效则功劳也最大，于是格外器重、关照刘栋臣。因担心其在坑道施工中发生意外，时时提醒他不必事事亲躬，组织好现场指挥即可，并批评违反要求钻入坑道与士兵一起挖掘运送土石的刘栋臣“真不懂事”。并且许诺，事成之后特批他坐美军飞机去昆明探望妻儿。据刘栋臣回忆，在坑道施工中松山腹部土质松软，但第2排排长王怀清中尉负责一条坑道曾遇到巨大石头拦路的意外情况，当时他令工兵向左右延伸挖一米左右，重新测量定向，避开了这块孤立的石头。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栋臣运用在工兵学校学过的坑道作业测量定向定位技术，准确无误地将计算出来所需要的3000公斤TNT炸药装在了日军堡垒的正下方。

据载，因此方案工程量巨大，一个连兵力不敷使用，第8军直属工兵营及所辖3个师的工兵连共6个连一起投入了坑道施工作业。据荣1师工兵连排长鲍直才回忆，当时参加会议的是连长以上干部，自己是从连长处领受任务后负责坑道作业和爆破技术工作。他记得在现场看到过军工兵营营长常承隧，但不认识第82师工兵连连长刘栋臣，因为隶属部队不同过去没有接触。这也有可以理解之处。

松山战役结束后，刘栋臣立功获奖章，由上尉晋升少校，并升任第82师第246团团部作战班长（**未到任**）。第82师美军顾问卡普隆（**音译**）上尉还特意送了刘栋臣一箱洋酒相贺。师长王伯勋亦兑现了安排飞机让其去昆明省亲的承诺。

刘栋臣的女婿宦国铎还向笔者提供佐证资料，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的秘书汪海屏中校（**中央军校第15期**），曾明确提及：“松山战役打了三个月，阵亡近七千人，最后是82师一个叫刘栋臣的工兵

连长用坑道颠覆法炸掉松山主峰才解决战斗。”这是汪海屏的外孙鲁韧在其网络自传小说中提到的外祖父的说法。[97]鲁韧与刘栋臣的子女素昧平生，说明刘栋臣的事迹当时就为远征军高层所知悉。

此外，虽然第82师师长王伯勋在其回忆文章中没有明确提及刘栋臣对松山爆破的功绩，但后来一直与刘栋臣保持着联系。1959年"审干"运动中，时任贵州省交通厅长的王伯勋还曾为刘栋臣写过证明材料，其中写到："刘栋臣1943年至1945年在伪第8军82师任伪师直属工兵连连长，当时伪8军在滇西担任对日本敌人的反攻，伪82师防守怒江，刘栋臣担任战场上的一切作业……"虽然所写不够具体，但考虑到在当时政治背景下这类证明材料的性质——是基于"脱罪"而非"表功"，自然有可以理解之处。

刘栋臣的子女在多篇博客中，向笔者转述了父亲昔日零星的回忆，且谈到了很多施工、爆破的专业问题。比如，军方史料中记述，作业之初是4条明壕平行推进，而后在"第一、第二壕之间及第三、第四壕之间各做坑道一条"，以两条坑道钻入山腹，其用意何在？刘栋臣生前曾向子女解释："双堑壕对接相连后进行一条坑道的作业，其科学性在于：一条是交通壕，另外一条用来存放从坑道中挖出还需要用于回填密封坑道的泥土袋，这能大大缩短传递运输距离，解决在敌人眼皮子底下不宜投入过多兵力的问题"。这样的技术细节，没经历过的人显然是编造不出来的。[98]

需要解释的是，坑道爆破法绝不是松山战役中才诞生的战术。可以说，火药发明不久，一些国家的军队就将古老的坑道工事与爆破手段相结合，用于摧毁城墙和堡垒。也许区别之处仅仅在于使用规模的大小。也许，当我炮兵和航空轰炸未能彻底摧毁日军堡垒，远征军将士一次次攻击均无效果之际，自然会想到爆破这个古老的战术手段。事实上，许多攻击部队都尝试过爆破筒、炸药包这些常规方法，奈何日军侧防火力密集、堡垒坚固，不是靠不近，就是炸

〔97〕据鲁韧网络小说《青春祭坛——"文革"中的血色青春》：http://bbs.ifeng.com/viewthread.php?tid=4261415。

〔98〕刘秀麟、宦国铎：《松山坑道大爆破的历史真相》，载《贵州文史丛刊》2013年第2期；及宦国铎新浪博文：http://blog.sina.com.cn/s/blog_656bdd320101d78h.html。

不坏。在付出巨大牺牲之后，一线士兵悲愤无奈之际，自然会产生“要是能把整个山头掀个底朝天就好了”的念头。这呼声一经产生，必定会通过刘栋臣这样的专业军官，逐级传递到最高指挥层。也许，这才是子高地“人造火山”的酝酿产生过程，它凝结的是集体智慧。而它最初的种子，一定萌生于那些蹲在弹雨纷飞的战壕里悲愤交加的士兵。

第 11 章　八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8 月 20 日—8 月 27 日。

指挥：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

主力：荣 3 团、第 245 团、第 308 团、第 307 团。

进展：夺取松山子高地。

(参阅附图 3、附图 7、附图 29)

8 月 20 日：D+77 日

大爆破

爆破松山子高地，后来成为参加此战的老兵们一生最感光荣和自豪的事，值得浓墨重彩予以描述。对此，中日双方均留下大量记述，笔者将从各种角度予以呈现。

据第 8 军工兵营第 1 连第 3 排老兵张羽富回忆：8 月 20 日早上，天气突然放晴了，好像老天有意要让大家开开眼界。太阳从怒江东岸升起来，把松山子高地照得通红。我炮兵照例先打一通炮弹，步兵又佯攻一阵，目的是把更多的敌人吸引到子高地堡垒中，使爆破取得最大的效果。[1]

子高地上的关山阵地，由日军步兵第 4 中队长辻义夫大尉率兵把守，最初有步、炮兵七十多人，经过连日激战，此时已减员约一

〔1〕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 275 页。

半。这天早晨，在我军炮击间隙，战壕里的日军卫生兵石田富夫在查询有无受伤人员时，看到不远处的鸟饲久一等兵呆呆地数着落在头顶的炮弹数，当他数到2000发就再没数下去了。山上一棵树也没有了，交通壕也被炸塌，没有藏身之处，日军士兵只能趴在有坑洼的地方躲避。[2]

这天，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都赶到了松山，与几位美军顾问在竹子坡指挥部眺望子高地。[3]

据1947年9月昆明《民意日报》记者马志华撰文《爆破松山纪实》载：

预定于9时整点火。8时40分，何绍周军长以电话令知荣3团迅行向后撤离爆破圈的危险界外，枪炮声亦随之逐渐冷落。在整个战场的我军，目光都集中在子高峰，以同样紧张之心情，在期待着这一奇迹的爆发……

在分针刚踏上9时整的时候，当前一切并没有什么改变。经电话向前方询问，始悉荣3团的攻击部队，于9时未撤离完毕，致未点火。[4]

原来，荣3团部队的“佯攻”之戏演得过于逼真，以至接敌太近未能及时撤下。

点火位置位于子高地东北坡下的荣3团指挥所，距子高地约500米。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陪同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来到这里，见到了团长赵发毕和从保山机场刚归建的本团第3营营长陈载经等，大家格外高兴。松山子高地之敌劫日已定，又到了“荣誉团”官兵大显身手的时机了，每个人的神情都很兴奋，连日来受挫的沉闷气氛一扫而空。掩蔽部内，放着10部用电话机改装的点火机，军工兵营营长常承隧站在一旁默默地吸烟。通常爆破只需一两部点火

〔2〕［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46页。
〔3〕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75—276页。
〔4〕转引自段培东《松山大战》，第239页。

机，今天为了防备不测预备了10部。赵发毕、崔继圣等人也相继走到一部点火机旁，握住了摇柄。[5]

在掩蔽部外，还备份了一套常规的导火索引爆装置，军工兵营第2连第1排中士班长罗长庆奉命点火。他回忆说："这是150厘米长的缓燃导火索，每秒钟燃1厘米，就是说，点燃火后，我有两分半钟飞跑着离开点火点，所以我不慌。我身后是我们连朱连长，他和何绍周军长对过表，分秒不差的。他背着电话机，随时待命叫我点火。我蹲在坑道里，一手捏着导火索，并把火柴头按在导火索上，一手捏着火柴盒。只待连长做一下手势，我就嚓的一下，叫狗日的日本鬼子化成一堆灰！"[6]

9时15分，军长何绍周在竹子坡通过电话下令："起爆！"老兵张羽富看到，工兵营长常承隧猛吸几口烟，然后扔掉烟头，手有些颤抖，狠狠摇动引爆装置。与此同时，荣3团团长赵发毕、崔继圣等人也用尽全身的力量猛摇手柄。[7]在掩蔽部外面，班长罗长庆也随着连长的口令点燃了导火索，而后转身向后跑。

老兵张羽富说，开始似乎没有动静，过了几秒钟，大地颤动了一下，接着又颤动几下，有点像地震，就见团指挥所掩蔽部的木头支架"嘎吱嘎吱"晃动起来。站在外面的荣3团第3营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看到，一股力量冲天而起，把主峰整个大碉堡托起数米歪斜地栽倒在山顶上。同时，一股浓浓的烟柱从子高地蹿起来，烟柱头上戴一顶帽子，很像多年以后在电影里看到的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浓烟中可见日军尸体、树干、汽油桶、枪炮，无数的军用物资和装备，漫天飞舞。烟柱足足有一两百米高，停留在半空中，久久不散。声音传过来时，却不及想象的大，还没有飞机扔炸弹震耳，有点像远方云层里打雷那种闷响。

崔继圣说，这时掩蔽部内外的官兵爆发出激动人心的口号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通滇缅公路！打回老家去！收复祖国的一切

---

〔5〕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3—164页。

〔6〕段培东：《狱中琐记》，转引自作者所著《松山大战》，第239页。

〔7〕杨金继2002年10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失地！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中国胜利万岁！……”大家互相紧紧拥抱，每个人脸上都淌着热泪。[8]

据荣3团第3营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回忆：按预订方案，当日由荣3团担任主攻，第1营（营长陈岳峰）第2连为突击队，已进入起跑线匍匐待命，第4连跟进；第3营（营长陈载经）为预备队。在爆炸后爆音未落之际，第2连官兵不顾烟雾毒气，随着冲锋号声一跃而起，呐喊着急速冲上主峰，把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插上了子高地。其时烟尘滚滚，天昏地暗，虽然太阳才出来一竹竿高，但飞扬的尘土遮天蔽日，像黄昏后一样。山顶上的土是松软的，开着许多大裂缝，有不少地方土还在往下落，已经不见敌人踪迹。[9]

几分钟之后，被炸蒙了的日军才缓过神来，西北侧地堡的日军拼命打起枪来。据活下来的日军士兵石田富夫说，爆炸后有些没炸死的人拼命逃了下去，遭到了联队副官真锅大尉的训斥，他说："我就是躺在担架上，也还要指挥你们战斗！"于是，这些日军士兵只好又掉头向子高地反扑。[10]荣3团第1营与敌展开激战，约1小时30分后将敌击溃。[11]

当荣3团在爆破后向子高地发起冲击的同时，在南面的部队也同时向小松山发起策应性攻击。第245团突击巳高地，受巳高地反斜面之敌猛烈火力所阻；另一部突击辰高地，遭到巳高地及午、未间无名高地之交叉火力所阻止，步兵伤亡很重，未获得战果。[12]

第307团向大寨门户小松林高地进攻，但因仰攻并受敌侧防火猛烈射击，仅占领辛、未高地间敌炮弹库一座。第308团向未高地突进，至中午将未高地炮车路以左地区日军阵地完全占领，歼敌多名，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0支。在未高地南端有一座堡垒，经我军用火焰喷射器喷烧后，查无敌人。但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

〔8〕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4页。
〔9〕杨金继2002年10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1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46页。
〔1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1页。
〔1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2页。

载：数日后，凡通过此地近旁者，多数被射杀。复派人行严密之搜索，始发现该堡垒之下层有坑道式掩蔽部4座，有敌5人，携轻机枪1挺据守其内，于是又集中火力予以击毙[13]——松山战事所以如此艰难，就是因为日军多是这些顽抗到底、剿杀不尽的“鼹鼠”。

荣3团第1营迅速打扫子高地战场，发现有4名敌人仍缩在被半掩埋的道沟内活动抵抗，因为无法活捉，我军士兵只好用土囊把道沟填死，将其闷毙在里面。[14]这次大爆破的歼敌总数，我方后来普遍宣传为70多名，这是最初据守关山阵地的日军总数，其实经过连日激战此处日军已经死伤过半。在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所著《滇缅公路》一书中提供了一个数字，为炸毙日军42名，[15]笔者感到比较可信，这很可能是当时美军顾问记录的结果。据早见正则回忆，当时他所在第1机枪中队荒木小队的浅田分队长、桥本芳行上等兵、有吉成喜兵长，还有一个曾在诺门坎战役侥幸活下来、经常叹气的白川正广兵长等人，都在这次大爆破中被活埋了。爆坑周围地面散落可见的日军尸体为9具，其中有大尉及准尉、曹长各1名；因关山阵地只有一个大尉，可确定是辻义夫大尉无疑。[16]但9人浑身上下没有一丝血迹，可知都是被强震震死。所以荣1师工兵连排长鲍直才后来感慨：“爆破子高地，担任攻击的步兵没有流血，守备的日军没有流血，就是我们几百名工兵在坑道里流了17天的汗。”[17]

此外，在爆坑四周捡拾到日军速射炮1门，轻重机枪各1挺，步枪22支。最意外的收获是，还从浅层浮土中扒出了5名被震晕的日军士兵，因口鼻有微弱气息，知道是活的——这是开战以来我军首次抓获俘虏。5人浑身泥土，身上也不见伤痕。官兵们背起5名

---

〔1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9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2页。

〔1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1页。

〔15〕［美］多诺万・韦伯斯特：《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第275页。

〔1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1页。日军中队长辻义夫之姓氏“辻”，为日本自造汉字，当时中方一般认作“迁”，而误写为繁体“遷”。

〔17〕鲍直才：《不流血的战斗——工兵流汗克松山》，载黄埔同学会《黄埔杂志》2007年第1期。

“土行孙”下山时，其中一名突然苏醒过来，开始拼命挣扎横撕乱咬，被气愤不过的我军士兵“格毙”。[18]

在日方记载中，对这次大爆破的效果评价普遍有一种轻描淡写的味道。在其公刊战史和个人战记中，都说这次爆破所造成的伤亡并不大，大部分士兵是被我炮击和突击队用火焰喷射器烧死的。甚至在日本随军记者藤井重夫笔下，连确凿被炸死的指挥官辻义夫大尉也只是受了重伤，且能“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19]。这无疑是极其荒诞的。据资料，辻义夫大尉时年37岁，曾是日本福冈市筑紫中学的一名国语教师，昭和14年（1939年）第二次应征入伍。在我军反攻前的平静时期，“是一个面对美丽风景善于作诗的军官”，与第56步兵团军医中尉丸山丰常一起切磋诗艺。[20]“诗人”辻义夫在松山驻扎近两年的重大发现是：雨季洪水暴涨时山下的江才堪称“怒江”，旱季波澜不惊时叫“潞江”为宜。

上午晚些时候，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随团长赵发毕、副团长陈运昌和团部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登上子高地。他们看到爆破造成两个漏斗状大坑，之间间隔约10米，右边一个直径约40米，左边一个直径约30米，深度有15米，破坏面积约为山顶的三分之二。方国瑜在著述中分析说，“以3吨黄色炸药之爆破，为首次尝试，本预期将子高地顶部完全破坏，实际仅爆开两大漏斗坑，由此知土壤之爆破，其结果颇难预定，盖其气体之发展方向，专向较松处突击耳。”[21]

由于多次对子高地攻击失利，这次指挥官们在现场仔细观察了一番。所幸还在废墟里找到了一份日军文件，内有日军阵地防御配备要图，经研究发现：日军在子高地顶及四周构筑多个五边或六边形堡垒，全有坚固掩盖，不但向四周开设有射孔，而且向山顶还有“倒打”火力射孔，所以以往我步兵占领顶点后，立刻陷入敌火力辐射，惨遭杀伤。[22]这表明，在迫不得已时把我军放进阵地内再打，

---

〔1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1页。

〔19〕［日］藤井重夫：《悲风　缅甸战线》，第202页。

〔2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47页。

〔21〕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1页。

〔2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3页。

是日军曾预先考虑的战术。

在下山途中，崔继圣他们遇到押送4名日军俘虏下山的官兵。当时俘虏都已经苏醒，看起来已经接受了命运的安排——日本兵往往如此：当有一口气时，在极强的从众心理左右下随大流拼死顽抗；一旦被俘则听天由命，因为“耻辱”已然降身，逃跑回去也是死路一条。崔继圣问其中一名日俘：“中国太君[23]好不好？”见中国“将校”发问，这个日俘马上愣头愣脑地回答：“中国太君大大的好，就是早晨我们正在咪西（吃饭），嘣的一声巨响，不好！不好！”团长赵发毕和美军联络官温夏克少校都忍不住笑起来。[24]后来这4个日俘被押到山下的腊勐街，由我军与美军联络官一起审讯，留下数张照片。其中面貌凶悍的两个，脚踝处还套着铁链，想必是曾经极力挣扎。据4人口供，子高地共有守军辻义夫大尉以下75人，除被俘外均被炸毙。[25]

但是，这4个留下清晰影像的日本兵，却没有在品野实、太田毅的著述中提及，他们战后寻访到从松山战役中活下来的十余人中，没有这4个人。笔者分析认为，这4个后来被我从重庆的战俘营释放的日本兵，回国后可能因巨大的社会压力，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沉默和自行人间蒸发。

据崔继圣说，傍晚时分，荣3团团长赵发毕下令第3营接替第1营防务，据守子高地。官兵们立即在爆坑四周修筑工事，以防敌人反扑。但爆破后的土垒十字镐一挖即碎，难以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26]

第一次反偷袭

夜间偷袭，为日军惯用战术。新28师“一战松山”时，在竹子坡、阴登山两次遭遇偷袭，十天前又发生了日军“挺身爆破班”夜

〔23〕“太君”系日语“队长”一词的汉语音译。日军从分队长到联队长均可称“队长”，“太君”即用来泛称指挥官。在等级观念极强的日军中“官大一级压死人”，士兵普遍渴望获得晋升。普通日军士兵常让中国老百姓称其为“太君”以满足虚荣心。

〔24〕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4页。

〔2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97—98页。

〔26〕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4页。

袭我炮兵阵地的事。占领子高地后的两个夜晚，连续上演了这一幕，发生了一段惨烈战事。

据日军战史载："20日夜，金光少佐从各阵地抽调兵力60名，任命从本道阵地撤出的只松茂大尉为指挥官，令其于当晚夜袭夺回阵地。夜袭一度成功……"〔27〕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的回忆是：当晚，日寇以数百人来逆袭我第3营，激烈的枪声在子高地彻夜不停。第3营刚到松山地形不熟，夜间敌人多次反扑，该营经过艰苦奋战，最后渐渐不支，退下子高地。

在荣3团指挥所，崔继圣看到退下来的第3营营长陈载经被士兵架着走向赵发毕，口中只能低声说："团长，我……"难过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浑身都是泥和血，把绿色的军装染得通红。据说，陈载经原来是师部中校副官主任，是他自己主动请求下团带兵的，战斗中他已经尽了全力，团长命令他去坚守现有阵地待命。〔28〕

前面曾说，傍晚，荣3团团长赵发毕曾令刚赶到战场的第3营接替第1营据守子高地。这是崔继圣的说法，应是考虑第1营在上午的激战中有所消耗，需要休整；而第3营是首次参战的新生力量，应该顶上去替补。但在第3营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记忆中，当时子高地仍是由白天攻上去的第1营第2连据守，后来第3营是冲上去增援第1营的。〔29〕

时为荣3团第1营第2连下士班长的湖南浏阳籍老兵崔化山的回忆，佐证了这个说法，他当晚参加了这次反偷袭。他说：

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了，我们全发了疯，不顾死活。不少鬼子被我们打中，倒下去滚几滚，又挣扎着向我们冲来，硬是要和我们拼命。我们也被鬼子的疯狂劲挑得性起，在战场上拼命，谁不爱？！于是我们也冲出战壕，和鬼子拼起刺刀来。

人，一有了拼命劲就力大无穷，蹦跳腾挪也灵活得很。我一枪

---

〔2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3页。[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3—194页。

〔28〕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5页。

〔29〕杨金继2002年10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按住想卡他的脖子，不提防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断了。可见狗日的鬼子咬得多狠！十指连心，我眼泪都疼出来了。心一横，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七八下，硬将这个日寇的脑袋一直敲烂到脖子才罢休……

打仗打到发疯卖命的时候，有一种痛快感，不经过无情拼杀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出这种滋味的。好比捉住一条大鱼或按翻一头马鹿，你能让它跑掉吗？我做人一生，最大的幸福，最自在、最解恨的时候，就是在松山用手榴弹敲鬼子脑袋的时候，时隔几十年，想起那一幕，我还浑身是劲！[30]

第3营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的回忆是：

当夜，日寇纠集了200余人[31]冲上子高地，企图夺回制高点。我所在的第7连王富国连长接到张营长[32]命令，带了第1、2排官兵冲上阵地与第2连官兵并肩战斗。在混战中，王富国连长麻痹大意，手中拿着一根藤杖，没有带枪，在战壕中与日寇当面相遇，被日寇连射两枪击中腰部，壮烈牺牲。在连长身边的传令班上士刘班长见鬼子又向自己瞄准，一跃而起把鬼子压在壕底，双手紧紧箍住鬼子的喉咙要掐死他。鬼子难以翻身，竟然拉响了腰上的手榴弹，一声巨响，刘班长与鬼子同归于尽……有幸，第2连和第7连第1、2排战士奋勇搏斗，冲锋枪与手榴弹发挥了最大的威力，将鬼子逐出了阵地……

副连长杨金继说，自己后来才知道，第2连和第7连这20人一直坚守在阵地上，退下去的第3营其他官兵并不知道，报告团长赵发毕说把阵地丢了，上面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这其实是一个误传。

杨金继本人当晚没上子高地，而是奉命率领本连第3排在松山右翼山谷中设立排哨警戒，防范日军由小道过来偷袭我军后方。[33]鉴于日军已屡次行此战术，我军各级指挥官终于对此引起重视，加强了夜间反偷袭准备。

---

〔30〕段培东：《抗日军人采访记》，转引自其《松山大战》一书，第250—251页。

〔31〕日方资料记载为60余人。

〔32〕原文如此。第7连属第2营，营长应为陈载经。

〔33〕杨金继2002年10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8 月 21 日：D+73 日

据日方记述，前夜偷袭子高地的日军，是 21 日天亮时分才被我军击退的。当时我军予以了炮击，偷袭日军在阵地上无藏身之地，手榴弹也已经用完。面对我据守部队强大的火力，想短兵相接以肉搏战夺取阵地已经无能为力，只好撤下了阵地。[34]方国瑜著述亦印证："(21 日）拂晓，增援围歼，将敌击退。敌遗尸 17 具，内有指挥官一员。"[35]

荣 3 团第 3 营第 7 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说，这天早晨，他接到营长电话，命其速带第 3 排返回营部。到达营部后，营长说：王富国连长已在昨晚阵亡，由你代理连长，率领第 3 排立即进入阵地，加强第 2 连阵地守备。并告知第 2 连的两个排长也于昨晚牺牲了。杨金继带领第 3 排迅速进入子高地阵地，立即清点人数。见第 2 连尚有一名排长，命令他将所有士兵编为 3 个班，防守左翼；将自己所带的第 3 排 3 个班放在前沿阵地；又将本连原第 1、2 排剩余士兵合编为一个排，作为预备队，由第 2 排排长指挥。第 1 排排长由于昨晚受伤，送往山下野战医院。令所有士兵立即修建工事，准备再战。[36]

然而，在我方不少当事人的回忆中，却认为 21 日日军已成功夺占子高地。如，第 307 团副团长陈一匡的回忆："混战到 21 日拂晓，荣 3 团第 3 营逐次退下山来。这时军长何绍周来电话责令该团团长赵发毕，限 22 日必须夺回子高地。"[37]

荣 3 团上尉副官崔继圣认同这一说法，他的回忆是：21 日清晨，代理军长李弥[38]打来电话狠狠地责备了荣 3 团团长赵发毕，说："赵发毕，松山就是赵发毕，赵发毕就是松山！你记住，有你就有松山在……" 命令我团把全部力量拿出来，不惜任何牺牲代价，

---

〔3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94 页。

〔35〕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82 页。

〔36〕杨金继 2002 年 10 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37〕陈一匡：《滇西反攻战第八军攻克松山纪事》，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39 辑滇西抗战，第 246 页。

〔38〕未说明在军长何绍周在位的情况下，缘何让李弥代理。

必须在22日夺回子高地。并告诉赵发毕，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将到你团督战。[39]

曾任第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的周昶撰文记述，李弥当时对赵发毕说：子高地爆破后由赵发毕团第3营占领，已经长官部报到重庆统帅部，各地报纸将刊登此重要新闻，全国全世界皆知松山子高地光复。这次，你挑选敢死队员再攻上去，每人发给奖金一万元，并将其家属情况记载下来，牺牲实属光荣，由部队申报抚恤，由地方每年发抚恤费给其家属，让敢死队员无后顾之忧。你必须挑选年轻力壮行动机灵之人，身弱智差者，不能让其送死。我派第82师王景渊副师长到你团督战并颁发奖金，奖金发毕即开始攻击。[40]

据崔继圣回忆，8月21日傍午时分，王景渊副师长来到荣3团指挥所，随行人员还抬着几个大箱子。王副师长到后，立即召集全团官兵组织敢死队，当时官兵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参加敢死队。第3营陈载经营长首先报告说，子高地阵地是自己丢掉的，就是脑袋掉了也要夺回来。并表示："我是全团唯一的中校营长，要起模范作用。"最后决定由陈载经为敢死队长，挑选30人组成敢死队。人员选定后，王副师长令随员打开几个大木箱子，里面装满了"关金票"，[41]而后逐一向敢死队员分发。王副师长说，今天每人暂发5000元，夺下子高地再补发5000元。每人还发了一张蓝包袱皮，让大家包好关金票背在身上。最后王副师长训话："我们是寸土必争。今天每个敢死队员都具有坚强的爱国精神，和不怕苦、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敢与顽敌拼死搏斗，夺回子高地。这种精神值得敬佩、敬仰。祝你们马到成功，最后胜利属于我们！"

据说，在场的美军联络组的官兵们见状大为感动，都争着也要参加敢死队。荣3团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要求，气得联络官温夏克少

---

〔39〕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5页。

〔40〕2005年3月28日《云南日报》文章《松山主战场抗日胜利纪实》，周昶撰文。

〔41〕关金票全称为"海关金单位兑换券"，原本仅作缴纳关税之用。1927年世界金价飞涨，银价暴跌，民国政府为维护关税收入，决定征收关税由银两制改为金币制，以0. 601866克纯金作为标准计量单位。后来为方便使用，于1931年5月1日开始，发行了一组拾分、贰拾分、壹元、伍元、拾元5种面值的关金票。1942年增发贰拾元、伍拾元、壹佰元、伍佰元面值的关金票，并规定可按1比20的比例兑换法币，与法币共同在市面流通。

校等人挥舞着拳头叫嚷："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参加敢死队，总叫我们在后面？我们是来打仗的，消灭日军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不是来吃闲饭的……"最后，只好决定由温夏克少校和崔继圣率领美军官兵以3挺高射机枪为掩护队。[42]

傍晚5时，第8军收到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发来的"未马未"电，云："闻昨日攻下子、未高地，甚慰。希于本月26日前能将松山克复为要。"[43]此时，子高地得而复失之事尚未敢上报，卫立煌就已对拿下整个松山规定了限期，第8军指挥官的压力可想而知！何绍周、李弥当即转饬各部队，要求务必遵令加紧攻击，依限达成任务。

据方国瑜著述："21日夜12时，敌复行反攻子高地，虽经守军竭力拒止，敌前仆后继，豕突不已，荣3团第3营营长陈载经（负重伤）以下伤亡几尽。"[44]由此可知，由第3营组成敢死队后，当晚即攻上子高地与日军激战。但日军的这次"反攻"，可能是由残留在阵地上的日军发起的，还不属于日军战史所说的"第二次偷袭"。

当日，第308、第307两团将滚龙坡及己、庚高地守备任务交刚开至战场的第309团第2营，而后继续向未高地及小松林高地间之敌攻击。该处设有敌坚固掩蔽部3个，周围环绕铁丝网数层，守敌约40余人。因此处距大寨极远，可谓核心阵地的前沿屏障，故日军拼力死守，对我攻击部队妨害甚大。我军遂于前夜将一门山炮推进至己高地附近，21日10时许直接瞄准射击，毁敌掩蔽部两个，未死的日军均遁入另一座掩蔽部内。这时，几天前曾夜袭大寨缴获日军联队关防的第307团攻击队班长张学成等两人，冒着敌机枪火力匍匐穿越铁丝网，向敌掩蔽部侧后迂回，而后向敌堡投入手榴弹，毙杀日军7名，其余30余人纷纷向炮车路以西逃窜，被我全部射杀。12时许，第308、第307两团将预定敌阵地确定占领，两团阵线已经连成一片，以弧形包围态势虎瞰大寨。[4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的记述为：当日，第307团与日军在大寨外围激战终日，占领

---

〔42〕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5—166页。

〔4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5页。"未马未"指8月21日13时至15时。

〔44〕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2页。

〔45〕《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堡垒5座及弹药库两座，并击毙日军中尉军官一名。[46]

8月22日：D+79日

第二次反偷袭

据日军战史载："21日夜，金光少佐将各阵地守备交给伤员，集中健康者约80名，交野炮第3大队本部观测员木下四郎中尉指挥，于22日凌晨4时（当地时间为凌晨2时）突入关山阵地，再次夺回该阵地。然而，黎明时分阵地遭到炮火猛击，守兵相继倒下，最后只剩十余名。金光少佐从音部山目睹此状，决定令守兵撤出，放弃关山阵地。"[47]

此为日方记载的第二次偷袭。因为失败，有些轻描淡写，只强调我军炮火之威，不提我军官兵勇猛的战斗精神。由此也可看出，当日军失去坚固阵地依托后，在我强大炮火优势和步兵突击下，其作战能力将大大下降。

日军指挥官木下四郎中尉在这次偷袭中被打死了，他不过是个炮兵观测员，指挥步兵突击属于赶鸭子上架。战后，很多日本人将此"木下"与后来活着逃出的炮兵中尉木下昌巳搞混了，因为两人不仅同姓，还都是炮兵中尉。据木下昌巳回忆，他后来逃出后，日本国内新闻媒体报道说"木下中尉奉命逃出"，木下四郎的妻子听后特别高兴，以为是自己的丈夫，却迟迟不见回家。后来木下昌巳去拜访她，令她痛苦不堪……[48]

方国瑜在其《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中记述，此战为整个战役中空前惨烈的一次：

22日拂晓即成混战，情形不明。荣3团抽集兵力以行恢复，并

---

〔4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5页。
〔4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3页。
〔4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4、305页。

以炮火注于（子高地）顶上。8时许，该团团长赵发毕集结30余人，并将其特务排10余人加上，亲率反搏。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亲督于后，于9时开始攻击。旋见敌三五成群，向反斜面逃逸，当即指定炮6门，于反斜面散布射击，敌纷纷滚下辰高地后谷地内溃逃者不下四五十名。当我步兵攻入至顶点之时，又见我步兵六七人由反斜面向山顶猛突，前后夹击，残敌拼死不退者约三十余名，旋即崩溃。我于10时复进至原阵地，又发现前未经破坏之大掩蔽部一座中，有我荣3团第3营连长1名、士兵12名据守其中；该掩蔽部口外，敌死尸堆积20余具。再清查阵地内，敌我士兵互相拥抱而死者共62对，满布壕内。反斜面上，肢离体解，肠肺狼藉，布满壕下，壮烈空前，惨不忍睹。[49]

原第1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周昶在回忆文章中提及，在7月5日战斗中，被李弥从上士直接提升为上尉的军部司号长杨敬财，在此战中再次表现出非凡的英勇行为。当时，杨敬财作为军直人员与美军联络官来阵地观战。冲锋开始后，敢死队员一冲上去，即被日军射中3人。杨敬财见此，怒上心头，无暇请示，就向守阵地的一位班长要走冲锋枪1支、手榴弹6枚，迅速冲到敢死队员身旁蹲下，而后向一个大土垒后投出两枚手榴弹，马上听到日军发出几声惨叫。原来日军枪手躲在大土垒后，观战时杨敬财早已一目了然；随后又连投手榴弹4枚，将土垒后的日军炸得血肉横飞。杨敬财乘势冲上去用冲锋枪向土垒后的日军猛烈扫射；这时团长赵发毕也亲率20余人冲上去增援，但不幸负伤。此时，杨敬财看到陈载经营长已负伤在垒后躺着，于是振臂一呼，肩负起阵地指挥，带领敢死队员击毙不少日军。我突击队士气陡涨，乘势向敌分散开火，转瞬间子高地之敌全被歼灭。[50]

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是作为掩护队在敢死队之后冲上子高地的，其时为当日早晨。他说：

---

〔49〕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2页。

〔50〕周昶：《松山主战场抗日胜利纪实》，载2005年3月28日《云南日报》。

我和美国兵都是第一次上最前线，显得特别激动和紧张。我们到达大炸坑前，不禁被惨状惊得话都说不出来，四周密密麻麻地堆放着敌我双方的尸体，有的互相扭打成一团，你抱着我的头，我卡着你的脖子，你抓着我的大腿，我又捏着你的下身，有的甚至还在蠕动、呻吟！被死者的污血浸透的土壤发出阵阵腥臭和硝烟味，仿佛在哭泣和燃烧。

我们只得拖开尸体，把高射机枪架为平射。只见陈载经营长浑身泥血，大腿、手臂都负了伤，躺在地上说："敢死队冲上来时，就发现战壕里有厮杀声，吼叫、搏斗互相叫骂声，原来是第8连高建国排长率领着18个[51]弟兄，一直坚守在炸坑里没有撤出，多亏他们与敢死队里应外合两下夹攻，才再次夺回子高地。"[52]

由此可知，在21日白天，子高地上一直有我军坚持。这印证了第3营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的说法，即21日子高地并未丢失，除了他所说的20日第一批突入的第2连和自己带的第7连官兵外，还包括陈载经所说的第8连高建国排长率领的这十几个弟兄，都曾坚持在子高地的堡垒中奋战。杨金继本人是在21日夜的激战中腿部受贯通伤，指定60迫击炮排长接替指挥后，撤下阵地的。综合以上资料可知，自20日9时30分算起，荣3团部分官兵已在子高地与日军浴血厮杀近两个昼夜，却不为阵地下的指挥官所知。也许，这就是惨烈战事所造成的记忆混乱——倘若一位士兵能脉络清晰地描述一场激烈的混战，要么他是一个旁观者，要么就是在编造谎言。

崔继圣回忆，正当陈载经指着身旁的尸体和满地的关金票欲说无言时，他忽然抬头看见一股日军从西北方向的丑高地扑过来，像一群恶狼，来势极为凶猛。崔继圣心里一惊，暗忖阵地上经过恶战剩下的敢死队员，只有十来个，温夏克少校和自己带来的美国兵掩护队，是否能顶得住反扑之敌？这时，掩护队架起平射的高射机枪

〔51〕军方资料记为12人。《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6页。

〔52〕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6页。

已经响起来，大口径子弹打在前面被烧焦而东倒西歪的树干上，立刻翻出白嫩的树心，显得格外醒目。冲在最前面的日本兵开始一个个倒下，后面的人却没有后退，而是踏着尸体继续冲过来。有几名日军直冲到离崔继圣几米的地方，才猛然栽倒在地，四肢开始抽搐，伤口一股股向外喷吐着污血……崔继圣突然意识到：他们根本不是来争夺阵地，而是因绝望而来集体自杀的！

直到最后一个鬼子兵倒下后，机枪声才逐渐稀疏。荣3团的步兵高兴地拍手叫好，许多人回过头来看着操纵高射机枪的美国兵，伸出手竖起大拇指向他们示意。[53]

回头来看，为何我爆破并占据子高地后，日军仍能一次次疯狂反扑，并与我形成胶着局面呢？因为，我军占领子高地之初，仅利用爆破坑边缘，构筑了简单工事。因时间限制，配置不周密，所以日军能轻易突入我阵地内，造成混战状态；且日军深知子高地为整个松山防御体系的锁钥，生死攸关，所以拼死力图恢复。经过两度争杀后，这时我军才有机会构筑堡垒，22日白天共完成了5座，火力互为侧防。[54]

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载，士兵们在构筑堡垒时还有一些颇实用的创意，如：在射孔外张铁丝网或绳索网，使敌手榴弹不能投入；在堡垒顶部设带盖的活动天窗，一旦敌接近后，可打开天窗投掷手榴弹；堡垒盖材用铁索相互连接，并打桩固定，以防敌接近后揭开盖材投入手榴弹……[55]

经过惨烈战斗后我兵力已显紧张，所以加强了戒备，决心不让日军再接近阵地。22日夜，日军组织30余人终夜反扑，但在我军堡垒火力压制下，始终无法接近，被我击毙20多名。此时，在松山上敌我两军角色易位，敌攻我守，日军的表现大大逊色。直到23日拂晓，日军终于放弃了努力退去，荣3团牢牢地占据了子高地。[56]

---

〔53〕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7页。

〔5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7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3页。

〔5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7页。

〔5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7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3页。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第18页。

超链接 18：松山战役中日士兵战斗精神比较

第 11 集团军司令宋希濂在战后总结滇西反攻作战经验时曾说：“对于这次反攻能够获得胜利的原因，我归结于：……二是官兵的坚强斗争意志。自开始反攻到战争结束，军队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我军向筑有极坚固的据点的敌人实施攻击，伤亡累累，但是官兵前仆后继，奋勇直前。当时，第 11 集团军美国联络参谋组吴德上校对我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的确，官兵们所以有这样旺盛的士气，这样坚强斗争的意志，这样愿意忍受恶劣气候和给养匮乏的痛苦，主要是他们认识到所参与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战争。”[57]

诚然，为捍卫民族生存权而战，是远征军将士勇气和斗志的源泉。然而，它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战场上的杀敌勇气和战斗精神。美军顾问吴德所言“中国军队忍受困苦的精神”，也许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士兵与生俱来的素质。然而作战中的勇敢精神，却要建立在思想的高度自觉上。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也许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才得以实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即为例证。[58]考察中国远征军，笔者注意到一个特殊因素，就是装备了美式先进武器、改善了补给方式后，中国士兵的自信心获得极大提高，对日军由惧怕转为轻蔑。这种战场上的“技术革命”，给中国士兵带来了从思想到行为的全新变化，正如驻印军一位美军联络军官所言——“对于那些只要显示出自身能力便能有效击败的敌人，中国人是从不畏惧的。”当时在远征军部队提出了“以火力压火力，以速度压速度”的口号，这是抗战以来所没有过的，甚至是同时期在豫湘桂战场一再节节溃败的东线国民党军队不敢想象的。因此，拥有先进战斗力及与之相伴的先进战术意识，建立了较强的自信心，也

〔57〕宋希濂：《远征军在滇西的整训和反攻》，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69 页。

〔58〕战后，一些日本人曾沿用其对于“大东亚战争”的言说模式，评价朝鲜战争为一百年来亚洲黄种人第一次打败西方白人。亦即，中朝军队完成了其“二战”中未能实现的“理想”。

许才是生成远征军官兵坚强战斗意志的直接因素。在工业落后的中国，要靠对精神的强调来弥补物质力量的不足（**日本面对美英作战时也不例外**）；但对精神力量的依赖应该是有限度的，否则就会容易压制军事技术的改进，而这是致命的。事实上，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精神才是真正质朴而可靠的。

另一个因素就是督战队的作用。即便在当时的国民党军中，这也是一个敏感话题。在远征军将士的回忆中，有些人承认它（**以士兵居多**），有些人则说自己的部队没有。很多远征军老兵说，前面是敌人的机枪，后面是督战军官的冲锋枪，与其退下来死，不如冲上去死，也许消灭了鬼子还能捡条命回来！这是冲锋在第一线的士兵们的典型心理。这情形在现代战争中已不常见，然而，它曾经是在漫长岁月中延续下来的"战场法则"。而且，很难设想它会很快退出战争舞台。

尽管在攻击子高地时，李弥对荣3团敢死队采取了奖金激励的办法，但笔者以为用金钱是不能真正唤起士气的。倒在血泊中的第3营营长陈载经指着阵地上满地散落的关金票，已经对此举作了无言的否定。

日军的情形有所不同。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在其作品《滇缅公路》中写道：

"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做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59]

---

〔59〕［美］多诺万·韦伯斯特：《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第264—265页。

可以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同时期印度英帕尔战场上一位叫官下进的被俘日军士兵后来说：

"在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的一切都显得有些疯狂。最初，只有一小批狂热分子鼓吹战争。但是随着战争发动并且逐步升级，一种病态的爱国主义开始控制整个社会，那些一开始并不支持战争的人也逐渐被拖进这种疯狂之中。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是武士道信徒，但后来，尊奉它并且为荣誉而战的压力开始潜入我们的意识深处。一旦你被拖进那种文化之内，它便无处不在，而你再也无法回到外面的世界。那些观念不断地感染着你，直到你也全身心地相信与其被捉住当战俘，倒不如舍身战死更为荣耀……能够为你的家庭、你的国家和你的天皇而献身是毕生最大的光荣，这种光荣感激励着日本人在亚洲的军事进军。对几乎每一个人来说，我们都视死如归。我们认为那样的命运，比起在征服亚洲的事业中失败而苟且偷生要幸福得多。"〔60〕

在英帕尔战场上的英军指挥官、第14军军长威廉·斯利姆（William J.Slim）将军，也对于他的敌手们的勇敢印象深刻。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日本军队所展现出来的力量，正基于每一个士兵的精神。他战斗、行军至死方休。如果有500名日本人坚守一处阵地，我们必须消灭495人，才能最终夺取它，然后，剩下的5个日本人便集体自杀了。没过多久，有关日本士兵自杀的种种故事便传遍了整个中缅印战区。"〔61〕

在松山战役的最后几天，远征军第8军的将士迫使日军再次上演这些故事。这疯狂的举动让他们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但是作为战胜者，日军的自杀举动渐渐在我军士兵眼中变得愚昧可憎，令人恶心。在缅北战场上，当日军士兵狂呼"万岁"一次次发起"死亡冲锋"时，美国大兵们回应的则是"像狼嚎一样的两个音节组成的

〔60〕［美］多诺万·韦伯斯特：《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第265页。

〔61〕同上。

脏话”和密集的冲锋枪弹雨，[62]这无疑是一种极有力量的精神系统颠覆：Fuck PK 神道信仰。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当被俘的十几名日军士兵进了中国远征军楚雄的战俘营，了解到我军并不会以他们的方式对待战俘，他们渐渐感受到进步和文明的力量，开始有所醒悟，有的甚至丧失了尊严对我军奴颜婢膝，表现出岛国民族性的另一面。

松山战役后，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与部下探讨日军“令人畏惧的顽强精神”，曾做过这样一番分析：“日本兵也是人，他们也会怕死。松山守备队之所以始终没有撤退，不过是因为他们以为会有援军来救援。过去，我们在上海、湖北、湖南与日军交战，周围哪怕只有鬼子的一个小队，他们也会拼命赶过来支援；所以小日本只要知道附近有自己的队伍，他就不害怕，死缠着和你打。可这次却不同了，打到最后也没见一兵一卒来帮忙，这说明什么？说明日本人不行了，明知道松山顶不住，硬是把他们丢下了。这样的事情只要再出现一两次，军心就懈了，再不会有部队愿意死拼死守，照这样下去，小日本离最后完蛋也就不远了！”[63]

笔者经过研究，发现日本兵的不怕死，很多情况下并非基于什么“精神”，还可能是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一位第309团老兵的回忆，真切描述了那种具体感受：“要说的话，我们打急了也不怕死，可还是和他们不相同。日本兵打起仗来，有一种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像鬼像野兽，反正不像人。和他们打仗就像是和僵尸打架一样，即便打赢了，心里也怕得很……”[64]那种投入战斗时像“已经死过了的感觉”，在有日本武士道经典之称的《叶隐闻书》中被称为“死狂”，[65]类似于中国人所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这种在战斗中假定

---

〔62〕［美］唐·莫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太平洋战场的较量（中）远征军》，第123页。

〔63〕王外马甲：《战场上的蒲公英》，第53页。

〔64〕同上书，第25页。

〔65〕“所谓武士道者，不外乎死狂。”（武士道は死に狂いである）［日］山本常朝（口述），田代阵基（笔录）：《叶隐闻书》，第1页。

必死而疯狂“求死”的状态，来源于武士道传统，也是一种基于战阵搏杀中生死概率的统计学——据说，在战斗中，越是胆小懦弱者越容易被打死，所以初次上阵的新兵伤亡率惊人。而参透这一规律的老兵，除了比新兵多一份镇静和从容，有的还生出这种疯狂“求死”而寄望于“意外”获生的厮杀技巧。既然死亡的命运个人无法左右，以疯狂留下“勇敢”之名就显得很合算。

假如战争再次重演，这些老鬼子还能像当初那样疯狂吗？笔者相信肯定不会了。正如品野实在其作品中的表达：“作为战败国的国民希望的是：即使没有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也不要野兽般的行动。”[66]日本人想过好日子，这是人间正道。也许，只有那些从未经历这一切的日本新一代右翼分子，才会重蹈覆辙，那是蒙昧的轮回。不能吸取教训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8月23日：D+80日

当日，日军弹药、粮食几乎告罄，患脚气病的人不断增加，全体人员体力衰退，连行走都感到很困难。[67]在关山阵地失守后，音部山（丑、寅、卯高地）成了日军防御第一线，日军准备利用音部山和北部的西山阵地（3号高地）坚持持久战。但音部山阵地距离子高地仅一百多米，而西山阵地比这里位置低下，到底能坚持多久，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没有多少信心。按日军作战要务令要求，金光命令各阵地将部分光学器材、被服、阵亡人员遗骨和文书进行销毁和掩埋处理。[68]

23日傍晚5时，金光惠次郎向第56师团发出电报，电文如下：

19日以来，敌猛攻。守备兵死守敢斗，大部伤亡，后关山被爆破，虽两度组织夜袭夺回，但敌集中炮击，我百名以上战死。为确保横股、松山、音部山、里山之一部和联队长宿舍南部高地，我们

〔66〕［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99页。
〔67〕［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64页。
〔6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4页。

准备将东北部高地连线整理。守兵一只手、一只脚者大部分都在奋力死守敢斗，力争确保该线。[69]

另外，察觉到最后的日期已经临近，金光惠次郎又在电报中补充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决定让炮兵队的木下昌巳中尉逃出报告”，理由是“木下在守备队本部全程参加了战斗，熟知战况，而且是目前唯一没有负伤、年轻气壮的军官”。[70]

关于此事，据木下昌巳本人的回忆：8月中旬某日，金光少佐曾传令其前往音部山本部交代了这一任务。太田毅战后采访了木下，在著述中如此记述：

金光少佐沉默地望着木下，过了好一阵，才低声说道：“……按师团司令部命令，要坚持到9月上旬。据目前情况看，我觉得已经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想请你在最后的时间逃脱出去，到师团司令部把守备队的战况详细地作个汇报。”

看着大气都不敢出的木下，少佐接着说道：“另外，还要把战死官兵的情况转告给他们的亲属。”

面对少佐的命令，木下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原以为被叫来是为增援一直坚持奋战的关山阵地或音部山阵地的事，哪会想到会是让自己出逃。木下中尉沉默地看着少佐，心想，即便这真是命令，自己也不能接受。

“这不是命令，木下不能服从，木下要与守备队全体官兵一起，死守阵地！”沉默一阵后，木下断然回答。

金光少佐仔细听着木下的回答，原以为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接受，甚至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过了一会，金光少佐又用平静的语气说道：“你的心情我明白。不过，你再认真考虑一下，如果全员都战死在这里，后果会怎样？

---

〔6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4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32页。著者以后者日文译出。

〔70〕［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33页。

师团司令部和军部如何得知守备队奋战的详情？那么长时间、反复艰难的拼杀和官兵们的牺牲不就白费了？另外，谁去把战死官兵的情况转告他们的亲人呢？谁去把松山战斗的情况转告后人呢？等等。我充分考虑后，才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即使辛苦、艰巨，你也得领受，因为这是命令！”

少佐一口变不了的冈山口音，咄咄逼人的口气，费尽心思的论理，说得木下无力推却。只有答复“是”的木下中尉，此时所能考虑的只是怎样去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了。

从这一记述看，派一名联络军校逃出报告战况，是拉孟守备队长金光的决定。但是，日军史料中还有一种说法，这一动议出自其上司、野炮第56联队长山崎周一郎大佐，且是全军覆灭前的9月5日晚才得到师团长松山祐三批准实施的。尽管金光是前线指挥官，但如此重大的决定由其个人先斩后奏，也是很难想象的——容后叙。

据载，在木下昌巳领受了这项特殊任务后，金光惠次郎考虑到关山阵地一旦失陷，需要重新整理防御线，又安排他带领音部山阵地和横股阵地的十余名兵力，用几天时间挖掘了音部山至西山之间的交通壕和散兵坑，为后期战事提前做了准备。[71]

日军战史载：此时，拉孟守备队仅存战斗兵力约100名——这是指未负伤的健康者，事实上很多轻伤者一直在参加战斗，实际兵力不止如此。而第8军也深感松山日军“越打越多”，子高地一次突击下来，荣3团的一个新锐营即消耗殆尽；倘仅凭现有兵力继续作孤注一掷之拼，胜算绝无把握，只好等待兵力补充后再扩张战果。[72]

8月24日至27日：D+81日至D+84日

24日，驻祥云的第103师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后续部队全部到达腊勐街，这是第8军投入松山之战的最后生力军。

据第103师战斗详报载：第8军自围攻松山以来，历时月余，

〔71〕［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59页。
〔7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47页。

兵力疲惫，已成强弩之末。此次第 309 团以生力军参加战场，对于松山命运实具有决定性，该团今后之使用实为当前最重要之问题。军长何绍周有见及兹，于当日召集有关人员指示：其一，尔后进攻以第 309 团为主力，由熊绶春师长统一指挥；其二，攻击重点决定依托子高地向丑、寅高地进攻，俾迅速瓦解松山敌阵地；其三，攻击部署须合以下三个条件：牺牲少、效果大、时间短。

25 日，军指挥部令第 309 团主力加入子高地方向，任务是利用既得成果，继续攻击。26 日，第 103 师副师长郭惠苍随同军参谋长梁筱斋，冒雨到子高地侦察战场，向各部队指挥官面示机宜。[73]

当日，蒋介石再次给卫立煌发来了一封言辞颇具刺激性的勉励电报，大意云："在腾冲、松山战场上，面对以现代化装备的国军，日军守备队仍孤垒死守。相形之下，国军的名誉丧失殆尽，直令外人质疑我中国在世界上之地位。……希望我军以死守密支那、松山、腾冲的日军为榜样，发扬我东亚民族优秀的军人精神，以积极作为挽回国军丧失的名誉！"[74]

第 8 军未按规定的 26 日期限攻克松山，已令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大为恼火，收此电报更为羞愤。遂于 27 日中午，派其参谋处长季鼎生、兵站总监蒋炎两位中将及各兵科指挥官组成督察组，来到松山现场解决第 8 军攻击困难。首要困难自然是粮弹供给问题，在战斗期间美军以一百多辆十轮卡车从保山运送粮弹到松山前线，但三天的运送量只够攻击部队使用一天。[75] 第 8 军指挥官在提出弹药保障等问题外，特别提请督察组将本军目下态势、兵力概要及不能做"孤注一掷"攻击的理由转报卫长官，并表示本军官兵绝不有违长官之命。

经双方研究，后续攻击弹药补充种类数量如下表所示，兵站总监部表示在 3 日内送达腊勐街：

---

〔73〕《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74〕在松山战役期间，蒋介石分别于 7 月 21 日、8 月 26 日、9 月 9 日发出类似电报三次，均被日方看作是来自敌国元首的反面表扬（"逆感状"）。但在国内公开资料中未找到原文，此内容系笔者据日方网站资料译出，参见：http://homepage2.nifty.com/shukenkaifuku/eirei/E06Link/E060002.html。

〔75〕李悫萱：《忆松山攻坚战》，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61 辑《滇缅抗战亲历记》，第 83 页。

表 10　第 8 军攻击松山弹药补充种类数量情况[76]

（1944 年 8 月 27 日）

种　类	单　位	数　量	备　考
792 步枪弹	粒	300000	
045 机枪弹	粒	30000	
60 迫击炮弹	颗	12000	
82 迫击炮弹	颗	8000	左列数字均为榴弹
小型木柄手榴弹	颗	7500	
英式手榴弹	颗	2000	
白磷手榴弹	颗	500	
火箭弹	颗	300	
枪榴弹	颗	4000	
掷榴弹	颗	1000	
美式 37 战炮弹	颗	5000	左列数字内爆炸弹 3000 颗，破甲弹 2000 颗
美式 75 山炮弹	颗	8000	左列数字为先期运送部分，而后视需要情形再行补送
762 战炮弹	颗	1000	
150 榴弹	颗	1000	
火焰喷射器	具	6	
麻袋	个	100	
大锯			
大斧			
303 机枪弹	粒	300000	左列数字为请求增加数
附记： 1. 表列数字均系 8 月 27 日于大寨议定核准； 2. 除 75 山炮弹及 82 迫炮弹分两次运送外，其余均一次运送交付。			

随后，各团团长带所属营连长做进一步绵密侦察。预定 28 日发起本军第八次总攻击。为此，将原配属荣 3 团的炮兵拨归担任主攻的第 309 团。[77]该团第 1、2 两营，于 27 日当晚在子高地集结完毕。因第 103 师部队此后将担负两个方面作战，为便于指挥起见，师长

〔76〕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插表一《陆军第八军攻击松山使用弹药预定补充数量表》调制，第 49—50 页。

〔7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48—49 页。

熊绶春决定分别在温果坪、滚龙坡两地开设指挥所。[78]

至此，荣1师的荣3团、荣2团第3营，第82师的第245团、第246团，第103师的第307团、第308团、第309团全部投入战场。自7月上旬起，基本上每个团都打了一次主要方向上的“主攻”，也基本上是一仗即大伤元气。当下，指挥部对新到的生力军第309团给予了厚望，期能创造辉煌战果；其余各团仍自原守备阵地猛力推进。

〔78〕《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第 12 章　九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8 月 28 日—9 月 1 日。

指挥：第 82 师副师长王景渊、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

主力：第 309 团、第 245 团、荣 3 团及荣 2 团第 3 营；第 307 团、第 308 团。

进展：夺取松山主峰诸高地及大寨一部。

（参阅附图 3、附图 28、附图 30、附图 31、附图 32）

8 月 28 日：D+80 日

按照第 8 军指挥部部署，本军第八次总攻击的任务区分为：

第 309 团拨出第 2 营两个连，分别担任第 103 师及第 8 军预备队；其主力从子高地北侧攻击丑、寅、卯及 5 号高地，为突破性的主攻方向。

第 308 团攻击午、未高地间无名高地；第 307 仍攻大寨；第 245 团抽集兵力准备肃清巳高地；荣 2 团第 3 营确保巳高地已占领部分；荣 3 团防守已占领的子高地，并在第 309 团攻击中尽量予以火力支援。

炮兵力量调整为：山炮第 2 连主力配属第 309 团；原配属荣 3 团的山炮、战防炮各一门，亦改配属第 309 团。另，战防炮一门及竹子坡第 2 连山炮一门，推进于子高地南侧，均由王景渊副师长指挥，破坏巳、辰、午高地反斜面敌堡垒及掩蔽部。第 5 连的山炮两门，移向竹子坡。[1]

---

〔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47—48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83 页。

此役，美军第14航空队派出9架飞机援战。[2]

第309团因初临战场，士气异常旺盛。几天来，团长陈永思带领各营连长对地形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侦察，但对日军兵力配置及阵地状态，仍一无所知。于是决定在总攻击前，先对当面之敌进行威力搜索。28日拂晓，第3营先以一个排向丑高地进行试探性进攻。11时许，接近该高地及其北侧无名高地，仍不见动静，于是冲入战壕，发现仅有7名受伤的日军在抵抗，进攻部队将其全部消灭，占领丑高地。夺获"十榴"重炮1门，步枪6支。

连日以来，第307团对大寨中部之攻击，均受到其北方火力之瞰射，难于进展。虽然该团只是在清扫零散据点之敌，但那些剿杀不尽的"鼹鼠"令他们大伤脑筋。几天前，该团占领辛、癸两高地后，经搜索确认无残敌。自癸高地向大寨推进时，忽然背后辛高地山麓又射来密集的机枪子弹，又返身包围后予以剿灭，歼敌7名，缴获轻机枪2挺。本日，移主力于大寨方面，与敌激战终日，据点得而复失，未获战果。

午后1时，日机8架飞临扫射，并于黄土坡北端投下供应品8包而去。

当晚，第309团在丑高地上两次遭到日军逆袭，均予以击退。[3]

8月29日：D+86日

凌晨4时，第8军司令部向各部下达"怒战字第32号"命令，要旨为：

一、松山之敌经我占领子高地及大寨附近之强烈压迫后，残敌不过三百人，仍欲盘踞松山及大寨附近地区，企图顽抗拖延时间；

二、军即应利用我攻占子高地之成果，以主力由子高地之右侧向寅高地突贯，尔后向左右席卷，分别将敌包围于松山南北山麓而

---

〔2〕张荣校：《龙陵抗日反攻战概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63页。

〔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1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3页。

歼灭之；

三、攻击兵团应以新锐之兵力，集结于子高地右侧附近，即经丑高地向寅高地攻击而确定占领之。其余仍于未高地北端、大寨南端之线向午高地、大寨强烈压迫，牵制该方面之敌，并相继占领之。惟推进阴登山第309团之一连，仍位置于该地，无命令不得使用。并应以山炮一门于子高地之左侧占领阵地，先破坏巳高地北端敌工事，支援守备兵团肃清该地之敌，尔后破坏并制压辰、午北端附近地区之敌阵地，以策攻击兵团主力左侧之安全；

四、守备兵团应确保双尖峰、子高地、巳高地南半部、冯家坡北端、未高地北端（不含）之线。于攻击兵团攻击时，应以子高地及阴登山步炮兵火力尽力支援攻击兵团主力向丑、寅、卯诸高地之攻击，并随时掩护其左右两翼，更应向辰、午高地行牵制攻击，惟须尽先肃清巳高地北端之残敌，使攻击兵团主力之进出容易；

五、彭支队（第246团第2营，营长彭剑鸣）应努力压迫马鹿塘之敌，相继攻占之，对于寅高地北方，该高地（即1至5号目标）应该严密搜索相继占领之……[4]

在我军占领子高地，对日军主阵地形成分割的情况下，各团根据兵力确定目标，在整个战场上呈现出一种分片“承包”、各自为战的态势。

29日拂晓，第245团抽调兵力一部，利用我炮兵对巳高地堡垒掩蔽部破坏成果，一举突入，肃清残敌，敌遗尸11具。此时我部分炮兵已推进到了子高地南侧，与阴登山炮兵形成交叉火力，对据守小松山的日军造成压制性打击。第308团也于午后强袭午、未高地之间的无名高地，占领了其南半部。[5]

啃“硬骨头”的则是兵力较完整的第309团。

上午11时许，第309团第3营以丑高地为依托，仍以一个排兵力向寅高地威力搜索。13时，袭入占领，于是增兵一个连，以期确

〔4〕《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1—5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3—84页。

保阵地。不久日军猛烈反扑，经我炮火支援，激战至15时，将敌击退。黄昏，日军又从反斜面掩蔽部内冲出增援反扑4次，均予以痛击。黄昏后，第309团又增派两个连巩固阵地。[6]

自午后以来，第309团一直与敌激战，对已占领的寅高地工事无暇构筑修复。寅高地即为日军音部山阵地核心，为松山制高点，筑有最坚固的堡垒，为全阵地之锁钥部。如能将其攻占，南可瞰制大寨及黄家水井，西可俯松山尾端及拊马鹿塘之背，控制松山以南公路之交通。据守音部山阵地的日军兵力达170余人，为各阵地兵力之冠。虽然第309团不顾牺牲，冒着敌浓密火网猛烈进攻，付出极大伤亡暂时占据阵地，但日军决不会轻易放弃。

29日夜，日军又纠集兵力连续反扑，到次日拂晓达7次之多。据守寅高地的第3营营长黄人伟腿部、耳部两次重伤，仍吼叫督战，不肯退下火线，使士气大振，终于在次日拂晓将日军击退，黄营长头部又负重伤晕厥，方撤下战场。天亮清查人数发现，全营伤亡200多人，以刀伤居多，均是被日军刺刀刺伤、军刀砍伤。日军也遗尸80多具。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称：第309团此战，“牺牲之壮烈，堪与荣3团之子高地争夺战相比美！”[7]

日军作战，以进攻为原则，进攻中的精华，即为“白刃战”；当迫不得已转入防御作战时，为达成固守目的，常常运用逆袭战术，仍然是主动进攻。近距离作战的利器为冲锋枪，但因子弹消耗巨大，出于国力考虑，日本基本未发展这种单兵自动武器，直到1940年才研制出试验型“一百式”冲锋枪，仅少量装备空降兵（日军叫“空中挺身队”）；以步兵为主的主力部队，仍追求单发步枪远距离的“每发必中”。为应对经常遭遇的白刃战，日军将刺杀术训练放在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军队中，只有装备不济的少数非中央系部队重视白刃战，有的替代性地配发大刀，延请武术家指导进行刀术训练，以此压制日军刺杀术，如喜峰口第29军大刀队夜袭敌营，及台儿庄战役中西北军的大刀队巷战。远征军装备美式武器后，即放

---

〔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1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3页。
〔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2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4页。

弃了这一战术，但由于“汤姆逊”冲锋枪不能人手一支（一个连18支），所以近战肉搏中往往不敌普遍擅长刺杀的日军。第309团此战中牺牲者以“刀伤居多”的事实，至少说明在战术细节上，总体上的火力优势，并不能完全替代士兵个体的勇气和技能。也许，在这个问题上，至今都不能持“唯武器论”，因为战争的具体过程，仍是军人个体之间的厮杀。

此外，日军之所以连续一个昼夜、十多次对寅高地进行反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里是其野炮第3大队本部，日军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就在此处坐镇。尽管日军战史根据逃出去的木下昌巳的供述，认定金光惠次郎于9月6日傍晚在西山阵地被我迫击炮弹击中腹部阵亡，但是活下来的日军士兵早见正则却一再非常肯定地指出，金光惠次郎是在29日这天死在音部山，即寅高地的。

据日方史料记载：

关山阵地被占领后，主阵地被分割为南北两块。士兵无日无夜，在战壕里嚼着沾满泥土的草，勉强填饱肚皮后继续战斗。剩下为数不多的官兵们，每天都在盼望师团派兵来增援，总是丢不掉会有援兵到来的幻想，都想活下去，为此，都全神关注着阵地外友邻部队的攻势。有的士兵还产生了幻觉，发狂地吼叫着“听到友军的号声和轻机枪声啦”，冲入远征军阵地丧了命。

远征军炮弹使用延时引信，能钻入很深的地层再爆炸，对战壕和堡垒很具破坏性。主阵地最高点音部山，由于受到百日来的炮击，4米深的高强度战壕都被埋没了。29日中国远征军从关山阵地攻来，音部山又失守了。[8]

据当时担任传令兵的早见正则的回忆：

（29日）我奉真锅大尉的命令前往音部山，进入金光守备队长所在的战壕。传达完命令后，我敬了个礼，并说：“我回去了！”刚要走出副官的住处时，一发从原口山（竹子坡）方向飞来的炮弹正好落在金光守备队长住处的顶上，那个战壕一下就被炸塌了。

---

〔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6页。

金光少佐住在4米深的掩蔽壕中，壕是一个L形状，L形地壕的转弯处还挂着门帘，最里面是金光少佐住的地方。只有一个洞口，再往里没有出口。战壕顶上落下一颗炸弹，炸塌了整个战壕，他人没有出来。当时我在入口处，也被炸起来的泥土埋到胸部，好不容易才爬出来。

这就是金光守备队长的最后时刻，他是被活活地埋葬了。

早见正则补充说，当时中国士兵已经冲到附近，还将手榴弹扔进了壕里，若是平日还会捡起来反扔出去，但音部山阵地的交通壕挖得特别深，根本就来不及捡起来，只能赶快跑到下面的一条小战壕里，却看到同分队的镰田上等兵也负了伤待在那里，于是又往山下的联队本部跑去。

联队本部是在原来联队长宿舍里面一个宽3米的“⼕”字形壕内，最里面是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的卧榻，在其前面的架子上放置着盛放联队军旗的木盒。右边的入口处是军械员一木朝三准尉和兽医少尉永田达的住处，左面的入口处是早见、中村和波多江三名传令兵的住处。

早见正则进入壕内见到真锅大尉，将所看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可真锅大尉听后脸色都不变，毫无反应”。[9]

以上为品野实采访早见正则后在其《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书中的记述。品野实本人也倾向于这一说法，所以他后来在采访木下昌巳时，以早见的证词对其做了单刀直入式的追问，令木下感到窘迫。木下只好承认，他最后一次见到金光惠次郎是在8月中旬去接受出逃命令那天，8月29日他是在横股阵地；他后来在日记中所载金光9月6日死于西山阵地的说法，是当日傍晚听从西山阵地撤下来的真锅大尉告诉自己的。木下说自己起初也有几分怀疑，因为从8月29日以后，各阵地残余日军都是各自为战，活下来的人谁也没有见过这位最高指挥官的踪影。但是，木下认为，真

〔9〕［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20页。

锅大尉也是马上要“玉碎”的人了，“人死之前是不会说假话的”。[10]一直想弄清真相的品野实也对此有些困惑，所以最后在书中对此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笔者从日方战史和个人记录中感到，真锅邦人与金光惠次郎的关系，并不是那么亲近。真锅大尉是步兵第113联队副官，金光少佐是野炮第56联队第3大队的大队长，分属不同部队。松井联队长在松山的时候，担任拉孟守备队长。在其离开后，按常理应从步兵军官中选一位代理其职责，由于3个步兵大队长也都走了，只好任命炮兵大队长金光少佐担任。虽然不久后真锅从红木树转回松山，真锅为老资格步兵中队长出身，指挥经验丰富，松井也评价其“精干”，但是因为金光职衔比真锅高，按日军传统以职衔高者为尊，所以仍未改变任命。但在战斗中，则是真锅实际负责指挥，因为这种阵地防御战斗毕竟是步兵的特长。金光对此显然采取了默认的态度。从年龄上说，金光比真锅大十几岁，已是四十八九岁的中年人。对这样的无望战局，心里感到无奈，又不愿看着士兵大量死亡而无所作为，于是大部分时间待在幽深的音部山战壕里发呆。真锅指挥调遣步兵在各阵地增援战斗，自然备感心力交瘁，但战况却只能以守备队长金光的名义发往师团，功劳都记在金光身上。对此，真锅自然不会心情太好。

当金光决定派一名军官逃出松山报告情况时，他选择了自己的炮兵部下木下昌巳，而不是步兵。对此真锅不会没有想法，因为显然是步兵更了解战况——后来第113联队的幸存者普遍对此不满，甚至连第56师团司令部的参谋都曾抱怨说：“难道步兵里面就派不出一个能报告情况的军官吗？”[11]有人还指责跑出去活下来的木下昌巳：“堂堂一个炮兵军官，活着回来了，连拉孟死了那么多的战友的情况都不知道！”因此，木下昌巳后来在很多年里选择了沉默[12]——但在这种看不到希望的战斗中，已经没有计较的空间了。

---

〔1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11页。

〔11〕同上书，第195页。

〔12〕同上书，第221页。

在战斗中，两人通过传令兵偶尔通报师团下达的情况，不会有更多交流。听到金光被炮击活埋在战壕里，真锅“脸色不变毫无反应”的举动意味深长，他明白，即便金光活着，对战局也没有多大影响。至于他为何向师团隐瞒了金光在全军覆灭前一周即阵亡的事实，笔者对其心理动机的分析是：对这个出身陆军士官学校、受军国主义教育极深的少壮军官来说，维护“皇军荣誉”可能是到死也不会懈怠的精神支柱。何况第113联队军旗是掌握在他的手中，在联队长不在的情况下，作为联队副官的他就是联队的化身。在此心态下，编造出守备队长金光少佐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证言，肯定要比说他在一周前就稀里糊涂地被活埋在战壕里更符合皇军的体面。此外，若过早告诉部下守备队长已战死，也许会导致士兵精神崩溃，自己很难控制局面。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金光在此前拟就的一份电报中已告知师团：自关山阵地失守后，战斗全部由真锅大尉指挥。[13]自己的功劳，军部已经很清楚了——关于这份电报，后面还要说到。

按说，击毙日军指挥官的情况，理应是远征军更为清楚。然而遗憾的是，留下的大部分撰述提到这一点时是众说纷纭，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金光是在最后一刻剖腹自杀了，但又不能提出什么证据。对于松山的敌情我们缺乏了解，而深埋地下的秘密，就更难以得知了。

攻克寅高地并与反扑日军惨烈拼杀一昼夜的是第309团第3营，营长黄人伟，战斗中曾3次裹伤。其中最后一次是前额被一颗子弹穿过，但两天后居然神奇地脱离生命危险，令为其手术疗伤的美军军医极感惊异。[14]也许连黄人伟本人也不知道松山最高日酋这天毙

---

〔1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9、311页。

〔14〕据美国新闻处《怒江战役述要》，第19页。另，美军对中国远征军的支援，医疗救治和战场防疫是一个重要方面。据美军驻中国战斗司令部公关军官汇编，美国Press Censor Goldbert出版的《怒江战役的完成》：“特别值得提到的是军医的显著工作，但是在这之前，中国军历史上是没有的。美国轻便式外科器械和战地医院抢救了超过15000名中国负伤士兵，其中有10000名是战场负伤的（他们都在中国军医院里得到照顾）。在这些得到美国人照顾的伤病员中只有5%死亡，如果考虑到这里地形的复杂、物资供应和气候条件对医务人员的限制，这个死亡数字是非常低的。仅仅只有2000人死于疟疾，战场地区的泥泞雨季是阵亡人员数字高达17000名的原因之一。考虑到这些事实，过去中国军一直就希望战地医务能使负伤与死亡的比例达到同样的数字。记录表明，在这次战役中美国人引导的预防疾病的方法也是很好的。”转引自戈叔亚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e1cca010008vm.html。

命于自己脚下，但是，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名字，因为他只留下了一个名字。[15]

同日，第308团向上仰攻，将未高地顶点完全占领；第307团亦将日军卫生队高地的“洪”堡垒[16]及大寨中心的“宇”堡垒攻占。在松山制高点均被我占据的情况下，日军就只剩下松山（1、2号高地）、横股、炮兵兵舍和西山（此两处均在3号高地范围）4个点以及里山（小松山）阵地的一部分了，覆灭的命运已经注定。

8月30日：D+87日

天亮后，第309团第3营官兵看到寅高地遍布尸体和伤号，经清查，200多位为本营伤亡官兵，绝大多数带着鬼子刺刀和军刀的刺伤、砍伤；鬼子也遗尸80余具。

当时，第309团卫生员李文德从道人坪子爬上去向下抬伤员和死尸。据他回忆，伤员一般需要经过军医检验，确认死亡后，就把尸体拖到现在子高地下的那个水塘里。在随后几天里，李文德最多的一天拖过七八具尸体，拖下来摞在一起，有一人多高。仗打得激烈，那些死人的军装都没机会脱，武器装备也不拿下来，连臂章都没得摘，就那样带着手榴弹，穿着衣服，扎着皮带堆在一起。那些日子，李文德从来没洗过脸，没换过衣服，每天拖伤员、死尸，两只胳膊袖子上的血都结在一起变硬了。“没见过那么多死人！”[17]

据记载，在第8军攻打松山期间，全军三个师中，只有第103师投入了全部兵力，连师直属特务连和工兵连都伤亡殆尽，普通的步兵连，最惨的只剩下两个人。而李文德记忆的数字则更为感性：他所在的第309团卫生队，本应最为安全，但到后来40人中也只

---

〔15〕陈一匡曾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第309团第3营营长名为“黄荣亮”，疑“荣亮”为黄人伟的字。

〔16〕据第103师战斗详报，我军将日军大寨北部诸堡垒分别以《千字文》开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等字命名。

〔17〕人民网文章《中国远征军老兵讲述战火亲历：血色满滇西》，黄怡撰文。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611808.html。

八九个人没有受伤，光军医就打死好几个。所以，战后第 103 师在大垭口建了一座阵亡将士公墓，后来墓碑被移到了子高地下面那个水塘边。墓志铭记载，“其下埋葬阵亡官佐 46 员，士兵 626 名，所埋忠骸未及当日牺牲者数目之一半”。[18] 因为，很多尸体都经烈日曝晒、雨水浸泡而腐烂，有的则被炮火炸得踪影皆无了。

走近如今郁郁葱葱植被茂密的松山，有谁知道它曾浸透了血肉？

我军克复滚龙坡、大垭口、松山顶峰后，敌顽固地死守在方圆 500 平方米面积的黄土坡、黄家水井、马鹿塘区域，构成堡垒群，利用小村庄及 7 个山洞顽抗。地形险要而林密，攻击也很困难。但我军不顾两个月来攻击战斗的疲乏和重大牺牲，为彻底歼灭敌人，对敌最后的据点堡垒实施攻击与扫荡。

由于第 309 团前夜损失过重，30 日拂晓后，不得不调整部署：

以军工兵营担任子高地防守任务。

抽出荣 3 团兵力清扫寅高地南半部及卯高地残敌；新调来的工兵第 15 团抽出一个连，为荣 3 团构筑工事；原配属第 309 团的山炮，抽出一门推进到子高地北侧无名高地上，支援荣 3 团作战；阴登山、竹子坡炮兵破坏寅高地南端的堡垒，以全力协助荣 3 团战斗。

令第 309 团迅速整顿部队后，在固守寅高地外，即向北坡下进攻 5 号及 4 号高地。

这天，天气不良，延宕至 13 时 15 分开始攻击。激战两小时后，荣 3 团将寅高地棱线以东完全占领。残敌仍据守已被炮火破坏的堡垒，顽抗不退，我军用火焰喷射器喷射两次，将其彻底焚毁。

17 时，荣 3 团进展至寅高地棱线西侧，发现有约 80 名敌兵向黄家水井方向溃逃，中途被大寨方向的第 307 团以火力截击，伤毙不下 30 人。在寅高地南端顶点西侧，有敌火力掩蔽部 3 座，黄昏时被我发现后，予以炮火封锁。入夜后，荣 3 团以火焰喷射器焚烧一

---

〔18〕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附件六《陆军第八军于松山围攻参战人员及伤亡统计表》，全师参战官兵为 5935 人，伤亡 3348 人，伤亡率为 56.4%；其中牺牲官佐 61 人，士兵 1721 人，阵亡率为 30%。而据在松山所立陆军第 103 师抗战阵亡烈士公墓碑记（第 103 师参谋长谭国铎撰、师长熊绶春书），第 103 师阵亡官佐 59 人，士兵 1450 人。两数字略有出入。

座，派出工兵爆破一座，步兵用土囊封闭了一座。在焚毁、炸毁的掩蔽部中，日军遗尸不下30具。[19]

据品野实描述："当日阵地逐渐缩小，野炮兵兵舍前的交通壕已经成为第一线。由于大炮的连续轰击，许多地方被炸得像翻耕过的土地一样。敌人一步步逼近，杀掉伤兵，冲了过来。"[20]

这天，拉孟守备队向第56师团司令部发出了一份请求增援的第540号电报，称：

由于三个多月来的战斗和敌人28日以来的总反攻，致使守备队的兵力死伤无数。加之长期作战，步兵、炮兵小队长以上军官基本战死或负伤，官兵多数成为残废。音部山的一角及炮兵兵舍、西山、横股阵地被迫不断收缩，即使死守，也处于极端危急的状态。由于弹药严重缺乏，就是短兵相接也无法解除包围，只有组织健康人员实施突击。请兵团主力部队面对残局组成敢死队，来确保拉孟之安危。[21]

这是6月4日以来，松山日军首次向师团发出请求救援的电报。这个电报应该是真锅邦人大尉所拟。

其实，对于松山的局势，联队、师团都很清楚。按日军传统，守备队只要拼死抵抗，增援的事自会由上级考虑；况且8月2日滚龙坡失陷后，松井联队长已无奈地回电让他们"等待神仙"，现在发电报求救多少有些丧失体面。据传说，一年前的1943年5月29日，日军阿图岛守备队在美陆军第7师攻击下全军覆没之前，其守备队长山崎保代大佐发给上级的最后电报为："无需援军和补给，决心战至最后一人。"[22]因此日本在官方战报中首创了"全员玉碎"这个词，此后一用再用。[23]

---

〔19〕《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3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4页。

〔2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53页。

〔21〕同上书，第196页。[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36页。

〔22〕[日]河村太美雄：《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第162页。

〔23〕据日本战史研究者披露，实际上山崎保代曾于5月16日发电日军北海守备司令部紧急求援，但此事后来被日本大本营刻意隐瞒，以将神话推向极致。

与之相比，拉孟守备队的这个电报，确实显得有点“尿”。但真锅邦人还是将其发了出去，并且在几天后木下昌巳出逃时，还塞给其一张请求救援的字条，其实那时已经濒临全军覆灭，带那个字条已经毫无意义。笔者揣测真锅此举的动机，应该有一种发泄难言之幽愤的成分。

超链接 19：“断作战”：解救松山日军的最后努力及失败[24]

就在松山日军发出求救哀鸣当日，还真的有人在为解救他们而积极努力。

此人即是辻政信，是刚从“中国派遣军”调至缅甸方面军第 33 军的高级参谋。日本军部调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滇缅战场的败局。这个人，职务一直是参谋，军衔不过为大佐，但其在日军中的知名度几乎不亚于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中国军队里素有“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的俗语，但参谋在日军中的地位却非同一般，尤其是那些策划、制定过重大战役作战方案的高参。这位辻政信大佐的“杰作”有哪些呢？诺门罕战役、进攻新加坡、攻占菲律宾、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再就是即将开始的这次“断作战”。上述战役，几乎都是日本发动战争以来最重要的战事，作战方案都出自辻政信之手，其在日军中地位可见一斑。然而在这些战役中，诺门罕战役、瓜岛战役、“断作战”都是日本战史上典型的败仗；日军攻陷新加坡、菲律宾则是因为战争初期的英美军较为软弱。就凭这些“作品”竟然浪得虚名，实在令人费解。

这个人突出的特点是工于心计，喜欢做秀，性情残忍，毫无信仰，尤其善于投机钻营。他 1902 年出生于日本石川县江沼郡一个烧炭业者家庭，从小顽劣，小学老师断言他怎么努力也进不了中学。深受刺激后发愤学习，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名古屋陆军幼年

---

〔24〕本节有关辻政信的记述，综合参考了［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日］俞天任：《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日］松本草平、华野：《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日］秦郁彦：《昭和史の军人たち》（日本文艺春秋社昭和五十七年版）、《日本军国主义侵华人物》（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等资料。

学校、中央陆军幼年学校。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6期毕业时，他又是首席，得到过日本天皇御赐的军刀，是响当当的"军刀组"。[25]陆军大学第43期毕业时，又名列前6名优等生（排序第三名）之列。从陆大毕业不到3个月，即被任命为第9师团第7联队步兵中队长，参加了日军进攻上海的第一次淞沪战役，并在战斗中负伤。这个履历，使其进入军界后一直笼罩着一圈光环，备受吹捧，先后在关东军、大本营陆军参谋本部、"华北派遣军"、第25军、第11军及"中国派遣军"任参谋，在关东军时期即被任参谋长的东条英机视为心腹。1944年7月东条内阁垮台，失去了靠山，被调至缅甸方面军第33军司令部，先任作战主任参谋，不久升任高级参谋。

此人谋战能力一般，但常有独出心裁的举止：在关东军参谋部第三课（负责政策）任参谋时，曾花十万大洋给张作霖办风光大葬，以消除关东军谋杀张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在诺门罕战场，他乘一架侦察机突然在前线降落，转身就飞走了，但留下了英勇的名声；在上海，他以中队长身份训斥一个用军车搭载酒店女老板的佐级军官，致使对方羞愧自杀；在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他看到高级军官在暑天扇扇子，便撕碎递给自己的扇子，斥责值班者败坏军风纪，搞得很多将官都红着脸悄悄收起了扇子。[26]出任第33军参谋不久，他就在战场上动手打一个发高烧的伤兵的耳光，训斥对方是胆小鬼；又声称他曾击毙一名跳伞下来抵抗的盟军飞行员，并将其肉用盐腌制后带头吃掉[27]；看到阵地上一位远征军阵亡士兵身上的笔记本里写着"誓死战斗到底"的誓言，又命令将其厚葬……这些"做秀式"的举动不胜枚举，特别吸引当时日本所谓"知识界"的人，将其视为军界有头脑的明星人物。尽管也有人对其不以为然，比如号称"马来之虎"的日军第25军司令官山下奉文中将，曾评价说："辻之人欲望强烈，奸

---

〔25〕按日军传统，陆军士官学校每届前6名优等毕业生，由天皇赏赐军刀，俗称"军刀组"。

〔26〕诸葛亮《将苑》卷二"将情"一节，有"为将之道……夏不操扇，雨不张盖，与众同也"之论。日军亦将此奉为治军之道。辻政信抬出这个来说事，即便是高级将领也拿他没办法。日本战败后，辻政信投靠重庆，在一次集会时看到国军高官清一色乘美式吉普车、打雨伞，马上断言这样的军队打不过共产党。

〔27〕战时任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报道班员的藤井重夫战后曾撰文提及此事。另，曾任日军第33军参谋长的片仓衷少将战后也证实此事。

诈狡猾，是个善于耍小才的人，非国家有用之大才。”但在随大流成风、缺乏有主见者的日本，他这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举止，还是蒙骗了很多人，给人以“有思想”的感觉。

这位有“思想”、有“风骨”的人，战败后害怕盟军追查其残杀英国飞行员、强迫美菲战俘“死亡行军”及在新加坡下令屠杀4万名华侨的罪行，先是扮成和尚在泰国、越南潜伏。后又利用国共内战爆发的机会，投靠军统局局长戴笠，混迹于国民党军统局和国防部第二厅，为蒋介石打内战出谋划策。在蒋庇护下，1948年他化装为一般遣返军人回国。马上又投靠了美国间谍组织，在CIC（盟军总对敌情报局）、CIA（美国中央情报局）双重领导下，对新中国和东南亚进行谍报活动。有此后台为依仗，看到国际政治气候已经改变，他开始跳出来写书大肆吹嘘个人经历，先后出版《潜行三千里》、《泰国和中国秘密活动记》、《滇西之决斗——十五对一》、《瓜达尔卡纳尔》、《诺门罕》等畅销书，书中极力推卸个人责任，博取日本旧军人的同情。1951年，他的年收入就高达350万日元，可谓名利双收。利用这种明星效应，他在1952年当选为日本众议院候补议员，1959年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

1961年4月，他以旅行为由去了泰国、老挝进行间谍活动，不久即失踪。有消息说，他因阻挠当地的民族运动而被老挝人民解放军以间谍罪处死。后来，日本有人撰文说，他去那里的真正目的，是寻找当年日军掠夺埋藏起来的黄金。

总之，就是这么一个人物，在1944年7月来到滇缅战场，酝酿制定了所谓“断作战”计划，企图挽救被远征军围困的滇西日军。[28]辻政信曾言，他将此次作战命名为“断”含义有二：其一，是通过此战切断中国远征军与中国驻印军打通滇缅公路而会师的企图；其二，日本俗语有“断然行事，鬼神避之”之说，有讨口彩借老天庇佑的意思。

8月30日，辻政信大佐在芒市起草下达了《第33军攻势命

[28]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25页。

令》，要旨为：

一、拉孟、腾越、平戛各守备队面对优势之敌的长期猛攻，仍孤军死守阵地。又，龙陵守备队自8月中旬以来，正遭受来自拉孟、平戛之敌的重压；

二、军决定迅速击破龙陵周围之敌，前出到怒江一线，首先救出拉孟守备队，继而营救腾越、平戛守备队……

为此，除了原有的第56师团外，还将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遭美军重创、刚转隶到缅甸方面军的第2师团[29]调了过来，再加上第49师团的一部为预备队，拼凑出约15个步兵大队及部分炮兵，共计约2万兵力，开始在芒市集结。

辻政信要求：9月3日拂晓攻势开始。[30]

但问题在于，正在远征军攻击下苟延残喘的拉孟、腾冲、平戛守军，能坚持到这个日子吗？

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对此心知肚明，连日来不断收到松山、腾冲的告急电报，让其焦头烂额。而迟迟不能到达战场的第2师团，更是让他恼火。他感到，按辻政信的作战计划，等第2师团到达后再行并肩发起攻势，肯定为时已晚。况且第2师团是以支援的立场来参战的，而第56师团是急于"从火中救出爱子"而作战，此时与其说需要兵力，不如说更需要"感情"投入和把握战机。他深信，像营救拉孟、腾越守备队这样困难的作战，没有"血缘关系"的部队是办不到的。

于是，在"断作战"未提出前，松山祐三通过参谋长川道富士雄向第33军提出强烈意见，要求第56师团率先投入作战，先解龙陵之围，然后贯穿突破到松山；待第2师团到达后，尾随在后面扫荡残敌就是了。但是，第33军担心第56师团孤军作战，救援不成反陷进去被吃掉，一直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仍令其研究与第2师团并肩作战的攻势要领。[31]

---

〔29〕亦即"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攻占我国东北全境的关东军主力。

〔3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29—130页。

〔31〕同上书，第141页。

自7月初挫败龙陵日军第一次攻势后，远征军第11集团军很快转入对龙陵的攻势作战，逐渐又将日军压迫回龙陵城内。至8月中旬，已突破日军复郭阵地，与日军在城内进行激烈巷战，逐渐将日军逼至城南。此时，日军在龙陵的守军为第53师团增援的步兵第119联队第1大队（大队长野中正进少佐）、第2师团增援的第29联队第2大队（大队长藤木隆太郎大尉）、第56师团第113联队及第148联队一部、工兵第56联队主力，此外还有第2野战医院部分伤兵，总计兵力约2500人。以工兵第56联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为守备队长。[32]8月23日傍晚，小室钟太郎向第56师团发去电报，称："龙陵连日来日夜遭受优势之敌空、地协同猛攻，即使奋战，也只能再坚持两天。"[33]

这位据守龙陵的小室中佐[34]，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工兵科（陆士32期），后留校任教官。1939年夏曾在诺门罕清理战场，为上万名阵亡日军收尸，关东军此战之惨败给其心理留下了浓重阴影。他本是第56师团所属的工兵联队长，松山阵地即为他所设计，搞搞工兵本行还可以，只是因军阶最高才被委任担负了龙陵城防之责（与拉孟守备队长金光的任命相似——笔者注），龙陵的"大杂烩"部队来自3个师团，多数不是自己的部下，对逼迫他们死战他缺乏信心。自第一次反攻失利后，第56师团主力撤到了芒市，奉命留守龙陵的日军都感到是被赤裸裸地抛弃了，小室钟太郎在官兵的目光中感到了巨大的压力。[35]

松山祐三接到小室钟太郎8月23日的告急电报后，再也坐不住了，断然决定率先出击。意识到事态严重的第33军这时批准了第56

---

〔3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36—137页。

〔33〕同上书，第138、141页。

〔34〕很多国内撰述均误写作"小宝"、"八宝"，相信都是因昔日作战部队油印本资料中"室"与"宝"、"小"与"八"的相似，而造成笔误一直因袭下来，几乎没有研究者想到去找来日方资料进行比对。1941年曾在第9战区司令部参谋处编译股担任战史编纂工作、1974年著有《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的已故台湾历史学家吴相湘，曾在其自传作品《三生有幸》中不无自豪地说，自己自20世纪60年代即去日本进入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战史室，是直接与战史室职员、昔日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参谋对中日战史做"互参式"研究的第一个中国人。

〔35〕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52页。

师团的要求。24日夜，松山祐三命令官原大队（第148联队第3大队）率先从芒市出发，疾进龙陵，入列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的指挥下，并要求小室要想尽一切办法在军主力到达前，确保龙陵。[36]

8月26日夜，第56师团主力今冈联队、松井联队（配属猪濑大队）等部沿滇缅公路，向龙陵东南外围攻击前进。不久，第33军令赶到的第2师团也从左翼投入作战。[37]第11集团军调整部署，对进攻之敌展开了坚决抵抗。同时，蒋介石已亲自电令第5军军长杜聿明，命其将一直未动用的"王牌"——机械化部队第200师（师长高吉人）从昆明用汽车输送至保山，欲倾全力与日军在龙陵展开总决战。[38]

至9月8日晨，日军仍在龙陵外围与远征军激战。这时，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从第56师团得到了拉孟守备队全军覆没的消息，虽然事先已有精神准备，接到通报后，还是痛哭流涕。[39]

一周后的9月14日，再次传来腾越守备队全军覆没的消息。当日黄昏，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在龙陵西南张金山高地长叹一声："活到现在还没有尝到过如此悲痛的滋味……"怆然决定撤兵。15日中午，命令第56师团于当夜隐匿，企图脱离我军后撤至芒市，去营救被我第2军围困的平戛守备队；第2师团在龙陵断后，一并指挥龙陵守备队，确保龙陵南方高地线，尽量谋求坚持为前者赢得时间。[40]

然而，在我第11集团军强大攻势压力下，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决心按照"确保龙陵南方高地线"的命令要旨，放弃龙陵城区阵地，将指挥部从龙陵中学后撤至两公里外的云龙寺。这一决定立刻遭到第2师团的指责。第2师团长冈崎清三郎中将认为，如果龙陵守备队放弃城区，就难以达成坚持的目的，所以必须死守；但

〔36〕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38页。

〔37〕同上书，第141—143页。

〔38〕1944年8月23日蒋介石致杜聿明密电稿，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第1516页。另据《徐永昌日记》9月11日载，"第200师主力（9月）13日以前可在龙陵附近集结完毕"。

〔39〕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48页。

〔40〕同上书，第147—148页。

让小室钟太郎愤怒的是，再次被抛弃的龙陵守军已为绝望感所笼罩，而第2师团一味为自己考虑，连个参谋都不愿意派来，他已很难强令部队苦战。大难来临之际，素来铁板一块的日军部队间也出现了裂痕。

这时，第33军参谋辻政信“发飙”了，大骂要将胆敢抗命的小室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并于17日从芒市派出了宪兵队来监督执行军法。小室钟太郎痛苦地收回成命，然而已是万念俱灰。18日，他给第56师团发去了“认罪电”，在远征军猛烈的炮击中，他换了一身新军服，心境凄凉地冒着细雨坐在战壕外的平地上，用军刀捅入自己的腹部，在痛苦抽搐中命令副官土生甚吾大尉为“介错”（**日本武士剖腹时指定的助手**），用军刀砍断了自己的脖子。[41]小室钟太郎选用这种残酷方式自杀，与其说是明志，不如说是抗议，然而此时的日本军人只有这点自由了。说一点题外话吧——

日本人信仰泛神，东瀛岛国“神社”遍布，泛神而生活化，就带着浓重的迷信色彩。在第56师团很多活下来的老兵的“战记”和回忆录中，1944年绵绵秋雨中的龙陵阴气森森，被死亡气息所笼罩，这感觉甚至在几十年之后仍弥漫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有点来由的。

查阅松山战役资料，“松山祐三”、“松井秀治”这两个名字曾让笔者心感奇异：他们要么姓“松山”，要么姓氏中挂一个“松”字，莫非命定要在松山遭此一劫？如果读者感到牵强附会，那么不妨再说一个细节：日军第56师团代字为“龙”，又称“龙兵团”；而他们的惨败之地恰好就是“龙陵”——龙的坟墓。简直是一语成谶！龙陵因自古多地震、暴雨灾害，在县城西南山上建一古刹“伏龙寺”而得名，日军第56师团侵占龙陵后马上觉得晦气，于是将伏龙寺易名为“云龙寺”。这些诡异而不祥的巧合，当年的日军官兵也注意到了，经常在暗中嘀咕——他们的部队1940年在日本九州被命名为“龙”，此后4年时间漂洋数万里的“浩荡进军”，居然是一步步地走向自己的坟墓！而“伏龙寺”，正是日军在龙陵最

〔4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66—67页。

后的阵地和指挥所。甚至，日本公刊战史也记述龙陵为第56师团“宿命之地”。[42]

细说起来，逼死小室钟太郎，已是辻政信进入缅甸战场以来，直接逼死的第二个守备队长了。两周前的8月4日，第56师团步兵团长水上源藏少将在密支那饮弹自毙，也是因辻政信所致。当时，因远征军反攻牵制，兵力窘迫的第56师团仅让水上源藏少将带了一个步兵小队及炮兵、工兵各一个中队去增援密支那[43]，自然受到密支那原守备队长、第18师团第114联队长丸山房安大佐的漠视，无法实施实质性的指挥。面对中美联军的强大攻势，水上源藏深知战局已无任何希望。这时，辻政信亲自起草了一份直接针对水上个人的第33军命令电：“……二、水上少将要死守密支那。”日本公刊战史披露，这份电报不提“水上部队”，而是命令“水上少将”个人死守，实属日本陆军史上没有先例、异乎寻常的命令。起初有的参谋以为是笔误，要订正，但是辻政信拒绝修改，且像演员一般“簌簌落泪”，把周围的人都搞懵了。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闻听此命令，看到自己的部下被如此对待，授意参谋长川道富士雄向第33军提出抗议，但因水上源藏此时已由第33军直接指挥，这个抗议不但无效，而且也被视为抗命的“越轨”行为。[44]

这些人哪里能窥破辻政信内心的隐秘呢，此举不过是以一个少将的自杀来挽回惨败日军的所谓“名节”，也给自己个人身上涂抹一点特殊的光彩。按说，密支那为第18师团守备区，在此自杀的应该是其所辖第148联队长丸山房安，而非赶来增援的友军第56步兵团长水上源藏。但是，这里又显示出辻政信窥察人心的精明之处：丸山房安素有缺乏廉耻心的“赖皮”之名，并不容易逼令就范；而水上源藏则是号称有古武士之风的“义人”，容易被忽悠。[45]水上源藏少将一死，残余日军就可以在早已丧失信心的第114联队长丸山房

---

〔42〕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87页。

〔43〕第33军原命令水上源藏带去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的兵力。

〔44〕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68页。

〔45〕［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44—46页。

安大佐带领下逃跑了，对外当然还可以宣传为“全员玉碎”。能捞到这个名声，几乎是惨败后的日军唯一的精神安慰，辻政信对日本军部首脑的心理比任何人都明白……

以营救拉孟、腾越两个守备队为主要目的的“断作战”，至此已毫无意义。此时，日军在滇西全部兵力为2.1万人，其中病、伤、亡者已逾7200人。[46]

10月29日拂晓，中国远征军各部在炮兵、空军协同配合下向龙陵守敌发起第三次总攻。11月1日，远征军各攻击部队向中央合围，一举攻占日军在城中的核心据点观音寺，次日占据城西制高点。日军残部在远征军三面合围下，于11月2日晚沿滇缅公路向芒市西退。1944年11月3日晨，远征军收复龙陵。

这时，惯于逼人“玉碎”的高参辻政信开始为个人后路谋算。11月19日，他在败退到遮放时写了一封密信，里面夹了一张自己在南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任职时去浙江奉化溪口镇祭奠蒋介石母亲的照片，找来被宪兵俘虏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谍报参谋恩义章中尉，让他捎信给卫立煌，请卫立煌转交蒋介石。[47]一年后日本投降，时在泰国的辻政信被英军列为战犯通缉，他假扮成和尚，化名为青木宪信，为逃避英军抓捕逃至越南，与重庆军统局的派出机构取得联系。[48]不久，他得到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密电，要他去重庆面谈。闻讯后，辻政信欣喜若狂……

8月31日：D+88日

虽然我军已攻占不少高地，但清剿隐蔽在工事内的残余敌兵，仍是耗时费力的任务。

荣3团于前日派兵十余名，清扫子、巳两高地之间的谷地，在草丛中突然遭到敌两个堡垒火力的狙击，只有4人撤出。估计堡垒

---

〔46〕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212页。

〔47〕〔日〕辻政信：《滇西之决斗——十五对一》，转引自钟彬《龙陵会战史》附录第四，第167页。

〔48〕据有的资料，辻政信先是与中华民国驻泰国曼谷的办事机构取得联系，表达出愿为军统局效力的意向，在中国方面同意后前往越南。

中有日军二三十人死守。31日，荣3团再派兵二十多名前进，并将山炮、战防炮各1门，推进到巳高地的东北端，近距离猛射，摧毁两个暗堡后予以占领。当再继续搜索前进时，又遭子高地南部山脚下死角中的敌堡垒射击，无法前进。于是又派兵一个班，由子、丑高地向谷地攻击，才予以歼灭。共毙敌7名，逃跑5名；获轻机枪2挺，步枪3支。至此，我占据的松山顶峰与阴登山之间已构成联系。第308团当日的进攻也取得进展，占领了午、未高地之间的无名高地。

即日清晨，经过整顿后的第309团向第4及第5号目标攻击。由于前路被茂密丛林遮蔽，炮兵用瞬发引信炮弹射击，炮弹出膛后触及树枝即炸，很快在丛林中炸出一条通路。13时许，确实占领第5号目标，继续向北扩张战果。14时30分，乘天候开朗向4号高地进攻，经过激战，至17时占领该阵地，卤获敌战车一辆。第308团向未高地左侧森林扫荡，因地形复杂，仅占领有射击设备之敌库房一处。第307团由日军卫生队高地向大森林高地的“荒”堡垒攻击，因敌之侧防火力极为猛烈，部队牺牲甚大而难以进展，仅占领大松林高地左侧一部，并毁敌大掩蔽部一座，毙敌10余名。

当晚，师长熊绶春接到军长何绍周电话命令，云：卫长官电话命令限即日肃清残敌；第103师应即以攻占松山尾部、黄家水井及大寨各处。通电话时已是晚上10时，何、熊二人都明白，在仅剩的两小时内显然无法达成卫长官的要求，只能是原话转达彼此领会而已。至此，卫立煌已多次向第8军发出“限期攻克”命令，然均未落实，卫心头郁积的恼怒和何、熊等的尴尬窘迫可想而知。在身处一线的何、熊看来，卫长官的命令自然有不切实际之感，所以后来在军、师两级的战斗总结中，均对“限期攻克”的惯常做法颇有微词。但是，处于战阵之中的下级指挥官，即便面对看似无理的上峰军令，也只能尽最大努力坚决贯彻执行。

师长熊绶春据此命令所属各部：第309团应向松山尾1、2、3号目标（即黄土坡）攻击；第307团应指挥所属及第246团第2营彭剑鸣部（约剩一连兵力）向黄家水井攻击；第308团应向午高地

攻击，并以重兵器协力第307团攻击。[49]

9月1日：D+89日

第8军调整部署，进行最后攻击敌群堡、扫歼残敌之战斗。

王光炜，黄埔第7期生，原为贵州遵（义）婺（川）师管区补充兵第1团上校团长，6月份从贵州遵义运送壮丁一千多人，来到云南为第8军补充兵员。所谓“师管区”，类似于现在担负后备军组织和动员的军分区，区别是当时在一个师管区征集的兵员基本上是补充到一个军的[50]，与日本的“乡土部队”类似，其实就是从日本学习借鉴过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松山战役大致是中国贵州人和日本北九州人打。

王光炜带到云南的这一千多名新兵，是怎么征募来的呢？简单说，就是“抓壮丁”。

据资料，当时遵义是贵州的大县，有51万人口，按通常比例，符合服役条件的人最多不过5万。抗战后期，遵义县的服役人员已超过4.3万，当地的征兵总量已达到极限。[51]可因为缺兵，军管区、师管区给遵义下达的壮丁指标已提高到每个月一千人，完不成任务就要受处罚。怎么办？只有乱抓，看到青壮年男子就拖进兵营。以前是“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独子免征”，现在不论了，只要够条件

---

〔49〕据《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50〕1937年6月抗战爆发前夕，国民政府转入战时体制，改此前的募兵制为征兵制。军政部设立兵役司（1939年改兵役署，1944年改兵役部），负责办理全国征兵事宜。1938年2月，根据军政部命令，贵州省设置贵（阳）兴（义）、镇（远）遵（义）两个师管区，各辖4个团管区。1941年10月调整体制，撤销了团管区，全省划分为贵（阳）毕（节）、安（顺）兴（义）、镇（远）独（山）、遵（义）婺（川）等4个师管区及毕节、兴仁、独山、思南等4个征兵事务所；规定每一个师管区配属一个军，即该师管区作为该军补充兵员的固定区域，以该配属军的副军长兼任该师管区的司令，从而达成使部队与兵员补充相结合的目的。其中遵婺师管区配属第8军。参见莫子刚：《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51〕据统计，1938年至1945年，贵州省征兵达45万余人，“平均25名壮丁中就有1人在前线杀敌，每3名壮丁中有1人在后方服役”。总计8年之中，贵州总出兵人数达675432人（其中志愿兵近2万人），占全省壮丁数（约160万人）的42.3%，全省总人口的6%。由于“捉放捉，捉逃捉，捉死捉等，实际数应该更多”。据《竺可桢日记》载，1939年11月官方公布贵阳已征壮丁数额为2500人，而实际上该月该县出兵之数达15000人，为6倍之数。因此有学者认为，“贵州以贫穷小省，总人口仅千万，而征兵派夫不下百万之众”。转引自莫子刚：《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就拉走，绳子一捆就往前线送。最早只是在乡下抓“黑脚杆”（农民），到后来，店铺的伙计也抓，工厂的工人也抓，无业的市民甚至外乡的难民也抓，遇见合适的就拉来。为了躲避兵役，有的青年男子把自己的脚搞断，把手指头剁掉，还有的装聋作哑，装疯卖傻。1943 年，遵婺师管区准备到一个兵工厂里抓壮丁，被厂方知道了，工人把大门一关，就在厂房里和军队打了起来，结果当场打死 40 人，接着又判了 12 个死刑，最后只“征”到了 8 名兵。这样的新兵送到部队，怎么可能提升军队的素质？但不送这些人去，又能有什么办法？要知道，到了 1944 年，就连抗战以来一直舍不得动用的大中专学生都已经纳入征兵之列，蒋介石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组建所谓“青年远征军”9 个师（番号从第 201 师至第 209 师），动员口号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当时参战的官兵们，虽然对抗战最终会胜利抱有信心，但是看到日军如此疯狂地顽抗，都不敢相信自己能看到胜利那一天的到来。很多人的想法是，拼光自己这一代人，杀死全部日本男人，也许中国才能熬到胜利那一天！

王光炜押送的这批壮丁本来有两千多人，从遵义徒步出发，经贵阳、平彝（现名富源）、昆明、开远，送到第 8 军在滇南文山的驻地就只剩下了一千三百人，一路上有的跑了有的死了，侥幸走到兵营的也被折腾得气息奄奄。第 8 军西进保山后，壮丁们就开始了短暂的战前训练，说起来更惨。

松山上不断死人，第 8 军各团都急着补充兵员，教导队的教官就都成了“魔鬼”。他们的理论是：“新兵都是些老百姓，不对他们凶一点，狠一点，他们就觉得像在家里一样，吊儿郎当，如何能养成服从上级、遵守纪律的习惯？在这里太客气，让他们把心放宽了，日后进了部队，遇到厉害的带兵官，这些人就会觉得受不了，到时候手里有武器，一旦生了反骨，就容易打黑枪，闹哗变，后果不堪设想……常言道：慈不掌兵。军队本来就是个舔血吃饭的地方，大家的脑门上顶着个‘死’字，个个都是打骂出来的。”

所以，新兵营里几乎天天死人。那些训练中犯了过错的新兵，有的被吊起来打军棍，严重的则被拉到操场边上，“砰”的一枪就毙掉了，一条人命就这么消失在荒野之中。等到开始练习实弹射击，

靶场四周就架起了机枪，这是防备新兵发枪后借机哗变。在这样的氛围下，人的心情十分紧张，各种事故也频频发生。正在上子弹的时候，“砰”的一枪，因操作失误，后排的人把前排的打死了。新兵们惊慌失措，吓得四散开来，谁也不敢站在前头。教官拎着军棍冲过去，劈头盖脑一顿猛揍：“怕什么！今天不死明天死，上了战场都一样，你不打死我，我就打死你！”随即下令把尸体拖走，继续射击。没过多久，又是“砰！”一枪，有人动作失误，自己把自己打死了……到最后新兵们都麻木了，死了人也无所谓，趴在血泊边上继续打枪。〔52〕

谁能想到，后来爬上松山跟日本鬼子血拼的，就是这些可怜的壮丁们！这些被国家侮辱和损害着的人，却在为国家卖命。他们当然算不上是觉悟的战士，但要说他们在战场上都是被督战队逼着去送命也不尽然。最初，固然是出于被迫，但万幸的是这支军队是在为民族的解放而战，面对更为凶残的侵略者激发的同仇敌忾之心，让他们暂时超越了对于这支军队的憎恶。而那些“魔鬼”教官的理论，也可以理解为是特殊时期“开启民智（兵智）”的极端方法——现在谁有耐心教你明白为什么打仗？你不想打，那么就逼着你打！也许你打着打着就明白了。〔53〕

战争，就是这个最残酷的课堂。

王光炜早年曾给何应钦当过副官，何绍周当第103师师长时，

---

〔52〕据王外马甲《战场上的蒲公英》，第11—18页。并参照了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0—29页。另据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83、284页）所述，远征军补充兵系经过美国军医挑选送驻印军后不合格的剩余人员，智力体格方面也存在“不堪教练”的问题。

〔53〕1939年3月22日的《中央日报》（贵阳版）刊登了一首《征兵歌》，反映了民国政府以通俗易懂、便于记诵的文字形式，向广大国民宣传培育国家民族观念的心理愿望：“征兵好，征兵好，只恨征兵行不早，募兵制度不相宜，到了今天江山又难保。东也扰，西也扰，男儿应当把国来保，保了国才有家，国破家亡欲往何处跑。好男儿，要当兵，要当就要当征兵，当了征兵强了国，还我河山，驱逐那强邻。好哥哥，快应征，家里田园我来耕，堂上父母我奉养，有衣有食，去去莫操心。好弟弟，快整装，自古男儿志在四方，努力前行莫逡巡，复兴民族，为国做栋梁。好姐姐，莫惊慌，古来征兵有汉唐，寓兵于农农即兵，国强家富谁也难抵挡。好妹妹，看分明，宋明亡国是何因，不用征兵用招募，内忧外患，无力去肃清。同胞们，勿惊扰，男儿当兵要趁早，谁不爱国与爱家，御侮卫国，只有征兵好。”转引自莫子刚：《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载《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4期。

王光炜又曾在其手下任团长。这次送兵来云南，是因为军长何绍周打算起用这个心腹老乡——据传是要接替第 103 师副师长郭惠苍甚至师长熊绶春，所以王光炜到后与此二人关系很微妙。何绍周虽已通过其叔父何应钦免去王光炜遵婺师管区的团长职务，但因战事紧张不容阵前换将，暂让王光炜在军部充任高参。在前一段讨论攻坚方案时，何绍周请王光炜也参与意见，王光炜提出以火力压制日军、步兵波次突击的战法，何绍周担心会造成较多伤亡，未采纳，而运用了对壕作业接近的“蚕食战术”。

9 月 1 日，第 309 团从黄土坡 4 号高地向 3 号高地攻击前进，经搜索，无敌踪影，但前进中忽然受到从棘中埋伏的敌机枪狙击，伤亡奇重。该团右侧一部曾占领第 2 号高地一角，因受敌各方火力集注射击，无法立足，且该部与主力过于分离无法相互策应，只好收拢至主力方向。在 4 号高地与 3 号高地之间有密林隔断，日军于密林中上下设有伏兵，使第 309 团进攻颇为困难。不得已，伐木而进，不仅进展缓慢，工作终日，仅前进 200 多米。此前，因日军惯于在大树上设置狙击手，我进攻部队对此已有提防，日军便改变战术，多在灌木丛中布置机枪狙击手。当进攻部队搜索时潜伏不动，专等大部队经过时，四面狙击手同时开火，形成交叉火网，使进攻部队既无法抵抗，也不能及时散开、撤退，伤亡惨重。于是，指挥部命令在阴登山待命作为军预备队的一个连约 40 人赶来增援，加强攻击力量。

第 245 团所进攻的辰、午两高地之敌已孤立，遂增调荣 2 团第 3 营主攻辰高地，令第 245 团超越而过攻击午高地。荣 3 团另派兵担任扫荡谷地任务。11 时，我炮兵先行破坏性轰击辰、午高地及其两高地反斜面之敌堡垒，13 时步兵攻击前进，15 分钟后荣 2 团第 3 营仅伤一人，即占领辰高地；14 时第 245 团与从左侧助战的第 308 团占领午高地，两团阵地连成一片。17 时许，荣 3 团亦将谷地内之敌完全肃清。但午高地棱线下有一座大掩蔽部，日军仍在顽抗。当四面围攻部队迫近，日军唯恐遭到火焰喷射器攻击，陆续有十余人冲出掩蔽部，准备拼命突围，当即被我击毙。黄昏时，将堡垒焚毁。

在大寨方向，第 307 团继续向大松林高地右侧攻击，因受其北

端“宙”堡垒之侧射，仍无进展。[54]此时，被该团围攻数日的大寨之敌已成釜底游魂，然仍沉着应战，拼死抵抗，其意志之坚强，实在令人感叹。我军攻击伤亡之大，费时之多，原因正在于此。[55]

当日14时45分，日机9架临空，投下供应品7包于黄土坡北端而去。[56]

表11　日军战机对拉孟守备队空投补给、支援作战情况

次序	日　期	番　号	出动飞机（架）	空投物资（包）	备　注	记载
1	6月20日	第50飞行战队	不详	不详		日方
2	6月28日	第204飞行战队	九八式直协侦察机6（一说4）	不详		日方
3	7月23日	不详	12	约20	空投马鹿塘附近	中方
4	7月24日	第204飞行战队	15（九九式军侦察机3，一式战斗机12）	不详		日方
5	7月26日	不详	12（战斗机5，轰炸机7—9）	18	被我击落九八式轰炸机1架，坠于冯家坡	中方
6	8月6日	不详	9（战斗机3，轰炸机6）	不详	被我击伤1架	中方 日方
7	8月12日	不详	13（侦察机2，战斗机11）	不详	被我高射武器击落战斗机1架（一说2架）	日方 美方
8	8月13日	不详	9	7	空投大垭口北侧	中方
9	8月18日	不详	21	不详	轰炸惠通桥，伤我辎重连长1名，马伤亡6匹	中方 美方
10	8月28日	不详	8	8	空投黄土坡北端	中方 美方
11	8月29日	第50飞行战队	不详	不详		日方
12	9月1日	不详	9	7	空投黄土坡北端	中方

〔54〕《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5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4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5页。
〔56〕同上。

续表

次序	日　期	番　号	出动飞机（架）	空投物资（包）	备　注	记载
13	9月3日	不详	6		空投补给品7包	中方
14	9月4日	不详	不详	不详	空投弹药，被我缴获两包榴霰弹	美方

附　记：

1. 著者根据《空军滇西作战日志》、《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壮烈　拉孟守备队》、《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怒江战役述要》等中日美三方史料统计制表，其中因记忆错误相邻日期的行动应有重复统计的；

2. 据日方资料，在滇西战场支援日军地面作战的日本陆军航空部队为第50飞行战队、第204飞行战队。其中第204飞行战队共出动7次，飞松山3次，腾冲4次。9月3日决定终止对松山日军的空中支援。该两支日军飞行战队初期隶属驻缅甸第5飞行师团，日本战败前转隶驻台湾第8飞行师团，其中部分战机曾参加日本陆军航空兵的“特攻”作战（代号“振武”；海军航空兵“特攻”作战代号为“神风”）。

第 13 章　十战松山

时间：1944 年 9 月 2 日—9 月 7 日。
指挥：第 8 军副军长李弥、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
主力：第 103 师各团及直属队、荣 3 团、第 245 团、第 246 团。
进展：夺取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马鹿塘，收复松山。

（参阅附图 4、附图 32、附图 33）

9 月 2 日：D+90 日

拂晓前，原设在竹子坡的第 8 军指挥所推进到了子高地，居高临下地指挥整个战场。炮兵第 4 连推进至滇缅公路 774 公里路标附近构筑阵地，以便支援对黄土坡的攻击；第 5 连推进到滚龙坡己高地，归第 103 师指挥，支援步兵攻击大寨。清晨 6 时，军长何绍周以电话命令各部：限本日肃清松山之敌，准备通车。[1]

自攻打松山以来，由于日军占据全部高地，远征军基本上是仰攻；此时，则对敌完全呈俯攻之势，从心理上也占据了优势。从拂晓起，左、右两兵团相互协同，从三个方向对残余日军形成合围，向釜底猛扑。

滇缅公路东边的大寨、黄家水井一线，是日军所谓“腹部阵地”，战前为步兵联队部、野战医院及兵舍驻地。战斗中，未派至主阵地的日军伤兵，及从本道阵地（滚龙坡）、崖阵地（壬高地）、纪念碑阵地（辛高地）、小股阵地（癸高地）等处溃逃的残兵多猬集于此。

〔1〕《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9月2日，第308团全力向大寨“天”、“地”堡垒进攻，并包围敌联队部驻地钢筋混凝土坚固掩蔽部。该团组织爆破手两度实施爆破，日军死伤枕藉，且毙命者有多名军官。第307团相继攻占“宙”堡垒、松林高地“荒”堡垒及滇缅公路上的黄土堡垒数处。[2]覆灭在即，顽强之敌仍作困兽斗，点点据守，寸步不让。敌我短兵相接，阵地几得几失，激烈空前。

当日又是雨雾弥漫，炮兵难以对步兵有力支援，但还有比恶劣天气更令人心焦的事。午后1时，第8军接到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传达卫立煌的“申冬未”命令：

1．松山残余之敌为数甚少；

2．目前全局成败，转捩点全在松山；

3．限该军于本日将松山及大寨之敌全部肃清，不得藉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

4．如逾限未能达成任务，着将负责之师长、团长一起押解长官部，以军法从事，该军长亦不能辞其责！[3]

显然，卫立煌对第8军未在自己屡次限期内攻克松山大为愤怒，一周前派督察组前来督战效果也不明显，为此该命令口气严厉异常，且直接敲打到了军长何绍周头上。对此，何绍周已有心理准备。但让他感到诧异的是，电文中“藉口先后及顾虑任何牺牲”似有所出，一时心绪纷乱。但仍努力平静自己，向各部队转饬长官严令，要求部队不必顾任何牺牲，坚决达成任务。

自上午10时许，第309团攻击部队即被敌机枪强火力阻滞于3号高地近前百米内。因兵力薄弱，难以从正面（南）突破，于是改从侧面的双尖峰南部仰攻。团长陈永思接军部通报卫长官严令后，亲临一线督战。14时许，该团官兵攀登山麓陡峻斜面奋勇直上，但却遭到隐匿在各处的敌侧防火力猛射，部队伤亡过半。第2营营长滕兴成负伤，

---

〔2〕《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5—56页。“申冬未”指9月2日13至15时。

副营长率领奋起突击，转眼又负伤。连长多数负伤或阵亡（第4连连长夏国藩被日军用军刀砍伤腰部），只有一名副连长代理指挥残部，始终无法前进，遂与敌相距约50米，陷于胶着状态。激战至黄昏，占领敌最东端一座大堡垒，进攻部队只剩下将士10多名，只能固守待援。[4]

但此刻，第307团、第308团终于完全攻占大寨。

师长熊绶春当即以第308团确保大寨既得阵地，令第307团继续向黄家水井推进。黄家水井为松山日军军需供应基地，利用山谷内斜面挖洞作为仓库和材料存储所，并收容重病号疗养，工事构筑极端坚固。堡垒盖材直径多为七八十公分，四周皆以汽油桶盛土被覆，所有房屋均有射击设施。因其周围茂林丰草，异常荫蔽，第307团屡遭敌伏击，攻击未得手。

深夜，第8军司令部下达“怒战字第33号”命令，确定次日拂晓发起最后攻击，歼灭松山全部日军。将攻击部队区分为左、右两兵团，令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为右兵团指挥，率荣3团配属荣2团第3营、第309团攻击黄土坡第1、2、3号高地；以第103师师长熊绶春为左兵团指挥，率本师主力第307团、第308团及彭剑鸣支队（第246团余部约一连），协力扫荡黄土坡以西黄家水井、马鹿塘残敌。另以第245团担任松山既占地区守备队；以副军长李弥统一指挥该守备队及右兵团。[5]具体部署为：

1. 荣3团配属荣2团第3营，移至第309团之右，攻击黄土坡1、2号高地；

2. 第309团以全力攻占3号高地；

3. 第245团接替守备寅高地，继续清扫5号、4号高地；

4. 第308团以主力肃清大寨之残敌后，以一部协力第307团攻击；

5. 第307团配属第246团加强连，攻占黄家水井后向马鹿塘进击；

---

〔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55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6页。

〔5〕《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6．军搜索营及特务营各一连，推进松山，为军预备队。[6]

9 月 3 日：D+91 日

清晨，第 308 团清扫大寨战场，发现阵地上敌尸狼藉遍地，不下 300 余具，却没有一个伤兵可抓做俘虏。因日军各掩蔽部被火焰喷射器焚烧，无法进入逐一查清。[7]

自本日拂晓后，荣 3 团逐次攻击到达第 309 团右翼，向黄土坡 1、2 号高地发动进攻。第 309 团见友军协同，斗志激发，奋力再攻，终于在午后 1 时占领 3 号高地的一座堡垒，该团第 1 营营长张炳其头部负伤。荣 3 团与 1、2 号高地之敌激战至黄昏，陷入胶着状态。[8]

在日军战史中，松山最北端滇缅公路拐弯处上面的 1、2 号高地名为"松山阵地"，最初是由第 4 中队小队长松尾良种中尉率 50 名步兵防守，并配备了机枪。7 月下旬，松尾奉命率一部前往增援本道阵地（滚龙坡），此时在 1、2 号高地的残余日军仅有一个分队（班）左右。[9]

3 号高地，主体部分应在日军西山阵地范围。但当日被第 309 团攻占的这座堡垒，正处于松山阵地与西山阵地结合部，又被称为"西山—松山联合阵地"。因此，在品野实、太田毅的著述中时常以"松山阵地"或"西山阵地"混称，不尽统一。

这天午后，沉默已久的日军炮兵破天荒地打出了一枚榴弹炮弹。

当时，横股阵地野炮第 7 中队的日军发现，在松山主峰音部山高地上，一排排我军官兵正站立着向此处指点观望，其中有一位举望远镜者似为高级指挥官。此时，日军仅剩最后一枚 105 毫米榴弹炮，本来是留着在最后时刻破坏大炮的，这时小队长木下昌巳下令搬出来装入炮膛。因为此前已破坏了火炮瞄准具，只能凑合着目测瞄准了，木下昌巳下令，炮兵伍长浜田正义将炮弹打了出去。炮弹一出膛就偏高了，弹道抛物线掠过了松山主峰山头，飞到背后的怒

---

〔6〕《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59 页。

〔7〕同上书，第 56 页。

〔8〕同上书，第 59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86 页。《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9〕［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175 页。

江峡谷里去了。木下当时遗憾不已。

后来，木下奉命逃出松山后，在芒市的第56师团司令部整理监听到的远征军情报时，看到一条消息：拉孟日军最后还向惠通桥炮击。原来，那枚最后的炮弹阴差阳错地落在了惠通桥附近，还对桥体造成了一定破坏。[10]木下后来常常跟人提起这瞎猫撞上死耗子的一炮，显出自鸣得意之色。这是最典型的日本人思维方式——当战争的结局无可争辩后，就在过程上抓一些“闪光”的细节聊以自慰。辻政信、服部卓四郎战后所写的书都是这个路子。

据方国瑜著述：“3日夜，日军组织兵力向第309团所占领的堡垒猛烈反扑，阵地得而复失。团长陈永思奋不顾身，亲自抽集其勤杂兵、通信兵及重武器兵组成的‘杂牌’部队约200余人反攻。”[11]

关于3日夜日军这次反扑及第309团阵地“得而复失”，在有关松山战事的撰述中，形成了一个“焦点”。

据日方资料佐证，确有这次夜间偷袭行动。

品野实著述中披露：“松山阵地[12]被远征军占领，对坡下300多米的横股阵地即形成瞰制之势，因此日军无论如何也要反击夺回。”真锅大尉决定由野炮第9中队长毛利昌弥大尉担任指挥，发动一次夜间逆袭。出击的兵力是西山阵地野炮第9中队的二十几个人，及由横股阵地增援的野炮第7中队长泽内秀夫中尉带领的二十几个人。经夜间偷袭后，阵地一度被夺回。[13]

后来活下来的野炮第7中队小队长木下昌巳，也参加了这次行动。不过他对偷袭时间记忆模糊，有时说是“2、3日左右”，有时却说是“3日拂晓”[14]——根据当时我军战线推进情况，方国瑜所述3

[1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03—304页。

[11] 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6页。《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0页。

[12] 如前，应是“西山—松山联合阵地”。

[1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7、308页。

[14] 同上书，第308页。王外马甲曾请萨苏帮忙在日方资料中查找这次日军反扑的情况，萨苏在博客文章《松山日军守备司令之死的考证——回王外马甲〈战地蒲公英〉题》中，援引木下昌巳记录的《拉孟守备队玉碎记》，记日军于3日拂晓行动。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0at7.html。

日夜似为一种可能，还有一种可能后面另说。

品野实、太田毅曾分别采访过木下，综合他们著述中所写的战斗过程如下：

天快黑下来时，夹着毛毛细雨的雾从水无川（勐梅河）不断升起，一会儿工夫衣服就被淋湿。由第7中队长泽内秀夫率领的十多名官兵向西山阵地和松山阵地斜面的洼地悄悄地摸爬过去，进入攻击出发位置，此处距离中国军队占领的阵地仅有30米。就在这前后，从西山阵地方向由野炮第9中队长毛利昌弥率领的二十多名士兵也到了，并分散布置于第7中队左翼。毛利昌弥大尉掌握着四十多名兵力，他手里拿着一根竹鞭，站在那里小声地给众人提示攻击注意事项……

天终于完全黑了下来，什么都看不清。毛利昌弥大尉发出命令：

“突击！”

当木下与本中队的二十几个人刚突入被中国军队占领的阵地时，眼前十几米的地方冒起了火花，中国军队的机枪“嗒嗒嗒”地响了起来。转眼间，木下感到右肩像被一支烧红的火筷子穿透了。此时，中国士兵已经从战壕站了起来，上半身露在外面举枪应战。木下等人似乎忘记了一切，发狂般地冲了过去，挥舞着军刀横扫。漆黑之中，敌我双方士兵叫喊、碰撞着相互厮杀，混战、乱战成一片。不一会儿，中国士兵迫于压力下退了下去。

此时，子弹仍不时飞来，木下匍匐在地上准备迎击中国军队逆袭。忽然看见一个黑影从左侧两米处扑过来，双方面对面时，因为无法分清敌我，对方犹豫了一下，右手握刀的木下已下意识地举起了左手的手枪，随着“砰”的一声，黑影倒了下去。“应该是敌人吧？”木下心里忐忑地爬了过去，摸到对方身上的棉布长条子弹带，确认是一名中国士兵，才松了一口气。

不一会儿，前面传来中国士兵咿呀咿呀的声音，随着一声尖锐的命令，木下身边响起了“砰、砰、砰”的手榴弹爆炸声。虽然脸贴在地上，但木下左上嘴唇还是被弹片击中钻进肉里，所幸未伤到骨头。刚才突击时，也只是被子弹穿透肩部，也未伤到骨头。

中国军队退了下去，阵地一时安静了下来。[15]

此后，我军加强了警戒，日军也一夜没睡等到了天亮。东方天空刚泛白时，日军留下一部分人，其余人员撤往松山阵地。但野炮第7中队长泽内秀夫却不见了踪影，木下昌巳迅速赶到昨夜的攻击出发位置附近，发现泽内中尉被一颗子弹从钢盔顶部击穿脑部，满脸血迹倒在地上。

木下与中野伍长把泽内抬进战壕，这时他的喉头就像被痰堵住一样直冒血，已经神志不清。木下与中野商量后，用手枪对准泽内的太阳穴补了一枪，让他断了气。然后，中野割下他的一绺头发，回到了横股阵地。本中队的小柳彻顺曹长也被机枪打中了手，回到阵地后疼得一个劲地惨叫。此人入伍前是福冈筑城町一个寺庙里的和尚，曾为战死者诵经超度，此时却一点也不淡定。尽管木下右肩的子弹贯通伤也疼痛难忍，在部下面前只能强忍着。[16]

中方资料关于第309团丢失3号阵地之事，却颇具争议。

参加过松山战役的不少贵州籍将领，在解放战争后期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在贵州政协系统担任委员。贵州政协工作人员汪德仲曾采访过几位当事人，后来撰文披露："面对日军逆袭，第309团因弹药耗尽，无法击退敌人，陈永思命令暂时后退，待弹药补足再攻击。不知何人因不了解情况而谎报上级，说松山已经占领，因系第309团陈团长后退，致使攻下的阵地丢失了。卫立煌获报急电令何绍周立即就地枪决陈永思。何绍周知道，第309团担任攻击任务以来，部队损失达三分之二。此番丢失阵地事出有因，拒绝执行处决陈永思的命令，决定派军部高参王光炜代理第309团团长指挥攻击。"[17]

---

〔1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08页。[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78页。

〔16〕同上。

〔17〕可参见汪德仲贵州政协报文章《抗日将领陈永思》：http://www.gzzxb.com/tzzx_new.aspx?id=474。

著名文史作家王外马甲（本名黄晓峰），曾采访到一位昔日在第309团参加松山后期战斗的贵州籍老兵蔡智诚，根据其口述著成纪实作品《战场上的蒲公英》，颇具影响。他对此事的记述为："第309团付出3个营长全部重伤的代价，总算冲上了长岭岗（即黄土坡）。部队刚杀上山头，李弥就向卫立煌报告：'我军收复松山！'可他刚放下电话，日军一个反击，第309团又被赶下来了。李副军长恼羞成怒，指责第309团团长陈永思'擅自放弃阵地'，远征军总部立刻打来电话，命令第8军枪毙陈永思，即日收复松山。"[18]

这一记述基本事实准确，细节上略有可商榷之处，比如，即便李弥急功近利，怎么可能在第309团刚"杀上山头"就敢报告卫立煌"收复松山"？且不说3号高地，此时黄家水井、马鹿塘还在日军手中呢。但是，笔者由此却再次感触到了第8军中的"派系"矛盾。以何绍周为首的贵州籍官兵，对本部在战斗中的表现，均予以肯定和维护。而副军长李弥显然有很多不满之处，松山之战对他无疑是个重要机会，所以必须借此多挣"表现分"，向卫立煌反映何绍周指挥不当自然可以突出其本人功绩。如此来看昨天卫立煌来电对第8军"藉口先后"及"顾虑牺牲"的指责，就可以想到可能是李弥反映的结果。到底真实情形如何，今天也许很难完全客观地把握了，因为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都难免有基于自身利益的立场和态度，后人面对的多是此类矛盾参杂的"公婆"之说。我们只能努力听到尽可能多的声音，也许才会在内心形成较为接近真实的判断吧。

从大后方来松山送新兵的补1团团长王光炜被何绍周临危授命，令其代理第309团团长，接替陈永思指挥后续战事。王光炜本是冲着当官来的，却毫无准备地当上了敢死队，承蒙老长官厚爱器重，该效力的时候哪能退缩，按军中规则来说这就是"关键时刻得冲得上去"。

据方国瑜著述：直到4日拂晓，陈永思仍手执冲锋枪在距敌堡约百米处督战猛攻，并未因免职而撤下阵地。并且在当日中午12时

---

〔18〕王外马甲：《战场上的蒲公英》，第22页。

许，得以恢复3号高地既失堡垒一座，而陈永思也于此时身负重伤，王光炜这才被派往代理指挥。[19]即，王光炜从代理陈永思指挥，到后来负伤撤下阵地，时间从4日中午至5日天亮。但因为此战是其一生的亮点，并且战后因此荣获青天白日勋章，所以他在回忆文章中描述得颇有波折：

卫立煌得知第309团丢失阵地，非常生气，电令何绍周就地枪毙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并斥责第8军指挥官指挥不力，要以军法从事。继后又下达了笔记命令给何绍周，限期攻下松山，否则第8军团长以上人员一律押解长官部法办。同时还给何绍周一封亲笔信说："绍周，切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

何绍周把卫立煌的手令给我看，并对我说："光炜，现在只有你来喽！就按你的打法，要怎样打就怎样打。"我问："部队呢？"何说："别的部队没有了，就是第309团这点部队了。"当时，我感情激动，目睹曾在上海、武汉、宜昌等地共生死的长官目前的困境和老同事、第309团团长将要面临的不幸，以及过去曾共同战斗的许多官兵的牺牲，我怎能袖手旁观！但是，刚败下来的第309团还能不能继续再战？经过思索，我想：古代孙武子吴宫练兵，妇女尚能赴汤蹈火，难道这些黔中健儿就不能冲锋陷阵？只要鼓起他们的勇气，是一定能够战胜敌人的。因此，我毫不推辞地接受了战斗任务。

受命后，考虑到过去战斗中因多头指挥造成的混乱情况，我向军长何绍周提出了要求："军长！我这次去战斗，是组织敢死队与敌人进行搏斗，战况是十分紧张的，变化也是很大的。我只接受军长一人的指挥，其他指挥官的电话我一概不接，否则就顾不上指挥部队，影响战斗。"何绍周说："你由我直接指挥。"接着他用电话通知了第103师和第309团团长陈永思。[20]

---

〔19〕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6页。《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0页。

〔20〕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4页。

超链接 20：卫立煌“威服”何绍周考证

在很多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和有关著述中，都提到了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威服第 8 军军长何绍周的故事。其中第 20 集团军第 53 军第 130 师师长王理寰在回忆文章《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中的记述较有代表性：

到 8 月底，第 8 军攻击尚无进展，伤亡甚大。卫立煌亲自到松山前线视察，对第 8 军军长何绍周反复指示，并说：“敌人已是山穷水尽，精疲力竭，可选用适当战术，出奇兵攻之，松山很快就能攻下。”卫立煌回指挥部后，给何绍周一个详细的攻击命令，限该军于两周内攻下松山，以绝后顾之忧。何绍周当时在电话里表示，攻击不下来。并说：“长官先把我枪毙，另找旁人来松山吧！”卫立煌在电话里笑说：“不用急躁，不服从命令，当然枪毙！”后经参谋长萧毅肃多方晓以大义，并告诉何，在战场上，依恃家庭势力是要吃亏的。卫长官是敢做敢为的。何绍周这才不得不按命令实行。结果不到十天，果然把松山攻下，敌人被全部歼灭。[21]

王理寰写这篇记述卫立煌功绩的文章，一定是代表了很多第 53 军将领对这位卫老总的感念之情，因为第 20 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曾以第 53 军为“东北军张学良余孽”，打腾冲“作战不力”为由报请蒋介石解散吞并该军部队、并将军师长一律以军法治罪，卫立煌主持公道给予了公正对待。[22] 但第 130 师师长王理寰一直在腾冲方向作战，他的这一叙述肯定以“后来听说”的成分居多。多种资料表明，卫立煌的这次震怒，应该发生在 9 月 3 日晚第 309 团丢失 3 号高地阵地之后。据说他听了第 8 军副军长李弥的报告，非常愤怒，

〔21〕王理寰：《卫立煌率师反攻滇西》，据《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 382 页。

〔22〕同上书，第 381 页。据说卫立煌告诫蒋介石：第 53 军作战始终有功；全国杂牌军约有两百万，若动第 53 军，会影响其他杂牌军的士气。参见卫道然《卫立煌将军》，第 133 页。

当即打电话要求何绍周马上枪毙第309团团长陈永思。大概何绍周正是在此时情急之下顶撞了卫立煌。

第309团团长陈永思是否该被枪毙？笔者研究资料后认为，应是李弥向卫立煌做了偏颇的报告，卫立煌有冲动失察之处，而何绍周的抗上言辞不乏爱惜部下的上官之德。第309团是8月24日开到松山战场的，在28日开始的第8次攻击中的表现可圈可点。尤其是29日夜在寅高地，其第3营在白天激战半日后，又于午夜连续打退日军7次反扑，营长黄人伟身负三伤犹喋血督战，全营伤亡200多人，且刀伤最多。叙事严谨的历史学家方国瑜曾有评价，其“牺牲壮烈，堪与荣3团之子高地争夺战相比美”。9月2日，第309团第2营营长滕兴成、第1营营长张炳其又先后负伤，全团3个营长全部负伤，可想官兵已尽力战斗。

至于3号高地之难打，后来证明确实事出有因。这个日军所谓的“西山—松山联合阵地”，是其野炮兵阵地、炮兵观察所所在地，丢失松山主峰后，这里就成了日军的核心支撑点。实际上，这个阵地的日军是直到9月7日拂晓才被荣3团、第245团和第309团3个团的剩余兵力联合肃清的。

据说，卫立煌在震怒之余，还让人给何绍周带来了一纸手谕，上书：“绍周，切勿以熟相欺，以身试法！”以卫立煌的辈分和职务，断不会说与何绍周“熟”，这里的潜台词是：别拿你的那个靠山何应钦来要挟我！〔23〕这几乎是发出“斩马谡”的预令了。但何绍周仍没有枪毙陈永思，而是让另一心腹、军部高参王光炜代理指挥。按王外马甲在《战场上的蒲公英》中的分析：王光炜代理指挥后，就多了一个责任——“何绍周暂时压着‘枪毙309团团长’的命令不办，如果王光炜能把松山拿下，陈永思的命就能保住；如果这一

〔23〕据李仲明《何应钦大传》（第223—225页）载，卫立煌与何应钦素有前嫌。1927年北伐战争龙潭战役时，担任第一路军总指挥的何应钦，曾对其指挥下战功卓著的第14师赏罚不公，令卫立煌颇为恼怒，给欲图解释的何吃了闭门羹；1941年中条山战役失利，本是蒋介石委派参谋总长何应钦前往洛阳主持作战部署失当，但蒋偏袒何而诿过于怀疑有通共嫌疑、离开前线在重庆述职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卫在战役总结中对何颇多指责。基于宿怨，在蒋介石因松山战局不利已预令要对第8军将领军法处置时，卫立煌可以完全不必顾惜何应钦的情面。

仗打输了，两个贵州老乡的脑袋一起搬家。”[24] 王光炜到位后，陈永思不但未撤出阵地，而且与王光炜并肩指挥，并在后续战斗中身负重伤，说明陈永思确实不应是该被枪毙的优秀团长。

何绍周一个军长敢当面顶撞远征军最高司令长官，固然有爱惜部下的原因，但主要资本还是因为有叔父何应钦这个“靠山”。这时，何应钦的亲信、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赶紧出来打圆场，在处事圆滑、熟知卫立煌性格的萧毅肃开导点拨下，何绍周马上意识到自己这种“太子脾气”在卫立煌面前是吃不开的，弄不好真有杀头之祸。卫立煌当时没有暴跳反倒报以冷笑，确实是那种特立独行、敢于阵前杀将立威的统帅性格。假如何绍周不识时务，逼着卫立煌真的开了杀戒，即便是制造了冤案，那也只能等后人在研究文章里为他昭雪了。

当日在黄家水井方向，左兵团以第 308 团任守备队，以第 307 团为攻击队。7 时半，第 307 团利用夜袭成果，指挥所属及配属部队乘炮兵猛烈射击后，即以主力向黄家水井南侧，一部向其东侧开始进攻。初颇顺利，追进至村落附近，因地形复杂，草木丛密，遭受敌各处隐密侧防火之射击，及与敌反复肉搏，预备队无法增援，所有突入部队伤亡殆尽，攻势即告顿挫。旋以第 309 团第 5 连（军预备队）增加火线，实施第二次攻击，冲杀 4 次，终为敌炽盛火力所制压，伤亡过大，迄未得手。午后 1 时，为挽回颓势，师长熊绶春饬该团挑选敢死队，诱导步兵主力分三路向敌阵突击，反复争夺，损伤甚重，仅占领黄家水井南侧房屋 5 栋。午后 5 时，为扩张战果，再组敢死队强攻，因敌凭坚固堡垒顽抗，无法接近，仍未奏功。[25]

9 月 4 日：D+92 日

4 日拂晓，左、右两兵团接到军部昨夜 9 时发出的“怒战字第 35 号”命令，内容如下：

---

〔24〕王外马甲：《战场上的蒲公英》，第 23 页。

〔25〕《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查各部队对于9月2日军部‘怒战字第33号’命令仍未彻底达成，依限肃清松山附近之残敌殊有未合。兹再重申前令，务彻夜攻击，期于明（4）日内一举扫清，除呈报长官部请予宽限外，仰各部队长不得再违致干法令为要。”

第103师据此以“作命滇字第17号”命令，转饬各部遵照。其要旨为：师决于本（4）日黄昏前攻占黄家水井，并于奏功后续向松山尾1、2、3号目标攻击；程团（第307团）应不顾任何牺牲，以全力攻击黄家水井而确保之，成功后续一部向1、2、3号目标攻击；文团（第308团）应攻占寅高地东南角独立家屋，并将山腹小公路上敌两个小堡垒攻占之。

左兵团指挥熊绶春令第246团残部组成的加强连（彭剑鸣支队）及师部工兵连、搜索连，加强到第307团方向，各部分三路向黄家水井合力猛攻。鏖战终日，伤亡异常重大。至黄昏时，仅占领黄家水井南半部两个堡垒。师为扩张战果，另饬第308团派队由午高地向黄家水井东侧攻击，配合主力攻击。[26]

在黄土坡北端，荣3团配属荣2团之第3营向1、2号高地反复猛攻，占领1号高地东端一座堡垒，兵员只剩下18名；又占领2号高地，兵员仅剩6名。由于兵力薄弱，也无力再扩张战果。[27]

当日中午，前来代理指挥的王光炜在3号高地前与负伤的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交接指挥权。此二人均为何绍周心腹爱将，何如此安排也是深知他们能协力配合。据方国瑜著述，此后两人协力指挥攻击3号高地其余两座堡垒，至当日黄昏攻占，但当晚再次遭到日军夜袭。[28]

王光炜本人对这一过程的描述显得非常拖沓，从编组敢死队、制定攻击方案、动员部署及投入战斗，似乎经历了两三天时间，而此时的战况显然不允许如此。王外马甲在《战场上的蒲公英》中，

---

〔26〕《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2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0—61页。

〔28〕同上书，第60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6页。

将王光炜代理指挥的时间从9月2日算起，但是笔者综合各种资料来看，2日之前第309团的战斗并没有什么可挑剔的，8月29日第3营在寅高地的反击战还是“堪与荣3团子高地争夺战相比美”的亮点，卫立煌没有理由发怒到要下令枪毙团长陈永思而导致临阵换将。笔者感到，应是王光炜对其一个昼夜的战斗经历，做了过于铺排的表述。因此，仅择其大要转述如下：

当时，陈永思对王光炜的到来表示真诚的欢迎，说：“你肯来团带部队作战，是我生死相交的好朋友，我绝不下去，一定和你一起带部队战死！”王光炜听后很感动，说：“我们不仅不会死，还一定要打胜仗！”两人把部队集中起来清点人数，全团尚有400多人，3个营长和一些连长负伤下去了，没有负伤的只有副团长周志成（一说为周治成）和几个副营长及连、排长。遂决定将现有人员编成9个突击队（一说是5支突击队），指定副营长和一些连长担任突击队长，并编了3个爆破小组，在进攻时为突击队开辟通路。[29]

第309团卫生员李文德多次回忆到这天的情景，他说，当时团长陈永思把全团的人集中起来清点，还剩下450人。陈永思什么也没有说，就用贵州话问了大家一句话：“勇敢前进不怕牺牲这种人咯还有？”当时150多人举起了手，李文德也举了。这批人，就成了敢死队。而后当场给每个敢死队员发了2000块国币，李文德说，当时在保山城吃一碗饵丝的价格是5块国币。[30]

王光炜集合全体官兵讲解战斗要领：“这次我们组织的是敢死队，分成主攻部队和助攻部队，我和陈团长带6个突击队为主攻，周副团长带3个突击队为助攻。冲入敌阵地后，要求沿壕与敌人搏斗。距敌远时开枪射击；稍近就投手榴弹；靠拢敌人就拼刺刀、用枪托打。夺得敌人阵地的立即固守，改造工事，射击敌人。”又宣布了战场纪律：“在进攻前进中，我在中央突击队的先头指挥战斗。前进中，如果哪一位弟兄发现我离开了指挥位置，那就是我临阵退缩，

---

〔29〕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3页。

〔30〕人民网文章《中国远征军老兵讲述战火亲历：血色满滇西》，黄怡撰文。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611808.html。

你们任何人都可以开枪打死我。同样，你们在进攻前进中，如果有哪一位弟兄畏缩不前，那就要就地枪毙，绝不宽恕。进攻前进中受重伤的，就找适当地点隐蔽，等待战场救护，但不要号叫，以免影响军心；轻伤要忍痛继续战斗！”

午后，我军炮兵一开始射击，王光炜就用信号弹令副团长周志成指挥他带的3个突击队向敌佯攻，日军果然被吸引住了。王光炜和陈永思趁机带着隐蔽在敌阵地右翼山脚下的6个突击队，接近敌阵地前沿，在破坏组的前导下，出敌不意，一举突入敌阵地内，与敌展开激战。佯攻部队随即也转为强攻，突入敌阵地，两队会合，与敌展开搏斗。这时，我炮火已延伸射击，敢死队员沿着敌壕向敌冲锋，手榴弹、机枪、刺刀都用上了，敌阵地内硝烟弥漫，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杀声交织在一起……〔31〕

王光炜对战斗过程的叙述一带而过，但在一线冲锋陷阵的蔡智诚的记忆中，却是细腻非常。王外马甲所著《战场上的蒲公英》中，留下了一位参战老兵最为翔实准确的战斗记录。谨择要转述如下：

时年22岁的蔡智诚，是贵州遵义的一个名门富家子弟，与第8军军长何绍周过继四弟何辑五的女儿何丽珠是中学同学。本来在南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电机系好好地读书，因一名中央军校教官一事不顺用军棍暴打了自己的老师、实验室主任俞国顺，在“美国援华协会”当医生的姐姐也在街上被一伙兵痞欺负，蔡智诚一怒之下决定弃笔从戎，要参加刚刚组建、正在招兵买马的“青年远征军”，想混出个名堂来“改造旧军队”。〔32〕这自然是一份书生意气。但正

〔31〕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5页。

〔32〕据介绍，蔡智诚欲从军“改造旧军队”的想法，深受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雷海宗思想的影响。1940年2月，雷海宗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学术论文集《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当时在知识界影响颇大。雷先生认为，中国旧文化是“无兵的文化”，偏重文德，使人文弱。士大夫对兵戎之事不了解、不关心，致使流氓无赖充斥行伍，军队的素质低下，不能满足文明社会的要求。“无兵的文化”使得国家“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所以他主张知识青年应该去当兵，因为“文武兼备的人有比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会也是坦白光明的社会”，他倡议知识分子应该修炼“武德”，修正畸形的“文德”，以此来振兴民族的风气。当时，主管贵州党务的张道藩（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部长）曾拿着雷海宗的书到浙江大学来搞宣传。“青年远征军”政治部主任蒋经国也到浙大来做演讲，以“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鼓动青年学子去当兵。

好遇上正为征兵发愁的王光炜，就把他带到了保山前线。毕竟是个“关系兵”，王光炜本想让他先在第103师过渡一下，就推荐到昆明的“青年远征军”第207师，不料蔡智诚忽然改了主意，要跟当了敢死队长的王光炜去打松山。急着用人的王光炜只好同意，何况大学生蔡智诚因为能看懂英文兵器教范，在新兵教导队无师自通地掌握了美式火焰喷射器，成了人才难得的“喷火枪”射手。

王光炜率队将要攻打的3号高地，是由3个山头组成的“品”字形阵地。第309团经过两日激战，已占领了最东端的一座，姑且称之为A山头；眼下正进攻的是B山头。B山头前是一个60度左右的陡坡，坡上是日军的阵地，坡下是一堆乱坟岗。此前我突击队组织了几次冲锋都失败了，最久的一次在坡顶上停留了大约十分钟，但最终还是退了下来。

几名军官正商量着继续发动进攻，突然，坡顶上出现了几个鬼子兵，抱着一枚炮弹就往下扔，没有了手榴弹的鬼子真是急疯了。炮弹蹦跳着滚下山坡，引信撞上乱坟岗里的石碑，立刻爆炸，我军官兵躲避不及当场被炸死了几个。

突击队不得不重新组织兵力。一个多小时以后，攻击部队再度集结起来，这一次，由副团长周志成带队。蔡智诚全副武装，参加了新一轮的突击。

开始的情形和前几次一样，我军爬坡的时候，日军不射击；等突击队员攀上坡顶，枪声就一齐响了，士兵们立刻中弹滚了下来。王光炜和陈永思守在坡底督战，催促着大家继续往上爬，这样反复了几个回合，攻击部队终于在坡沿上站住了脚。

蔡智诚在助手罗烟杆的帮助下好不容易爬上去。上到坡顶，他发现60米开外就是日军阵地，有战壕，还有一大一小两个碉堡。战壕里的鬼子已经被我们的机枪火力压制住了，可大家面对碉堡却束手无策。

碉堡露出地面一人多高，大碉堡有3个射击孔，小碉堡有一个，4挺机枪喷出的火舌覆盖了整个阵地前沿，打得人无法直起身来。我军十几个射手用枪榴弹进行攻击，可枪榴弹或者打在射击孔的旁边落了下来，或者砸在碉堡的顶上爆炸，对日军工事根本不起作用。

第309团有一个喷火小队，原本装备有3支“喷火枪”，这时只剩下了一个人。那个喷火兵在火力的掩护下滚过来，爬过去，好不容易爬到了碉堡的正面，探出喷火枪刚要发射，就被日军重机枪击中了。接着，子弹又打穿了他背上的压缩空气瓶，爆炸产生的气浪把这个喷火兵掀起来好高。

这情景把毫无战斗经验的蔡智诚看得目瞪口呆。

突击队被压制在阵地前沿。人堆里，蔡智诚背着两个大铁罐，还带着助手，显得十分耀眼。周围的士兵都望着他，意思是“你有这么威风的武器，还不赶紧想个办法……”蔡智诚急了，一咬牙，就准备照着那个射手的样子朝碉堡前面滚。

助手罗烟杆是个老兵油子，连忙拽住他：“不行！没有火力掩护，一上去就是死！”蔡智诚赶紧请示长官：“掩护我！我冲上去喷火！”

“小蔡，快过来！”不知什么时候，陈永思团长已经到了阵地上，蹲在副团长周志成旁边向他招手。“你看见没有，那里有一个弹坑。”陈永思指着大碉堡的侧面，“我们组织火力掩护，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能不能冲过去？”

蔡智诚看见了50米外的弹坑，那里距离日军碉堡只有30米左右。“能过去！”——可是，喷火枪在那个位置根本无法瞄准敌人的射击孔，而碉堡的侧面又没有门窗或者孔洞，冲到那里能有什么用处？

“你不用把火焰打进碉堡，只要在地堡前打出一道火墙，挡住敌人的视线就行了。我带爆破队上去炸了它！”

9个敢死队员已分成了3个组，陈永思也拿着爆破筒准备一起上。副团长周志诚急了，伸手就去抢爆破筒：“你不要上，我上！”陈永思说：“有什么好争的？今天拿不下阵地，回到山下也是死，还不如死在山上痛快些！”

蔡智诚和爆破兵们顿时十分激动：“团长，要死大家一起死。我们先上，等我们死光了你再上去！”周志成咬牙一声令下，机枪、步枪和枪榴弹的火力一齐射向了大碉堡。爆破兵立刻跃出坡沿，滚翻爬跳，冲向各自预先选定的掩体。

蔡智诚朝着那个弹坑奔去。在10秒钟里，全副武装的他跑过被

炮火肆虐得坑坑洼洼的 50 米泥地，当他终于扑进弹坑的时候，觉得自己紧张得快要虚脱了。但他不能停下休息，短暂的火力压制之后，那些爆破队员又被日军的弹雨拦阻在阵地上了，现在正等待着喷火兵的掩护。这时，日军已经发现碉堡侧面上来了两个突击队员，战壕里的步枪手立刻向这里射击，子弹“嗖嗖”地从头上飞过。

蔡智诚挪动身子，观察碉堡的位置距离，心里默算着应该使用多大的喷枪压力。一切准备就绪，他在弹坑的边上刨出个缺口，探出枪口，扣动扳机，“噗——噗——噗——”灼热的火龙飞出了掩体。3 秒种的标准射击之后，蔡智诚探头看了一眼，喷枪的角度和气压计算得非常正确。凝固汽油从斜侧方喷出去，划出一道抛物线，正好浇在碉堡正面的外墙上，熊熊的火焰立刻把射击口封得严严实实。

日军的机枪停顿了，就等着爆破手炸碉堡了。

蔡智诚和助手捂着头在弹坑里趴了老半天，却丝毫没有感觉到爆炸的震动。终于忍不住探出脑袋张望，发现鬼子的射击口虽然被烈焰封着，但机枪隔着火焰盲射，照样把试图突击的敢死队员拦阻在阵地前沿。

可是，这时候日军的地堡却和先前不大一样了——厚实的顶盖上热气腾腾地冒着烟，看上去就像包子铺里的大蒸笼。原来，松山日军碉堡的材料并不是钢筋混凝土，而是用几层木柱铺上泥土搭建而成的。经过长时间的炮击，泥土震散了，木柱也震松了，凝固汽油喷上去就渗进了木架的缝隙。松山当地的木料大多是松木、核桃木、栗木，所含油脂比较多，遇到灼热的火焰，木头里的油脂和水分就被迅速蒸发出来，使碉堡的顶盖变得烟雾缭绕。

鬼子的地堡能燃烧？那就好办了。蔡智诚二话不说，抬起枪口接连打了两个“三秒”，这回也不必考虑落点，只管加足压力，把凝固汽油直接喷到堡垒壁上就是了。随着“嘭嘭”的爆裂声，浓烟里蹿出了一股股火苗——“大蒸笼”变成了“烽火台”。

这时候，山顶上正起风，风从地堡的射击孔灌进去，就像生炉子一样，把堡垒烧得噼里啪啦直响。到这个地步，鬼子再顽强也没办法还击了，阵地前沿的第 309 团官兵都高兴得欢呼起来。

干掉了大地堡，还剩下个小地堡就好办多了，四五挺机枪同时开

火，把它唯一的射击口封锁得严严实实，一粒子弹也打不出来。陈永思团长兴奋得嗓门都变了调："小蔡，点了它……给我把它点了！"

又是两个标准射击，小碉堡就变成了"大火炬"。

蔡智诚正在得意，突然，不知从哪里蹿出一个日本兵，恶狠狠地扑上来，伸手就抓住了喷火枪。刚射击过的枪口灼热得直冒烟，可鬼子兵却不管不顾，虽然攥住枪头的那只手被烫得"吱吱"响，可另一只手却夺过喷枪扣动了扳机——幸亏，这家伙不懂科学——喷火枪的枪机只是个点火装置，射击之前要先旋动气压旋钮和油阀门，光扣扳机是打不出火的……

这时，蔡智诚才从惊恐中清醒过来，随即和这个日本兵厮打在了一起。蔡智诚背负着沉重的装备，被鬼子压在地下翻不过身来。脸对脸地看着鬼子凶神恶煞的模样，蔡智诚急了，张嘴狂叫："老罗哥呀！快来帮我呀……"喊声未落，就听"砰"的一声，小鬼子仰面倒下了，原来是罗烟杆拎着个压缩空气钢瓶从后面给了鬼子重重一击！

第 309 团的将士们呐喊着冲进敌人的战壕，3 号高地 B 山头拿下了。

蔡智诚跟着大家在 B 山头上转了一圈，发现这里是日军的野战重炮"十榴"阵地。阵地上有两门 105 毫米榴弹炮，早已被我军炮火所摧毁，弯七扭八的成了一堆废铁。[33] 让人意外的是，有一门九二式步兵炮却完好无损——日军用木头做了轨道，轨道的前端是射击掩体，后端是一个很深的防空洞，把大炮推出去打两发，然后再拖回洞里藏起来，难怪我军的炮火和美军的飞机都拿它没办法。

找来找去，山头上只有十几个日本兵尸体，最多不超过二十个。就是这么点兵力，竟把第 309 团的五百多人阻挡了六七个小时。究其原因，日军的"玉碎"精神和防御工事固然起到了主要作用，可我军的战场侦察也太不够细致了——如果早知道日军堡垒是木头做的，就用不着打那么多高爆弹，丢几枚燃烧弹就可以省事得多。

---

〔33〕此描述与中日史料记载的日军炮兵部署情况吻合，即"十榴"炮阵地分别位于本道阵地、西山阵地、横股阵地三处，且西山阵地有两门。

攻克阵地，王光炜兴冲冲地举起信号枪朝天上打了3发红色信号弹，通知其他突击队向这里会合。随后，命令留下部分人员在B山头修筑工事，自己带着大队人马继续杀向C山头。

王光炜决定加固B山头的工事是十分明智的举措。昨天夜里，第309团攻克阵地以后，就因为没有做好防御准备，结果被日军一个反扑打了下来，伤亡惨重不说，陈团长还差点被枪毙，这可是个血的教训。

C山头距离B山头不远，没有大的火力点，只有个炮兵观察所还算是座堡垒，但也被我军的炮火摧毁得差不多了。进攻部队轻而易举地冲上了山头，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蔡智诚站在山头东张西望，心想："难道日本鬼子都跑光了？"

这时候，旁边有人呼喊："喷火兵，快过来！"

C山头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它的坑道特别深，一般的地方在3米左右，有些地段甚至达到了五六米。坑道的侧壁上还挖了防炮洞，有1米宽、1.5米高，能弯着腰进进出出。从洞口看进去，里面黑乎乎的，不知道有多深。

"喷火兵，烧一下。"军官们指着防炮洞。

"里面有人吗？"

"听着有个伤兵，跑不掉了。"

"那……叫他出来投降吧。"当时，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有指示，抓住日军俘虏有奖赏。

"你做梦呢！他们不会投降的，鬼子都是死硬分子。"

这倒也是实话，松山阵地上随处可见日语传单，那都是些规劝日军放弃抵抗的劝降书。美军飞机撒了两个多月的宣传品，也没见一个鬼子下山缴枪。

既然如此，那就放火烧吧。接连打了七八枪，小半截坑道都着火了，只听见几声歇斯底里的咒骂和惨叫，却没看见日本兵出来。不过，蔡智诚也只能罢手了，因为他的气罐子空了，凝固汽油也用光了。

日军的炮兵观察所碉堡原本挺大，现在已经被炮弹和炸弹轰掉了大半边，塌下去的地方露出个洞口，一群官兵正朝里面扔手榴

弹。代理团长王光炜也在这里，他看见蔡智诚就喊："小蔡，快来，点把火。"

"点不成了，没汽油了。"

"哎呀哎呀，哪里还有油？"

"我不知道。"

"军部有个喷火大队，正在子高地那边清理战场。"陈永思团长说。于是，王光炜就与军长何绍周通话，何很痛快地答应说：立刻把喷火队调过来。

这时候，整个3号高地上到处都在扔手榴弹，没过多久就全甩光了，可那些坑道口、地道口却还是黑乎乎的深不可测，大家都不敢进去查看。王光炜说："算了算了，等喷火兵来吧。"

也只好这样，官兵们都随地坐下休息，等了很久也不见喷火队上来。[34]蔡智诚正觉得纳闷，却看见王光炜骂骂咧咧地走过来，陈永思团长也拉长着脸一声不吭。原来，王光炜和副军长李弥吵架了。[35]

对于自己与李弥的冲突，王光炜是这样叙述的：

在战斗十分激烈的时刻，忽然通信排长要我去接李弥副军长的电话。本想不接，但又想到我在湖南芷绥师管区任团长时，他是司令，老上级，我勉强到距离好几十米远的电话机旁接了电话。李弥在电话中对我说："光炜，你们进攻的路线选在左边就可以减少许多伤亡……"我着急地说："副军长，我现在正和官兵一起与敌人拼搏。我下来接电话，跟着的士兵就死了两个。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改变已来不及，待战斗结束后，再请副军长给我们讲评。"我放下话筒，又赶到前面去指挥战斗。[36]

——王外马甲评论说：李弥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因为日军西山

〔34〕《战场上的蒲公英》中蔡智诚叙述当晚在3号高地坐等火焰喷射器的细节，与王光炜在《回忆松山之战》中的记述可相互佐证。

〔35〕王外马甲：《战场上的蒲公英》，第32–41页。

〔36〕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5页。

阵地右侧炮兵营房前有战壕依托，左侧炮兵观察所因原有松山火力瞰制，阵地薄弱。想必是李弥用望远镜从远处看到这一点才提醒王光炜的。但在已经展开近战之际是否容许更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王光炜的愤怒在于李弥干扰了自己的注意力。[37]

而后，王光炜记述当晚再遭日军逆袭的情景：

直到深夜，敌人阵地全部被我们占领，枪声稀疏，只有敌掩蔽部内个别未死的敌人向外放枪。我命各部队立即改建工事进行固守，并和团长、副团长、周彭俊（王光炜从遵义带来的中尉副官）带着团指挥所人员冲到敌掩蔽部上面。敌掩蔽部内的少数敌人，虽然我们用机枪和手榴弹爆炸，但都没有把他们消灭掉。我们就坐在敌掩蔽部上，等军部派火焰喷射器前来，消灭敌掩蔽部内的残敌。

不久，在黄家水井方面的第103师副师长郭惠苍来电话，对我说了一些客气话之后说："光炜，你怎么搞的，副军长对你很不高兴哩！你打仗很勇敢，就是有点不听指挥。"我听后十分生气，便气愤地对郭说："我在第8军还未任职就来当敢死队，难道还对不起第8军吗？本来我这次指挥战斗，事先就同军长讲好了的，只由他一人指挥。在与敌人拼命的时候，副军长忽然来电话，说我进攻的路线走错了，人员伤亡大。我因和他熟，解释了几句，还向他请示有无指示，他说没有，我才离开电话到前面指挥战斗的，根本没有不服从指挥的事实。这样干还得不到谅解，我在第8军还有什么意义？我决定这次战斗一结束就离开第8军。"

电话讲完，我余气未散，在阵地上和团长陈永思、副团长周志成一起谈这件事，大家都感到气愤和不平。

过了一会，第103师副师长郭惠苍又来电话说："你们要注意！我们阵地前面黄家水井那边大约有100多敌人，其中一部分人头上扎了白绷带，拿着战刀，牵着警犬，沿着小路向你们那边来了，你

---

〔37〕王外马甲在《战场上的蒲公英》中叙述，王光炜认为李弥要求自己改变进攻路径，还有为攻下山头抢功打伏笔的意思。笔者以为，以当时战况来看，此虑似乎过于超前了。何况右翼攻击队和松山主峰既占阵地守备队本来就由李弥统一指挥。

们要特别注意！”

接电话后，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从他围攻的黄家水井阵地上抽出来反攻我们的敌人，应当要求郭惠苍派部队截击；也没有想到应即报告军长何绍周，由他设法去对付。因此，我未加思索，就对副团长周志成说：“志成，你带着你的3个突击队，立即进到通向黄家水井小路山垭口上占领阵地，消灭由黄家水井来犯的敌人。”

周志成受命后，毫不犹豫地带着部队去消灭由黄家水井方向来犯的敌人。我和309团陈团长仍在临时指挥所位置注视着占领地面的情况，继续等待火焰喷射器部队。[38]

王光炜提到4日午夜日军再次增援逆袭3号高地，在《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也有记述，但日方资料未见提及。从规模上说，也很难想象日军此时能组织起100多人。但这一记述，却与前面所述3日夜日军野炮第7中队从横股阵地（马鹿塘）增援偷袭西山阵地大致吻合。以郭惠苍的指挥位置大寨为视点，黄家水井与稍远的马鹿塘是一致方向。因此，笔者推测无非两种可能：

其一，就是木下昌巳记错了时间，即日军组织偷袭不是在“2、3日”，也不是“3日拂晓”，而是4日午夜。

其二，若上述推测成立，那么3日晚第309团遭遇的就并非日军组织的这次大规模偷袭，而是3号阵地残敌的小规模反扑。如果是这样，陈永思当晚丢失阵地确实有大意失职之责。笔者所以将日军偷袭之事放在3日晚来讲，从心里来讲是不希望是后一种情形，但也许真相并非如我所愿。

且看王光炜随后的叙述：

周志成带着部队去后不久，我们听到他那方面的前方有狗叫声，接着听到我们向敌发射的机、步枪声。枪声稍停，又听到日寇的喊叫声，紧接着又是我方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之后，双方的厮杀

---

〔38〕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5—26页。

声不断，敌我展开了肉搏，战斗十分激烈。不久，部分日军冲到我和团长所在的团临时指挥位置。团指挥所人员与敌搏斗，有许多官兵阵亡，指挥所被冲乱，陈永思与我也失去了联络。此时，在我身边的只有周彭俊一人。周彭俊说："团长，陈团长他们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他拉着我翻出敌指挥所掩蔽部铁丝网外，转到敌掩蔽部岩坎下，敌人遂占领了我和团长原占的位置，向下盲目投弹。

一时情况不明，造成这种局面，使我们攻占的敌人阵地有功亏一篑的危险。我非常悲愤，悔恨自己对黄家水井来的敌人没有认真对待，没有亲自带队去消灭他们，实属处置欠周，应对此负责。同时我也痛恨副军长李弥，他在我们与敌生死搏斗处于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不仅没有支持我们，反而横加责难，强加给我不听指挥的罪名，因而分散我在战斗指挥中的精力，以致造成差错。我准备一死以承担罪责。

不久，和我们分散的一部分士兵找到我们，又和我在一起，也恢复了与军的电话联系，并派出传令兵分别去找我们占领阵地的部队指挥官，要他们固守已占领的阵地，并齐向占领团临时指挥所位置的敌人开火，消灭他们。

我向军长何绍周报告当前的情况，请他派部队增援。何绍周询问了我所在的位置和团部各部队所占领的位置后，命令荣誉第 1 师赵发毕团增援，这时，天已拂晓……[39]

据第 103 师战斗详报载："是（4）日夜，我右兵团之陈团已倾全力（官兵共 270 余员名）以决死精神攻占黄土坡第 3 号目标。敌我伤亡奇重。陈团长身负重伤，仍在前线督战。接续指挥之王团长亦负伤。是夜敌倾巢反扑，经抽调防毒连一排驰援，甫到遭敌猛袭，该排已全部壮烈牺牲矣。"[40]

---

〔39〕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2004 年 7 月印，第 26—27 页。

〔40〕据《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贵州读者陶维勤看到拙作第一版后曾致函笔者，告之其父陶相宜时任第309团上尉副官，战斗中一直跟在陈永思身边。关于当时的情景，曾留下如下亲笔撰述：

我当时任309团团部上尉副官，受团长陈永思指示先攻上去查看日军情况。我攻进敌阵地时，日军已经狼狈不堪，但仍有少数日军顽强抵抗，我用冲锋枪横扫日军，亲眼看到击毙两名。我跨进日军阵地交通壕，见到日军尸体都在每个散兵坑内，机枪处的四人多是伤兵，胡须很长，头发凌乱。

当时，团长因受日军榴弹击伤腰部，疼痛难忍。我的伤势不大，乃叫我向师部联络请师部增援。师部派来防毒连排长陈兴国带领他的一排人来到，由我亲自指引陈排长部署警戒线。时天已黄昏，日军又由反斜面冲上占领一线阵地，日寇军犬狂叫，但亦不敢过来，见到我们部署乃投掷手榴弹过来，将我身旁的一名士兵炸死。我顺着铁丝网旁卧下，满身被榴弹炸的烟土盖满。

当夜即将陈永思送到下面本军第二野战医院休息。次日凌晨，军部派荣3团一个营（配属该团的荣2团第3营）来接守阵地。营长郑安关与我军校同期同学，我将阵地情况告诉他后，由他处理一切善后事宜。[41]

而《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的记述为：“（4日）午夜，百余名日军突袭3号高地第309团既得之堡垒，使得3号高地所得堡垒又被攻占。各部队闻讯纷纷支援反攻。荣3团赵团长亲率‘杂牌’兵20余名驰援助战，亲持冲锋枪突入3号高地。”[42]——荣3团主要力量此时在右邻的1、2号高地战斗，团长赵发毕接到何绍周命令却毫无二话赶来救援，实在是难得的英勇行为和战场道义之举！

此刻，在黄家水井方向，第307团团长程鹏集合部队，慷慨激

---

〔41〕据陶维勤提供笔者的陶相宜回忆文章。

〔4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1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7页。

昂地宣誓："今晚如果不能占领全部阵地，天亮后我在弟兄们面前自裁，请师部再派有能力的团长来率领弟兄们继续作战吧！"

几个营、连长都激动地嚷起来："好！我们跟团长冲！冲不上去就死在敌人阵地前，绝不后退！"将士们情绪激昂，不少士兵把帽子摔在地上，敞开上衣，把胸膛拍得嘭嘭响："他妈的，这一腔血今晚喷在鬼子阵地上了！"团长程鹏令部队利用麻袋装土筑垒为掩护，分四路推进，迫近黄家水井核心堡垒。

后备部队及右翼部队都一齐上了，真可谓孤注一掷！这支热血沸腾的部队勇往直前，团长身负数伤仍不肯退，将士们怒吼着，各种火器不停地向日军射击，犹如瓢泼大雨，压迫得鬼子的火力无法发挥。[43]

据日方记述：4日，西山阵地逐渐缩小，炮兵兵舍前的交通壕已经成为前沿。由于遭火炮连续轰击，许多地方被炸得像翻耕过的田地一样。远征军一步步逼近阵地，杀掉伤兵，冲了过来。

当晚，在炮兵兵舍旁边的战壕里，联队本部卫生兵鸟饲久第三次负伤，脖子右边被子弹打穿，血一个劲地往外冒。当时壕内唯一的军医也正在参加战斗，一时找不到可以帮忙包扎的。鸟饲久看到负伤的步兵第1大队步兵炮小队长川村裕中尉带着勤务兵待在深壕里，就求他用三角巾帮其包扎，但川村裕以"我不知道如何包扎"为由拒绝了。鸟饲久颇感心寒，想想后还是继续央求："您是一位军官，难道就不能让部下教您一下吗？"川村裕只好让人边教边为鸟饲久包扎，总算止住了血[44]——这位川村裕中尉，是6月上旬与真锅邦人一同从红木树转回松山的。据载曾在红木树屏风山反击我新39师战斗中表现"英勇"，后来获得了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签发的嘉奖状。[45]

当晚，与鸟饲久同为卫生兵的石田富夫也受了伤。当他在我炮

---

〔4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1页。方知今：《血战滇缅印：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实》，第375页。

〔4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8—199页。

〔45〕［日］杉江勇：《福冈联队史》，第253页。

火射击间隙钻出战壕外小便时，一枚迫击炮弹突然落在身边爆炸，一枚弹片钻进了他的腰部，他觉得好像被刀重重地劈了一下似的。当时，第4中队的大冢长平兵长腹部也被击中，他大叫了一声："我被打中了！"石田临时用绷带为其包扎了一下，可是不顶用，没一会儿就死了——这位大冢兵长时年38岁，已是第三次服兵役，入伍前是福冈县的一名警官，也是日本柔道界的著名人物。〔46〕

9月5日：D+93日

拂晓，增援的荣3团与第309团终于将3号高地反扑之敌击退。

这时，第309团仅剩战斗兵员20余名。团长陈永思因腹部中弹已被后送野战医院，代理团长王光炜也肩部负伤，因此只能将阵地及所剩兵员交给荣3团赵发毕团长接收，确保既得地域，努力扩张战果。然战斗力已弱，攻击终日毫无进展。右翼的荣3团主力续攻1号高地西端堡垒而固守，也无力再进。〔47〕

在3号高地上，我军守住了A、B山头，日军控制着C山头。虽然我军已经占领了一多半阵地，可是，只要日军控制着这个最后的山头，就仍可以掩护背后的1、2号高地和西侧坡下的横股阵地，阻止我军继续向前推进。仗打成这个样子，统一指挥松山阵地守备部队和右兵团的副军长李弥急了，亲自到一线督战。

当日取得突破的是黄家水井方向。经过第307团（含加强的第246团余部和师部工兵连、搜索连）一夜激战，于清晨6时冲入敌核心阵地予以占领。除掩蔽部及洞窟内被焚烧和炸毁埋葬的尸首无法清点外，仅壕沟内日军尸体就有106余具，且生俘日军6名。缴获炮1门、高射机枪1挺，步枪无算。〔48〕然而，由于清扫残敌不彻底，日军在该地深草中仍隐伏一兵一枪，这只"漏网之鼠"，见我大部队通过则隐伏不动，一二人行动即冷枪狙杀，数日间先后被该敌射杀者二十余人，直到被我围歼〔49〕——此为后话。

〔46〕［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83页。

〔47〕《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1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7页。

〔48〕《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1页。《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49〕《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9页。

师长熊绶春考虑到第 307 团连续 3 日攻击损失过重，残破不堪，令固守既得阵地，而以第 308 团纠集残部 60 余人担任后续攻击。该部于上午 9 时越过黄家水井，沿滇缅公路向马鹿塘攻击前进，11 时许攻占公路左侧敌堡垒一座。不料进至第二道铁丝网时，遭受敌侧防火及松山西侧森林内埋伏机枪之瞰制，虽一再突击，伤亡惨重，无法进展。但部队已推进 1200 米，尖兵已进至距马鹿塘约 300 米处。因此时天已入暮，遂就地整顿态势，实施夜袭。但因日军警备严密，火力炽烈，第 308 团彻夜袭击未能奏功。〔50〕

守备松山顶峰的第 245 团受命将阵地移交给工兵营及特务营接替，抽出所余的兵力，并加强了军直属部队搜索营第 1 连，全力由寅高地之反斜面，经 5 号、4 号高地向 3 号高地清扫残敌。据日方资料，4 号高地应该是其西山阵地的中心，这里尚有野炮第 9 中队残余日军，当晚其他阵地日军都向此处集中，且真锅邦人也转至这里组织指挥。因此处密林丛棘，第 245 团清扫困难无比。入夜后，才进至 4 号高地西北端的反斜面下，攻占堡垒一座，再搜索前进，又遭敌火力阻止，只是与荣 3 团所占领的堡垒取得了联系。〔51〕

当日，第 8 军急调怒江东岸第 82 师第 244 团一个营增援。〔52〕这是第 8 军所拥有的最后一个团了。

日军战史对这天战况的记载是："5 日，中国远征军自音部山向西山压迫，今日西山阵地被包围，拉孟守备队末日来临。金光少佐恐通讯中断，遂向师团司令部做了最后的报告（品野实认为金光 8 月 29 日已死，此时发电者应为真锅），并向师团主力诀别。在西山阵地烧毁密码本及文件，破坏了无线电通讯机（早见正则回忆，是 6 日傍晚才烧毁的），并将在里山一角继续死斗的兵力集中到西山阵地。"〔53〕

日方所说的"里山"，是指小松山辰、巳、午、未诸高地范围。

---

〔50〕《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51〕《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62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87 页。

〔5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61—62 页。

〔53〕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 164 页。

按当日我军推进线，已经超越小松山而过，此处不应还有日军。但日军战史和个人回忆均如此表述，姑且认定在小松山一隅确实隐匿着尚未被我彻底清剿的日军。

据品野实著述：

5日，西山阵地和被分割开来的里山阵地的另一部分也被包围，与松山、横股阵地失去了联系。进入夜晚后，传令兵向里山阵地守兵传去了命令："将50名守备士兵集中起来转往西山阵地，放弃里山阵地的最后一部分。"

守备队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

1. 军旗由真锅大尉裹在腹部带走；

2. 烧毁密码本；

3. 与师团司令部进行最后一次联络后，将无线电通讯机处理掉；

4. 对生存人员进行最后一次训话并宣誓战斗到最后（包括对重伤员如何处置的指令）。

于是，向师团最后一次发报诀别，电文如下：

考虑到即将处理通讯机，现将目前情况报上：

1. 弃关山阵地后，音部山阵地成了第一线。我们现在正在音部山和西山阵地间坚持战斗，战斗全部由真锅大尉指挥。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发生，决定将多余的武器、被服、书刊等烧毁处理，坚持到兵团主力增援拉孟为止。尽管以持久战为策略，但敌人已竭尽全力攻到第一线，而且越来越猛烈，没有缓和趋势。

2. 守备队百余名官兵（包括双眼双手受伤的在内）没有眼泪，只知道浴血奋战，一直坚持到8月29日音部山阵地失守，主阵地被分割为南北两块。[54]

品野实经过研究认定，从电文内容来看，至少第1节的电文应是在8月24日关山阵地失守后，由金光惠次郎拟就的，当时未来得及发出。笔者也认同这一推断，因为到5日音部山与西山阵地之

〔5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8—199页。

间，已被我第245团占据清扫，与电文内容“音部山阵地成了第一线”相矛盾。那么，此时真锅邦人补发这一内容，一是为了给师团提供完整战况；二是借金光之口表明自己从何时接替全权指挥。这则电报，也可能是真锅后来隐瞒金光死讯的一个原因，因为按日军习惯，像“战斗全部由真锅大尉指挥”这样的话，是不好由本人自我标榜的。[55]

后面两节的内容，应是8月29日金光死后由真锅邦人所拟：

> 3．音部山阵地被占领后，9月5日西山阵地被包围，与其他阵地失去联络。在拉孟处于危急之时，决定将密码本烧毁。在发完此电后处理无线电通讯机。军旗已交真锅大尉带在身上，在共同行动的同时，以守备队长为首的全体官兵决心奋战到最后。
>
> 4．周围战况越来越紧迫，我们已几次将战况报上。全体官兵已弹尽粮绝，生死垂危。但官兵们将生死置之脑后，服从命令，竭尽全力，勇敢战斗，坚守阵地。尽管小官指挥拙劣无力，但决心死守到底。实在对不起。谨祝以兵团长为首的各位长寿，皇运昌隆，武运长久。[56]

但电报落款仍为“金光电”。对此，品野实调查后认为，按日军战时通讯制度，即便金光已死，在没有正式任命新的守备队长时，还是沿用原来的落款。据在芒市第56师团司令部担任密码翻译的日军中尉石井皎[57]后来说，这份很长的遗言式的电报，是“5日晚间至6日下午”断断续续接收到的，推测松山日军通信兵是在操作台

---

〔5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12页。

〔56〕同上书，第199页。经查日文资料，原文为：“四囲の状況急迫し、屡次の戦況報告のごとき全員弾薬食糧欠乏し、いかんともいたし難く、最後のとき迫る。将兵一同死生を超越し命令を厳守確行、全力をふるってよく勇戦し、死守敢闘せるも、小官の指揮拙劣と無力のためご期待に沿うまで死守しえず。まことに申訳なし。つつしみて聖寿の無窮、皇運の隆昌と兵団長閣下のご武運長久を祈る。” http://ikotu.org/old/gyokusai_6.html。

〔57〕据查《第五十六师团将校职员表》，1944年3月石井皎的职别为第148联队本部少尉密码员，此时可能被抽调在师团司令部工作。据北部九州乡土部队史料保存会编《兵旅の赋》，第278页。

旁一边译成密码一边发出的。

如前所述，8 月 23 日金光曾发电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拟让炮兵中尉木下昌巳逃出报告战况。但野炮第 56 联队本部山口末吉中尉战后撰文记述，是自己向联队长山崎周一郎大佐提出这一建议的。山口中尉担任联队本部“功绩挂”，他从职务角度认为，拉孟守备队全体将士皆不惜生命舍身奋战，准确无误地评价其光荣战绩，将能起到扩大战果且振奋我军士气的作用。为此应令金光守备队长从拉孟阵地派回一名联络军官以传达该地事迹。为了完成此任务，该军官应熟知拉孟全局战况及第 3 大队的人事关系，沉勇有谋。山崎联队长认真考虑后，表示将视情况变化即时决定。

9 月 5 日，考虑到战况已恶化到最坏的境地，晚 6 时 30 分，山崎大佐对山口中尉说，“今晚随我去师团司令部。” 7 时，山崎大佐带着山口中尉从龙陵赶到芒市面见师团长。在作战会议间隙，向松山祐三申具了让拉孟守备队派联络军官逃出的意见，得到许可。深夜 11 时 30 分，山崎大佐向金光发出电报，并在司令部等待回电。直到 6 日傍晚，才陆续接到了前述 4 则“金光电”。[58]

这一记述，与在师团司令部担任译码工作的石井皎的讲述彼此吻合。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测，山口中尉向山崎大佐提建议的时间应在 8 月中旬以前，并曾发过一次电报（可能是经师团参谋长川道富士雄大佐首肯）告知金光并令其物色人选，由此才有金光 8 月中旬找木下交代任务的前端。

那么，战后活下来的野炮大队本部通信兵森田觉军曹说，5 日发完电报后即奉命亲手销毁发报机并当面向金光守备队长汇报，就是可疑的说法。

森田觉军曹还说，当时金光又向身边的“联队旗手”问及军旗善后情况，那位旗手说“已经裹卷在腰部”，并撩起衣襟让大家看。太田毅在著述中推测，这位森田觉不认识的“联队旗手”，实际上是步兵联队副官真锅邦人大尉，因为次日在横股阵地的木下昌巳就见到了腹部缠裹着军旗的真锅。如步兵早见坚持认为金光 8 月 29 日在

---

〔58〕《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师团战记》，第 410 页。龙文美译文。

音部山阵地被活埋一样，炮兵森田也说真锅早在7月间就战死在松山阵地。这里面，也许有囿于不同部队利益的意气用事。[59]

其他几个后来活下来的日军士兵的行迹，从侧面反映了我军当日战斗情况：

9月5日傍晚，日军联队本部人员陆续退往西山阵地和横股阵地。早见正则解除了传令兵的任务，真锅大尉已先撤下去了。

天黑后，早见与第2机枪中队长只松茂大尉等4人同行，向西山阵地转移。在音部山西侧半山腰的小路上，迎面遭遇我军哨兵，且已无法躲避。早见听到我军士兵用日语问道“是谁？”由于这声音从未听到过，只松茂下令开枪，我军士兵转身逃跑，不料被铁丝网挂住，怎么也挣脱不了。早见冲上去，一刺刀捅死了这个士兵。这次意外使日军都跑散了。

早见再往前走，看到两个人影在前面出现。他说了声“拉孟”，对方回答“腾越”，口令对上了，那两个人走了过来。正在这时，四周的我军士兵闻声包围上来，手榴弹流星般地一齐投了过来。早见没有一颗手榴弹还击，正在躲避，忽然脚下触到一只弹药箱，发现里面全是美式手榴弹。刚才那两个日军中的一个就拿出一枚，拔去保险销后藏在身后，没想到，手榴弹突然爆炸了，两人当即被炸死，只剩下早见一个人。原来，日造手榴弹扯下保险销后，在钢盔、枪身、靴底等硬物上撞击引信之后投出去才会爆炸；而美式手榴弹保险阀一张开，必须马上投出，否则会在手里爆炸。这两个人不知道，白白送了命。

两个被炸死的士兵，让早见明白了美式手榴弹的使用方法。于是，他拿起美式手榴弹向我军投去，乘着我军躲避之际，又向西山阵地奔去。突然，前面一团火光一闪，一颗手榴弹爆炸了，一块热辣辣的弹片扎进了他的膝盖。他倒在地上，挣扎着往前爬，爬到一个战壕边，见壕里有两个我军士兵，就用尽全力，用刺刀刺向一个士兵，然后一个翻身，滚进草丛中藏了起来。这时，一枚黄磷弹[60]

---

〔59〕［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88、201页。

〔60〕磷弹（phosphorous bombs）包括黄磷弹和红磷弹，主要为黄磷弹，就是弹体内填充的磷药，遇空气即开始自燃直到消耗完为止，伴随燃烧过程会有白烟冒出为明显的特征，并随着温度逐渐升高，弹体可能会引爆，主要影响为磷药与人体接触时会发生灼伤。

飞了过来，磷粉洒在身体周围，稍动一下就会闪闪发光，还得忍受其刺鼻的气味和对伤口的刺激。听着不远处我军士兵的说话声，早见只能硬着头皮俯伏在草丛里。

不一会儿，又传来了讲话声，好像是日本兵的声音。早见正想看个究竟，突然，左边响起了机枪声，接着，听到有日本兵在叫："我被打中了！"早见一边观察，一边爬出草丛。这才发现有个战壕，入口处倒着一个日本兵。过去一看，是一起为真锅大尉当传令兵的中村种次郎上等兵。

早见把他拖进战壕里，发现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和膝下。早见用三角巾给他包扎后，仍血流不止。中村艰难地喘着气说："我不行了，你如果能回到日本，请代我向母亲问声好……"然后取下自己的手表放在早见手里，15分钟后就断了气。

东方开始发白，早见将步枪伸出战壕去，探头观察，突然发现两个我军士兵抬着机枪走来了。他马上推上子弹，接开两枪打倒了对方。他正想走出战壕，我一枚手榴弹又扔了过来，他立即滚回了战壕卧倒。手榴弹在壕外爆炸了。他又往前爬了一段，这才进入西山阵地的战壕。〔61〕

此时，西山阵地大部分已落入我军（应为第245团及军搜索营第1连）手中，活着的人聚集到了野炮第9中队的一个"匚"字形战壕里。负伤的第2机枪中队长只松茂大尉已躺在这里——据前述早见的行迹，他原是和只松茂同行，因为遭到我军袭击后才走散的，那么只松茂应是在那时受伤以后独自来到这里的。另外，战壕里还有此前曾在崖阵地指挥的速射炮中队村上正登准尉，加上不知名姓的下士官在内，共有12人。

据载，此时日军已传令将炮兵兵舍附近的防御兵力转移至横股阵地。〔62〕正面阵地的日军正陆续后撤，只剩下卫生兵石田等12个人。一个掷弹兵跑过来说："你们都耽误了，敌人已经上来了，撤不下去了！"

---

〔6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22—225页。

〔62〕战后活下来的野炮大队本部通信兵森田觉军曹说，此命令是本部吉戒贞一中尉奉金光之名传达的。若金光是8月29日阵亡，此说显然存疑。据［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84、192页。

他到来后，战壕里又多了一个人，但四周已经被我军团团围住。[63]

已从西山阵地撤至横股阵地的卫生兵鸟饲久，看到野炮第9中队长毛利昌弥大尉正拄着竹杖站在公路边的洼地里。如前所述，这位毛利大尉3日夜曾指挥所部向3号高地偷袭，素有“豪爽”之名，颇受部下推崇。看到用绷带在脖子上吊着两只手的鸟饲久等人撤下来，毛利大声喊着：“松山阵地（1、2号高地）好像还有我们的人，走，去松山阵地！”但仔细一看，山头上已经都是中国兵，于是只好下到了横股阵地的战壕里。[64]

9月6日：D+94日

拂晓，第245团部队搜索前进，夺得3、4号高地间堡垒一座。这时，发现通向公路方向，有交通壕一条，长约100米，敌据守顽抗。

中午时分，第244团第1营从怒江东岸到达战场，立即接替4、5号高地及松山主峰的防御。同时，指挥部又令军直属特务营为预备队，以便第245团能集中兵力攻击3号高地残余的两个堡垒。第245团与敌激战至傍晚5时，才予以占领。

再前进，又遭敌火网阻击。敌火力来自我已经占领的3号高地堡垒附近。经搜索，将近3号高地时，突遭左方之侧射，敌射击位置，又在我直前之谷地中。再经严密搜侦，发现敌在该谷地内有暗堡3座，右可侧防3号高地直前，左可侧防公路，伪装得极其巧妙，步兵既难以搜索，炮兵也难以破坏，而此时已进入夜晚。

第245团与荣3团联系约定，由荣3团负责消灭右方的侧防火力，本团消灭左方谷地侧防火力。当晚10时，两团同时发动进攻。

荣3团向右进攻，猛扑多次，均被日军强大火力击退。第245团先以火力压制日军，然后派工兵用炸药包炸毁敌堡而占领。旋见敌由右方向第245团右翼反扑，经予痛击而消灭之。再继续搜索其

[63]［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48—249页。
[64]［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192页。

他堡垒，已无敌踪。[65]

在马鹿塘方向，第308团于中午11时许开始突击，仍遭昨日同样结果，未及奏功。纠集残部再兴攻击，15时，忽遭马鹿塘敌炮奇袭射击，[66]损害颇大，攻势遂告顿挫。16时，该团攻击队冒敌浓密火网，由山沟内匍匐行进，几经艰险，始抵达敌主阵地棱线下发起冲锋。但受2号高地西侧敌重机枪从侧后狙击，伤亡殆尽，功败垂成。

熊绥春令该团准备夜袭，但清点部队后发现，程、文两团经连日激战伤亡惨重，杂兵抽调已尽。当时程团仅有步兵16名、机炮兵20名；文团仅存步兵24名、机炮兵50名。而日军因大部分阵地沦陷，溃逃残兵悉数麇集于黄土坡及马鹿塘一带，仍作困兽之斗。情况虽极险恶，但为了遵限完成任务，熊绥春决心凑集残余疲兵再战，不顾一切牺牲做最后一击。6日夜，凑集师直属部队残部（特务、搜索、工兵、防毒、卫生）堪战人员及程、文两团残部，共173名，合编为攻击队。令第307团团长程鹏统一指挥，准备一举攻击消灭负隅之敌。[67]

超链接21：松山战役中的日军狙击战术

松山战役之艰苦，自然首先是日军堡垒之难攻克。然而攻克了堡垒，远征军仍然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困境，那些似乎剿杀不尽的日军零星残兵，总能潜伏在某个隐蔽的暗角，以高度精确的射击技术，不断狙杀刚刚松了一口气的远征军士兵。只要有一个人存活，就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狙击手，这就是日军。

弹药不足，射击精确，生性狡诈，似乎是日军偏好狙击战术的天然因素。因为国力匮乏，浪费不起弹药，日本对研制自动步枪缺

---

〔65〕《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2—63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87—88页。

〔66〕据木下昌巳供述，其指挥横股阵地“十榴”在3日发射了最后一枚炮弹，此时日军似不应仍能发炮。

〔67〕《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乏热情，因此战术上强调步兵的“每发必中”和“白刃主义”。原日本关东军士兵、作家五味川纯平在其《虚构的大义》一书中披露：日军在射击训练上对精确性要求极严。初步要求是：对于射程300米的伏靶——状如伏在地上的人头和双肩，不仅5发子弹要全部击中，而且至少要有3发是集中在一个拳头大的面积上。达到这个程度后，就是限秒射击。最初是限在4秒以内击中300米外不知从哪里露出来的靶子，其次是限2秒。这也做到后，就戴上防毒面具快跑30米，接着进入限秒射击。五味川纯平因为最初过不了此关，不断遭到班长和老兵的申斥：“打不中就不准吃饭！”按照这个标准训练出来的日军步兵，几乎每个人都是狙击手。[68]

按日军编制，每个步兵中队编有专职步枪狙击手15名，每步兵小队为5名（第1分队2名，第2、3、4分队各1名）。[69]按此估算，松山日军中专职步枪狙击手就有50名，这些射手都基本能达到五味川纯平所说的射击精度。这里，还不包括30挺轻机枪、8挺重机枪中的优秀射手。可以说，远征军的绝大部分伤亡，都是这约90名射手造成的。与远征军士兵中普遍存在的壮胆式“滥射”相比（为克服这一问题，旧军队中还专门规定了“射击军纪”），这些日军狙击手确实是以最少量的弹药制造了最大作战效能的杀人机器。

从松山活下来的日军士兵早见正则，曾是第1机枪中队的一名重机枪射手。战后，他曾多次来到松山，这是他当年战斗和被俘的地方，学者戈叔亚还接待过他。有一次他向别人透露，在松山战场上，他个人至少杀死了65名远征军士兵。[70]其实，早见正则所说的这个数字并不难估算，只要把远征军7773人的伤亡总数除以日军狙击手、机枪射手总数88即可。考虑到早见正则是重机枪射手，65这个数字还是保守估计。

在1944年的缅北、滇西战场，处于节节溃败状态的日军，到处采用这种“绝望战术”进行最后的挣扎。据中国驻印军许多老兵回

---

〔68〕［日］五味川纯平：《虚构的大义》，第59页。

〔69〕据钟彬《龙陵会战史》之“滇西敌军一瞥”附件日军步兵中队编成表估算。

〔70〕戈叔亚新浪博客文章《中美日士兵的差距》：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9e1cca010008t1.html。

忆，日军第18师团残兵在败退过程中发明了一种奇特的战法，可称之为“自杀式火力点”：他们把狙击手绑在高高的大树上，专门狙杀中国军队的指挥官。狙击手之所以要被绑在树上，是因为即使被我军发现后击中，也不会掉下来，依然可以继续射击直至死亡，根本不作要逃走的设想。接班的狙击手爬上树替前一位松了绑，然后又让对方把自己绑好才离去。这是一种疯狂得难以想象的战术。后来，我军发现了这一规律，行军和战斗中，只要前方有高大的树木，就用机枪扫射一通。不久，我军士兵就在丛林中的大树上看到了被绑着的日本狙击手的遗骸——一具腐烂了的尸体吊在树上，既阴森可怖，又残酷得使人心寒。[71]

在松山战役中，在癸、辛、未等高地，黄家水井和3号高地，那些剿杀不尽的日军残兵，还采用了一种“敌后堡垒”战术，或者叫“倒打火力”配置。一种情形是，如3号高地——在3个大堡垒中间的谷地内，还筑有3个小暗堡，主体藏于地下，只露出掩在草丛中的射孔，可以四向射击，每一暗堡只有二三名驻守兵。当我军进攻时有的并不开枪；一旦推进而过，这些小暗堡就在我军的背后突然开枪，使我前后受敌，只得退回原地。另一种情形是，如癸、未高地——在多层大堡垒的最下层挖有坑道掩蔽部，当我炸毁上层时，有数名日军伏在地下的掩蔽部未死，我军以为攻克，继续向前攻击时，突然从地下钻出来在我背后狙击。

如果不消灭这些狙击手，就无法向前推进，然而这并非易事。除非你能到达堡垒的入口处，往里丢手榴弹或以火焰喷射器攻击，直到确认杀死堡垒内的全部残兵。战术要点是，首先察明小堡垒机枪的每个射击死角，然后从死角处以多人伏地匍匐接近。同时用多挺机枪密集射击，压制日军的机枪火力，使其无法对伏地前进的中国士兵射击。这样伏地前进的士兵，才有少数可以到达小堡垒的入口处丢手榴弹或实施炸药爆破。而要攻破一小堡垒，必定要伤亡不

〔71〕据中国驻印军新1军新38师第112团排长封正明口述资料：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62e02b010099c2.html；及曾在印度蓝姆伽受训的青年军第201师炮四连大学生士兵孙国栋的回忆文章《我的抗日从军行》：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qnjwsg0007.html。

少伏地前进的士兵。[72]

所以，即便站在日军阵地上，甚至被炸毁的主堡垒上，远征军士兵也没有把握说已经占领。笔者在写作中绘制《远征军攻克日军编号阵地流程表》时，不断遇到如此的问题：刚刚从一份资料中认定某号阵地为某日占领，几天后却发现远征军某团仍在对其发起攻击。

这就是松山之战：不杀死最后一个日军残兵，都不能叫做胜利。

笔者极力寻找我军参战者6日的撰述资料，均未找到。也许，像清扫残敌这样的战斗，确实不如子高地争夺战那样聚焦人们的记忆，何况生存下来的当事人是那样稀少。在日方资料中，仍是以石田和早见两个活下来的士兵的口述为主，当时他们应是龟缩在西山阵地内两个不同的战壕内，因为彼此的回忆都没有提到对方。

到天蒙蒙亮时，日军卫生兵石田探出战壕，发现十米之外已全是我军。一想我军很快就要用手榴弹，或是火焰喷射器发起攻击，日军都慌了。明知跳出去无疑就是送死，村上准尉还是爬出了战壕，却被飞来的一颗手榴弹炸伤，滚了下来，嘴里叫着："快，快来给我包扎！"但战壕里迷迷蒙蒙，什么也看不清，伤口在哪里也不知道。

在早见所在的战壕里，安置着无线电发报机。战壕呈"匚"字形，左右两个入口处，站着17个身体较好的日本兵。早见对他们说自己负伤了。但对方理也不理，只是让他也在右边入口处像哨兵一样站着。这个战壕挖在一个陡坡边上。此时我军已经来到山顶，扔下来的手榴弹在战壕前不断爆炸，到处是炸出的弹坑。

战壕宽3米，进深20米。虽说点着蜡烛，但里面仍朦朦胧胧。壕内挤满了伤员，没了手脚的，流着脓血的，呻吟之声不绝于耳。不断有人哀叫："水，给我点水！"

中午，命令给全体人员每人发了两包升汞[73]片。这是一种无色结晶体，只要放在水里加上消毒氯化钾溶化，就成了盐化水银，可

〔7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70页。

〔73〕即氯化汞，俗称升汞，白色晶体、颗粒或粉末；熔点276℃，沸点302℃，密度5.44克/厘米^3(25℃)；有剧毒；溶于水、醇、醚和乙酸。氯化汞可用于木材和解剖标本的保存、皮革鞣制和钢铁镂蚀，是分析化学的重要试剂，还可做消毒剂和防腐剂。

以致命，紧急情况时用以自杀。但是谁下的命令，早见对此讳莫如深，可以想见必是真锅邦人大尉，但这显然不是可堪夸耀的命令，对这类问题日本人总是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暧昧，即便后来提到某人干的坏事，也不会点到具体的人头上。

早见从炮弹坑里取来水，溶化升汞片，先拿给重伤员喝。那些呻吟着“给点水喝”的伤员不知真情，接过去就一饮而尽，嘴里还说着“啊，真好喝！”留下这最后一句话，就一个个痛苦地抽搐而死。有两个伤兵意识到是毒药，坚决不喝，自己爬到战壕前的弹坑里，俯身在手榴弹上面自爆了。这样能立刻就死去，不用忍受折磨；爬进弹坑自杀，还可以避免牵连别人。后来想起这一悲惨情景，早见终生难忘。

夜幕降临后，由于能见度差，我军减弱了攻击。日军打算趁此机会，从我军警戒间隙溜到坡下的横股阵地。在石田所在的战壕里，已先后爬出去 3 个活着的，石田有些羞惭地对躺着的人说了声：“我去报告！”也拿起负伤的村上准尉的手枪和军刀，爬出去了。悄悄爬出两三米后，他忽然站起来朝我军方向冲去。我军起初误以为是自己人，待意识到是日本兵，立刻举枪射击，却未打中。石田到达本部后，先爬出来的 3 个兵也到了，但都受了轻伤。

这时，在早见所在的战壕里，日军把无线电通讯机放在侧面地洞仓库里，和大量防毒面具一起用火烧，人员开始向横股阵地转移。不料火光亮起后，立刻引来我军密集的弹雨，好几个日军被打倒了，其余的人都受了伤，跌跌撞撞地沿着交通壕向下逃窜。早见与森茂夫兵长互相搀扶着，边走边说：“我要是被打中了，就帮忙补上一枪。”

到了横股阵地，石田见到了先撤下来的真锅大尉，向他报告了负伤的只松茂大尉等人在西山阵地被围困的情况，并上交了村上准尉的手枪和军刀。尽管知道上面战壕里还有负伤者没撤下来，但已经没有力量去解救他们，真锅只能下令用掷弹筒发射几枚榴弹作为声援。[74]

---

〔74〕［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25、249—250 页。

在真锅邦人等人从西山阵地撤下来之前，横股阵地指挥官木下昌巳围着整个阵地转了一圈，发现本中队有战斗能力的只有 8 个人了，没有负伤的仅有亀川肇上等兵一人。此前，木下曾利用我军炮火停止的间隙，与部下试探性地交谈。他说："大家都跟我一起死吧。"但所有士兵都低着头默默不语。良久，木下只好说了声："那么，就拜托你们了，明天又是一天！"[75]

战后，日军第 56 师团战友会"云龙会"编写的《拉孟、腾越玉碎真相》一书，根据木下昌巳报告的情况，对 6 日的战况做了这样的描述：

1．天一亮，敌人就对西山阵地发起猛烈的攻击，在毫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全军覆灭。

2．金光守备队长站在阵地上指挥作战。下午 17 时[76]，金光守备队长被敌人的迫击炮弹击中。19 时，金光少佐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战死，保住了松山和横股阵地。

3．真锅大尉接替守备队长担任指挥。[77]

据木下回忆，他见到撤到横股阵地的真锅是 6 日晚 8 时左右，当时跟着真锅的还有与自己军校同期的黑川敏之中尉。黑川是联队旗手，但此刻军旗已经裹在真锅的腰间。当木下问及金光守备队长的情况时，真锅告之："下午 5 时，在西山阵地战死了。"[78]显然，这时真锅已打定主意向这个被确定要逃出去的年轻中尉隐瞒金光之死的真相。

品野实后来对这段被虚构出来的"英勇事迹"是如此分析的：

"金光少佐死之前，野炮早就沉默了，几乎只有步兵在战斗。从上下级关系看，尽管金光是守备队长，但按道理讲，偷袭和肉搏战的实际指挥权，已经交给了更有经验的真锅大尉。所以，早见上等兵才不时去向真锅报告情况。所以，守备队长死亡的真相只有真锅

[7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301—302 页。
[76] 日本战史和个人战记资料中均采用日本时间，中国时间要晚 2 小时。
[7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00 页。
[78]［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201 页。

大尉知道。木下中尉奉命逃出后，在给师团报告时，对金光不管怎样也得美言美言。而且，木下中尉又是金光少佐的直属部下，就更会按照真锅大尉最后的想法，尽快虚构出一个战死有功的情节来……”[79]

在活下来的日军士兵中，仅有野炮第 3 大队本部军曹森田觉一个人指证，金光惠次郎是 6 日阵亡于西山阵地的，但是他本人也并非目击者。他所说的过程大致如下：

6 日天快黑时，森田奉野炮大队副官吉木和一中尉之命，率部反击冲到西山阵地金光守备队长隐蔽壕附近的中国军队。当时，中国军队的一挺重机枪已经迫近此处，当森田准备举手枪射击时，左颈、左大腿与腰部接连 3 次中弹，但仍坚持打完了 8 颗子弹。被部下送回隐蔽壕后，军医给了其一瓶说是止疼的药，可能是安眠药。因疼痛难忍，森田就着身边一个汽油桶孔眼里滴出来的水，将瓶中的 20 粒药全部吞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野炮大队本部密码员杉枝正年伍长满脸悲伤地来到森田身边，低声告之：“刚才金光队长死了，哪个来帮我一起把尸体埋掉？”森田闻听后意识到，金光可能是自杀，因为他待在隐蔽壕最深处，当时也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炮击。但此时吞下的药力起了作用，森田已经难以睁开眼，于是迷迷糊糊昏睡了过去，直到次日被中国军队俘虏……[80]

显然，以这样的口述，非但不能支持“金光少佐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战死”，甚至也不能佐证他此时尚在西山阵地。自从早见正则于 8 月 29 日目击金光被活埋在音部山阵地本部深壕以后，他就一直是一个影子般的存在。

在木下后来凭着记忆补写的日记中，松山日军的这个“玉碎”前夜悲哀难言：

---

[79] [日] 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312 页。

[80] [日] 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 195 页。

夜幕降临，敌人好像停止了攻击，四周一片寂静，连绵不断的蒙蒙细雨悄悄地下着。火药味笼罩着整个阵地。我方阵地只剩下西山阵地一角、松山（1、2号高地）及斜坡下的横股阵地了。

金光守备队长战死后，联队副官真锅大尉担任总指挥。他把军旗裹在腹部，与大家共同行动。但这时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全军覆没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经过一百多天战斗，横股阵地的战壕里到处堆满了尸体。有的伤员还在蠕动着，但又无药医治，有的伤兵用布条把伤口紧紧扎住。守备士兵中已经没有未受伤的人了，而且总共不到80人。不论是谁，都是一副经过长期战斗的疲劳面孔……〔81〕

深夜，躲在战壕里的卫生兵吉武伊三郎伍长被身边慰安妇们的哭泣声缠住了。20名慰安妇都是十几天来陆续集中到横股阵地的，这些天一直替代护士照顾受重伤的士兵。眼看着重伤员在呻吟中一个一个死去，想到即将到来的命运，这些女人都哭了起来。

"不管到哪里，带着我们从这里逃出去吧！"她们缠住吉武央求说。听到她们的哀求，吉武不说话。既然已发了毒药要让她们死，一个士兵即便略有恻隐，又能有何权力改变。沉默了一会儿，吉武说："到处都是大山，到处都是敌人，就是想带你们逃出去，也非常困难。你们已经和士兵共同生活到今天，就和士兵们死在一起吧！"〔82〕

当日，第8军收到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申支诚金"电，云："申江亥钊恭电悉，希于最短时期内，肃清残敌……"〔83〕显然，卫立煌已掌握第8军的状况，给予了充分理解。其实，对明日即可攻克松山卫立煌未必没有预感，这个稍显多余的电报，也许还有为9月2日的严厉电报缓和态度的因素。据说这天何绍周满腹怨愤地离开了松山，把一切事务丢给了李弥，其实也是估计到次日松山势

〔8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01页。

〔82〕同上书，第258—259页。

〔83〕《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63页。"申支"指9月4日，"申江"指9月3日。

在必夺，才撂挑子发泄一下。军中俗话说，胜利者是不应受指责的。倘若明天第 8 军拿下松山，一向为将宽厚的卫立煌自然不愿意在军中留下苛刻的印象。

对此，第 8 军上下深为感动。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载："军蒙宽限，宜增感愧。于转令之后，上下官兵决于明 7 日必灭此顽敌，以达长官之所望！"[84]

9 月 7 日：D+90 日

对于敌我两军官兵来说，这天无疑都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

天亮前，在我军合围逼迫下，全部松山日军已被锁定在横股阵地、松山（1、2 号高地）和西山斜面这一三角形区域内。

凌晨，在被包围的横股阵地，日军重伤员和慰安妇缩在泥泞不堪的"匚"形大战壕里。据后来活下来的卫生兵吉武和石田说，不少折断了腿的士兵都挣扎着从其他阵地爬到了横股阵地，认为这里位置低，处于死角，远征军观察不到，也许有生存的希望。

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升汞片——按既定"处理"方案，由卫生兵给每人发放。石田说自己尽管同情这些伤兵，但除了口头安慰两句外，也别无他法。但许多重伤员都拒绝喝这些药片，宁愿自己用手榴弹自杀；有的喝了又吐了出来，嘴里一个劲地叫："杀了我吧！"[85]

据后来活下来的里美荣兵长回忆，当时联队本部的一个下士官对自己说："要把慰安妇杀掉！"并给了他十多粒升汞片，要他把它搅在饭团里，让慰安妇吃掉。里美荣说："我不能做这种残忍的事，实在不行，就叫她们当俘虏吧。"那个下士官就对里美荣吼道："你不这样做，我先杀了你！"这时，朝鲜慰安妇都哭喊着要去当俘虏。尽管当时有命令，要杀掉她们，但是谁都不愿意亲自动手。[86]后来木下昌巳也回忆道，当时听到有日本兵说："这个地方被占领了才好，还可以保住命回国去！"[87]

---

〔84〕《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63 页。

〔8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59 页。

〔86〕同上书，第 331 页。

〔87〕同上书，第 318 页。

对此，品野实在著述中说——“在最后一刻，残存日军士兵的精神终于崩溃了”。

凌晨3时，真锅邦人命令木下昌巳准备出逃，并给了他一张纸片，说：“你把这封信带出去。”事先，木下挑选了本中队的龟川肇上等兵做随从，第8中队的里美荣兵长以会说中国话且熟悉地形为由自荐，也得到了真锅许可。真锅给了他们一人半张纸，上面写着命令，内容为：“突出敌围，代表拉孟守备队全体兵员，报告战斗状况，呈出将士之功绩资料，并转告遗族（指阵亡人员家属）。”3人换上了便衣——这是让慰安妇利用蚊帐材料缝制的，8月上旬组织“挺身爆破队”时曾穿过一回——将命令纸叠得很小，藏在袖口的夹层里。木下告诉两人：“到达本部后再拿出来给他们看。如果跑散了，谁先到达，要说明后面还有两个人。”

离开阵地时，三人都弯着腰，仿佛是做一件愧疚的事情。虽然没有被哨兵盘问，还是遇到了一帮态度强硬的人，他们质问道：“光你们逃跑是不行的，要带着我们一起走！”显然，在面对不同的生死选择境况时，很多人因心理失衡而恐慌了。当时，木下只好说：“这是上司的命令，我们没有权力带你们一起走，你们也不能跟着走。如果你们实在要跟着走，我们也没有办法。但以后我们要讲清楚，不是我们带你们走的。”但还是有七八个男女跟在了他们后面，其中3个是日本慰安妇，没有一个朝鲜慰安妇。[88]

马鹿塘西侧为缓坡深涧，涧下是数十米宽的勐梅河，因水浅可以涉越。因兵力到达不易，我合围部队在此一直留有一个缺口。很难说这是否基于“围师必阙”[89]的战术古训，意在逼迫日军从此溃逃，而后在阵地外歼灭。但是，在长达3个多月的围困中，日军却从未利用过这个有意无意的“漏洞”，其死硬顽抗到底的作风由此可见。

木下一行奉命后即从此处溜下勐梅河，就被我军发现追了过来。这时跟着他们的七八个男女已经失散，木下等3人涉水过河后，

---

〔8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32页。

〔89〕《孙子兵法·军争篇》中列举的用作战八条原则之一。其中“阙”通“缺”，指包围敌人时要虚留缺口，以诱使使其心生逃意而涣散坚守决心。

分散躲在对岸山坡岩石下直到黄昏，目睹了松山日军覆灭的最后一幕……

7 日拂晓时分，在我一阵猛烈的炮火覆盖后，荣 3 团、第 245 团分别从坡顶和山腰，协力清扫松山和西山斜面残留日军。荣 3 团猛攻 3 号高地谷地内右侧暗堡，第 245 团全力猛扑 3 号高地斜面之堡垒，两位团长亲自督战，官兵前仆后继，壮烈空前。激战 30 分钟后，荣 3 团以步兵利用敌堡射击死角，靠近后用集束手榴弹塞入射击孔，将敌堡占领。

荣 3 团于是抽出在 3 号高地所有兵力，增加于 1 号高地。第 245 团又以全力协助荣 3 团扫荡 1、2、3 号高地反斜面之敌。日军无侧防火力支援，主堡动摇，各部队协同围攻，终于在 10 时将 1 号高地占领，残敌纷向坡下的马鹿塘溃退。[90]

西山斜面之敌被我清扫后，横股阵地日军就失去了左侧制高点的火力支援。连日来被阻挡在马鹿塘南方的我第 103 师部队，在第 307 团团长程鹏统一指挥下，如开闸泄洪般沿公路扑向敌阵地。13 时，该部官兵不顾牺牲，尤以师部特务连为最，冒着日军炽盛火网，一举突入马鹿塘敌阵地。顽敌仍据壕死抗，双方白刃相搏，反复冲杀，我军虽伤亡枕藉，士气则愈战愈奋。[91]

14 时，已肃清黄土坡之敌的荣 3 团沿着公路从右侧向马鹿塘进攻；第 245 团向左迂回，联合第 103 师部队右翼，围攻马鹿塘。日军见三面围攻迫近，难于抵抗，残兵约 40 人分两路向怒江坝及邦迈方向溃逃，却遭我预先迂回至横档（亦称混当）的第 246 团彭剑鸣支队及师侦察排迎头痛击，歼灭 10 余人。[92]

尽管知道末日已经到来，但日军仍本能地顽抗到了最后一刻。

当日清晨，步兵第 2 大队本部主计军曹谷裕介所在的战壕上面，

---

〔90〕《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63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88 页。

〔91〕《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9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63—64 页。方国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第 89 页。《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有人高声喊道："敌人已经上来了，赶快出去吧！"谷裕介走进左侧的散兵壕抬头一看，不远处的西山阵地上已黑压压都是我军士兵。此时他附近的战壕里还有约30名日军，不过都已经负伤，有的已经不能动了。

"冲上去！"不知谁是指挥官，当时就有一个人带头冲了出去。其他的人也都跟了上去，手持军刀、上了刺刀的步枪或手榴弹，朝着正从西山阵地攻下来的我军迎了过去。

后来活下来的谷裕介回忆说，他看到绰号"兵痞"的第6中队上等兵永田健太郎赤裸着身体大骂着冲在最前面；另一个没有了两条小腿的士兵，一面用左手抓着地上的草和树枝往前爬着，一面用右手奋力投出手榴弹。

中国士兵用冲锋枪边扫射边冲，双方迫近后就转入混战开始肉搏。当谷裕介也挥舞着军刀往前冲时，一发迫击炮弹在身后爆炸了，他肩部和臀部中弹倒了下去。他掏出了手枪，但因安全栓生锈扣不动，用食指下压时又"砰"的一声走了火，这时，已冲至近前的我军士兵一记枪托打在了他的额头，登时昏了过去……[93]

在野炮第7中队火炮掩体壕内，此时仅有上野正义上等兵等10名日军。木下昌巳出逃前，曾指令中队三苦又雄曹长担任指挥。面对逼至近前的我军，三苦跳出战壕，挥刀狂呼"中国人滚过来！"话音未落，一排机枪子弹射来将其击倒。中午时分，不知谁高叫起来："怎么都是死，还不如到水无川喝饱再死！"于是，剩下的几人边向我军射击，边溜下横股阵地斜面，向勐梅河方向逃跑。[94]

在另一处战壕，当卫生兵吉武伍长从壕里探出头时，看到我军已迫近战壕前的一片洼地。我军一个士兵背着一箩筐手榴弹，其他人从箩筐里拿了雨点般地投过来，并一步步逼近。吉武听见另一处战壕里好像有人喊："打这边，打这边！攻上来了！"听声音好像是真锅大尉。

能动的日军士兵都在本能地应战，已无须什么命令。日军用的

---

〔93〕［日］太田毅：《拉孟——玉砕战场の证言》，第206页。

〔94〕同上书，第212页。

是打一发拉一下枪栓的“三八式”步枪，在面对面近距离内已经无法阻击我军推进，实在难以招架，只好捡起我军投来的手榴弹反投过去。但到后来，投来的手榴弹多了，就来不及捡了。没能反扔出去的手榴弹，就在战壕里爆炸了，日军士兵一个个倒下，浸满雨水的战壕里躺满了尸体。即便如此，活着的人还得踩着他们的尸体继续战斗，战壕里不断传出被踩着的尚未断气的伤兵的呻吟。在吉武旁边，同为卫生兵的牛岛兵长被手榴弹当场炸死，担架中队的一个曹长被击中，手脚动弹不得，躺在战壕里一个劲地哼叫：“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这时，吉武伍长看到两三个慰安妇跳出战壕，朝勐梅河方向逃跑了。[95]

学者戈叔亚认为：吉武当时所看到的这几个跳出战壕逃跑的慰安妇，就是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同伴。但据美军照相兵拍摄的俘获慰安妇照片上注明的日期显示，朴永心等4人逃出的时间还要早几天，为9月3日。

吉武后来告诉品野实，这时战壕里倒着大约四五十个人，已经没有会喘气的了，他们当中有用手榴弹自杀的士兵，“有用拐棍从嘴里塞进肚子自杀的慰安妇”[96]。

一个人怎么能以这种自杀方式呢？吉武在这里隐瞒了事实。

实际上，在末日来临前，日军对慰安妇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处理方法：那些朝鲜籍慰安妇，有的被逼迫吞下升汞片自杀，有的则被集中在一个战壕里投入手榴弹炸死——这是活下来的卫生兵石田后来在接受韩国记者金荣采访时亲口所言。[97]这个慰安妇，因为拒绝服用毒药，应是被日军用拐棍从口腔捅入腹部杀死；朴永心等几人是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生的。而5名日本籍慰安妇，在战争最剧烈的日子里，始终受到日军庇护，被安置在最安全的战壕里，直到日军全军覆灭之后，她们都活着当了俘虏，受到中国军队优待，被

---

〔95〕［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59—260页。

〔96〕同上书，第260页。

〔97〕［韩］金荣：《慰安妇朴永心》，载《华夏人文地理》杂志2003年第2期。

转送至保山、楚雄的战俘营，最后被遣返回国。[98]

超链接 22：战争状态下的慰安妇

据日军第 56 师团司令部情报军官石井皎在《拉孟、腾越玉碎真相》一书中披露，远征军进攻松山时，松山上尚有 24 名慰安妇。[99] 其中，应包括 5 名日本女人，15 名朝鲜女人。多出来的 4 名，是 1942 年 5 月从缅甸带来的三四名女人，还是后来抓来的中国女性，不得而知。

尽管日军提前得到了远征军即将大举进攻的消息，但并没有允许慰安妇从松山撤出。松山当时并不像密支那、腾冲那样孤立。实际上，日军并未将慰安妇视为平民，她们没有脱离部队寻求避难的可能。在战事将近之时，把慰安所建立在最前线的要塞中心，这一行为本身就很反常。据日本作家相良俊辅在其《菊与龙：为祖国荣光的战争》中的说法，拉孟守备队长金光在战斗开始之前，曾“考虑将这些慰安妇转移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带”，但正当他“因为担心转移途中的安全问题而犹豫是否要这样做时”，战争便开始了。也有相关回忆资料显示，慰安妇自身“很勇敢地表示希望留在这里，而不愿意在途中被惨杀”，但她们“想让士兵保护她们在战争中逃离，但错过了机会”的说法也似乎可信。

那么，这 20 余名慰安妇在战斗中有何表现？日本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浅野丰美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她们用希望能唤起守备军同情的方式，在战斗中给予了配合。这一点，可以在 1954 年“云龙会”组织编纂的战史中得到证明。该组织是由第 56 师团幸存者组成的机构。这部战史是这样描述的：在拉孟，有包含伤病士兵在内的“共 1280 名士兵”，还有“约 20 名日本平民”。“日本平民”，是在“慰安妇”一词被禁用时期经常使用的一个词。这部战史还有这样的

---

〔9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82 页。

〔99〕［日］浅野丰美：《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 371 页。

记载："这些日本平民投身于战斗之中，与士兵协力合作，并且以她们的瘦弱之躯与男人一样自杀献身"，"她们甚至在枪林弹雨中，搬运弹药、食物、水，并且料理伤员病号。她们的辛苦付出及对同胞的奉献，不下于士兵"，"她们得到了许多士兵的感谢，并在艰苦的条件下与他们并肩协力作战"。3年后出版的一个士兵的回忆录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这些女人起初是慰安妇，但在拉孟被包围之后，她们完全转变成了日本妇女。她们穿着制服，为士兵做饭，并且不顾自己照顾伤员。我对她们深感歉意。"

据日本慰安妇问题学者西野瑠美子叙述：

腊勐阵地被中国军队包围之后，朴永心她们听到飞机的声音就跑进慰安所附近的战壕里。战事紧急的时候，在厨房工作的苦力们或死或伤，剩下的逃回了村里。为此，炊事班的军曹则命令慰安妇去做厨房里的工作。

厨房是在关山阵地通往核桃洼途中下面挖的一个洞里。从阵地到厨房，步行约30分钟。煮饭炒菜全在洞里，要是做饭的烟从战壕里冒出去被发现的话，就会遭到迫击炮的攻击，所以在战壕的入口处为了防止烟子冒出去而挂了毯子。

"做好饭团送到阵地上去！"

慰安妇被命令去运送食物。

在烟雾弥漫的战壕里，朴永心她们用饭盒煮饭，用青鱼罐头加上调料后做成饭团。刚煮好的热饭，做饭团时把手烫得通红，可既顾不上烫，也顾不上疼，慰安妇为士兵们埋头做饭团。

正值腊勐的雨季，战壕外雨下个不停。想出去看看，也会遭到炮火袭击，所以白天根本不能动弹。等到夜里，慰安妇们穿着军裤、戴着钢盔，为士兵们运送饭团，在那将各个阵地连接起来的齐胸深的交通壕里穿行。

腊勐阵地被围约过两月，绪方山阵地被炸毁了。为了构筑新的阵地，重机枪浅田分队的早见一行奉命在本道阵地（即滚龙坡）集结。在大雨如注的深夜，好容易摸到本道阵地的早见，回忆当时的情况："那时见到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在炮火和大雨之中，朝鲜慰

安妇们两个人一组，用装干面包的空罐头盒，默默地为官兵们送饭团。此时，她们已为守备队的一员，不顾自己的安危，为奋战的官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平日她们只为满足我们的欲望，老想着她们低我们一等，现在却让士兵们有了对她们低下头说声‘对不起’的想法。”

慰安妇们在阵地上来回地转，嘴里说着“今天每人一个”，“今天每人两个”。平时只把慰安妇们作为发泄性欲工具的士兵们，此时也对她们产生了感激之情。[100]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慰安妇穿的是日军战斗服装。此外，据一个朝鲜慰安妇的证词，在战斗激烈时，慰安妇们仍被强迫到壕沟里去，在炮火纷飞的状态下满足士兵们的性欲。

西野瑠美子曾经访问过曾执行第二次从空中补给松山日军任务的第5飞行师团第4飞行团班长小林宪一中尉。小林如此描述当时所看到的慰安妇：

我执行上司的命令，起飞7次，为松山补充弹药。7月24日（中方资料记载为23日）的空中运输，共起飞了15架飞机。在那温克机场起飞的有九九式军用侦察机3架，担负掩护任务的隼式战斗机12架，都装了绑好降落伞的弹药筒，飞向拉孟。我们飞进险峻的山岳地带，在拉孟的阵地上空盘旋，看到了半裸的士兵，为了指示地点将发烟筒点燃，橘黄色的烟拖着长长的尾巴从空中掠过。我们将吊着的弹筒向T形布板投下，心里祈祷下面的人能顺利收到。这时，有两三个士兵仰着脸向我们的飞机挥舞双手，再一看，是几个穿着士兵上装的、应该是慰安妇的女性，正举着白布，拼命地向我们舞动。在这样的战场上，却有女性……我只觉得胸口被堵住了。这个冲击长久地压在我的胸口。[101]

---

〔100〕［日］西野瑠美子：《战场の慰安妇——拉孟全灭战を生き延びた朴永心の轨迹》，第136页。

〔101〕苏智良、陈丽菲：《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第175页。

浅野丰美认为，慰安妇之所以在战斗中如此热情地给予协作，一个原因是其中有5名来自日本九州。但实际上，随着日军“玉碎”日期的临近，她们逃离的愿望日益强烈。“在完全败退之前的一两天”，20名慰安妇都幸存下来，并且对卫生兵吉武伍长“大声哭喊”，高声请求“请让我们和你们从这里逃到其他任何地方”。这时还穿着战斗服的慰安妇，都将制服换成了“裙装”。成为战俘的朝鲜慰安妇在被俘时都穿着裙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她们是希望逃跑的。根据一个证人的证言，慰安妇换上裙装，是为了显示她们的平民身份，希望能够为自己多一点安全保障。在松山日军“玉碎”之前，她们分成各有三个人组成的两组逃跑了。其中一组只有日本妇女。守备松山的日军士兵说，他们“互相鼓励”，相信如果能等到9月份，他们的军队就会集中分散在缅甸北部的兵力，并从龙陵派出救援部队。而慰安妇之所以选择逃跑，可能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这样的设想是无望的。

随着慰安妇逃跑的愿望日益强烈，日军曾试图将慰安妇拖进自杀之途。如后来从松山逃出的里美荣伍长回忆，一名“联队本部的下士官”曾令其以升汞片毒杀慰安妇，他当时拒绝了，但显然有其他人那么做了。

之后发生的事情缺乏史料记述，但有如下三点可以明确：

首先，9月3日，4名朝鲜慰安妇和1名日本慰安妇成为中国第8军的战俘。在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9月7日发出的电报中记述，当日俘虏了“敌军的5名妇女”。其中，朴永心等4名朝鲜慰安妇在一起，由美军照相兵瓦尔特·乌勒（Walter Wundle）拍摄了一幅著名的照片，照片中怀孕的朴永心为右数第一人。而在另一幅照片中，是一名年纪较大的慰安妇，并且身边有一位中国士兵正在打电话向上级报告情况，这个女人是日本人，约35岁，花名“双叶”，本名北村富子。据后来朴永心及松山当地老人指认，就是当时负责监督慰安妇的专职卖春的日本女人。在美军拍摄的另一张注有“9月7日”日期的慰安妇照片中，后来由日军士兵松下一雄和早见正则指认，所拍摄者是一名叫“真”的日本慰安妇。

其次，日军“玉碎”后，根据第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日记9月

6日的记载，在松山“黄家水井”，他们发现了106名日军尸体，其中包括1名官佐，“6名妇女”。日方资料记载，在战壕中也发现了一些尸体，其中包括2名妇女。

再次，根据战时美军中缅印战区内部刊物《中缅印战区综合杂志》（*CBI Roundup*）的报道，在松山共有10名日本和朝鲜妇女被俘，逃出的24名妇女中有14名在逃跑途中被炸死。一名被俘日军士兵也证实，被俘的慰安妇是10名或者9名。

在10名或14名死亡的慰安妇中，黄杰日记中记述的6名女尸，很可能是被日军拖进“玉碎”，或者被其他人自杀用的手榴弹炸死的。据一名生还的日军士兵回忆，在“玉碎”前，“接到一个命令，让把慰安妇带进洞壕中，然后用手榴弹将她们炸死”。前文曾提到一个士兵的回忆，得到过毒死慰安妇的命令。因此可以推断，慰安妇是被强制性地拖进所谓“玉碎”作战的。[102]

表12 松山日军慰安妇不完全情况

区 分	日 本	朝 鲜	其 他	合计
人数	5	15	4	24
死者		14		14
幸存者	5	4	1	10

备注：据“二战”美国《中缅印综合杂志》及品野实《异国的鬼——中日拉孟决战揭秘》等资料（不含被日军抓来的本地女性）。另据远征军老兵回忆，幸存者中除日本、朝鲜人外，另一名听口音可能来自台湾或南京。

在美军照相兵瓦尔特·乌勒拍摄的慰安妇照片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右边一位怀孕的女人朴永心，朝鲜人，当时23岁。直到2004年，朴永心还健在，且于2003年11月在西野瑠美子、戈叔亚、朱弘、方军等中日学者陪同下来到了松山。

朴永心生于1921年12月15日，家乡是朝鲜平安南道南浦市江

［102］［日］浅野丰美：《滇缅战场上日军的“玉碎”及“慰安妇”的命运》，据《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第371—376页。

西区域石二洞，自幼丧母，只上过小学二年级。由于家里穷困，14岁后一直在当地的缝纫铺里做工。1939年8月，17岁的朴永心被日本警察以“招护士”为由骗到了中国南京。当时的南京刚刚发生过震惊世界的大屠杀，30多万中国军民被杀，不计其数的妇女被强奸。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在南京大屠杀之后，日本占领军向政府提出为了避免军人的强奸行为，应该推行慰安妇制度，日本政府也认同这种强盗逻辑，遂在南京开办了第一批慰安所。

朴永心老人的脖子上，一直留有一道伤痕。在南京日军利济巷慰安所，她不愿意成为慰安妇，拼命反抗日本兵的强奸，差点被日军用军刀戳死。最终，朴永心在日军暴力逼迫下无奈做了慰安妇，每天要“接待”二三十个日本兵。在南京待了近3年后，1942年初夏日军从缅甸打进了云南，她和7位朝鲜慰安妇又被辗转送至滇缅战场，先后被安排在腊戌、腾冲的日军慰安所，于1944年4月来到松山。对于这段行程朴永心的回忆是，坐在军用卡车的货厢里，一边被颠簸的卡车摇晃着，一边凝视着路边的花朵。她记得，路边全都是一些黄色的花，随风摇曳，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家乡。

朴永心记得，拉孟慰安所的房屋是木造的平房，材料是当地的松木，长排的房子，用木板隔开，形成十多个房间。在慰安所的生活，慰安妇与日军老兵的回忆截然不同。据西野瑠美子对日本老兵的采访，日本老兵非常喜欢“若春”，尤其是她唱的歌。早见正则曾回忆说，“若春”的歌唱得非常美。然而朴永心却认为这是无奈的行为，唱歌给日本兵听，并不是自己所喜爱的。为了缓解无法回家的痛苦，朴永心与其他慰安妇有时会高喊：“我想回家！”她们吸食鸦片，麻醉自己的神经。在慰安所周围，种植了很多罂粟，获得鸦片非常容易。

在远征军对松山发起攻击后的近一百天血战中，朴永心和其他的慰安妇缩在战壕中，每天承受着远征军猛烈的炮火覆盖，“难道就要死在这里，回不了故乡了吗？大家都哭了起来。此前，虽然曾几次想到过死，但不想在这儿悲惨地死去。既不能生，又不能死，像处在地狱里一般地恐怖”，并不止一次产生绝望的念头，“干脆爬出去被炮弹炸死算了。”但求生的本能又使她们咬牙承受着一切。然

而，就在松山即将覆没之际，日军开始强迫慰安妇自杀，突然醒悟的朴永心不顾身怀七八个月身孕的危险，与其他几名朝鲜慰安妇乘日军不备跳出战壕逃跑。在勐梅河谷地，幸运地被一位熟悉的当地少年李正早搭救。

李正早，松山大垭口村马鹿塘社人，当时15岁，被日军拉孟守备队强征当马倌，每天都要拉着日军的军马从大垭口的日军慰安所前经过。大概因为李正早当年是个孩子，日军对其没有戒心，他有时可以到阵地上转转，和日军士兵与慰安妇都比较熟悉，甚至那些慰安妇还教会他唱一些日本歌。李正早认识朝鲜籍慰安妇朴永心，记得她当时被叫做“若春”。

1944年9月7日，李正早和他的哥哥李正邦带着几名远征军士兵来到勐梅河边用手榴弹炸鱼，遇到了躲在谷地边一个玉米地里的朴永心和其他3名朝鲜慰安妇，另有1名慰安妇在逃跑时落水溺死。他回忆60年前搭救朴永心时的情景时说：

战斗结束后，大概过了3天吧，我与中国的炊事兵及两个村里人一起到勐梅河里去抓鱼。一看，河岸上有4个女人和一个日本男人。看到中国兵后，那男的和一个女的马上跳入河中。男的拼命游到对岸逃走了。女的被水冲到下游。当时是雨季，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当中国兵在下游用树枝将她捞上来时，她已被淹死。

3个女的被中国兵抓捕后，玉米地里还有一个女的。中国兵去抓她时，她正哆哆嗦嗦地发抖，带到山上，她下身开始流血。血流到地上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她痛苦万状，嘴里叫着，挣扎着上了山。[103]

朴永心对于自己跳出战壕直至被搭救的经历，是如此回忆的：

战壕中，日本兵和女性们共有20人左右。听说日军断定自己已

〔103〕［日］西野瑠美子：《战场の慰安妇——拉孟全灭战を生き延びた朴永心の轨迹》，第136页。

经战败，烧毁了军旗，一阵恐怖袭来。一个日本女子喊了一声“一起逃走吧”，我便立即跳出战壕，其他几个女子也相继跳了出来。我们逃出时，战壕里的人还活着。

不知逃往何处。姑且向山下的河边逃去。河边有一片玉米地，腹中相当饥饿，进入玉米地，再也无法忍耐，便不顾一切地大吃起玉米来。就在这时，被中国兵发现。同时被捕的一共4个人。我担心会被中国兵杀死而瑟瑟发抖。听到有人说“放心吧！”才稍稍好些。

吃玉米的时候，肚子就开始痛起来，痛苦难耐。看到我的样子，中国兵说：“去解个手吧！”小便后，稍稍休息了一下，就被带到山上。这时，下身开始流血，行走都很困难，我流产了。

和我一起逃出来的一个庆尚道出身的女子，才见中国兵就跳进了河中。当时，我要是有可能的话，自然会跟随跳下去，也就被淹死了。照目前这样子，今后可怎么办呀，我既担心又害怕。[104]

李正早扶着身怀六甲的朴永心，走了很远的山路，先是在哥哥李正邦家里给她们做了饭吃，后来把朴永心送到了设在腊勐街的第8军野战医院。当时，朴永心肚子里的孩子好像已经死了，下身一路都在流血。在医院，中国军医为朴永心做了手术，拿掉了她死在腹中的胎儿。

“二战”结束后，朴永心被送回了朝鲜。在朝鲜她与一个老鳏夫同居，因为丧失了生育能力，领养了一个儿子，过了几十年的平静生活，直到一位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日本人西野瑠美子女士从日本专程过去找到了她。2003年11月，中国、日本和朝鲜三方的有关研究人员陪着朴永心来到松山，为在国际会议上揭露日本实施慰安妇政策的罪行而取证。

据报道，这次调查，最困难最危险的就是如何保证朴永心老太太的身体和精神正常。在松山，大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

〔104〕[日]西野瑠美子：《战场の慰安妇——拉孟全灭战を生き延びた朴永心の轨迹》，第136页。

11月25日，代表团来到松山日军外围阵地滚龙坡（**日军本道阵地**），这里可以看到整个松山的全貌。朱弘对老太太说："妈妈，这就是松山！"一直很平静的老太太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唉，松山，MATSUYAMA（**日语"松山"的英语拼读。MATSU是松树，YAMA是山**）！我到死也不会忘记这个地方……日本人在这里做了许多坏事，他们对你们中国人更坏……看到这个地方就想起过去的事情，很揪心哪！很想死啊！呜呜……"

大家赶忙把坐着轮椅的她抬上车，老太太在车上哭得非常伤心。

当大家搀扶着老人来到已经成了红薯地的原慰安所遗址，伤心悲痛的老太太再次愤怒了。她挥舞着拳头说她真想把这个地方砸碎！想亲手杀死日本鬼子，随即把这种仇恨转移到了日本人身上。她粗鲁地告诫西野"别再提这个事情了，再提我就要晕倒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很厉害的……"虽然昔日的慰安所早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老太太还是记得慰安所"两边都是山"，所以此地叫做"大垭口"。

朴永心和李正早的见面，完全在意料之外，当时李正早在围观的人群中一眼认出了这个自己昔日救助过的朝鲜慰安妇，一时激动不已。马上，朴永心也认出了他。

"你还好吗？"两位老人彼此问候着。李正早常年干农活的一双粗糙的手和朴永心老人紧紧相握，他激动地说："当年我把你们领到我们家吃过饭，我还记得你当时是大肚子呢，我把你送到了卫生所，你咯还记得？"朴永心老人点点头，"记得，记得！"她激动得哭了出来。"当时，你给我们饭吃，我们才活到今天。"

朴永心："让我们一起打日本人。"

李正早："我们也受害，你们也受害。"

朴永心："你的头发都白了。"

李正早："白了，我也白了。前两天听说你要来，你能来到这地方我就高兴了。"

朴永心："我和你能够活到今天，再能够见面，我很高兴。"

李正早："高兴，高兴！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啊！如果没有中国军队，我们就要死掉了，日本人就把我们杀掉了。我们中国伟大啊！"

朴永心："我们朝鲜也伟大！"

最后，两位老人紧紧抱在了一起。

在这次松山之行回国不久，朴永心就去世了。直到临终前，她还常常做一些可怕的噩梦，梦到日本兵在追她。每当讲到过去的事，就会想起那些噩梦般的悲惨生活，痛苦和愤怒就会涌上心头。[105]

"……交通壕成了鲜血的河，尸体遍地。"战后，卫生兵吉武为第56师团战友会撰写卫生队记录时写道，"这时听到有人在喊'吉武伍长'，回头一看是小柳力军医，他的大腿被击中，鲜血已经浸透军裤，再也坚持不了多久。他托付我说：'赶快到本队去报告情况！'说着取下腰间的军刀交给我，挣扎着撑起上身，右手握着手枪，对准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回头再看右边，户田寅彦军医和野田伍长身受重伤，躺在地上。户田军医最后也用手枪自杀了。还有剩下的三四十人，难道就这样喂给敌人的炮弹吗？大家喊起来：'冲出去！'"

此后，吉武等人分散开，从阵地斜面下去，向勐梅河方向冲去……吉武临离开还看了阵地一眼，没有发现一个军官。[106]

据日军士兵早见回忆：

"下午2时，大家作了最后的准备，军旗杆上的旗冠已经深埋在野炮兵仓库的入口处。敌人开始从松山阵地向横股阵地发起攻击。下午4时30分左右，真锅大尉下达了最后的命令：'健康的士兵都去追赶本队。'"[107]

对真锅是否下过这个最后命令，笔者持怀疑态度：既然这时候让活着的人逃跑，何不早一些下令？因为早见本人后来是在逃跑中被我军俘虏，经我战俘营释放回国的，对于这个"不光彩"的经历，他需要一个说法，至少自己的出逃是奉了命令的。活下来的几位日

---

〔105〕本节参考了云南电视台2004年摄制的纪录片《记忆的伤痕》；2004年1月2日《春城晚报》文章《朝鲜慰安妇云南指认铁证如山》，张臻、段毅撰文；及2004年4月号《华夏人文地理》杂志文章《慰安妇为历史作证》，戈叔亚、西野瑠美子、朱弘、熊维元等撰文。

〔106〕［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60页。

〔107〕同上书，第226页。

军士兵回忆中提及，在最后时刻师团卫生队担架第3中队长野津高雄似乎曾下令突围，野津本人却未能逃出。但是，第56师团显然并不认可这些所谓的命令。

据品野实著述："第56师团搜索联队副官穴井元喜曾说：'违反军令从拉孟战场逃回到原队的士兵有7人。当时，川道参谋长很伤脑筋，他对我说：'穴井，这些人返回原队来了，实在是个头疼的事啊！又不能通过军事法庭处罚他们。前方正需要一兵一卒，给他们找一个去死的地方吧！'当时，我还迎合着答道：'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士兵的命运就是如此而已。"[108]

不过，早见正则告诉品野实，他看到了松山日军最后的指挥官真锅邦人的最后一幕：

"当时，真锅大尉将军旗挂在肩上，挥动着军刀，独自从横股阵地经公路边的一个小坡，向着敌军占领的松山阵地（1、2号高地）方向冲去。道路弯弯曲曲，冲了30米，他转向左面，人被山挡住。当时，早见只见到他的背影，然后背影也消失了。"[109]

那时，松山阵地已经被我荣3团占据。如果真锅冲上山口作"死亡冲锋"，肯定会被我击毙。值得注意的是，根据早见回忆，最后突击上去的只有真锅大尉一个人，而且军旗还挂在其肩上，并不像日军战史所载，是真锅于7日天亮后在横股阵地炮兵掩蔽部中烧毁了军旗。[110]所以，笔者怀疑他是先找个隐蔽处烧掉军旗，而后再自杀或发起自杀式冲锋。但是，这些我方均无记录，也没有缴获其军旗的记载。

品野实在著述中评论说："真锅大尉一直在鼓励士兵们说：'援军会来的，要坚持住！'他自己也是这样想的，虽然内心里可能也有过倒戈的想法，但他终究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军官。官兵力量的源泉就是'信赖'，既不埋怨谁，又一个人带着军旗冲向敌人，难道不是这种信赖在支撑着他吗？不过，这种毫无意义的死，

---

〔10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191页。

〔109〕同上书，第226页。

〔110〕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4页。

就连士兵也不愿跟他行动。试问，没有价值的牺牲和全军覆灭的价值何在？

“许多战争记录描绘说：‘守备队全体是在铺天盖地的敌群中玉碎的。’这种电影中的场景是看不到的。很多证词可以证明这一点，残存下来的士兵是在逃出来后一个个死在山野里的。”[111]

下午5时，松山枪声渐渐稀疏，一轮红得刺眼的夕阳正缓慢地坠向怒江上游，坠向高黎贡山脉。夕阳将残血一般的余晖洒向怒江峡谷的崇山峻岭，涂抹在弹坑累累遍地焦土的松山阵地上。一直躲在勐梅河对岸崖下的木下昌巳，将这一幕永远刻在了记忆深处。[112]

战斗停息后，荣3团上尉副官崔继圣忙着指挥把死伤的官兵抬下山去，把日军尸体就地掩埋。在拖日军尸体的士兵中，不时传来哭泣声，有许多人都停下了自己的工作。当时崔继圣觉得鼻子发酸，眼前模糊，站在那里揩抹脸上的泪水。对于那些朝着日军尸体又打又踢，甚至用刺刀扎个不停的士兵，都没有阻止。

在一个大碉堡里，崔继圣发现一具日军尸体，头发和胡子完全连在一起，死者身上到处都缠着绷带，而尸体右腿的脚拇指还紧紧地抠在一挺机枪的扳机上。崔继圣从他身旁捡起机枪，没有说一句话，注视着他那一张不平静的脸，又一次感受到战争的残酷。[113]后来木下昌巳曾对戈叔亚说，这个人可能就是第4中队长辻义夫大尉。但笔者以为他是在子高地爆破后被掩埋的，应不会保持如此姿态。

带着传令兵搜山的荣3团第3营第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在一个山坡上发现一个鬼子伤员，满头缠着纱布，血迹斑斑，坐在小路边。杨金继站在他的上方居高临下十多米处，端着冲锋枪指向他，并用日语向他喊话：“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优待俘

---

〔111〕［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27页。

〔112〕同上书，第316页。

〔113〕崔继圣：《血浴松山顶峰的荣三团》，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第167—168页。

虏！”只见这个鬼子慢慢地转过头来，面孔狰狞地瞪了一眼，又把头转了回去。这时，杨金继听到“噗”的一声轻响，凭着多年的战斗经验，知道鬼子磕响了手榴弹引信，杨金继伸手按下传令兵，扑倒在路边一块巨石后，接着一声爆炸，那鬼子已被炸得血肉模糊。

不久又发现了一处沟壑里的掩蔽部，传令兵对着洞口用冲锋枪打了一梭子子弹，立即听见里面传来女人“哇哇”的尖叫，从里面跑出来一群穿着和服的女子。原来是一群慰安妇，计有 11 人，其中朝鲜人 6 名，日本女子 4 人，还有 1 名操南京口音的中国女人。〔114〕

在马鹿塘北侧，荣 3 团团长赵发毕把“全团”还活着的官兵集合在一起。想起一个多月前过怒江时全团三千多人，黑压压的一大片，如今却只剩下这寥寥二百多人，而且多数是头部、手、脚、身子有着不同的轻伤，缠着脏污的绷带，已难见昔日军威。他虽然久经战阵，这些天的冲杀更是看多了生死，也忍不住泪如雨下，哽咽着难以作声。

其他几个团也都伤亡很大，第 246 团团长田仲达、第 307 团团长程鹏以及第 308 团团长文安庆、第 245 团团长曾元三都成了“连长”。可有的团却连“连”也编不成了。第 309 团的两千余人，是松山之战后期调上来攻坚的。攻克横股阵地后，第 103 师师长熊绶春打电话来问团长陈永思：“你们团还有多少人？”陈永思捂住他那还在作痛的伤口，低沉地回答：“20 个人！”熊绶春先是惊愕，然后忍不住伤感地大哭：“天哪！怎么会只剩下 20 个人？”〔115〕

据荣 2 团团长周藩回忆，松山守敌被全歼后，该团第 3 营官兵归还建制。他们走时有 600 多人，此时仅剩下 18 个勇士。这 18 人中，有一个排长、一个班长、16 个士兵，全营牺牲 600 多人，营、

---

〔114〕杨金继 2002 年 10 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115〕《天津日报》2005 年 9 月 8 日文章《加强连“连长”——滇西抗战纪事》，彭荆风撰文。文中个别团长名字有误，笔者据第 103 师战斗详报做了订正。

连长全部为国捐躯。[116]荣3团第3营7连中尉副连长杨金继说，自己的7连原有官兵177人，这时连自己在内剩下17人——这是他带着弟兄搭乘飞机从芒市飞往昆明，在机舱里逐个清点的。[117]

傍晚时分，在大垭口军指挥所，参谋向李弥报告："副军长，我们胜利了！"李弥坐在指挥部外一块石头上一动也不动，像个木头人，眼泪扑簌簌地滚下脸颊……[118]

关于李弥在日军覆灭日置身松山战场的心境，中方能找到的记录寥寥。然而日本作家楳本捨三却在其著述中有一番奇异的描写。考虑到此人惯于以虚构之笔为日军涂脂抹粉，这段文字藉李弥之口褒扬日军的色彩很明显。但是仔细品味，这段来路不明的文字，倒也传达出作为战败一方对于中国将领品性、胸怀、风范的某些认识，不妨引来供读者咀嚼：

整个战场一片死寂。

李弥少将仿佛自言自语地低声问道："你们还恨这些日本兵吗？"

"不恨。"参谋们齐声应道。

"我现在感到与这些对手作战很光荣，这是军人的幸福……"言罢停顿片刻，声音有些哽咽。某个参谋心想师长（日军似一直不知李弥已升为副军长，很多记述中仍以荣1师师长称之）可能是落泪了，却未敢去正视他的脸。

李弥没有称这些日本兵为"敌人"，而是用了"对手"这个词。

"……这些日军官兵的父兄，曾热情地庇护过我们的国父孙文先生，而后才有我中华民国革命的成功。现在与他们厮杀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些士兵怎么会被驱赶着来参加这样愚蠢的战争呢？我真不明白，也没法想明白……

"我要向总统报告这个战场的真实战况。现在，作为师长我希望官兵们能郑重地安葬他们。"

---

〔116〕周藩：《龙陵痛歼日本侵略者亲历记》，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49页。

〔117〕杨金继2002年10月自述文章：《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118〕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第277页。

说完，李弥少将对着阵地的一角双手合十行了一个佛教之礼，为那些战死者的亡灵祈福。[119]

9月8日至9日：

一整天，我军都在松山打扫战场。

清点整个战场日军尸体，共发现600余具，不包括在堡垒和战壕内被掩埋者。松山全部日寇仅数十名逃窜四方，有的被我友邻部队俘获或击毙。在掩蔽部内俘虏20多名勤杂人员及慰安妇十余人。

松山战后，龙陵县县长许颖贤曾致电保山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李国清，呈报当地凤（岭）邦（迈）[120]军民合作站向导组协助部队歼灭分散逃匿之敌的情况。该电称，共发现从松山零散逃出的日军75人，这些亡命日军狼奔豕突，一路疯狂杀伤我军民20余人，因此当地民众纷纷自发以石块、木棍杀敌，共击毙44人，生俘5人。[121]据载，木下昌巳等3人、森本高之进等7人、石田富夫等7人、森本谢等3人、乌饲久等9人、吉武伊三郎等20余人、早见正则等25人，均是结伙从横股阵地溜下勐梅河，而后分散踏上逃亡之途的，合计为74人，与电报资料数字出入不大。据此资料，似应有36名日军最终逃脱。但日军第56师团参谋长川道大佐曾言逃回归队日军为7名，则电报中溃逃日军总数75人中，也许有被当地军民多次发现而重复统计的情况。

据太田毅著述，后来进了保山战俘营的"松山组"日俘有十四五人，他提及其中9人：步兵谷裕介、早见正则、森本谢；炮兵小笠原光雄、森田觉、里美荣、上野正义、稻永峰次、八中观测兵（化名）。被俘者中还有一个化名"森之石松"的广东籍中国兵，此人1942年在缅甸被日军俘虏，被留在日军野炮第7中队做饭，学会了日语，完全日本化。他善做粤菜、会按摩、会拉二胡，深得日军喜欢。被俘入战保山俘营后，他让日俘为其保密，害怕被作为汉

---

〔119〕［日］楳本捨三《壮烈　拉孟守备队》，第142—143页。

〔120〕当时的凤岭、邦买两村，属龙陵县第七区，区公所设在凤岭乡。今为镇安街邦买村。

〔121〕据《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第73页。

奸处理。最后，竟被当作日俘送到了日本。[122]

松山上日军遗留战利品很多，除了大量的机、步、手枪和战刀外，还有105毫米野战炮8门及完好的掘土机、汽车和相当多的骑、炮兵用的骡马鞍具。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记得，清扫战场的官兵打开了日军在大垭口的一个大仓库，穿上了日军的呢大衣、军服；有的还拿走了食品罐头。第103师熊绶春师长得了一部小汽车，是日军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的专车；设在大垭口的自来水抽水机被第82师王伯勋师长派人拖走；副军长李弥得了一台缝纫机。周彭俊为王光炜弄来了一把战刀和5支日式步骑枪。[123]国军没有“一切缴获要归公”的传统，何况第8军是个“穷部队”，对自己用鲜血生命换来的这些战利品，自然是“分田分地真忙”。

最遗憾的是，荣3团政治副团长（荣1师部队仿苏军编制，设政治副职）陈叔铭在打扫战场时不幸触雷身亡。[124]据王外马甲在《战场上的蒲公英》中记述，这位戴眼镜、很斯文的政工干部，有可能是了解松山战场日军情况最翔实的人，他不幸身亡后，也把很多秘密带到了另一个世界。

此刻，只有那些正在处理掩埋阵亡烈士的卫生人员，仍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之中。腊勐军野战医院的新39师少尉军医黄执中说，他记得当时日军被打死850人，被俘9人，我军则伤亡官兵6000余人。黄执中率队上山掩埋尸体，“挖了3个大坑，分别能装1000人、800人、500人，全部填满了！”[125]

随木下昌巳一起出逃的里美荣兵长，在勐梅河对岸山上与木下、龟川走散，独自逃到龙陵后，被我第71军部队俘虏。因为穿着便衣，自称叫“秀文明”，又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起初被误认作汉奸，暴打了一顿。待弄清其真实身份后，我军这天将他带到松山，

---

〔122〕［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270、289页。

〔123〕王光炜：《回忆松山之战》，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25页。

〔124〕陈一匡：《滇西反攻战第八军攻克松山纪事》，据《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第252页。

〔125〕2005年6月19日《重庆商报》文章：《血战松山　三吨炸药炸飞山头》，罗磊、颜乔撰文。

让他指认日军埋藏无线电通讯机的位置，又问军旗上的菊花御纹旗冠在哪里，里美荣说自己不知道——这个由真锅邦人亲手处理的日军精神图腾，从此成为掩埋在松山的一个秘密，[126]在几十年后仍被重返这里的日本老兵们一次次问及。

经过滚龙坡阵地时，里美荣看到好几处都覆盖着草席。一揭开，黑压压的苍蝇就“嗡”地飞起来，下面的尸体已经腐烂，蠢蠢蠕动的蛆虫就像小山一样。里美荣知道，那都是日本兵已经腐烂了的尸体……[127]

老兵洪绍坤昔日曾任昆明防守司令部的训练教官，当时司令部派几个参谋和他到前线，清点和收集松山战斗中缴获和剩余的军用物资上报。[128]他曾向访问他的戈叔亚回忆说：

战斗一结束，我们就奉命来到了松山。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一位少将陪同我们去，他叫我们做好准备，因为山上死人的味道臭得可怕……汽车还没有到腊勐，臭味就扑鼻而来，而且越来越浓烈，堵着胸口很难受，仿佛把空气都凝固了。我们几个人一下子就紧张起来。在这里所看到的东西第一是尸体，第二是尸体，第三还是尸体。战斗部队的军官带着我们四处看。我们是走一路哭一路啊，包括那个带队的军官和两名少将。

松山是由许多山头组成，大得很。凡是有日本人防御阵地的地段，松树都被炮弹炸断或者连根拔起，或者被烧得光秃秃的。每一段坑道，每一个地堡都是经过搏斗才占领的。除了尸臭外，还有火药硝烟和东西被烧焦的味道。我们是沿着大垭口部队进攻的路线上去的，到处是还保持着临死时各种各样姿态的尸体和被炸飞的人头，手脚、大腿随处可见，真是触目惊心。

---

〔126〕品野实在《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记述，军旗御纹章旗冠由真锅亲手处理，早见正则的回忆是深埋在横股阵地野战炮兵仓库入口处，木下昌巳回忆埋在音部山与西山阵地之间，莫衷一是。

〔127〕［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334页。

〔128〕第8军系因作战临时纳入远征军序列，原隶属昆明防守司令部（由第5集团军总司令杜聿明兼任司令，辖云南境内第2、5、6、8、53等5个军），因此该司令部有派员监督战场清理之权。

快到山顶时，坡度很陡，这里的尸体不多。说是中弹的士兵都滚到山谷里了。有些官兵在尸体堆中走来走去，在收集枪支、寻找战友和还活着的人，有的好像在寻找什么值钱的东西，有的鬼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山顶上，武器弹药堆成了小山包。士兵们胡子和头发长得可怕。燃烧着火焰的目光熄灭了。士兵们在休息说笑和睡觉。更多的是一个劲地抽烟，在一面破烂不堪的国旗下发呆……

我们在松山大垭口的帐篷里住了一个多星期，每天老是听到“突突突”的推土机的声音，把耳朵弄得成天嗡嗡的。那是推土机在掩埋尸体。他们用推土机把尸体推到挖好的壕坑和凹地里，然后推土掩埋。尸体堆里有时会发出呻吟或者蠕动，人们就停下来，找到活着的人拉出来再干活。根本不清点人数，辨认尸体和登记胸章，有时甚至把死者随身的武器也一起埋掉。

我看不下去了，掩着鼻子跑过去告诉他们不能这样干。可人家根本不理睬我。在一旁的军官把我拉开，说是有的人已经死了几个月了，如果发生瘟疫那更可怕……

一天在野外，不知怎么搞的，陪我们来的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的那个少将被自己背着的日本小盖板马枪打死了，枪是松山部队送的，每人一支。有人说是走火，也有人说是自杀。人这玩意儿，活着死了，我看都没意思。可真是的，你说人和人相互残杀，这叫什么玩意儿，似乎活着挺有意思的，他妈的……

离开松山，我们又去了龙陵。几天后返回昆明，路过松山时，推土机“突突突”的声音还是没个完……[129]

9日，位于芒市的日军第56师团情报部门监听到蒋介石给围攻腾冲城的第20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发出指示：

“获悉松山阵地于9月7日被第8军攻占，心中极为欣慰。望大军继续防备龙陵方面之敌反攻。腾冲务必要在9月18日国耻纪念日

〔129〕据戈叔亚战地田野调查《初上松山记录》，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九一八事变）之前夺回。目前整个战局正朝着有利我军的方面发展，虽然胜利曙光在望，但征途还很遥远，将有不少艰苦磨难……从这次日军在湖南的进攻作战，缅北及怒江方面对我攻势战迹来看，我军仍将面临极大困难。

“我军官兵，须以日军松山守备队、密支那守备队孤军奋战至最后一人拼死完成任务之情状为典范……”（据日文资料译出）[130]

这已经是蒋介石第三次用“激将法”激励远征军，在日军方面自然又可以将此看作“逆感状第三弹”。

获悉松山胜利的消息后，史迪威将军向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发电报祝贺：“谨向那些将松山缩小了的铁人们表示祝贺。成就非凡，诚挚致敬，不可言表。不应忘记七千名为此献出生命的战士。如果能够夺取腾冲，你们就大可以高枕无忧了。”

仅仅一周后的 9 月 14 日，腾冲也被中国远征军第 20 集团军一举攻克。

第 8 军从 7 月 2 日至 9 月 7 日围攻松山，费时 68 天，先后发动 9 次攻击，大小战斗无数次，终于摧毁日军经营两年之久的坚固设防阵地，全歼守敌，打通了扼守滇缅公路的咽喉要地。该军为此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全军投入作战的总兵力为 15975 人（含配属炮兵），伤亡达 6074 人，伤亡率约为 38%。其中士兵阵亡 3038 人，负伤 2741 名；军官阵亡 107 名，负伤 188 名。此外有 18 人失踪。[131] 从新 28 师于 6 月 4 日向松山之敌发动进攻，到第 8 军于 9 月 7 日攻克松山，远征军累计动用约 10 个团，兵力总计 23695 人，作战近百日。各攻击部队伤亡总数达 7773 人（不含失踪人员），与毙杀日军人数（1280 人）相比，比例约为 6.2：1，且战死人数超

---

〔130〕［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202 页。看此译文可知，大概出于维护中国体面的缘故，本书译者将蒋介石电报日文最后一段翻译成了相反意思：本来是让国军官兵以日军为榜样，反倒成了我军作出了光辉典范。经查日文网站，蒋介石电报的日文原文为：“……我が軍将校以下は、日本軍拉孟守備隊、あるいはミートキーナ守備隊が孤軍奮闘、最後の一兵に至るまで、命令を全うしあるを範とせよ”。而邓贤《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中的引文，就表达了蒋介石电报原意。见该书第 286 页。著者据日文将译文修订。

〔131〕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附表六《陆军第八军松山围攻参战人员及伤亡统计表》。

过了负伤人数。[132]

取得的战果是，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俘虏28名（含慰安妇）；缴获步骑枪437支，轻重机枪32挺，各种口径火炮16门，战车3辆，汽车15辆。[133]因有大量日军尸体及其武器装备埋于地下无法准确统计。

在滇西反攻胜利后，云南各界群众在昆明市圆通公园建立“滇西战役第八军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为：

“岛寇荼毒，痛及滇西。谁无血气，忍弃边陲。桓桓将士，不顾艰危。十荡十决，甘死如饴。瘗忠有圹，名勒丰碑。懔懔大义，昭示来兹。”

超链接23：松山战役远征军参战兵力及伤亡情况

多年以来，日军战史和中方资料中对于远征军松山战役投入兵力均有估计偏高的情况。实际上，在中方第一手史料中，对此有着详尽的记载。

在松山前期一个月的战斗中，参战部队为第71军新28师及第6军新39师第117团。据第71军军长钟彬《龙陵会战》附录之《龙陵情报记录之十四号》，截至1944年2月，新28师兵力为6220人[134]；按当时国军编制，第117团参战兵力约为1500人；两部合计为7720人。另据曾观战滇西的陆军大学教官吴致皋所著《滇西作

〔132〕关于抗战时期国军部队伤亡统计问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很多部队因平日“吃空额”而故意长期缺额，于是在一场战事结束后趁机多报阵亡人数，借以对此前的缺额“销账”。据蒋介石1941年12月9日日记云：“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皆知之缺点。各级层层欺蒙不一而足，至一师之中缺额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平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做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178页。军令部长徐永昌在统计国军部队兵力时，亦按“七折”估算。国军一个师足额应为9800人，而第8军各师实额均为五六千人，可见也存在“吃空额”嫌疑。因此，战后第8军的伤亡统计数字，极可能存在“浮报”问题。一般而言，战斗中死伤人员大致比例为“死一伤三”，若战后上报数字中阵亡人员超过了负伤人员，多半存在浮报“销账”的问题，而松山战役中第8军伤亡统计数字确为“死多于伤”（阵亡3145名，负伤2929名）。

〔133〕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附表十《陆军第八军攻克松山战斗夺获敌战利品及俘虏人员统计表》。

〔134〕钟彬：《龙陵会战史》，第73页。

战实录》载：在前期战斗中，各攻击部队付出了伤亡近1700人的重大代价。其中士兵阵亡805人，负伤736人；军官阵亡50人，负伤108人。此外失踪32人。[135]

后期第8军参战后，投入兵力及伤亡情况如下表：

表13 第8军松山战役参战人员及伤亡统计表[136]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 日）

参谋处第二课制

区分/部队		参战人马			死亡			负伤			生死不明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司令部		50	57	14									
军直属部队	特务营	18	239	7		1		1	5				
	山炮营	17	187	106		3	2		8				
	战炮营	25	321	42	2	1		1	6			6	
	工兵营	22	366	19	1	29		1	30			4	
	通信营	30	188	20									
	辎一营	21	287										
	辎二营	29	259	89		1	12		1				
	第一野战医院	13	113										
	合计	225	2017	293	3	35	14	3	50			10	
荣誉第一师	2团第3营	26	386		6	135		13	171				
	第3团	125	1548	48	10	390		38	389				
	合计	151	1934	48	16	525		51	553				
第82师	245团	91	1218	25	8	417		24	212			8	
	246团	95	1132	20	19	335		20	380				
	合计	186	2350	45	27	752		44	652			8	

〔135〕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45页。

〔136〕笔者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件六核制。

续表

区分 / 部队		参战人马			死亡			负伤			生死不明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第103师	司令部及直属部队	97	986	39	3	86		6	73				
	307团	106	1591	39	21	340		34	620				
	308团	104	1456	30	16	450		18	481				
	309团	117	1538	43	21	645		31	303				
	合计	424	5511	175	61	1721		89	1477				
配属部队	炮10团	157	1419			1							
	炮7团混合营	50	532	303									
	71军山炮第2营	35	430	78									
	第5军山炮第8连	25	271	80									
	工兵15团第9连	8	150			4		1	9				
	合计	275	2082	461		5		1	9				
总计		1261	14714	1022	107	3038	14	188	2741			18	

据上表统计数字可知，第8军参战总兵力（含配属炮兵）为15975人。

与战役前期投入兵力7720人相加，自6月4日至9月7日，远征军投入松山战役总兵力约为23695人。而日本公刊战史推算的远征军松山参战兵力居然高达41500人，其错误在于将第6军军部及新39师整师均统计在内，其实后者均在龙陵、平戛战场。[137]

则松山战役中远征军参战部队伤亡情况汇总如下：

〔137〕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下）》，第165页。

	阵亡	负伤	失踪
新28师、第117团	855	844	32
第8军及配属部队	3145	2929	18
小计	4000	3773	50
伤亡合计	7773		

远征军与日军“战损比”反差巨大，常常为后人诟病。究其原因，除松山地形险要，日军工事坚固，顽强抵抗，作战期间正值雨季，补给困难等原因外，远征军各级指挥机关对松山敌情不明，在战术指导上未能进行充分准备，集中优势兵力、兵器一鼓作气攻克敌阵，而是逐次用兵，在攻击一再受挫后也是逐渐增兵，致使攻击旷日持久，伤亡增大。关于此点，笔者将在尾章中专题讨论。

9月11日：

即日，在龙陵的日军第113联队长松井秀治，见到了从松山逃出来的木下昌巳中尉和龟川肇上等兵，并收到了真锅邦人带给自己的信。真锅的绝笔如下：

拉孟全体官兵，誓死捍卫联队军旗，也相信联队长会回到我们身边来，即使只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继续浴血奋战。小鸟在喳喳地叫着，等待母鸟的归来。我们全体官兵不论发生什么事，也绝不会损害联队的荣誉……[138]

这封信的内容木下事先没有看到，真锅不是当着他的面写的。木下后来认为这封信是8月中旬写的，目的是请求救援，当时打算派人送出去，但没有能够送出去的人。信似乎没有写完，但原因是什么，木下也不知道。

〔138〕［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202—203页。经查日文资料，原文为：“拉孟の将兵は確（よ）く軍旗を護り、連隊長殿が帰られることを信じ、最後の一兵まで血戦を続けます。小雀はチューチューと鳴いて親雀の帰りを待っております。私共はどんなことがあっても連隊の名を汚すようなことはいたしません。”

信中，“小鸟在喳喳地叫着，等待母鸟的归来”这一句，不但显得突兀，更流露出莫名的凄楚和幽怨色彩，也许只有作为联队长副官的真锅才能对其上司作如此私人化的表达。在一个月前已晋升为少将的松井秀治读这封信时，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流。这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打击。[139]

这天，由远征军第71军后方部队帮助镇安街地方开办的民众小学开课了，因战争而跟着大人躲进深山的孩子们重回课堂，部队派来了有文化的军人教孩子们读书。德宏州政协退休干部、当年是10岁学童的张国龙记得，三个月来松山那边的枪炮声已经平息，龙陵方向的枪炮声仍不时传来，而远征军在镇安街大坝修建的飞机场已经开始起降飞机，巨大的引擎轰鸣声经常掩盖住了老师讲课的声音。一位军人老师手捧着油印的绵纸课本，努力提高嗓门为孩子们领读课文：

“第一课：人，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都是中国人。”[140]

---

〔139〕9月16日，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给拉孟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少佐发来嘉奖令，亦破格特晋两级为大佐；一年后，由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对真锅邦人大尉按常规特晋一级为少佐。当时，日本大本营顾虑到，日本民众对太平洋岛屿作战中日军全军覆灭已有心理承受能力，但对陆地作战而全军覆没恐怕难以理解，因此在9月21日发布公报时未沿用“玉碎”的说法，而改作拉孟、腾越守备队“全体官兵相继战殁”。但日本媒体普遍使用了“全员玉碎”的字眼。因此，那些被俘或未受命而擅自逃出的士兵，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日]太田毅：《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第235、304页。

〔140〕张国龙：《在侵华日军铁蹄下的日子——镇安沦陷区回忆》，据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松山作证》，第185页。

尾章　松山战役检讨

（参阅附图5、附图6）

松山战役之后，针对日军防御战术的特点，国军组织了大规模的观摩研讨活动，一时间，各战区都派了高级军官到松山阵地参观考察。军委会的初衷本来是希望大家认真研究“攻克阵地”的办法，有意思的是，这些黄埔系军官们到阵地上看了半天，进攻的新方法没有想出来，却被日军的坚固工事吸引住了，觉得大开眼界，纷纷表示自己掌握了“防御的精髓”。只可惜，这个防御的本事学到手的时间太晚了一点，因为，此时的日军已经没有能力再做进攻了，所以直到日本投降，“松山经验”也没能在抗战中派上用场。

据说，倒是第71军军长陈明仁将日军的松山防御经验学到了手，在1947年6月坚守四平街战斗中让“常胜将军”林彪吃了个大亏。陈明仁曾披露：“能够守四平的把握是我学会了日本人过去守龙陵、松山的方法，这些方法都是我体验到的，我当时相信日本人的方法一定可以达到坚守的目的……只有依靠坚强的工事，而工事又只靠面不靠点和线。有了全面的坚固工事，即使多数点被突破，都是不要紧的……”[1]1949年5月国民党军在上海外围的阵地防御，也沿袭了“四平模式”，解放军早已是吃一堑长一智，以丰富的攻坚经验，没有给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扬名立万的机会。

笔者经过多方寻找，获得了关于松山战役不同层次的总结资料，

---

〔1〕 详见黄埔军校网文章《尸山血河争四平》，弥新撰文。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hpzc2nz0003.htm。另可参见2008年第2期《三联生活周刊》文章《血战四平的攻防得失》，蔡伟撰文。

分别由第103师、第8军及陆军大学教官完成，由此可见当时国军上下对这一战例的重视。兹将其分别介绍如下：

第103师为松山战役主攻部队，作为左翼兵团先后攻克滚龙坡、大垭口、大寨、黄家水井、黄土坡、马鹿塘，该师也是唯一以全建制投入松山战役的部队，甚至连师部直属连队都几乎打光。也因此，在松山专门修建了该师的阵亡将士公墓和纪念碑。这支带着浓郁“黔系”色彩的部队，参战官兵为5935人，伤亡3348人，伤亡率为56.4%；其中牺牲1782人，阵亡率达30%。在该师战后所作的围攻松山战斗详报中，在叙述战斗经过之外，对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反思。其前言颇含深意地表示：“查松山攻克为抗战以来对敌据点群攻击奏功之一，其间经验教训可为国军尔后训练作战参考之处尚多。昔日普鲁士因受耶拿会战[2]之创痛，即以敌为法揣摩拿破仑之战法，经年而后有色丹之捷。[3]甚望国军袍泽对于此次会战之经验教训幸勿等闲视之，倘能由兹役为基点，进而攻克敌在国境内所有之据点群，扫荡腥膻，光复华夏，则本篇之著为不虚矣。”

作为师一级的总结，其重点在于对敌我优劣点的条分缕析，以及据此形成“对敌据点攻击法”战术，以供友军借鉴。因军事科学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后者今天看来已经明显落后，但从前者仍能见出总结者“知己识人”的心智。而战斗文书就事论事、不加褒贬的朴实的“技术路线”文风，亦颇堪玩味：

甲、敌之优劣

（一）优点

子、战术方面

1. 敌113联队官兵均为九州子弟，素质优秀，技术精良，烂熟

---

〔2〕 耶拿（Jena）会战是拿破仑进占普鲁士的主要战争。1806年10月，法军在耶拿大败欧洲强国普鲁士，6天之内便瓦解普鲁士主要作战力量，19天后便进占柏林，并摧毁当时曾经风行一时的线式作战，改写了欧洲陆战的战术原则。

〔3〕 色丹（Sedan）又译作色当。色当会战发生于1870年9月1日普法战争时期。战斗的结果是普军俘虏了法皇拿破仑三世及其麾下的军队，虽然普军仍需要与新成立的法国政府作战，但此战实际上已经决定了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及其盟军的胜利。

山地战术，敌龙兵团依为命脉（在龙陵所获敌文件中，有云56师团生命要靠松井联队即113联队决定）；

2. 敌选择阵地适当，能以少数兵力控置广大之区域，支持长时间之战斗；

3. 敌防卫配备能适合地形特性，无论高地、森林、村落、谷地，均能曲尽利用之妙；

4. 敌善于捕捉战机，每当风雨浓雾黑夜之际，能实施果敢之逆袭；

5. 敌利用反斜面工事以作韧强抵抗，常诱致我军于进出棱线之际，予以重大之损害；

6. 敌军惯用包围侧击战法，正面仅留少数兵力牵制，主力常绕出我侧背而攻击之；

7. 敌以歼灭攻击者于阵地内为着眼而编成火网，侧防机关多而隐秘，非至最近距离不易发现；

8. 敌在森林、村落或丛草内常设伏击阵地，俟我军通过后由背面射击；

9. 敌军守备阵地深得以逸待劳及争取主动之要诀，通常于主阵地要部配置少数观测兵，主力控置于掩蔽部内待机，一俟我炮击停止，步兵进入其火网内时，即行进入阵地猛烈射击，致我军蒙受重大之损失而攻势陷于顿挫；

10. 敌设置壕内阵地恒于交通壕内，两边构筑避弹孔，俟我军进入时即予消灭。

丑、战斗方面

1. 敌士兵独立作战能力甚强，常以少拒众，且行动机敏，每进出我攻击部队侧背勇猛袭击；

2. 敌火力分配适当，能向四周发扬火力，对重要方面并构成急袭火网；

3. 射击沉着，非至最有效距离不轻发射；

4. 敌行动异常隐匿，昼间敌阵地常若空虚无人，纵战斗激烈之际，亦难于发现敌之目标位置；

5. 战斗虽到达非常危急时期，敌守备部队毫不混乱，仍沉着

应战；

6．敌辎重兵、卫生兵、通信兵及一切杂兵，均受步兵训练，故能随时补充损耗，战斗力尚强；

7．敌军擅长近迫战及壕内战斗，剽悍沉着，得未曾有。

寅、技术方面

1．敌对各种武器之射击技术均异常精确，几有弹不虚发之慨；

2．敌军官兵之劈刺技术精良，每当我攻击部队于阵地内发生肉搏战时，我之损害较大；

3．敌使用轻重机枪异常灵活，假作三五发之点放后，即行停止射击或变换阵地，以致我军无法判明其确实位置而怀恐怖心理；

4．敌掷弹筒射击精确，运用灵活，对我预备队危害最大，我军官兵甚畏之；

5．敌军辅助通信技术如手旗通信、信号弹、通信犬、通信鸽、小型无线电机等，均及完备。

卯、精神方面

1．敌军官兵均有与敌共存亡之决心，虽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仍沉着应战顽抗到底；

2．敌有坚忍不拔之精神，虽炮火猛烈之际毫不退缩，或冒险抢修工事；

3．敌军爱国心浓厚，我方虽屡以飞机散发宣传品劝其投降，终无一应者；

4．敌军官兵忍苦耐劳精神较之国军毫不逊色，虽数日不得一食，仍死守阵地不退。

辰、筑城方面

1．敌据点工事强度一般能抵御我山（迫击）炮之破坏，其重要工事之坚强能抵抗重炮及飞机之轰炸；

2．工事构筑巧妙，步兵掩体均有中掩盖，交通壕纵横繁密，皆有射击设备，其壕内两侧多向下挖有坑道式之掩蔽部，敌兵恒隐匿其内不易肃清，乘机奇袭，故占领后颇难固守；

3．工事伪装良好，枪口位置隐匿不易发现。

巳、装备方面

1. 敌军步兵装备齐全，如钢盔、皮靴等均系国家制作，作战甚为便利；

2. 敌三八式步枪刺刀较国军为长，于肉搏较为有利；

3. 敌军手榴弹小而轻，投掷较远，威力亦大。

（二）劣点

子、战术方面

1. 敌恒畏我兵力强大，仅凭坚固守，不敢作大规模出击，故陷被动之不利；

2. 敌对于工事信赖过甚，如能确实围困，常能将其全部歼灭；

3. 敌对于我军主攻方向判断错误，防御配备欠当，并将炮兵射向固定，未能发挥炮火之效力；

4. 敌未控制有力之预备队，防御正面过大，守备兵力不敷，指挥调动困难；

5. 敌虽有空中接济，但增援断绝炮弹缺乏，守兵日益消耗，难当再作更长时日之抵抗也；

6. 敌之侧背感应性甚大，我军虽系一部，如能进出其侧背，颇易奏功。

丑、战斗方面

1. 敌警戒疏忽，如派三五人小组之勇敢士兵夜袭，常能获得不预期之战果；

2. 敌防御战斗顽强而攻击精神异常脆弱，如我军能沉着固守，敌即自行溃退；

3. 敌依赖据点工事心理甚切，如远离阵地，其战斗力锐减。

寅、技术方面

1. 敌对进路死角设置障碍及埋设之地雷，均无火力防护，易被我破坏；

2. 各据点之水管多未埋藏于地内，或用土掩盖亦极为显明，屡经我破坏致水源断绝。

卯、精神方面

1. 敌对我军新式武器，如火焰放射器、60迫击炮及冲锋机枪

极为畏惧；

2. 敌因畏我空军及炮兵，故日昼恒潜伏工事内不活动，致遭困击；

3. 敌失败后常遗弃大批尸体及械弹器材甚多。

辰、筑城方面

1. 敌据点式阵地之编成，依其筑城思想以现在颇为陈腐，盖尚未脱离往昔集团工事之雏形，故在火力发达异常之今日易被摧毁；

2. 敌据点工事大部构在山顶或棱线上，故甚暴露，死角亦大；

3. 敌此次所构筑之铁丝网，纵深太小，除滚龙坡方面外，一般容易破坏；

4. 敌炮位置固定，方向变更不易。

巳、装备方面

1. 敌自卫兵器之战刀及手枪，远不如我军冲锋机枪威力之强大，故甚畏之；

2. 敌掷弹筒射程威力均较60迫击炮为小，常被我制压。

乙、我之优劣

（一）优点

子、战斗方面

1. 攻击前由高级军官或派参谋至最前线侦察敌阵地配备详情，故攻击指导尚称适切；

2. 对据点前采用逐次攻略方法稳扎稳打，攻则必克，守则稳固；

3. 使用第一线兵力节约，通常控置强大预备队，以为扩张战果或防止逆袭之用，收效极大；

4. 实施端末作业，损失减至最低限度，且易接近敌阵，为敌最感痛苦之事；

5. 攻击前召集炮兵军官详密协同，调制射击目标、划分射击区域，适当用能以极少数弹药破坏敌工事；

6. 挺进炮兵于步兵线附近，能直接瞄准射击敌之枪口，命中精确，破坏敌侧防机能确实；

7. 编组挺进部队施行迂回绕袭敌后，对敌威胁最大；

8. 以小组兵力施行夜袭，屡获不预期之战果。

丑、战斗方面

1. 攻击时先行搜索敌之侧方机能位置，以炮兵破坏或制压，使突击容易；

2. 攻击队形编组均合据点攻击要领，每组人数甚少，能确实利用地形地物逐步前进，故能减少损害；

3. 步兵重火器适切区分射击地区，能直接支援步兵突击；

4. 步兵信赖炮兵甚深，能充分利用炮击成果，在炮弹弹幕诱导之下实施攻击；

5. 攻击准备周到，攻击前之侦察及攻击奏功后所需构筑工事之材料均预备妥当，故每当攻占敌阵敌后立即构筑工事，使敌不易恢复；

6. 攻占后即区分为警戒部队（防敌奇袭）、火战部队（自动火器即利用敌工事构成火网防敌逆袭）、土工部队（构筑有掩盖堡垒防敌反攻）。

寅、技术方面

1. 手榴弹投掷技术一般均合要求，敌甚畏之；

2. 土工作业工作力甚强，每于最短时间能完成必要之对壕迫近敌阵；

3. 炮兵及步兵重火器命中精确，且能适时阻止敌之逆袭；

4. 爆破技术甚佳，凡炮兵不能破坏之坚固掩蔽部，屡用爆破奏功，如松山子高地及大寨敌之联队司令部，均系爆破摧毁之；

5. 步兵对山敌之攀登能力甚强，如攻击第三号目标（即黄土坡3号高地）时，倾斜角在八十五度以上。

卯、精神方面

1. 攻击精神旺盛，虽伤亡惨重之际，仍能前仆后继、再接再厉；

2. 全师精诚团结士气发扬，而于作战之协同上则十分圆满；

3. 各兵种间、各部队间均十分协调，无争功诿过之不良现象发生；

4. 克苦耐劳精神堪嘉，能不休不眠在恶劣气候中战斗；

5. 官兵富于坚忍不拔之精神，能耐饿耐苦，据守尸体纵横臭气

迫人之工事中与敌对峙；

6. 命令贯彻到底，报告确实，甚少阳奉阴违、谎报军情之事件发生。

辰、筑城方面

1. 在敌阵地前火网浓密下不畏牺牲，实施对壕作业；

2. 攻击筑城能适合地形掩蔽确实接近敌阵，并能发扬火力使据点内之敌无以为守；

3. 占领敌阵地后即能迅速构成各种掩体及通后方之交通壕，使敌无法逆袭，确能固守既得阵地。

（二）劣点

子、战术方面

1. 最初敌情判断不确，将敌兵力估计过低，以致遭遇意外顽强之抵抗，不得不逐次增加部队，而陷于逐次增兵之不利；

2. 最初有少数指挥官误采一举攻略法，伤亡甚大；

3. 最初对于攻击部队未配属炮兵，以致步炮协同不密切，对于敌工事破坏不彻底，而使攻击步兵蒙受无谓之牺牲；

4. 最初攻击滚龙坡敌阵地使用兵力过大，而部署又不适合据点攻击法，伤亡较大；

5. 直援炮兵未能适时制压松山敌之炮兵，以致攻击滚龙坡之步兵受害甚大；

6. 攻击直前无统一之侦察，以致选择重点每为局部地形所眩惑，而发生争执。

丑、战斗方面

1. 干部指挥能力较差，兵力掌握欠确实，勇者先进而蒙损害，怯者落后以致无法指挥；

2. 火力运用欠灵活；

3. 预备队或援队距离过远，未能适时增援扩张战果；

4. 下级干部战术修养较差，只知正面攻击，不敢大胆包围，以致每为少数敌人所牵制；

5. 士兵于接敌运动间过于密集暴露目标，死伤特大，未能确实

疏散，并利用地形地物隐蔽；

6. 攻击前对敌阵地侦察欠周密，尤以对侧防机能及由其他据点指向之敌火毫不顾及，故突入敌阵前即受敌各方面火力射击，损害甚大；

7. 重兵器未能确实制压或扑灭危害我步兵之敌军重大火器及掷弹筒，适时援助第一线突击之步兵；

8. 攻击时步炮协同欠确实，步兵未能利用炮击成果迅速发起冲锋，间有炮伤自己步兵；

9. 突入敌阵地后过于猬集，遭敌其他阵地掷榴弹之损害；

10. 占领敌阵后，对敌逆袭事前毫无对策，以致临事张皇不易固守；

11. 对森林战及村落战欠熟练。

寅、技术方面

1. 射击欠精确，消耗弹药甚多；

2. 对于急袭射击平时训练时间较少，以致发现有利目标动作迟缓，未能适时消灭；

3. 刺枪术欠熟练，少数士兵避免与敌作肉搏战；

4. 对美方新武器性能欠了解，运用欠适切；

5. 破坏铁丝网动作生疏，姿势过高，且未用火力掩护；

6. 攻击筑城平时缺训练，技术欠佳，工作力不强。

卯、精神方面

1. 少数官兵过于勇敢，只知向前猛冲，毫不顾及敌火，徒遭损害；

2. 屡胜则轻敌，稍挫即气馁，为此次作战最容易发生之不良现象；

3. 依赖炮兵心理过重。

辰、筑城方面

1. 交通壕及掩体多未掩盖，而掩盖又以强度太弱，致遭掷榴弹损害较大；

2. 各种武器位置暴露，射孔过大，易被敌发现过早破坏。

巳、装备方面

1. 攻击部队官兵无钢盔，头部容易受伤，损耗甚大；

2．攻击部队官兵因缺皮靴，对于敌敷设之低铁丝网、竹签及其他障碍不易通过。[4]

陆军大学教官吴致皋曾观战滇西，他经过现地调研，著成《滇西作战实录》一书，较为宏观地总结了第11集团军所属部队滇西反攻作战的经验。该书虽系研究者个人撰述，但1946年曾由国防部史政局出版。因作者身份原因，可能曾通过教学在“国军”最高军事学府传播。

吴致皋认为，日军因兵力所限，加之在高原山地广阔正面布防，因此在各要点均构筑了类似松山阵地的坚固工事，采取独立据点式的防御战术。远征军在反攻初期，损失很大。以后逐渐取得战斗经验，损失才随之减小。其主要经验是：

①绵密侦察

敌阵地火力配系极其严密，尤其是侧防火力，配置非常巧妙，常能出我意料之外，给我攻击造成巨大损害。所以在攻击实施之前，务必利用各种手段，详细侦察清楚敌工事堡垒位置，及其火器配置情况，然后才进行适当有效的部署。

②对壕作业

为减少攻击牺牲，更容易地接近敌堡垒，实施对壕作业是最有效的手段。构筑对壕数，应根据敌阵地据点正面的大小而定，大致每隔50米至100米构筑一道为适宜。对壕形状以电光形为佳，并应在每个曲折部，构置射击位置；在对壕端末处堆积土垒，以防敌手榴弹和掷弹筒的杀伤。如能将对壕延伸到敌堡垒最近位置，对攻击更为有利。

③空军轰炸

在攻击开始之前，先以轻型轰炸机进行较广范围的轰炸，然后以战斗机向指定攻击目标，在不固定时间分批轮流俯冲轰炸或扫射，以摧毁敌工事，破坏敌交通，杀伤敌有生力量，震撼其精神。每次

〔4〕《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

投弹后，最好在附近空域做较长时间盘旋，使敌始终隐蔽不敢出，以掩护我步兵前进。

④ 炮兵使用

在空军轰炸或轰炸结束后，应以优势炮火力量压制敌炮火，主力则集中对指定攻击堡垒进行射击，彻底破坏其工事及障碍物。如情况允许，能以山炮数门，推进至最近距离，对敌堡垒实施直瞄抵近射击，效果更佳。射击时间或长或短，次数或多或少，通常视情况而定，但应以无规律为有利。因为敌人每当我空军轰炸、炮兵射击，常离开其阵地避入反斜面或掩体内，一旦我飞机离去或炮火停止射击，即出来占领阵地，以阻止我步兵前进；如我步兵在炮击同时攻击前进，敌亦常退至反斜面，以减少其损害，但当我步兵进至其阵地附近，立足未稳，而炮兵延伸射击的瞬间，又突然施行猛烈之逆袭，使我蒙受损害极大。为针对敌这一战术，所以我空军和炮兵，应施行不规律的轰炸和炮击，使敌遭受严重打击而手足无措，然后我步兵才能出敌不意，一举占领其阵地。

⑤ 步兵进攻兵力部署

攻击敌坚固据点的部署，步兵应分作若干波次（最少三个波次），重叠部署，使其能进行连续不间断的攻击。攻入敌阵地后，尚有充分力量阻止敌逆袭，扩张战果。每波次的兵力，及波次之间的距离，应视敌阵地具体情况而定。

⑥ 步兵攻击要领

当空军或炮火轰炸、射击时，步兵应撤至距敌约100米左右。待空军轰炸后，或炮火延伸射击的瞬间，利用对壕迅速前进至原来的位置，一面用手榴弹向敌堡垒及交通壕投掷，使敌无抬头的机会；一面以预先准备的迫击炮及机枪火力，指向敌之反斜面，并压制敌侧防技能，以阻止敌之逆袭或增援。此后，如敌仍凭借堡垒顽强抵抗，再用火箭筒及火焰喷射器摧毁其工事，烧杀其守兵，或以炸药直接投入敌掩体内爆破，消灭残存之敌。

如果不利用对壕作业，直接敌高地之坚固据点攻击，或进行距离较大的冲锋，往往在到达敌阵地前即造成极大损害，而使攻击受挫。

⑦ 占领敌阵地后续处置

夺取敌堡垒后，应迅速改修、构筑工事，将重火器推进，并合理配置，以阻止敌之逆袭。此时，最忌讳打扫战场、搜检战利品，以致敌突然逆袭时猝不及防，使阵地得而复失。[5]

表 14　远征军与日军战术素养比较

	日　　军	远　征　军
优点	1. 官兵素质较佳，教育训练扎实，对上级命令能彻底执行； 2. 对于工事构筑，火网编成，侧防配置及工事伪装等，均极端认真，绝不敷衍； 3. 富于独立作战精神，尤其富于牺牲性，据守据点或阵地，如未达成任务，即使死伤殆尽，也不轻易退却； 4. 长于逆袭及夜袭，常乘我攻至阵地前时，利用侧防火力由两侧封锁，同时由正面出击；或在我占领阵地立足未稳之际，施行逆袭或夜袭； 5. 作战准备周到，企图隐蔽。凡每一据点，均事先储备充分粮弹，以利死守；射击时不在 100 米距离左右，一律不滥行射击； 6. 情报良好，搜索严密，联络确实。	1. 士气旺盛，作战勇敢，能耐劳苦，不怕牺牲。虽在雨季山地，均能服从命令，努力执行战斗任务； 2. 兵力及火力均占优势，能主宰战场，施行包围或迂回，使敌感受到痛苦，处于孤立； 3. 有充分的空中力量，能适时适地投送粮弹，以弥补地面运输补给之不足； 4. 对伤病官兵救护迅速及时。轻伤者分区收容；重伤者可用空军转运后方医院救治。
缺点	1. 兵力与防御正面过于悬殊，因而不能阻止远征军由间隙突入，成包围迂回，联络线常被我切断； 2. 空军和炮兵力量始终处于劣势，无法争取主动； 3. 如阵亡人员遗弃战场，对其士气影响很大； 4. 绥靖政策失败，缺乏当地人民协助支持。	1. 士兵素质及训练较差，战斗动作不熟练，往往不能达到战术要求； 2. 不论攻击前进，或占领据点时，常忽略工事构筑，致使受敌逆袭，蒙受重大损失； 3. 士兵缺乏独立作战精神，军官一旦伤亡，即丧失战斗能力；攻击时，不懂得利用地形地物，常常猬集于一处； 4. 少数指挥官不能彻底执行命令，致使战机错失，影响整个作战；

〔5〕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 127—129 页。

续表

	日　军	远　征　军
缺点		5. 步炮协同尚欠良好。步兵冲锋时，炮兵不能适时延伸射击阻敌逆袭；炮兵集中射击后，步兵未能适时前进至适当位置，使敌有时间恢复其态势； 6. 官兵缺少保守机密及防谍意识，对情报工作不如日军迅速确实。
备注	日军优点以主观因素为主，缺点以客观因素为主。	远征军优点以客观因素为主，缺点以主观因素为主。
附记：著者根据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战役检讨相关内容归纳制表。[6]		

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于战后编纂了《陆军第八军怒江西岸松山围攻战斗经过概要报告书》，专门对松山攻坚作战进行了反思。该报告曾被改名为《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列为重庆陆军大学参考教材，是公认的权威总结。其主持者，应为第8军军长何绍周、参谋长梁筱斋。

作为战役总结，最核心的内容自然是关于得失、成败的分析。对松山战役所以“旷日持久”，且造成“殊出意外”的惨重伤亡，该军从困难和教训方面归纳出了以下6条：

（一）敌情判断错误致影响于作战指导，陷兵力于逐次使用之弊。

敌盘踞于松山二年有余，以一工兵联队担任阵地之构筑，经年竣工，准备坚守8个月，其总司令官及师团长曾亲临视察，极表满意。5月我大军渡泸（怒江），其第113联队之第2大队永在松山并未移动，其第1大队原守备红木树，经我第54军击退后转移于松

〔6〕 在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及战史会档案中，留存着一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总结，日期为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21日，总结单位不详，似应为国军统帅部门。该总结对于敌我优劣点分析，其客观程度远不如吴致皋及第103师团的总结。大致是，对日军优点和国军缺点分析较准确，对日军缺点和国军优点评价正误参半，主要体现为高估了国军在初期发起左右两翼攻势的作战指导，低估了日军对于我军企图的掌握判断能力。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第452页。

山，与第2大队共任固守之任务。[7] 当我攻击松山之初期，曾以重炮8门与我炮战。此种种情报均置诸等闲，一味判断松山固守之敌，不过三四百人、炮一二门而已。致使用之兵力，开首为两个步兵团，于伤亡之后始增加兵力，伤亡复伤亡，增加复增加，番号虽多，但得使用之兵力，永未超过两个步兵团之力量。致不能做连续不断之攻击，费时持久，增多困难也。

（二）敌防御阵地位置之选定良好，使攻击不能发挥优越之兵力，尤其松山及其以北，步炮兵之协同更难。

敌阵地前临深谷，背依深渊，阵地前地斜面陡峻，步兵攀登不易。松山及其以北，其前地特低，一直瞰制至怒江江岸及唯一交通路之惠通桥。如我欲行一包翼之攻击，必使兵力远离后方联络线，以行作战，则无求得轴翼之良好据点，因之必攻击松山正面不可。故敌坚固松山正面阵地，使我之攻击不易奏功。幸初期敌将阴登山放弃，军开始又袭取子高地北侧高地，获得轴翼据点，将松山之敌封锁于阵地内，使敌无法转移攻势，我可从容布置，以主力指向敌右翼滚龙坡附近，行包围攻势，故而奏功也。

唯对滚龙坡之攻击，如从正面着手困难之度，除炮兵可以协调外，仍不减于松山正面；如从侧翼着手，限于200公尺之正面，又不能发挥优越之兵力。

（三）敌士兵战斗意志殊为坚强。虽阵地粉碎，仅余一人，仍拼死顽抗，不死不休，尤不能以战理判断。虽处于被严密包围之绝地，仍拼死不退，我军非将其斩杀无余，始能称占领该地。例如：

攻击滚龙坡，当我军占领丙、丁两高地后，敌尚残置步兵于丁高地之东北山嘴及丙、丁间之谷地，从背后射杀我攻击乙高地部队。

当我军进占辛高地及癸高地后，敌尚有7人携轻机枪2挺，于我由癸高地向大寨攻击前进时，始出现于辛高地山麓。未高地占领之后，其南端有堡垒一座，经我喷火器焚烧，并经搜索，已无敌踪。数日后，凡通过其地近旁者多被射杀。复派人行严密之搜索，始发

---

〔7〕 此处关于日军松山兵力情况的推定明显与实际情况不符，按说战后审俘并参考缴获日军文件可以搞清日军松山兵力，第8军对于敌情的夸大可能是有意而为。

现该堡垒之下曾有坑道式掩蔽部4座，有敌5人，携轻机枪1挺据守其内。当我占领子丑、寅、卯、辰、巳、午诸高地之后，仍有敌二三十人据守子、卯、巳、辰间谷地之堡垒中，拼死不退。寅、午、未、癸均为我占领，敌尚据守大寨。

黄家水井为我占领之后，于该地深草丛中尚隐伏敌一兵一枪。部队通过则隐伏不动，一二人行动即被射杀，先后共为该敌射杀者计20余人。

当我由黄土坡4号高地通过密林，向3号高地攻击之前，当派出多数之长官斥候（旧军语，指侦察兵）严密搜索，均无敌踪。唯部队通过之时为敌猛射，始发现有敌机枪巢设置于坟墓之内，其顽强机敏实足钦佩。

当我占领3号高地3个堡垒之后，该3个堡垒间谷地中，尚存留敌兵30余人，与我攻击部队昼夜肉搏两日之久。

诸如此事，不胜枚举。敌战斗意志之坚强，出人意表。我军伤亡之重，亡者较多，其有以致之也。

（四）敌以野战工事之材料，构筑成重炮兵无破坏效力之坚强工事；并于阵地内外均编成浓密之火网，局部之失陷，不影响其阵地之安危。虽谷地山隙，亦构筑坚固堡垒，坚固固守，使我军无奇袭之余地。

敌堡垒构筑，大多分为3层，上作射击或观察，中作寝室或射击，下作掩蔽部或弹药粮食库。更有于下层掘斜坑道，于坑道末端构筑地下室者；又有于下层之四方舍去坑道，径构筑地下室者。虽间有掘开式之掩蔽部，仍构筑射击设备，故与堡垒难有明显之识别。

堡垒之盖材，以20～70公分之圆木，加盖三五层，其上再被以3公厘厚之钢板数层。堡垒四周，更加以内填砂石之大汽油桶3层，于汽油桶之间或其内部，再被以3公厘厚之钢板数层。十五榴重炮命中全弹，难期有破坏之效果。后经专门试验，不但不能破坏，且人居内部震荡颇微，无精神上之打击。

堡垒内上、中、下三层之间，仍以50公分左右之圆木2～3层为盖材，虽上层倒塌，其下仍不受影响。

堡垒构筑之位置，多在小高地之顶点、山腹或反斜面上，有时

亦在谷地中及山麓下构筑之，以消灭其阵地内之死角。

在山顶上堡垒之四周，以有掩盖之散兵壕及铁条或铁丝网围绕之，成为环形独立守备之阵地。在山腹者即设置于散兵壕之主要部位，或以消灭死角为目的，伸出于山腹或山麓，并以有掩盖之交通壕连贯之。

更于高地之纵横棱线，构筑有射击设备之十字交通壕，以通达外围散兵壕。故我步兵占领高地一半，相距50～100公尺，仍能陷于胶着状态。如忽略我既占领敌阵地内之肃清，我步兵到达棱线，便陷于敌包围火之内矣。

堡垒之支点，连结数个高地，编成堡垒群式之据点。各堡垒、各高地之火力均能相互支援，互相消灭死角及扇形地；更于堡垒之间任意连结，均能成阵地线，而于据点内部编成火网。故其局部失陷，绝不受任何影响。因之，每于我攻占其一高地后，前后左右均为敌火所包围，进既困难，退亦不易，而且预备队之增加亦不可能。如所攻占之高地低，敌则以火力瞰射，最后复以兵力逆袭攻击部队。如于攻击之前，未讲求周密之攻击方法，鲜有奏功者；尤以部队突下于反斜面，必被敌消灭而后已。

各堡垒式据点间，以堡垒连结之，而成为堡垒式之阵地带。如不占领其堡垒，欲事突入，不为敌交叉火所封锁消灭者鲜矣。

（五）弹药之屯备不易。每陷于有弹待兵、有兵待弹之现象，致延长攻击时间。

国军对坚固阵地之攻击为首次尝试，弹药使用之数量，自难求其标准。兵站之能力不足，受道路容量之限，车辆年久失修，亦难如期追送。故每次攻击之后，须数日之屯备，始敢行一次之攻击。

又于攻击之初期，兵力消耗之后，须待兵力之增加，始能作次期之攻击。其费时旷日，有以致之也。

（六）天候不良，影响于步炮协同及运输者甚大，在作战上增多人力不能挽救之困难。

怒江之天候，在七八月间，一般称之为雨季。即在晴天，怒江中浓雾，又沿各谷地弥漫于山峰，展望炮击，均不可能。仅赖步兵之攻击，又徒劳而无功。无雨之日，正午以后始见明朗。故除雨日

外，每日得使用之攻击时间，仅五六小时之久。顾虑于攻击奏效之后，须有两小时构筑阵地之时，俾能于夜间防止敌之反攻，因之能利用以作攻击者三四小时而已。此三四小时，仅可攻击一个堡垒阵地之高地。敌全阵地中有40个左右，计须使用无雨日40天左右。此亦为增加攻击困难，延长时日之一主因。[8]

说到致胜奏功之道，第8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总结了4条经验：

（一）改变攻击方向，避开其坚固正面，由滚龙坡进出，对敌阵地永形成侧击之态势，颠覆子高地使其失掉依据，致克奏肤功。

军踏袭友军之攻击方向，行第一次攻击。在子高地北侧确站脚步之后，始知态势全非。遂大胆毅然改变攻击方向，以阴登山为轴，主力移于滚龙坡附近，并利用竹子坡瞰制之利，一克滚龙坡，二陷大寨，再攻马鹿塘，如破竹之势直劈到底，致敌坚固之正面于无用武之地。

又，对巳、辰、午、未高地，在子高地未颠覆之前，曾猛攻数次，均因子高地之瞰射，侧防机关无法消除，蒙重大之牺牲，未获战果。经颠覆子高地后，先夺寅高地，续克巳、辰、午诸高地，如摧枯拉朽，并无困难矣。

（二）战法改善。

军行3次攻略失败之后，概知敌据有坚固之堡垒阵地，顽强之战斗意志，火网编成之方法及重火力兵力逆袭之要领，遂确定战法，以为尔后攻击之依据：

1. 行限制目标之攻击，逐次攻略敌阵地。攻击之部队，突贯敌阵地并不困难，肃清隐伏于阵地内之敌，颇费时日。尤须准备夜袭，防敌逆袭，否则徒劳无功，因之每日能夺获一二高地而确保之，即为满足。故采用逐次攻略方案以行攻击。

2. 于攻击之前数日，以炮兵先行软化敌之阵地，对敌每个工事，均行精密之破坏，使敌坚固阵地变成野战之简易阵地。于攻击

〔8〕据《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16章“所见”，笔者做了校订。第67—73页。

之直前，再以集中火力对攻击目标猛烈轰击，迫敌于阵地外或迫敌于未能彻底破坏之堡垒内，并使敌仅能隐伏于堡垒之下部，不能利用，以行射击，依步兵之要求停止火力，即移火力于敌侧防机能之所在，以压制之。

因此，炮兵均选直接射阵地，行单炮直接瞄准，以期精确；为求坚固堡垒亦能发挥破坏之效能计，将单炮一门与战防炮一门推进至最近距离，先以战防炮射击，打开破口，再利用山炮弹爆炸威力，期能于一点命中多数炮弹，逐次扩大破口，以收破坏之效果。经实施之结果，在地表面之部分，山炮弹、战防炮弹各300发能以摧毁。

至步兵攻击时期，此推进至最近距离之炮兵，即配属攻击部队，为步兵伴随炮，担任被破坏堡垒之压制，及破坏临时发现之坚固目标。

3．接敌运动

步兵构筑交通壕，以行迫近敌之阵地于30公尺以内，俾能一跃而占领高地顶点及敌之阵地，并避免我炮兵之损害，及尔后之增援容易。

敌火下之交通壕端末作业之构筑，日夜不停每日可进展立行者约8至12公尺，并须加以掩盖以避免敌掷榴弹及手榴弹之损害。

4．突击部队之编组

对每一个高地以一个建制部队担任之。

此建制部队之攻击部署，应区分为三波：第一波任敌阵地之突贯，直突至高地之棱线，占领该线上附近敌之阵地，并防敌由正面之逆袭；第二波继第一波之后，占领敌人工事，逐步严密肃清壕内之敌，尔后如可能由敌壕向反斜面清扫之；第三波俟第一波占领高地棱线，即携带构筑工地之木材，及掩盖材，到达棱线附近，构筑防御阵地，交第一波固守之。

有时我第一波突击之顷间，敌之侧防机能突然出现，此时应避免由斜面上跃进棱线，应先占领敌之阵地工事，由壕内逐步肃清，向反斜面攻击前进；第二波续第一波之后占领棱线；第三波仍任工事之构筑，交第二波固守之。

5．堑壕扫荡

顽强之敌，于我炮击时，均隐伏于交通壕或散兵壕下之掩蔽部内，我步兵如通过其前，即由暗处射杀之，因此须加以严密之清扫。

担任肃清敌工事内敌人之部队，一跃入壕，即沿壕逐步清除之。

担任清扫工作之先头两兵卒，务身靠壕壁，以行前进。凡有敌之掩蔽部及横墙与弯曲部之前方，先投以手榴弹后，再搜索前进，其较黑暗之位置，亦不可忽略。该兵之后，应以班长持冲锋机枪[9]，掩护该兵之前进。

6．堡垒攻击方法

堡垒经我炮击破坏之后，其地表面以上，多被击塌。故敌通常于我炮击期间，隐伏于下部，俟炮火停止或转移后出现，以行抵抗。因之对堡垒攻击之部队，应利用炮火停止之瞬间，进至距堡垒20公尺以内，封锁堡垒之门户，及未被破坏之枪眼，或将敌封锁于堡垒之下层，不使出现。俟喷火器或破坏组到达，予以焚烧或破坏，再进入内部而占领之。

7．喷火器班及工兵破坏组之使用

喷火器之重量约50余斤，用机油为燃料，喷射距离可达20公尺；用汽油为燃料，可喷射50公尺。机油喷射成面状，汽油则成线状，燃烧热度在一千度以上，每次可负油5加仑，点射可发射3次，如作一次喷射，可持续两秒钟。于喷射完毕之后，须退回安全地点补给油料，并更换压气筒，更换工作，在熟练之人员，约需15分钟。

工兵爆破组，如一般所示，唯其所使用之药包，每次须在20个以上，否则无济于事。喷火器班及工兵爆破组，置控于营预备队中，视攻击部队之需要，临时派出之，于出发之前，对下列事项，须于现地详密指示，期动作迅速，免为敌破坏也：

（1）攻击目标；（2）喷射或投射堡垒之部位；（3）进入道路；（4）退出道路；（5）掩护之部队兵力及所在之位置。

8．占领地区之工事构筑

当我突击部队占领高地之后，首应顾虑敌以密集掷榴弹之抛击，

---

〔9〕冲锋机枪，为当时对冲锋枪的称呼。

尤须准备击破敌人于夜间之反攻。

对敌密集之掷榴弹之防护法，在利用敌之工事，迅速增加掩盖。故突击部队之第三波，其工事材料之携行，必须充分；不得已时，自行掘成较深之单人掩体，以资防护。攻击部队之第三波，除供给第一波之盖材外，应迅速完成轻重机关枪有掩盖之掩体，续完成支点式之阵地，并于阵地前构筑障碍物，以增强防御力；如材料许可，第三波应携带折叠式之铁条网，较为方便。

根据经验，此种阵地，于夜间一经敌人突入，便呈混乱状态。后改为堡垒群式阵地，以其人之道反制其人，颇收效果。其法乃于占领之高地上，最小限构筑各能容一班人之三个堡垒，使其能相互支援，互相侧防，于黄昏前官兵携带充分之弹药，尤以手榴弹更须多备，进入其中，由外方坚固封闭之。更准备手电筒，使互相照明前地。

堡垒之材料，以大汽油桶填土堆集为堡垒之角部，以沙包堆集为墙壁，上以铁板，或连结之圆木为盖材，再于其上加 1 公尺之积土。

并于重要之堡垒内，安设电话，其电线埋于地下，通达后方，以资联络。经数次之经验，其完成之速度，如于攻击前材料之准备充分，反较支点式阵地为迅速。敌人继能突进于我堡垒之间或堡垒之后，仍无法立足，于天明时，不得不自行退去。

9．迫击炮之使用

远征军之编制装备，在迫击炮每步兵团有直属迫击炮连（82 或 81 者 4 门），营有直属迫击炮排（81 或 82 者 2 门，60 者 3 门），全团共计 82 或 81 者 10 门，60 者 9 门。在松山围攻初期，营迫击炮未行抽出，仍于其建制内，以支援其攻击。对于掷榴弹之压制，每难生效果。后以全团完全集结为两个迫击炮队，由团长掌握之，集中一点，以行射击，颇著效果。不惟对敌之掷榴弹筒能生显著之压制效力，且对敌之逆袭，于反斜面上形成压弹幕，可阻绝其前进。

60 迫击炮之效果，在此次围攻战中，并不亚于 82 迫击炮，且携带便利（一人可以携炮，一人可以携带炮弹），于协同困难之地形中，可径加入散兵内，进行战斗。

（三）战场上优良之现象师合气旺，足以克敌致果。

1. 攻击部队，于进展至高地棱线时，仅余三四人者常有之。而此三四人便据守棱线，虽有命令命其退回，仍拼死据守，与敌周旋，并招其战友前来共同挫敌。战友无奈，于三小时内，掘开 50 余公尺深约 40 公分之交通壕，前往支援，因而克奏肤功者，累见不鲜。

2. 经受重伤之士兵到达裹伤所时，不但无痛苦之表情，而且态度自然，向其长官报告受伤经过。虽拥集多数之伤兵，无一人痛苦呼痛者。

3. 于每次攻击失败之后，各级长官照实直陈，不推诿不卸责，并且于自己之攻击断念之后，即不待命令，尽自己所有之力量，援助友军，冒重大之危险，再所不惜，务使其友军成功而后矣。

4. 与敌搏战二月有余，各级长官无一面露愁色、悲观战况者。由始至终，虽伤亡惨重，累经挫败之部队长，仍以受命担任主攻为荣，与其他部队常相争，当受命令后，奋力攻敌。其他未担任主攻之部队长，尽力援助，无一相嫉而观望者。

5. 下级干部不论何时均以身先士卒为荣，而营长一级，亦常有此“病”，团长以上之长官稍不注意，则见连营长已与士兵为伍矣。考其原因，多为责任心重所驱使也。

（四）各级长官均以其智慧，研究战法，克敌致果，无一喜与敌力拼者，故围攻之中期，战法改良之后，与士兵之沉着勇猛相辅，攻克敌之坚固据点，所付之代价颇少。〔10〕

此外，着眼于后续战事，该总结还从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指导方面，提出了几条可供参考性的意见和建议：

（一）装备

远征军之装备已属优良，团以下之近战火力已相当充分，防御力固佳，而攻击尚嫌不足。此次攻击，不得已以单炮配属于营团担任伴随炮兵之任务，足资证明。如欲使部队兼备有攻击力，可以摧坚破锐，应如下装备之：

〔10〕《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75—82 页。

1．营之装备

（1）步兵连3仍旧；（2）重机枪连仍旧；（3）迫击炮排应取消82（或81）迫击炮，以60迫击炮9门装备之；（4）战防班应改为排，取消战防枪（重而无用），以战防筒6具装备之；（5）增设榴弹炮排（以山炮2门编成之）；（6）增设通信排，有无线话装备之；（7）增设输送连，负担战斗行李及日用行李之任务。

2．团之装备

（1）步兵营3仍旧；（2）高射机枪连仍旧；（3）迫击炮连应以82炮击炮6门编成之；（4）通信排应增加无线电改编为连；（5）增设伴随炮兵连（以山炮4门编成之）；（6）驮载输送连仍旧；（7）卫生队仍旧。

3．师之装备

（1）步兵团3仍旧；（2）搜索连仍旧；（3）增设山炮1营；（4）工兵连仍旧；（5）通信连仍旧；（6）输送连增加1连，改为输送营；（7）卫生队仍旧；（8）特务连仍旧；（9）防毒连仍旧。

4．军之装备

（1）步兵师3仍旧；（2）搜索营仍旧；（3）炮兵营应扩编为团，在山地部队以山炮3营、重炮1营（十五榴2连、十加1连）编成之；（4）工兵营仍旧；（5）通信营仍旧；（6）增设高射炮（枪）营；（7）辎重团仍旧；（8）增设汽车营；（9）野战医院仍旧；（10）特务营应扩编为3连，则以在国外作战为尤然；（11）战防炮营仍旧。

以上之增编似有增加国家负担之嫌，唯作战旷日持久、失城丧地，其损失为尤甚也。

（二）教育

美方之教育，偏重武器性能及技术上之使用，对于战斗战术上之运用多付阙如。经考查其担任教育之军官，亦多缺乏此种学识，诚不可不注意也。

（三）作战指导

1．攻击准备

凡阵地攻击均须行攻击之准备，尤对坚固阵地之攻击为甚。为

状况上之要求缩短攻击准备之时间者有之，其准备之事项概如下：

(1) 各级地形之侦察各级各兵种敌情之搜索；(2) 弹药之屯备；(3) 围攻器材之准备；(4) 攻击之部署。

基上述之4项，再考查此次之围攻战经过即知，如其一项准备不周，鲜有不遭挫败者，不唯其兵员损失重大，而且旷日持久，与原来企图相违，更知限时限日之攻击，非计也。

2. 弹药之屯备

对于阵地之攻击，国军尚少经验。本军此次对松山战斗使用之弹药，常引起一般非议或惊奇，兹将经验之概数列于后以为参考。

唯松山阵地，其利用之地形姑置不论，其工事虽不属要塞工程，其强度非野战重炮命中所能彻底破坏者，既无空军予以软化之轰炸[11]，又无中型以上战车作为步兵之诱导，全凭思想及技术克服诸种困难，始得以奏功也。

以一个步兵团山炮12门、战防炮4门，担任敌一个堡垒阵地之攻击，正面幅约200余公尺；重武器均使用，步枪兵仅使用200人，使用弹药概数如下：

弹　　种	团内保有数	攻击前请补数	攻击后请补数
步枪弹	20000	50000	50000
冲锋枪弹		20000	200
60迫击炮弹	200	600	600
81/82迫击炮弹		400	400
手榴弹	300	600	600
战防炮弹	200	600	400
山炮弹		1500	1500

攻击前对敌阵地之软化破坏射击，于滚龙坡地区前后共用山炮弹6000余发。

3. 攻击精神之使用

攻击精神为发扬战力之基础条件固属定论，唯指挥者欲使攻击

[11] 实际上第14航空队曾出动轰炸机予以轰炸，只是效果不尽理想。

精神发扬光大，尤赖于各级指挥官巧妙之部署，使其发挥无余，始无遗憾。否则不着眼于战术之运用，仅依赖于攻击精神，纵战胜敌人，其伤亡之重，恐非想象所及。即便能立时做人员上之补充，因训练、人事及经验诸条件之影响，终难恢复如前之战力。故指挥官之地位愈高，偏重于战术上之运用愈大，为统帅者不可不慎。

4. 兵员伤亡制度

在日本，其师团伤亡人数达全师团人数 1/3，即为极端惨重，多抽至后方重新加以整顿充实之。考其原因，伤亡达 1/3，即步枪兵已伤亡殆尽，部队无突击能力矣。

国军步枪兵，因人员之补充不易，疾病者较多，故步枪兵每不能达编制上之比例数。在步兵营约占其人员之半数，在步兵团约占 3/8，在师约占 9/32，概相等于 1/4 （1/3.5）。即师之伤亡数于达 1/4，不能作人员上之补充，尚可于重武器人员抽选一部作为班长编成队伍；如超过 1/4，其班长之抽选亦属困难矣。

军之伤亡每师达 1/2，干部伤亡殆尽。目下各长官均在人员上做努力之补充，欲恢复其战力与以前相等，实成绝大之问题矣。

5. 防御仅可作时间上之要求，不能作无期限之固守

敌松山阵地地形之利用，工事之强度，以尽人事上最大之能事，并以敌战斗意志之坚强作持久固守之计。国军素质教育均不如敌，仍有攻陷之一日，此证明之防御绝难作无期限之固守也明矣。[12]

最后，第 8 军参谋人员乐观地归纳说，若当初注意到了以上经验教训，从各方面切实加以改进，在战斗中做到：敌情判断不出大错，作战指导甚切机宜，兵力使用适当，攻击准备完善，先以空军投大量重磅炸弹软化日军阵地，再以炮兵实施精确打击破坏，而后以中型战车引导步兵冲击，那么，松山战役十余天就可以结束。再用之克龙陵、出腊戍，战略上与经济上所获之利益，较之增补弹药及军队之保养所付之代价，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13]

---

〔12〕《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 82—89 页。
〔13〕同上书，第 89 页。

当然，这是一种“事后诸葛亮”式的反观了，且带有空想成分。比如，反攻滇西难就难在松山切断滇缅公路，仅粮弹补给不足即造成龙陵“得而复失”，即使东岸真的有“中型战车”这一堡垒攻坚的利器，如何能过得了怒江？

2002年，军史专家郭汝瑰、黄玉章在其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史》中，充分肯定中国远征军滇西反攻作战胜利的巨大价值，认为这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的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而随后与中国驻印军并肩作战歼灭缅甸日军，更是“自甲午战争以来第一次援助盟邦进入异邦国土作战并获得胜利的一次大规模作战”。同时，他们认为滇西反攻作战远征军伤亡过大，其原因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失误造成的。即，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作战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火焰喷射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尤其是“对松山、龙陵、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5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14〕

话虽显得苛刻了一些，但回顾松山攻坚的整个过程，还是颇感中肯。兵法云：“预则立，不预则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而逐次投入松山战场的第71军、第8军的近10个团，哪一个不是匆匆上阵，“摸着石头过河”？在那样的“添油式”用兵和“车轮战”中，哪支部队均无暇及时总结经验，并将经验遗留给友军，以士兵的生命重复“交学费”实在是太多了。据远征军参谋长萧毅肃的儿子萧慧麟所写的《萧毅肃将军轶事》披露，因“松山工事坚固，士兵伤兵惨重，部队长滥用职权施以重压，盲目驱赶士兵冲锋送死，以致士兵被迫逃走，甚至有整排人一齐逃亡。”〔15〕这样的内情，恐怕是第8军的指挥官和参谋们在编纂战史时也不愿意面对的事实了。

---

〔14〕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抗日战史》第九卷西南及滇西作战，转引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1308页、第1310页。

〔15〕萧慧麟编著：《萧毅肃将军轶事》，第106页。据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等资料，新28师曾有32名官兵失踪，第8军有18名官兵失踪，其中可能存在萧慧麟所说的在战场上“整排人集体逃亡”的事实。

写作本书中，笔者心里有一份好奇：中国人民解放军有没有研究总结过松山战役？一份意外的收藏所得，让这个疑问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笔者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到了一件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外军教研室编印的小册子《日军战术特点》[16]，这份标有“秘密”字样的军内文件中，分析总结了日军战术的主要原则、进攻和防御战斗的特点，而其主要依据则是抗战时期的日军战史。[17]而对日军防御战斗所解析的经典战例，就是1944年的松山战役，并附有《日寇松山（云南省）防御阵地（据点群）要图》、《松山据点编成要图》。[18]笔者将其中对日军防御战术特点的总结概括，与吴致皋、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的战史比照，发现无论是分析和概括都要更加精当深入。比如，该总结指出日军防御阵地通常按照警戒阵地、主要阵地、预备队阵地、炮兵阵地4个层次编成；选择阵地时首先强调利用地形，并要求阵地高度隐蔽并能支持独立的“环形”防御；即便是最小部队、最仓促条件下的防御，亦必须“不惜劳力”构筑坚强的工事，而不必考虑利用之久暂，认为“缺乏工事的防御就等于丧失了防御的利益”。又比如，指出日军在防御中特别重视“反冲击”（即逆袭）战术的运用，有将“攻势”寓于防御的辩证思想。特别是在山地防御中，担负反冲击的预备队兵力配置优于扼守一线的第一梯队；反冲击时机多选夜间浓雾大雨或攻击者立足未稳，甚至有时故意自阵地向后撤回，而以火力覆盖撤离阵地予敌猛烈杀伤，而后猛烈反冲击……这些战术细节都是国军方面的总结中认识不甚清晰的。

松山战役已过去70年。由于特定的政治气候造成的宣传普及不力，这段历史曾长期不为公众所熟悉，对其深入的研究，主要在

〔16〕《日军战术特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外军教研室编写，1962年2月20日出版，出版编号（62）军教字第80号，印刷份数1700份。

〔17〕该资料在前言中指出：虽然上世纪60年代日本自卫队连以上单位均配有美军顾问，其条令基本上是美军的翻版，但由于日军的编制、装备和所处地位，民族特点，历次战争经验的传统以及封建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当时日军中高级指挥官绝大部分为旧军人，因此其战术观点、军事行动具有其自身特点，而非全盘照搬美军。有些日军军官认为：“未来作战必须继承日军传统，运用更灵活的战术手段。”所以该资料的研究仍以“二战”时期的日军战史为蓝本。

〔18〕经比对，此图系由《第8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唯绘制更为精细。

少数军事专家、军事爱好者圈子内进行。作为前车之鉴的战史经验，除了其精神层面的意义，更重要的价值也许是要让后来的军队汲取致胜之道，避免重蹈覆辙，毕竟这是用无数军人生命和鲜血所换取的。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遮蔽，都易造成一个民族自省能力和进步希望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那种仅囿于“自家经验”，为了宣扬光荣军史的自说自话式的研究，就显得非常狭隘和可笑了。在这个意义上，应该确立一个观念：战术研究应无“禁区”。

超链接 24：松山战役 VS 上甘岭战役

研究松山战役的时候，笔者时时忍不住会与抗美援朝战争后期的上甘岭战役作比较，因为这两场战役在形态上太相似了。上甘岭战役中，担任防御一方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进攻一方是美国和南朝鲜联军。笔者比较后的结论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阵地防御战比日军打得好，而美韩军的进攻战比中国远征军差得远。这当然是一个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的看法，但它并非没有根据。

在《战争论》中，克劳塞维茨通过对进攻和防御进行仔细的考察和比较后得出结论：防御是较进攻更强的作战形式。他认为，在战争中追求较高目的的一方，自然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谁认为自己的力量相当强大，足以采取进攻这种较弱的作战形式，谁就可以追求较大的目的；谁要是给自己提出较小的目的，谁就可以利用防御这种较强的作战形式的利益。”[19]在上甘岭战役中，我志愿军占据的三角山、狙击兵岭[20]两个高地，楔入双方对峙线敌方纵深，我已占据有利态势，因而意在坚守防御确保优势；美韩军为在谈判中取得更多筹码，则倾力进攻欲图夺取。在松山战役中，我远征军以打通滇缅公路为总目标，拔除松山据点是为总目标扫清通道，因而积极进攻志在必得；日军迫于兵力劣势，则以拖延待变这一消极目的，

[19]［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总参谋部出版局出版发行，1964年12月第一版，第646页。

[20]为美军军史中的称呼。我方称呼三角山为597.9高地，狙击兵岭为537.7高地北山。

凭借地利优势做消耗性防御。

表 15　松山战役与上甘岭战役比较[21]

区分 项目		松山战役		上甘岭战役	
		进攻：远征军	防御：日军	进攻：美韩	防御：志愿军
阵地情况	阵地类型		准要塞式半永久性工事		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阵地体系
	建设情况		耗时两年构筑		耗时两年多构筑
兵力投入		新 28 师 2 个团又 1 个营；新 39 师 1 个团；第 8 军军直，及所属 6 个团又 2 个营，近 10 个团，共 2.4 万余人	第 113 联队及野炮 56 联队第 3 大队部分兵力，合计约 1300 人	美军第 7 师，美军空降第 187 团；韩 2 师、9 师等 11 个团；埃塞俄比亚营和哥伦比亚营 2 个营；加上补充的韩军第 105 编练师和 4 个新兵联队，总共 6 万多人	第 15 军 5 个团，第 12 军 4 个团，共 9 个步兵团，加上战役中陆续补充的 2000 余新兵，共 4.3 万余人
步兵支柱兵器		火箭筒 54 具，火焰喷射器 81 具，汤姆逊冲锋枪 1500 余支	轻重机枪约 40 挺，掷弹筒、枪榴弹筒约 90 支	全员为自动武器	基本装备苏式自动武器，手榴弹、手雷、爆破筒基本足量
作战支援	炮兵	炮 10 团、炮 7 团 1 个混合营及军属炮兵，105 毫米口径以上火炮约 40 门，75 毫米山炮 36 门	105 毫米榴弹炮 8 门，75 毫米以下山炮、步兵炮共 12 门，速射炮 2 门，迫击炮 2 门	105 毫米口径以上 300 多门	75 毫米口径以上火炮 114 门（不含迫击炮），喀秋莎火箭炮 24 门，高射炮 47 门
	航空兵	美第 14 航空队约 1 个大队，间歇性支援约 50 架次	航空兵极少量支援，以空投补给为主	航空兵 1 个大队，飞机约 100 架，共出动约 3000 架次	无航空兵支援
	装甲兵	无坦克	3 辆坦克，仅深埋做固定堡垒	坦克 2 个营，170 余辆	无坦克
作战时间		93 天		43 天	

〔21〕上甘岭战役敌我双方统计数字，引用了军史专家周明专栏文章《上甘岭战役》资料：http://www.superarmy.com/zmzl/koreawar/2001_0207_1.htm。

续表

项目 \ 区分	松山战役		上甘岭战役	
	进攻：远征军	防御：日军	进攻：美韩	防御：志愿军
伤亡情况	新28师、第8军共伤亡7763人（含失踪人数）	死亡1250余人，被俘9人	伤亡2.5万余，其中美军5200余人（美方的统计是共伤亡9000人）	阵亡7100余，伤8500余，合计1.56万
战场英勇行为	团长亲率步兵冲锋，团长普遍负伤，营、连长阵亡比例达60%以上；军长何绍周，团长赵发毕、王光炜，营长谢梦熊（阵亡）、黄人伟获"青天白日勋章"；第103师获军政部颁发"飞虎旗"[22]一面	组织"挺身爆破班"2次，战果不佳；伤病员全部参加战斗；无主动投降记录；守备队长金光死后特晋两级，封号"军神"	未见记录	拉响手榴弹、手雷、爆破筒与敌同归于尽，舍身炸地堡、堵枪眼的烈士留下姓名的有38位之多，诞生黄继光、孙占元、胡修道3位特级战斗英雄
作战结果	赢得胜利	全军覆灭	只取得537.7高地前沿2个班阵地	赢得胜利
经验和教训	绝对优势之炮火及坑道爆破法、火焰喷射器、敢死队轮番突击，为致胜主要因素	失败无主观因素	战斗意志欠缺	胜利的"三大法宝"是坑道、火炮和手榴弹

通过列表对比，从防御的角度来看：

志愿军和日军赖以支撑的最大依据是防御工事，日军的松山堡垒是苦心经营两年完成的准要塞式的半永久性工事，可容纳联队

〔22〕正式称谓为"荣誉旗"，是民国政府授予特殊战功部队的最高荣誉，其形制为长方形蓝缎中央有一白色大五星图案，左右肩有"荣誉"二字；五星中心绣有一立姿黄色老虎，又称"飞虎旗"。滇西缅北战场共有36师、87师、88师、荣1师、198师、103师、新22师等7个师，54军、新1军、新6军等3个军获颁（其中第103师因克松山功绩而颁，荣1师因克龙陵战绩而颁）。据《中华民国重要史实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三）缅北及滇西反攻（四）远征军滇西反攻之作战，第37条，军事委员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向蒋委员长综呈铨叙厅厅长钱卓伦、军令部长徐永昌请奖叙远征军滇西战役有特别战绩单位与驻印军之裁编签——1945年4月13日。第513页。另据胡博先生考证，第9师和新38师也获颁荣誉旗。

（团）级规模的防御作战；志愿军也用两年多构筑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体系，可容纳营连规模的防御作战。需要说明的是，从上甘岭战役开始，志愿军就与美韩联军以反复拉锯的方式争夺三角山、狙击兵岭两个高地，所以，志愿军并不占有绝对的地利优势。三角山易守难攻，狙击兵岭易攻难守，双方都面临同样难题。因此上甘岭战役不完全是志愿军凭险坚守，打退美韩联军一次次进攻的那种阵地防御战。而松山战役中，基本上是日军凭借坚固阵地防御，远征军以进攻为主，很少以阵地防御优势予敌大量杀伤（**仅在子、寅高地出现攻守易位的短暂争夺战**）。因此，从防御作战的首要因素——阵地依托角度看，我志愿军不及日军占优势，充其量大致相当。

与日军相比，志愿军突出的优势在于兵力较充足。但是由于上甘岭阵地规模很小，仅为 3.7 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在阵地上作战兵力始终局限于两个连左右；而松山核心阵地面积达 18.5 平方公里，相当于上甘岭阵地面积的 5 倍，日军即便在放弃竹子坡、阴登山等外围阵地后，仍能以 1000 人以上兵力依托主阵地同时投入作战。

与日军相比，志愿军的炮火是第二个优势。但炮兵的作用首先在于对 3 倍以上优势于我的美韩军炮火力量的部分抵消，其次才是拦截其步兵冲击或阻止其在占领表面阵地后扩张战果。

志愿军与日军相似之处在于，都是在基本缺水断粮状态下作战的，靠的都是机枪、手榴弹等步兵武器。尤其是，在极端残酷的战斗中，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巨大威力，部队开展了"一人舍命，十人难挡"的硬骨头运动，并在强调"与阵地共存亡"的基础上，提出了阵地要存，人也要存，摸索出以"少、近、狠、快"为特点的一整套坑道战术。[23]在战斗中涌现出了许多以无比的英勇和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危急时刻与敌同归于尽、以身体堵塞枪

---

〔23〕"少"是指使用兵力要少，一般以一两人对付敌班进攻，以小组对付敌排进攻，以班对付敌连进攻；"近"就是指将敌放到 20 米至 30 米的近距离再开火，既能使敌猛烈炮火失去作用，又能给进攻之敌沉重打击；"狠"是指对突入阵地之敌要力争全歼，把敌打痛，使其产生恐惧；"快"是要求从坑道跃出快、战斗结束回撤快，反击距离不超过 100 米为宜。据军史专家周明专栏文章《上甘岭战役》：http://www.superarmy.com/zmzl/koreawar/2001_0207_1.htm。

眼的英雄壮举。坚持坑道斗争中，在面临敌军破坏、缺粮断水、建制混乱的情况下，组织临时党支部和党小组，领导官兵团结奋斗，克服了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终于配合纵深部队恢复了阵地，达成战役目的。这一切，充分显示了志愿军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并不输于日军的“武士道”精神。

更何况，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的胜利，绝非仅局限于战术、战役价值，诚如第15军军长秦基伟所言，“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价值观和思想体系的较量……是在小山头上打大仗”。[24]美第7师和韩第2师在战役中遭受了巨大的伤亡，迫使美军将战略预备队美第25师和韩第9师调上来，进一步加剧了其后备兵力不足的缺陷，并彻底消除了中朝方面关于能否在美军绝对优势火力下坚守阵地的忧虑。当时敌我双方都在谈判桌上等待这场战役的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胜利将朝鲜战场上的战略对峙，更加有效地稳定在北纬38度线上，并加速了朝鲜停战谈判的历史进程。[25]

这些，岂是在松山战役中全军覆灭的日军可以企及的。

从进攻的角度来看：

中国远征军进攻兵力仅为美韩军的1/3。其他条件也无法与美韩军相比：炮火力量是美韩军的1/3；航空支援力量是其1/60；远征军没有1辆坦克，全赖步兵突击，美韩军有2个营约170辆坦克助攻。在此情况下，远征军不但攻克了比上甘岭大得多的松山阵地，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且伤亡人数比美韩军少（**远征军在松山战役中伤**

---

〔24〕据《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第十五章鏖战上甘岭。

〔25〕美韩方对上甘岭战役的官方评价，均认为打了败仗。“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一书中评述志愿军坑道斗争：“铁三角一带的高地，范佛里特预计以200人为代价，可在5天内实现目标。但第10军从10月14日发起进攻，在共产党猛烈抵抗下苦战了好多个星期，使美国和南朝鲜付出了9000人的代价，共产党死伤达1.9万人之多。在战斗于11月18日逐渐停下来时，联合国军的阵地只略略有点微小改善，而损失却太大太大了。直接进攻敌军主阵地，实现一点有限目标无异于枉费心机……”曾批准美第8集团军总司令范佛里特“摊牌行动”的“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其回忆录《从多瑙河到鸭绿江》中也沮丧地说：“金化攻势”是“发展成为一场残忍的挽回面子的恶性赌博”，“我们死伤的人数在8000以上，大部分为大韩民国之官兵，得不偿失……我认为这次作战是失败的。”而《韩国战争史》认为此役时间之长、战斗之残酷，伤亡之惨重，史无前例。并写道：“中共第15军防御意志坚定，因此，三角形山战斗始终没有进展，反而使敌人因打了漂亮仗而自豪。”转引自军史专家周明文章《上甘岭战役中几个必须澄清的问题》：http://milsky.cn/html/shihaiyanyun/20070119/200F11a61.html。

亡约 7763 人；中方统计上甘岭战役中美韩军伤亡 2.5 万人，美方的统计数字为 9000 人[26]）。而美韩军最终仅占领了上甘岭 537.7 高地前沿的 2 个班阵地，远未达成其作战目标。

按一般规律，在战争中进攻方与防御方的战损比例为 3∶1。这一数字会随着防御一方阵地坚固程度和进攻方的火力强度等因素有较大变化。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以 19 世纪的军事技术条件（无航空兵，陆军已拥有步、骑、炮、工四大兵种，但尚无轻重机枪等自动火器）评估，对要塞阵地的攻坚，进攻方需要投入比防御方至少多一倍的兵力，而受到的削弱大致为防御方的四倍。[27]在松山战役中，远征军对日军兵力之比为 24375∶1300，约为 19∶1；远征军与日军伤亡人数之比为 7763∶1250，约为 6∶1。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对美韩军兵力之比为 43000∶60000，约为 1∶1.4；以中方统计数字，志愿军与美韩军伤亡人数之比为 15600∶25000，约为 1∶1.6——军史专家周明分析美方统计数字后认为，美韩军伤亡可能不到中方统计的 25000 人，但绝不止 9000 人，应与志愿军伤亡大致相当，即双方战损比约为 1∶1。

远征军对日军的伤亡比例较大，这是长期以来人们议论的一个话题。[28]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战史丛书，在谈及“全员玉碎”

---

〔26〕国防大学教授、军史专家徐焰在其《第一次较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年 2 月修订版）一书中说：“在朝鲜战争中，交战双方所公布的消灭对方的数字与各自宣布的己方损失数字都不相符。了解战场统计情况的人都清楚，除了绝对控制战场或缴获了对方全部档案的情况下，一般只能较精确地统计俘虏对方的人数，至于杀伤对方数字主要靠估计。尤其是在使用远射程的攻击武器时，战果更要靠猜测。”

〔27〕［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二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总参谋部出版局出版发行，1964 年 12 月第一版，第 729 页。其时，由于轻重机枪等自动化火器尚未诞生，因而防御方火力密集性不强，对实施集团冲锋的步兵杀伤、阻止能力较弱；而进攻方除火炮压制掩护外，尚可以运用炸药爆破手段攻击堡垒，因此略占优势。

〔28〕关于抗战时期国军部队伤亡统计问题，存在一种特殊情况：很多部队因平日“吃空额”而故意长期缺额，于是在一场战事结束后趁机多报阵亡人数，借以对此前的缺额“销账”。据蒋介石 1941 年 12 月 9 日日记云：“我前方部队兵额之空虚，已为全国皆知之缺点。各级层层欺蒙不一而足，至一师之中缺额至三千人以上者亦相率视为平常。平时领一师之饷，临时不能做半师之用，及至事后申报战役经过又任意浮报，动称一师死伤五六千人。”转引自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第 178 页。军令部长徐永昌在统计国军部队兵力时，亦按“七折”估算。国军一个师足额应为 9800 人，而第 8 军各师实额均为五六千人，可见也存在“吃空额”嫌疑。因此，战后第 8 军的伤亡统计数字，极可能存在“浮报”问题。一般而言，战斗中死伤人员大致比例为“死一伤三”，若战后上报数字中阵亡人员超过了负伤人员，多半存在浮报“销账”的问题，而松山战役中第 8 军伤亡统计数字确为“死多于伤”（阵亡 3145 名，负伤 2929 名），因此令人怀疑。

的松山之战时，也爱从这一点上为自己挽回面子，强调日军实施的是兵力1比10或者1比15的作战，[29]言外之意是中国人的胜利是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有人说，八年抗战中国为“惨胜”，松山战役可以说是一个缩影。但若因此而贬低远征军胜利的“含金量”，笔者认为这是妄自菲薄。中国远征军装备美式武器时间仅半年（1943年10月才开始接受美械装备），士兵大多数为文盲，临战前仅进行了简单的基础训练，战术素养难以迅速提高；加之以往缺少攻坚作战的经验，完全是在战斗中学习战斗（如，除军工兵营外，第307团等部队是在攻击间隙培训火焰喷射器的使用），能有如此战果已属难得。

所以，以战争目标的价值来衡量战争投入，才是科学的分析方法。松山之战，拔掉了滇缅公路上最硬的“钉子”，此后打通滇缅公路势如破竹，我抗战“生命线”得以重新恢复。以战役级的投入赢得了战略级的战争目标，应算是辉煌胜利。与此可以比较的是，在日俄战争的旅顺口陆战中，日军仅为夺取俄军千余人防守的一个小小的203高地（长不足250米，宽仅30多米），在第3军司令官乃木希典中将指挥下，投入4个师团中的近6.4万兵力，阵亡1.7万人（其中包括乃木希典的次子，其长子也在这次战役中死于金州），代价不可谓不大。[30]但日本经此一战，加之在对马海峡海战中击败俄国远东舰队，成为亚洲第一个打败西方列强的国家，一举奠定了世界强国地位，正如当时的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大将所言：“皇国兴废，在此一战。”日本有人抱怨此战损失大，但也普遍认为是扭转“国运”的巨大胜利。

---

〔29〕实际上日本公刊战史中对于远征军兵力，都作了较为夸大的估计。如围攻松山，依据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和《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等中国军方内部统计数据，新28师及第8军总共投入兵力约为24900人（参见附表《第八军松山战役参战人员及伤亡统计表》），但在《缅甸作战》中日方估计为41500人，夸大了近两倍。参见《缅甸作战（下）》，第165页。经计算，中日双方投入兵力对比为24375：1300，约为19：1。日方资料认定的“十比一”、“十五比一”都不算离谱。邓贤在其《大国之魂》中，认定中日双方交战兵力之比为50：1，距实际情况距离就太大了。

〔30〕在日俄旅顺口陆战中，由于俄国在要塞防御中采用了每分钟射速达600发的马克沁重机枪，近战火力空前强大，因而对仍沿用密集队形进攻的日军造成巨大杀伤。此为机枪在战争史上首次使用。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轻重机枪广泛采用，对防御一方颇为有利，因而进攻方被迫采用筑壕作业，战局演变为双方隔着堑壕漫长对峙的状态。直到后期坦克问世并投入使用，才打破这一攻防平衡。

日本人就是这样：在打了胜仗时算大账，视人命为草芥；在打了败仗时算小账，一万个不服气。正如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自我认同感与战争》一书中所概括的，这是一种“虽然整体失败了，但认为强调个别战场绝对没输的自负、逞强和嘴硬的压抑在内心的自卑与自负纠结的复杂情结”[31]。日本人这种民族心理特点，中国人应该看清楚，万不可人云亦云，自我迷失。

松山战役后，作为中国盟友的美国军人亦曾做过深刻反思。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中国人为民族生存权而战，美国人为国家战略空间拓展而战，双方投入的感情决定了彼此对战争价值认知的不同：中国人强调现实功利而专注于胜败得失，美国人有超越性思维但易于陷入幻灭感。时任中国远征军美军顾问团团长的弗兰克·多恩准将，后来在其回忆录《当国旗降下之后》中，披露了自己和史迪威将军的某些思考，典型地呈现出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认识和困惑。也许，随着岁月流逝，今天的人们从中会更容易获得关于战争认知的某些启示：

计算我方的损失并权衡夺取松山的价值，这个问题一直缠绕着我，它是不是值得？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在战争中的胜利者，常常会失去他开始时所具有的崇高目标和精神力量。如果是这样，在胜利的那一瞬间他就失败了，因为他看到的只是他所铸成的凄凉和悲惨。”我亲眼看到将近万名残肢断臂的中国官兵和差不多一半数量的阵亡者，他们为了夺取一段山路而牺牲，然而这条路，将会拯救全国悲惨的命运。

“战争这个机器，”史迪威将军继续说道，“是人类精心创造的最浪费和最不道德的一个设计物，人类生命和国家资源的浪费简直是毫无道理的。即使是正义的战争，结果是否正义也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说有道德原则的话，就会牵扯到几条，然而最大悲剧之一是战争对在作战中的每一个人的意志力量的破坏。”

---

〔31〕［日］山田正行：《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第27页。

就整个国家来说，史迪威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个人做出狂妄的战斗叫嚣是怎么回事呢？以及人们想成为光荣的英雄的那种返祖冲动是怎么回事呢？人们在一种野蛮的狂欢和一种不存在于人生其他阶段的权利感觉中，他们的下意识促使他们寻求从一生的约束中完全解脱是怎么回事呢？尽管战事浪费和不道德，但战事却经常是并且还将是人们一生中所能遭遇到的一种最伟大的经历。所谓和平的安静时期是那么平淡、枯燥、常规和重复。战斗中的冲锋陷阵是那么激动人心，振奋精神。如果说没有伤及皮肉的话就简直是一种乐趣了。当厌烦和功业成为一个国家的苦恼时，人们就将寻找一些理由，在一些地方、以某些办法来制造战争的借口。男人的本性就是好斗，他爱战争就好像爱一个为诱惑他而付出一切美丽的女人一样。正像他基本上憎恨和平时期沉闷单调的生活那样……和平时期像一块腥臭的湿尿布或煮白菜那样令人厌恶的味道。

现在我们在松山已经取得了胜利，即使敌人进行了顽强但却是枉费心机的防御战斗，我感觉对敌人的失败毫无怜悯之意。“该杀死他们，越多越好，最好的日本人是战死的日本人。”（引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小威廉·弗雷德里克·哈尔西语）……

然而，在我为战胜而狂欢时，难道我不也是犯了一种毫无心肝堕落腐化的罪行吗？也许我是有罪。但假如在这场斗智斗勇的“狗咬狗”的战斗中日本人战胜了，他们也会一个不留地屠杀我们的。当我想到那些吹毛求疵的道理原则时，我不能不想到在松山战死的日本军人的双亲和妻儿，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可爱的人是如何死去又是死在哪里。然而不管死与不死，他们都得到了他们可悲的结局。他们对上帝犯有罪行……人心与天意，已经把他们内心可能具有的赎罪的德行全都给摧毁了。

他们最恶劣的罪行就是同类相食。[32]

弗兰克·多恩将军又回到他念念不忘的日军吃人肉问题了。然

〔32〕据弗兰克·多恩将军回忆录《当国旗降下之后》，转引自戈叔亚凤凰网博客译文部分：http://blog.ifeng.com/article/1973713.html。

而，到底他们是因为要吃人而发动战争，还是因制造战争才陷入吃人境地的呢?

超链接 25：松山战役远征军主要将领的最后归宿

1943 年至 1944 年，著名历史学家、曾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郑洞国副官的黄仁宇，在缅北战场上为重庆《大公报》等报刊写下了一系列战地通讯，后来编成其平生第一本著作《缅北之战》。[33] 他在书中曾表达过一个写作上的“定见”和“癖好”：希望将关注视线聚焦于营以下部队的行动。相对于所谓“统帅部真实”，他更关心“战壕真实”。在这种写作理念里，流露出一种军旅之中难得的“民间”意识和“草根”情怀，使笔者一直心有戚戚焉。

作为以“微观战史”写作为定位的笔者，在翻检松山战役史料时，也总是对在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团长、营长以下官兵的事迹倾注了更多感情，也更希望能惊喜地看到他们在抗战胜利后幸存、在此后爆发的内战中有个善终。遗憾的是，历史的舞台上总是官位高的当主角，我所寻找的人物多半都成了没有名字或者仅留下名字的“跑龙套”者。而据品野实在其著述中披露，日军松山阵亡者有一个完整的名单，包括每一个士兵。[34]

据资料，松山战役胜利后，有 6 位参战官兵获得了国民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他们是第 8 军军长何绍周、荣 3 团团长赵发毕、第 309 团代理团长王光炜、第 246 团第 1 营营长谢梦熊（**战斗中牺牲**）、第 309 团第 3 营营长黄人伟、荣誉第 3 团第 3 营排长张其昌等 6 人。青天白日勋章，为中华民国高等级的荣誉勋章，授予陆海空军于战时抵御外侮立有卓著战功的军人，抗战期间仅颁发 166 枚。即便荣耀如此，前述 6 人的生平资料也难以寻觅，特别是以排长身份获此殊荣的张其昌，其战斗经历及战后情况竟然毫无记载（**台湾方**

---

[33]《缅北之战》1945 年 3 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新星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曾再版。

[34] 这份资料为 1962 年第 56 师团编辑委员会内部出版的《第五十六师团》一书。见［日］品野实：《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第 175 页。

面也无详细档案）。笔者曾请民国军史专家胡博多方寻觅，最后获得的不确定信息是：他在松山战役中身负重伤，返回贵州原籍，其后不知所终。

“战场失踪者”这一概念的潜台词，是统计学上的“糊涂账”。对军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这个概念更具杀伤力。“无名烈士”这个由此引申出的概念，对于一个具备统计能力的体制来说，也是一种反讽。正如电影《集结号》中那位主人公连长谷子地面对墓碑时的悲鸣：“生下来爹妈都给起了名字，怎么就无名了呢？”在这个问题上，狭隘的“唯物论”将遭到有良知的人们的谴责。“人死如灯灭”，“化作一缕青烟飘走了”，请不要对牺牲者说这样残酷的话。否则，何谓英名不朽？何谓精神常驻？

基于这样的心情，笔者将在松山这个舞台上出演了民族解放战争雄浑大剧的主要人物名单列举如下，并简要交代他们后来的结局。事实上，对他们中的很多人而言，松山这一页翻过，其后的人生经历未必精彩。如果说，松山九十多天的浴血奋战决定了他们人生价值的“峰值”，想必他们自己也是认可的。在战争中的他们未必有暇想到青史留名，现在，后辈人有责任以铭记的方式来表达对于这样一种历史价值的肯定。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系统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陆大特别班第1期**），滇西战役后再度失去兵权，被任命为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这一虚职，未到任。1948年1月又被蒋介石起用为东北行辕代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赴辽沈战场救急，然未能挽回东北败局，因指挥作战失利被撤职软禁南京。1949年初摆脱特务监视，秘密出走香港。新中国成立时，曾致电毛泽东表示祝贺。1955年回国，先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等职，被毛泽东称誉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1月在北京病逝。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参谋长萧毅肃（**云南讲武学校第14期、陆大特别班第2期**），1944年12月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

谋长，于抗战胜利后在芷江、南京主持与在华日军洽降、受降事宜。1946年起先后任重庆行营参谋长、重庆行辕参谋长兼重庆警备司令、国防部次长、参谋本部次长、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参谋长、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等职。1949年12月赴台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本部副参谋总长等职。1975年7月在台北病逝。

中国远征军炮兵指挥官邵百昌（**保定军官学校第6期、奥地利维也纳炮兵专科学校、德国航空学校**），后历任军政部驻昆明管理处主任兼越南区特派员、后勤总部第七区铁道军运指挥部指挥官、吴淞要塞司令部司令、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炮兵指挥官等职。1949年赴台湾，任“国防部”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等职。1980年4月在台北病逝。

炮10团团长胡克先（**黄埔第6期、陆大将官班乙级第3期**），后历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吴淞要塞司令部司令、厦门要塞司令部司令。1949年赴台湾，历任高雄要塞司令部副司令、台南师管区司令等职。1963年8月在台北病逝。

第11集团军系统

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黄埔第1期、陆大将官班甲级第1期**），后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2月在四川峨边被解放军俘虏，在北京过了10年战犯生活后，被特赦。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1993年在美国去世。

第71军军长钟彬（**黄埔第1期、陆大正则班第9期**），后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4兵团司令。1949年9月在四川涪陵被解放军俘虏，12月底在北京景山关押学习改造，因心理压力过大，在外出劳动时跳崖自杀（**一说是，1950年2月下旬，钟彬因患急性疟疾，在支撑了一个星期后去世**）。

新28师师长刘又军，又名刘铸军（**黄埔第1期、陆大将官班乙级第2期**），后历暂编第5军副军长、国防部少将部员（**派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服务**）。1949年赴香港，未久转赴台湾。1962年逝世。

新28师副师长王治熙（**黄埔第6期**），后任第6编练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12月在云南昆明参加起义。

第82团团长黄文徽（**黄埔第6期**），后任新8军第88师师长。1948年10月在辽沈战役中于锦州被解放军俘虏。

第83团团长董惠（**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7期**），后任第118军第54师师长。1949年12月在四川郫县参加起义。

第84团团长鲁岂愚，又名鲁启钰、鲁震南（**黄埔第6期**），1948年任新疆警备司令部第128师副师长。9月携全家返回故乡遵义休养一年。1949年9月离开遵义前往四川投奔宋希濂。在西昌曾与家人联络，后失踪。

第6军新39师第117团团长江望山，后任第53军第116师第347团团长。1947年10月在东北战场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被俘。

第8军系统

第8军军长何绍周（**黄埔第1期、陆大正则班第10期**），后任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9兵团司令。1949年12月贵州解放前夕脱离部队去往香港、巴西经商。20世纪70年代随妻女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籍。1980年9月在美国病逝。

第8军副军长李弥（**黄埔第4期**），1948年任第13兵团司令。于淮海战场奉命掩护黄百韬第7兵团突围未果，不久第13兵团亦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而全军覆没。李弥示意所部第9军第3师师长周藩（**即参加龙陵会战的荣2团团长**）走出掩蔽部投降，自己化装成负伤士兵乘乱逃脱。蒋介石重建第13兵团，仍任命李弥为司令并兼第8军军长。后改任第6编练司令部司令，开入云南。卢汉率部起义后，李弥等被扣。为解除国民党军对昆明的围困，卢汉将李弥放回。但李弥离昆后，即与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汤尧商议，将部队撤到滇南的开远、蒙自一带，企图卷土重来。1950年1月，李弥奉召去台湾。9月，蒋介石派李弥到缅甸北部，纠集外逃残部和部分土匪，组成“反共抗俄救国军滇南边区第一纵队”。12月，李弥被委任为“云南省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1951年5月至7月，在美国的支持下，李弥率逃缅国民党军两次窜扰云南边境，均遭人民解放军痛击。1953年1月，在缅国民党军残部改称“云南反共救国军游击总部”，还与缅甸的反政

府军相勾结。缅甸政府忍无可忍，对李弥残部进行军事围剿；同时向联合国提出控诉。台湾国民党政府以玩弄花招相对付，将李弥残部改为“东南亚自由人民反共联军”。同年底至1954年，李弥率残部陆续撤往台湾。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73年12月在台湾去世。

第103师师长熊绶春（**黄埔第3期**），后任第14军军长。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包围于双堆集，在其黄埔学长、解放军中野四纵司令员陈赓争取下欲行起义，因第12兵团副司令胡琏严密监视而迟疑不决，于1948年12月11日在与解放军作战中殒命于安徽宿县。

第103师副师长郭惠苍（**陆大特别班第2期**），后任第92军第21师师长，1947年11月12日在辽宁义县与东北民主联军作战时兵败被俘。

第245团团长曾元三（**中央军校洛阳军官训练班**），后任第39军第103师师长；第307团副团长陈一匡（**黄埔第10期**），后任第39军第103师副师长。以上2人于1949年10月率部在广东三水举行起义。

第307团团长程鹏（**贵州陆军崇武学校第5期**），后任第39军军长。于1949年10月下旬率残部经海南岛撤往台湾。1985年在台湾去世。

第82师师长王伯勋（**陆大特训班第6期**），后任第19兵团副司令官；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后任第19兵团参谋长；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中央军校高教班第4期**），后任第49军军长；第309团团长陈永思（**中央军校高教班第3期**），后任第249师师长；第309团代理团长王光炜（**黄埔第7期**），后任第328师副师长；第308团团长文安庆，后任第327师副师长。以上6人均于1949年12月在贵州普安举行起义。

第246团团长田仲达（**黄埔第6期**），后任第9军副军长兼第3师师长。1950年1月在云南曲溪起义。

荣誉第3团团长赵发毕，又名赵发笔（**中央军校高教班第9期**）。1946年11月任第8军103师309团团长，进攻胶东解放区时在掖县粉子山战斗中受重伤。1948年由云南警备总司令部上校参

谋调任云南省罗平县县长。1949年任第19兵团司令部上校高级参谋，12月在贵州普安随第19兵团起义，调入重庆西南军政大学学习。1955年2月，罗平县公安局以反动官吏案由批准判处无期徒刑。1956年于狱中病逝。[35]

2014年5月11日定稿

---

〔35〕该资料部分内容经民国军史专家胡博补充校订。

松山战役大事记

（1944 年 4 月 14 日—11 月 3 日）

4 月 14 日：

蒋介石指示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签署“怒江攻势命令”，电令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做好反攻出击准备。

4 月 17 日：

美国和中国签订《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

5 月 5 日：

卫立煌传达何应钦签署的怒江攻势命令，预令远征军于 5 月 11 日向怒江以西攻击。

日军第 56 师团部署反击作战方案。

5 月 11 日：

第 20 集团军首批部队渡江发起右翼攻势。

5 月 12 日：

日军第 113 联队长松井秀治奉命率所属第 1 大队，在红木树方向反击渡江的我新 39 师第 115 团。

5 月 19 日：

军令部长徐永昌致参谋总长何应钦转蒋介石签呈电报，建议发起左翼攻势。蒋介石批复同意。

5月21日：

卫立煌根据部队缴获敌情报，确认我军攻势计划泄密，决定令左翼集团军出动，发起全线反攻。

5月28日：

第71军首批部队开始渡江准备。

6月1日：

怒江东岸我军重炮开始向松山试射。新28师前锋第82团渡江，向松山外围竹子坡攻击前进。

6月3日：

松井秀治令副官真锅邦人带三百余名伤兵从红木树返回松山，协助守备队长金光惠次郎指挥。

6月4日（D日）：

第82团向竹子坡及腊勐街攻击。

6月5日：

第82团攻击阴登山。

6月7日：

第82团继续攻击阴登山；第83团攻击大垭口、滚龙坡。

6月8日：

第71军主力围攻龙陵。

6月11日：

日军第56师团命令松井秀治率联队主力从腾冲出发增援龙陵。

新39师第117团于奉命归新28师指挥，参加围攻松山。

6月14日：

第117团到达战场，向日军松山北部阵地攻击。

6月15日：

美军第20轰炸机集团68架B-29轰炸机从成都起飞空袭日本北九州。

松井秀治率部突破龙川江邦乃渡我军防线，向第87师两翼合击。

6月17日：

第87师、第88师相继放弃既得阵地，第一次围攻龙陵失利。

第8军荣1师第2团第三营、第3团奉预令，准备参加松山攻击。

6月20日：

第82团（附第83团第二营）占领阴登山。

日军第56师团战斗指挥所从芒市推进至龙陵。

6月21日：

第71军军长钟彬奉命率第84团一部从龙陵转往松山指挥。

6月24日：

第8军辎重兵团团长李葸萱奉命过江与第71军接洽。

6月25日：

美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向远征军提出编组“特种攻击队”对松山攻击。

第8军副军长李弥率荣1师主力投入增援龙陵作战。

6月26日：

日军第56师团下达“蚌渺会战”攻势命令。

6 月 27 日：

钟彬指挥第 117 团对松山最后一次攻击失利。

6 月 28 日：

日军航空兵首次对松山日军空投补给。

日军攻占龙陵外围 5255 高地，第 87 师师长张绍勋阵前自杀未遂。

当晚荣 3 团（欠第三营）渡江。

6 月 30 日：

卫立煌决心由第 8 军担任松山攻击任务，令第 8 军军长何绍周接替钟彬，完成指挥权交接。

7 月 1 日：

怒江简易桥修复通车。何绍周抵达松山。

7 月 2 日：

日军“蚌渺会战”失利，松井秀治率部后撤至龙陵。

第 82 师第 246 团奉命渡江。荣 2 团第三营自镇安街转进松山。

7 月 5 日：

第 8 军对松山日军发起首次攻击，以荣 3 团的第一、二营攻击子高地。

7 月 7 日：

第 8 军发起第二次攻击，由荣 3 团并指挥荣 2 团第三营围攻子高地；第 246 团攻击大垭口、滚龙坡。

7 月 8 日：

第 307 团抵达腊勐街。

7月11日：

我军从阴登山向巳高地发起一次小规模攻击。

7月12日：

第307团以两个营对滚龙坡发起进攻。因气候影响，攻击顿挫。

7月13日：

第307团第二、第三营向滚龙坡发起攻击，占据滚龙坡西南高地。

荣3团主力及第246团对子高地、大垭口攻击失利；荣2团第三营占领敌壕，推进约50米。

7月14日：

我军找到日军水源地所在，破坏了其第一蓄水槽，使日军陷于断水境地。

7月15日：

为探明日军松山暗堡分布，荣3团、荣2团第三营对子高地发起了一次小规模攻击，因敌反扑失利。

7月18日：

松山日军获悉东条内阁总辞职，关东军开始抽调兵力移防冲绳。

7月21日：

日军滚龙坡阵地守备队长井上要次郎中尉遭我炮击毙命。

第56师团监听到蒋介石给中国远征军的激励电文（“逆感状”第一弹）。

7月23日：

第8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击。第307团以第一营、第三营夺占滚龙坡丙、丁高地；第246团主力攻占庚高地；荣2团第三营突击巳高地失利。

7月25日：

第246团一部拦截自大垭口向已高地增援之敌，与安河内正幸少尉指挥的军旗护卫小队约30人遭遇。经过激战毙敌12名，缴获山炮1门。安河内正幸率十余名残敌突入滚龙坡。

日军滚龙坡阵地继任守备队长松尾良种中尉遭我炮击毙命。

第307团切实占据滚龙坡丙、丁高地。

第308团第二营抵达战场，当晚自第307团左翼投入战斗。

7月26日：

我防空火力击落为松山日军空投补给的九八式战斗机一架。

7月27日：

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中将向松山日军发来嘉奖令。

7月28日：

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中将向松山日军发来“感状”。

松井秀治从龙陵致电真锅邦人，提醒真锅准备处理军旗、焚烧文件。

7月29日：

李弥奉命从龙陵转至松山协助军长何绍周指挥。

7月30日：

日本南方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签发给拉孟守备队记功的嘉奖状。

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给松山日军发来鼓励电。

第56师团长松山祐三电令让拉孟守备队死守到9月上旬。金光惠次郎回电表示要克服困难，坚守阵地，完成师团赋予的任务。

当晚，第308团第二营利用对壕作业，攻占滚龙坡戊高地。

8月1日：

我军利用山炮对滚龙坡日军堡垒实施抵近射击。

第307团攻占乙高地堡垒。该团一部进抵壬高地两侧，破坏了日军第二蓄水槽。

当晚，第246团以对壕作业迫近己高地60多米。

8月2日：

第307团、第308团第一营攻克滚龙坡甲高地堡垒。

金光惠次郎发出战况报告，松井秀治回电表示“身不由己”，令部下等待“神仙保护”。

8月3日：

第307团、第308团肃清滚龙坡残敌。第246团攻占己高地。

真锅邦人致电松井秀治：“军旗已从旗杆脱下，缠于腹上，旗杆已奉烧，御纹旗冠已深深地埋入地下。”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转达蒋介石命令，严令第8军于9月上旬克复松山——“如果违限不克，军、师、团长应以贻误戎机领罪！”

第8军召开会议研究战术，决定对子高地实施“坑道爆破”。

8月7日：

为掩护子高地坑道作业，第8军对巳、午、未高地发动第六次总攻击。荣2团第三营、第246团第一营、第246团第三营遭到严重损失，攻击受挫。第308团因清扫壬、辛高地残敌受阻，未能及时增援。

第8军呈请长官部调第309团和荣3团第三营，增强攻击力量。

8月8日：

金光惠次郎命令由28名日军组成“挺身爆破班”，夜袭破坏我军炮兵阵地。

8月12日：

我军防空火力再次击落敌机一架。

8月13日：

第307团前锋夜袭大寨，下士班长张学成带3名战士缴获日军第113联队关防。

8月17日：

荣3团第三营开至战场。

8月18日：

惠通桥吊桥修复。日军派出21架飞机空袭破坏，经我防空火力反击下未果。

美军第14航空队一架C-47运输机飞临松山向我军空投补给，不幸被敌人炮火击中坠毁于龙陵，7名机组人员遇难。

8月19日：

子高地坑道作业完成，3000公斤美制TNT炸药填入坑道。

8月20日：

对子高地实施大爆破。

荣3团攻占子高地，当晚击退日军第一次偷袭反扑。

8月22日：

至凌晨，荣3团击退日军第二次偷袭反扑。

白天完成既占阵地堡垒构筑，当晚击退日军反扑多次，切实控制子高地。

8月23日：

日军收缩防线。金光惠次郎致电第56师团，决定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让炮兵队木下昌巳中尉逃出报告战况。

8月24日：

第309团到达战场。

8月26日：

蒋介石再次给卫立煌发来言辞颇具刺激性的勉励电报（“逆感状”第二弹）。

8月27日：

卫立煌派督察组来到松山解决第8军攻击困难。第8军指挥官提请督察组将本军目下态势、兵力概要及不能做“孤注一掷”攻击的理由转报卫长官，并表示本军官兵绝不有违长官之命。

8月28日：

第8军发起第八次总攻击。

第309团占领丑高地，击退日军两次逆袭。第307团攻击大寨受阻。

8月29日：

第309团占领寅高地及5号高地，打退日军反扑四次；第245团占领巳高地；第308团占领午、未高地之间的无名高地南半部。

午夜，第309团打退日军对寅高地反扑7次，“牺牲之壮烈，堪与荣3团之子高地争夺战相媲美！”

金光惠次郎遭我炮击，被活埋于寅高地掩蔽部。

8月30日：

松山日军向第56师团首次发出求援电报。

第33军参谋辻政信在芒市制定“断作战”计划，起草下达“第33军攻势命令”，欲图营救拉孟守备队。

8月31日：

第309团占领4号高地；第308团占领午、未高地间无名高地。

9月1日：

第245团占领午高地；荣2团三营超越攻击占领辰高地。

9月2日：

第309团占领3号高地最东端一座大堡垒。

第308团、第307团相互协同，激战至当晚完全占领大寨。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向第8军传达卫立煌“申冬未”严令。

9月3日：

第309团午后占领3号高地一座堡垒。当夜，日军组织兵力猛烈反扑，阵地得而复失。远征军总部电令第8军枪毙第309团团长陈永思。

9月4日：

何绍周令王光炜代理第309团指挥，与陈永思一道率“敢死队”攻占3号高地堡垒。当夜，再次遭到日军偷袭，阵地丢失，部队被冲散。荣3团团长赵发毕率20余名兵力驰援。

9月5日：

荣3团与第309团将3号高地反扑之敌击退。

第307团（附第246团加强连和第103师工兵连、搜索连）、第308团攻克黄家水井。

第8军调怒江东岸第244团第一营增援。

当夜，松山日军陆续向第56师团发出“最后处置”情况和“诀别”电报。

9月6日：

第244团第一营抵达战场，接替守备阵地。第245团与荣3团合力攻占3号高地。

日军命令重伤员自杀，并杀害部分朝鲜慰安妇。

9月7日：

凌晨，真锅邦人命令木下昌巳准备出逃。

我军合力聚歼1、2、3号高地及马鹿塘残余之敌。

真锅邦人焚烧军旗后独自发起“死亡冲锋”，被我击毙。

9月8日：

第8军打扫战场。

9月9日：

蒋介石发电称“获悉松山阵地于9月7日为第8军攻占，心中极为欣慰”；令第20集团军务必在9月18日之前攻克腾冲。

史迪威向远征军最高顾问多恩准将发电祝贺第8军攻克松山。

9月10日：

第8军军长何绍周致电军委会，提请叙奖松山战役有功将领第8军参谋长梁筱斋、第82师副师长王景渊、第103师师长熊绶春。

9月11日：

松井秀治在龙陵见到了从松山出逃的木下昌巳，收到真锅邦人带给自己的绝笔信，内云：“小鸟在喳喳地叫着，等待母鸟的归来……”

9月14日：

第20集团军攻克腾冲。

日军第33军司令官本多政材决定终止对龙陵攻势，令第2师团断后，并指挥龙陵守备队留守，以掩护松井部队救援平戛日军。

9月18日：

龙陵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因擅自后移防线遭斥责，愤而剖腹自杀。

9月27日：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致电军委会，以“指挥松山战役，战果辉煌”提请颁给第8军军长何绍周青天白日勋章。

10月29日：

远征军各部在炮兵、空军协同配合下向龙陵守敌发起第三次总攻。

11月3日：

我军收复龙陵，日军沿滇缅公路向芒市溃逃。

松山战役相关纪念设施考证

余　戈

松山上曾经树立过一些纪念碑，一部分为纪念修筑滇缅公路所立，一部分为松山战役而立。如今，它们多数已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仅能借助文献和几幅老照片打捞起一点破碎的印象。

1938年2月，滇西百姓开始修筑抗战“生命线”滇缅公路。当时是由各县分段包干施工，松山至怒江惠通桥这一段最为险峻的路段，摊派给了腾冲县。竣工之后的1939年5月，素有文化传统的腾冲人在松山立碑纪念。碑立了两方，一方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纪念碑”，一方是“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位置均在大垭口东南的一个小高地上。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这两方纪念碑遭破坏而不见踪影。所幸，它们曾被占领松山的日军拍成照片，得以留存下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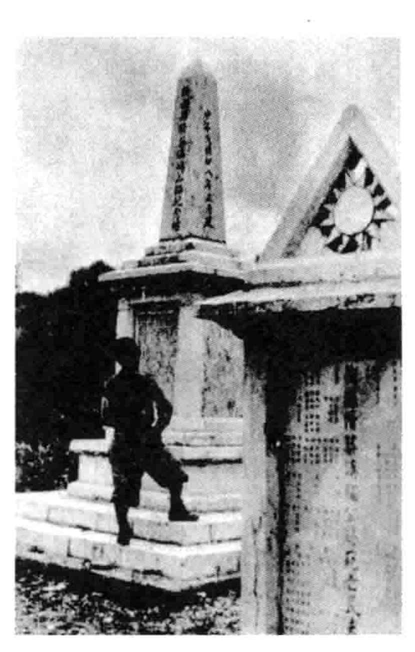


图1

1942年12月30日傍晚，日本朝日新闻社特派战地记者野村正男来到松山，采访这支“战功”赫赫、一直打到中国大后方最远地带的“拉孟守备队”。31日清晨，他在阵地上溜达时，对公路边的这两方碑产生了兴趣，于是让同伴拍了照片，把自己也摄入了镜头（如图1）。

更为难得的是，他居然还抄录下了“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的碑文，并且在后来所写的文章中全文引用，替我们保留了一件历史文物。这位野村正男，后来在东京审判中担任朝日新闻采访组组长，写了不少报道，还见到了中国派去的曾著有《印缅随军记》的记者张仁仲。

这件事的价值何在呢？可以说，正是因了野村的拍摄和抄录，我们今天才知道曾有此物，甚至可以想象借助这些许的资料恢复这两方碑。

日本人对这两方碑的记忆，自然比我们深。因为这两方碑，日军将碑所在的小高地命名为“纪念碑阵地”，当时修筑了战壕堡垒，由通信队常驻。而阵地东侧的坡下，就是日军慰安所。1944 年我军反攻时，将这块阵地命名为“辛高地”。这地方，曾埋了一辆 T-26 坦克做固定堡垒用。攻克此阵地的，是第 103 师的第 308 团。地形图（左）/ 卫星图（右）对比（如图 2、3）。

前几年，松山村民在翻地时挖出了“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顶部的一个残件，术语称之为“宝鼎”，造型是一个三角形的石框，中心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徽。最初人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用日本人拍的老照片一对，认得了。不过，也有人说可能是已经消失的第 8 军“国殇墓园”纪念碑残件，当时纪念碑宝鼎普遍采用这个造型（如图 4）。



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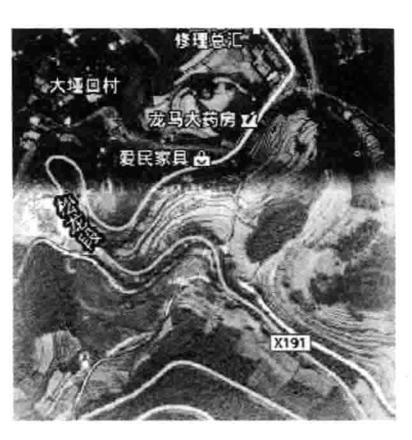


图3



图4

从照片看，“腾冲县修筑滇缅公路死亡民夫纪念碑”的正面，还刻有不少民夫的名字，但这个资料已经永远消失了。记述修路情况的碑文，应该在背面。战后，日军老兵太田毅（野炮第56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观测手、军曹）在其著作《拉孟——玉碎战场の证言》；品野实（第113联队第1大队步兵炮小队补充兵）在其著作《异域の鬼》中都分别引用，并且在后者的中译本《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中，被该书译者、云南省政府外事办公室的伍金贵先生翻译了过来。

书中这样写道：

“公路弯弯曲曲穿过本道阵地（即滚龙坡）中部，顺斜坡下去不远是个很宽的平台。在公路右侧有一座中国滇缅公路建设纪念碑。纪念碑记载了修筑公路的情况和牺牲人员的姓名，碑文如下……”（如图5）

遗憾的是，因为碑文是半文半白的雅言，又经过不知文化深浅的日本记者野村倒了一次手，译文质量不是很高。实际上，想再“信达雅”地译回当时的中文，恐怕是不可能的事了。

因笔者和历史学者戈叔亚先生曾受龙陵县政府委托做松山抗战历史资源普查，对于这个重要文物，当然要尽可能恢复得好一点。于是，我在微博上贴出了日文，征求精通日文的志愿者帮助翻译。最

终，确定了一份比较好的译文。内容如下：

“民国二十六年秋，侵华战争爆发，敌军侵入我国国境，各口岸及要道相继沦陷，滇缅公路之修筑已至不可一日轻忽之地。中央政府授意，云南省政府下令沿线各县修路，我县亦奉命于群山深泽之间蜿蜒开路。民国二十七年二月设立办事处动工，二十八年四月竣工。其间，披荆斩棘，掘土削石，县内各区乡负担资粮二百万元，动员民夫五万，其中因瘴疠病亡即二千余之数。今年以来又为公路修补强化动员万人。值此民族抗战危急之际，纵匹夫亦应有其责。居后方为国家奉汗马之劳，与前线将士流血牺牲同具大义，必尽全力而竟其责。为免牺牲民夫湮没无名，将另立招魂碑以记之。民国二十八年五月。”（@醉里祭旗看剑 译文）

民国二十六年（註・昭和十二年）秋、中国戦争が爆発し、敵軍は我国境を侵入し、海岸の各要道は次第に淪陥し、滇緬公路の修築は一日もゆるがせにできないようになった。雲南省政府は中央の意を体して沿道各県に命じたので、我県も群山深壑の間を蜿蜒道路を開さくすることになり、弁事処を設け民国二十七年二月起工し、二十八年四月竣工を告ぐ。その間、荊を抜き、草を刈り、土を掘り、石をきり、各区各郷民夫達五万名を使役し、地方負担資糧二百万元にのぼり、瘴癘に斃れしもの二千余名に至る。然もなお本年以降は万人を以て公路の補修強化に任じなければならぬ。この際全民族抗戦の建前により疋夫もまた分に応じて責任がある。全力を国家に貢献し、銃後において、汗を流すことは、将士が第一線で血を流すことと同じである。力つき果てるまでその責任をつくさねばならぬ。死亡せし民夫の姓名をあえて煙没せしむるに忍びず、別に招魂碑を築きてこれを記す。

民国二十八年五月。

图5

戈叔亚先生在松山普查时，曾了解到一些昔日腾冲民工在这里修路的情况。据普查工作队成员赵秀龙提供的信息：他的舅父李元生当年曾在此修路。李元生是腾冲和顺乡人，1938 年被差遣来到这里做民夫，同来的腾冲民夫有 5 万人。和顺是云南有名的侨乡，村民大部分都到缅甸、泰国做生意，做生意是好手，但是干体力活不及别人。无奈和顺人只好

贿赂路段负责人，分到了大垭口到小立色寨子一段没有石头、比较好修的路段，大约有一公里长。当时，和顺的民夫住在小立色寨子。

据赵秀龙回忆，他的舅父告诉他：那时民夫到处风餐露宿，逢集时无法都去腊勐街去赶集，就在施工点附近找了一块平地做临时性集市，此地名称叫“喂鸡水”。民夫把从家乡带来的一些干菜和松山老百姓交换。后来日军占领松山，也在这里建立了一个临时集市，就叫做“难民街”或者“日本街”。

除了大垭口村出土的这个“宝鼎”，当地还找到了刻有几个人名的巴掌大的石碑残片。依据这张照片，可以确认是碑文中所说“招魂碑”的正文。残片上隐约可以辨认出“陈逢春”“郭崇云”两个名字，应该就是筑路中死去的民夫。

除了上述两方“民事碑”，松山上还曾有过几方“战事碑”。

1944 年 9 月 7 日，松山战役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第 8 军等各参战部队共伤亡 7773 人，其中阵亡 4000 人。歼灭日军 1280 人，俘虏日军十余人。

战斗结束后，第 8 军留下部分官兵在松山处理善后事宜长达数月，其中一项主要的工作就是寻找和收敛阵亡官兵遗体，运到松山大垭口小山坡埋葬，修筑了中国陆军第 8 军松山战役阵亡将士公墓。位置就在前述两方筑路纪念碑偏下的坡地上。

据当地老人和老兵回忆，当年墓地四周和出口摆放整齐排列的装满泥土的汽油桶，每个油桶上放着一盆鲜花。有的老人说墓地与腾冲“国殇墓园”一样也叫做“国殇墓园”，前面立有纪念碑和阵亡将士姓名碑，遗体整齐排列埋葬，都有坟堆，插着写有阵亡者姓名、部职别的木牌。

由于松山地处偏僻，修建公墓时仍然处于战时，因此公墓非常简陋。1947 年 12 月，第 8 军又将阵亡将士遗骨用麻袋装运移葬，在怒江以东的保山市南郊易罗池公园重新修筑了一座公墓并立碑。2009 年秋，笔者陪同曾在松山战役亲历者、原第 8 军荣誉第 1 师工兵连排长鲍直才夫妇重返旧战场。站在一度被毁坏、后又重修的纪念碑前，老兵老泪纵横。（如图 6）

第8军移灵时，在松山留下一方“松山阵亡将士移葬记略碑”。碑文为：“民国三十三年秋，我第八军奉命收复滇西，血战百余日，伤亡官兵六千余人，始尽全功。当时弃葬之忠骸，已移殡保山南郊易罗池畔。云南省警备司令、前第八军军长何绍周题。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



图6

而第8军下辖的第103师为全建制参加松山战役，共阵亡军官59人，士兵1450人。该师没有迁移公墓，仍然留在原地。该师所立纪念碑，由师长熊绶春、参谋长谭国铎撰碑文：“查松山之敌，为倭寇第五十六师团松井联队及野炮第三大队。本师奉命于民国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开始攻击，赖我忠勇将士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卒于同年九月七日完全占领，歼灭顽敌三千余人，虏重炮八门，其他机械无算；我亦阵亡官佐五九员，士兵一四五〇名，但因当时我况紧迫，多数未及妥埋。战后收集忠骸，适埋于此者，仅官佐四六员，士兵六二六名。兹为纪念忠贞，将所有阵亡官兵姓名刊诸石碑，经垂永久。尚望国军袍泽共同维护，俾此碑能与松山共终古，而凭景式，则幸甚矣。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

后来，这些墓地和纪念碑都遭到了严重破坏。墓地消失变成了耕地，石碑有的被彻底砸碎，有的被抬到当地小学校做建筑基石。其中镌刻有1509名阵亡者姓名的两方石碑，经人践踏字迹全部消失；腊勐绅民为死难将士举办“水陆道场”所立的“捐款纪念碑”亦严重损毁。

20世纪80年代，龙陵县政府和松山村民找到了散落各处的3方石碑，将破碎的予以修补，重新树立在了大垭口公路边原青松堡阵地附近。2004年，龙陵县举行纪念滇西抗战胜利60周年活动时，又将其迁至松山子高地下的老干塘旁边。（如图7）



图7

此外，在云南省会昆明市圆通山也有一座第8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应该是第8军军长何绍周战后调任云南警备总司令后所立。因此碑在“文革”中遭破坏仅存基座，残留文字不多，又经风雨冲蚀，一度可辨认者寥寥。

2011年，笔者看到云南历史学者戴美政所写的文章中，较详细地将原文刊出。戴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即根据1947年9月昆明旧报纸刊载的文字考订了残存碑文，其中最重要的是军长何绍周亲撰第8军松山战役特写文章，及第8军所属3个师的阵亡名录（军官有名字；士兵无名字，但有统计数字）。特转载如下：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纪念碑记

自日本首侵中国，而世界战祸已开。我以新造之邦，独御方张之寇，乃不得不迂回羁绁，使不获逞其囊括四海之心。自珍珠港事变，而敌之阴谋大著，我乃得与同盟友邦并肩作战，崎岖撑拄，至于七年，乃有滇西反攻之役。自下松山要隘，进攻腾龙，而滇西之交通始复，我内外国军乃得会与八莫线。以南宁桂柳之克，使海外敌人绝退归之路，攻日盟军无侧袭之虞。而大战全胜之局以定，则滇西之役，

其关系为如何哉！溯第八军之配入远征序列也，自滇南各地徒步而西，辗转月余，始集于松山。喘息甫定，即受渡江接替友军围攻松山之命。于是蛇行揉进，浴血仰攻日夕，与敌搏斗於丛林陡壁之间。溽暑泥泞，猛攻九次，伤亡官兵六千余人，举军师所属之战兵杂兵，悉数加入战斗，有一连仅余二三人者，凡历六十六日，仅乃克之。其难如此，盖松山雄踞怒江彼岸，惠通桥西［北，拔海五千余公尺（当时公尺指英尺——笔者注），俯瞰滇缅公路，环山百里，咸在其重炮射程之内。敌之据缅之初，已移一二三联队（有误，应为113联队——笔者注）屯驻于斯，经营坚强工事者一年有余。峻坡斜谷，堡垒林立。壕坑掩体，密如蛛丝。电网铁条，层层绕护。火力四达，一呼百应。故我虽夺一阵地，辄陷四面围轰之中，进退不能自拔。至若食粮弹药之储藏，饮水医疗之设备，靡不坚秘周详弗虞匮乏，故虽战至最后一卒，仍复死守不降。益以夏季郁热，雨雾弥漫，地形危阻，飞鞔维艰，在在均足影响进攻，动多牵制。而天候恶劣，箐峦幽隐，至于敌情，未有明确之侦察。我军远道跋涉，新经装备，限于时日，未作完全之训练，尤为作战艰苦之主因。幸赖全体将士，激发智勇，百折不挠，每得一度围攻之经验，即有一度战术之改良。突击攒轰、锲而不舍，卒将彼凶视若金汤之要塞摧陷而廓清之，实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九月之七日也。绍周躬率余兵，沿山巡视，则断骼残尸，狼藉林墅，而敌］我肉搏扼吭绝脰相抱而毙者，至六十二具矣，可想见其惨烈已。松山既克，我军复偕友军，有收复腾龙之役，然滇西战局要以松山为始基，亦最为艰巨云。今者胜利告成，瞬已两载，而当时遗骸，仅能浅厝，爰偕旧日袍泽，往移烈士之骨，葬于保山西郊之龙泉池畔。复以昆明之圆通公园，划地树碑，勒叙大略，用兹纪念。嗟乎！今日国内外情势之不安，未知视战前何如。而此后一隅之关全局，则固无可疑者。昆明自军兴，为后方重镇，四方人士崒焉。而滇西则云南之右臂也。望云山之苍莽，抚战地之瘴疠，知必有低徊咏叹、深长以思而不徒嘘噜凭吊者矣噫！

前陆军第八军军长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率全军官兵同建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顾问白之瀚撰文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八月立

以上为戴美政先生据民国报纸抄录的完整碑文，其中中括号内为仅存的一块残碑上的文字，刊载其他文字的原碑已失踪。另据戴先生考证，此碑文与保山易罗池《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碑铭》“文风相近，个别字句亦相同”。保山易罗池纪念碑也已毁掉遗失（部分碑体石块被零散砌于易罗池池壁），但碑文仍保留在旧报纸上。特从抄录如下：

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公墓碑铭

呜呼！此陆军第八军滇西战役阵亡将士之公墓也。日本既侵中国，复袭取南太平洋诸岛，剽据缅甸、越南，欲遂逞其并吞东亚之心。以松山高屋建瓴，为我西门之锁钥也，特移其勇悍著战之一一三联队于此，控扼滇缅公路，阻塞东西运道，以摇荡我边疆。其为工事也，凡山之崇岗要隘、高地斜坡，莫不堡垒如林，萦回映带。而又卫之以深壕，联之以坑道，电网交织，层层围护，连鸡崎角，呼吸可通，纵克山隅，瞬被围轰。而其堡垒则依岩附箐，皆以精钢水泥、炼沙大木凝合而成，重炮所不能摧，贲育所不能近。甚至食粮饮水，子弹医药，亦无不储藏丰固，设备周详。如是惨淡经营一年有奇，彼固以为金城汤池，将久屯而坚守也。民国三十三年夏，我军奉檄隶入远征军，乃自滇南驻地卷甲而西，徒步二千余里，甫抵保山。即受接替友军围攻松山之命，时吾国抗战已七年矣。于是梯山喋血，争险攻坚，以奔波远道之卒，冒炎暑瘴疠之威，与敌扑抵于重峦绝壑者六十六日，死者三千八百九十八人，伤者称是，卒于九月七日摧陷而廓清之。绍周、弥遍历战地，拊循余兵，唯见断骼残肢，狼藉林谷，而敌我肉搏相抱颠顿力尽同毙者，至六十二具。自来战斗之惨，斯为罕觏。盖我军甫经装备，训练未充，尘土在衣，遽当大利。益以天候异常，地形特险，森林障蔽，则侦察不明，雨雾弥漫，则鞔运艰阻。故作战之初，擿植冥行，耗折甚钜。赖将士之忠勇，于艰苦中益增慧智，用能察知彼此。随军设施军谋战术，逐步改善，先后总攻至九次，始竟全功，其难有如此者。松山既克，我军复有腾龙之役，然论滇西战局，实以为滥觞，亦以松山为艰巨云。每念当时，因偕友军前进作战，仅能复土遗体，草草掩藏。今特躬率袍泽，往检忠骸，葬于

保山西郊易罗池畔，以安英灵，乃为之铭曰：

倭奴猾夏首兴戎，凶门一凿九州讧。我则迂回绊寇纵，勿俾虎凶出樊笼。崎岖七战始反攻，薄言远征零雨濛。滇西大战天改容，积尸血染西江红。十荡十决静边烽，湘桂继之驱鼍龙。盟军大会扶桑东，重光六合收全攻。易罗池畔卜幽宫，三千猛士藏其中。深宵万寂号阴飔，隐隐似闻呼冲锋。噫吁！陟高节天兮松山之松，□豕西缴兮铁壁关雄，魂魄式凭兮长卫提封，我瞻西方兮请歌大风。

前陆军第八军军长云南省警备总司令何绍周、陆军第八军军长李弥率全军官兵同建

云南省警备总司令部顾问白之瀚撰文

云南省昆明市政府顾问吴绍磷书丹

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吉月立

第八军阵亡将士名录

一百零三师

营副	肖云贵					
连长	张一杰	刘正中	汤宗开	刘万明	胡峰	舒梦良
副连长	卢钟衡	余景麟	龙海钧	向贵林	雷坤	董子璋
排长	陈兴国	侯奠环	谢国安	李占全	王国栋	田甦
	刘晏希	王锡芝	覃心忠	王应善	龚德明	姜焕章
	吴正邦	陈玉林	杨家林	何树臣	泰雪山	刘文成
	罗廷方	赵长发	刘华轩	龙海清	张云清	邓筱萍
	韦理光	陆胜培	严泽兴	赵锡明	何家连	黄英洛
	金树荣	唐均陶	文英雄	黄家玉	康德云	黎大伦
	刘云清	吴志卿	田少清	郭仕福	邓生祥	陈思忠
特务长	任绰本					
军医	卓松					
防毒军官	姚方贵					
准尉班长	粟志强					
士兵	一千五百四十四名					

（以上军官统计为 59 人，合计为 1603 人——笔者注）

荣誉第一师

连　　长　李武文　苟占银　陈　志　魏树堂　陈信孚　徐有堂
　　　　　刘　涛　杨波涛
副连长　李忠林　郭玉堂　锺　叡　杜玉卿　唐保山
排　　长　何深远　王富山　陈　俊　涂相贤　熊昌贵　覃继南
　　　　　贺　真　谭良臣　蒋荣峰　曾朝笃　罗　琳　王景廉
　　　　　王经文　何谋亮　艾　晴　许王身　胡天德　何明生
　　　　　徐　标　唐正凯　岳文忠　莫　开　万　年　刘德林
防毒军官　冉华山
副　官　殷德义
少尉迫炮班长　盛正旅
士　　兵　一千三百七十一名
（以上军官统计为40人，合计为1411人——笔者注）

八十二师

营　　长　杨登科　谢梦熊
副营长　杨维洲
连　　长　杨顺和　吕扬波　郭　维
副连长　张汉臣
排　　长　杨光武　黄维松　张傅金　陈照光　冯振中　蒙泽盛
　　　　　李镇山　余化龙　邱正文　黄云龙　张炳忠　张少全
　　　　　胡继善　张志超　桂立芳
特务长　贾成方
准尉排长　黄春廷
士　　兵　八百六十名
（以上军官统计为24人，合计为864人——笔者注）

据笔者考订，此碑文记载的统计数字为3898名，应是第8军在整个滇西战役中的阵亡数字，其中应含部分部队（荣1师第1团及第2团第1、2营）在龙陵的阵亡数字（870名）。

在松山战场上，71军新28师、第8军及配属炮兵部队阵亡将

士共4000名。其中属于第8军的，是3140人（103师1782人；荣誉第1师541人；82师779人；军部直属队38人）——这是《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附录中的统计数字。

谨列表对照如下：

阵亡统计	103师	荣1师	82师	军部	合计
整个滇西	1603	1411	864	38+	3916＋
松山战场	1782	541	779	38	3140

从中可以看出两个信息：

第一，《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中103师在松山的阵亡数字1782人，超过了此碑上的整个滇西战役中该师的阵亡人数1603人，这说明其中一个统计肯定有不精确之处。笔者判断1603人的数字更准确，因为这是战争结束3年后的1947年核实刻碑的数字；而1782人的数字统计于战役结束一个月，可能有将当时的战场失踪人员及在医院疗伤的人员均算作阵亡的情况。战场上的失踪人员，一般包括阵亡而找不到遗体及私自脱队当了逃兵两种情况。

第二，荣1师大部分阵亡（1411－541＝870）发生在龙陵。

另外，在此碑上留名的123名阵亡军官中，真正计入史册的只是82师246团第1营营长谢梦熊一人，因其战后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其他的，在本书均未写到；而总共3775名阵亡士兵，即便在当时也连名字都不能镌刻在纪念碑上。

军长何绍周所写的文章，记录了作战的情形，推测应该有3块碑，仅存留1块，因此文字仅三分之一。引起笔者注意的是这一句："每得一度围攻之经验，即有一度战术之改良。"可见，当时第8军的9次攻势，确实是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不断改进战术，乃有最后全歼日军拉孟守备队的战果。

经对比可知，在保山易罗池碑铭中有"绍周、弥遍历战地，拊循余兵，唯见断骼残肢，狼藉林谷……"的表述；而在昆明圆通山碑文中则为"绍周躬率余兵，沿山巡视，则断骼残尸，狼藉林墅……"前者是以军长、副军长联名所述，后者却仅以军长口气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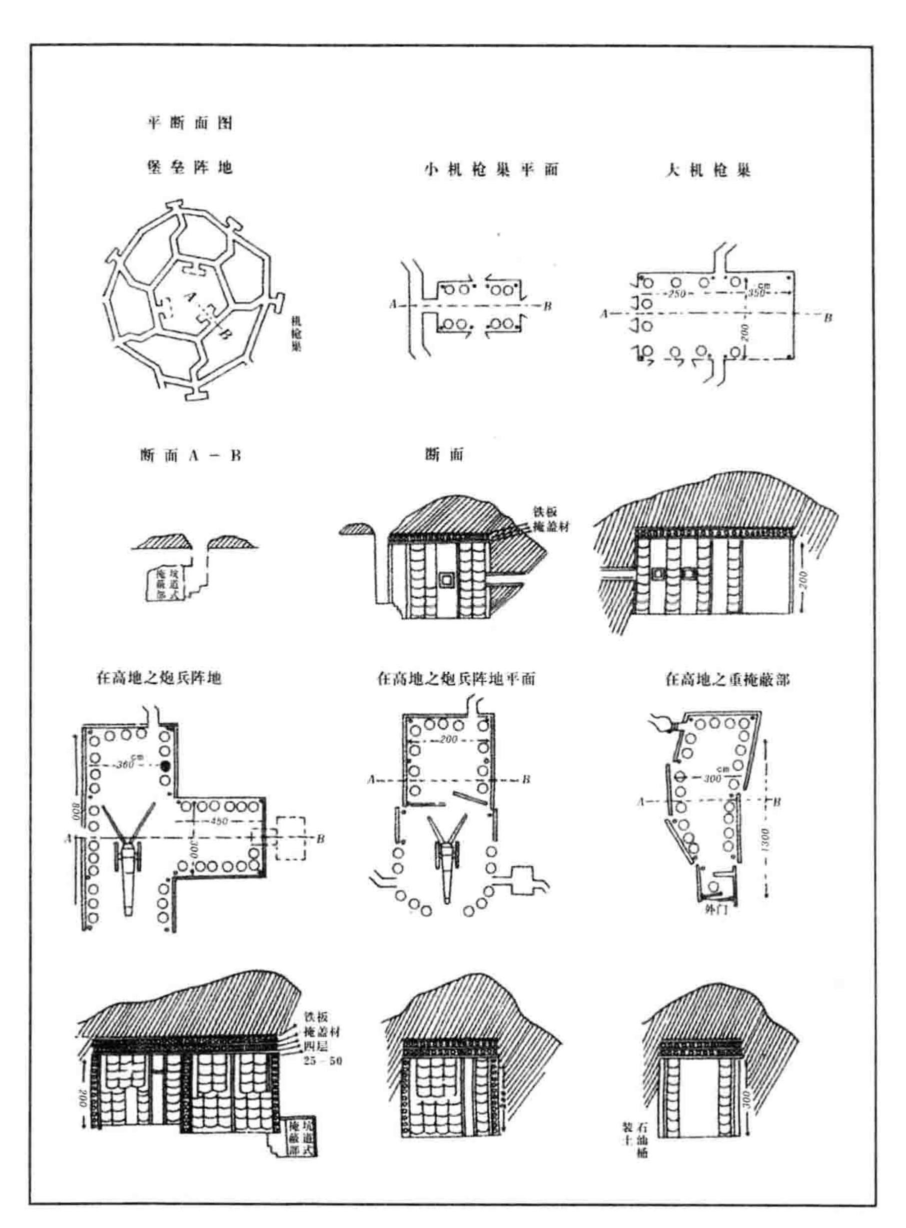
写，也许此时正是何、李二人因第 8 军指挥权交接闹矛盾之时，使得已履新“云南警备总司令”的何干脆撇开了李弥不提。在建墓立碑的事上，警备总司令何肯定比接任第 8 军军长的李更有决定权。

另外，从记述中，至少可知军长何绍周并未像某些作品所写的，在松山战役中将指挥权丢给副军长李弥而置身事外。实际上，后来连这位堂堂军长也差点被岁月淹没了。

附　图

附图1 敌工事构成图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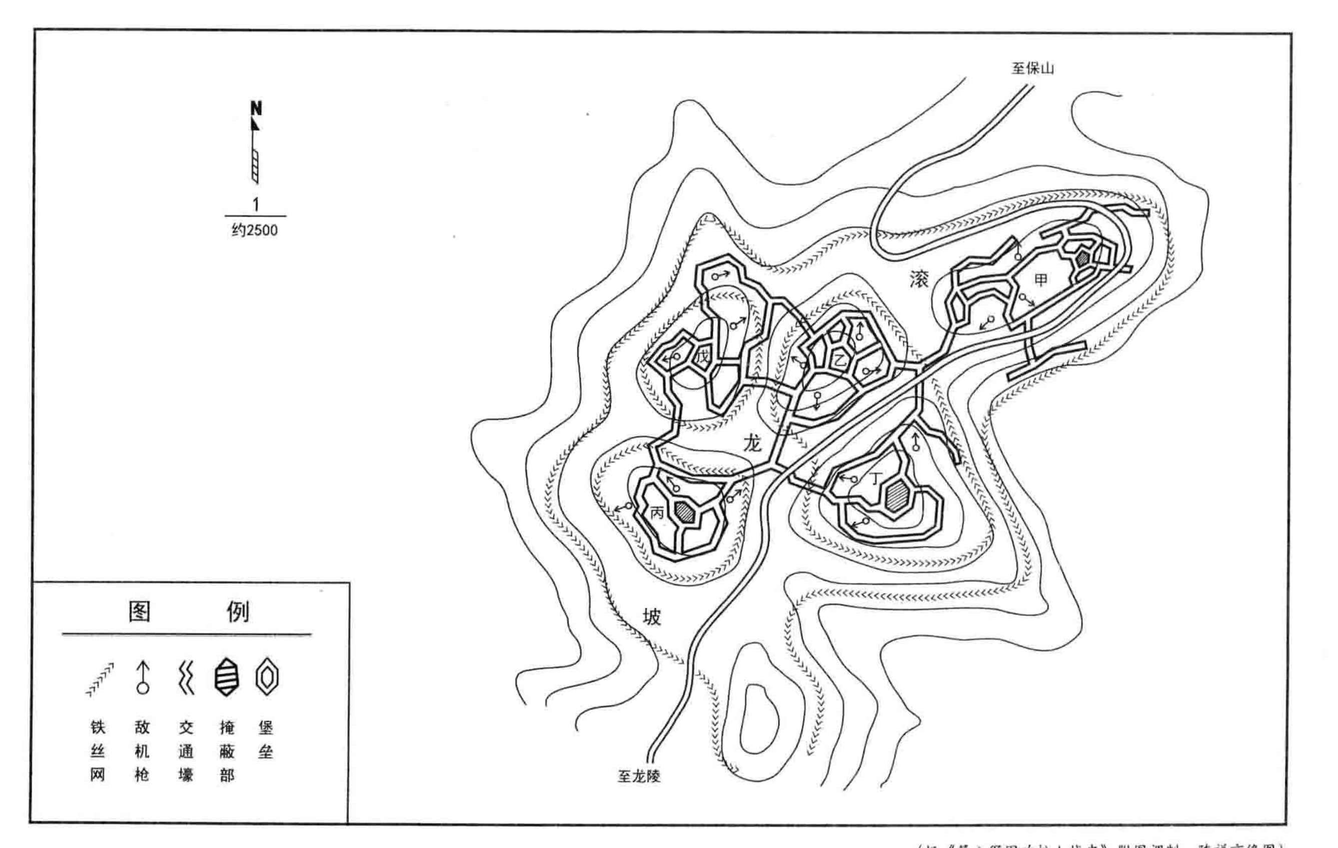
（1944年9月 日调制）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强晓东、陈祥京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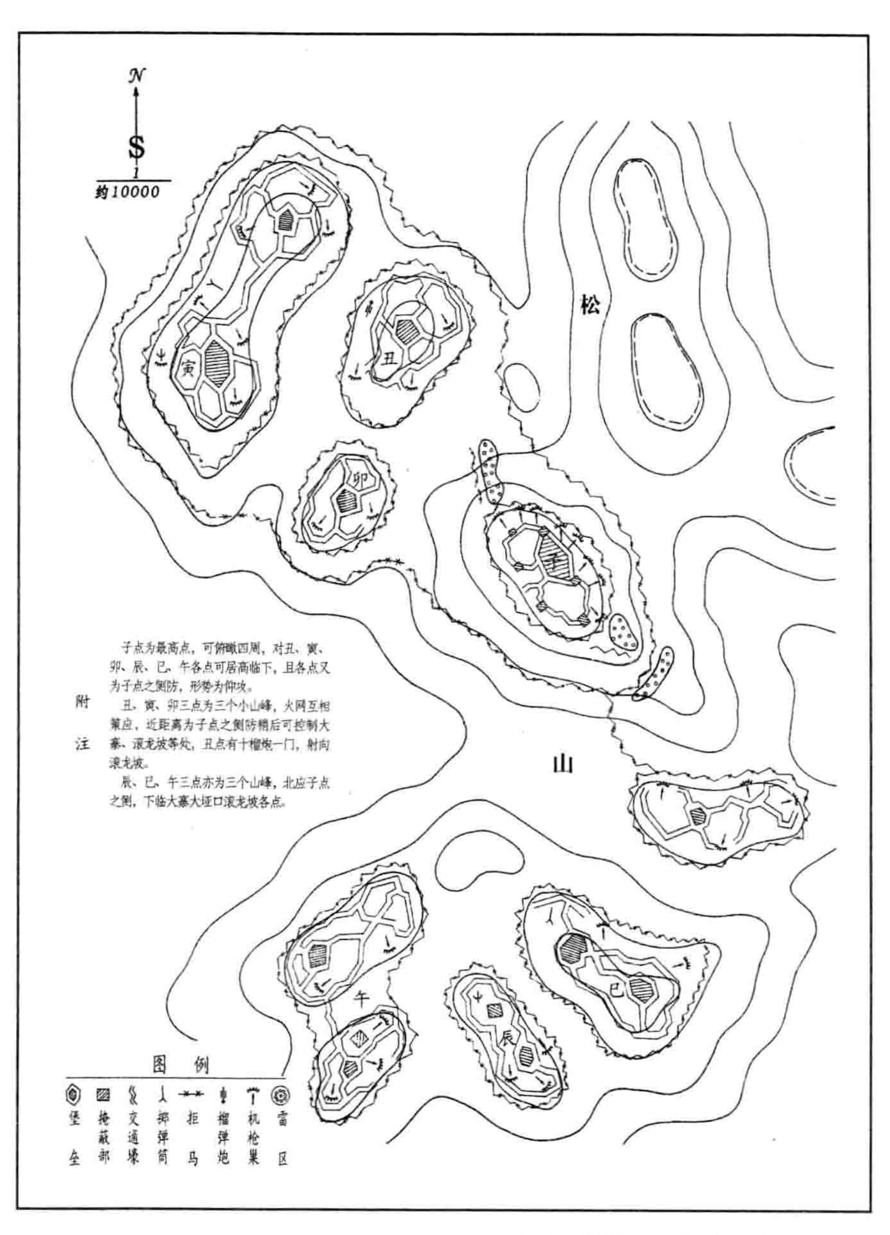
附图2　滚龙坡敌据点编成要图

（1944年9月　日调制）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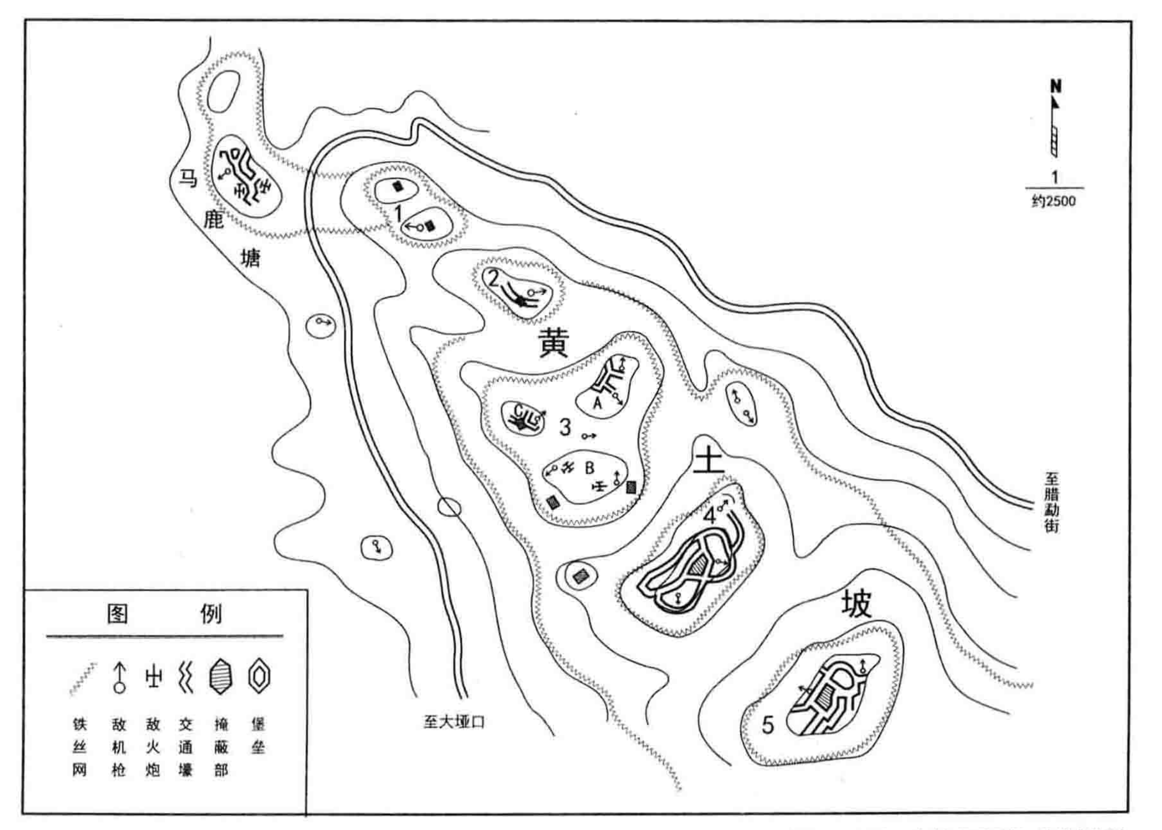
附图 3　松山敌据点群编成要图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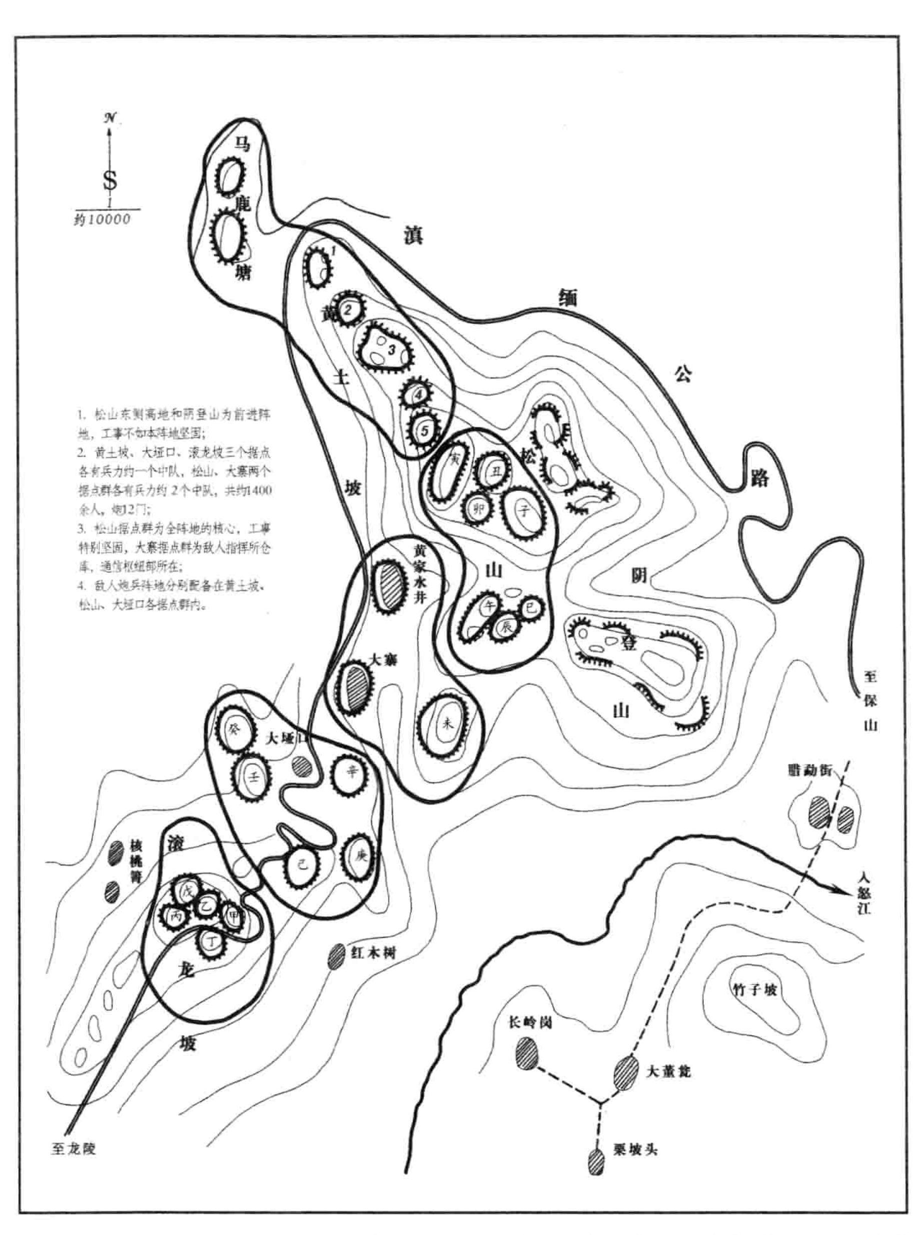
附图 4　黄土坡敌据点群编成要图

（1944 年 9 月　日调制）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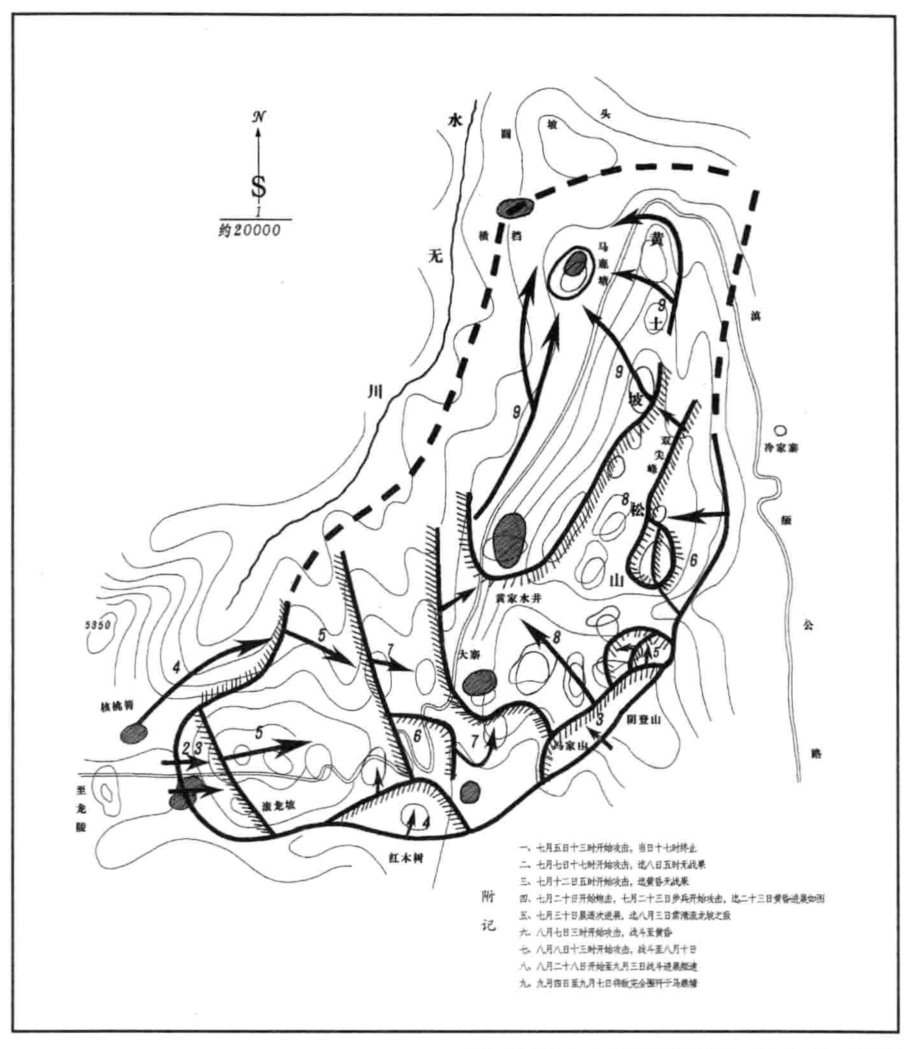
附图 5　松山敌阵地全般状态要图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强晓东、陈祥京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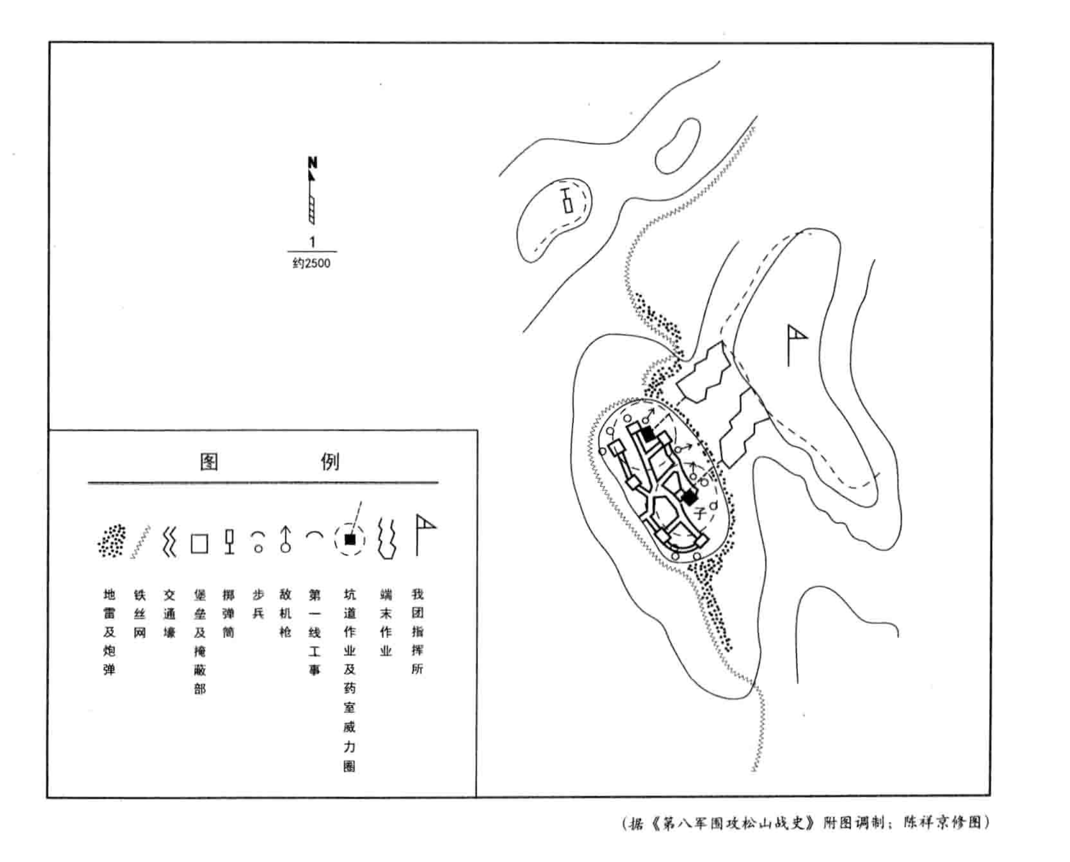
附图6　第八军围攻松山作战经过要图

（1944年7月5日至9月7日调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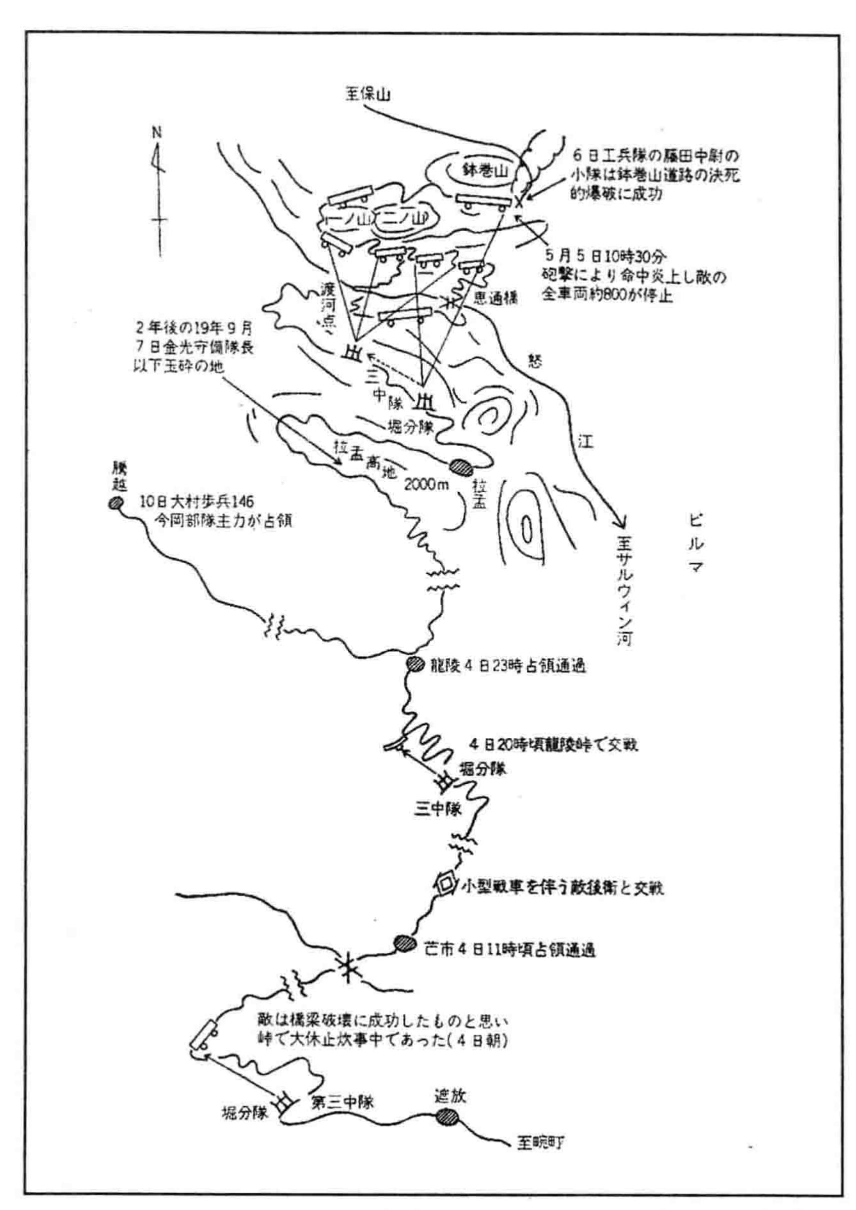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强晓东、陈祥京修图）

附图 7　松山战斗坑道作业敌我态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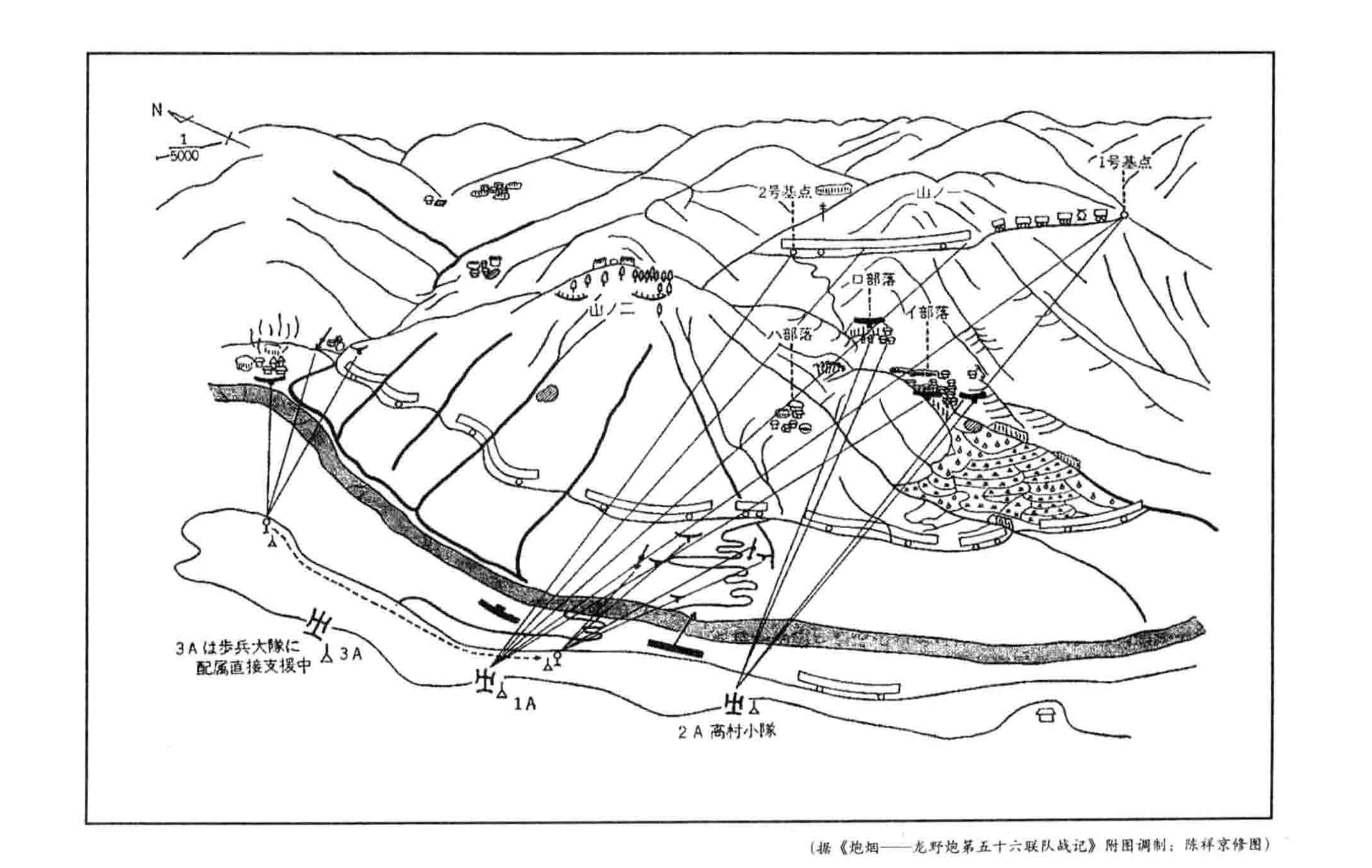
（据《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8　野炮第 3 中队自遮放占领芒市、龙陵、拉孟战斗概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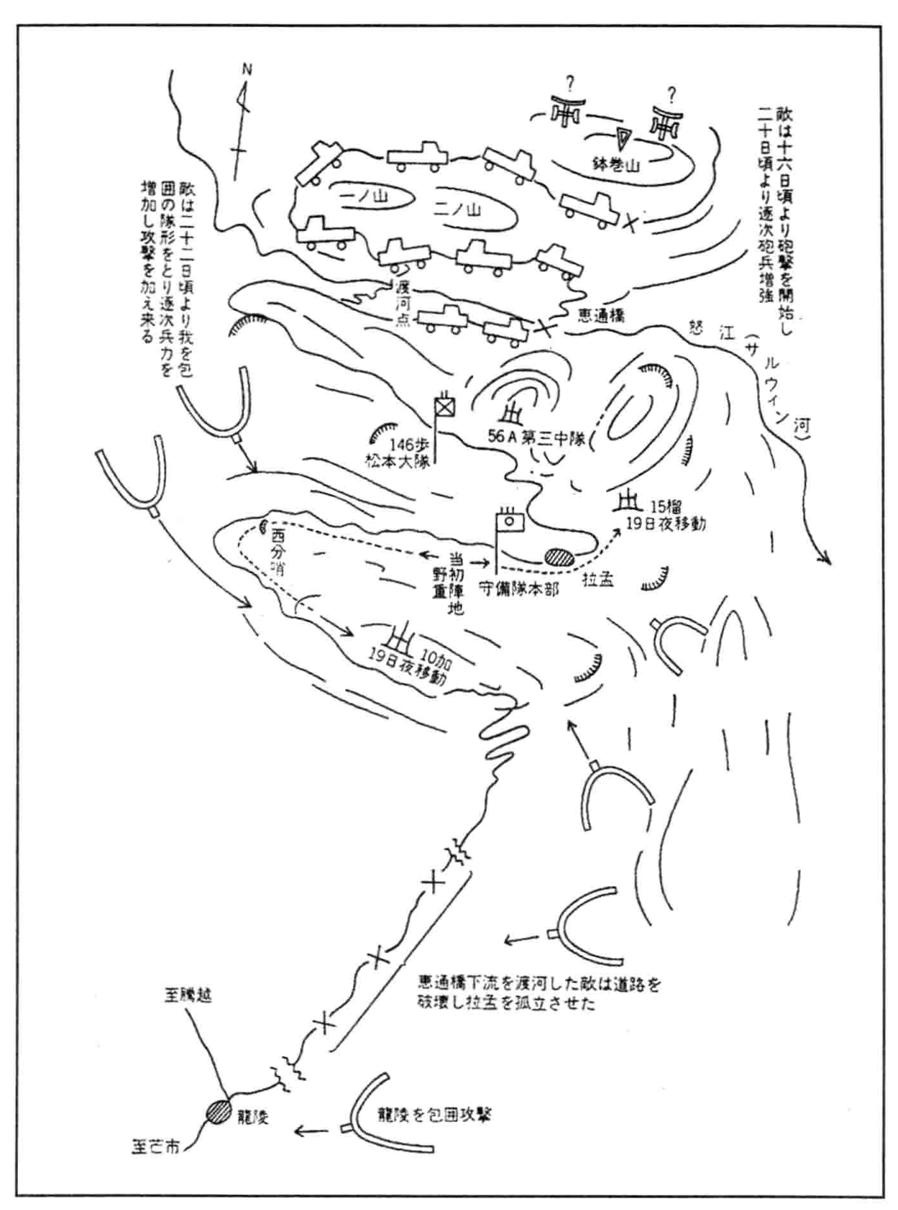
(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9　昭和十七年五月五日野炮第 1 大队拉孟战斗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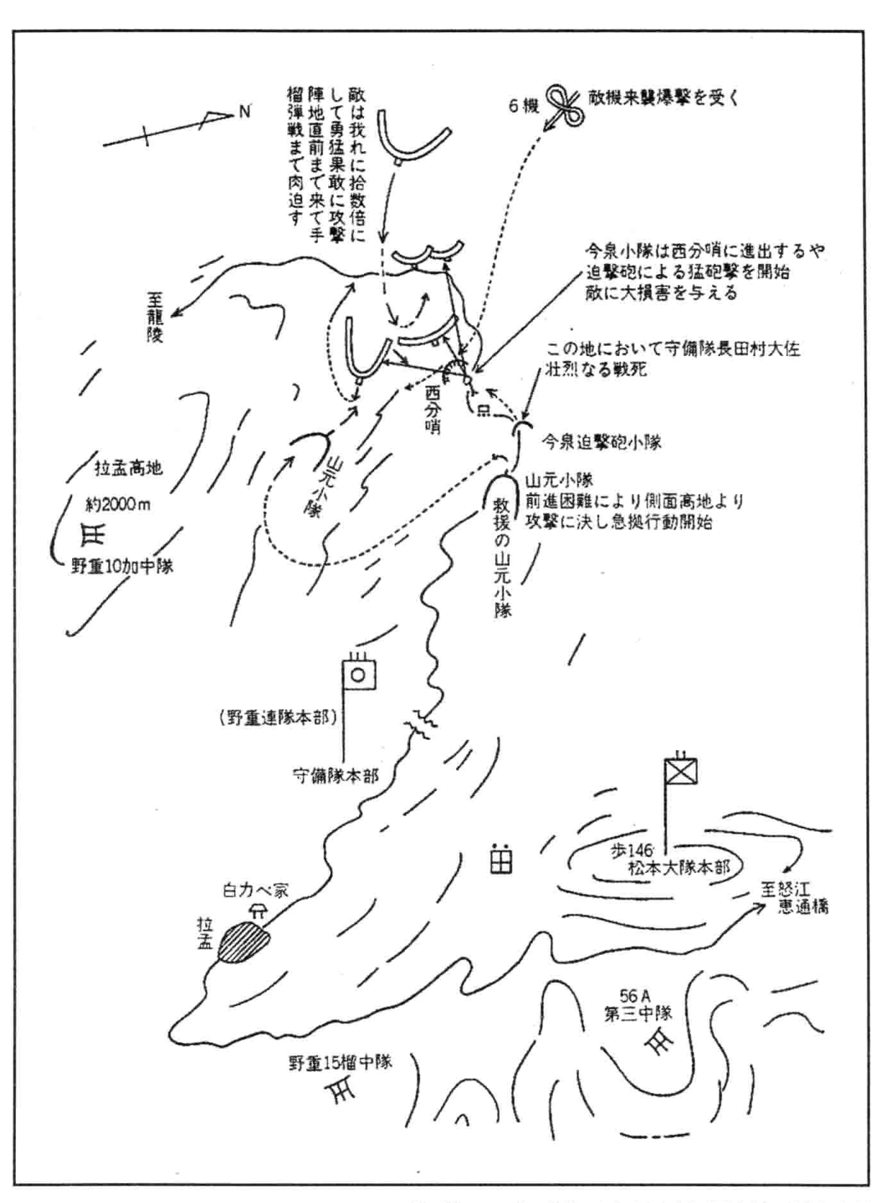
（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0　昭和十七年五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敌初期反攻时拉孟守备状态图



（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1　昭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拉孟西分哨救援战斗概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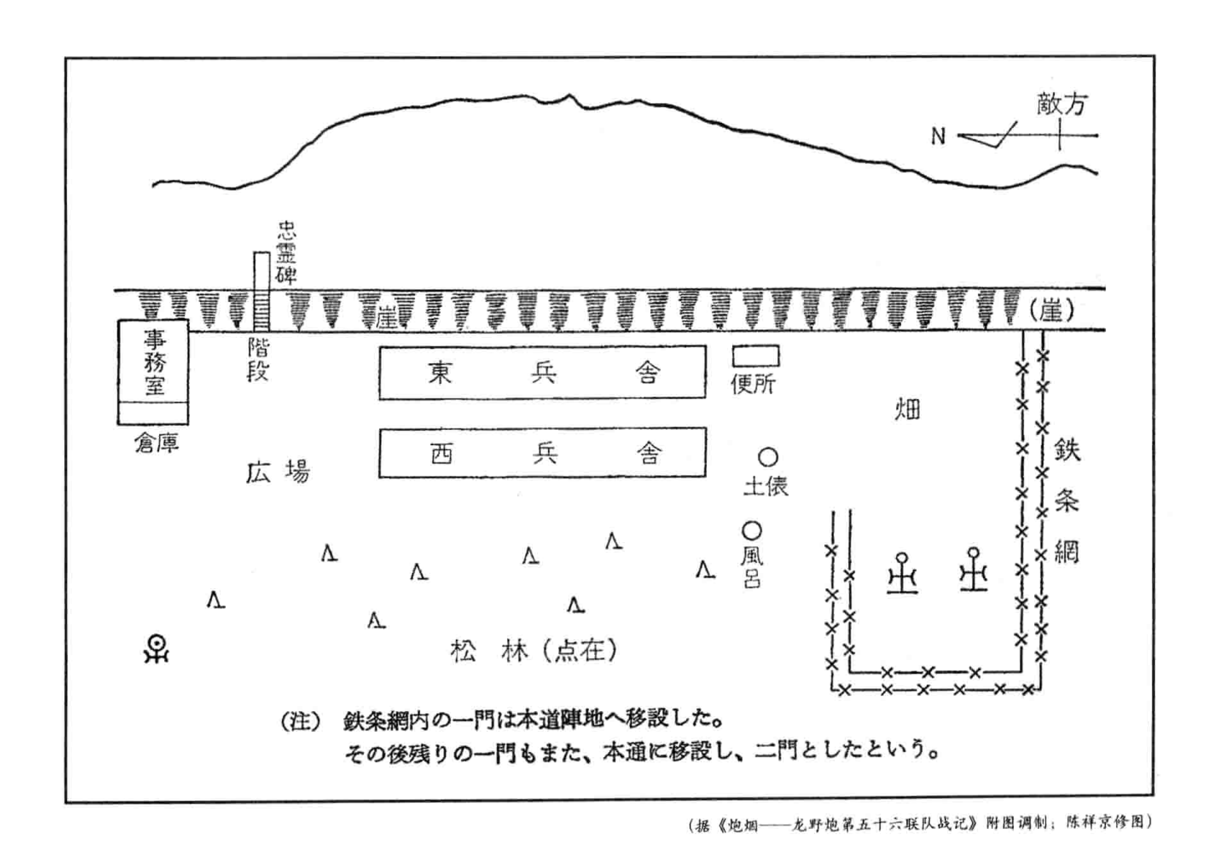


（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2　拉孟阵地概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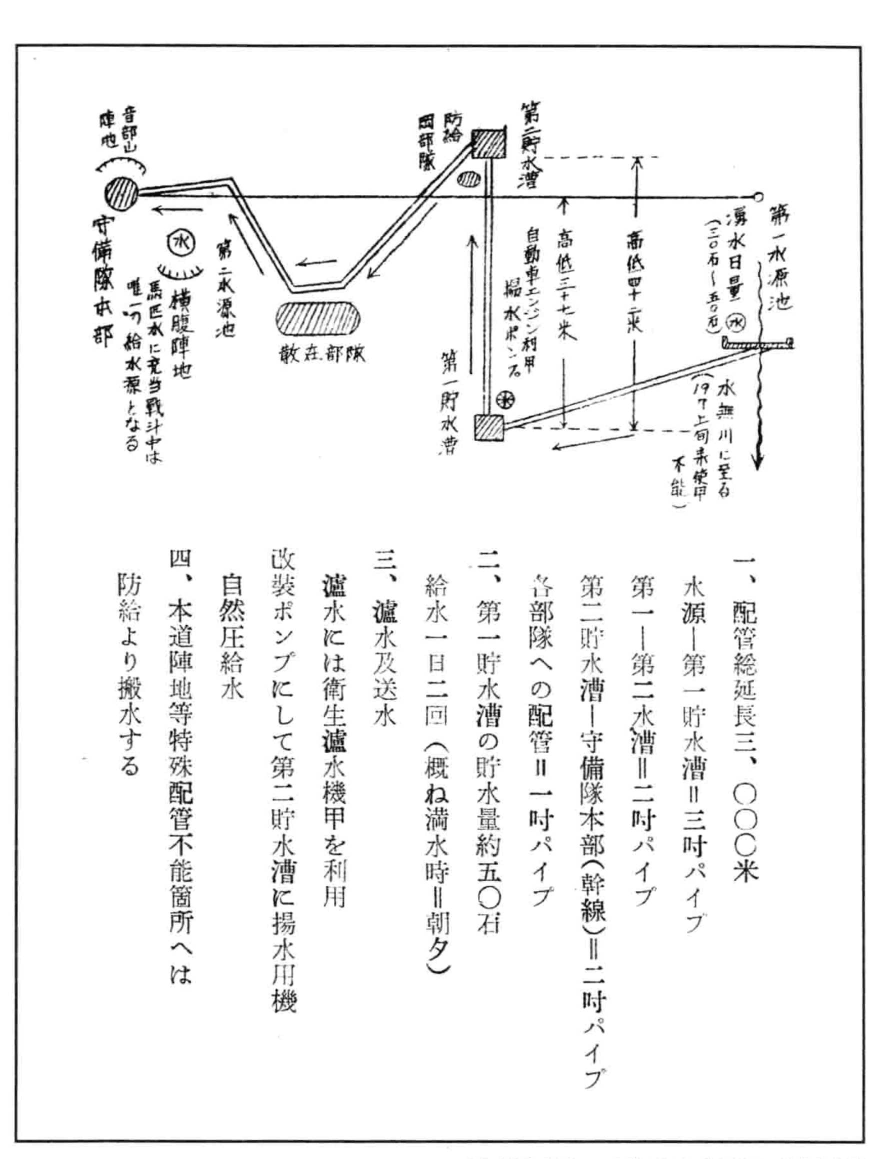
（据《拉孟·腾越——玉砕の実相》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3　野炮第 8 中队炮台山概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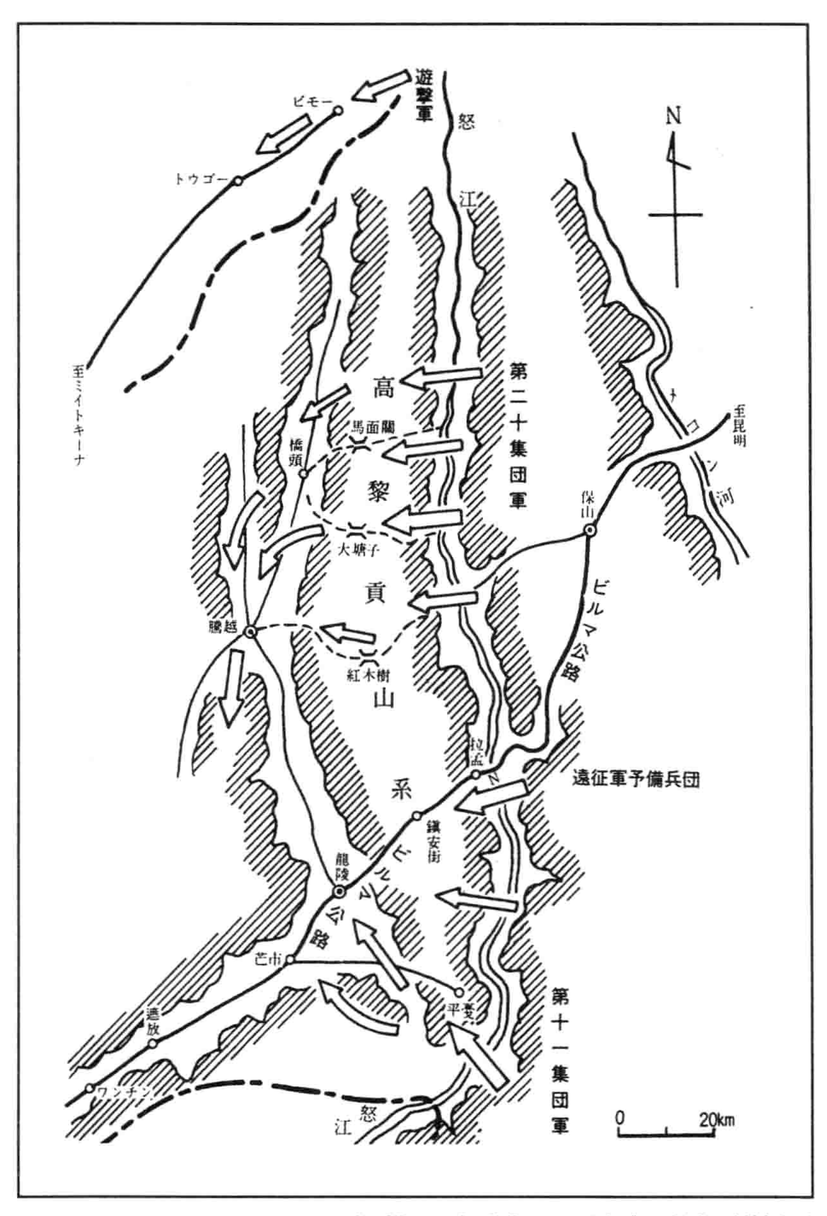
（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4　拉孟水道设施断面略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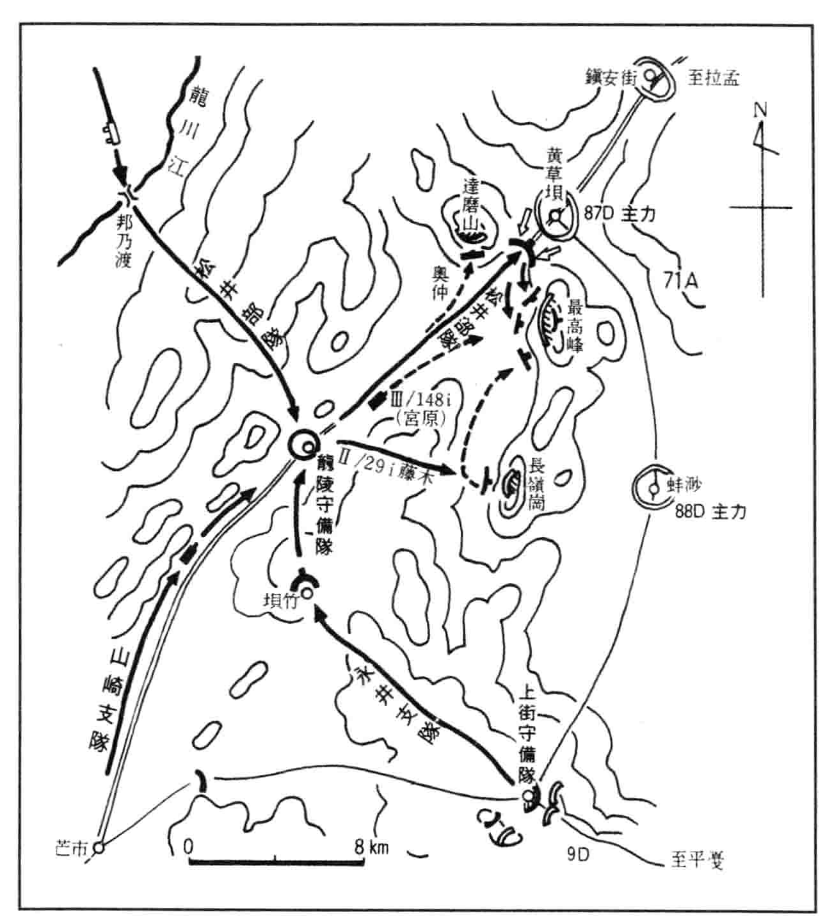
（据《拉孟·腾越——玉砕の実相》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5　中国远征军反攻计划要图



（据《炮烟——龙野炮第五十六联队战记》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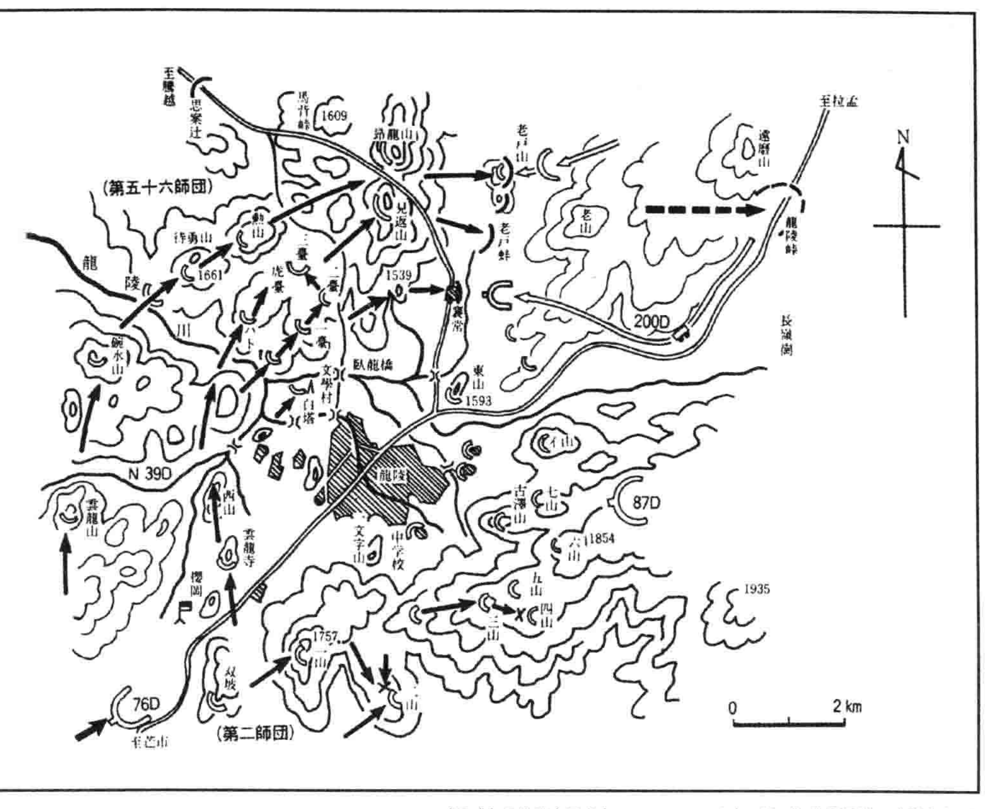
附图 16　松井部队增援龙陵态势图



（据《太平洋战争写真史——フーコン·云南の战い》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7　龙陵会战经过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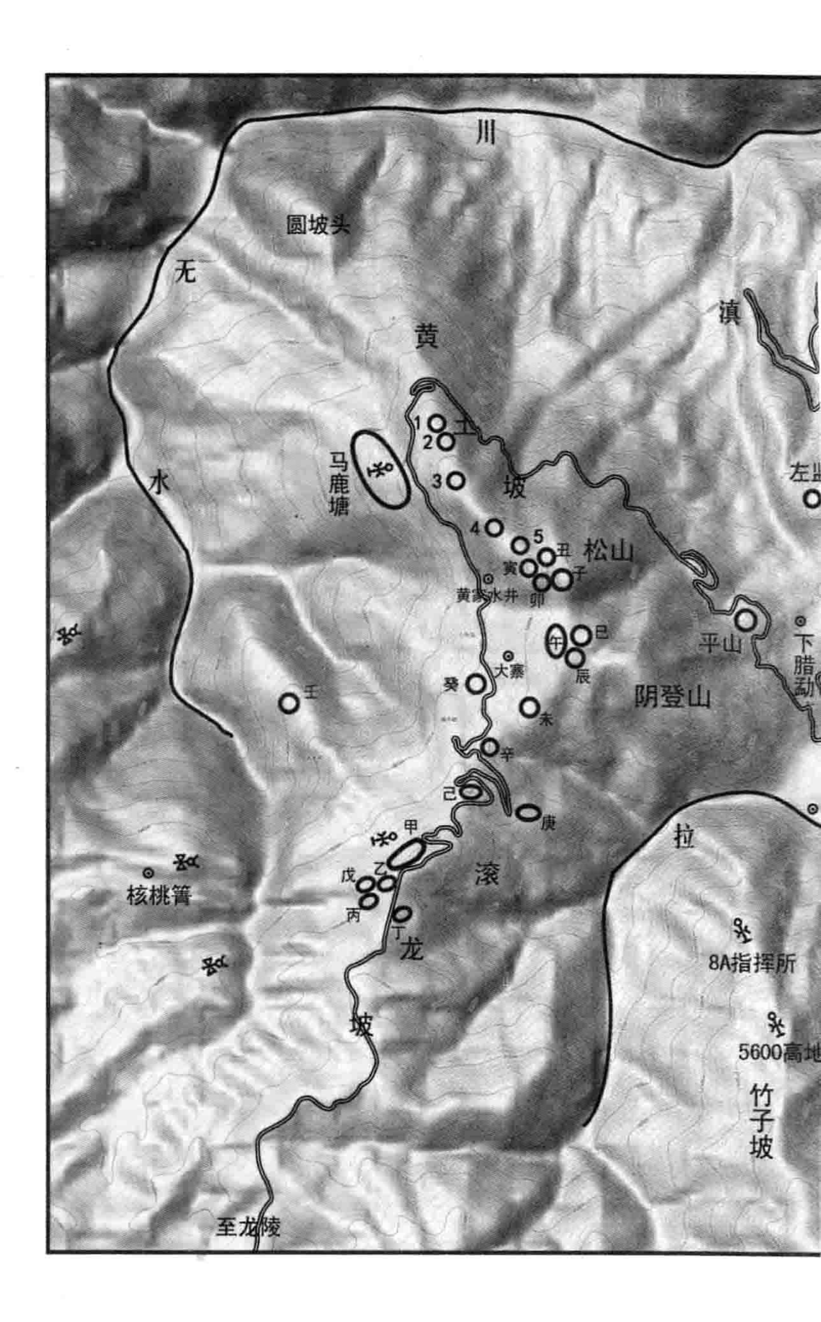
（1944 年 7 月至 9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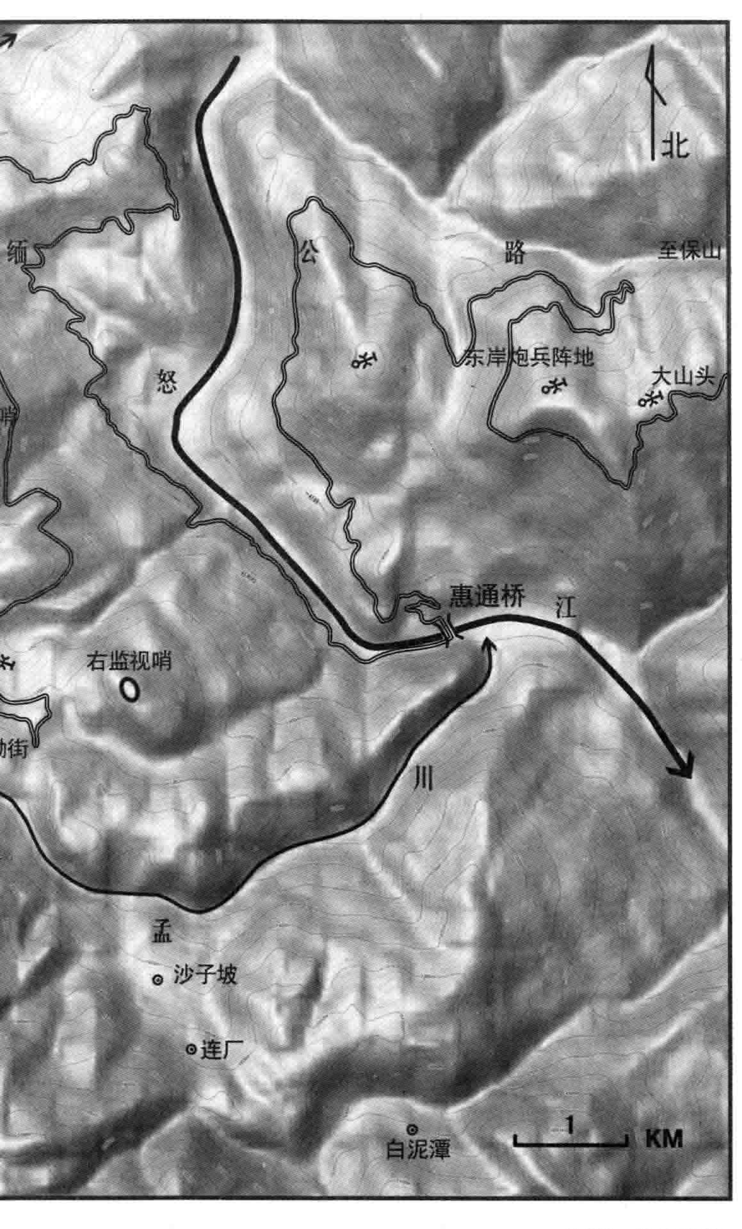


（据《太平洋战争写真史——フーコソ·云南の战い》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19　松山敌我阵地分布要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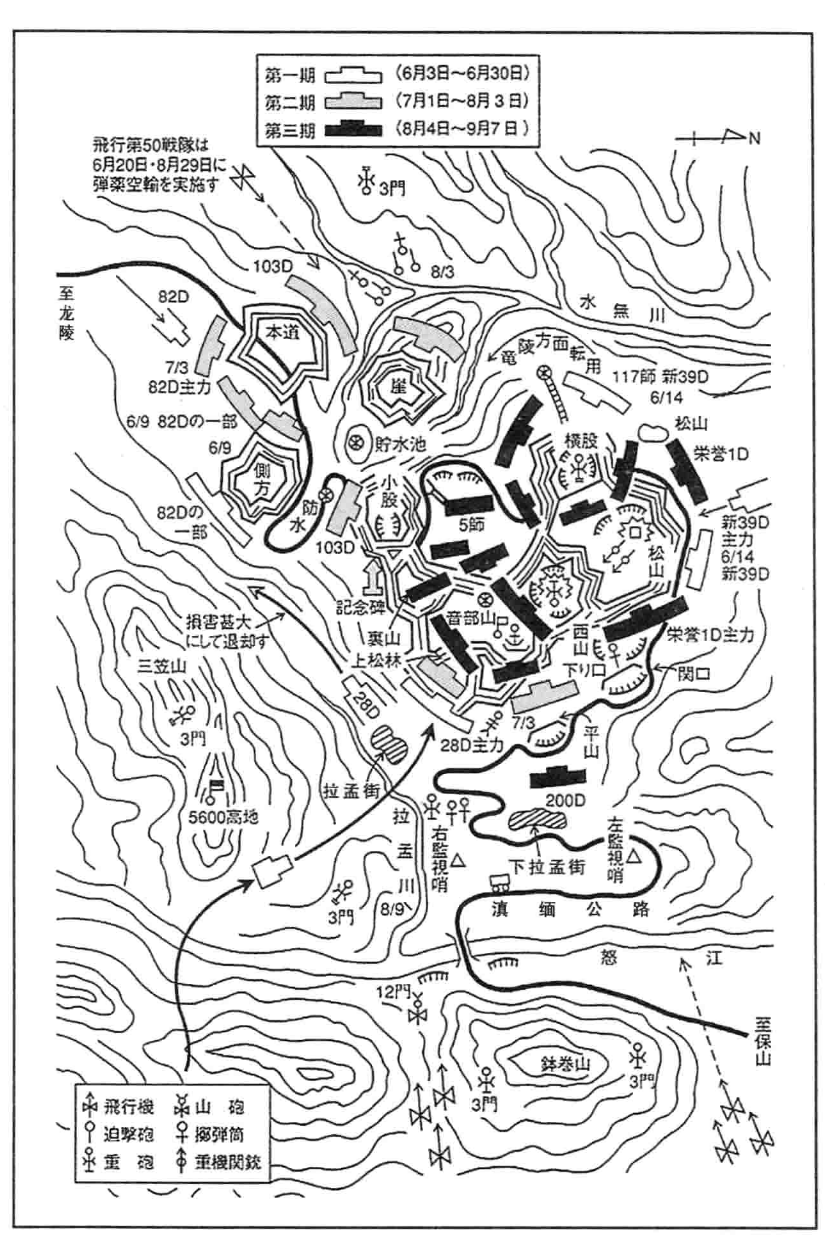
（以 Google 地形图调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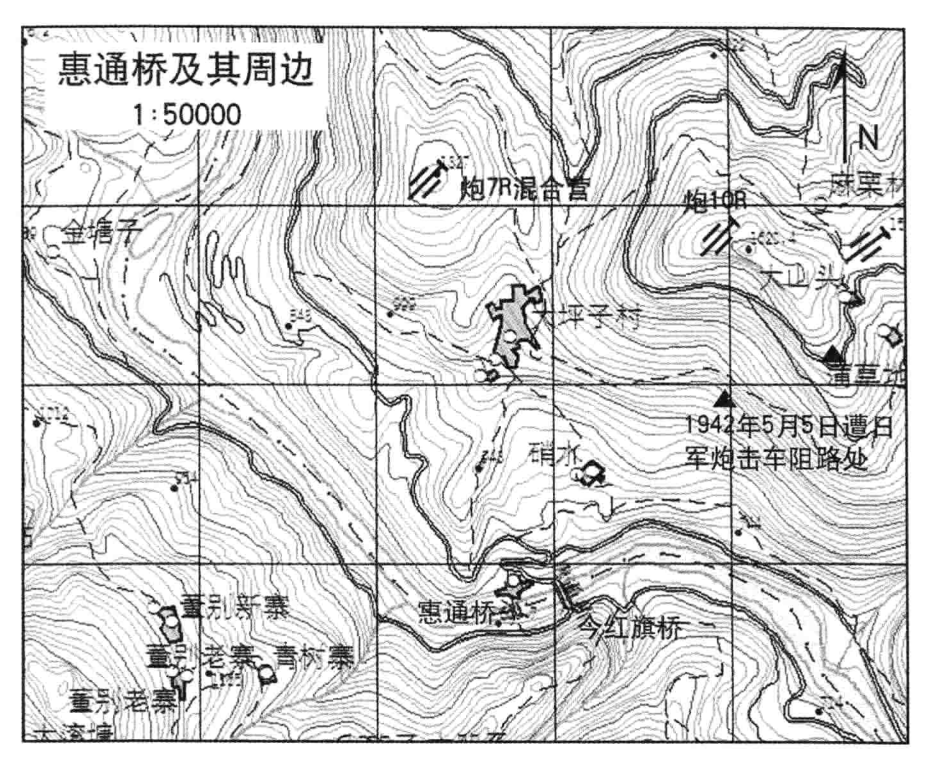
（强晓东、陈祥京修图）

附图 18　拉孟攻防图



（据《太平洋战争写真史——フーコン·云南の战い》附图调制；陈祥京修图）

附图 20　惠通桥及其周边态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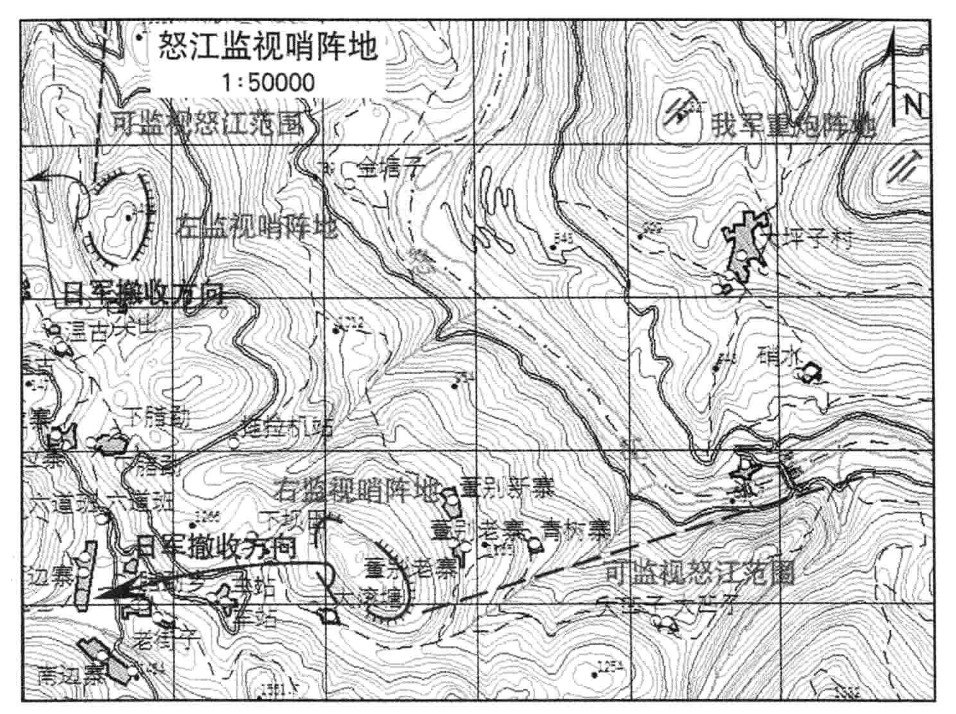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1 竹子坡及腊勐街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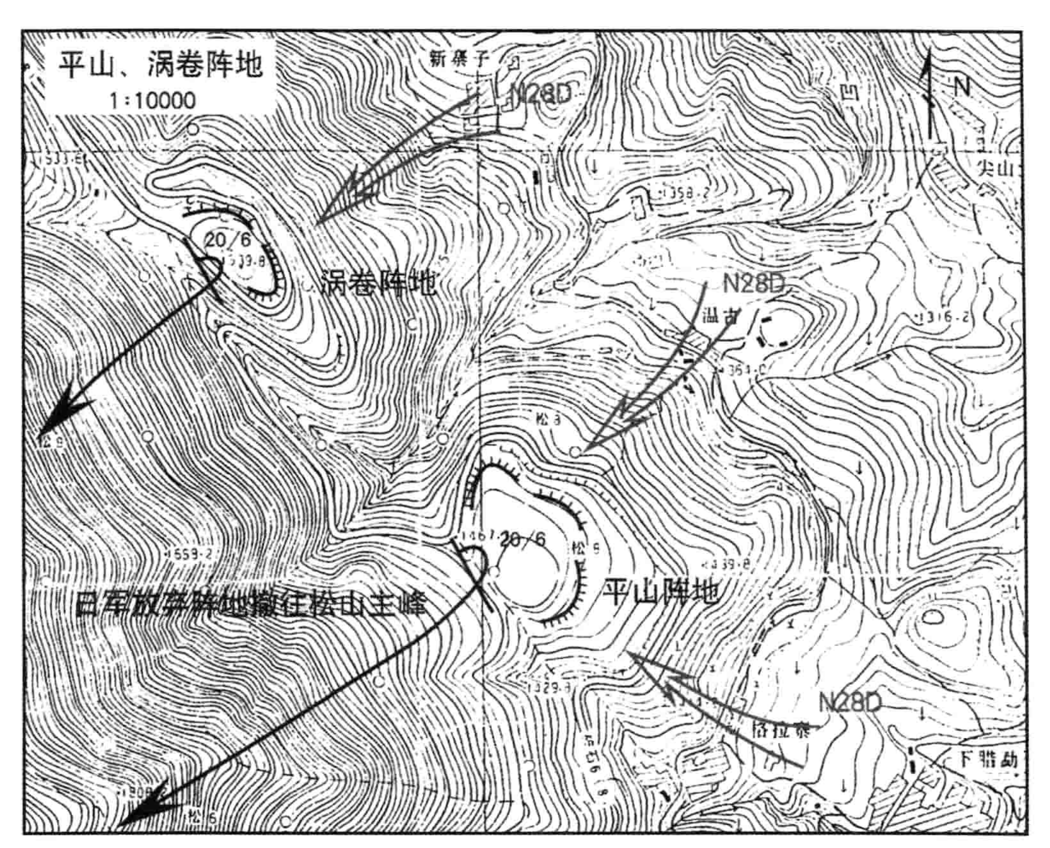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2　怒江监视哨阵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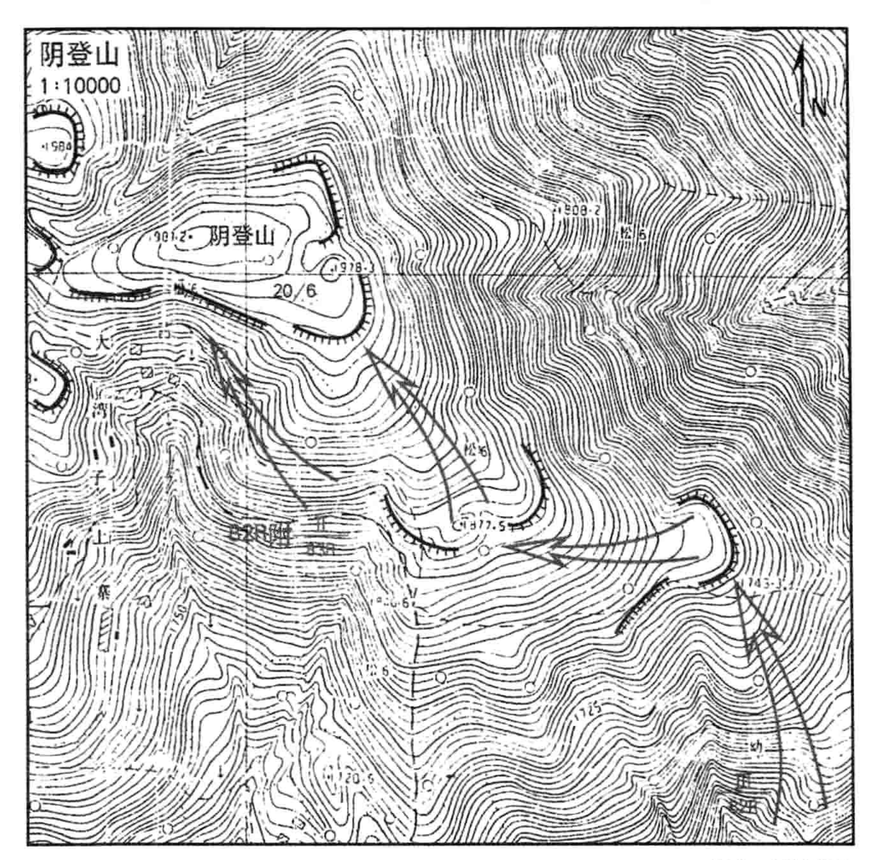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3　平山、涡卷阵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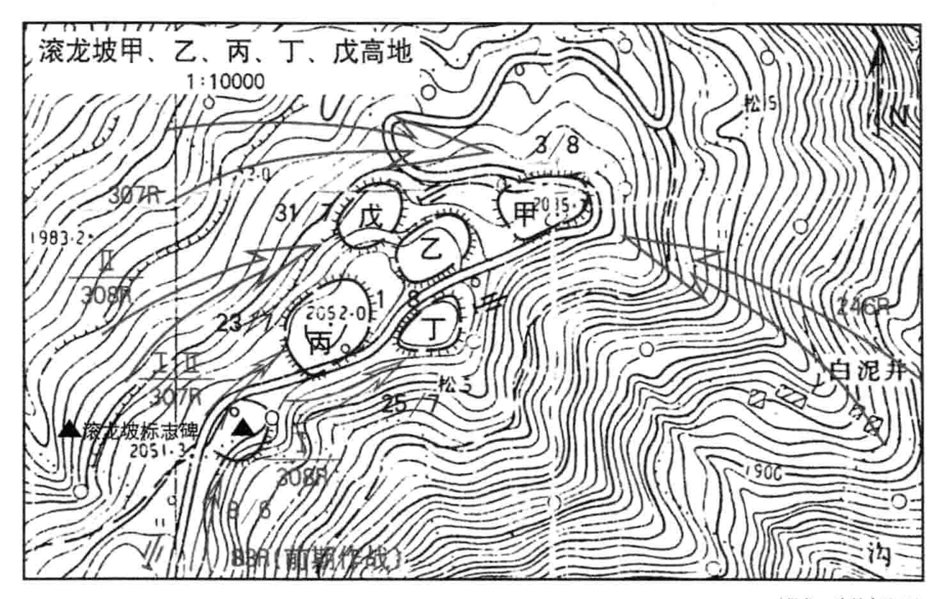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4　阴登山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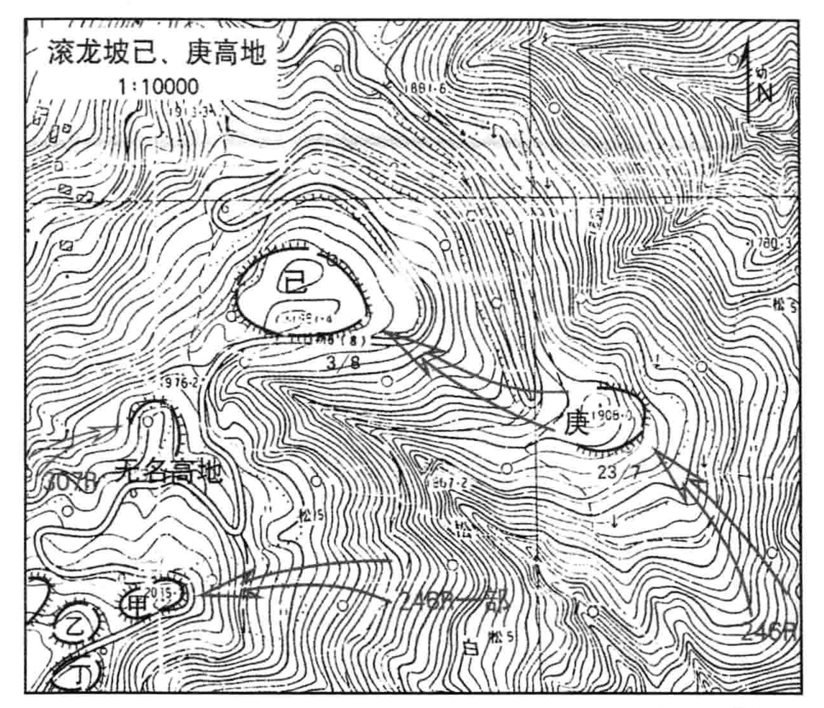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5 滚龙坡甲、乙、丙、丁、戊高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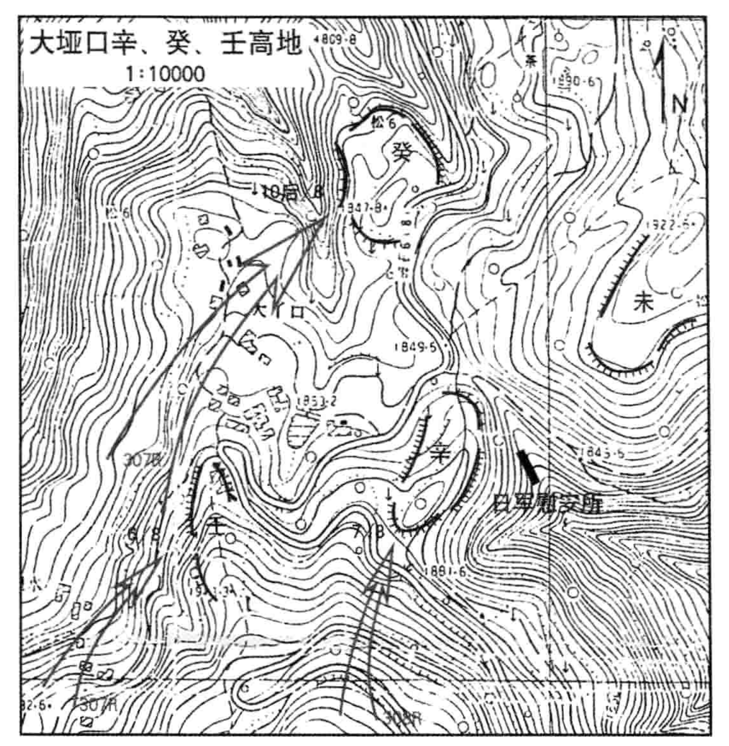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6　滚龙坡己、庚高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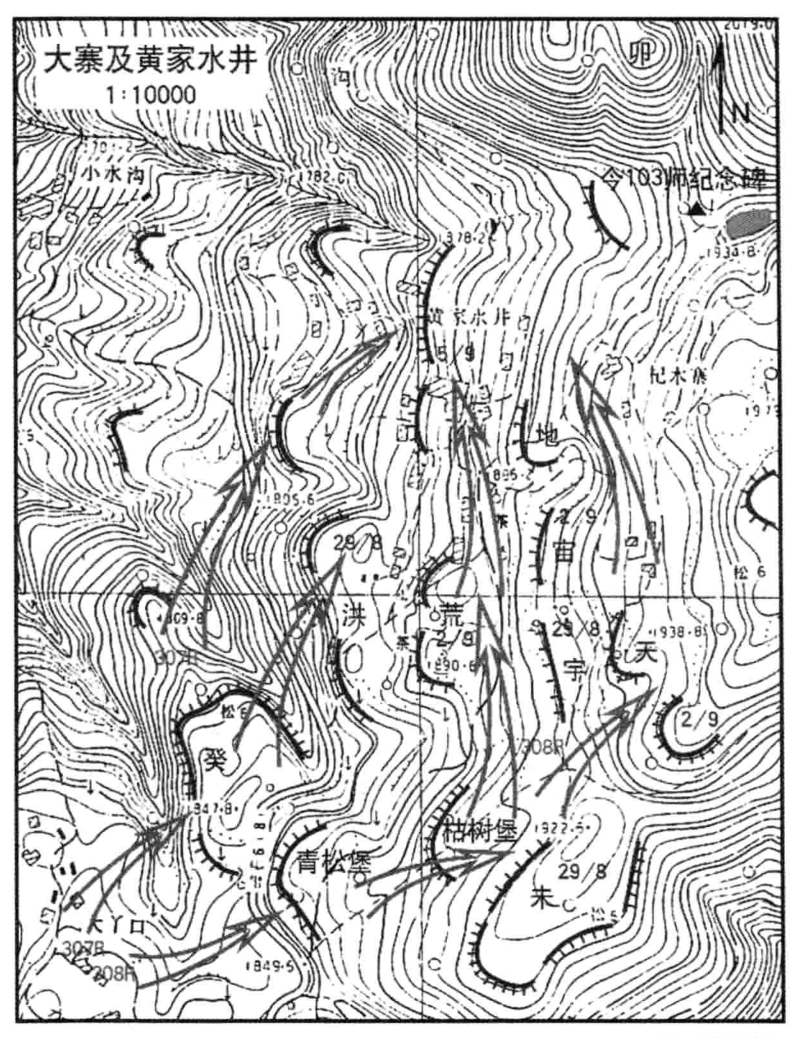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7　大垭口辛、癸、壬高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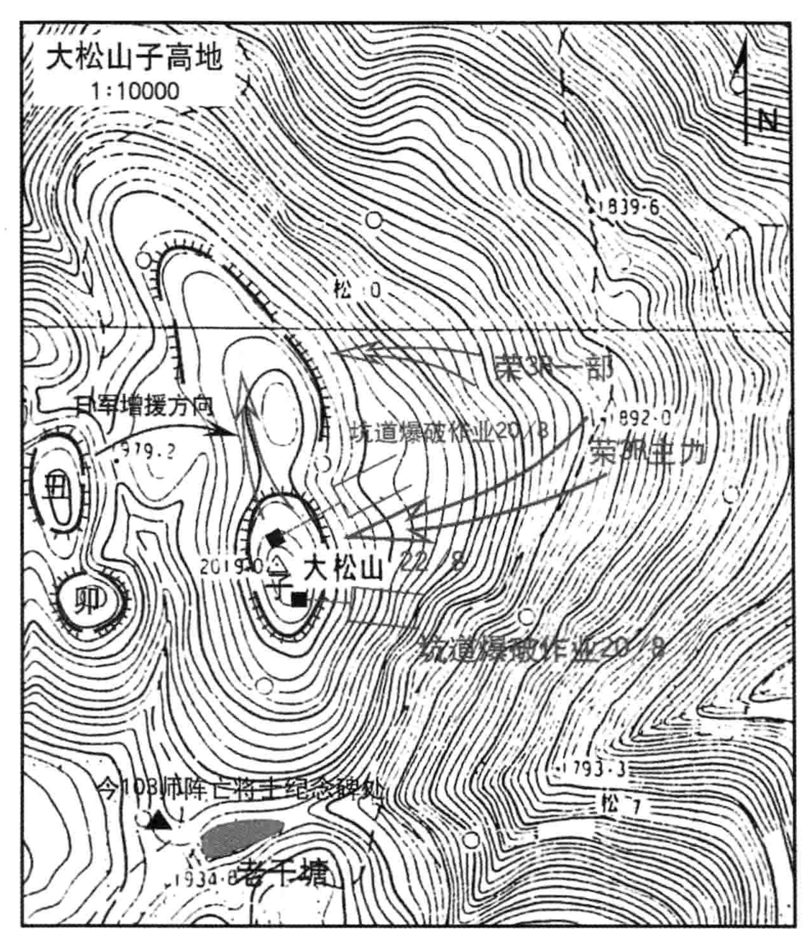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8　大寨及黄家水井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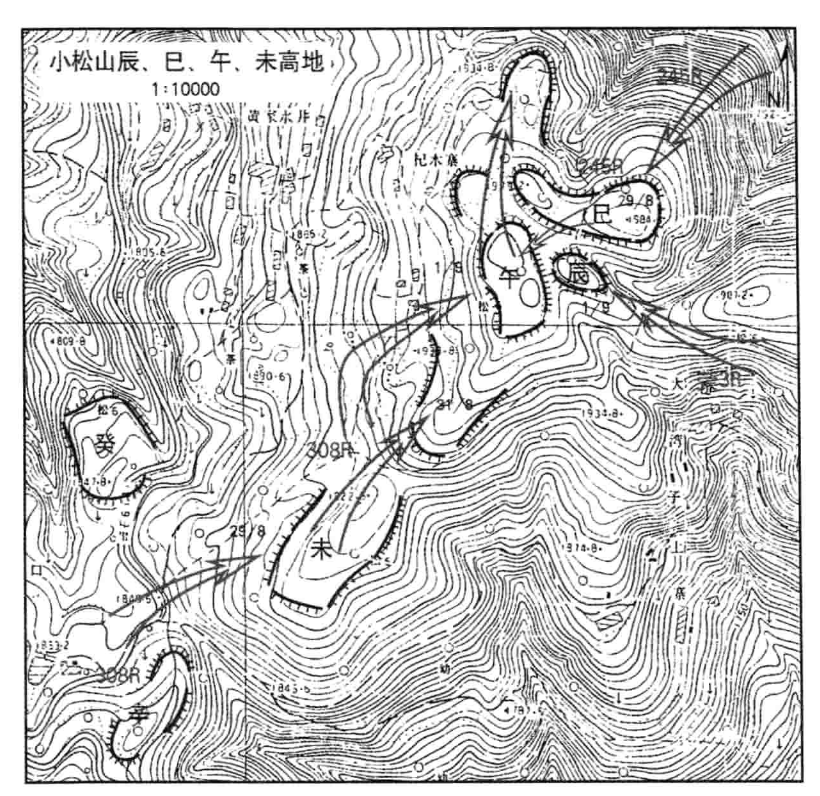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29　大松山子高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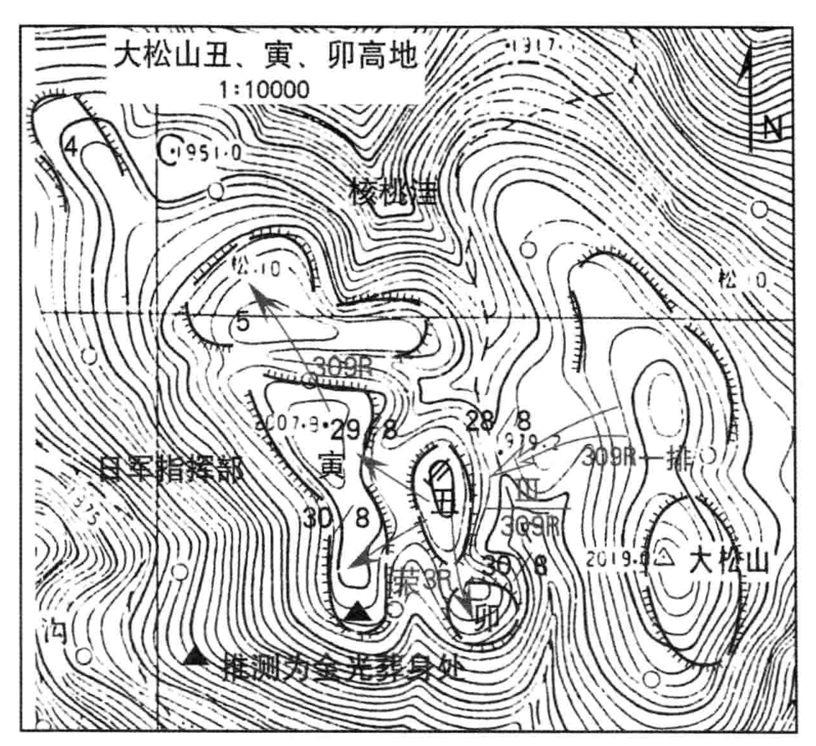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30　小松山辰、巳、午、未高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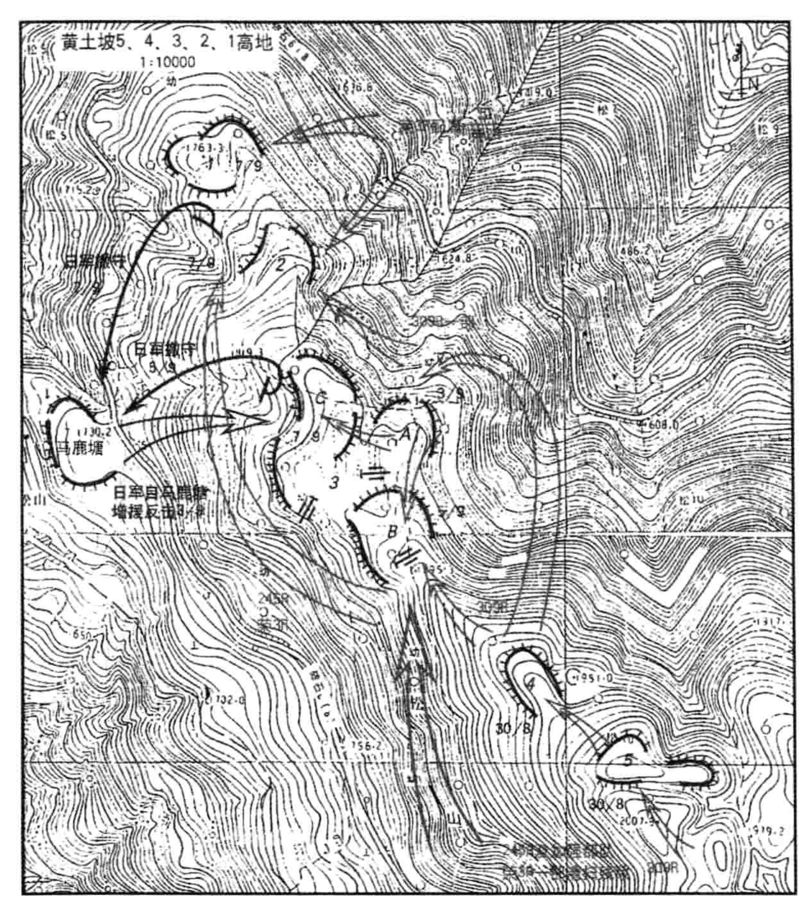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31　大松山丑、寅、卯高地攻防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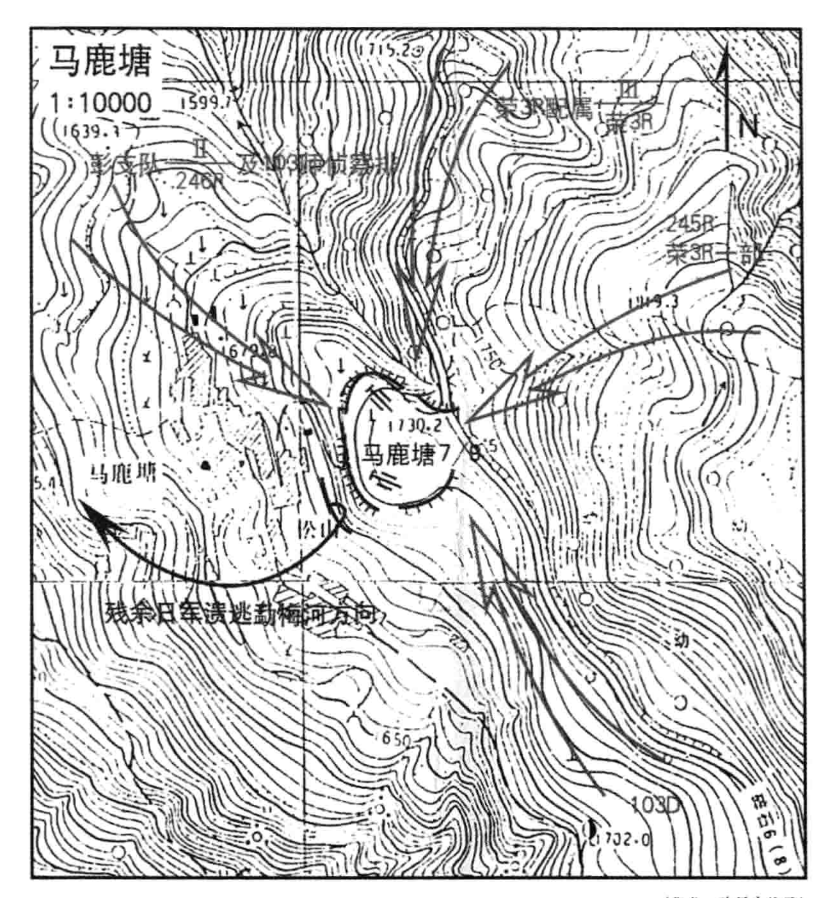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32　黄土坡 5、4、3、2、1 高地攻防示意图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图 33　马鹿塘攻防示意图



（张龙、陈祥京修图）

附　　表

表 16　远征军攻克日军编号阵地顺序表

（1944.6.4—9.7）

阶段		时间	攻击目标阵地	作战部队	重要进展	次序
一战松山	1	6月4日	竹子坡	第82团	攻占竹子坡	1
	2	6月5日	腊勐街	第82团	攻占腊勐街	2
	3	6月5日	阴登山	第82团第三营		
	4	6月6日	阴登山	第82团		
	5	6月7日	阴登山	第82团两个营		
			滚龙坡	第83团		
	6	6月8日	滚龙坡	第83团		
	7	6月10日	阴登山	第82团		
			滚龙坡	第83团		
	8	6月15日	阴登山	第82团		
			大垭口	第83团		
			黄土坡	第117团		
	9	6月17日	阴登山	第82团		
			大垭口	第83团		
			黄土坡	第117团		
	10	6月20日	阴登山	第82团附第83团第二营	攻占阴登山	3
			大垭口、滚龙坡	第83团及第84团第二营		
	11	6月22日—23日	小松山	第117团		
	12	6月23日	小松山	第84团第一营		
	13	6月24日	小松山	第84团第三营		
	14	6月27日	小松山	第117团		
二战松山	15	7月5日	子高地	荣3团第一、二营		
三战松山	16	7月7日	子高地	荣3团（欠第三营）、荣2团第三营		
			滚龙坡	第246团主力		
			大垭口、红木树	第246团一部		

续表

阶段		时间	攻击目标阵地	作战部队	重要进展	次序
四战松山	17	7月12日	滚龙坡	第307团第二、三营		
	18	7月13日	滚龙坡	第307团		
			子高地	荣3团（欠第三营）		
	19	7月15日	子高地	荣3团（欠第三营）、荣2团第三营		
五战松山	20	7月23日	滚龙坡丙、丁、乙、戊	第307团第一、二营，第308团第三营，师工兵连、防毒连	攻占丙高地	4
			滚龙坡庚及大垭口南	第246团	攻占庚高地	5
			小松山巳	荣2团第三营		
	21	7月24日	滚龙坡丙、丁	第307团第一、二营，第308团第三营，师工兵连、防毒连		
	22	7月25日	滚龙坡丁	第308团第一营	攻占丁高地	6
			滚龙坡戊	第308团第二营		
六战松山	23	7月26日	滚龙坡丙、丁反斜面及乙、戊	第308团		
			滚龙坡己	第246团		
	24	7月31日	滚龙坡戊	第308团第二营	攻占戊高地	7
			大垭口壬高地水源地	第307团		
	25	8月1日	滚龙坡乙	第308团	攻占乙高地	8
			滚龙坡甲	第307团		
	26	8月2日	滚龙坡己	第246团		
			滚龙坡甲	第308团第一营主力		
			滚龙坡丁反斜面	第308团第一营一部		
			滚龙坡甲北端、己侧背	第307团主力		
七战松山	27	8月3日	滚龙坡己、无名高地	第246团、第308团一排	攻占己、甲高地	9、10

续表

阶段		时间	攻击目标阵地	作战部队	重要进展	次序
七战松山	27	8月3日	滚龙坡左侧森林堡垒	第307团	攻占森林堡垒	
	28	8月6日	大垭口辛	第308团		
			大垭口壬	第307团	攻占壬高地	11
	29	8月7日	小松山巳	荣2团第三营主力		
			小松山辰	荣2团第三营一部		
			小松山午	第246团第一营（谢营）		
			小松山未	第246团第三营（黄营）		
			大垭口辛	第308团	攻占辛高地	12
			大垭口壬反斜面	第307团主力		
			大垭口癸	第307团一部		
			松山、阴登山间马鞍部	第245团一个营		
	30	8月8日	未、辛间鞍部，未	第308团		
			大垭口黄土包、壬左侧洞窟	第307团		
			大垭口癸	第307团		
	31	8月9日	小松山未高地棱线	第308团		
			昨日位置北侧	第307团		
	32	8月10日	大垭口癸	第307团	（数日后）攻占癸	13
	33	8月12日	公路南侧小松林高地	第307团		
			小松山未高地	第308团		
	34	8月13日	公路西侧断崖下	第307团一部		
			大寨一处房舍	第307团张学成夜袭组	缴获第113联队关防	
	35	8月14日	小松山未高地棱线	第308团		
			公路南侧	第307团		

续表

阶段		时间	攻击目标阵地	作战部队	重要进展	次序
七战松山	36	8月18日	松山子	军工兵营及师属工兵连	坑道施工完毕	
	37	8月19日	松山子	军工兵营及师属工兵连	坑道炸药装填完毕	
八战松山	38	8月20日	松山子	荣3团主力		
			小松山巳	第245团主力		
			小松山辰	第245团一部		
			大寨门户小松林高地	第307团	占领辛、未间炮弹库	
			小松山未	第308团		
	39	8月21日	松山子	荣3团主力		
			小松山未及小松林高地间	第308团、第307团		
			大寨外围	第308团、第307团		
	40	8月22日	松山子	荣3团主力	攻占子高地	14
九战松山	41	8月28日	松山丑	第309团一个排	攻占丑高地	15
			大寨中部	第307团		
	42	8月29日	松山寅	第309团		
			小松山巳	第245团	攻占巳高地	16
			小松山午、未间无名高地	第308团		
			小松山未	第308团	攻占未高地	17
			大寨洪、宇堡垒	第307团	攻占洪、宇堡垒	
	43	8月30日	松山寅高地	荣3团	攻占寅高地	18
			子、巳间谷地	荣3团一部		
	44	8月31日	子高地南部山脚	荣3团一部		
			未高地左侧森林	第308团		
			5、4号高地	第309团	攻占5、4号高地	19、20
			大寨荒堡垒	第307团		
	45	9月1日	3号高地	第309团主力		

续表

阶段		时间	攻击目标阵地	作战部队	重要进展	次序
九战松山	45	9月1日	2号高地	第309团一部		
			小松山辰	荣2团第三营	攻占辰高地	21
			小松山午	第245团、第308团	攻占午高地	22
			辰、午间谷地	荣3团	肃清谷地残敌	
			大寨大松林高地右侧	第307团		
十战松山	46	9月2日	大寨天、地堡垒	第308团	攻占大寨	23
			大寨宙堡垒、松林高地荒堡垒	第307团		
			3号高地	第309团		
	47	9月3日	3号高地	第309团	攻占3号高地A	
			1、2号高地	荣3团		
			黄家水井南侧、东侧	第307团、第309团第五连		
	48	9月4日	黄家水井	第307团，加强彭支队及师工兵、搜索连		
			黄家水井东侧	第308团		
			1、2号高地	荣3团及荣2团第三营		
			3号高地	第309团，师防毒连一个排、荣3团一部增援		
			黄家水井	第307团及加强部队		
	49	9月5日	3号高地	第309团	攻占3号高地B	
			黄家水井	第307团及加强部队	攻占黄家水井	24
			马鹿塘（推进）	第308团残部60余人		
			4号高地（清扫）	第245团，配属军搜索营第一连		
	50	9月6日	3、4号高地间，及3号高地（清扫）	第245团及加强部队、荣3团		
			马鹿塘	第308团		

续表

阶段		时间	攻击目标阵地	作战部队	重要进展	次序
十战松山	51	9月7日	3、2、1号高地及斜面	第245团、荣3团	攻占3、2、1高地	25、26、27
			马鹿塘	第103师、第245团、荣3团、彭支队及师侦察排	攻占马鹿塘	28

表 17　第 8 军松山战役歼敌情况统计表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　日）　　　　参谋处第二课制

我军作战部队	时　间	地　点	日军伤亡情况				备　考
			伤		亡		
			官	兵	官	兵	
荣 1 师第 3 团	7 月 3 — 5 日	松　山	2	25	1	20	日军作战部队为第 113 联队第 2 大队主力及第 1、3 大队各一部，师团炮兵联队第 3 大队主力。 附记： 1. 括号内为遗尸数字； 2. 此表统计数字多系估算，与实际毙伤情况差距较大。
82 师 246 团	7 月 6 — 7 日	红木树	2	20	1	30	
荣 1 师第 3 团	7 月 7 — 9 日	松　山	1	15		15	
荣 1 师第 3 团	7 月 12 日	松　山		20	1	15	
82 师 245 团第 2 营	7 月 23 日	松　山	2	35	1	19	
103 师	7 月 24 — 26 日	滚龙坡	5	100	3（2）	70（50）	
荣 1 师第 3 团	7 月 25 日	松　山	2	25	1	15	
103 师	7 月 27 — 30 日	滚龙坡	3	50	2（2）	40（30）	
82 师 246 团	7 月 8 — 26、27 日	红木树	6	100	2（1）	200（100）	
103 师	7 月 31 日	滚龙坡	2	30	1	20	
103 师	8 月 1 — 2 日	滚龙坡	5	200	3（2）	300（90）	
103 师	8 月 3 日	大垭口	2	30	1（1）	20	
82 师 246 团	8 月 3 — 4 日	大垭口	1	60		30	
103 师	8 月 6 日	大垭口	2	60	1（1）	30	
103 师	8 月 7 日	大垭口	1	60	1	40	
荣 1 师第 3 团	8 月 20 日	松　山	1	10	6（5）	100（80）	
荣 1 师第 3 团	8 月 21 日	松　山	2	20	2（1）	100（80）	
荣 1 师第 3 团	8 月 22 — 23 日	松　山		80	2	70（60）	
103 师	8 月 23 日	大垭口	1	50	3	35	
103 师	8 月 23 日	松　山 / 大垭口	2	30	1	25	
103 师	8 月 25 日	松　山 / 大垭口		50		30	
103 师	8 月 26 — 28 日	松　山 / 大垭口	1	20	（3）	（80）	
103 师	8 月 30 日	松　山 / 大垭口		60	（2）	（100）	
103 师	9 月 1 日	松山北侧 / 大　寨		15		100	
103 师	9 月 2 日	松山北侧 / 大　寨		50	（6）	（200）	
103 师	9 月 3 日	黄土坡 / 黄家水井		10	（5）	（350）	
103 师	9 月 4 日	黄土坡 / 黄家水井		20	（15）	（600）	
103 师	9 月 5 日	黄土坡 / 马鹿塘	2	10	（7）	（250）	
103 师	9 月 6 日	黄土坡			（5）	（400）	
103 师	9 月 7 日	黄土坡 / 马鹿塘			（10）	（500）	
合　计					87	3488	

据第 8 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件九制表

表 18　第 8 军松山战役参战人员及伤亡统计表

（民国三十三年十月　日）　　　　　　　　　　　　参谋处第二课制

部队	区分	参战人马			死亡			负伤			生死不明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司令部		50	57	14									
军直属部队	特务营	18	239	7		1		1	5				
	山炮营	17	187	106		3	2		8				
	战炮营	25	321	42	2	1		1	6			6	
	工兵营	22	366	19	1	29		1	30			4	
	通信营	30	188	20									
	辎一营	21	287										
	辎二营	29	259	89		1	12		1				
	第一野战医院	13	113										
	合计	225	2017	293	3	35	14	3	50			10	
荣誉第1师	2团第3营	26	386		6	135		13	171				
	第3团	125	1548	48	10	390		38	389				
	合计	151	1934	48	16	525		51	553				
第82师	245团	91	1218	25	8	417		24	212			8	
	246团	95	1132	20	19	335		20	380				
	合计	186	2350	45	27	752		44	652			8	
第103师	司令部及直属部队	97	986	39	3	86		6	73				
	307团	106	1591	39	21	340		34	620				
	308团	104	1456	30	16	450		18	481				
	309团	117	1538	43	21	645		31	303				
	合计	424	5511	175	61	1721		89	1477				
配属部队	炮10团	157	1419			1							
	炮7团混合营	50	532	303									
	71军山炮第2营	35	430	78									
	第5军山炮第8连	25	271	80									

续表

部队＼区分		参战人马			死亡			负伤			生死不明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军官	士兵	马匹
	工兵15团第9连	8	150			4		1	9				
	合计	275	2082	461		5		1	9				
总　计		1261	14714	1022	107	3038	14	188	2741			18	

附　记：据此表统计数字可知，松山战役第8军参战总兵力为15975人。战役前期，第71军新28师参战兵力约为6900人，第6军新39师第117团参战兵力约为1500人。自6月4日至9月7日，远征军投入松山战役总兵力约为24375人。而日本公刊战史推算的远征军参战兵力居然高达41500人，其错误在于将第6军军部及新39师整师均统计在内，其实后者均在龙陵、平戛方向。

据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件六制表

表 19　第 8 军松山战役武器弹药消耗统计表

（民国三十三年九月　日）　　　　　　参谋处第二课制

性质 / 种类	部队	荣 1 师		82 师				103 师				军直属部队				配属部队					合计
		2 团 3 营	3 团	244 团 1 营	245 团	246 团	直属部队	307 团	308 团	309 团	直属部队	特务营	工兵营	战防营	山炮营	5 军炮 8 连	71 军炮 1 连	2 军炮 2 营	炮 10 团	炮 7 团混合营	
弹药消耗	步枪	95800	182697	3000	94013	109615	2000	131264	110890	87960	35018	8873	6792	1800	300	2000	1000	3000		2000	812936
弹药消耗	轻机枪	171000	390000	4000	314000	230000	6000	350000	261000	190000	85400	18851	1000								2056731
弹药消耗	重机枪	103881	820000	4000	250000	236000		233000	14000	121000											1481881
弹药消耗	045 机枪	45475	108345	6000	4452	30191	4000	124708	62364	47208	19050	8000	5570								308463
弹药消耗	303 机枪		47752		28089	28216		30550	39570	29864											189716
弹药消耗	81 迫击炮	1344	4566		1319																7289
弹药消耗	82 迫击炮				3353	4364		7844	5710	7497											28970
弹药消耗	60 迫击炮	3032	12310		8993	7550		10438	10134	9524											61181
弹药消耗	55 战防枪	444	2529		1540	1830		1269	1373	2320											11026
弹药消耗	火箭筒	465	981		299	236		460	402	476											3259
弹药消耗	信号枪	130	1308		345	268		498	410	1280		80		50							4419
弹药消耗	枪榴弹筒	2386	5666		139	1740		3200	3350	2587	358	368									19784
弹药消耗	掷弹筒			209	1922	559						110	190								2810
弹药消耗	木柄手榴弹	4959	1441	480	2163	5422	800	11500	9000	5973	885	240									58254

续表

性质 / 种类	部队	荣1师		82师				103师				军直属部队				配属部队					合计
		2团3营	3团	244团1营	245团	246团	直属部队	307团	308团	309团	直属部队	特务营	工兵营	战防营	山炮营	5军炮8连	71军炮1连	2军炮2营	炮10团	炮7团混合营	
弹药消耗	黄磷手榴弹	145	1396		533	400		1180	650	307											5215
	美式手榴弹	305	1161			882		1688	5	105											5051
	英式手榴弹	100	1220		1844			1700	1620	3280		96									10860
	勃朗宁手枪	50	100					1250	950		270	60		140						760	3560
	自来得手枪	150	550					1320	1304	431	110	200	40			300		480			4881
	左轮手枪							205	625	400		30	80								1330
	2公分战防枪													600							600
	英式37战防炮													17240							17240
	75山炮														9980	10615	2664	15180			38339
	115榴弹炮																			3808	3808
	110榴弹炮																		2981		2981
	762野炮																			4858	4858

续表

性质	部队 / 种类	荣1师		82师				103师				军直属部队				配属部队					合计
		2团3营	3团	244团1营	245团	246团	直属部队	307团	308团	309团	直属部队	特务营	工兵营	战防营	山炮营	5军炮8连	71军炮1连	2军炮2营	炮10团	炮7团混合营	
武器损失	步枪	8	56		106	46	3	42	75	101	19		21								481
	轻机枪		4		12	2	1		2	5	1		1								26
	045机枪		9		11	10	2	9		21	1		1								64
	60迫击炮									1											1
	火箭筒	1	1			1															3
	信号枪		9		1	2		9	2	2											20
	枪榴弹筒	3	39			13		13	4	12	2										86
	掷弹筒			1	3	4															8
	自来得手枪						2	4	2	5	1	1									15
	勃朗宁手枪	2									3										5
	左轮手枪							14	8					1							23
附记	1．火焰喷射器损失1具、损坏5具，未列在本表中； 2．配属71军炮1连被日军炸毁75山炮1门未列表中； 3．战炮营使用的37美式战防炮9门，均因射击过量膛线磨损严重，不能再使用； 4．武器损失栏内的物品皆是遗弃在战场内的，现正在清理战场，有任何数据变动会随时更正。																				

据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附件七制表

表 20　步兵第 113 联队第 3 大队第七中队编成表

中队长：石田德二郎中尉																				
指挥班			第一小队	小队长：□九玄真见习士官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掷弹筒分队			
班长：井上常一准尉					分队长：四郎九胜实军曹				分队长：军三苦城军曹				分队长：小川清太伍长				分队长：阿部久伍长			
职名	军衔	氏名			职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职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职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职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命	曹	伍白环			1	兵		傣本实	1	兵		禅院高一	1	兵		武田以	1	兵		坂口英雄
兵	军	大久保进			2	上	♂	松冈静雄	2	上	♂	松本君正	2	上	♂	村上泣夫	2	上	♀	中山孝志
给	军	中峰勇男			3	上	弹	松崎和海	3	上	弹	深町万吉	3	上	弹	上野芳一	3	上		宫崎正胜
传	兵	南星源六郎			4	—		藤芳德	4	—		山村则明	4	—		日原贞善	4	上		原田善弘
传	上	石田舜			5	兵		容苗	5	兵		黑岩义人	5	兵		山本武六	5	上	♀	松尾喜三
传	上	金九国光			6	—		高须贺木二雄	6	上		冈部勇治	6	上		能浦精二	6	上		警田政雄
传	上	江口真久			7	上	狙	吉田正也	7	上	狙	小野清春	7	—	狙	藤田洋太郎	7	上		清水政雄
传	上	师根正次			8	—		西谷谨次郎	8	—		前田春海	8	—		平野秀夫	8	上		松田重祐
传	上	高米寿人			9	上		柳田军人	9	上		大庭太一郎	9	上		伊藤重山	9	上	♀	川边清
传	—	荒川松平			10	—		北屋夫正敏	10	上		佐佐木清	10	—		筒井彰	10	兵		富桥政雄
喇	上	松尾山一			11	—	狙	大岛生美夫					11	—	狙	田烟光则	11	上		枝光岩夫
卫	兵	田中义雄											12	上		本冈龙太郎	12	—		西本则行

续表

中队长：石田德二郎中尉																				
指挥班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掷弹筒分队			
卫	兵	城户长之助	第二小队	小队长：大崎利夫少尉	分队长：弓削新一军曹				分队长：千千巧军曹				分队长：伍田薰伍长				分队长：中岛义满伍长			
卫	上	高鸠义人			1	兵		内川一三	1	兵		板本武夫	1	兵		吉原直市	1	兵		高山传
编成外					2	上	♂	横山鸷藏	2	上	♂	岛屋初则	2	上	♂	竹内元三	2	上	♀	吉田惠
中尉		尾原繁			3	上	弹	白川司郎	3	上	弹	伊藤孝吉	3	上	弹	吉武梅勇	3	—		高木併金
	曹	小岛广人			4	—		江崎忠义	4	上		田原学	4	—		青柳茂广	4	上		长谦作
	军	吉武政雄			5	兵		塚木义清	5	上		百富国彦	5	上		久勇定光	5	—	♀	有田郡善
	军	梅泽重喜			6	上		泷口敏一	6	上		满井忠一	6	上		永野彦助	6	—		福岛岩松
	兵	田政辉			7	上	狙	城间孙治	7	上	狙	小岛政利	7	—	狙	大里贞夫	7	上	狙	沟上友人
	兵	薄一郎			8	—		行定常三郎	8	—		新见康	8	—		真锅秀雄	8	—		石井胜喜
	兵	青木泰生			9	上		石原金一	9	—		山口藤雄	9	—		田平采人	9	上	♀	柴田大九郎
	上	泣多野一之介			10	—		高屋勇助	10	—		小川勇	10	—		杉山要一	10	—		铃木寅松
	上	松冈一夫			11	上	狙	小原初男									11			岩崎正一
	上	大场种彦			12	—		尾家勋												
	上	松山茂太郎	第三小队	小队长：胁山忠之少尉	分队长：篠原寅雄军曹				分队长：荻尾重光伍长				分队长：安达政伍长				分队长：岩本利繁军曹			
	上	令林政雄			1	兵		木村政次	1	兵		桥野助安	1	兵		宫本胜	1	兵		奥利章吉
	上	冈田纯勇			2	上	♂	斉堃敏	2	—	♂	大内田八郎	2	上	♂	末次国俊	2	—	♀	大内田良助
	上	桥本初一			3	上	弹	服部一郎	3	—	弹	山本大郎	3	上		梶原金太郎	3	—		木下一
	上	石村岩			4	上		松本义平	4	上		柴田土尾	4	上		柳利郎	4	兵		原田吉政
	上	山本荣			5	兵		丰泽法人	5	兵		白石善治	5	兵		波多江四藏	5	上	♀	小西政和

中队长：石田德二郎中尉																				
指挥班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第三分队				掷弹筒分队			
	一	次郎九赖雄	第三小队	小队长：胁山忠之少尉	6	上		古贺金作	6	上		滨野顺决郎	6	上		大谷益雄	6	上		川安
	一	光野伊佐男			7	上	狙	松尾明	7	上	狙	山元明	7	上	狙	大穗等	7	上	狙	吉富建
	见	保板林			8	上		西尾久	8	一		川原弘	8	一		王丸常美	8	上		吉田松
					9	一		二木三郎	9	一		伊藤义久	9	一		加来清久	9	上	♀	木村胜岛
					10	一		富木童男	10	一		西正春	10	上		白勇伍雄	10	上		伊藤
					11	一	狙	松山金岁	11	上		仁科安太郎					11	一		中村一夫

笔者注：“联络挂”即负联络者；“传”即传令兵；“给”即给养兵；“命”即命令受领者；“刺”即号兵；“弹”为弹药手；“狙”为狙击手；♂为轻机枪手；♀为掷弹筒手。“见”为见习士官，“曹”为曹长，“军”为军曹，“伍”为伍长，“兵”为兵长，“上”为上等兵，“一”为一等兵，“二”为二等兵。日军的“指挥班”，与分队编制人员相当，主要以专业勤务兵组成，相当于所在队的指挥机关。

据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附表中国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制表

表 21　日军第 113 联队第 3 大队第八中队兵种区分表

<table>
<tr><th rowspan="2">部别</th><th rowspan="2">分队别</th><th rowspan="2">通常人数</th><th colspan="3">特务兵</th><th colspan="2">义务兵</th><th colspan="2">其　他</th><th rowspan="2">合计</th></tr>
<tr><th>瓦斯兵</th><th>号兵</th><th>铁工兵</th><th>缝工兵</th><th>装弹兵</th><th>传令兵</th><th>弹药兵</th></tr>
<tr><td>本部</td><td>步枪兵</td><td>10</td><td></td><td>4</td><td></td><td></td><td></td><td>6</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4">第一小队</td><td>第一分队</td><td>13</td><td>2</td><td></td><td rowspan="4">1</td><td></td><td rowspan="4">1</td><td></td><td rowspan="4">1</td><td></td></tr>
<tr><td>第二分队</td><td>13</td><td>1</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第三分队</td><td>13</td><td>1</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掷弹筒分队</td><td>9</td><td>1</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4">第二小队</td><td>第四分队</td><td>13</td><td>1</td><td></td><td rowspan="4">1</td><td rowspan="4">1</td><td></td><td></td><td rowspan="4">1</td><td></td></tr>
<tr><td>第五分队</td><td>13</td><td>1</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第六分队</td><td>13</td><td>1</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掷弹筒分队</td><td>9</td><td>1</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4">第三小队</td><td>第七分队</td><td>13</td><td></td><td></td><td></td><td rowspan="4">1</td><td rowspan="4">1</td><td></td><td rowspan="4">1</td><td></td></tr>
<tr><td>第八分队</td><td>13</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第九分队</td><td>13</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掷弹筒分队</td><td>9</td><td></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小计</td><td></td><td>154</td><td>13</td><td>（4）</td><td>（2）</td><td>（2）</td><td>（2）</td><td>（6）</td><td>（4）</td><td>187</td></tr>
</table>

据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附表中国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制表

表 22　日军步兵第 113 联队第二机枪中队编成表

中队本部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弹药分队		
中队长：曾根崎岩　大尉					分队长：辻毅雄　军曹				分队长：渡边善富　兵长				分队长：前田吾市　军曹		
职名	军衔	氏名			职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职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军衔	特业	氏名
指挥班长	准	山口清水	第一小队	小队长：只松茂中尉	1	上		家补蒲	1	上	瓦	上村乡一郎	上	装	本村惠正
曹　长	军	梶原泉			2	上		守田功	2	上		田中一	一		辻峰雄
兵器挂	军	津田金作			3	上		上野信幸	3	上		大场义一	一	蹄	金川进
给养挂	军	田中正一			4	兵		中村日吉	4	上	瓦	森十郎	一	鞍	长沼办儿
传令兵	上	井久雄			5	上	锻	行平忠	5	上		古贺定美			
传令兵	一	今井速雄			6	上		松本茂	6	上		上川忠男	配属军马名		初征
传令兵	二	后乡山郎			7	一	瓦	行实义正	7	一		山北贤次			初羊
喇叭手	上	藤木盛雄			8	一		川上小市	8	二		大谷宽			初岛
喇叭手	上	古贺丰			驭	一		山内富雄	驭	一		吉竹剑太郎			初丰
卫生兵	上	田中春行			驭	一		田村善保	驭	一		波户秀雄			
卫生兵	上	野上喜太郎						红矶初蒲				初宇初旭			

续表

中队本部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弹药分队		
卫生兵	一	铃木寅山	第二小队	小队长：石健大郎少尉	分队长：今吉正雄　伍长				分队长：掘江敏之　伍长				一		坂田正己
马职兵	一	青乡充			1	上		荻野孝生	1	上	瓦	荒木龟雄	一	装	樋口义德
附　证： 1. 此系战时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之复写件。 2. 日军机枪中队计有将校4名；准尉2名；军曹5名；伍长4名；兵长9名；上等兵49名；一等兵41名；二等兵4名；卫生上等兵2名；卫生一等兵1名。 乘马1头；铣、驮马29头。 人员计111名，马匹计30头。					2	上		梅谷治平	2	上		樱井雄	二	锻	沼口贵
					3	上		平原荣	3	上	蹄	姿永正则	一	鞍	梅泽雄
					4	兵	瓦	下笠清亲	4	上		岛田仲敏	上	缝	上村英太郎
					5	上		国崎德登	5	上	瓦	渡边敏秋	配属军马名		初冬
					6	上		藤野勇	6	上		清永末次			初快
					7	一		永元芳成	7	一		宫崎源市			初穗
					8	一		山本清	8	一		小川喜久司			初西
					驭	一	锻	窪山武夫	驭	一		岩下人			初雪
					驭	一		垣尾实	驭	一		古贺正三			
								城藤初				盛笹初永			

续表

中队本部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弹药分队		
笔者注： “兵器挂”即军械员；“给养挂”即给养员；“驭”即驭手；“瓦”（瓦斯）即防化兵；“蹄”为给军马安装蹄铁者；“鞍”为配马鞍者；“缝”为修补马具者；“锻”、“担”不详。 “见”为见习士官，“曹”为曹长，“军”为军曹，“伍”为伍长，“兵”为兵长，“上”为上等兵，“一”为一等兵，“二”为二等兵。	第三小队	小队长：秦源之少尉	分队长：三苦和人　伍长				分队长：鬼塚金一郎　兵长				一		石川稔
			1	上	瓦	有任进	1	上	瓦	山本传	二		时安方郎
			2	上		绪方清俊	2	上		藤田静雄	上		栗正雄
			3	上		住吉克己	3	上		前田正臣	上	缝	安井岩男
			4	上		坂口贤太	4	兵		坂本赖母	配属军马名		初秋
			5	上		山下隆司	5	上	担	加藤健雄			初菊
			6	上		堺岛藏	6	一		门司正己			初音
			7	一		有田文雄	7	一		奥清人			初东
			8	一		道崎清吉	8	一		田中岬夫			
			驭	一		丸林岩生	驭	一		安谷星荣康			
			驭	一		中岛又太郎	驭	一					
						睦宿红光							

续表

中队本部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弹药分队
	第四小队	小队长：安武利实少尉	分队长：高崎又一郎　伍长				分队长：城户贞　兵长				
			1	上	瓦	养父明	1	上		北野寅	
			2	上	铳	冈部	2	上		前田定	
			3	上		太原英治	3	上		大胡国	
			4	兵		石松广义	4	兵		铃木孝	
			5	上		来须武雄	5	上	瓦	丰田正雄	
			6	上		宫崎俊	6	上	担	柴山通	
			7	一		薄隆	7	一		常冈重尾	
			8	一		太东折	8	一		福田	
			驭	一		安藤一	驭	一		津村成雄	
			驭	一		守口泰	驭	一		比嘉正温	
						幸昌初				迁海初	

附记：该编成资料应为松山战役前，因第一小队长只松茂中尉在松山战役中已晋升该中队大尉中队长。

据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附表中国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制表

表 23　日军步兵大队配属步兵炮小队编成表

小队长　陆军中尉　仓原胜											
指挥班			第一分队			第二分队			弹药分队		
职	衔	氏　名	职	衔	氏　名	职	衔	氏　名	职	衔	氏　名
指挥班长	曹	泷口幸太郎	分队长	军	古贺光次郎	分队长	伍	塚本亲志	分队长	军	掘辰喜
给养挂	曹	西村喜吾	分队附	伍	小林利明	分队附	伍	野口新	弹药手 1	兵	佐佐木兰治
观测挂	军	中村一	炮手 1	兵	茅鸠辰造	炮手 1	上	松平菊夫	弹药手 2	上	宝住正一
命令受领	军	野村定男	炮手 2	兵	渡边广	炮手 2	一	壁矢胜	弹药手 3	上	令出正人
观测手 1	上	西田丰	炮手 3	兵	安永正一	炮手 3	兵	真锅清	弹药手 4	一	野原进
观测手 2	上	谷川市兵卫	炮手 4	兵	福康繁行	炮手 4	兵	石木正春	弹药手 5	一	石崎卯之助
观测手 3	兵	永永正	炮手 5	上	江藤义雄	炮手 5	兵	今井胜广	弹药手 6	兵	章场贤次郎
观测手 4	上	汤下保郎	炮手 6	上	山村保夫	炮手 6	兵	藤本金吹郎	弹药手 7	上	原善之助
传令	兵	佐伯正	炮手 7	上	柳预昌且	炮手 7	上	安河内利夫	弹药手 8	上	隈本秀男
传令	上	上野虎男	炮手 8	上	八寻俊郎	炮手 8	上	为家道男	弹药手 9	上	隅田正志
传令当番	上	山内吉治	炮手 9	上	荻原保	炮手 9	上	广田吉雄	10 名		
马取报	上	大隈武	炮手 10	一	大和富右卫门	炮手 10	上	庄岛辉雄			
卫生兵	兵	一宫小一	12 名			12 名					
计 13 名											
笔者注："给养挂"即给养员；"观测挂"即观测员；"马取报"不详。"曹"为曹长，"军"为军曹，"伍"为伍长，"兵"为兵长，"上"为上等兵，"一"为一等兵，"二"为二等兵。日军的"分队"相当于远征军的"班"，每分队配置九二式步兵炮 1 门；日军的"指挥班"，与分队编制人员相当，主要以专业勤务兵组成，相当于所在队的指挥机关。											

据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附表中国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制表

表 24　日军一般分队兵器携带区分表

品名＼区分	联络兵	班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三八式步枪弹（发）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120
九六式机枪														
九六式预备枪身		1												
九六式属出囊			1											
九六式属入囊				1										
九六式装弹机					1	1								
九六式弹衾囊			1		3	1	1							
手旗	1													
标示板														
九八式夜光罗针		1												
小圆锹			1		1			1	1	1		1	1	1
小十字镐				1			1				1			
弹囊			1		1	1				1				
镰		1												
九二式隐显灯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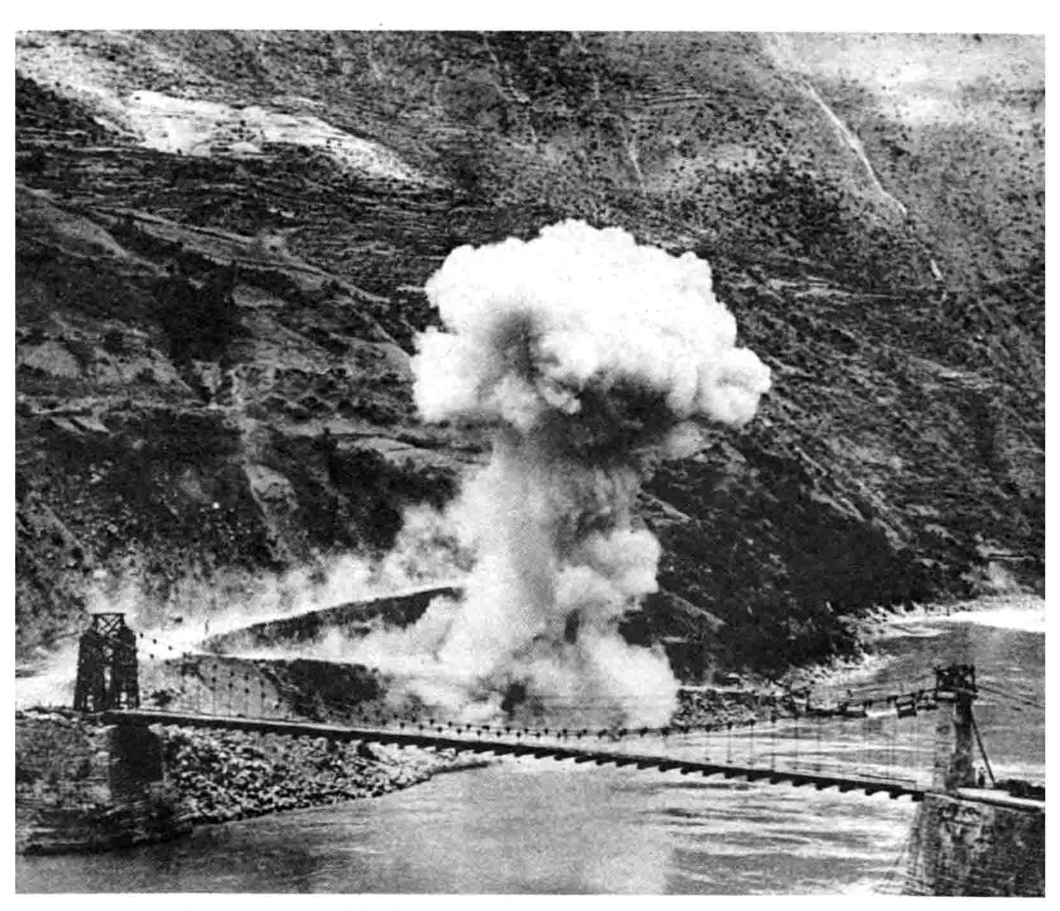
据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附表中国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制表

表 25　日军掷弹筒分队兵器携带区分表

品名＼区分	班长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掷弹筒			1				1				1		
掷弹囊		1		1		1		1		1		1	
掷榴弹		8		8		8		8		8		8	
标示板							1						
九八式夜光罗针	1												
小圆锹			1	1	1			1	1		1	1	1
小十字镐		1				1							

据陈祖樑主编《浴血怒江》附表中国远征军虏获日军文件制表

历史照片



1. 1942年5月，日军飞机轰炸惠通桥时的情景。由此图可见惠通桥未炸毁前的样式。



2. 1942 年 5 月 22 日，日军首任松山守备队长、野战重炮联队长田村中佐（背对镜头者）向第 56 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俯身面向田村者）报告战况，两天后田村被我第 36 师第 107 团击毙于西分哨阵地附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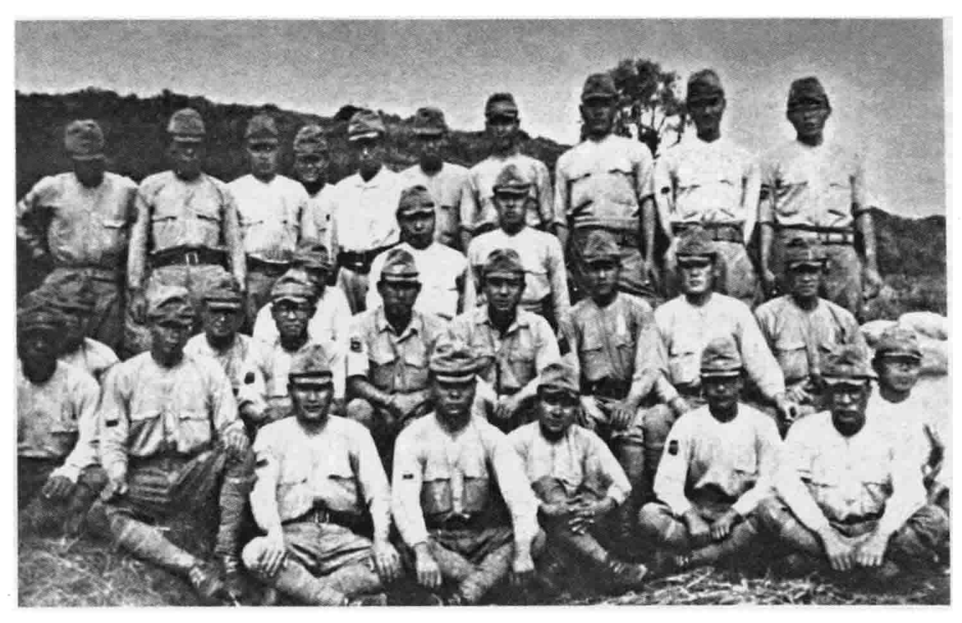


3. 1942 年 5 月，进占龙陵的日军第 56 师团长渡边正夫中将（左）与所辖第 56 步兵团长坂口静夫少将在龙陵城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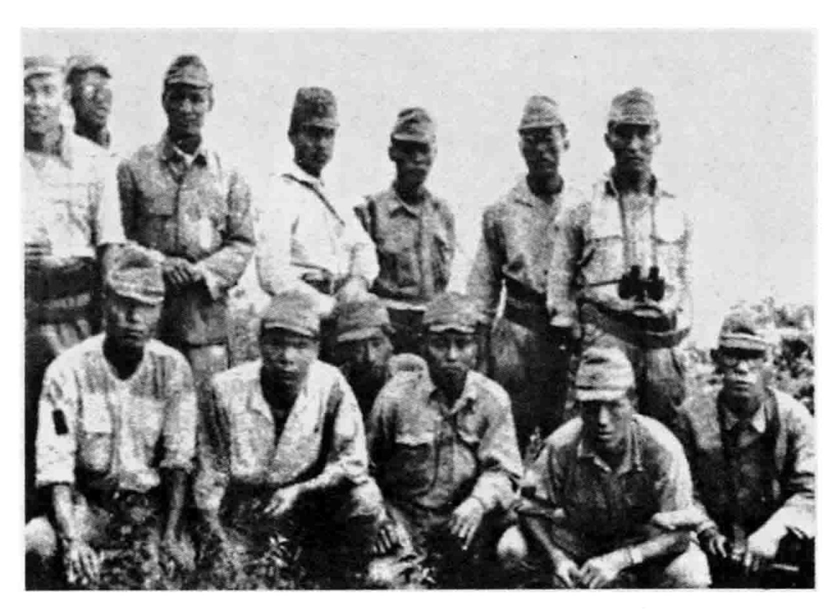


4．日军松山堡垒工事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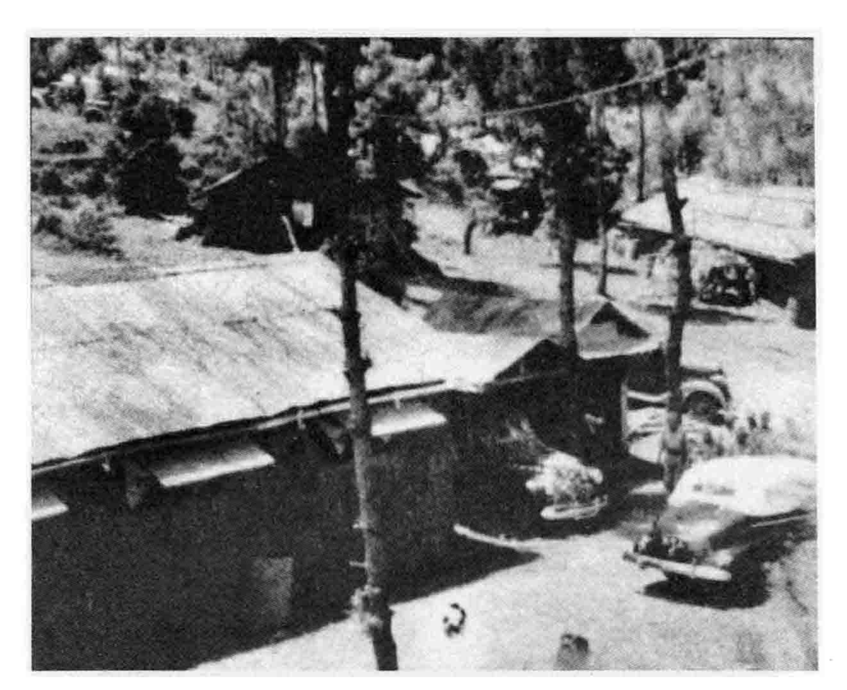
5．1942 年 6 月，日军野炮第 56 联队第 1 大队第 2 中队在松山 3 号高地（日军西山阵地）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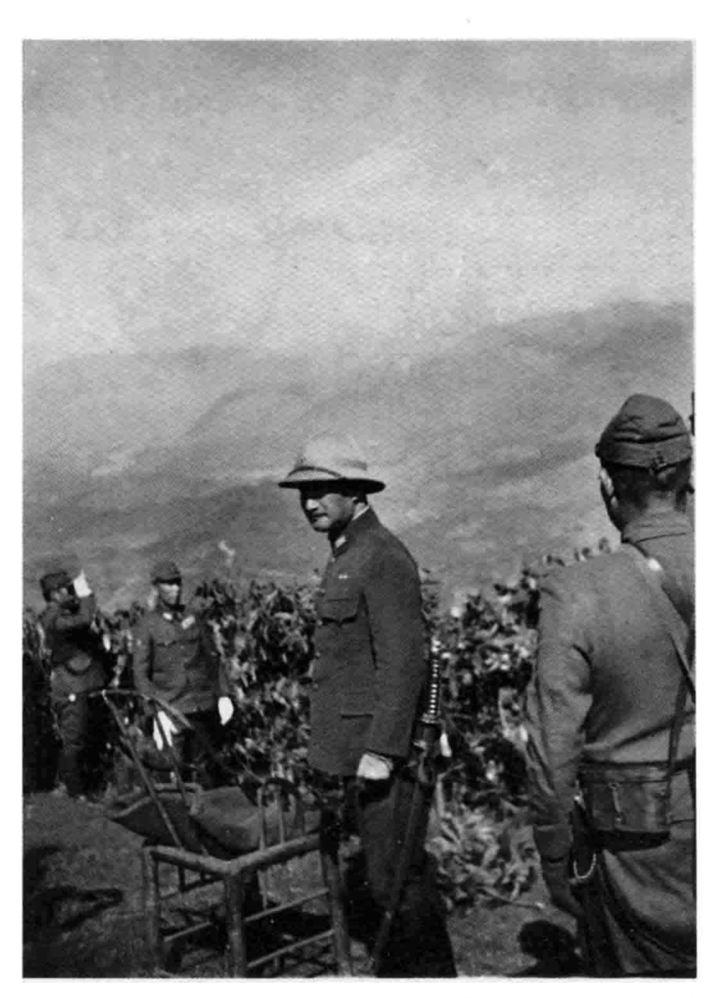
6. 1942年6月，日军野炮第56联队第3大队第7中队军官合影，这些人中仅一人负伤生还，其余均毙命于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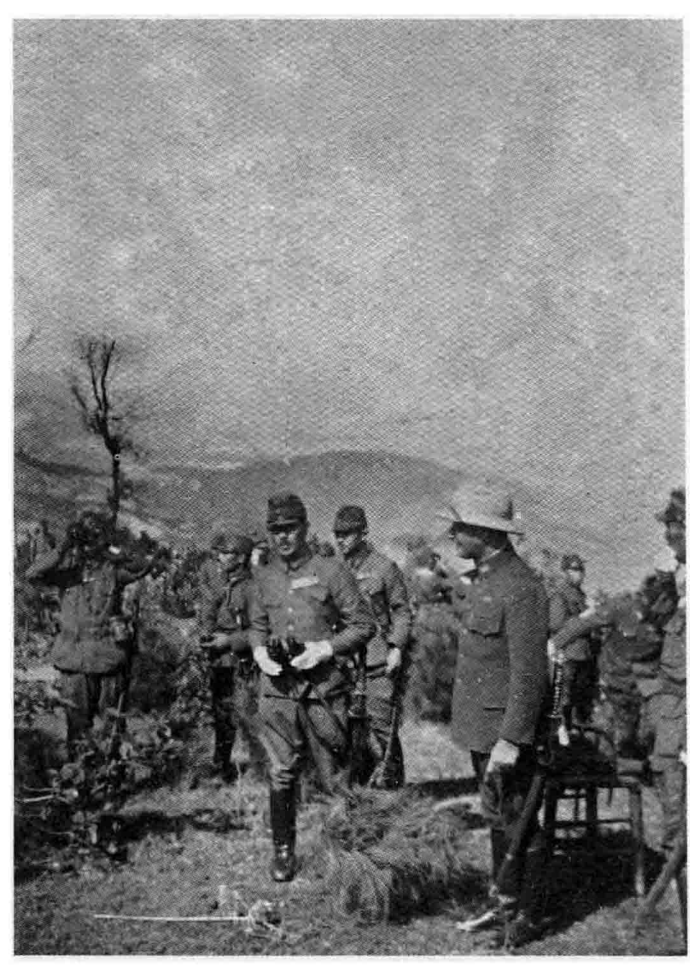
7. 1942年6月，进占松山的日军第113联队第1大队步兵炮小队老兵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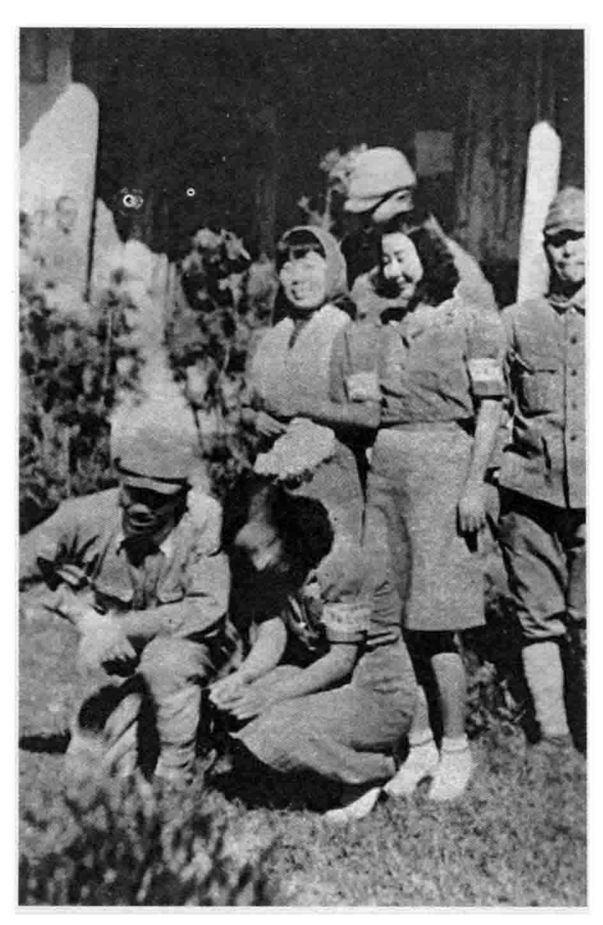
8．位于松山黄家水井的日军第 113 联队长宿舍，其座车战后被第 8 军缴获。



9. 1942年秋，日本南方军总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视察松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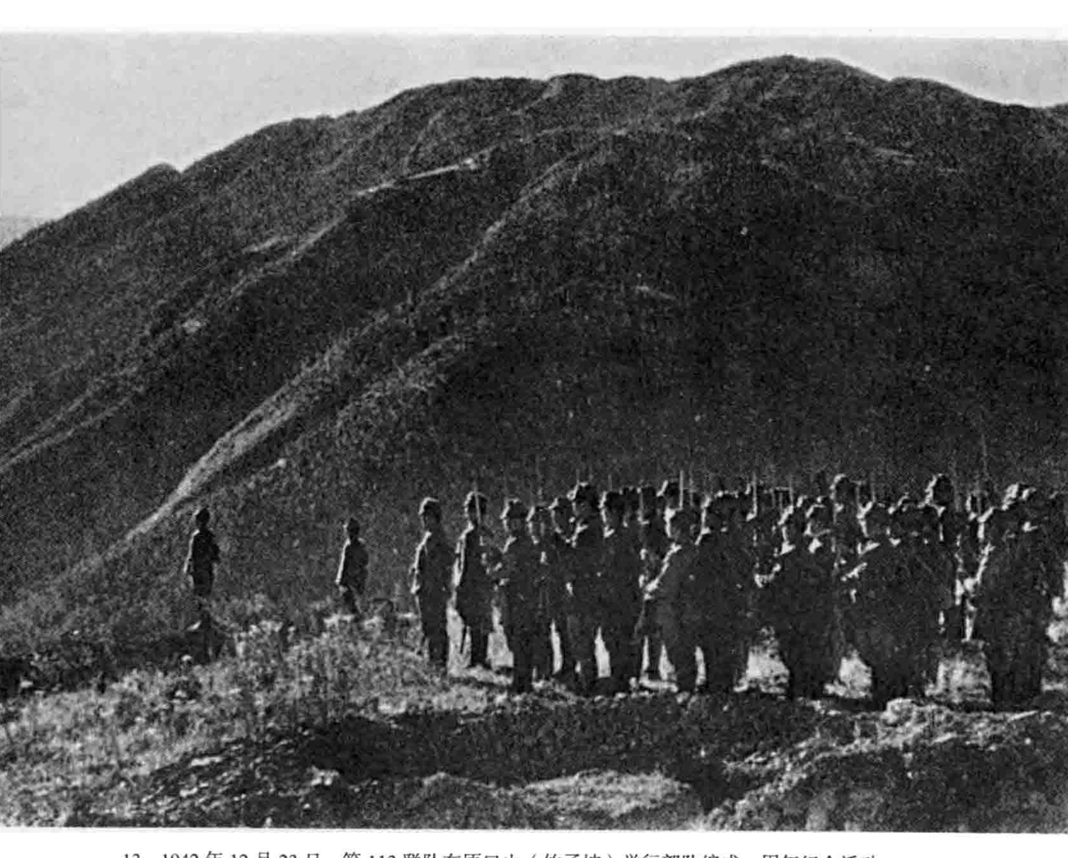
10．1942 年秋，陪同寺内寿一视察松山的第 56 师团长松山祐三中将。从地貌判断，此处为日军西山阵地。



11．1942 年 11 月，由 NHK 组织日本知名作曲家古关裕而、歌星奥山彩子等成员参加的慰问团，不远万里来到松山为日军拉孟守备队打气鼓劲。



12．1942 年 12 月 8 日，第 113 联队长松井秀治大佐率部在阴登山举行“大诏奉戴日”（裕仁天皇颁布对美英宣战诏书日）训话。



13. 1942 年 12 月 23 日，第 113 联队在原口山（竹子坡）举行部队编成一周年纪念活动。



14．1943 年 1 月 1 日，松山日军在西山阵地举行元旦遥拜仪式。



15．步兵第 4 中队长辻义夫大尉（右三）陪同日本朝日新闻社记者野村正男（右一）经松山东侧公路前往惠通桥视察，远景可见怒江对岸的“钵卷山”。

16. 1943年春，野炮第3大队前任大队长菊地武宁少佐（扶军刀者）与预定要退役的部分部下合影。但因为后来战事变化，这些人均毙命于我军反攻。



17. 野炮第3大队继任大队长金光惠次郎，是出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少尉候补生第7期的“老少佐”。后担任拉孟守备队长，在我反攻中毙命于音部山阵地。



18. 1944 年初，进占松山的日军在道人坪子露天洗澡。几个月后，远征军第 8 军工兵即从此处挖掘坑道直通松山主峰，以“人造火山”爆破子高地。



19. 在隔江对峙时期，怒江东岸远征军江防部队用望远镜侦察松山敌情（照片摄于 1944 年 2 月）。



20. 1944 年 5 月 5 日，远征军渡江反攻前在怒江东岸侦察西岸日军松山阵地布防情况，此处距离松山约八九千米。



21.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上将。

22. 1944年5月29日，第11集团军自惠通桥下游以美式帆布舟渡越怒江发起反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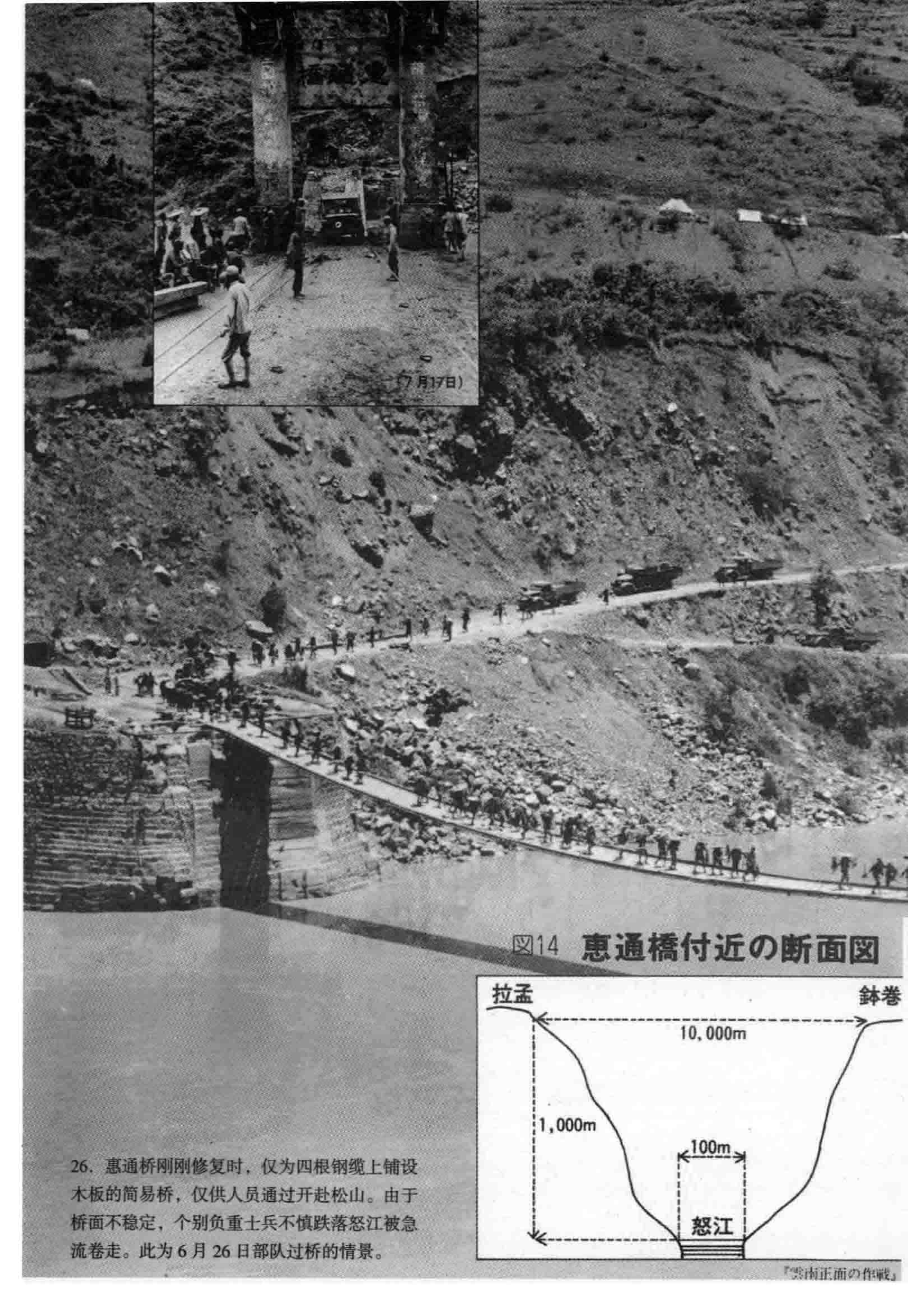
23．1944年6月，第11集团军自怒江下游渡江反攻，官兵登上美式帆布舟准备渡江。



24．1944年6月4日，卫立煌在炮兵总指挥邵百昌中将陪同下，在怒江东岸羊角峰观察第71军新28师对松山首次进攻。左一抱臂而立者，为当时尚担任江防任务的第8军军长何绍周中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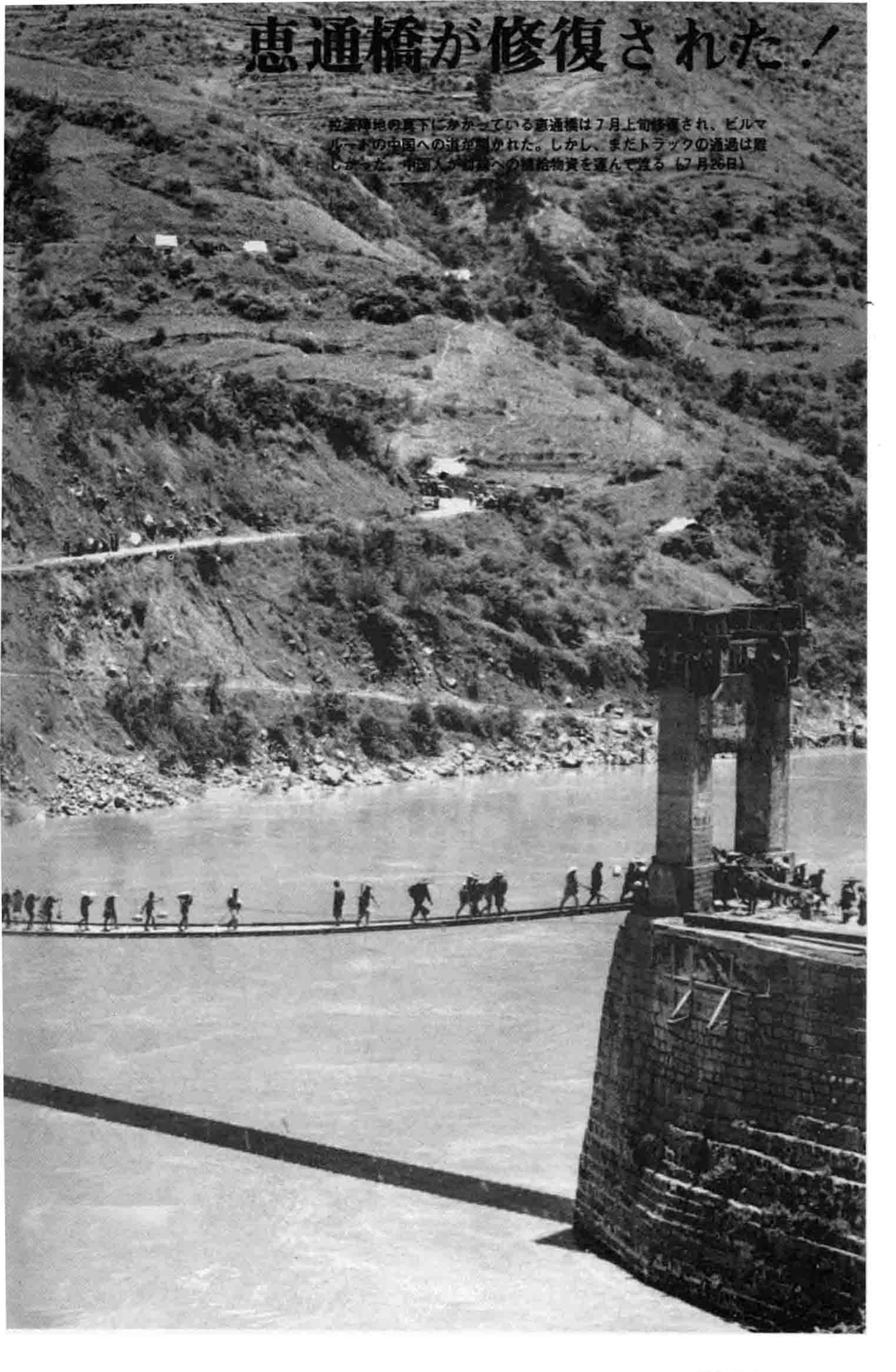


25. 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左一）与第 71 军军长钟彬（右一）在沙盘前绸缪战事。



26. 惠通桥刚刚修复时，仅为四根钢缆上铺设木板的简易桥，仅供人员通过开赴松山。由于桥面不稳定，个别负重士兵不慎跌落怒江被急流卷走。此为6月26日部队过桥的情景。

恵通橋が修復された！



拉孟陣地の真下にかかっている恵通橋は7月上旬修復され、ビルマルートの中国への道が開かれた。しかし、まだトラックの通過は難しかった。中国人が前線への補給物資を運んで渡る（7月26日）



27. 刚刚铺设完成的惠通桥便桥，这是从桥头西岸（松山一侧）眺望东岸的情景，时间应为 7 月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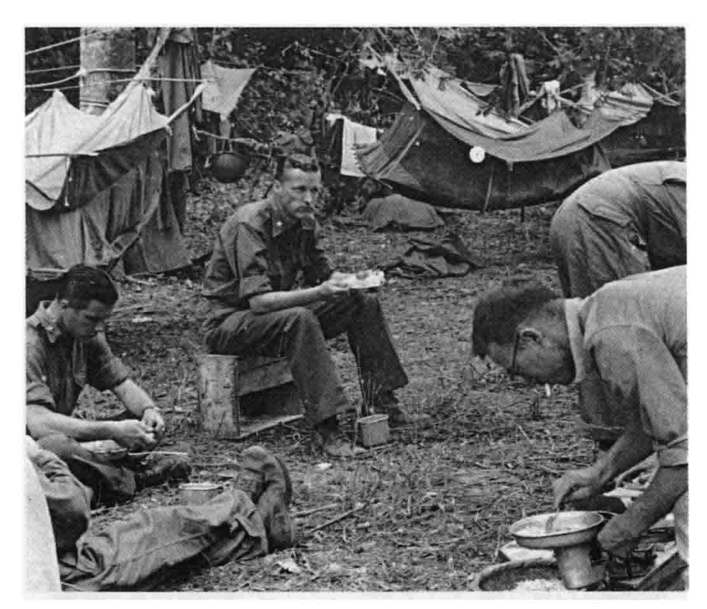
28. 惠通桥便桥铺设完成后，卫立煌在美军顾问陪同下过江视察松山前线，于7月8日返回东岸。



29. 7月8日，通过惠通桥便桥运送修桥材料的当地民夫。



30．松山战役期间，在惠通桥西桥头担任警卫的远征军士兵。从其身后搭建起的便桥判断，时间为 1944 年 7 月。



31. 7月14日，美军顾问团长（Y部队美军野战司令部参谋长）弗兰克·多恩准将（坐木箱者）和他的同僚们在怒江边的野战营地里用早餐。



32. 7月23日，第8军第103师准备向日军滚龙坡阵地发起新一轮攻击。



33．松山战役期间远征军工兵赶修惠通桥，于 1944 年 8 月 18 日竣工。水平桥面为可通行车辆的钢缆吊桥；下面的弧形桥面，为先行修复、尚未拆除的人行便桥。



34．8 月 20 日，第 8 军工兵以坑道爆破颠覆日军松山主峰子高地，从浮土中扒出 5 名被震昏的日军士兵，一名苏醒后反抗被击毙，4 名做了战俘。



35. 第 8 军攻克松山一个多月后，美军拍摄的子高地爆坑照片。（晏欢供图）

36. 9月2日，位于松山腹部、被第8军摧毁的日军第113联队本部。



37. 9月3日，被第8军占领的松山腹部的一处日军兵舍。



38. 9月3日，在松山一处阵地上，远征军抓获两名瘦骨嶙峋的日军战俘。右侧正在喝泥水的日军俘虏头上，缠着日军做护身符的“千人针”；担负看押任务的远征军士兵，手持美式M1卡宾枪，身着美式雨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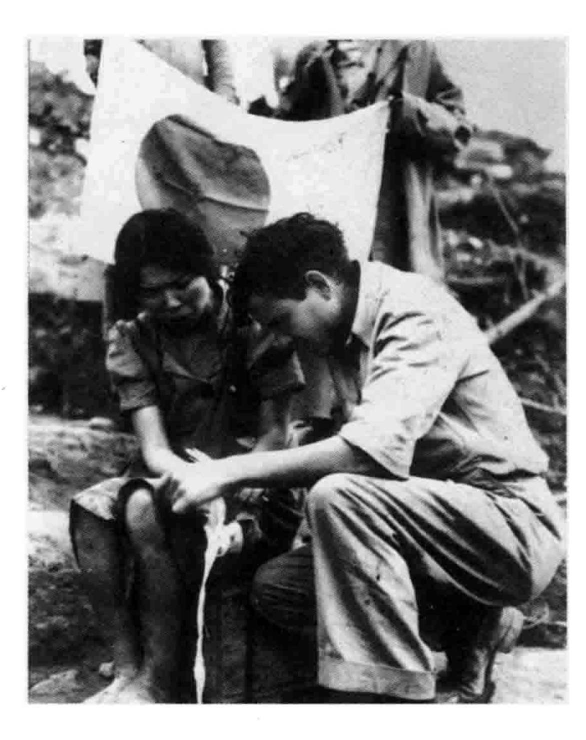
39. 9月3日，远征军在勐梅河谷地捕获4名日军慰安妇，右一为朴永心，当时已怀孕。她们身后为穿美式风雨衣、持中正式步枪的远征军士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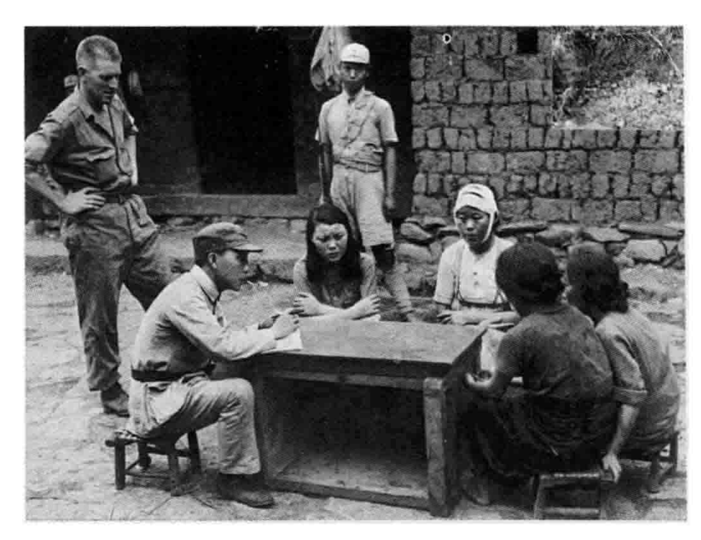
40. 第 8 军攻克松山后，发现一处堑壕内有 15 具日军尸体，其中 2 具为女性（慰安妇）。



41. 远征军发现一名落单的日籍女性，此人为慰安妇的监督者北村富子，花名“双叶”。右侧的士兵正通过电话向上级请示处理意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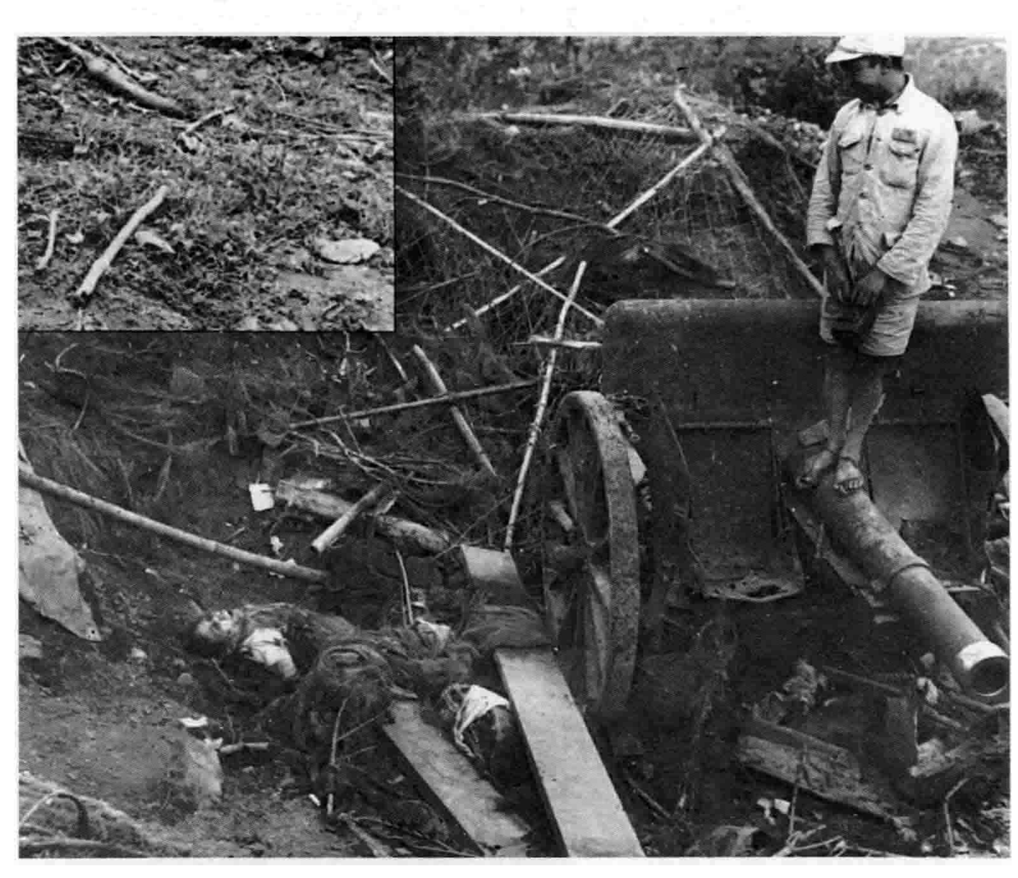
42. 攻克松山后，为慰安妇包扎伤口的美军卫生兵，背后两名远征军士兵在展示战利品日军太阳旗。



43. 远征军军官与美军顾问在腊勐街审讯被俘的日军慰安妇，这些慰安妇多数为朝鲜籍。在战斗初期，慰安妇均着日军夏季制式军服；在全军覆灭前，不少慰安妇换着裙服便衣准备寻找机会逃命。



44. 9月7日，日军全员覆没当日，一位美军士兵好奇地用缴获的日本军刀拨弄着战壕内的一具日军尸体。据活下来的早见正则辨认，此人是与自己同为真锅邦人大尉传令兵的中村种次郎上等兵。



45. 9 月 8 日，在被我攻占的一处日军九一式 105 毫米榴弹炮阵地上，一名远征军士兵正在打量躺在火炮一侧的日军尸体。



46. 9月8日，中美士兵一起展示在战斗中缴获的日军太阳旗。旗面之前，为在战斗中发挥显著作用的美式“汤姆逊”冲锋枪和美式手榴弹。



47．9月8日，一位远征军士兵在被攻克的一处日军据点发现一具日军尸体。其身背的国造中正式步枪及腰带上悬挂的刺刀，为当时一个普通士兵的基本装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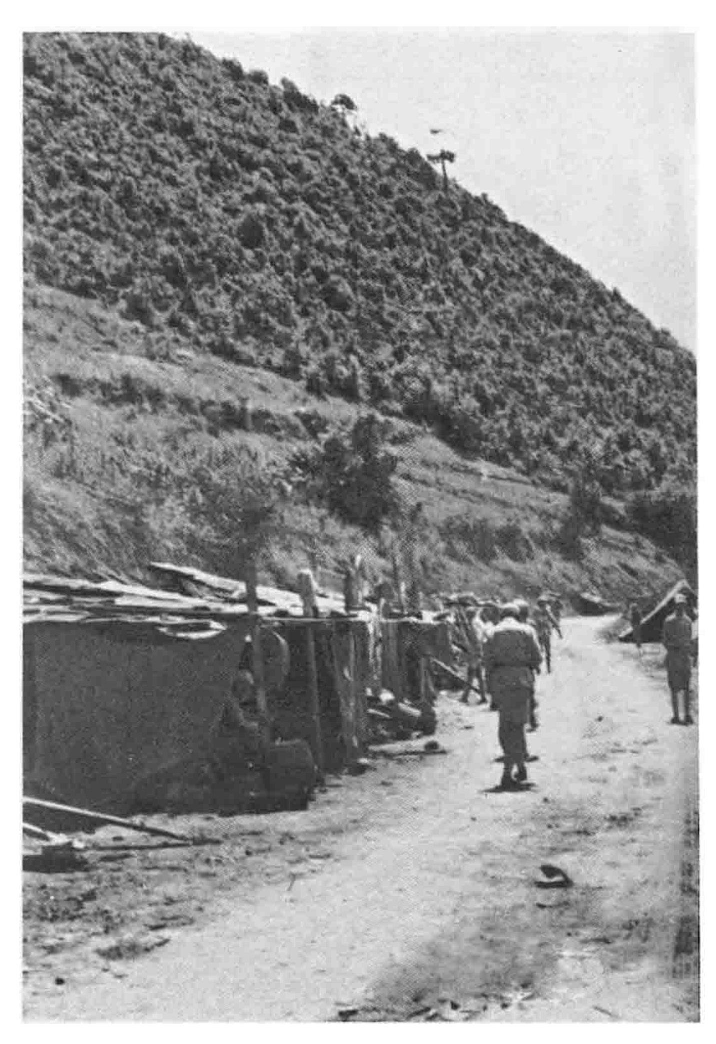
48．9月8日，日军拉孟守备队全员覆没次日的最后阵地——横股阵地（马鹿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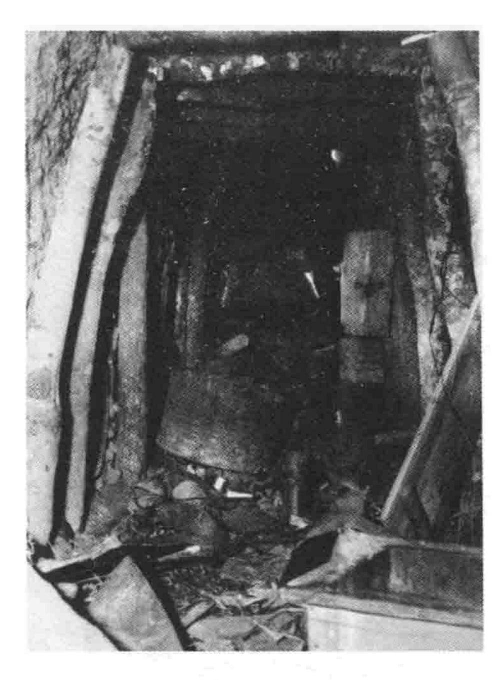
49．9月9日，被第8军攻占后的黄家水井日军野战医院（卫生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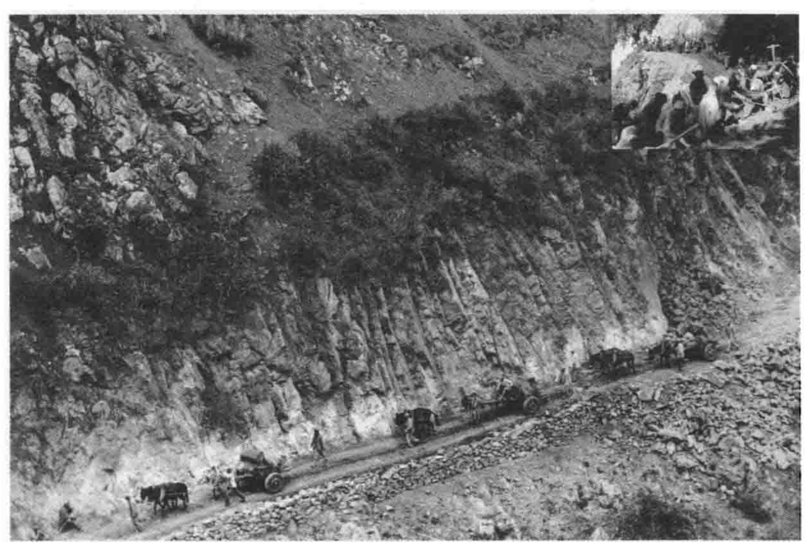
50. 9 月 10 日，我军工兵操作推土机清理松山战场。画面右侧为日军半掩埋做固定堡垒的坦克，推测此地为滇缅公路上的滚龙坡阵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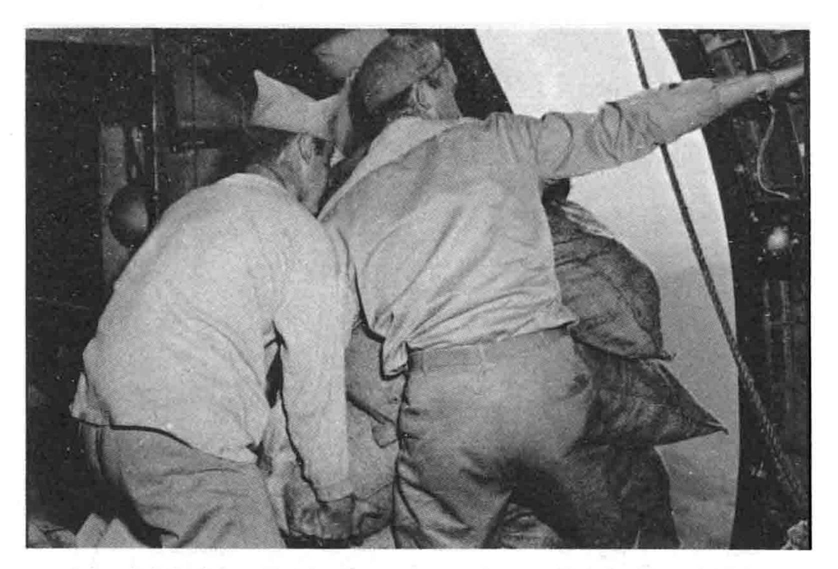
51. 9月 11 日，攻克松山 4 天后，第 8 军官兵在山脚搭设的简易棚内休整待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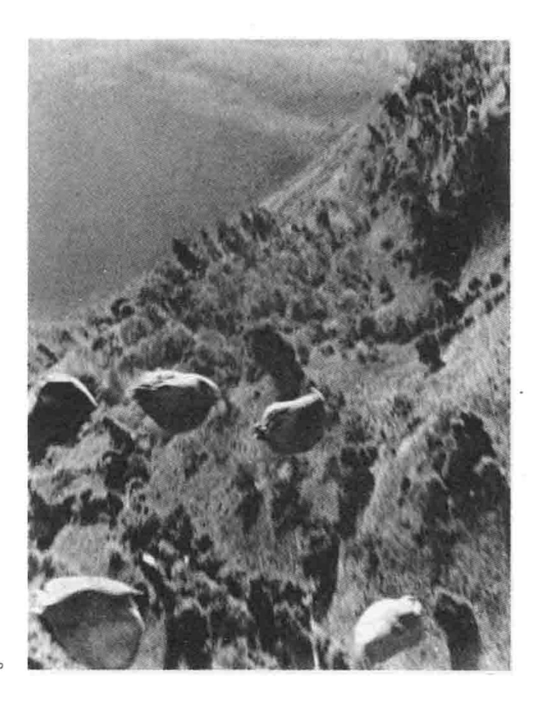
52. 以原木加固的松山日军掩蔽部内景（9 月 11 日拍摄）。



53. 滇缅公路怒江段，多为在陡峭山腰上凿刻出的狭窄路面，雨季常常因塌方而中断。图为在战役期间以骡马大车为松山战场运送粮弹的我军士兵和民夫。右上角小图，为民夫艰难修复公路的情景。



54．松山、龙陵战役期间，美军从运输机上向远征军部队空投粮食（5 月 31 日拍摄）。



55．美军空投的补给品坠落山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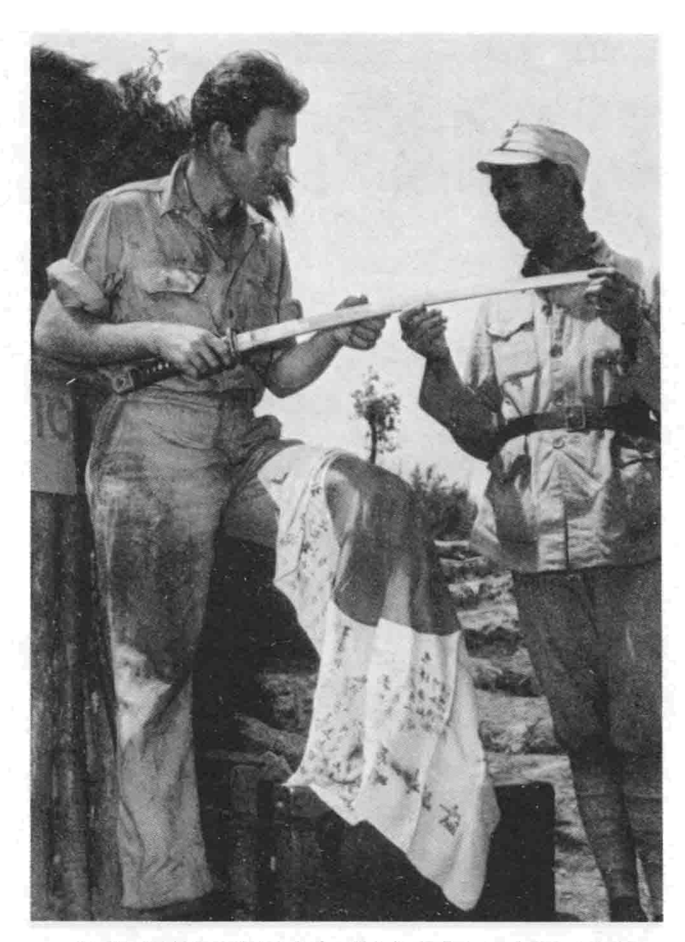
56. 在滇西战场，远征军部队有很多十四五岁的“娃娃兵”，这是战争后期因兵源匮乏而强行抓壮丁充数的结果，但很多“娃娃兵”在残酷的战场上完成了自己的成人典礼（9 月 3 日拍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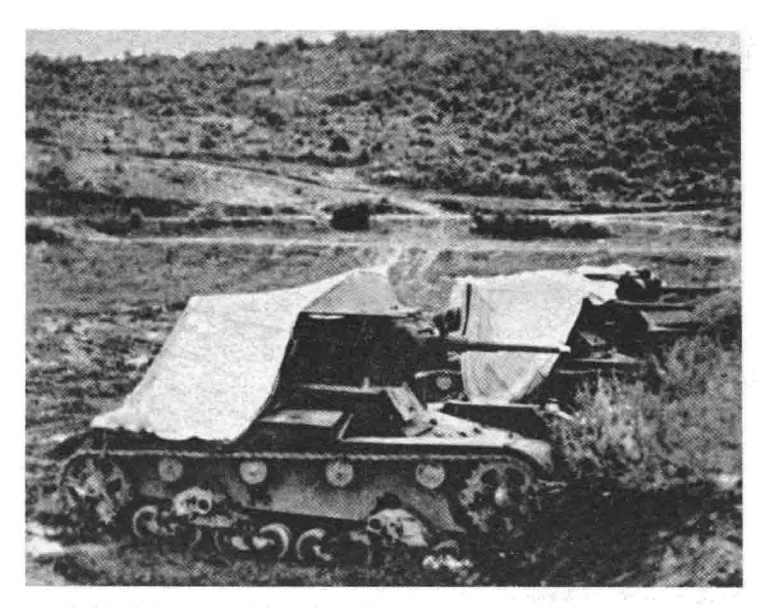
57．当时，美军照相兵曾用手持摄影机拍摄了松山战役的电影镜头。



58．在松山战役期间，设在高地上用于惠通桥等要害设施防空掩护的美式高射炮，均由美军士兵操作，击落从缅甸飞来空投补给及助战的日军战机多架（9 月 11 日拍摄）。



59. 美军顾问团的官兵普遍喜欢我军缴获的日军军刀、太阳旗之类的战利品，并愿意拿出随身物品与从火线上缴获战利品的我军士兵交换（9月11日拍摄）。



60．在滇缅公路上的日军滚龙坡阵地，停放着 1942 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溃败后遗弃的坦克。因为缺乏弹药，这些坦克后来被日军半掩埋在松山各处阵地做固定堡垒。（此图为日军方面拍摄）



61．松山外围滚龙坡阵地，日军以远征军遗弃的苏式 T–26 坦克半掩埋做固定堡垒，后被我军缴获。

主要参考文献

档案及档案汇编类

《第十一集团军民国三十一年五月五日至六月一日惠通桥腾冲龙陵地区间战役战斗详报》。

《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陆军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重庆陆军大学1947年编印。

《陆军第八军第一零三师围攻松山战斗详报》，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陆军第一零三师在滇西阵中整训日记》，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渡江初期美军顾问团长弗兰克·多恩准将报告》，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馆藏资料。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作战经过（三），秦孝仪主编，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1年出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军事（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下），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中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凤凰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日军侵华罪行实录——云南部分》，云南省档案馆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滇缅印战场实录系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江山作证》，陈祖樑主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滇缅印战场实录系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浴血怒江》，陈祖樑主编，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60周年滇缅印战场实录系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中、美、日战史

《抗日战史》第29章缅北及滇西之作战（二），胡璞玉主编，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民国五十七年十月初版。

《国民革命战史》第三部：抗日御侮1—10卷，蒋纬国总编，三军大学战史研究所编，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4月第一版。

《龙陵会战史》，钟彬著，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六十六年四月印行。

《滇西作战实录》，吴致皋著，台北文星书店，民国五十一年五月第一版。

《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方国瑜著，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第一版。

《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何应钦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2年9月出版。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吴相湘著，台湾综合月刊社，1974年2月初版。

《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中华民国史丛书之一，张宪文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郭汝瑰、黄玉章主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中国远征军战史》，徐康明著，纪念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丛书，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中缅印战场抗日战争史》，徐康明著，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

7月第一版。

《怒江战役的完成》，中国战斗司令部公关军官汇编，戈叔亚译，美国 Press Censor Goldbert 出版。

《怒江战役述要》，美国新闻处编印，1945年6月版。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缅甸作战》(上下)，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编著，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中华书局，1987年4月第一版。

日军对华作战纪要丛书《伊洛瓦底会战——缅甸防卫的失败》，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民国八十六年六月出版。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中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第一版。

《大东亚战争全史（Ⅲ)》，[日] 服部卓四郎著，台湾军事译粹社编辑室译，台湾军事译粹社，民国六十七年三月出版。

《拉孟·腾越玉砕の実相》，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云龙会"编撰，昭和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印行。

《ああ滇緬公路——ビルマ從軍》，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战友会"兴龙会"编撰，昭和五十八年七月印行。

《炮烟——龙野炮兵第五十六联队战记》，日军第56师团野炮第56联队史编辑委员会编辑，昭和五十八年七月印行。

《ビルマに云南埋もれた战史——镇安街守备队》，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第1大队第1中队战友会编辑，平成二年印行。

《兵旅の赋——北部九州乡土部队70年の足迹》第二卷昭和篇，北部乡土部队史料保存会编，昭和五十三年七月印行。

《福冈联队史》，[日] 杉江勇著，秋田书店，昭和四十九年一月二十日初版发行。

《帝国陆军の最后》1《进攻篇》，[日] 伊藤正德著，角川书店，昭和四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第三版。

《帝国陆军の最后》3《死斗篇》，[日] 伊藤正德著，角川书店，昭和四十九年二月二十日第三版。

《太平洋战争写真史——フ-コソ・云南の战い》，[日] 森山康平编著，日本池宫商会出版部，昭和五十九年六月一日初版。

《一亿人の昭和史》之《日本の战史》10太平洋战争4特别企画之拉孟·腾越守备队，每日新闻社，昭和五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华北治安战》（上下），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第一版。

《日军侵华战争》，王辅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文史资料选辑（含汇编本）

《远征印缅抗战——原国民党抗日战争亲历记》，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10月第一版。

《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抗日战争亲历记》，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7月第一版。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第一版。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一版。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第一版。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滇西抗战》，政协云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滇缅抗战亲历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一，保山地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编，1989年12月印行。

《保山地区史志文辑》抗日战争专辑之四，保山地区行政公署史志办公室编，1990年12月印行。

《德宏史志资料》第二集，德宏州志编委会办公室编，1985年印行。

《德宏史志资料》第八集，德宏史志编委会办公室编，1986年印行。

《滇西抗日战争史》，中共保山市委党史地方志工作委员会编著，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7月第一版。

《滇西抗战第一枪——纪念滇西抗战胜利60周年文史集》，中共施甸县委宣传部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年3月第一版。

保山市文史资料之滇西抗战专辑《溅血岁月》，政协保山市科教文卫体委员会编，云南民族出版社，2004年2月第一版。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5年9月印行。

《昆明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政协昆明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88年8月印行。

《抗日战争龙陵纪事》，政协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四）龙陵抗战续集，2004年10月印。

《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一）》龙陵抗日战争专辑，政协龙陵县委员会编，1999年12月印。

《松山作证》，政协云南省龙陵县委员会编，龙陵县文史资料选辑（三）龙陵抗战续集，2004年7月印。

《湖南文史资料》第26辑，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

《湘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田仲达诗文专辑），政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1992年5月印行。

亲历者撰述

《史迪威日记》，[美] 约瑟夫·史迪威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

《徐永昌日记》第六、七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七十六年六月出版。

《黄杰滇西作战日记》，黄杰著，台湾“国防部”史政局，1982年版。

《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郑洞国著，团结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7月第一版。

《滇西抗日血战写实》，陶达纲著，台湾“国防部”史政局，民国七十七年印行。

《八年抗战小史》，方诚著，新军研究社，民国三十六年再版。

《战怒江》，潘世征著，昆明扫荡报社，民国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缅甸荡寇志》，孙克刚著，时代图书公司，民国三十五年九月二十日再版。

《血路》，谭伯英等著，戈叔亚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

《中印公路是怎样打通的》，大公报小丛书第三辑，大公报馆，1945年3月出版。

《中国抗战秘闻——白修德回忆录》，[美] 白修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

《抗日名将叶佩高》，曹英哲、王楚英著，香港东方影画艺术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

《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1月第一版。

王荣年：《奋战松山的单炮敢死队》，黄埔同学会《黄埔杂志》，2007年第2期。

鲍直才：《不流血的战斗——工兵流汗克松山》，黄埔同学会《黄埔杂志》，2007年第1期。

黄天：《中国远征军松山攻坚战纪实》，《长沙统一战线》杂志，2008年第2期。

周昶：《松山主战场抗日胜利纪实》，2005年3月28日《云南日报》。

杨金继：《松山血战荣三团》：http://tanghao.spaces.live.com。

《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日] 品野实著，伍金贵、喻芳译，群众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

《拉孟——玉砕战场の证言》，[日] 太田毅著，昭和出版，1984年。

《松山——全军覆灭战场的证言》，[日] 太田毅著，伍金贵译，

云南民族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

《腾越玉碎记》，[日] 吉野孝公著，昭和五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自印本。

《一个日俘的回忆·腾越玉碎记》，[日] 吉野孝公著，金明译，1994年6月印。

《悲风ビルマ战线》，[日] 藤井重夫著，番町书房，1971年。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政协广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0年6月编印。

《冈村宁次回忆录》，[日] 稻叶正夫编，中华书局，1981年12月第一版。

《虚构的大义》，[日] 五味川纯平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3月第一版。

《诺门罕：日本第一次战败——一个原日本关东军军医的战争回忆录》，[日] 松本草平、华野合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

《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太平洋战争》，[日] 小俣行男著，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8月第一版。

《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日] 河村太美雄著，东方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

研究者著述

《史迪威资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美] 约瑟夫·史迪威等著，瞿同祖编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中华书局，1978年2月印刷。

《史迪威事件》，梁敬錞著，商务印书馆，1973年5月第一版。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美] 芭芭拉·塔奇曼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9月第一版。

《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1925—1945》，[英] 方德万著，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一版。

《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美] 迈克尔·沙勒著，商务

印书馆，1982年7月第一版。

《日本帝国的衰亡》（下），[美] 约翰·托兰著，新华出版社，1982年7月第一版。

《中国抗战画史》，曹聚仁、舒宗侨编著，联合画报社，1947年出版。

《太平洋战场的较量（中）——远征军》，[美] 唐·莫泽、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刘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海南出版社出版，2005年5月第一版。

《滇缅公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的壮丽史诗》，[美] 多诺万·韦伯斯特著，朱靖江译，作家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李辉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陈纳德与飞虎队——独行其是的战争》，[美] 杜安·舒尔茨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第一版。

《从重庆通往伦敦、东京、广岛的道路——"二战"时期的战略大轰炸》，[日] 前田哲男著，中华书局，2007年8月第一版。

《自我认同感与战争——关于战争期间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日] 山田正行著，刘燕子、胡慧敏译，昆仑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无约束的日本》，[美] 约翰·内森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一版。

《回忆卫立煌先生》，赵荣生著，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第一版。

《卫立煌将军》，卫道然著，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一版。

《爱国将领卫立煌》，方知今著，华文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

《何应钦大传》，李仲明著，团结出版社，2008年10月第一版。

《萧毅肃将军轶事》，萧慧麟编著，香港书香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

《血雾迷盲——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陈祖樑编著，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

《东方诺曼底之战——滇西缅北战役》，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腾越文化研究会编，张志芳主编，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一版。

《极边第一城的血色记忆：腾冲抗战见证录》(上下)，中共腾冲县委宣传部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 12 月第一版。

《寻找英雄——抗日战争之民间调查》，陈真主编，田川、林平芳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6 月第一版。

《援华抗日的美国飞虎队》，彭光谦、彭训厚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一版。

《远征路上话今昔——中国远征军老兵在缅甸》，禹志云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年 7 月第一版。

《战场の慰安妇——拉孟全灭战を生き延びた朴永心の轨迹》，[日]西野瑠美子著，明石书店，2003 年出版。

《追索——朝鲜“慰安妇”朴永心和她的姐妹们》，苏智良、陈丽菲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年 8 月出版。

《军国幕僚》，俞天任著，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年 3 月第一版。

《昭和史の军人たち》，[日] 秦郁彦著，日本文艺春秋社，昭和五十七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一刷。

《菊と龍：祖国への栄光の戦い》，[日] 相良俊辅著，光人社，1972 年印行。

《壮烈 拉孟守备队：玉砕に殉じた日本军将兵の记录》，[日] 楳本捨三著，光人社，2003 年 8 月印行。

《日本军队用语集》，[日] 寺田近雄著，日本立风书房，1992 年版。

《日军战术特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训练研究部外军教研室编写，(62) 军教字第 80 号，1962 年 2 月 20 日出版。

论文类

《滇西抗战论文集》，多守业主编，德宏民族出版社，1999 年 3 月第一版。

《滇缅抗战论文集》，傅宗明、林超民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

《纪念滇西抗战60周年文集》，保山市政协编，2005年第一版。

《滇西抗战史证》，耿德铭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一版。

《滇西抗战史论》，何光文著，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

《中日战争国际共同研究之二——战略与历次战役》，杨天石、臧运祜等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月第一版。

报刊网站报道

《慰安妇为历史作证》，戈叔亚、西野瑠美子、朱弘、熊维元等撰文，《华夏人文地理》杂志，2004年4月号。

《寻找少校麦姆瑞》，孙敏、章东磐、江汶等撰文，《华夏人文地理》杂志，2004年5月号。

《大国伤心地》，邓康延撰文，《凤凰周刊》杂志，2005年第18期。

《攻陷东方马奇诺》，邢立达撰文，《博物》杂志，2005年第8期。

《怒江：愤怒之河》，孙敏撰文，《中国国家地理》杂志，2005年第8期特别策划“山河抗战”。

《血战中国天空——“二战”时期美国援华空军的战斗》，《环球飞行》杂志，2005年第9期。

《抗日名将陈明仁的戎马一生》，于冠礼撰文，《文史春秋》杂志，2005年第11期。

《救助抗日老兵》，周丽娜撰文，《中国新闻周刊》杂志，2007年第42期。

《抗战时期贵州役政之初探》，莫子刚撰文，《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08年第4期。

《松山：八千贵州男儿血——第8军103师老兵谭祖幼的抗战回忆》，周渝撰文，《贵阳文史》杂志，2012年第6期。

《松山坑道大爆破的历史真相》，刘秀麟、宦国铎撰文，《贵州文

史丛刊》杂志，2013 年第 2 期。

《朝鲜慰安妇云南指认铁证如山》，张臻、段毅撰文，2004 年 1 月 2 日《春城晚报》。

《松山旧图藏灭寇战讯》，莲子撰文，2005 年 5 月 21 日香港《文汇报》。

《论中国远征军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局的影响》，倪乐雄撰文，2005 年 6 月 14 日《文汇报》。

《血战松山 三吨炸药炸飞山头》，罗磊、颜乔撰文，2005 年 6 月 18 日《重庆商报》。

《松山血战亲历者诉说——异国的鬼》，王蓉撰文，2005 年 8 月 7 日《重庆晚报》。

《抗日老兵林峰：松山战役后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王雷撰文，2005 年 8 月 8 日《南方都市报》。

《林峰：松山战役后，山上没剩一根草，一棵树》，王雷撰文，2005 年 8 月 12 日《南方都市报》。

《主动请缨两赴缅甸抗日 战士被蚂蟥吸干血》，申重重撰文，2005 年 8 月 17 日《华商报》。

《松山只剩下两棵树》，胡印斌撰文，2005 年 8 月 30 日《燕赵都市报》。

《加强连“连长”——滇西抗战纪事》，彭荆风撰文，2005 年 9 月 8 日《天津日报》。

《川军南征万名重庆勇士血战滇缅》，张卫、丁香乐撰文，2008 年 7 月 8 日《重庆晚报》。

《我们没有忘记，从广西走出去的中国远征军》第三章滇西溃败⑤，卢大清、钟亮、莫仁力撰文，2012 年 8 月 25 日《南国早报》。

《怒江大峡谷纪行》，曹光撰文，《日本新华侨报》文章，转自日本新华侨网：

http://www.jnocnews.jp/news/show.aspx?id=5219

《日本老兵来滇收集日军遗骨未得逞——陈女士讲述 17 年前的故事》，陈晓耘、黄维、赵学康撰文，《春城晚报》文章，据云南日报网：

http://paper.yunnan.cn/html/20050804/news_86_323998.html

戈叔亚新浪博客有关滇缅战史的系列文章：

http://blog.sina.com.cn/s/indexlist_1302207690_4.html

戈叔亚凤凰网博客有关美军松山战役记录、松山战场田野调查的系列文章：

http://blog.ifeng.com/1814067.html

萨苏新浪博客文章《松山日军守备司令之死的考证——回王外马甲〈战地蒲公英〉题》：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00at7.html

《反攻滇缅路的龙陵战役》，胡薛军撰文，黄埔军校网：

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yzjwsg0013.html

《鲜血铸就的远征——发现老兵刘俊贤》，邓果撰文，关爱抗战老兵网：

http://www.ilaobing.com/forum.php?mod=viewthread&ordertype=1&tid=25475

《云南省龙陵县发现侵华日军遗骨遗物》，方军撰文，人民网日本版：

http://japan.people.com.cn/2002/7/22/2002722112601.htm

《我们为何搜寻“飞虎队”美机残骸——访探险家严江征》，人民网：

http://www.people.com.cn/GB/junshi/192/9164/9167/20021014/841849.html

《中国远征军老兵讲述战火亲历：血色满滇西》，黄怡撰文，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6/3611808.html

《抗战名将——李弥》，新华网：

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8-04/07/content_7933869.htm

《今古一相接 长歌怀旧游——抗日名将成刚之子成彦邦先生访松山抗战遗址》，云南日报网：http://paper.yunnan.cn/html/20060126/news_88_897871.html

《从台湾回来的远征军老兵》，陈秀峰撰文，云南政协网：

http://www.ynzxb.cn/2007/10-31/11032568838.htm
《抗日将领陈永思》，汪德仲撰文，贵州政协报网：
http://www.gzzxb.com/tzzx_new.aspx?id=9474
《抗战时期的李弥将军》，张方元撰文，德宏州政府网：
http://dehong.yunnan.cn/255/2006/11/15/37@1689.htm
《"东方直布罗陀"的累累白骨——血战松山》，杨刚撰文，云南施甸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ynsd.gov.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07

纪实文学类

《缅甸，中日大角逐》，陈立人著，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 年 7 月第一版。
《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印纪实》，方知今著，作家出版社，1991 年 4 月第一版。
《大国之魂——中国远征军滇缅征战纪实》，邓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年 10 月第一版。
《松山大战》，段培东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10 月第一版。
《落日》，邓贤著，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 年 5 月第一版。
《血战滇缅印：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实》，方知今著，解放军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一版。
《大战场　小细节》，许敏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7 月第一版。
《挥戈落日——中国远征军滇西大战》，彭荆风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年 8 月第一版。
《中国远征军血战滇缅实录》，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系列节目丛书，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 年 11 月第一版。
《战场上的蒲公英》，王外马甲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年 6 月第一版。
《父亲的战场——中国远征军滇西抗战田野调查笔记》，章东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 年 7 月第一版。

后 记

1

笔者是一家军队杂志的编辑，关注和研究抗战史是几年来的业余爱好。像我这样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男性，从小就被“打鬼子”的老电影所熏染，心灵深处早就埋下了一种“抗战情结”。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在近一百年里，屡遭列强蹂躏的中国人，第一次打败了欺侮我们最狠的一个外国，抗战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个体，都有一种精神拯救的意义。”

最初，我的兴趣是收藏抗战主题的军品，特别是日军投降后遗留在国内的玩意儿。我认为这些东西是广义上的战利品。对军人而言，有什么能比把玩战利品更能表达胜利者的愉悦与自豪呢？既然出生太晚没能为抗战效力，那么就以收藏研究的方式来感受先辈创造的历史荣光吧。七八年之后，我收藏的战利品就摆了满满一屋子，成了一间家庭抗战陈列室，藏品中还有一两件够得上一级文物的东西，比如南京大屠杀主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中将所写的一幅中堂，内容为“踊跃破南京城”；而据此所写的数十篇文章，也时时见诸报刊与网络，并引来一些电视媒体朋友登门来做节目。

唐人杜牧有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我以为，杜牧在磨洗、把玩折戟的一刻与我是同道，我们都是在“磨洗”而“认”中品味历史的沧桑。因为手里的物品直接浸染着历史的烟火和血迹，其感触来得直观、细腻而强烈。

由“藏品”进而追求“藏识”，我又踏访了不少抗战遗址遗存。从平型关、黄土岭、东团堡、台儿庄、昆仑关、淞沪、衡阳、长沙，直到滇西的松山、龙陵、腾冲。起初，我以为经过几十载岁

月，那种置身现场的历史感怀早已被前行者“打捞”干净了，我这个晚来者顶多是印证一下别人的心情，就像初到一个旅游点被导游员按套路化的导游词“忽悠”一样。然而，还真不是如此。有心者与无心者不一样，有准备者与无准备者不一样，来的人和来的人也就不一样。

我看到不少新鲜的东西。在松山，这种感觉来得尤其强烈。

公元2004年9月15日的晚饭，我是在龙陵县腊勐乡腊勐村吃的。听说县里的领导陪着北京的记者来访，五十多岁的老村长从村委会后院捉了两只乌骨鸡宰了，与土豆一起炖了一搪瓷脸盆端了上来。酒是当地产的烈性烧酒，话题自然是60年前的那场战争。昏黄的白炽灯下人影朦胧，一扭头就看见墙角散陈着近些年村民在山里劳作时挖出来的锈迹斑斑的各式炮弹。而我们吃饭的这间屋子，就是当年第8军军长何绍周的前进指挥所。

酒话均过三巡之后，老村长捧着一杯酒踉跄着绕过矮桌要来敬我们。我们赶紧站起身迎上去，尚未听清楚他方言浓重的祝词，就见他一扬脖干掉了满满一玻璃杯！我们也忙晕乎着把酒灌了下去。这时就见老头忽地一下直挺挺地往后倒去，幸亏身边的人扶得及时，他才没有重重地砸在地上。

直到今天，我都没弄明白老头何以那样激动。是为了几个北京人居然知道自己的偏僻小村曾经发生过那样的大事而感动吗？但以他的年纪，60年前可能还没出生，那些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也许，是当时我们所谈论的话题血腥气太重，在烧酒所氤氲的神秘气场里，在那一刻制造了类似战场的幻觉，而我们都像当年的远征军老兵一样产生了莫名的亢奋和冲动。松山一带的村民常说黄昏阴雨天能听到山谷里有喊杀声和枪炮声回荡，那些聚拢在这个山洼的七千多英魂就不会给我们这些千里迢迢来探望的人某种感应吗？何况傍晚时分我们才用同样的烧酒祭奠过埋在不远处山坡上的第103师的老兵们！

回到北京很久，这个晚上的情景都萦绕在脑海里，要为松山战役写一本书的念头也就萌生了。某一夜，灯下翻看品野实的《中日拉孟决战揭秘——异国的鬼》，一行跃入眼帘的文字更是刺激得我无法安宁。

他写道："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一直在反复整理拉孟战史……天长日久，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们的面容，可片刻之后又倏然消失，只有一群敌人围在我的面前，向我喷射出无数的光和热，我被燃烧了！当我感到夜色已深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要写的不是已经写完了吗？"

我从中体味到这个拉孟守备队补充兵的真实心境——尽管他在书中不断反思着战争的罪恶与灾难，但是他对战争责任的归因和批评锋芒，仅仅指向所谓军队高层将校和"无谋"的参谋；而对那些在第一线犯下了无数战争罪行的下层官兵、他那些未曾谋面的"战友"，则寄予了无限理解和同情，他无法忍受他们被埋没荒草。这正是品野实从每日新闻社退休后，将后半生全部精力投入此事的情感支撑点。后来，他作品书名中"异国的鬼"这一概念，已经成为日本公众关于历史记忆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词语，其语义更多的是对惨败战事的幽怨，而非对战争责任的反思。但是，他关于"真实的战况，只有听老兵们的讲述才能知道"的感慨，我则牢牢记在了心里。我就想，好吧，你是写完了，现在该轮到抗战老兵后人、现役中国军队记者余戈来还愿了。我眼前浮现的，则是背负火焰喷射器跃出战壕向鬼子们喷出无数光和热的那些远征军的士兵们。

2

因为公务繁忙，写作的过程拖得很长。此外，琢磨怎样写的问题也颇费了些时日。我没有可能亲自采访到那么多战争亲历者，在很长时间内他们被世人遗忘了，待公众刚刚对那段往事产生兴趣时，他们的生命又渐行渐远。而以战史脉络为线索进行虚构创作，既非我所长，更非我所愿。笔者一直认为，正是《三国演义》之类"经典"的熏陶，使中国人面对历史时有一种"演义化"的心理惯性，真实的经验总是被遮蔽在自慰式的阅读快感背后，"读史使人明智"的预期往往落空。于是，我将作品定位为"私家战史笔记"，想老老实实地依据历史文献和个人口述资料，以个人的考证和分析写出类似于战史实录的文本。文学评论家周政保先生在其《非虚构叙述形态》一书中，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操作规范性，"报告"与"文学"何为根本

的论述，在我心里产生了很大影响。我感到，这些年看到国内很多贴着“纪实”标签的文字，都有意无意地忽悠了读者，在“非虚构”创作领域仍然存在缺乏观念引导和文体自律等问题。我觉得，即便从最底线来讲，能写出一份能让人做资料的“报告”，也是有价值的。确定以“日记体”的结构方式，则是受益于我的同事、著有淮海战役纪实三部曲的梁粱先生的点拨，他说：松山战役不就打了九十多天吗，你先把每天发生的事情梳理出来看看。在此基础上，对那些与战争进程相关的延伸性背景，我以插入专题文章的方式做了处理。而在叙述微观战况演进中，著有《远东 朝鲜战争》的作家王树增的一个创作经验，对我影响深刻。他说，他在写我志愿军某个连队进攻一个山头时，同时要知道防守这个山头的美军是哪支部队，指挥官为何人。也许，让战争双方当事人坐在一起推演昔日战事，永远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尽可能找到交战双方的官方战史和个人“战记”进行比对，绝对是一件有意义且有趣味的事。搞收藏的经验，让我在查寻资料方面颇有心得，只要看看我开列出的参考书目就可以知道，它们摞起来约有两米高。到这时候，你会看到交战各方对某段史实的夸大或缩小，看到彼此讲述的侧重点，因而你会明晰他们如此讲述的动机——这就是俗话所说的“旁观者清”吧。如果能做到这样，尽管面对的是60年前的旧事，你仍然会觉得自己反倒比当事人还明白其原委，能订正其某些有意无意的笔误和口误，历史的某个小秘密居然被你一个后来人洞悉了，这是多么爽的体验啊！

当然，我所说的是一种理想境界。对于历史，我们所知道的永远比发生过的要少，何况还在流传过程中存在那么多的遮蔽、过滤与矫饰，能无限趋近于客观真实，就相当不容易了。在这里，我还真不怕别人说我搞得过细，因为对于习惯于在“定性”后“概而言之”的国人来讲，也许缺少的恰恰是这种注重细节、不厌其烦的“琐碎”，而我一直感到中国缺少的正是这种“微观战史”。

3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一个国家完成现代化之特征，是实现整

个社会的“数目字的管理”。以这一视角来观察，国内历史文献资料的保留存档，确实呈现出“农业社会”所特有的粗放式、粗线条、大而化之的色彩。仅举一例：笔者经过对第8军司令部参谋处编撰的《第八军围攻松山战史》中的附件参战人员和伤亡统计表进行逐一核算，发现士兵负伤一栏的合计数字，竟然漏算了整整1000人。须知，这份资料是进入官方军事档案的“源头”资料，因了这个被“污染”的源头，使得历史“下游”的研究征引都不过是以讹传讹！

为本书搜集材料的过程中，笔者还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国内的“低端”历史文献实在是太贫乏了。这使得国内的军史、战史著述多数都是宏观的综述和总论，偏重于从政治、外交和战略角度叙事，仿佛政治路线、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历史结局即为命中定数；而关于一线战壕里浴血拼杀的记录，只是可有可无的边角料，难以进入历史研究者的大雅之堂。难道不是由漫长的城市巷战构成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了“二战”历史的转折点吗？但就在苏德两军长达一年的厮杀中，曾出现过多少次可能完全改写胜败结局的战场变数！基于对这一问题观念的不同，西方史学界普遍对有关军事、战争的细部问题格外重视。仅以“顾问团”和少量作战部队投入滇缅战事的美军，在战后编撰的中缅印战区战史，如今竟成为关于这段历史最翔实、最重要的史料。战后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撰的战史丛书，关于滇缅战事的记述常常具体到一个中队的行动，显然得益于拥有较完备的部队阵中日志、战斗详报等资料，而它竟然是由一支被打得溃不成军的败军保留下来的。日本学者山田正行在其《自我认同感与战争——战争期间中国滇西地区的心理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及自己在本国获得的历史文献罗列了数十种，在中国的搜寻却为数寥寥，只好如此解释：“那是因为出现了上述斗争和混乱（指国共内战、大跃进、反右、“文革”等），存在着整理抗日战争文献记录困难的状况”，对比之下着实令人感到窘迫。即便在军事题材“纪实文学”创作领域，国内又何曾有人下过美国作家科尼利厄斯·瑞恩在其“二战”纪实三部曲《最长的一日》、《遥远的桥》、《最后一役》中所下的调查采访功夫。瑞恩及著有《日本帝国的衰亡》、《最后一百天》等战史作品的约翰·托兰，常常不按传统史学规范注出

材料出处，那是因为他们不但是所写战事的亲历者，而且主要素材为亲自采访所得。国内的战争影视创作者，也很难想象《拯救大兵瑞恩》、《兄弟连》、《硫磺岛家书》这样的战争影片，有着怎样扎实的真实历史素材作为依据。

试想，如果国内的战争幸存者都能像日本老兵那样有条件出版个人的“战记”，我们的军史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无名英雄”？我们的军事题材创作怎么会总把“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当成了经验？其实，如果你真的了解到那些真实的“小事”，马上会为自己编造出来的“细节”脸红。因为笔者将写作定位于“微观战史”，这无疑设置了一种颇具挑战性的难度：首先，我已经不可能像科尼利厄斯·瑞恩、约翰·托兰那样直接采访每一位战争亲历者，所寻访到的极少数仍健在人世的老兵，能脉络清晰地陈述往事者寥寥，情形令人心痛（**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后有价值的抗战口述史作品已几无面世可能**）；其次，那些统帅日记、将领回忆之类的高端文献中，又极难看到黄仁宇先生所说的“营以下行动”的踪影；再次，即便在档案馆查到作战部队的原始战况资料，叙事也过于简略，基本没有关于人物的情况。仅仅记述战事流程，无疑是非常枯燥、无法引起非军事专业背景的读者的兴趣的（**实际上，虽经笔者付出了相当努力，本书仍存在这样的遗憾**）。

基于这一现实，研究者若想挖掘到历史的微观层面，与其征引数量甚少、线条过粗的“高端”文献，莫如下大力气搜寻散落民间的“低端”文献，做类似史料“拓荒”的工作。我认识的戈叔亚和方军都是这样的人，前者自80年代开始对滇缅战场做田野调查，光是松山就去过不下30次；后者自10年前开始寻访见证抗日战争的“最后一批人”，已出版口述史作品不下3种。所以，读者将不难理解我对上世纪50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直接关怀下，由全国各级政协进行的文史资料征集、编撰工作的特别的感念之情，那是官方组织的一次大规模历史“拓荒”，它为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保存下了大量由亲历、亲见、亲闻者撰写的第一手史料，且有着大量的事件、人物细节。也许这些基本呈现出“低端”色彩的史料，有其杂芜、错漏、小视角的一面，且很多都属于非正式出版物；但是当我们将视线从

统帅人物的办公桌转向一次战役、战斗的前沿战壕，所能依赖的只能是它们，需要我们付出的劳动则是甄别、校订等细致的技术工作。同时，我也深深地感谢多年来由各地报刊利用抗战胜利纪念契机对那些抗战老兵所做的寻访报道，以及近年来网络媒体上的“军事发烧友”们对于历史细节无微不至的挖掘探索。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很多努力比那些吃专业饭的人更逼近历史真相。为此，我恳请有缘看到此书且对这段历史感兴趣的同道者，特别是仍健在人世的滇缅战场参战将士及其后人，能向我指出文中的错漏之处，告诉我您所了解的新鲜资料，让我们一道来做这个“无限趋近于历史真实”的工作。我的电子邮箱为：laoyuge@sina.com。

我要诚挚地感谢为本书作序的朱增泉、乔良两位将军，他们是我所仰慕的重量级军旅作家。特别是乔良的《超限战》和朱增泉的《观战笔记》，是带给我以启迪和引领感的作品，我从中感受到现代职业军人意识和情怀对于一般“文人文事”的超越感，那是令我向往的“以笔为剑”式的写作。朱将军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南部边境战争中担任军级指挥员，乔将军曾以专职作家身份亲临前线采访体验生活。我将请他们为序，视为请求所敬重的师长对自己的军事“沙盘作业”做队前讲评。

4

在本书付梓之际，除了以上提到的启迪者，我还要感谢以下亲朋挚友：

武警保山医院政治处原副主任温文来少校，是他挑选了经验丰富的老兵司机，陪同我沿着险峻的“滇缅公路”寻访昔日的滇西抗日战场。他所在的医院有“红十字照耀滇西”之誉，很多地方史志、宣传部门的同志，都是他出面帮我联系的。如今这位厚道的广西人转业在保山，有空我还要去找他，与他一起坐在腾冲坝子上晒太阳喝酒。随我一起踏访滇西的是北京“龙骑兵军友俱乐部”的两位朋友刘征年和陈佳，他们一路上用摄像机和照相机记录了我们的行程，使得我回到北京后仍能一次次重温松山的地形地貌。

龙陵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冯怀准同志，这位朴实得像内地的乡村干部的领导同志，把家乡史志烂熟于心，在龙陵的各个战场遗址都是我们的最佳导游。因为书一直没写出来，这几年我一直没好意思跟他联系，这回算是对他和他所代表的龙陵有了一个交代。

我尊敬的军事学者兼藏友、宁夏军区预备役大校沈克尼先生，一直热情鼓励我早日完成此书，并雪中送炭地为我搞到了4幅珍贵的远征军滇西地区1/10万军用地图。我感到，这简直是上苍借他之手来助我一臂。当我以为已将松山战役的史料篦梳干净时，忽然得到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讲师李习文传来的喜讯，他委托研究生弟子刘涵喆帮我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检索到了松山战役主攻部队第103师松山战斗详报及阵中整训日记。作者立即赶赴南京，承蒙南京军区创作室创作员裴志海、武警总部司令部调研员成金旺等帮助协调，在第二历史档案馆支持下以档案原件复印了史料，回京后在短时间内对书稿做最后的补充修订。对上述友人的感谢，实在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

经解放军出版社同事殷实先生介绍，我有幸结识了曾翻译《战争与罪责》、《正义是否击败了时间》两本重要日文图书的朱春立老师。朱老师曾在日本企业和中国驻日使馆供职，日语功底非常扎实，且对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当熟悉。在她热情帮助下，我这个日语门外汉才得以消化所搜集到的日文资料，在此谨致以由衷的谢意。而经殷实先生介绍，书稿得到三联书店编辑叶彤先生的认可，对我而言更是一份意外之喜。我印象中这个拥有60年辉煌历史的文化殿堂以人文学术类图书为出版定位，但不久就看到了该店所出的《龙旗飘扬的舰队》、《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等品质不凡的军事历史图书。在叶彤先生的建议下，我对书中引用资料一一作了注释，体会到以学术规范提升纪实作品品格所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这将使我受益无穷。

我的同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主编许向群先生，常常对我说：杂志编辑这个行当是个“万金油”，还是有一点兴趣专攻为好。没有他的大力支持，我这个副主编不可能挤出时间来写这个本职工作之外的东西。感谢我的同事、《军营文化天地》杂志见习美术编辑

强晓东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帮我精心绘制了大量战役进程示意图，使那些因年久而模糊不清的油印历史资料旧貌换新颜。

作者2009年3月22日于北京平安里